当代国外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集体编著

A. Г. 梅斯里夫钦科主编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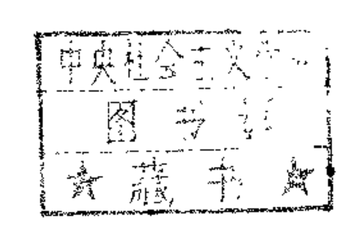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编

А・Г・梅斯里夫钦科主编

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室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北京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4

根据苏联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

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上、下）
А·Г·梅斯里夫钦科主编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室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顺义燕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4.75 字数：600千字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2419·002 定价：6.30元

译 者 的 话

《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一部集体著作,实质上是苏联学术界在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研究方面的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美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以及这门科学发展中的问题和趋势。

我们中国的理论工作者面临着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非常需要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积累的理论经验,包括他们在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方面的经验。可惜,至今为止我国还缺少系统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情况的出版物。我们翻译苏联研究者的这部著作,就是想暂时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相信,这部著作对我国理论工作者会起到启发借鉴的作用。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同志是:编者说明、前言:詹汝琮;上编:第一章:詹汝琮,第二章:杜章智,第三章:杨启潾,第四章:顾锦屏,第五章:陈国雄,第六章:冯申,第七章:单志澄;下编:第一章:冯申,第二章:杜章智,第三、四章:冯文光,第五章:单志澄,第六章:陈国雄,第七章:杜章智,第八章:单志澄;结束语:杜章智,人名索引:冯申。詹汝琮读了上编译稿,杜章智对照原文通读了全书译稿。译文中错误和不当之处,谨希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说明

我们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是苏联科学中第一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发展中的基本阶段、问题的趋势进行的总结性研究。之所以出版这部著作，是因为很早就需要系统地阐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总结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创造性经验，揭示他们对作为统一的国际学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所作的贡献。

本书上编研究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发展，这些国家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下编分析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西欧和美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发展，这些国家是：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奥地利、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书中说明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探讨社会发展的迫切问题，研究哲学史，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反共主义和修正主义方面的各种活动。

这部著作是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在下述单位学者参加下准备的：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卢蒙巴各国人民友好大学。参加编写本书的作者是：《前言》——А.И.梅斯里夫[illegible]科；上编：第一章：Е.И.斯捷潘诺夫、

В. И. 齐普拉科夫（第一节一部分），第二章：М. А. 赫维西，第三章：С. Н. 奥比德娜娅、Р. М. 加比托娃（第三节节）、Н. И. 斯捷潘诺夫（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第四章：П. Ф. 卡津，第五章：А. Д. 马季卢、М. Ф. 索洛杜希娜，第六章：В. Д. 斯卡尔任斯斯卡娅，第七章：С. М. 布拉约维奇、З. Т. 戈连科娃；下编：第一章：Е. Ф. 波莫加耶娃，第二章：М. Н. 格列茨基、В. А. 波多罗加、Т. А. 萨哈罗娃（本章开头部分利用了В. Н. 库兹涅佐夫的材料），第三章：О. В. 伊拉里奥诺夫，第四章：Я. Г. 福格列尔，Р. И. 索科洛娃、И. И. 彼得罗夫，第五章：И. И. 彼得罗夫，第六章：И. И. 切尔卡索夫，第七章：И. И. 切尔卡索夫，Е. Ф. 波莫加耶娃，第八章：В. А. 阿尼申；结束语：А. Г. 梅斯里夫钦科、Е. И. 斯捷潘诺夫、И. И. 切尔卡索夫。

参加准备本书出版的科学辅助工作的，有А. В. 加里尼娜，В. И. 索洛宁科娃和В. И. 齐普拉科夫。人名索引是由В. И. 齐普拉科夫编写的。

全体作者和编辑部委员会向以下苏联和国外学者在书稿准备付印过程中提供的宝贵意见表示深切的感谢：Б. В. 波格丹诺夫教授、В. В. 扎格拉金教授、В. А. 库瓦金教授、И. С. 纳尔斯基教授、В. В. 斯托里雅罗夫教授、П. 金杰夫教授和Д. 格尔杰夫教授（保加利亚）、И. 卢卡奇教授和К. 西盖金教授（匈牙利）、З. 赫佩纳教授（民主德国）、Т. 雅罗舍夫斯基教授和Я. 古拉诺夫斯基教授（波兰）、Р. 里赫塔教授和Т. 加列契卡教授（捷克斯洛伐克）、С. 塔利亚甘贝教授和Дж. 卡鲁奇教授（意大利）、Г. 施泰格瓦尔德教授（联邦德国）、И. 施泰纳教授（奥地利）、Дж. 维尔教授（加拿大）。

作者和编者知道，本书是苏联书刊中第一部这样的著作，决不奢求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多方面活动作出详尽无遗的分析，读者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下列地址：莫斯科121019 沃尔洪卡14号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前　　言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二十世纪的主要事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基本内容的新时代。伟大的十月革命为世界历史以及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深刻进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这些进展的成果之一就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威力的加强、帝国主义立场的削弱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当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都令人信服地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生命力和世界历史意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苏联共产党、兄弟共产党、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正在发展。

随着帝国主义的产生，社会过程的发展重心日益从民族封闭的任务转到国际任务上来。社会主义从本性来说是国际主义的。进步力量只有正确地估计国际范围内阶级力量的配置，才能指望取得胜利。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精神仆从力求一体化的意愿相对立，各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学说，努力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而进行斗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孤立地仅仅在某国或某一批国家中发展，而是在国际范围内，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集体思想的成果，作为各个不同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成果出现的。列宁把关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的辩证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社会运动，揭示了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最本

质的特点和规律性，而只有对这些方面的了解才“能成为弄清某个国家更详细的特点的基础”[1]。忽视普遍规律和过分强调个别国家社会发展的特点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理论上或实践上的失误、民族局限性和狭隘性。同样，如果低估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道路和形式的民族特点也是错误的。在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十分清楚地强调了这一列宁方针。对社会主义各国具有代表性的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的丰富多样，而不是“千篇一律”。“如果对待问题不抱成见，那么应当承认，谁也不能把任何忽视某个国家特点的样板和公式强加于人”。[2]

在当前历史发展阶段，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提出了许多新任务。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强烈表现出来的动态性。在事件的这种瞬息万变的发展中确定深刻的趋势，确定科技革命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的性质，预测未来的发展——这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一些最重要的任务。

在本世纪六十——八十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学者们的创造性思想大大活跃起来，发表的著作数量急剧增加，其质量也提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日益需要研究并总结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解决社会发展进程所提出的迫切问题方面的创造性经验，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包括对哲学的贡献。

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书刊中对这种贡献的研究是不够的、不经常的。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区域地理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最初尝试，在集体著作《西欧和美洲国家的当代哲学和社会学》（一九六四年）和《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一九六五年）中得到了反映。在这些书中对国外许多国家在比较短的时期内（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况作了阐述，诚然是非常简略的阐述。这

种阐述主要带有情报综述的性质。上述书籍问世后，至今没有出版过其他任何研究上述题目的总结性专著。

对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需要变得越来越迫切。一九六七年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并提高其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其中把已经成熟的“保证全面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3]的任务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提出来。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合作的必要性，号召互相学习、要认真地研究并且更广泛地利用兄弟国家的经验。近年来，苏联社会学家在这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因此，在苏联哲学科学史上初次开始发展了哲学研究的比较新的方面——系统地全面地研究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现状和主要发展趋势

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不同哲学学科体系的其他方面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呢?

对哲学知识部门之一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其特点在于这些研究从性质上是按问题的方法和按区域地理的方法的结合，是一般、特殊和个别在辩证统一中的反映。一般就在于在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都研究当代世界发展的共同规律，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门统一的、国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特殊和个别就在于在这些研究中揭示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表现的特点，唯物辩证法原则在各国具体历史条件下运用的特点。

从研究对象的这个特点，也产生了它作为不同哲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这些研究所负的使命是富有内容地分析国外学者所研究的问题的实质，揭示他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另一方面它们应当表明的不单单是问题本身，而是在当代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不同国

家中问题发展的动态。这一类研究综合起来有助于解决苏联哲学科学的已经成熟的任务——创作国际范围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史。[4]

因此，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原则之一，就是把按问题的方法和按区域地理－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这些研究的目的就是创作出关于当代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情况和发展趋势的完整图景。归根结蒂，任务在于创作出这样一套著作，它们包含了理论总结和丰富的情报资料，既有科学认识的意义，又有教学的意义，使苏联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撰写有关社会发展和科学认识的哲学问题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等等的时候能够加以利用。

准备这一类著作有很大的困难。困难在于必须研究大量外文书籍、杂志、报刊，必须从这些大量书刊中选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著作。在创作全面揭示和概括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著作方面，重要的参考材料就是国外学者有关该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现状的著作。可惜，这一类涉及战后时期有关国家哲学发展的著作现在还出版得很少。这就是《一九四五年至六十年代民主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一九七九年）[5]和《保加利亚哲学思想简史》（一九七三年，俄译本出版于一九七七年）中有有关保加利亚九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哲学的章节。在罗马尼亚和和保加利亚总结性著作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在阐述对各国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时，可以分出三个基本决定因素：该国对全世界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该国的哲学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不同国家哲学史的和文化的遗产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性质：在一些国家，它不是促进而是阻碍创造有利于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条件，而在另一些国家则促进了这一点。

为了写出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情况，除了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原则外，最重要的就是也要保证叙述材料所有篇章的结构的统一。在本书中，采用了按区域地理兼按问题的方法，这就使我们有可能用单独一章叙述每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每章中按哲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分析材料，而在各方面内部则按最重要的问题进行分析。在每章开头部分，分析有关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阶级力量配置，党的关于社会发展、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问题的主要文件，划分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阶段、哲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和科学中心。在每章的各节，则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以下方面的贡献：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逻辑学、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的迫切问题、哲学史以及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反共主义、改良主义、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分析了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科学发展的主要方面。揭示了这些国家的哲学家对下述方面的贡献：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研究科技革命、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认识和管理、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等问题，研究个性和培养新人的理论问题。

人类的社会进步的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同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相联系的。因此，在苏共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兄弟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十分注意首先从理论上总结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所积累的经验。下面是最重要的结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使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物质基础得到巩固；兄弟国家的外交活动的协调取得高度效果并显出极端必要性；在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扩大合作的意义日益增大；社会主义发展的形式多样化、民族特点的存在并不否定这种发展的共同规律性的统一。这一切使人们有理由提出下面极其

重要的原理：目前社会主义各国逐渐接近的过程是作为规律性表现出来的。

对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思想的分析表明，在党的文件中和学者著作中正提出和解决那些由于同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联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在多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科学的发展的主要方向是由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决定的。研究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社会实践中一般和特殊的东西，国际和民族的东西的辩证法具有越来越大的迫切性。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积极斗争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斗争促进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优点之一就是它同生活、同实践的有机联系。这些科研成果在准备党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决定时受到重视和利用，并被运用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实践中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政治的有机联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鲜明特点。

哲学研究的顺利发展和它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非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中往往也是承认的。例如在世界第十六届哲学大会（一九七八年）前夕，在联邦德国出版的《德国哲学（一九四五——一九七五）》一书中指出："在民主德国，近三十年来哲学得到显著的发展并起了相当大的社会作用。"⑥但是作者接着赶忙附带说明，在民主德国与在"多元化社会"的哲学发展不同，后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哲学学派，它们的社会影响取决于它们的论据的说服力，而前者仅有"唯一的哲学形式"——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他毫无根据地认为，"民主德国的哲学发展和状况，它的中心问题和成就主要决定于外部因素。哲学是三十年前主要靠外部政治因素建立起来的。"⑦ 作者认为在社

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在外部政治因素中，苏联的影响占主要地位。

当然，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家们，十分珍视苏联学者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在发展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方面所提供的帮助。这里指的是共同研究、翻译教科书和科学著作，培养哲学干部，等等。但是在这些国家中哲学思想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外部因素，而是内部因素。

目前，属于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社会主义各国的哲学家解决的最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就是按照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它的现实可能性和需求，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

在六十年代初，在国外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得了胜利，并且面临着生产关系发展的下一阶段问题。在六十年代下半期，社会主义大家庭大多数国家完成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建设以后，过渡到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新的历史形势向理论战线工作者提出了新任务，这些任务是同规定生产力、社会关系、文化的发展标准，完善社会管理制度，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相联系的。

由于进行研究的结果，深入分析了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质和标准的基本原理。这种分析的最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得出以下结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共同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

尽管在不同国家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民族等条件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发展的共同特点，作为经常因素表现出来的一般规律性的一致则日益处于首要地位。因此共同制定社会主义发展的统一的战略路线，集体从理论上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则变得越来越迫切和必要。苏共中央政治局，苏联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研究了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八三年一月四、五日于布拉格）的总结，指出："在现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它们在世界舞台上为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共同斗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经验的交流，在经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力量的协调等作用日益提高。"[8] 在社会主义各国的所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其中包括哲学领域的共同的创造性活动的发展，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实现的。

在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分析了西欧和美洲一系列发达资本主义家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出现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并创造社会主义革命前提的过程：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深化，加剧的生产过剩危机，能源、金融、生态危机，通货膨胀，大批失业，劳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等等。

这一切因素证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军界工业界集团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帝国主义和为切身利益而斗争的人民群众之间对抗的激化。与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工人阶级"丧失"革命性的论断相反，阶级斗争日益加剧；加入反帝国主义战斗的不仅有工人，而且有农民、农场主、城乡中间阶层、知识分子群众；反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社会力量正在成熟。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民主运动的活跃、劳动人民群众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加强、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的提高必然同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的加强有联系，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争取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唯一科学基础。走在反对反动势力、争取和平民主的进步力量的最前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彻底科学的世界观的拥护者。在复杂的条件下，他们进行巨大的紧张的工作来解决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理论领域，在制定科学的战略和策略，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右的

和“左”的修正主义方面所面临的任务。

资本主义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首先研究的，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反对战争和反对派的斗争中具有迫切政治意义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发展的最深刻的、全面的学说——的方法的基础上，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复杂的、矛盾的过程，两种世界社会体系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对抗的趋势，科学地制定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战略和策略。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很大比重的是论述社会哲学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的著作，这些问题是同下述对现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的研究有联系的：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的道路和形式，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民主的阶级本质，群众性民主运动（青年运动、“新左派”运动、生态保护运动、争取种族平等运动，等等）的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和信教者对话的哲学方面，等等。

近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加紧发挥多元论思想，这些思想以各种不同形式（哲学的、世界观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出来。在资产阶级哲学领域，它们表现为某种“方法论多元论”，这种理论企图证明，在科学、哲学、意识形态和政治中，在同一个问题上存在着大量价值相等同时又竞争着的真理。

认识论的多元论被利用来作为方法论原则，一方面是为了证明各种各样反动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存在是正当的，为了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基础（“多元化社会”）辩护；另一方面是为了把资产阶级多元论思想任意推广到性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社会结构上去，也就是推广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去。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在修正主义者帮助下，企图把修正主义的观点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区域“化”。

他们把哲学多元论和政治多元论思想,“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的思想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企图以此阻挠旨在加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作的努力。他们竭力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扭转到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在其中将产生各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对抗和各政党之间争取政权的斗争。

因此,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完整和统一，维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性质的任务是非常迫切的。同样，今后也必须揭露反科学的和以颠覆破坏为目的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多元化”的观点，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对抗阶级或阶层的。“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而斗争，反对对它进行歪曲或破坏的企图，始终是大家的共同任务。”[9]

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当代主要问题的解决，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要站在为争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核战争威胁、争取各国人民之间持久和平而斗争的战士的最前列。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一九八三年）决议指出：“在国际舞台上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完全对立的世界观之间的斗争正达到激烈的、整个战后时期从未有过的尖锐程度。”[10]而人类的未来在不小的程度上取决于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结局。同时,思想斗争不应变为心理战争,尤其不应变为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对抗。在华沙条约参加国政治宣言（一九八三年）中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到对和平事业和国际安全的责任，在自己的政策中严格区分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关系问题，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建立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一贯主张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广泛的合作。各国不管社会制度如何而互相合作，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符合巩固普遍和平的迫切要求的。”[11]

苏联在争取和平未来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中，是同世界共产主

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共同前进的。苏共中央总书记К．У．契尔年科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演说时强调指出："我们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对我们外国同志争取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权利的斗争怀着热切的同情和深深的敬意，并且认定全力巩固联结我们的纽带是我们的义务。"⑫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体进步人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找到的不仅是对当代根本问题的解答，而且是在总结各国革命运动的重大经验和科学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一学说的纲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于创造性地运用它来解决当代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遗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经验总结，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

研究各个不同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成就，有助于解决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思想统一、更深刻地揭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等方面的重要任务。

通过生活检验、经受一切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深入到我们这个星球的最遥远的角落。它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思想基础。

---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142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81年莫斯科版第34页。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1966—1968）决议汇编》1972年莫斯科版第9卷第353页。

④ 参看Т·М·约夫丘克《列宁主义，哲学传统和当代》1982年莫斯科增订2版第235—236页。

⑤ 参看Б．В．别索诺夫、А．І．梅斯里夫钦科《民主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的珍贵著作》，载于《哲学问题》1980年第3期。

⑥ Н·М·鲍姆加特纳、Н．М．扎斯《德国哲学（1945—1975）》1978年柯尼施泰因版第36页。

⑦ Н·М·鲍姆加特纳、Н．М．扎斯《德国哲学（1945—1975）》1978年柯尼施泰因版第33页。

⑧ 《共产党人》1983年第1期第22页。

⑨ 《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材料》1976年莫斯科版第31页。

⑩ 《苏共中央全会（1983年6月14日——15日）材料》1983年莫斯科版第68页。

⑪ 《真理报》1983年1月7日。

⑫ 《苏共中央非常全会（1984年2月13日）材料》1984年莫斯科版第20页。

上编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 匈牙利 ·民主德国

波兰 · 罗马尼亚 · 捷克斯洛伐克

南斯拉夫

下　编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在资本主义国家

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

奥地利·美国·加拿大

阿根廷



目　录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资本主义国家

第 一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保加利亚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是保加利亚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进行根本改造的出发点。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并开始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保加利亚人民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始终不渝地按阶段地解决农业集体化任务，逐步把农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部门，完善对国民经济、全部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计划和管理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社会主义型的个人。保加利亚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政治成就促使国内形成良好的社会－心理气氛以及有信心、进取心和创造性的空气，保证了民族文化的繁荣，成为具体学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迅速发展的巩固基础。

保加利亚的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拥有丰富的传统，这种传统渊源于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建者Д．布拉戈耶夫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活动家Г．季米特洛夫以及保加利亚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П．格诺夫、В．科拉罗夫、Г．巴卡洛夫、Т．帕夫洛夫等人。早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就形成了哲学家的坚强核心，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一贯不调和地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修正主义，为建立保加利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而奋斗。[1] 在三十年代保加利亚就已经出现了相当可观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著作。[2]

保加利亚在革命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根据保加利亚研究者提出的分期法，[3] 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决定于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它包括了从一九四四年至五十年代中期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意识形态的总任务曾由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四八年）决议作了规定，就是：清除保加利亚理论思想的资产阶级影响，把理论思想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从而保证从理论上，也包括从哲学上分析国内社会发展的问题，造就一切知识领域的新的科学干部，帮助培养并巩固劳动人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

保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决定了国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第一阶段的任务的性质。[4] 这些任务的基本内容是：反对保加利亚国内资产阶级哲学残余，首先反对雷姆克主义这个在保加利亚最有影响的唯心主义派别；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改造整个思想战线、全部具体科学；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

一九四五年成立了保加利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它以后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中心。以克利门特·奥赫里德斯基命名的索非亚大学和国内其他高等院校建立了马列主义教研室。开始出版了理论杂志《新时代》（保共中央机关刊物）和《哲学思想》。大量发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基本著作的译本。苏联作者的著作也被翻译过来。[5]

社会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原则的确立是社会主义在自身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而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则成为保加利亚哲学科学取得进一步成就的前提。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决定于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它包括五十年代下半期到现在这个时期。

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个阶段是同苏共二十大和保共中央四月全会（一九五六年）的决议有密切联系的，这些决议为克服对哲学思想发展发生过不良影响的教条主义因素和个人崇拜的后果奠定了始基。全会制定了一系列彻底实行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的措施，承认必须改进宣传和鼓动工作、党的全部思想工作，把它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6]

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保加利亚开展了对社会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的广泛研究。主要注意力放在：认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意义、性质和动力、一般特点和特有的特点，等等；[7] 论述整个社会，特别是保加利亚社会的进步改造的各个方面的特点；[8] 为从理论上认识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工具；[9] 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和修正主义。[10]

国家从建设社会主义基础向建设发达社会主义过渡所造成的新的历史形势，要求树立新的目标，规定生产力发展的新标准，继续发展一切社会形式和关系，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这一切决定了保加利亚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整个新的意识形态任务和理论任务。由于六十年代中期制定了领导经济的新体制，在保加利亚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明显地有了根本的质的进展，这些进展影响到保加利亚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新体制的实行表明迫切需要使全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需求和目标适应。因此保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对国民经济的新的管理体制作了很高的评价，提出了改善对全部社会主义社会体制的管理的任务。

保共中央七月全会（一九六八年）的决议对哲学和社会学问题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这次全会制定了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改善对国家的社会管理的整个体制的战略方针。

在保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一年）的决议和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中，这一方针得到全面的体现。代表大会研究了涉及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建设的主要阶段、社会管理的改善等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

代表大会特别注意社会科学和马克思马列主义哲学——对各个不同社会过程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科学指导的基础——的作用。因此在保共新纲领中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今后努力创造性地发展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以及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11]

在保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的各种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一直继续到目前。出版了相当可观的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区分标准和特点的集体著作和个人著作。[12] 对社会认识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哲学方法论问题和哲学社会学问题进行了特别广泛的研究。[13] 研究上述问题的保加利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作得到苏联学者的承认，保加利亚作者的著作的被译成俄文就证明了这一点。[14]

为了改进哲学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师资和科研干部的培养工作，于一九七二年将保加利亚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索非亚大学哲学系、保加利亚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心理学实验室合并成统一的哲学和社会学干部科学培养中心（ЕЦНИКФС）。由于采取了组织措施，在十——十五年中哲学干部的人数增加一倍。[15]

哲学干部人数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促使哲学、社会学、心理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有了根本改善。在全国哲学社会学代表会议（一九七五年）上指出："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以前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个别著作的出版被看作重大事件，那么现在每年都平均出版三十五部著作和小册子，从一九四六年到目前为止仅

哲学家和社会学者就出版了论述本学科的迫切问题的书籍、教科书和小册子六百四十三种。还撰写了有关哲学、社会学、科学共产主义和心理学方面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发表了研究这些学科的基本问题的专题著作。其中一些著作得到国际承认，并被译成俄文、德文、英文和其他文字。”[16]

保加利亚学者认为国内哲学思想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通过组织国际理论会议、学术会议，实行哲学杂志间的合作，经常交换科学专家，共同撰写集体著作来进一步加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家的科学合作。一九六九年为了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在索非亚由托多尔·帕夫洛夫发起举办了以“列宁的反映论与现代科学”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它的资料成了以后苏联和保加利亚共同撰写的两部集体著作《列宁的反映论与当代》（一九六九年）和三卷本的《列宁的反映论与现代科学》（一九七三年）的基础。根据保加利亚学者的评价，“这些著作是在反映论领域对现代科学成就和社会历史实践进行哲学理论研究的初次国际尝试，也是保加利亚和苏联哲学家之间在研究认识论的最迫切的问题上日益融合一体的表现。”[17]

从一九七〇年开始举办的瓦尔纳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夏季学园已经成为保加利亚哲学家倡议组织的新的国际合作形式。

当代保加利亚的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水平很高是得到国际承认的。因此在这里举行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如第七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一九七〇年）和第十五届世界哲学大会（一九七三年）不是偶然的。

七十年代下半期的标志是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所造成的保加利亚哲学和社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具有综合的、整体的性质，只有依靠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管理科学、法学、美学、伦理学、科学共产主义、教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代表们的共同努力才能够顺利地解决。[8] 这样做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上述学科的方法论作用增大了。因此，保加利亚哲学家十分注意分析当代的社会历史实践、国内发生的社会变化、社会生活的新现象、对它们进行科学管理的规律性、社会主义型的个性的形成。他们继续研究反映论问题、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唯物辩证法问题、局部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以及美学、伦理学、科学无神论问题。

在当代保加利亚，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结果是哲学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功能的意义提高了。这一点表现在，现在准备党的最重要决议时，在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时都考虑了并利用了保加利亚哲学家和社会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保加利亚的哲学家和社会学者可以有充分根据说："没有一个涉及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根本问题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没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参加准备。"[19]

这一点最明显的证明就是保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八一年四月）的材料。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了目前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这些任务首先是同在新的经济方法的基础上增强国民经济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坚定方针相联系的，而新方法的基本原理在一九七八年全国代表会议上已经提出了。采取这种方法首先要建立集中制与民主制的正确相互关系、完善分配关系、加强社会管理中国家-社会和社会-国家的因素、在其中利用主要是经济的机制和杠杆、增强法制、加强经济结构和国家政治结构的基层的物质力量、彻底改进对社会舆论的研究、不断提高对领导干部的要求，等等。

为了顺利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些重要问题，下一个时期党的思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必须把保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思想方针变成认识、信念，变成劳动群众的行动动机，其办法是：加强思想工作的进攻性和战斗力、确立思想工作为党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经常保持精神联系的主要形式、加强思想工作的创造性。按照上述要求，T.日夫科夫在保共中央工作报告中指出：“社会经济政策的实行要求在以下领域进行更深刻得多的研究：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本质和联系，它们的发展趋势、对它们进行调节和控制的动因和因素，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个人行为的动机，个人的追求、意愿、信念和立场的形成。”[20]个人的社会积极性是衡量思想工作的影响程度的标准。T.日夫科夫在这方面强调指出：“我们期待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社会学、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是，它们将更深入地研究那些决定着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个人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和在生活中的确立、群众意识的发展过程和趋向的社会因素。”[21]

对上述许多问题的广泛研究工作在代表大会以前的时期就已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2]

一、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哲学和社会学问题

从理论上认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活动的各个方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的观点的进一步具体化，这个观点的核心是关于社会历史是社会经济形态依次交替的学说。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把以下问题提上日程：全面规定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任务和前景；必须划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特别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

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文件中和保加利亚的科学出版物中，

"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概念的内容在六十年代就形成了，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完整和准确。在保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一年）通过的新的党纲中，对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的特点作了充分的说明。[23]

在准备党的纲领过程中，党依靠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的全面考虑，依靠了保加利亚哲学家和社会学者的研究工作。例如，早在一九六二年保加利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就出版了集体著作《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其中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是指解决过渡时期的任务，而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指建设发达社会主义。Ж．奥沙夫科夫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阶段和规律性》的绪论中论证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必要阶段的思想。[24] 上述著作的其他作者——M马尔科夫、H．斯特凡诺夫、H．亚希尔、CT．米哈伊洛夫、CT·安格洛夫、B·多布里亚诺夫——企图全面说明国内发展的新阶段的特点。在整个六十年代和在七十年代初期，在自己著作中对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各方面问题进行研究的有T．帕夫洛夫、Ж·奥沙夫科夫、B．多布里亚诺夫、CT．米哈伊洛夫、K．多布列夫、CT．茨韦特夫等。因此T．日夫科夫有充分根据指出："制定纲领是由中央委员会领导，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工作人员以及人数相当可观的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参加。"[25] 同时他指出必须进一步分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的各种不同问题："我们希望我国的哲学家家、社会学者、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活动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论上的概括，说明社会阶级结构的动态、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变化过程、社会统一的巩固和个人的发展。"[26] T．日夫科夫强调指出，因为纲领给上述研究指出了方向，同时它本身也需要有上述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设

共产主义的理论："纲领是进一步研究我国社会发展的理论问题的基础。纲领不能指望成为终审法庭的绝对真理。它在对一系列问题作出理论回答时并没有预先决定理论的未来发展，也没有限制进一步创造性的研究。"[27]

保加利亚哲学家和社会学者的功绩首先在于他们回答这种社会要求时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文献方面是最早一批撰写了相当大量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理论奠定基础的著作。[28] 在这些著作中分析了一系列涉及发达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完善的问题。在其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它们的界限和划分标准、特点和特征，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辩证法，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阶级结构、社会管理、精神生活的完善和发展的规律性问题，科技革命的成就同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结合的方式，培养与发达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个人、扩大他参加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善化的途径，等等。

保加利亚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集中注意于上述方面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Н．伊里巴贾科夫、В．多布里亚诺夫、С．波波夫、В．伊万诺夫、Ц．灿科夫等论证了在研究发达社会主义中采用系统结构方法、发生学方法和区域性方法的必要性和特点；阐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的研究的多种多样的方法论要求；揭示了并分析了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各个不同形式的特点。

对发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有内容的研究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这就要求认真了解各种各样社会过程的特征和特点以及这些过程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因此目前国内对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活动的最重要方面广泛进行的具体社会学研究是上述研究的巩固基础。

社会学问题的研究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同整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产生的。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依靠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总结了各个不同国家的制度，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在某个时候以前，社会学的发展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密切联系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学问题就开始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在保加利亚文献中，这一点在T．帕夫洛夫的著作中得到反映，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在《反映论》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最一般的“非哲学科学”的思想，这门科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基础，但研究对象与它不同，是研究整个社会的结构和结构规律性的。

这一思想对保加利亚一九四四年革命后社会学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社会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中的过渡时期（一九四四——五十年代下半期）基本一致，在这个阶段社会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问题的轨道上发展的。所研究的是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动力；过渡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阶级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在保加利亚社会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意识中与此相应的变化。

保加利亚社会学发展中的新阶段是由于国内向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过渡而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要求确切而具体地了解最重要的社会过程的状况，这就决定了必须把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同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社会实践的需要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并且为了作出关于改造社会主义现实某些方面的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行政决定而积累具体的社会学的信息。

社会学研究对解决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意义的增长以及因此把社会学研究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使得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科学机构的结构中有了社会学的建制。一九五九年在国内建

立了社会学协会，同年它成为国际社会学联合会的成员。一九六八年建立了保加利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在不同的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中，后来（一九七五年）还在最大的企业中建立了一系列社会学中心。到六十年代末保加利亚社会学思想获得了牢固的建制的基础。一九六八年开始出版《社会学问题》杂志（最初的名称是《社会学研究》）。

采取在国内广泛开展并从科学上保证社会学研究的措施，要求保加利亚社会学者解决一系列重要理论的、方法论的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它们涉及社会学的对象、内容和结构，社会学同其他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以及经验上和理论上的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

在五十年代下半期和六十年代初首先从社会学同历史唯物主义对比的角度讨论了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问题。T．帕夫洛夫关于社会学作为"非哲学"学科的独立性质的主张在Ж．奥沙夫科夫和K．瓦西列夫的著作中得到支持和论证。[29] 但是把社会学看作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范围之外的关于社会的特殊的局部科学，这种观点从一出现到目前一直受到许多保加利亚学者的反对。[30]

坚持社会学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独立存在的作者们（Ж．奥沙夫科夫、K．瓦西列夫、B．多布里亚诺夫、C．米哈伊洛夫等）的努力，导致制定这个研究方面的关键概念——社会学结构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产生是由于试图进行这样一些工作的结果：揭示社会作为完整系统发挥职能和发展的前提，论证区分这个系统中那些使社会本身作为完整的构成物存在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成分的标准。这些成分被确定为那种为使社会能够作为完整系统发挥职能所必要而且是充足的基本人类活动形式。按这些作者的意思，这些基本的活动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构成社会的基本的、最一般的结构——社会学的结构。一部分作者（C．米哈伊

洛夫、 В．多布里亚诺夫等）分出这个结构的五个组成部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的再生产、社会管理和交往），[31] 另一些作者（Ж．奥沙夫科夫）则分出四个组成部分（物质生产、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类个体的再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管理、交往）。[32] 在这两种场合，对人类活动的基本形式的划分是基于对社会劳动的一种社会学分工的观念。[33]

根据上述作者的意见，社会学结构同其他社会结构——经济、社会阶级、政治、人口学等等的结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社会学结构包括了保证社会作为一个系统的完整性的基本的、绝对必要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是包含社会系统因素的唯一本质结构。它是抽象的，因为它确定下来的是社会的基本成分之间的最一般的相互关系，撇开了它们的具体历史表现。[34]

考虑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的抽象的、社会学结构的基本成分的特殊变态和它们的相互作用，是对现实的社会构成物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任务。[35]

社会学结构的思想也被保加利亚作者用来作为社会学科学本身结构化的基础。比如， В．多布里亚诺夫近年来研究并论证了把社会学看作具有不同层次的科学理论体系的观点，而这种体系就整体来说包括社会的社会学断面。[36] 按照他的意见，社会学知识结构的最高层次是一般社会学，它的对象是最一般的、深刻的、抽象的社会学结构、社会发挥职能和发展的最一般的社会学规律。社会学知识的下一层次就是局部社会学理论，其中分为形态社会学、区域社会学和社会各个子系统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结构的思想也被用于分析两种形式的社会学认识——抽象理论的认识和具体经验的认识——，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37] 以及研究社会学认识的方法论问题，[38] 制定实现经验的、社会学的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积极研究后一类问题的社会学者

有С．米哈伊洛夫、В．措涅夫、К．瓦西列夫、Б．恰卡洛夫И．瑟科娃、А．阿塔纳索夫、Й．维涅基科夫、А．约瑟福夫夫等等）。

尽管在保加利亚社会学文献中对上述思想进行了一定的分析研究，但是它还要求全面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检验和论证。

目前在保加利亚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面既有物质生产、社会阶级结构的动态、群众性交往的发挥职能和发展等的社会学方面，又有精神生产、社会意识状况、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社会集团的心理和思想倾向等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是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的基础，而且是使社会意识、社会认识和意识形态这些哲学问题具体化和深化的基础。

对社会意识、社会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的研究
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主观因素的作用的不断增长首先表现在社会意识对决定它的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的加强。因此就要求进一步加深从哲学上对社会意识、它的一切形式和层次的分析。

保加利亚研究者为了实现这种要求，全面分析了社会意识的问题。Л．格尔杰夫有许多著作在这方面进行研究。[39] 其中对整个社会意识，特别是社会主义意识的特点以及发挥职能和发展的规律性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了使它的一切形式和层次完善的途径以及提高其目的性、能动性和效果的手段。

Д．格尔杰夫根据系统结构方法把社会意识看作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它反映了社会存在的不间断的进程和客观逻辑，又包含了一系列由于本身固有的规律性而发挥职能并发展起来的子系统。同时，所谓社会意识的结构，是指划分社会意识要素的一定方式和次序以及这些要素的具体的相互作用，它们归根结蒂是由社会存在的具体的历史的多样性决定的。

作者是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最先提出关于社会意识的所谓基

本的、“基础的”结构的原理的人之一，这种结构包含着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在全部人类社会发展时期都始终不变的社会意识的基本成分。采用这个确定社会意识的普遍因素（作者把科学的意识、评价的意识和实践的意识列入其中）的概念，对于彻底确定社会意识的本质和特点，对于系统地分析它的规律性、它的结构的各种静态和动态方面，是十分有前途的。

保加利亚学者分析了社会意识的各种不同的结构成分。例如Д.拉杰夫在研究科学和社会的关系时，揭示了科学同其他社会现象相比是本质的表征，规定了科学在复杂的社会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网中的地位，仔细研究了社会和科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作用的特点。作者指出，在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为实现人类由来已久的对逻各斯和实践、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和谐一致的追求创造了良好的前提。[39]

由于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变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比较全面地研究科学认识的本质特点、规律性和功能就具有日益增大的意义。Н.斯特凡诺夫、П.金杰夫、Г.吉尔吉诺夫、М.杨科夫、А.波利卡罗夫、А.杰伊科夫、В.普罗达诺夫等等，在竭力揭示科学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阐明科学认识的发挥功能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内部因素和特点时，集中注意力去研究这样一些科学的基本问题，如科学在当代意识形态斗争中、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在提高人类道德中的作用，科学认识的方法论，在科学中认识过程的基本特点，科学认识同马克思主义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密切联系，科学革命的特征和特点，认识的科学形式和非科学形式的相互关系，等等。[40]

在保加利亚哲学文献中也研究了社会意识的其他成分。比如С.波波夫在分析社会意识的评价方面把反映、认识、评价的概念加以对比并指出评价是人类认识的必要要素，而认识本身又表

现为作为物质的普遍属性的反映的特有形式。作者揭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培养科学世界观、对制定局部科学的认识方法论具有重大意义。

保加利亚研究者还分析了社会意识的其他方面：它的认识、感情和意志方面的相互联系，社会意识同个别意识、个人意识的相互作用，等等。[42]

在研究社会意识的层次方面给了极大的注意。比如T．基肖夫在其著作中揭示了日常意识的本质和特点，仔细研究了日常意识同感性的和经验的认识以及同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揭露了它内部固有的矛盾以及它的形成和发展的机制。他指出，日常意识所固有的外向性限制了它的自我深化过程，虽然不是完全排斥这种过程。在日常意识范围内,由于它有感性负担、外部倾向，它要自我分析、看清本身的结构和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能的。只有处于理论意识层次，这种分析才有可能，因为理论意识理解日常意识同现实的关系，以及现实反过来对日常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因此必须提高科学在解决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方面的作用。[43]

Д．格尔杰夫分析了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他揭示了在知识变为信念的过程中象精神需要和利益这样一些意识形态过程的社会心理要素的意义和作用，指明了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心理方面，阐明了指导社会心理的方法、指导意识形态过程的社会心理问题，把它看作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活动的主要任务之一。[44]

许多保加利亚学者在著作中对意识形态过程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个过程在建设和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在保共中央二月全会（一九七四年）以后对这个问题的兴趣特别增强了。在这次全会上提出了思想工作的主要任务：改

进教育工作以保证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紧密联系；提高对组织和指导意识形态过程的现代方法的研究和实际应用的效果。在索非亚大学社会科学院的机构中建立了理论的和指导意识形态过程的中心，协调这方面的全部研究工作。保加利亚学者分析了意识形态的本质、性质和发展规律性，它同哲学和科学的相互关系，它同社会意识的其他层次、同社会环境的规律性联系，它在社会信息、社会心理的思想影响方面的作用，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等等。[45]

最近时期，在保加利亚哲学文献中有许多著作论述了作为社会意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能动地发挥功能的过程的社会认识的问题。根据 П．金杰夫的意见，任何具体的社会认识的对象表现为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深化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在掌握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的社会活动的特征性方面的基础上并且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起来的，而这些特征性方面是社会认识的主体在其活动的某阶段感兴趣的。П．金杰夫揭示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在社会认识过程中的方法论功能，详尽地指出，如果没有在形成认识论映象的基础上使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社会认识就不可能从客体的现象深入到本质，而认识论映象本身也是在对现实的实践改造过程中形成、被认识并受到真理性的检验。[46]

许多著作分析了社会认识的各个不同方面：它的客体、主体和对象，结构和形式，它发挥功能和发展的规律性，它的预测能力、方法论和方法，等等。研究这些问题是改善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管理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因为在这种改善的过程中，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发生具体的相互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发生积极的反作用。[47]

社会管理的哲学方法论问题 大大扩大的国民经济规模，整

个社会机体的职能经常不断的变化以及这一机体的发展的加速，极大地提高了正确地作出关于在社会生活某一范围内进行改造的方针的行政决定的意义。因此对于构成管理过程的一切部分的组织和职能的发挥，对于准确地确定目标和规定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手段，以及相应地对于领导者和执行者的业务水平和知识都提出崭新的要求。这一切也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认识和有效地应用其成果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方式。

在保加利亚对社会管理进行理论研究的主要方面是：研究社会管理的一般理论，它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工艺因素和组织因素，社会信息、预见、预测、计划工作在实现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作用；论证作为提高社会管理效果的有效手段的专项纲要法和倍增法。

目前对社会管理问题进行研究的有M・马尔科夫、H・斯特凡诺夫、B・多布里亚诺夫、П・金杰夫、T・维洛夫、H・尼科洛夫、Д・格尔杰夫、Г・吉尔吉诺夫、M・杨科夫等。

保加利亚研究者最早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提出必须把社会管理理论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的学科来研究的问题，并且在这一研究方面迈出了成功的步伐。把管理关系——一种特殊形式的、无法归结为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划出来作为社会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对于把这个理论分出来成为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具有重要意义。管理关系这个概念作为进一步分析管理问题本身的基础，还起着重要的方法论的作用：它使保加利亚研究者在社会管理理论同其他与之密切联系的社会科学如哲学、控制论、科学共产主义、经济和法律科学等等之间建立了正确的相互关系。

研究社会管理问题首先要求使一般哲学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具体化、具有独特的内容，要求进一步深入分析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保加利亚研究者对社会管理问题进行哲学的分析

——其目的是通过在社会机体的自己运动、自动调节、自动控制的过程中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等关系来划清社会管理概念的界限——并在这种分析的过程中使用主体和客体、目的和手段、有意识和无意识等哲学范畴，他们同时揭示了“社会管理”概念的内容，分析了与其认识有关的概念工具，研究了在管理过程中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在解决管理任务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管理和管理知识对阶级任务和阶级目标的依存性。

保加利亚学者在对管理中的主客体关系进行哲学分析的基础上对“社会管理主体”概念下的定义是研究社会管理理论的重要因素。按照对这个问题作过很多研究的 T．维洛夫的意见，社会管理的主体的最突出特点是积极地自觉地影响社会体系的某些社会过程、方面以及整个社会。[48] 由于这一点，社会管理的主体表现为属于主观因素的主要结构要素。它是有可能和有权采取相应的行政决定并保证其实施的复杂的等级的组织系统。这里首先涉及政党、国家、各层次群众性社会组织的领导，也涉及那些参与准备和组织对行政决定的执行的劳动者集团。保加利亚研究者指明，在主观因素范围内社会管理主体在作出有关影响社会过程、现象和关系的某些决定方面以及在组织执行这些决定方面是起决定作用的。[49]

保加利亚作者在分析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功能的社会信息的问题时把社会信息看作社会认识过程的结果，而后者是同主观因素的活动密切联系的。社会认识是这种活动的最重要的方面。比如，T．维洛夫指出：“社会认识及其在社会体系发挥功能和发展中的作用首先在主观因素和社会管理主体的社会认识的和有目的的行政调节的活动中显露出来。主观因素和社会管理主体是社会主体的结构要素和基本利益的表达者”[50]

社会信息虽然是社会认识的结果，但可以分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保加利亚学者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门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基础上，顺利地解决了这样一些社会信息的重要哲学方法论问题：社会信息同社会意识、它的形式和层次的相互关系，社会科学在社会信息形成中的作用，社会信息在认识向实践转化过程中发挥功能、发展和运动的特点和规律性。

把社会信息看作社会意识的因素之一，对于正确地对待社会信息具有重要意义。在保加利亚学术文献中，社会信息被看作社会意识的“做工的”、“工作着的”部分，这个部分与社会存在发生直接相互作用，反映它，并保证它有目的地发挥功能和发展。社会意识的任何成分为了变成信息，应该变换成适合于采取行政决定的形式。[51]

在保加利亚科学书刊中十分注意社会信息在从认识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的运动。Н．斯特凡诺夫提出的最初的观点得到许多保加利亚研究者（М．马尔科夫、Д．格尔杰夫、Г．吉尔吉诺夫、М．杨科夫 等） 的 赞 成，它不仅对于社会信息和社会认识，而且对于现有精神文明的整个领域、它的一切方面和形式的进一步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2]

按照这种观点，参与行政决定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全部信息无论是科学的还是评价的，都可以分为一种向管理的子系统“报告”被管理的子系统的状况的信息（描写信息）和一种赖以对被管理的子系统实现相应影响的信息（规定信息）。在管理过程中，描写信息不是始终不变的，而是受到加工的，这是管理的非常重要的、重大的因素。信息的加工过程就是把描写信息改造为规定的、规范的、指示性的、直接存在于行动之前并决定着行动的信息。

保加利亚的哲学家和社会学者根据这个情况最近作出很大的

努力来科学地分析各种社会规范化体系——法律的、道德的、美学的等等。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的新的重要方面是研究违反社会准则的原因和条件，后者是消极的、危害社会的现象和犯罪现象的基础。[53]

研究人的问题、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问题 目前在保加利亚哲学社会学文献中加紧形成研究人的统一的综合的方法，它表现为围绕着人的问题把各种不同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

综合的研究人的方法要求解决一系列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对人的社会环境和居住环境的数据的综合优选，对"人——机器"、"社会管理——个人"的关系的完善，对认识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的制定和对个人、个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社会心理特点、意识的改造，等等。这一切问题在保加利亚哲学文献中都得到研究。[54] 研究者强调指出，哲学方法论不仅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般认识论的和世界观的基础，而且是当前所有对人的综合研究的直接而必要的参加者、主要中心和组织环节。[55]

保加利亚学者根据关于人的能动本质的原理指明，这一本质是在同外部世界、其他个人、社会集团、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作为自然力量，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一种积极地改造外部世界的存在物。人不是按照某种生物物种的规律行动，而是多方面地行动，也就是说，在任何具体情况下，人按照那些作为因素包括在他的社会活动的更广泛的过程中的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规律行动。人，结合成社会的人们同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劳动中实现的。可见，劳动—— 人同周围世界相互作用的最普遍的形式——把人变成普遍的、"综合的"研究对象。

保加利亚学者根据这些原理指明，对人的整体研究首先要求熟悉作为积极活动家的主体的结构并理解他的主要活动——劳动、

认识和交往——的系统。人的活动的结构有各种层次：从低层次即包括与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然本性相符合的宏观运动和微观运动系统的层次，到高层次即与作为个人的人的社会功能相联系的层次。在人的活动的结构中，这些层次反复交织一起，反映历史和自然的规律的真正互相渗透和统一，在这里自然以被改造的形式包括在社会体系中。因此，离开社会本性和关系就不可能考察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完整结构，而自然本性和关系是在社会本性和关系的基础上被改造的。[56] 因此也就产生了学者们对分析人的社会性和它的基本表现即人的实践所赋予的意义。

保加利亚哲学家在分析人同社会的相互作用时，强调指出社会和人的自然的统一，同时个体和社会具有相对独立性。只有社会赋予个别人一定独立性的这样一种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出现时，个人的出现才成为可能。这样，个体变为社会的个人，而社会的个人是个别的、独特的东西同一定社会集团或阶级所固有的特殊的东西，同说明人之为人的一般的、类的东西的辩证统一。

个人结构是在人类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在他进入社会关系、掌握积累的经验并把这种经验用于他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意味着个人结构是从社会关系结构产生的。由此可见，对作为个人的人的基本特征的描述是建立在对该社会的社会关系的研究上。[57]

个人的进步决定于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于是否存在那种使他能够在时间上，在他所处的具体状况方面最充分地实现自己人的本质的自由（从经济的自由到个人的自由），因此学者们全面研究了人的自由和异化以及它们的产生和发展的条件问题。[58]

保加利亚学者在分析培养新人问题时指出了个人发展的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同以个人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为转移的个人的质的变化相联系的。指的是研究个人类型学。保加利亚

作者强调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求运用具体历史的和阶级的方法。根据这种方法，社会关系系统的类型决定该系统中存在的个人的类型。

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剥削阶级的意向和被剥削阶级的意向处于对抗性矛盾中。因此在所有这些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类型的个人，这些类型又有各自的亚类。在社会主义社会则形成统一类型的个人，这就是摆脱剥削、占有生产资料、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协调一致的社会主义个人。保加利亚学者强调指出，统一类型的个人的形成绝不是意味着各个个人同一化、个体丧失个性。社会主义个人有许多亚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具体生活条件的多样化和不断变化决定了社会主义类型个人的亚类的多样化。研究这些社会亚类的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提高社会管理和培养新人的科学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58]

作为个人的人的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同第一个方面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它同作为一定质的系统的个人的不同方面发展的和谐程度有关。这种发展是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相联系的。

近来在保加利亚的文献中越来越集中注意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问题。正如C，安格洛夫指出，这种情况之产生不仅是因为在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对抗的条件下，在每个制度下生产方式都成为当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中心，而且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使得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类型的个人的生活方式。[59] 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不同方面——哲学方法论、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按照保加利亚作者的意见，对生活方式进行各方面的理论分析，就能逐步建立起一种完整的理论，这种理论必定变成现代对社会的科学认识的基本方面之一。保加利亚学者

（С．安格洛夫、В．莫莫夫、В．维尔科娃、П．达涅夫、М．德拉加诺夫、З．杜诺夫、Г．马纳福夫、П．米捷夫、Л．尼科洛夫、Д．斯坦科夫、З．斯托亚诺夫等）研究了生活方式同生产方式的相互作用，把生活方式作为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条件下在人们的一定活动形式的基础上发挥功能和发展着的完整系统进行分析，并且揭示了决定生活方式不断发展的结构变化和社会机制——从物质生产机制到精神、意识形态机制。这些研究使保加利亚共产党有科学根据地、有效地指导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树立并完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过程。

二、对认识论和哲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

反映论的迫切问题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保加利亚哲学家的学术著作中，关于反映论的著作占有主导地位。造成这种情况不仅因为反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而且因为保加利亚早有深入而全面地研究有关问题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创建人Д．布拉戈耶夫的著作中开创的，而且由于Т．帕夫洛夫[61]及其无数追随者的研究，这一传统已变成保加利亚哲学思想的主要方面之一和突出的特点。

Т．帕夫洛夫院士是最早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发挥了列宁关于反映是"物质基础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哲学和具体科学都具有根本意义的特性的思想。他全面地指出：在同周围世界相互作用时，在反映的物质系统中发生了内部状态的变化；后者是对外部作用的特有的内部"反应"，在其基础上形成了外部反应，反作用；因此，反映是反映的物质系统的内部状态和反作用的统一。

帕夫洛夫利用从现代科学汲取的丰富的实际材料指出，物质系统的反映能力从比较简单的形式过渡到日益复杂的形式，辩证地"扬弃"这些形式的规律性和矛盾，从而逐步发展起来，最后在

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以主体自觉反映客观世界为基础的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最复杂最高级的形式——中达到最充分的体现。根据这一点，帕夫洛夫认为哲学和局部科学的共同任务就在于全面揭示作为一切物质特性的反映的形式和程度的无比纷繁，仔细研究反映从处于物质组织低级阶段的无意识的东西逐步变为处于其高级阶段的有意识的东西。[62]

帕夫洛夫在《反映论》中研究了物质——最初是本体论方面的主体，这时它作为特性、活动状态和它们变化和发展的动力等的承担者出现——如何随着“自觉的个人主体”的形成而逐步被认识，而这个个人主体在其同周围物质世界发生实践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内部从认识论上同认识客体相对立。[63]

因此帕夫洛夫全面阐明了揭示主客体关系问题对于解决哲学的其他问题如认识，认识的自觉性、积极性、能动性、真理性等等所具有的重大意义。[64]

T.帕夫洛夫的思想是广泛地从各个方面研究主体和客观活动的相互关系，主体的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的能动的、创造的方面，活动的效益、计划性和目的性的条件等问题的理论源泉。研究这些问题是当前阶段保加利亚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由于T.帕夫洛夫及其追随者的创造性活动，在保加利亚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派，即得到国际承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论方面的派别。它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中全面论证这样一个原理：列宁关于反映是物质的普遍特性的思想，是这个领域中所有具体科学的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已经从假设变为证实的科学真理。他们研究的对象是：反映作为主客体关系的表现的本质特性，认识方式的特点，反映的能动性问题，反映和创造的统一问题，反映和信息的关系，等等。

C.彼得罗夫的著作[65]在保加利亚哲学书刊中是最详尽地研

究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表现为这种关系的特有方面——的著作之一。按照他的定义，“客观”这一术语的最一般的含义就是在一切方面或某个特定方面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根据这一点，作者分出客观的东西的一系列不同的独立形式。对主观这个概念也作了同样多方面的说明,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在一切方面或者在某些特定的方面依存于主体。因此，按照作者的意见，这种依存性往往按存在、按原因是主观的（按原因不由自主的主观，按原因任意的主观），按内容是主观的（在非形象反映意义上和不相符的反映的意义上）。

M．杨科夫从精确地说明“客观—主观”和“物质一观念”这两对范畴的特点的角度，要求首先区分客观实在和主观实在以及唯物客观和唯心客观。在前一场合，划分的主要标准是存在是在意识之外还是意识之内，在后一场合划分的主要标准是存在是否依存于意识。[86]

近来在保加利亚文献中特别广泛地讨论了关于认识主体的能动的、创造方面。这首先因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断向前发展必然产生各种要求创造性地革新地解决的新问题，这也就刺激了对一般主体的创造性，特别是对他的认识活动的加强问题产生理论兴趣。意识形态斗争的任务，批判在创造和反映上的反列宁主义观点的必要性也加强了对上述问题的理论兴趣。

C．瓦西列夫在著作中把创造看作由主体的高度能动性决定的整个反映的顶峰时,力求揭示这种能动性的最重要形式的特点。他指出，在认识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表现在善于选出研究所需要的客体，而对这些客体，主体感到需要认识，同时也拥有进行认识的全部必要的可能性和手段。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更增强了。他作出了理想的计划，寻找并以必要的方式组

织材料，运用各种结构的逻辑的和其他的方法，使计划“具体化”或者依靠各种符号体系把它表达给其他人。根据瓦西列夫的意见，在这方面可以说主体无论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都起了决定性作用。[67]

另一位保加利亚哲学家Г．吉尔吉诺夫证明，主体活动的创造性最有力地表现在预见未来、确立目标和选择实现这些目标的相应手段。根据这一点，他把理论活动称作创造活动最明显的表现，因为它胜于艺术创作之处在于完全相符地准确地客观地反映实际。在吉尔吉诺夫看来，这一活动的最积极的因素就是创造和应用科学方法以及进行实验。[68]

П．金杰夫、Д．格尔杰夫、А．科扎罗夫、М．马尔科夫、М．杨科夫以及其他许多保加利亚哲学家在其著作中也集中注意于分析认识的和活动的主体的能动性的各个方面。[69] 同时他们不仅竭力说明能动性本身的一般特点，而且针对能动性的这种或那种表现形式使这些特点具体化。

同关于主客体关系的哲学问题密切联系的是信息及其在反映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这个问题是随着控制论的出现而产生的，控制论使信息在管理中具有根本性意义，而且从那时起不仅引起局部科学的专家，而且还引起哲学家的越来越大的注意。

控制论的发展产生了这种倾向：把人的脑神经活动包括创造性思维归结为一般控制论规律，仅仅用信息论术语来考察人的这种活动，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反映范畴同一化直至完全放弃这个范畴并以信息范畴来取代它。所有这些情况也促使对于信息和反映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变成近年来认识论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目前信息问题吸引了许多保加利亚研究者的注意。对它的各方面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作者把信息广泛理解为任何物质客体的特性，理解为物质和能在空间和时间中分

布的不均匀性的量度，把它同熵的概念联系起来。[70] 另一些作者则把信息看得比较狭窄，把它看作只有高级组织系统——生物的和社会的系统——才具有的特殊形式的反映，并且把它同这些系统中的控制过程相联系。[71]

后一种态度的代表人物 M．杨科夫在其学术著作《物质和信息》和其他著作中把批判地分析对信息的机械论和唯心论的解释同实证地辩证唯物主义地分析信息的最重要方面成功地结合起来。

M．杨科夫在说明现代西方研究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情况时，把它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二十世纪初物理学危机的估计作了对比，并认为目前在对基本的控制论问题和信息论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可以说有相应的危机。他指出，这种危机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同本世纪初"物理学唯心主义"类似，存在着许多关于控制论和信息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控制论唯心主义"，它所固有的不仅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思辩，而且甚至是神学的思辩。

作者在批判对信息的唯心主义解释时强调指出，承认信息是客观现实的普遍特性或者是反映这个现实的意识特性，还不能把它按唯一涵义评价为马克思主义。因为全部问题在于怎样理解客观现实——唯物主义地理解还是唯心主义地理解。M．杨科夫指出，对信息，首先对"反映——信息"关系这样的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有效的科学的和哲学的分析，要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地解决"物质——信息"问题作为出发基础，因为这个问题是在控制论和信息论问题领域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焦点。[72]

与这个情况相适应。在保加利亚研究控制论和信息问题的哲学家的著作中，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还是出现了分析的方法论基础的共同性，而作为这个基础的是唯物辩证法和它的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列宁的反映论。哲学家把信息理解为列宁关于反映是物质的普遍特性这一著名原理的具体化方面之一。

这种具体化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分析符号体系的反映性质和特性。在保加利亚有大量内容丰富的书刊研究反映论的逻辑方面。学者们根据列宁对符号在反映现实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指出，如果思维是人意识中反映现实的方式或形式，那么符号语言及其体系就是思维过程即人意识中在观念上、主观上反映现实的过程的具体化和物化的高级的、独特的形式，就是认识的专门工具，同时是它的产物。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对现代资产阶级关于逻辑和语言的性质和特性的思辩开展了批判。[23]

保加利亚逻辑学家十分注意分析现代科学认识的逻辑工具，因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在它充分了解它用来建立并发展其概念体系的逻辑手段的时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1]

哲学和局部科学的关系。科学认识的方法论 对于保加利亚学者来说，对哲学知识和局部科学的知识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在传统上首先是一种阐明哲学本身特点的方式。帕夫洛夫在《反映论》中强调指出，作为对这种关系进行分析的出发点的情况是：统一的物质世界是科学认识的客体。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世界的辩证性质——首先表现为一切物质现象和过程的相互作用——也决定了全部科学知识的统一性，它的一切部分的相互作用，不管它们的特点如何。这些部分不是由于某种明显的界限互相孤立，而是彼此交织、互相渗透，处于一定的从属联系。同时这些功能的差别为区分这一领域或那一领域的知识、为形成它的对象特点创造了基础。哲学知识和局部科学的知识的特点是这种差别的主要表现之一，而且“所有专门学科……都试图在发现对象的组成部分的结构、它的结构规律性和它的发展的内部规律等等方面

确立其对象的真理，而哲学作为逻辑、认识论和辩证法——它们都是一回事——则研究真理、它的条件（客观的和主观的）、形式、标准等等。"[75] 因而，"哲学没有失去自己最一般的性质，它只有作为逻辑（或者认识论，或者辩证法）——被看作一门关于客观认识即真理的本质、形式、标准和目的的科学——才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相对的独立性。"[76]

因此，根据帕夫洛夫的观点，如果说任何局部科学把存在或意识的某个个别领域（方面）当作研究对象，分析它的结构和结构规律性，那么哲学的对象就是意识和存在在达到真理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而主要任务则是研究这种相互作用所具有的规律性，以便制定符合这些规律性的逻辑。哲学的这种特点不仅使哲学变成最一般的科学，因为它要求研究一切客观思维的规律，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普遍规律，而且保证哲学具有世界观的性质。

T. 帕夫洛夫指明局部科学知识对有内容地分析哲学问题的作用，同时全面论证了哲学对局部科学的决定性作用。他强调指出，"如果说没有专门学科，哲学就成为空洞的哲学，那么没有哲学，专门学科就是盲目的学科，因为它们失去了自己客观的和唯一的方法论基础；它们也失去了彼此之间的任何联系，而这样做的后果，虽然反映了现实的多样化，却不能反映它的统一性。"[77]

保加利亚学者在近来的著作中继续进一步研究 T. 帕夫洛夫拟定的问题。例如在《哲学和社会认识》一书中，П. 金杰夫在谈到哲学对局部科学知识所具的特点时再次强调指出："'被研究的各个客体的共同性的程度'即标准本身并不能划清哲学认识和非哲学认识。确实，哲学的对象就是研究物质、存在的普遍规律和形式，但始终是同研究存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的辩证法相联系的。"[78] 根据这个观点，哲学对象的突出特点不在于哲学所研究的

现象和规律的普遍性本身，而首先在于人的意识和客观现实的关系。[79]金杰夫认为把哲学理解为关于普遍的东西的科学是重犯历史上被克服了的把哲学理解为"科学的科学"，"超科学"的观点。

A．波利卡罗夫在分析局部科学知识和哲学解释的相互关系时指出它们联系的复杂性质。除了在最简单的场合，在一定的科学概念和某种哲学学说之间具有同义的一致以外，这种一般联系是同义又多义的，也就是说科学概念一般容许不同的哲学解释——以唯物主义精神解释或以唯心主义精神解释。同时波利卡罗夫强调指出，这些解释不是意义相同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更重要的解释，包括从局部科学上对问题的正确的解决和正确的哲学世界观"。[80]

哲学对局部科学的知识的影响表现在它所实现的方法论功能。因此，就产生了研究哲学在整个科学的方法论中，在对科学认识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科学认识的方法论是保加利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活动的方面之一。

П．金杰夫分析了作为关于科学认识方法的哲学理论的方法论问题，分析了方法论同各门局部科学和理论的方法论功能的相互关系。[81] A．波利卡罗夫在著作中根据主要是物理科学的材料分析了对哲学在局部科学知识的发展中的方法论作用的不同观点。[82] Н．伊里巴贾科夫、Г．吉尔占诺夫、И．卡莱科夫、В．措涅夫、Г．韦基洛夫、Т．季切夫都研究了生物科学和医学知识的方法论方面。[83] П．金杰夫、В．多布里亚诺夫、С．米哈伊洛夫、Н．斯特凡诺夫等分析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些方法论问题：经验和理论的关系、理论认识和历史认识的关系、这些认识的本质和性质、事实在具体历史认识中的作用，等等。[84]

近来，在保加利亚学者对哲学和局部科学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方面出现了某种变化。引起这些变化的首先是由于自然科学知识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进一步完善，具体的社会研究的采用和日益广泛的推广。因此，重点日益从研究和论证哲学对局部科学的方法论作用转移到探求哲学和局部科学知识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特点和机制。

比如，在《科学的认识论问题》（一九六六年）一著中，Г．吉尔吉诺夫指出一般认识论对局部科学的方法论作用，同时强调一般认识论本身同时在这些局部科学的基础上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些新的局部科学使一般哲学原理获得重新理解、深化和更准确，因为科学是系统的知识，而且它的特点不仅在于部分依赖整体，而且在于整体依赖各个因素。

例如，M．杨科夫指出，个别自然学科的成就促进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范畴和原则得到进一步论证、丰富和发展，促使哲学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认识功能。此外，哲学在分析中也可以利用局部科学的方法，首先是数学和控制论这些学科的方法。因此，杨科夫强调指出，应该说的是“结合，对它无论哲学还是个别学科都同样需要。轻视其中一方面或者有意夸大另一方面的意义都会导致片面而错误的结论”⑧

对此 П．魏尔切夫说了很有意思的思想。他在分析科学认识的辩证法问题时提出这样的论点：现在阐明哲学知识向非哲学知识过渡和非哲学知识向哲学知识过渡的问题具有特别意义。在前一场合要求研究以下机制：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假设时利用方法论原理；把哲学范畴变为科学思维工具、变为研究者科学思维的有机部分。另一方面，要求研究的是从非哲学知识向哲学知识相反过渡的机制，哲学知识在同局部科学知识发生方法论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自身得到丰富的机制。魏尔切夫写道：“在前一过渡中谈的显然是哲学知识的能动作用，它的直接参与研究工作，哲学

科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使命，在后一过渡中指的是局部科学知识促进方法论思想、哲学理论本身创造性丰富起来。”[86]最后这个问题.比如，在分析科学的最新革命时——其特点之一是出现新型学科：边缘学科（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等等）和整体学科（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等）——就产生了。因此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局部科学需要哲学来确定边缘学科和整体学科的本质、地位和作用；新型学科的出现为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工具、规律和原则创造了认识论的可能性并促进马克思哲学的进一步发展。[87] Н．伊里巴贾科夫在这方面指出，“所以，在生物学中象‘结构’、‘形式’、‘组织’、‘系统’、‘信息’、‘对称和不对称’、‘本质和现象’、‘偶然性和必然性’等等范畴就成为非常迫切的范畴。”[88]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范畴的分类和系统化问题 保证哲学的方法论作用的任务，哲学和局部科学的相互作用的加强，后者的蓬勃发展，要求哲学进一步深入研究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范畴工具并考虑最新科学资料。保加利亚哲学家研究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范畴体系”，发展了关于范畴彼此之间以及同基本的辩证的规律性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问题。

近来对哲学范畴的分类问题，对建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给予很大的注意。根据 П．魏尔切夫的定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体系就是作为理论的辩证法的规律、原则和范畴的总和，它们在这一理论范围内的位置、它们的相互联系和关系。每一条规律，每一个原则或范畴在这个体系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在这个体系发挥功能中起一定的作用，并同其他规律、原则和范畴发生联系和关系。”[89]

起初作为范畴的从属关系和系统化的基础提出来，或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或者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物

质，其余范畴则被看作是对这个基础的各种表现、它的发展的反映和对它作为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发展的反映。同时作上述尝试的作者力求一下子建立起整个辩证唯物主义范畴体系。[90]但是，已经很清楚，尽管从五十年代中期到目前对范畴系统化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意见，仍然没有一个意见可认为是完全令人满意的。问题要比最初想象的复杂得多。

这里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解决辩证唯物主义范畴系统化问题只有依靠巨大的研究者集体的力量才能胜任。第二，先前要建立唯物辩证法范畴体系的尝试表明，个别作者只能建立这种完整体系的多少适当的子系统。因此保加利亚研究者在揭示唯物辩证法个别范畴的内容方面的努力以前也作过，[91]现在的特点则是：重点首先在于揭示某些范畴在完整的范畴体系中的作用，在于弄清它们同体系中的其他范畴的相互作用。[92]以系统的方法研究唯物辩证法，已成为保加利亚哲学书刊中公认的方法论原理。

第三，现代对待辩证唯物主义范畴问题的特点在于保加利亚哲学家比以前更加集中注意力于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方法论、论证范畴的系统化、并列从属、层次的原则，等等。目前正在详细拟定研究规划，根据规划者的想法，实现这些规划应该使得无论是整个问题还是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都能顺利解决。所以，и．甘涅夫为了建立辩证范畴体系提出以下方法论规划：

一、规定范畴性的标准和确定目前历史时期辩证范畴的数量；

二、制定体系的理论基础；

三、规定体系中范畴赖以形成结构的原则；

四、确定范畴之间互相依存的基本类型；

五、根据理论基础、原则、范畴之间互相依存的基本类型，构成范畴的统一体系——理论，也就是确立完整体系中范畴之间

的一切可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93]

在保加利亚书刊中还有其他的方法论的规划。[94]

现在保加利亚哲学家继续探索建立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的途径，把辩证法问题的一切新方面都列入研究之中，因而也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工具的完善化准备了基础。

三、对哲学史的研究。对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的批判

哲学史的研究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保加利亚哲学史思想发展中的根本变化奠定了基础，使得唯心主义被排挤，哲学史科学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受到思想理论的改造。

目前保加利亚哲学家有成果地进行研究的问题有哲学史知识的方法论问题、世界哲学史过程问题、保加利亚哲学思想史问题、对保加利亚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的分析、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的批判。

积极研究方法论问题是保加利亚哲学史书刊的优点。学者们力求加深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理解哲学史的对象，揭示它的特点，制定对它进行研究的最有效的、系统的方法论。他们依据发生学的系统方法并使之具体化，从而揭示了哲学知识的本质的、不变的特点。所以M．贝奇瓦罗夫指出，只有把哲学史理解为既包括个别国家哲学史问题的发展，也包括整个哲学史过程的发展的体系，才能把现实哲学体系所具有的最本质的东西突出出来，而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有这一种或那一种体系。[95]

保加利亚研究者在把哲学史看作哲学认识发展的统一的、完整的、合乎规律的过程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限于描述这种或那种哲学学说、说明其特点，而是揭示哲学思想向前发展的

总的情况，把它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其中研究的主线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因此，哲学史过程的性质本身具有党性的原则；这个过程的发展是同哲学作为方法论基础而与之发生相互作用的局部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最后，必须把这种或那种哲学体系看作是同创立它的哲学家所代表的民族的全部历史相一致的，因为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有可能科学地说明这个或那个民族、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发展中的一系列特点。

А．本科夫、Г．格罗泽夫、М．贝奇瓦罗夫、К．安德烈耶夫、И．波格丹诺夫、Л．季米特罗夫、Р．卡拉科洛夫、Е．帕诺娃、Р．拉杰夫、П．鲁谢夫、С．斯拉沃夫等都是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上研究世界的和国家的哲学史。

研究保加利亚人民的哲学遗产是目前的广阔领域。现在对国内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对那些对民族哲学文化的发展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以及在欧洲哲学思想发展上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最著名的哲学思想代表人物的活动都进行了研究。[96]

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保加利亚的传播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对这个过程的完整叙述包括对保加利亚共产党创建人Д．布拉戈耶夫及其战友П．格诺夫、Г．格奥尔吉耶夫、С．伊利耶夫、Г．基尔科夫、И．马涅夫、Т．彼得罗夫、Т．斯托伊洛夫等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问题进行了研究。[97]保加利亚哲学史学家把分析过去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观点同解决另一项任务——确立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列宁阶段——结合起来。对保共领导人Г．季米特洛夫和В．科拉罗夫以及著名哲学家Т．帕夫洛夫、С．加诺夫斯基、А．基谢林切夫、Г．巴卡洛夫、М．季米特罗夫等的理论活动的研究占了很大的地位，因为他们的科学著作促进了保加利亚思想战线的列宁主义化。[98]哲学史

学家指明，在保加利亚早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就形成一批列宁主义哲学家，他们热情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继续发展它的理论原理。

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 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同积极反对资产阶级哲学和各种修正主义派别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这一斗争的特点是，保加利亚哲学家主要批判地分析那些直接同马克思主义论战的或者作为现代修正主义最有影响的派别的基础的资产阶级观点。最近出版了一批专门研究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方法论问题的著作。[99]保加利亚哲学家认为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条件，是哲学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最重要的任务和功能之一。

目前保加利亚哲学家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观点进行批判的有关主要问题是反映论问题、特别是主体反映客观现实的能动性问题、历史主义和历史预见问题、哲学的和政治的一元论和多元论问题、人的问题、反对反苏主义和反共主义。在这一工作中作出重大功绩的有Т．帕夫洛夫、С．加诺夫斯基、А．基谢林切夫、М．季米特罗夫、Н．伊里巴贾科夫、Д．帕夫洛夫、В．多布里亚诺夫等。

保加利亚哲学家指出，反映论的现代批评者（А．勒费弗尔、М．马尔科维奇、Г．彼特罗维奇等等）歪曲了列宁对于反映和创造的观点：把人的创造能力绝对化使他们得出反映和创造不可相容的结论，因为创造似乎不需要任何反映，而反映也不包含任何创造的因素。Т．帕夫洛夫、С．瓦西列夫等人指出，从主观唯心主义方法论的立场出发对创造作这种解释意味着对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作形而上学的理解；人如果不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特性、关系，如果不在自己意识中反映世界，他就不能改

变世界。他们全面证明，反映同其批评者所设想的对存在物的消极的感知、机械的复写毫无共同之处；只有反映论帮助人们了解，物质对象在主体意识中是作为观念的映象反映出来的，而观念的映象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体现为现实，使现实受到创造性的改造。[18]

保加利亚在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领域作了很大的努力。例如H. 伊里巴贾科夫在其著作中根据对B. 文德尔班、B. 狄尔泰、Б. 克罗齐、A. 汤因比等等历史哲学思想的详细分析指出，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否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和客观的历史真实，宣扬绝对的相对主义，因而不能实现对历史过程的科学认识。[19]

B. 多布里亚诺夫在分析新实证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K. 波佩尔的社会哲学观点时令人信服地揭露了运用新实证主义原则去解决社会发展的哲学问题是站不住脚的，并且指出新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待社会发展的态度是对立的。他指出："马克思和K. 波佩尔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人是否需要活动来创造自己的命运、促进人类的发展，而在于怎样活动，在什么基础上活动：是在被认识的历史规律的基础上还是在绝对主观主义，随心所欲的基础上。"[20]

保加利亚哲学家（C. 列维、П. 鲁谢夫、C. 斯托耶夫、Д. 采科夫，等等）批判资产阶级对人的问题的解释，主要是在批判地分析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以及它们的变种方面。比如П. 鲁谢夫指出，形而上学地把主体同客体、个人同社会分离是存在主义对人的解释的基础。他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说，存在主义无法提出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异化的积极纲领，因为存在主义是撇开、脱离作为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考察人的。[21] Д. 采科夫在分析Ж.-П. 萨特尔的存在主义自由

观时，揭露了它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实质，指出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把自由看作臆想的精神自由的唯心主义路线的继续。[14]

保加利亚研究者非常注意分析的现代最重要的哲学和政治问题之一就是一元论和多元论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只要想一下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模式”、马克思主义“多元化”进行论证的企图就够了。

保加利亚哲学家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反击各种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在论证意识形态多元论,其中包括哲学多元论方面的诡计,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论是头等重要的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任务。H，伊里巴贾科夫、A．科扎罗夫、Д．帕夫洛夫、Д．米捷夫、Д．斯帕索夫等等的一系列著作揭露了修正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必须建立各自样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他们的著作中指出：虽然具体条件的差别决定了共产主义政党在争取建设新社会的斗争中的工作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但是这种多样化决不等于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多元性”或“多样性”的思想所指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的理论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15]

在一系列研究著作中揭露了反苏反共的反动本质,[16]阐明了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以及它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阶级的问题上的立场错误。

在当代思想斗争中，保加利亚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战斗队伍之一。他们积极地、创造性地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为有效地解决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斗争。

① 参看：《哲学史》1964年莫斯科版第5卷；《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1965年莫斯科版；《保加利亚哲学思想简史》1977年莫斯科版。

② 参看：T．帕夫洛夫《雷姆克主义与唯物主义》1930年索菲亚版，《反映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概论》1936年莫斯科版；C．加诺夫斯基《哲学的主要流派》1934年索菲亚版；等等。

③ 参看《保加利亚哲学思想简史》第547页。

④ 这些任务在Г．季米特洛夫同《哲学思想》主编T．帕夫洛夫的谈话（1946年）中已经具体说明。谈话的俄文本首次发表于《哲学问题》杂志（1973年第7期）。

⑤ 参看《保加利亚哲学思想简史》第550页。保加利亚研究者自己强调指出，在国内大规模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可能，首先因为保加利亚学者一开始就拥有大量苏联哲学文献，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后培养出来的很大一部分哲学干部是在苏联高等院校受哲学教育的。

⑥ 参看《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和中央政治局决议汇编》1965年索非亚版第5卷第5—6页。

⑦ 参看：A．科扎罗夫（恰拉克奇耶夫）《保加利亚人民民主革命的性质和动力》1956年索非亚版；Ц．金杰夫《论保加利亚人民民主革命的性质问题》1956年索非亚版；T．帕夫洛夫《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意义》1958年索非亚版；Г．措科夫《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的一般和特殊》1959年索非亚版；等等。

⑧ 参看Н．伊里巴贾科夫《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1956年索非亚版，《世界革命过程与和平共处》1963年索非亚版；T．维洛夫《论主观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1957年索非亚版；K．瓦西列夫《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特点》1953年索非亚版；《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消亡》1962年索非亚版；C．加诺夫斯基《社会经济形态与和平共处》1964年莫斯科版；Ц．金杰夫《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1965年索非亚版；A．本科夫《共产主义道德》1951年索非亚版；等等。

⑨ 参看：Т．帕夫洛夫《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局部科学》1956年索非亚版，《反映论与当代》1961年索非亚版；A．科扎罗夫（恰拉克奇耶夫）《思维的能动性——思维在认识过程和实践活动中的积极作用》1961年索非亚版；A．波利卡罗夫《辩证唯物主义与现代物理学》1950年索非亚版，《物质和认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1961年索非亚版；A．克托夫《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生物演化的源泉问题》1962年索非亚版；Г．吉尔吉诺夫《科学中的认识论问

题》1966年索非亚版；П．金杰夫《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认识辩证法》1962年索非亚版；А．本科夫《思维与语言》1960年索非亚版；Ж．奥沙夭科夫《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科学》1953年索非亚版、《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1958年索非亚版（1970年再版）；К．瓦西列夫《历史哲学绪论》1961年索非亚版；等等。

⑩ 参看：Т．帕夫洛夫《关于唯心主义反动哲学的总结》1953年索非亚版；Н．伊里巴贾科夫《'时髦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同现代反马克思主义斗争中的哲学社会学问题》1960年索非亚版，《捍卫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1962年索非亚版；Г．吉尔吉诺夫《现代修正主义——反共的意识形态》1958年索非亚版；等等。

⑪ 《保加利亚共产党纲领》，载于《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72年莫斯科版第273页。

⑫ 参看：Н．伊里巴贾科夫《发达社会主义社会》1972年索非亚版；В．多布里亚诺夫《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1973年索非亚版；С．茨韦特夫《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经济分期》1971年索非亚版。

⑬ 在上述研究方面特别有成果的有М．马尔科夫、Н．斯特凡诺夫、П．金杰夫、В．多布里亚诺夫、Т．维洛夫、Г．吉尔吉诺夫、Л．格尔杰夫、С．波波夫、М．杨科夫等

⑭ 参看：П．金杰夫《哲学和社会认识》1978年莫斯科版；М．马尔科夫《社会管理理论》1978年莫斯科版，《社会主义与管理》1973年莫斯科版；Н．斯特凡诺夫《社会科学和社会工艺学》1976年莫斯科版；С．波波夫《意识与社会环境》1978年莫斯科版；М．杨科夫《物质与信息》1979年莫斯科版；Л．格尔杰夫《社会意识的迫切问题》1982年莫斯科版；等等。

⑮ 在1975年在哲学、社会学、科学共产主义和心理学领域工作的有205人有学位和学衔，其中院士2人、通讯院士3人、教授30人、学科博士22人、副教授和高级研究员78人、副博士80人。参看Н．伊里巴贾科夫、С．米哈伊洛夫、С．安格洛夫、П．金杰夫、К．瓦西列夫《保加利亚哲学、社会学、科学共产主义和心理学领域中科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载于《哲学思想》1975年第9册第32页。

⑯《哲学思想》1975年第9册第21页。

⑰ 《保加利亚哲学思想简史》第555页。在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有1981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从科学和实践发展的观点看列宁的反映论》。

⑱ 参看《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的哲学和社会学问题》1973年索非亚版第12页。

⑲ Н．伊里巴贾科夫、С．米哈伊洛夫、С．安格洛夫、П．金杰夫、К．瓦西列

夫《保加利亚哲学、社会学、科学共产主义和心理学领域中科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第21页

20 《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1982年莫斯科版第69页。

21 同上书，第76页

22 参看：Д．格尔杰夫《科技革命，精神生活和劳动知识化》1982年索非亚版，《思想活动的方式》1983年索非亚版；П．甘切夫《哲学与社会活动》1982年索非亚版；Н．斯特凡诺夫《科学态度和社会状况》1983年索非亚版；М．马尔科夫《现实的社会主义——管理和自治的辩证法》1983年索非亚版。

23 《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67年莫斯科版第31页。

24 参看《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发展》1962年索非亚版第32—38页。

25 Т．日夫科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载于《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第125页。

26 Т．日夫科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载于《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第140页。

27 《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第145页。

28 在以下著作中最充分地反映了对发达社会主义的分析：Н．伊里巴贾科夫《发达社会主义社会》；В．多布里亚诺夫《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哲学方法论问题》1975年索非亚版。

29 参看：Ж．奥沙夫科夫《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载于《社会学是一门科学》1970年索非亚版；К．瓦西列夫《历史哲学绪论》。

30 参看：П．金杰夫《哲学和社会认识》1973年索非亚版；Т．维洛夫《Т．帕夫洛夫院士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著作中的反映论》，载于《'反映论'和当代》1978年索非亚版；等等。

31 参看：С．米哈伊洛夫《社会是一个社会学系统——论社会学对象问题》，载于《保加利亚科学院哲学所通报》1965年第11卷第61—66页；В．多布里亚诺夫《从社会观点看社会》，载于《社会学认识——方法论问题》1976年索非亚版第7—28页。

32 参看Ж．奥沙夫科夫《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第22页。

33 参看В．多布里亚诺夫、Б．斯塔夫罗夫、Н．格诺夫《保加利亚现代社会学——历史概论》1978年索非亚版第32页。

34 参看В．多布里亚诺夫、Б．斯塔夫罗夫、Н．格诺夫《保加利亚社会学——历史概论》1978年索非亚版第4页。

35 В．多布里诺夫、Н．格诺夫《对社会的结构和发展的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载于《社会学问题》1978年第1册。

36 参看：В．多布里亚诺夫《社会学的对象和结构》，载于《社会学研究》1968

年第1册；《论社会学认识的层次》，载于《社会学问题》1974年第5册，《从社会学观点看社会》第7－28页

37 参看：C．米哈伊洛夫《经验的社会学研究》1973年索非亚版；H．格诺夫《论社会学研究的理论阶段》，载于《社会学问题》1975年第2册；等等

38 参看：B．多布里亚诺夫《论社会主认识的层次》，载于《社会学问题》1974年第5册，K．卡拉伊夫《哲学和社会学》1975年索非亚版；等等

39 参看：Д．格尔杰夫《社会意识的结构分析》1970年索非亚版，《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1972年索非亚版，《社会意识的规律》1975年索非亚版，《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过程》1978年索非亚版，《社会意识的迫切问题》1982年莫斯科版。

40 参看Л．拉杰夫《科学及其功能》1978年索非亚版。

41 参看：П．斯特凡诺夫《社会科学和社会工艺学》1973年索非亚版；П．金杰夫《哲学和社会认识》；Г．吉尔吉诺夫《科学和创造》1975年索非亚版；等等。

42 参看：Т．斯托伊切夫《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1972年索非亚版；С．波波夫《意识和社会环境》1976年索非亚版；等等。

43 参看Т．基肖夫《日常意识的辩证法》1979年索非亚版。

44 参看Д．格尔杰夫《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过程》

45 参看：Г．帕夫洛夫《意识形态和哲学》，载于《哲学思想》1971年第3册；B．伊万诺夫《意识形态——发展的性质和规律性》1977年莫斯科版；Л．约托娃《信息和意识形态的作用》1977年索非亚版；K．达尔科夫斯基《"意识形态的边缘"或边缘的意识形态》1972年索非亚版；Т．斯托伊切夫《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斗争》1976年索非亚版；《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方法论问题》1976年索非亚版；等等。

46 参看П．金杰夫《哲学和社会认识》。

47 参看：Т．维洛夫《社会认识在社会主体的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于《列宁的反映论和当代科学》1973年索非亚版第3卷；С．波波夫《社会规律和社会认识》1973年索非亚版；《历史唯物主义问题》1976年索非亚版第2卷，1979年第3卷；Н．甘切夫《历史唯物主义和对未来的预见》1978年索非亚版；Н．比察泽《出版物是社会认识的形式》1977年索非亚版；等等。

48 参看Т．维洛夫《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管理的"主体—客体"系统的辩证法》，载于《科学与社会的管理》1971年索非亚版第69页。

49 同上书，第71－72页；并参看：Т．维洛夫《社会主体及其功能》1971年索非亚版；M．马尔科夫《社会管理的主体》1974年索非亚版，《社会管理理论》；等等。

50 Т．维洛夫《社会认识在社会主体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于《列宁反映论

和现代科学——反映论和社会科学》1973年索非亚版第288页

㉛ 参看：H．斯特凡诺夫《科学和管理》1970年索非亚版，《社会科学和社会工艺学》；Д．格尔杰夫《社会管理和信息》1973年索非亚版；Л．拉杰夫《科学及其功能》；M．马尔科夫《社会管理的工艺学和效果》1980年索非亚版；等等

㉜ 参看：H．斯特凡诺夫《科学，标准，管理》1979年索非亚版，《科学和管理》；Π．斯特凡诺夫、H．亚希尔、C．卡乔诺夫《管理，模式设计．预测》1972年莫斯科版；等等。

㉝ 参看：Γ．瑙莫夫《保加利亚犯罪的社会决定性》1971年索非亚版，《社会环境和消极现象》，载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哲学方法论问题》；等等。

㉞ 参看：C．安格洛夫《在人的认识中的综合方法》，载于《社会学问题》1973年第3册；《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个人的形成》1976年索非亚版；《人，生活方式，精神行为》1977年索非亚版；《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个人的精神发展》1978年索非亚版；《教育的社会学问题》1978年索非亚版；等等。

㉟ 参看：C．安格洛夫、Г．格奥尔吉耶夫《现代科学认识中人的问题》，载于《哲学问题》1973年第7期；C．安格洛夫等《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个人的精神发展》1978年索非亚版；B．维尔科娃《个人——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1982年索非亚版；C．波波夫《个人的社会环境，活动，意识》，载于《哲学思想》1974年第12册。

56 参看．B．莫莫夫《对个人及其行为综合研究的方法论》，载于《教育的社会学问题》；K．卡拉伯夫《人是社会存在的要素》，载于《哲学思想》1974年第1册；C．米哈伊洛夫《个人是特殊的社会学系统》，载于《教育的社会学问题》；C．斯托耶夫《人、新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1972年索非亚版；X．桑图洛夫《一体化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1982年索非亚版

57 参看：A．哈尔切夫、B．莫莫夫《社会环境和教育》1977年索非亚版；C．安格洛夫《现实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载于《人、生活方式，精神行为》；B．莫莫夫《道德和教育》1972年索非亚版；B．维尔科娃《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个人的发展》，载于《新时代》1975年第5册；等等。

58 参看：T．帕夫洛夫《为人而斗争中的列宁主义》，载于《列宁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1970年莫斯科版；Π．金杰夫《民主，自由，责任》1972年索非亚版；C．波波夫《社会主义，异化和自由》1968年索非亚版；等等。

59 参看：《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个人的精神发展》；《教育的社会学问题》；等等。

60 参看：C．安格洛夫《现实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载于《人，生活方式、精

神行为》第43页；《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个人的教育》，载于《教育的社会学问题》。

61 参看：T. 帕夫洛夫《反映论》，载于《哲学著作选》1962年莫斯科版第3卷；《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И. П. 巴甫洛夫学说中的主要之点》，载于《哲学哲著作选》1962年莫斯科版第2卷。

62 参看 T. 帕夫洛夫《反映论》，载于《哲学著作选》第3卷第33页。

63 参看T. 帕夫洛夫《反映论》，载于《哲学著作选》第3卷第41、68—69、71、93—100、130—140页，等等。

64 参看T. 帕夫洛夫《哲学著作选》第3卷第19、65、153—155、266、312—313、390—393、395、429—430页，等等

65 参看 C. 彼得罗夫《关于客观和主观的概念》1965年索非亚版。

66 参看 M. 杨科夫《物质和信息》1976年索非亚版。

67 参看：C. 瓦西列夫《反映论和艺术创作》1970年莫斯科版，《反映和创造的哲学方法论问题》1972年索非亚版

68 参看 Г. 吉尔吉诺夫《科学中的认识论问题》

69 参看 Д. 金杰夫《哲学和社会认识》1977年莫斯科版；Д. 格尔杰夫《社会管理和信息》；M. 马尔科夫《社会管理的客体和主体的辩证法》，载于《哲学科学》1976年第2期；H 斯特凡诺夫：《科学和管理》；等等。

70 参看：H. 斯塔努洛夫《论信息和反映》，载于《哲学思想》1969年第4册；B. 布里耶夫、B. 博耶夫《信息论与认识辩证法的若干问题》，载于《哲学思想》1972年第8册；H. 涅诺夫《信息和认识》，载于《哲学思想》1972年第12册；等等。

71 参看：Г. 帕夫洛夫《信息，反映，创造》1965年索非亚版；M. 克雷斯捷夫：《反映——认识论范畴的基础》1973年索非亚版；B. 措涅夫《信息和反映》1977年索非亚版；C. 恰夫达罗夫《信息，系统和控制》，载于《哲学思想》1970年第10册；M. 杨科夫《物质和信息》1976年索非亚版；等等。

72 参看M. 杨科夫《物质和信息》1979年莫斯科版。

73 参看：《逻辑问题》（五卷本），1967—1973年索非亚版；A. 本科夫《逻辑学》1958年索非亚版；Д. 斯帕索夫《语言学的哲学反对语言哲学》1970年索非亚版；C. 彼得罗夫《哲学解释中的逻辑怪论》1971年索非亚版；等等。

74 参看：Ю. 明科夫《逻辑结构和认识过程》1972年索非亚版；Б. 江科夫《唯物主义逻辑学的迫切的方法论问题》1973年索非亚版；Б. 武多夫《规定性，非规定性，模态，可能性——现代科学认识的范畴》1974年索非亚版；等等。

75 T. 帕夫洛夫《反映论》，载于《哲学著作选》第3卷第412页。

76 T. 帕夫洛夫《反映论》，载于《哲学著作选》第3卷第412页。

⑦ Г. 帕夫洛夫《反映论》，载于《哲学著作选》第3卷第413页。

⑱ П. 金杰夫《哲学和社会认识》第27页。

⑲ П. 金杰夫《哲学和社会认识》第28页。

⑳ А. 波利卡罗夫《相对性和量子》1966年莫斯科版第8页。

㉛ 参看：П. 金杰夫《论科学认识的方法论问题》，载于《保加利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通报》1965年第13卷；《哲学和社会认识》1977年莫斯科版；等等。

㉜ 参看：А. 波利卡罗夫《科学认识的方法论》（二卷本）1972—1973年索非亚版、《从方法论看科学认识问题》1977年索非亚版。

㉝ 参看：Н. 伊利巴贾科夫《哲学和生物学》1967年索非亚版；Г. 吉尔吉诺夫《科学思维的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问题》1973年列宁格勒版；И. 卡莫科夫《生物反映和适应》1975年索非亚版；Т. Г. 季切夫、К. Б. 塔拉索夫《环境保护的哲学方面和社会保健方面》1977年莫斯科版；И. 卡莱科夫《文明和适应》1981年索非亚版；В. 措涅夫《无生命物质向有生命物质转化的必然性和偶然性》1973年索非亚版。

㉞ 参看：В. 多布里亚诺夫《理论和历史》1965年莫斯科版，《理论认识和历史认识的方法论问题》1968年莫斯科版；С. 米哈伊洛夫《经验的社会学的研究》1973年索非亚版；Н. 斯特凡诺夫《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和方法》1965年索非亚版；Н. 斯特凡洛夫、С. 卡乔诺夫、С. 西苗诺娃《历史认识的结构和和方法》1971年索非亚版。

㉟ М. 杨科夫《列宁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载于《哲学思想》1972年第5册第33—34页。

㊱ 《'反映论'和当代》第25—26页。

㊲ 参看Г. 吉尔吉诺夫、А. 克托夫《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载于《哲学问题》1973年第7期第89页。

㊳ Н. 伊里巴贾科夫《哲学和生物学》第109页。

㊴ Б. 魏尔切夫《面临新问题的辩证法》1972年索非亚版第83页。

㊵ 参看：А. 波利卡罗夫《物质和认识》1961年索非亚版；А. 马里诺夫《辩证法的范畴和规律》1970年索非亚版；И. 塔谢夫《唯物辩证法的范畴》，载于《政治教育》1973年第3期；等等。

㊶ 参看：С. 波波夫《论因果性》1962年索非亚版；И. 塔谢夫《个别和一般》1966年索非亚版；С. 萨尔基相《规律和属性》，载于《哲学思想》第1969年第10册；С. 阿大拉莫娃《科学认识中关于本质和现象的范畴的作用》，载于《保加利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通报》1960年第5卷；П. 赫里斯托娃《论可能性和现实性范畴的若干问题》，载于《保加利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通报》

1963年第8卷；等等。

92 参看：A. 波利卡罗夫《从方法论看科学认识问题》；С. 萨尔基相《关于属性问题》1977年索非亚版；Г. 米霍娃《必然性和偶然性》1972年索非亚版，《物质和观念》，载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问题》1975年索非亚版；等等。

93 参看В. 加涅夫《论哲学范畴体系的建立》，载于《哲学思想》1979年第5册。

94 参看：Н. 塔谢夫《论辩证范畴的体系》，载于《哲学思想》1975年第9册；М. 杨科夫《认识论范畴的体系》，载于《哲学思想》1972年第8册；Н. 米霍娃《辩证范畴的系统化和规定》1977年索非亚版；等等。

95 参看М. 贝奇瓦罗夫《哲学史是发展的体系》，载于《列宁主义和现代哲学史科学问题》1970年莫斯科版。

96 参看：Г. 格罗泽夫《保加利亚哲学史》1961年索非亚版第1卷；А. 本科夫《保加利亚哲学思想的发展》1966年索非亚版；《保加利亚哲学思想史》1970—1976年索非亚版第1—3卷；等等。

97 参看：《保加利亚哲学思想史》1976年索非亚版第3卷；Р. 卡拉科洛夫《Д. 布拉戈耶夫的哲学观点》1974年索非亚版；К. 安得烈耶夫《Д. 布拉戈耶夫对保加利亚在哲学问题上的新康德主义的批判》1968年索非亚版；《Т. 格诺夫博士论马克思主义哲学》1964年索非亚版；等等

98 参看：《保加利亚哲学思想简史》1977年莫斯科版；К. 安得烈耶夫《俄国和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哲学联系（1883—1917）》，1976年索非亚版；С. 斯拉沃夫《论列宁主义化（1927—1944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1972年索非亚版，《现代保加利亚哲学思想中的人》1982年索非亚版；等等

99 参看：《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方法论问题》1976年索非亚版；《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一般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1977年索非亚版；等等。

100 参看：《列宁的反映论与当代》（三卷本）1973年索非亚版；Т. 帕夫洛夫《为人而斗争中的列宁主义》1970年索非亚版；С. 瓦西烈耶夫《反映的能动性——哲学的和自然科学的论证》1977年索非亚版；等等。

101 参看：Н. 伊利巴贾科夫《列宁主义、哲学、思想斗争》1970年索非亚版，《在资产阶级哲学法庭面前的克利俄》1972年莫斯科版。

102 В. 多布里亚诺夫《反历史主义的贫困》，载于《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1971年莫斯科版第73页。

103 参看П. 鲁谢夫《崩溃哲学》1972年索非亚版。

104 参看Д. 采科夫《存在主义和自由》1969年索非亚版。

105 参看：《社会主义及其批评者》1973年索非亚版；А. 科扎罗夫《在意识形态

和政治中的一元论和多元论》1972年索非亚版；Л. 斯帕索夫《统一和多样化》1977年索非亚版；Л. 莫捷夫《'社会主义的模式'和修正主义》1971年索非亚版；Л. 帕夫洛夫《科拉科夫斯基的修正主义》，载于《哲学思想》1969年第6册；等等。

⑯ 参看：《社会主义及其批评者》1973年索非亚版；Л. 帕夫洛夫、Н. 特伦达菲洛夫《反共主义的思想贫困》1967年索非亚版；П. 金杰夫《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批评者"》1970年索非亚版；《民主和当前阶段的思想斗争》1972年索非亚版；等等

第 二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匈牙利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匈牙利的发展是在它的复杂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只有到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才开始在匈牙利传播，因为这个国家工业发展薄弱，且在奥匈帝国范围内没有民族独立，都不利于这一过程的展开。在指出匈牙利哲学思想发展的特征时，必须考虑到，进步的哲学思想那时往往不是以“纯粹”形态表现出来，而是以间接的形式出现，即表现为文学、美学和诗歌。甚至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范围在这个国家解放前也是相当狭窄和有限的。

二十世纪初，在工人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开始越来越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工人运动本身处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下，在工人运动的范围内没有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九一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特别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兴趣。然而，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和法西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二十五年统治又使哲学生活趋于停滞。

霍尔蒂政权的意识形态家不仅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而且认为许多资产阶级思潮和流派都不能容忍。他们的意识形态政策的出发点是，不能容许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发展，因为这种发展势必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他们甚至对弗洛伊德主义或新实证

主义都极为警惕。

只是在一九四五年匈牙利获得解放并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以后，才形成了有利于一般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发展的条件。开始大量出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出版了头几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起初是翻译苏联的教科书。很快就出现了匈牙利作者写的书籍和教材。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在战后时期的理论活动，集中于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理论，探讨人民民主革命的发展及其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问题，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和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

在这个时期出版了 Л．鲁达什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一九四七年）、《理论和实践》（一九五〇年）、《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九五五年），Э．莫尔纳尔的《社会主义史》（一九四七年）、《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一九五九年），Б．福加拉什的《逻辑学》（一九五九年），Д．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一九五二年）等著作。在上述著作中，以及在 Л．马特劳伊、А．莫德、И．列瓦伊、Й．西盖蒂、Э．佐伯尔、П．山多尔、Ш．萨劳伊的著作中，密切结合对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的批判，阐述了对一系列原则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些著作的高度理论水平加强了马列主义的影响，促进了它在全国的广泛传播。

一九四八年以前，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与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有关的问题上，集中在把先进知识分子吸引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并使他们相信马列主义的正确性上。在一九四八年以后，重点转到揭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并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思潮作斗争。

在这些年代，除了积极的过程以外，也发生过消极的现象：对哲学问题的分析有时过于简单化，对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说理不够，对待马列主义奠基人的著作有教条主义味道。在五十

年代，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有相当广泛的流传。有些研究者在复兴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开始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进行重新审查。修正主义者的活动造成了思想混乱，削弱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盟。

这一切因素对造成那种在一九五六年十月曾助长和决定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本质的思想气氛，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考虑到一九五六年事件的教训，坚决采取了全面加强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的政策，团结国内一切进步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按照这种方针，提出了“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口号。这种政策要求进行大量细致的意识形态工作。“为了说服群众，需要仔细，沉着，无限的耐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做群众的尾巴,因为原则必须贯彻始终。最好的政策是原则的政策！党宣布了并且至今为止进行着两条战线的斗争。它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左倾作法，也反对修正主义。”①

从五十年代末起，与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力量联盟的政策得到特别细心的贯彻，并且被看作是在制定党的意识形态政策时的根本原则之一。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讨论……应该用有助于加强我们政治联盟的方法来进行。应该争取使我们的同盟者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和我们接近”。②这一政策产生了很好的成果。从五十年代末起，工人阶级与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力量的联盟被看作是在制定党的意识形态政策的具体问题和方向时的根本原则之一。

社会主义社会在党的领导下的成功建设反映在最重要的党的文件中。一九六二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确认已在全国建成社会主义基础。在第九次（一九六六年）和第十

次（一九七〇年）代表大会上，党的注意中心是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指出，“按照性质和阶级关系，以及按照所有制形式，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然而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在我国还在继续”。[3]

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成就使得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有可能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五年）上提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党中央的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已经奠定和巩固，‘谁战胜谁’的问题已最终解决。我们的社会正沿着在它创建的巩固社会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前进……在未来的十五——二十年中，我们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跨出新的一步、在全国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4]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八〇年）的决议在强调匈牙利必须建立巩固的社会主义基础的同时，确认这个国家“已经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方面前进了。”[5]

匈牙利社会的社会政治发展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生活发展的特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极为重视加强党内的思想统一、保证马列主义的主导作用、科学的全面发展。一九六九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公布了党在科学领域的指示。指示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已有广泛影响，但是同时指出：“在我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事实上，社会科学中任何概念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所以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社会科学中的一切讨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可是实际上有各种不同的概念、观念交织在一起：有的只是外表上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有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成分相互矛盾地混然杂陈，还有的虽然按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不能对生活所提出的新问题提供答案。”[6] 所以，党力求展开讨论，认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会在讨论进程中显示出来并得到

保证。

党的政策产生了成果；因此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能够断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马列主义世界观在社会中已深深扎根，得到广泛传播。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我国人民的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水平是由我们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高涨、社会主义的发展决定的。"[7]党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道，虽然民族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极左的观点继续产生一定的影响，匈牙利社会意识的状况"首先是由我国人民思维中发生的积极变化决定的"。[8]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最近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政策促进了马列主义思想在全国的发展，为此建立了相应的创造气氛和必要的机构。一九五七年建立了匈牙利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大批哲学家在以埃特瓦什·洛兰命名的布达佩斯大学和一系列其他高等学府工作。从一九五九年起开始出版哲学杂志《匈牙利哲学评论》，而从一九七二年起开始出版《社会学》杂志。在党中央的《社会评论》杂志上，以及在《光明》杂志、《真理》杂志和其他社会政治刊物上都可以发表哲学论文。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

匈牙利学者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本质和内容是统一的，而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客观世界的一切领域——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社会。他们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可分割的统一。

匈牙利哲学书刊中广泛讨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根本问题。这些讨论的目的，不仅是要弄清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而且是要揭示人、人的意识、主观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例如，在六十年代初进行了关于如何解释哲学的物质概念和物质同意识的相互关系的讨论。当时在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

都进行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匈牙利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И．西波什的文章发起的，他认为在哲学书刊中过分注意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论方面，而对物质和意识的本体论的统一则注意得不够。按照他的观点，把世界划分为物质部分和非物质部分破坏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元论原则。应该把意识看作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

其他许多作者（И．西蒙诺维奇夫人，Т．费尔德什）认为必须有两种物质概念——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

例如，费尔德什写道，不能通过把理论认识方面绝对化来论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原则。一元论原则有本体论意义，如果物质概念中不包括意识，那么按照他的看法，它就不能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提供根据。把物质和意识对立起来，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问题就难以解决。

И．贡第发表了相反的看法，他强调意识和物质对立，不能说意识的物质性。他反对把存在和意识等同起来，强调物质第一性的原则。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意识同一观说的不是意识的物质性，而是意识是物质的产物，依赖于物质。赞同这种强调认识论方面的观点的，有Ф．А．柯瓦奇，И．波德纳尔等人。

И．霍尔瓦特强调在解释物质时必须把本体论方面和自然科学方面统一起来。在讨论进程中确立了这样的观点，即在给物质下定义时，必须有本体论方法和认识论方法的统一，只有和非物质的东西即意识对比，才有可能给物质下定义。同时特别强调指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只有在哲学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是正确的。

А．穆勒的《自然科学认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9]一书讨论了物质问题，它将恩格斯和列宁的自然观作了对比考察。

作者的出发点是，建立在最新科学成就之上的当代自然观，虽然与恩格斯、甚至列宁提出的自然观并不完全相同，然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与当代的自然观继续完全符合。穆勒在揭示列宁对恩格斯观点的发展时，分析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的物质定义。他指出，有时可以听到自然科学家说，列宁的物质定义过于一般，不适用于自然科学认识。按他的意见，这种说法中包含有对“旧时”实际上把实物与物质等同起来的机械唯物主义、对那种物质概念可以直观的时代的怀念。列宁的定义使物质概念失去了直观性，变得“不可捉摸”。但是问题不仅在于列宁所下的定义具有更一般的性质，而且在于它改变了这个概念的职能。在机械唯物主义中，物质概念实际上起实体的作用，所以它首先表现为本体论的范畴。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则认为，物质定义应该首先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使之不依赖于自然科学的新成就。

对物质的理解是与对物质运动形式的理解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讨论进程中指出了，需要不仅考虑运动的形式，而且考虑这种运动的各种层次，物质世界的各种组织形式。

与分析物质运动形式有关的讨论，首先是为了解决各种运动形式有何相互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能相互转化的问题。换句话说，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是否能转化为低级形式。在这一讨论的进程中，有一系列哲学家（И.霍尔瓦特，T.阿奇等）指出，不能把较复杂的运动形式转化为较简单的运动形式，这会意味着回到机械唯物主义。他们强调说，例如，生物的运动形式不能转化为化学和物理的运动形式，它是物质发展中的一种新的质的飞跃，要研究它，需要运用一系列新的范畴。

在讨论进程中，另一种立场也得到充分的表述，这种立场的拥护者强调一切运动形式都包含物理运动，因此可以说物理运动

是构成任何运动的最终"砖块"。这种观点的拥护者承认运动的化学形式、生物形式、社会形式有质的差别，但是反对把这种差别绝对化。A．穆勒、Д．马尔库什、T．埃尔代伊－格鲁兹等人把质的差别与存在各种不同结构联系起来，强调结构的成分预先决定了构成结构整体的各种联系相互作用的特征。

辩证唯物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与对反映论的理解有联系的物质和意识相互关系问题，在这个国家的哲学书刊中讨论过不止一次。在一九六九年，由于Й．西盖蒂的报告《关于列宁的反映论、辩证法、实践的相互联系的意见》而展开了讨论，在一九七四年纪念《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发表六十五周年的时候，匈牙利的哲学书刊上又一次讨论了反映论问题。Н．卡托恩写道，反映论是表达物质和意识之间的根本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书刊中有一种流传得相当广泛的看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地方就在于"物质"概念；有时这种区别的标志被认为是"意识第二性"的原理。但是物质概念本身不能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之间的分水岭。它只能有助于把一般唯物主义和一般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许多匈牙利哲学家认为，对物质和意识相互关系问题无论是采取本体论立场还是采取认识论立场都不可能产生成果，无论本体论立场还是认识论立场都是不正确的，只有在社会历史实践的水平上才能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意识的概念应该不是简单地从它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从对它的物理和生物基础的依赖中推论出来，而是要在社会关系的背景上，把它解释成为社会历史实践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最清楚地表现在Д．卢卡奇、Д．马尔库什、Я．瓦伊达、A．Д．萨博的著作中。

卢卡奇首先联系对作为有目的的活动的劳动的分析来考察反映问题。他的出发点是，主体和客体的划分是劳动过程的必然结

果和人类存在的固有基础。人的意识反映世界，从而人似乎与他周围的自然界分隔开来，这也就表现为客体与主体的对立。

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被反映的画面与现有的存在分离，似乎独立地在意识中起作用。现实被反映在意识中，同时反映出来的东西可能与那被反映的东西远不是完全等同的。“社会存在分解为两个不同种类的因素，它们从存在观点来看不仅是不同种类的，而且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是存在，另一个是存在在意识中的反映。”[10]

反映总是包含有错误的可能性，它从来不是摄象式的、机械的摹写，总是取决于目的设定，取决于劳动过程。

按照卢卡奇的看法，对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分析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是完全必要的。“在人的意识中产生符合客观现实的摹写，只有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和对它的越来越不同的运用才使得有可能实现物质的实践、有目的的安排。所以，在人的意识中产生的这种摹写、这种反映获得相对的独立性，与客体相对立，只是因为如此，产生了对反映结果进行分析、将它们与现实本身进行比较的必要性。”[11]

在许多匈牙利哲学家（И．西盖蒂、И．赫尔曼、И．阿尔马什等）的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不仅不是把反映只看作摹写、摄象的理论，而且直接与这种观点相对立。他们强调反映的能动作用，揭示反映过程的复杂机制、反映客观世界的意识的作用。

世界可认识性问题在匈牙利哲学书刊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问题也和方法论问题一样，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的进程中，也就是在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相信公设、而是科学证据的严格体系的进程中，开始在匈牙利的哲学书刊中进行讨论。在论述认识理论的著作中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可

认识性原理的任务，特别是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范畴进行新的综合的和语义学的分析的办法，以便更确切地弄清楚它的规律的逻辑结构、在统一的整体内部各规律之间的相互联系，建立起严格的、有科学根据的哲学原理体系。

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证明理论基础》（一九六七年）、《当代的可认识性问题》（一九七一年）、《关于真理的真理》(一九七四年）这些著作中，T．费尔德什[12]在分析关于解决世界的无限性和可认识性之间的矛盾问题时，谈到两种意义的"世界"概念，并按照这一点提出了"世界 1"和"世界 2"这两个概念。他用第一个概念指在时间和空间上无限的整个宇宙，用第二个概念指可以认识的那一部分宇宙。这是人能够得着的那一部分无限性，人能得到关于它的信息，它从而为认识的人提出一定的问题。换句话说，"世界 2"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成为认识对象的那一部分宇宙。

费尔德什认为，"人能够认识世界"这个一般公式产生三组问题。第一组涉及世界应该作何理解，现在的空间和时间概念是什么，是否可以认识未来等。

第二组问题与世界的可认识性作何理解有关。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对"能被认识的"东西和"能被制做的"东西之间的辩证联系的理解。同时必须考虑到，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都有不同的层次。

第三组问题与对"人"这个术语的理解有关。可认识性是现实的客观属性，但是它必须以存在认识主体作为前提。须预先假定有能够认识的主体。因此对现代的认识理论说来，就产生了"思维机器"的问题，除人之外的"思维存在物"的问题。

许多匈牙利逻辑学家的著作中考察了认识理论的逻辑方面，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相互关系问题。Л．埃尔代伊在《认识的

起源》（一九五七年）中对黑格尔逻辑学进行了批判，力求揭示出作为认识开端的因素。在另一部著作《辩证逻辑的认识理论》（一九七一年）[13]中，他考察了形式逻辑方法和辩证逻辑方法的差异。从事逻辑学问题研究的，还有К．加兰塔伊夫人、И．瓦什、Ж．毛道拉斯夫人等。在Д．陶马什的著作中研究了科学定义的理论问题。在一九八一年出版了Ш．西盖特瓦里的《论概念的辩证法》和И．塞纳西的《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14]

在匈牙利形成了得到国际承认的数理逻辑学派。最有名的是Л．考尔马尔考察数理逻辑问题和数学概念起源的著作。在这些引起世界反响的著作中考察了逻辑和自然科学的相互联系。在符号逻辑方面进行研究的有И．鲁霞，他出版了《在数学和哲学的边缘上》一书。[15]

最近几年对科学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方面，Я．凯莱门、Г．彼罗、К．尼利、И．赫隆斯基、Я．法尔卡什的著作很有名。在一九七七年出版了М．费赫尔和Л．哈尔申合著的《从科学问题到理论》和Л．维克尔迪关于科学和科学学历史的书。在《哲学和具体科学》论文集中也考察了科学学问题。[16]

在探讨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书刊中，对决定论问题的解释，特别是根据现代物理学成就的解释占有重要的地位。匈牙利哲学家强调指出，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微观物理学的发展证明，不能硬性地把因果性和偶然性对立起来，机械的拉普拉斯因果概念不能回答许多与自然科学发展有关的问题。

在《决定论概念的发展和量子力学》[17]一书中，Ю．佛多尔提出了揭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一般决定论概念的具体内容、对这一概念的诸范畴进行分析并探索其相互联系的任务。佛多尔的出发点是，只存在着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而唯心主义的因果观不能用这个术语表示。所谓无定论完全不要求存在无因果现象，而

只是认为在非物质领域中有因果性。把任何承认因果依存关系的学说都看作是决定论，是不正确的（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然而，佛多尔把决定论解释成为与唯物主义等同的学说，按照其他作者的看法，是说服力不够的。如果采用这种观点，那么所有其他哲学流派就完全归在一类了。

匈牙利的哲学书刊从六十年代初起积极讨论了决定论问题。对简单化和宿命论的解释进行了批判。在《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一九六二年）[18]一书中，）．莫尔纳尔在匈牙利最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对决定论的宿命论理解相去甚远。他强调指出，“社会中的因果性不是某种超验的因素，而是与人的[illegible]动、以前世代的活动成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T．费尔德什在《意志自由问题》（一九六二年）[19]一书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对意志自由的理解，揭示了唯意志论立场的唯心主义实质。

在A．萨博的《实践和辩证法》（一九七一年）[20]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提出了从社会辩证法角度的解释。他的出发点是，马列主义哲学的一切问题只有从社会历史现实的立场才能获得解决。例如，意识问题只有超出纯粹认识论框框，在实际活动中才能解决。

匈牙利哲学书刊中对整体性、总体性问题的研究很有意义。这种研究在卢卡奇以后在И．赫尔曼的著作中，首先是在他的《资产阶级颓废派问题》（一九六七年）、《当代文化问题》（一九七四年）[21]及其他一系列著作中，得到最充分的反映。作者阐明了总体性范畴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原理之一就是要求从现实的普遍性上去把握现实。赫尔曼强调指出，总体性的本质就在于一般和特殊的相互联系。现实不应该被看作是事实的总和、各种因素的堆积，而应该被看作是有机地相互联系的整体。总体性要求揭示一个现象的全部本质关系。

卢卡奇的最后一部未完成著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22]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卢卡奇对本体论的理解与对这个名词的传统解释不完全一致，在他那里这个名词实际上意味着客观辩证法，而卢卡奇把客观辩证法看作是主观本体论即认识论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主观辩证法的学说，总是把本体论、也就是关于经常在现实中出现的客观辩证法的学说作为前提。”[23]按照卢卡奇的观点，本体论是在世界上客观存在的普遍的相互联系。他的出发点是，象实践、反映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是必要的。他认为，为了表明社会存在在自然界本身中的现实基础，在与自然界的同一和区别中表明社会，马克思主义需要本体论。他区分三个大的存在领域：非有机自然界、有机自然界、社会。它们都应该在相互联系中被考察。卢卡奇反对认为只有社会中才有辩证法的观点，强调辩证法与自然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既然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不只是认识的原则，而是任何具体现实的规律，那么这样理解的辩证法就不可能只适用于社会，它应该在非有机的和有机的自然界有相应的前史。本体论意义上的辩证法如果不是普遍的，就是毫无意义的。”[24]

按照卢卡奇的观点，与唯心主义的最终决裂就在于确立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列宁理解了这一点，卢卡奇认为，列宁事实上是以唯物辩证的本体论作为出发点，虽然这一内容在他那里有时被蒙上认识论的形式。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列宁恢复了马克思的本体论。

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性既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社会。但是，如果把这解释为某种可用于这个或那个存在领域的共同的哲学理论，那就是错误的。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它既涉及非有机和有机的自然界，也涉及社会。卢卡

奇认为，通常被称作自然辩证法的东西，是社会存在方式的前史。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一般存在、特别是社会存在的范畴是一个根本范畴。按照卢卡奇的看法，其余一切范畴只有与这个范畴对比的时候才有意义。所以他认为，为了最充分地反映现实的全部丰富内容和多样性，除了逻辑范畴以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应该包括本体论。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九二三年）相反，卢卡奇谈到在解释社会存在时必须承认物质优先的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在匈牙利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许多自然科学家研究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自然界的问题。例如，Т.埃尔代伊—格鲁兹分析了一般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所提出的方法论和哲学问题。在《哲学知识和自然科学》（一九六五年）一书中，他考察了自然科学的社会作用、一系列客观辩证法问题、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的联系、自然界中的进步问题。

Д.阿丹姆、Д.瓦罗、Л.维列茨盖伊、Я.森塔戈什托伊等人的著作探讨了生物学的哲学问题，Л.亚诺西、Т.埃莱克、Д.西盖蒂、А.穆勒、И.霍尔瓦特、Г.萨博等人的著作探讨了物理学的哲学问题。在一九六六年出版了И.费尼埃什的《物理学和世界观》一书。[25]

Л.亚诺西对相对论进行哲学解释的著作非常著名。按照他的看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好用认为自然界的规律不变的洛伦茨的原则来取代。亚诺西认为洛伦茨原则的优点在于，在运用它时，不需要那些关于观察者看或做的东西的混乱的唯心主义推理。

亚诺西的观点与现代马克思主义书刊中通常相对论的评价不同，它在Т.埃莱克的《马克思主义和相对论》（一九七三

年）[26] 一书中得到了支持。按照埃莱克的看法，理论物理的数学化和爱因斯坦的影响促使许多物理学家离开了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走上了柏拉图唯心主义的立场，它更接近宗教得多。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的经验实证主义固有的特点是唯心主义的无神论。在从经验实证主义立场转向逻辑实证主义的过程中，也可看到类似的倾向。量子力学的抽象而复杂的数学资料促使在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框框内转上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因为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科学的作用就在于主观进行演绎。

许多匈牙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Г．彼罗、А．穆勒等）不赞同Л．亚诺西和Т．埃莱克的观点，对它进行认真的批判。[27]

他们的论据的出发点是，亚诺西的解释也跟爱因斯坦的公式一样，导致数学公式。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一种场合是唯心主义的理论，而在另一种场合则被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

二、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

匈牙利哲学家们在研究与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密切有关的社会发展问题时，认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之一是确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标准和阶段。一系列学者在分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和标准时，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支配地位划出来作为主要标准。[28]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不能把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一个标准划分出来，对这个问题应该采取综合的态度，不仅要考虑生产关系，而且要考虑政治机制的全部功能体系、社会意识的水平。[29]

发达社会主义时期在匈牙利书刊中被解释成为相对长期的历史时期。“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在我们这里不是被看作是某种介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既有前者又有后者的东西。这是达到了发达状态、社会主义优点已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社会。”[30]

要对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问题进行成功的分析，需要深刻研

究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在匈牙利哲学书刊中，这一理论首先由于Ф·推凯伊的著作《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九六〇年）《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一九七一年）、《古代社会和封建主义》（一九六七年）[31] 而得到广泛的阐明。他是重新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头几位作者之一。

大家知道，在六十年代，在苏联和国外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参加者从力求从马克思的《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经济学手稿》，首先是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这个片断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弄准确。许多涉及这个问题的著作包含有与推凯伊著作的论战。在说明生产方式时，推凯伊认为必须考虑三个因素：个人、共同性（集体性）和生产资料。从他的观点看，所有这些因素既包括在生产力中（作为内容），也包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作为形式），而且它们只存在于相互联系中。包括主客观因素一定相互作用在内的劳动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决定各社会经济形态相互之间的差异。

推凯伊强调指出，共产主义不简单地是五个形态之一，它是所有以前发展的总结，是“前史”的结束。推凯伊把资本主义以前的三个所有制形式解释为个人逐步摆脱自然形成的制约性的过程，解释为逐步改变生产资料以把作为创造者的人推到前台，改变他们的共同性以使他们摆脱自己自然形成的本质。

一切以前的形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毁灭了。而资本的限度是，其发展是以对抗方式进行的，生产力的创造是作为从事劳动的个人的异化而被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限度是资本主义的关系本身，是劳动和所有制的完全分离。

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真正否定，恢复劳动和所有制统一的社会、集体形式。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恢复”个人所有制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更确切地说，即建立在共同

占有之上的个人所有制。①。推凯伊对社会形式、形态的解释问题的提出、他对简单化理解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批判毫无疑问值得注意，虽然他对马克思观点的解释受到了一定的批评。

在这种解释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具体作用、阶级斗争在克服这些矛盾中的作用是不清楚的。这一切因素都被挤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为了克服自己立场中的一定弱点，推凯伊在《个人和共同性（一九七二年）中考察了马克思在说明社会经济形态时所使用的一系列范畴。例如，他考察了某个范畴（个人、社会、家庭、民族、共产主义）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是在何种意义上被使用的，这同一个范畴的内容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又是怎样保存和改变的。

在分析范畴《Wesen》时，推凯伊认为，它以萌芽形式包含着象"交往"、"生产方式"这样的哲学概念。这个概念翻译成别的语言，不可能用象"本质"和"存在"这样一两个词表达，因为这些词并没有表现出对马克思说来主要的东西："存在"方式即关系的意义。作者写道，在马克思那里，对德国哲学传统的范畴《Wesen》（本质）包含有象"存在"、"潜力"和"社会存在方式"这样的概念。推凯伊强调指出，正象离开社会考察个人是不正确的一样，离开个人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也是不正确的。

作者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利用和接受在历史上产生的"自然形成的"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共同性。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总是描绘这样一种共产主义"模式"，它完全拒绝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共同性，而要建立一种"崭新"类型的共同性，因为据他们说，以前的一切类型的共同性都是空幻的。当然，从发展类型学的观点看，共产主义所要求的是完全崭新的东西，因为个人将有权自由选择共同性，但是这一共同性本身将不是发明出来的。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共同性都将被利用。

社会经济形态问题成了许多社会学家的著作的注意中心。例如，A．阿格在《人类前史的现实性》（一九七三年）中阐明了，社会经济形态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在阿格的另一本书《历史提出的问题》中，研究了非欧洲国家中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问题、亚洲大陆以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И．维塔尼的著作中，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被运用于艺术史问题，在P．西蒙的《伊斯兰教的起源》（一九六七年）中考察了穆斯林世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在匈牙利哲学书刊中，非常注意对主体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分析。在六十——七十年代举行的一些讨论中，例如在关于存在主义、哲学人类学的讨论中，主体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这些讨论的进程中驳斥了那种对主体性的一切表现作宿命论的解释、认为一切都已硬性决定了的观点。同时承认了那种用对主体性的存在主义解释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是站不住脚的。

主体性和人的活动的问题是和对目的范畴的解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哲学书刊中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在现代科学和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科学思维的新形式和新方法把目的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只要提到有目的的分析在生理学、心理学学说的发展中、在把目的性解释方法广泛引入科学的控制论的发展中的作用就足够了。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分析、当前广泛流行的系统方法，都与目的设定密切有关。一系列传统哲学问题，首先是伦理学问题的研究，都要求明确理解目的范畴。

在J．罗霞赫迪的《目的和活动》一书中，强调指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中制定一种总的目的理论，这一理论将包括对人的活动目的既进行认识论的又进行本体论的分析。他指出，目的总是具

有社会性质，而人按其起源和本质是一种使用工具的活存在物。因为，“他使用和制造工具时，不仅‘维持’自己的生命，而且……创造和形成把他和别人联系在一起的关系”。[33]

既然甚至最原始的目的都是由于活动而产生的，是一种被意识到的需要，它从一开始起就受到社会的制约，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态度。

只有在理解人的活动本质的范围内，才能理解人的需要的本质。人们的有目的活动的本质在于间接满足他们的需要。考察社会需要变为主体意向的机制，就要分析价值关系。不这样，就不可能揭示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的动态。

客观存在的社会需要，不是作为某种外部的命令，而是作为影响人们主体活动成果的社会条件，对人们产生自己的影响。在领会社会条件过程中的价值意识，就为活动的导致需要结果的某种预定性质提供根据。它给人提供这样而不是那样活动的合理基础和推动力量，它以存在内在动机为前提，这种内在动机就是需要。“目的是满足需要、需要促使活动，同时决定这一活动内容的基本方向。”[34]

价值作为主观能动性的源泉，包括在目的概念中。不理解促成活动的诸因素，不统一掌握社会和个人的辩证联系，就不能理解目的。

除了需要范畴，在哲学书刊中还研究了利益范畴。例如，在H．里克的《利益和活动》[35]一书中，利益被看作是一个在人和社会的生活中起巨大作用、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影响人们的全部活动的历史范畴。

对目的、活动、需要、利益这些范畴的分析，对理解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主要范畴之一的劳动具有重要意义。对劳动范畴的研究在匈牙利哲学书刊中得到广泛的发展。在Д．傅卡斯的一系列

著作㊱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它们融合的条件、劳动的社会地位改变问题。他也考察了现代各种劳动对艺术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

科学研究中非常注意考察科技革命及其作用和对当代世界、首先是对社会关系和个人命运的影响的哲学问题。从事这些问题研究的有 A．阿格、M．霍洛、Д．阿戈什东等人。

Д．卢卡奇的著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做了展开的分析，在那里，劳动被看作是有意识的目的的实现、适合目的的活动的过程。卢卡奇强调指出，马克思否定在劳动之外、在实践之外存在着任何目的设定。劳动不是目的设定的表现形式之一，而是那种从本体论上确认目的设定是历史现实的现实因素的唯一的东西，目的设定是从社会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它应该满足这些需要。但是，为了使目的设定不成为空想，它应该拥有相应的资料。

卢卡奇强调社会和自然之间的联系，但是他反对按照与自然规律的类比来描绘一般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经济创造人的第二自然，乍看起来它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庸俗化的立场极力把政治经济学描绘成为某种“准自然科学”。常常是不考虑在社会发展中一切都贯穿了目的设定和思想，而把经济发展物神化。

卢卡奇把劳动看作是一切社会实践的模型。劳动改变人的本性本身。因为当人给自己提出一定的目的、监督它的实现时，他也改变自己的意识，他的意识会取得新的功能。与实现劳动过程有关的意识因素包含着那由社会的经济存在所产生的一切思想、意识形态形式的萌芽。卢卡奇指出，这种立场取消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而建立在劳动总是要求思想因素和物质因素融合这一点上。

卢卡奇正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强调意识的作用。意识获得特殊

的作用，它不再是生物再生产的简单派生现象：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的产物是在过程之初就在劳动者的概念中，也就是观念地存在着的结果。劳动同再生产对周围世界的消极的、只有调整性的适应变为有意识的、能动的改造过程有联系。

卢卡奇认为，劳动过程经常使人、人的意识面临着对不同任务作出选择、决定的必要。甚至原始人也面临着选择的必要：挑选哪块石头作工具。人们自己选择、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对历史条件他们不能选择。对不同道路的选择是由历史发展的一定水平预先决定了的。卢卡奇从人经常必须对他面临的不同任务作出选择这一点出发，把人定义为对这些可供选择的问题作出回答的存在物，应该经常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提出的不同方案之间作出选择的存在物。这个定义非常含糊，很不确切，作者本人没有充分的解释，所以它在匈牙利书刊中受到了正当的批评(И．赫尔曼)。

与劳动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对异化问题的分析。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在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占去了匈牙利书刊许多篇幅。在这一讨论的进程中突出了异化的原因、本质和消灭途径的问题。

讨论参加者们的出发点是，异化问题不能被看作是马克思"青年时代唯心主义"的残余。在某些文章中，马克思的异化范畴被解释为一种心理学范畴。另一种观点则把异化看作一种哲学史范畴，说的就是个人活动的产物在一定条件下脱离开他的控制和权力，对他说来成为一种外部力量。

在评价异化时发表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它的本质在于存在剥削，第二种则认为是分工和商品生产。就是按照这一点来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异化问题。例如：П．山多尔把它和存在资本主义残余联系起来，不同意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生新的

异化形式的意见。A·维尔特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异化因素，但是认为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时不必用这个范畴。还发表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异化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特征，只是在社会主义被歪曲时才会产生（M.阿尔马什）。

有些学者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货币关系，造成了异化的可能性。说的只是可能性，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所起的作用已经与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异化的古典形式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可是，价值规律的一定作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国家和其他一系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起作用的因素的存在，不能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引起异化现象。人道主义问题是和克服异化问题密切联系的。在《规律和人》（一九六四年）[37]一书中，A.萨博详尽地研究了异化的产生原因和克服途径。Э.托尔达伊在《异化的神话和现实》[38]一书中分析了消除异化的过程、它的本质以及与确认人道主义原则的联系。

也许，对异化问题研究得最充分的是Д.卢卡奇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如果说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他还把物化和对象化等同起来，那么在以后的著作中，特别是在《青年黑格尔》中他已把这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开来，在《本体论》中，卢卡奇再一次阐明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在异化观点上的对立，并且反对把异化说成是人的永恒本质。

按照卢卡奇的看法，为了正确理解异化的本质，必须不把人和社会硬性对立起来。“离开社会考察的人和离开人们的相互联系考察的社会，都是空洞的抽象。”[39]人作为个人，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异化不能作为某种一般的、超出历史之外的人本主义范畴存在，它总是带有社会历史性质。异化作为科学的抽象，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只以具体形态存在。异化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现象，它在受到经济的制约，并且以意识形态形

式表现出来。

异化由于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和现实一起发生变化：一种异化形式消灭了，另一种异化形式又代之而起。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对社会意识进行控制的消费社会，产生了新的异化形式。可以说，只有对全部社会经济制度进行革命改革之后，才有可能消灭异化，但是这并不排除，而是要求每个个人自己克服自身的异化。

在И．赫尔曼的著作《资产阶级颓废派问题》（一九六七年）、《现代文化问题》（一九七四年）、《卢卡奇的思想世界》（一九七四年）中，分析了异化现象。他写到必须把对象化、物化和异化这三个概念区分开来。消灭异化在一定意义上只不过是恢复目的设定和目的实现的统一、活动的目的和结果的统一。赫尔曼阐明了，现代资产阶级文化成了异化过程的牺牲品。

匈牙利哲学书刊中也认真注意了宗教异化问题。例如，И．卢卡奇的著作《神的道路》（一九七四年）[1]中，分析了宗教异化的本质，表明了，在宗教中异化劳动表现为超自然力量居统治地位的观念。在宗教意识中，劳动异化的特征一方面是对劳动作贬抑的评价，另一方面是赋予超自然力量以活动的能力。异化在工人和“非工人”那里表现不一样，这决定了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宗教意识的差异。如果说前者力求利用宗教来对现存事物采取批判态度，那么后者则把宗教只当作为现存事物辩护的东西。

И．卢卡奇在阐述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时，表明了宗教异化只不过是人们的主观活动与其客观结果之间的矛盾、分裂在意识中的拟人的、虚幻的反映。

人按其可能性说来是一种全面的存在物，但是，由于他的活动受到敌对的社会关系的限制，人的全面性便片面地、以与他的内容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分工成了人本身的分解，他被

变成了局部的人。借以实现人类发展全面性的分工，在这些条件下表现为不仅是产品的异化，而且是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

И.卢卡奇强调指出，必须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关系如何产生出宗教的这个或那个形式，因为宗教的任何形式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结果。他表明了，作为这种或那种类型宗教的基础的，首先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它决定着该种类型宗教的基本特征。因此他把宗教分成两种类型：东方的（其中有印度教、各种形式的佛教、儒教等），和西方的（其中有天主教、新教、正教、犹太教）。按照作者的观点，东方类型的宗教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它的缓慢发展速度、特别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存在有密切联系。他把西方类型的宗教与古代城邦的形成以及公社和私人两种所有制形式联系起来。

异化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和对马克思的《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经济学手稿》的解释有关。例如，在A.阿格的《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的世界》（一九七九年）[11]一书中，表明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区别何在。马克思在揭示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时，也表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人本学局限性。李嘉图未能把物化过程和异化过程分开，因为他还不了解剩余价值的性质。而马克思在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本质、指出了劳动的私人性质和社会性质之间的矛盾之后，能够发现对象化、物化和异化这三个过程之间的差别。

异化问题与对人的问题的解释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匈牙利哲学书刊中对后者极为注意。Э.法尔卡什在《自由和个性》（一九六八年）一书中认为，采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概念是完全合理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概念包括在各种作为主体的人的科学中所考察的一系列问题。”[12]按照他的设想，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包

括两部分：研究人类发展史（系统发育）和分析个别人的发展（个体发育），也就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和个性的理论。后来，这个观点没有得到任何作者的发挥。

在E．安切尔的著作《自由的困境》（一九七二年）、《历史和选择可能性》（一九七八年）、《论时代精神》（一九八一年）中[43]，分析了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个性在各种不同资产阶级理论中的“消失”。商品拜物教在个人的意识中发展了消极性。这一事实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艺术中得到了反映和支持。因为不能活动的人完全受制于现存事物，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从属于事物关系的世界。可是对人说起来，看到自己存在的目的、意义是最基本的需要。安切尔在批判关于人在社会中的活动被硬性决定的概念时，分析了人的选择决定的可能范围、人对行动进行选择的自由幅度以及他的决定实现的可能性。在И．里克的著作《个性和哲学》[44]中，从个性理论的角度对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作了解释，分析了个人行动的结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考察个性问题的还有关于伦理学问题的书刊。在Т．胡萨尔的《道德和社会》（一九八三年）[45]一书中，考察了道德的起源、道德发展的特征、社会和道德发展的相互联系的规律。在一般方法论方面，М．马卡伊的研究值得注意。她的《论道德意识的辩证法》（一九六六年）[46]是匈牙利头几本这类著作之一。它不仅包含着对一系列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分析，而且还有对伦理学一般哲学问题的正面解决。作者分析了伦理学和认识论的相互关系、科学和伦理学的联系。她写道：“伦理学中没有一个一般的范畴或概念不是道德意识共有的价值和规范功能的特殊折射，不同时包含有客观的和自我评价与调节的因素。”[47]马卡伊在揭示道德中的规范因素的本质和功能时，认为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对反映现实

的功能的理解密切相关。规范因素揭示出行为的本质，迫使把行动和理想加以对比。规范与现实的认识密切相关。现实和规范之间通过评价过程相互联系在一起。对规范适当性的研究与对作为它的基础的评价正确性的分析密切相关。马卡伊把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道德和作为个人意识形式的道德严格区分开来。她把个人道德意识的形式称作道德性。

A．阿格、Л．加拉伊等人从比纯粹伦理学更广泛的角度来研究个性问题。Л．加拉伊在《个性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存在》（一九六九年）[48]一书中阐发了对人的对象活动的心理学解释。那里表明了，对个性关系的分析对解决社会心理学问题具有根本意义。而在这一方面，他考察了关于个性理想化的问题，个性理想化是通过激发动机对经济关系进行折射而实现的。A．赫勒尔依靠局部科学的成就，在《本能·情感理论》（一九七八年）一书中分析了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个人、他的本质和可能性，对资产阶级的人的侵略性理论进行了详尽的批判。以Φ．巴塔吉为首的一批匈牙利心理学家在研究个人的社会行为及其动机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

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问题的匈牙利哲学书刊，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如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进行的研究有联系。例如，在И．萨博的著作中考察了法律科学的许多方法论问题。一九七五年出版了他的《马克思和法律科学》一书，对哲学家们也很有意义。同样有意义的是K．库尔恰尔在社会学方面的著作。[49]一九八○年出版了他的《现代匈牙利社会》一书。匈牙利历史学家Л．胡萨尔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历史和自我意识》一书[50]，也引起了注意。

六十年代中期，匈牙利历史学家举行了一系列讨论，其中也有哲学家参加，这些讨论涉及社会进步问题。中心问题之一是关

于匈牙利在漫长历史中的民族独立问题的解释。讨论会的参加者们反对民族主义的表现，强调指出必须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庸俗化作斗争，必须进行具体的社会分析，特别是对阶级力量的分布及其斗争情况。

在对匈牙利社会的社会学研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种企图揭示现代社会状况特征的努力。在这方面进行工作的有Т．胡萨尔、Т．卡洛西、А．维尔特等人。在Ф．柯瓦奇的《论工人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积极性和修养》[51]一书中，考察了与确定“工人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积极性”这些概念有关的方法论问题。在其他著作中分析了中等阶层（А．博姆）、合作农民（Е．契兹马迪阿、Ш．查尔诺察伊、Т．兰解尔、Ю．基什）、知识分子（Т．胡萨尔）的结构和状况。

А．基什的著作《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批评者》、《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政治理论——政治实践》[52]探讨了国家、民主和人民政权问题。他认为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任何民主、任何专政都具有阶级性质。马列主义不把民主和自由等同起来。资本主义最民主的形式不能保证人的自由。基什指出，民主要求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使人变为人物的条件之一。群众的积极性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工作，它要求人在任何生活领域的积极活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与群众的觉悟程度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民主按其本性应该考虑群众的意见。

有一系列匈牙利学者的著作探讨革命的理论问题（А．基什、Ш．卡尔巴蒂），批判左倾激进的革命概念（Б．克佩茨、Т．朵特），研究发达国家中小资产阶级的作用（И．毛尔东），分析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革命（Т．豪伊都）。

匈牙利哲学家在分析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时，对美学问题予

以特别注意。研究美学、对现实的审美反映的一般哲学问题，在匈牙利有深厚的传统。这些传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匈牙利哲学思想史发展的特点，由于许多历史情况，匈牙利的哲学思想往往是在美学、文学和诗歌中反映出来。在美学方面，这个国家形成了首先是与Д．卢卡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一定的学派。M．阿尔马什、Д．若尔陶依、Й．西盖蒂、Л．西克拉伊、И．赫尔曼等人的著作很出名。

在Д．卢卡奇的《审美特征》一书中，阐述了作为哲学科学的美学的完整体系。这部研究著作的中心是主体和客体、主观事物和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的辩证法。如果说科学提供对现实的"非拟人化"描述，那么艺术的特征就在于提供对存在的通过人的反映："在解释人类生活的任何领域时，没有主体不可能存在客体，这一原理是哲学的唯心主义，但是在确定审美的特征时，它却是最重要的一点。"按照卢卡奇的观点，艺术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最高形式。这种自我意识不能与影响人、控制人的外部世界分割开来。

卢卡奇的美学概念是论证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正是现实主义能够提供对世界的深刻的和多方面的描绘，而现代主义，按照卢卡奇的看法，则是在激情、情绪的水平上对世界的片面的、凝固的描绘。

马克思主义美学方面的许多著作，特别是论述现实主义问题的著作，是由Й．西盖蒂写的——《文学概论》（一九五九年）、《马列主义美学绪论》（一九六六年）[34]等。在Б．克佩茨、И．基拉伊、M．萨波尔奇的论述文学问题的著作中，也探讨了美学问题。

匈牙利对音乐美学问题特别注意，它的研究与文化的命运、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著作是由Д．若尔陶依写的[35]。在《现代音乐中人的形象》（一九六

九年）一书中，他对在现代资产阶级音乐概念出现以前的理论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这种分析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及其批判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一九七二年，若尔陶依发表了一部从古代一直写到资产阶级文化时期的美学简史。他的一系列著作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音乐美学、特别是阿多尔诺的美学观点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批判过程中揭示了对艺术的社会制约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在 И. 乌依法鲁西的《现实的音乐形象》一书中，研究了对现实的音乐反映的哲学问题，探讨了音乐的哲学解释如何同时代的一般文化以及它所持有的社会条件有直接联系。从事音乐美学问题研究的还有 Я. 毛洛蒂、И. 维塔尼㊻。

在 И. 赫尔曼的一些著作中探讨了哲学问题和美学的密切联系。例如，在《探索个性》（一九七二年）一书中，他研究了作为人类发展史中各种矛盾倾向之间斗争的典型表现的戏剧发展史。在《资产阶级颓废派问题》（一九六七年）、《现代文化问题》（一九七四年）、《七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文化》㊼ 等一系列其他著作中，赫尔曼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必然使文化成为异化过程的牺牲品，或是使它成为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东西，或是作为象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批判的东西，但是它不能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观念的框框。

М. 阿尔马什也以美学文章的形式阐述他的哲学观点。在《戏剧发展的道路》（一九六九年）、《外观的现象学》（一九七五年）㊽ 等著作中，他分析了虚假意识的各种表现形式，力求揭示出它们如何与现实生活的结构、与社会存在的体系联系在一起。

三、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对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的批判

哲学史是一个在匈牙利得到很广泛发展的哲学知识领域。在这个国家解放以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少。甚至哲学经典作家的著作也翻译得很少，而且翻译的通常只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的作品。在解放以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做了很大的努力。出版了《哲学著作集》丛书，其中包括古代东方、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十七——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作品。在《思想家》丛书中发表了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的作品。出版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集。出版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的著作。其中突出的有：《哲学史》三卷；A．赫勒尔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古代叙事文学》（一九六六年）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一九六七年）；И．西蒙诺维奇夫人的《莱布尼茨》（一九七二年）；Й．西盖蒂的《德尼·狄德罗》（一九五九年）；Л．卡洛查伊的《笛卡尔的伦理学》（一九六四年）；И．赫尔曼的《康德的目的论》（一九六八年）；П．山多尔的《柏格森的哲学》（一九六八年）；M．马卡伊的《失望意识的世界观》（一九六九年）；M．卢达西关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和伦理学的一系列著作以及З．罗日尼亚伊、M．阿尔马什等人的著作。[59]

在匈牙利哲学史书刊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极为注意。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全集，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要阶段。在一九五八年就发表了Д．卢卡奇的《关于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发展资料（一八四〇——一八四四年）》[60]。这是在五十年代证明不应该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的少数研究著作之一。这部著作在匈牙利

为这个问题的研究定了调子。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问题的解释在Д．卢卡奇的《本体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马克思是从物质存在第一性的原则、从物质生产在社会中第一性的原则出发着手制订他的本体论的。列宁与当时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理解了马克思的这种意向。马克思能够通过把历史性和系统性结合在一起的办法，克服黑格尔本体论的矛盾性。这点的例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特别是在分析马克思的本体论的基本原理的部分，卢卡奇证明了，马克思的方法是对黑格尔的虚假合理性的直接和间接的批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的活动在他能够得出结论、预见到自己活动的后果的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社会过程本身、历史本身不包含有任何会预先规定历史的一定进程的“理性”。正是因为如此，目的设定在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与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有联系的问题得到了广泛的阐述。匈牙利哲学家把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建立经济学体系的第一次尝试来进行分析。他们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表现在对自然界客观性的承认上，由于社会历史过程的基础是社会和自然的相互作用，这也是承认社会历史过程的客观性质。他们对马克思关于人及其本质的理解进行了阐发。A．阿格有一系列著作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在其中分析了马克思一八四四——一八四八年的著作。[61]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观》（一九七六年）一书中，阿格详细地说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经过，分析了马克思的历史观。他特别突出对每个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对人及其本质的解释。阿格的另一本书《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形成》（一九七五年）也是探讨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是由许许多多关于“青

年”马克思的讨论引起的。他的阐述是从与马克思作为出发点的理论原理对比的方式进行的。介绍“青年”马克思问题本身研究经过的那章值得一读。

Э. 法尔卡什的著作[62]探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伦理学遗产，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道德的观点，表明了这些观点与科学共产主义一般理论的密切联系。

一九八一年出版了Э. 罗霞赫迪的书《理论和哲学》[63]，作者在这本书中试图弄清楚对马克思及其哲学作出多种解释的根源。按照作者的看法，这些解释的原因是试图建立哲学体系，而且不同的作者由于自己的政治倾向不同而以不同的原理作为出发点。马克思的哲学是与理论的内部结构密切联系的理论思维方式。

论述列宁创作的著作在哲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Д. 卢卡奇的《列宁》（一九七〇年）[64]一书，是他在不同年代写的论文集，他在这本书中对列宁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不仅是实践家，而且是理论家、哲学家。

在A. 维尔特的《作为哲学家的列宁》[65]一书中，揭示了歪曲和伪造列宁哲学遗产的作法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维尔特反对把辩证法只理解为方法，他写道，把作为方法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的辩证法对立起来，只是在把辩证法看作某种外部方法的情况下才合理。维尔特指出，按照真正辩证的理解，方法是和内容密切相连的。他援引列宁的话作为依据，列宁曾援引黑格尔的话说，方法不是外部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

在A. 萨博的《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66]一书中也考察了列宁主义的问题，它说明了列宁的思想与本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是完全对立的。在Л. 久尔苛的科普著作《列宁和十月》（一九六八年）和《同革命面对面》（一九七〇年）中，不仅介绍了列宁的思想遗产，而且创造了列宁作为人和战士的艺术形象。

除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的著作以外，还有关于匈牙利哲学史的研究。在战前的匈牙利，哲学家当中长时期流传这样一种观点，即既然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没有具有特色的哲学家，匈牙利哲学思想史也不必研究。

在五十年代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开始了对本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一九六七年出版了十八世纪末匈牙利雅各宾党人的著作。这方面的巨大功绩属于 Д．托尔达伊、 П．马特劳伊[67]。马特劳伊在六十年代出版了论文集《十五——十七世纪的匈牙利哲学家》，在其中分析了这个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在论文集《思想和自由》中，马特劳伊考察了“教义派”的理论原理，敎义派”是匈牙利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他们力图把“民族精神”与“革命精神”分割开来。在一九七八年，他又出版了一本论述二十世纪初奥匈帝国的哲学生活的书。

在二十世纪奥匈帝国形成的精神发展问题和理论流派，在最近几年的哲学书刊中得到广泛的阐述。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产生了一大批哲学流派——从弗洛伊德到维特根施坦！在 К．尼利的《帝国的精神生活》(一九八〇年)[68] 一书中，对这些流派进行了哲学史的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并且试图揭示出产生它们的社会现象。

在匈牙利二十——三十年代的历史学中广泛流行“精神史”流派，它是德国唯心主义“精神史”的附庸。 п．西盖蒂的《匈牙利“精神史”流派批判》[69]一书专门对它进行了分析。这个流派所要解决的意识形态任务，在于对这个国家的过去进行“反革命的修正”；对十九世纪匈牙利自由主义和各种民主思潮的批判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西盖蒂强调指出，反动派总是力求把匈牙利文化描绘成“地方性的”。“精神史”派的理论家们不止一次企图把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宣布为“舶来品”，他们无视这样的事实，

即匈牙利接受马列主义的土壤是由这个国家历史上的各种进步的社会政治传统和科学传统培育起来的。

匈牙利的研究者对二十世纪初予以特别注意。匈牙利许多著名文化活动家的观点正是在那时形成的。正象在论文集《二十世纪初的匈牙利哲学思想》[70]中强调指出的，在这个时期，哲学在匈牙利的精神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欧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传统对它的影响大大增长了，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兴趣也增长了。在Д．傅卡斯的《关于匈牙利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历史》[71]一书中，分析了二十世纪初匈牙利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哲学观点，这些人为工人阶级的启蒙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他们宣扬的是受到严重歪曲的马克思主义。

在И．萨博的《匈牙利资产阶级的法和国家哲学》（一九五五年）一书中考察了法哲学的产生和从十八世纪末到一九四五年的发展，揭示了这种哲学的实证主义性质和保守反动倾向。两卷本著作《匈牙利社会学的第一个工场》（一九七三年），提供了二十世纪头一个十年匈牙利社会思想形成的完整画幅。Ж．毛道拉斯夫人的著作《纯粹逻辑学的基本问题》（一九六五年）专门论述著名匈牙利逻辑学家A．鲍勒尔的观点。在З、诺瓦克的《星期日的社会》（一九七九年）[72]一书中揭示了二十世纪初匈牙利精神气氛的特征及其对当时哲学思想的影响。

有一系列著作论述Э．萨博的世界观，Э．萨博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头一批严肃的宣传家之一，他对匈牙利工人运动、对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匈牙利知识分子观点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出版了著名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Ш．瓦利亚什的著作集（一九七一年）。[73] И．谢尔麦茨在前言中考察了瓦利亚什思想发展中所经历过的复杂道路，分析了他在逻辑学方面最重要的著

作。一九七九年出版了论文集《两次大战之间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74] И．赫尔曼在前言中分析了匈牙利在那些年代的全部精神气氛的特征，并且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力求找到反法西斯斗争的同盟者是这个时期的主导因素之一。

关于著名匈牙利哲学 Д．卢卡奇不同时期的观点，发表了许多著作。在他逝世后，在布达佩斯成立了 Д．卢卡奇档案馆，现在它成了匈牙利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分所。它不仅收藏在世界各国出版的关于卢卡奇的书刊，出版他的著作，而且对卢卡奇的精神遗产进行研究。在匈牙利的书刊中、政府和党的文件中，卢卡奇被看成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创作在他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矛盾的。这就要求对他的全部创作进行仔细的批判研究。[75]

这种研究的尝试之一是 И．赫尔曼的书《捷尔吉·卢卡奇的思想世界》，它的副标题是《对二十世纪人的可能性的研究》（一九七四年）。作者的出发点是，二十世纪为人类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类发展途径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例如，Э．布洛赫提出希望原则作为发展基础，这个原则不是着眼于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而是着眼于没有的东西，也就是乌托邦的原则。法兰克福学派用它的大拒绝即无希望原则提供了另一种答案。赫尔曼认为，卢卡奇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认为希望原则空洞无物，无希望原则也是一样。卢卡奇提出了一点不同的东西——发现可能性。赫尔曼写道，但是在他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在一十和二十年代，可能性被卢卡奇解释得"很抽象，被解释成为神秘的义务，某种要求……这种可能性不是从内部发展的矛盾中产生出来。后来，他在确定可能性方面前进了一步"。[76]

在评价卢卡奇的创作道路时，必须考虑到，卢卡奇本人在六十年代曾不止一次对他的发展道路、他自己所说的"走向马克思

的道路”进行过批判分析。在《我向马克思的发展：一九一八——一九三〇年》（一九六七年）和他在一九六九年为他的一九一〇——一九二六年著作匈牙利文版写的前言中，卢卡奇分析了他早期著作的许多错误论点，并且说明正是这些错误论点被资产阶级拿了过去，变成了时髦口号。

当前匈牙利书刊中对卢卡奇最后一部未完成著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九七六年）的评价值得注意。绝大多数作者给这部著作以高度评价，强调指出它既尖锐地反对新实证主义，也尖锐地反对法兰克福学派。他们也指出，《本体论》是对卢卡奇早期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九二三年）的许多论点的批判审查。对卢卡奇这部著作的肯定评价，并不意味着接受他的全部论点。卢卡奇把人定义为进行选择的存在物、他在说明人的本质时对选择可能性及其作用的解释等，受到了批判分析。

在匈牙利哲学书刊中，除了对卢卡奇《本体论》的肯定评价外，还有些著作对它提出了尖锐批评。例如，M．马卡伊在《伦理学的本体论问题》一文[27]中认为，卢卡奇把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绝对化了，使意识能够不依赖于存在而构思对象，卢卡奇实际上以承认自然和社会的二元论作为出发点。

卢卡奇一些过去的学生（M．瓦伊达、Д．马尔库什、M．费赫尔、A．赫勒尔）从相反的立场对《本体论》提出了批评。他们对卢卡奇的主要指责，是他离开《历史和阶级意识》的许多论点，承认不仅社会中而且自然界中有辩证法，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反映论，是他对历史决定论的解释和对社会主义的论证。按照他们的观点，在卢卡奇的解释中对一般意识，特别是哲学思维没有赋予足够的重要性。据他们承认，他们曾指望在《本体论》中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解释的改造，找到与把哲学看作关于存在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的概念对立的观点。由于在卢

卡奇这部新著作中没有找到这些，他们就决定，用他们的话说，回到卢卡奇二十年代的遗产上去。

上述匈牙利哲学家对Д.卢卡奇的思想的不同评价表明，无论是对《本体论》还是对他的全部著作都必须进一步进行深刻全面的分析。“卢卡奇自从成为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以来，直至生命的终结，始终不渝地捍卫和继续发展马列主义的经典遗产，巩固和改革其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基础。”[78]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这方面值得注意的著作有Е.安切尔的《被震撼意识的神话》（一九七四年），[79]它对许多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世界观中的绝望和冷漠进行了批判。

М.马卡伊的《失望意识的世界观》[80]一书也和这个主题直接有关，它对现代资产阶级的伦理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按照马卡伊的看法，存在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同样属于颓废派思潮，因为它们不仅不解决任何新问题，而且也没有提出任何新问题，而是在“科学还是道德”这个按其本质说来是虚假的两难推理上打圈子。这两种思潮之间的差别在于，新实证主义使科学排除了道德，而存在主义使道德排除了科学。

Л.埃莱克什的《对现代资产阶级科学历史的解释》[81]一书，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思维进行了批判。他得出结论说，在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中，历史作为单独的认识对象和方法论原则已被排挤到次要地位，只具有次要的意义。作者表明了，为什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主义原则被遗忘。

在Л.法尔卡什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化》（一九七三年）[82]一书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他指出，在我们今天，资产阶级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求助于马克思主义，利用它的范畴和一系列原理。它们这样做，

是为了“削弱”马克思主义本身。他把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这种企图称作“马克思主义化”。除了这个名词以外，法尔卡什还使用了“通情达理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这是指这样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它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并在资产阶级哲学的框框内加以运用。他认为“通情达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不能接受的。

匈牙利哲学家的其他批判著作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批判存在主义（З．托尔达伊）、现象学（М．瓦伊达）、阿多尔诺哲学（Д．若尔陶依）、弗洛伊德主义（И．赫尔曼）的著作。А．盖堆的著作《危机的哲学》（一九七六年）考察了资产阶级危机意识的某些理论的和历史的倾向。

Б．克佩茨的书《“新左派”的意识形态》（一九七四年）考察了“新左派”意识形态的各种流派。作者表明了，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观点各种各样，他们的共同点只是，他们在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中既拒绝传统的左翼激进的批判，也拒绝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既否定资本主义也否定现存社会主义，使“新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某种两面性。在哲学方面，这是把纯粹主观的因素提到首位，恢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首先是自发性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一九八一年出版了Ж．包卜的书《新左派及其理论家》。一九八二年出版了Б．克佩茨的另一本书《新保守主义和新右派》，[89]在其中不仅对美国、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的这一现象作了介绍，而且说明了它的思想本质以及К．波佩尔和М．韦伯等人的哲学对它的影响。

在批判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对马列主义的歪曲的著作中，可以提到А．盖堆、А．基什等人的书。在基什的著作中，重点放在就社会主义本质、民主、平等、社会分化等问题对反共产主义的批判上。他指出，社会主义消除了人对人的剥削，按其本性还没有

消除按照按劳付酬原则的重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与人们在分工体系中的不同地位，首先是和社会主义还没有达到各取所需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联系。这种受历史制约的不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消灭。基什写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建立平等的问题看作是一种多方面的、漫长的过程，“政治革命只有达到平等的第一阶段，随后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漫长的过渡时期，它为那种归根到底将导致人们的真正解放和平等的发展创造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条件”。[84]

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关于存在多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多元论是一种错误地概括了工人运动中目前在一些党派之间有争论的情况的修正主义论断，这种论断就是：事实上存在着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而是多种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中的争论是在‘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的。”[85]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多元论，不仅意味着理论上的修正主义，而且意味着拒绝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不是坚持统一的理论原则的党，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所以，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捍卫这样的原理：没有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党的马克思主义和非党的马克思主义，保守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只存在着一种马克思主义，它总结不断变化的世界、现实变革的过程，而不断地发展”。[86]

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最近二十年来的发展非常富有成果。标志是研究的主题大大扩展了，专业性加强了。这不仅是指哲学出版物的数量增加了，而且是说哲学领域的研究质量提高了。这些年就马列主义哲学的各种问题进行的讨论，不仅有助于弄清许多争论问题，而且吸引了广大知识分子来钻研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发展的许多现实问题寻求哲学上的答案，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的联盟，使得马列主义哲学在全国的影响加强了，它的科学威信提高了。

---

① Я．卡达尔《文章和演说选集》，1970年莫斯科版第495页。

② Д．阿策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科学领域的政策和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载于《哲学问题》1975年第9期第24页。

③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71年莫斯科版第95页。

④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75年莫斯科版第280页。

⑤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81年莫斯科版第178页。

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科学政策指示》1969年布达佩斯版第15页。

⑦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115页。

⑧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117页。

⑨ А．穆勒《自然科学认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和列宁的自然概念史》1974年布达佩斯版。

⑩ Д．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1976年布达佩斯版第2卷第37页。

⑪ Д．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1976年布达佩斯版第2卷第388—389页。

⑫ Г．费尔德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证明理论基础》1976年布达佩斯版；《当代的可认识性问题》1971年布达佩斯版；《关于真理的真理》1974年布达佩斯版。

⑬ Л．埃尔代伊《认识的起源》1957年布达佩斯版；《辩证逻辑的认识理论》1971年布达佩斯版；《逻辑中的对立和矛盾》1975年布达佩斯版。

⑭ Д．陶马什《科学决策》1961年布达佩斯版；Ш．西盖特瓦里《论概念的辩证法》1981年布达佩斯版；И．塞纳西《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1981年布达佩斯版。

⑮ И．鲁仄《在数学和哲学的边缘上》1968年布达佩斯版。

⑯ М．费赫尔和Л．哈尔申《从科学问题到理论》1977年布达佩斯版；Л．维克尔迪《未完的现在》1979年布达佩斯版；《哲学和具体科学论文集》1981年布达佩斯版。

⑰ Ю．佛多尔《决定论概念的发展和量子力学》1972年布达佩斯版。

⑱ З．莫尔纳尔《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1962年布达佩斯版。

⑲ Г．费尔德什《意志自由问题》1962年布达佩斯版。

⑳ А．萨博《实践和辩证法》1971年布达佩斯版。

㉑ И．赫尔曼《资产阶级颓废派问题》1967年布达佩斯版，《当代文化问题》

1974年布达佩斯版。

㉒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暂且只用匈牙利文全文出版。共有三卷（第一卷——《历史哲学笔记》、第二卷——《系统笔记》，第三卷——《绪论》）。这本书的个别部分出了德文版。由于这是作者未完成的著作，编辑解释的余地很大，匈牙利文版和德文版的内容并不一致。

㉓ Д．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第1卷第247页。

㉔ 同上书，第100页。

㉕ И．费尼埃什《物理学和世界观》1966年布达佩斯版。

㉖ Г．埃莱克《马克思主义和相对论》1973年布达佩斯版。

㉗ 《匈牙利哲学评论》1965年第5期第891页。

㉘ 例如参看《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5年第1期第60页。

㉙ Л．纳吉《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载于《党的生活》1975年第5期第52页；Ш．卡尔巴蒂《人民匈牙利三十年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的过程》，载于《社会科学公报》1975年第1期第108页；И．瓦什《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历史问题》，载于《社会科学公报》1975年第3期第32页

㉚ И．波日加伊《根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看匈牙利哲学科学的若干任务》，载于《哲学问题》1975年第9期第35页。

㉛ Ф．推凯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1975年布达佩斯版，《古代社会和封建主义》1969年布达佩斯版，《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1971年布达佩斯版（1975年在莫斯科出了俄文版），《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证法》1974年布达佩斯版。

㉜ А．阿格《人类前史的现实性》1973年布达佩斯版，《历史提出的问题》1974年布达佩斯版；И．维塔尼《共同性——集体性》1971年布达佩斯版、《社会、文化、社会学》1981年布达佩斯版。

㉝ Э．罗霞赫迪《目的和活动》1973年布达佩斯版第99页。

㉞ Э．罗霞赫迪《目的和活动》1973年布达佩斯版第247页。

㉟ И．里克《利益和活动》1979年布达佩斯版。

㊱ Д．傅卡斯《哲学上的劳动》1965年布达佩斯版。

㊲ А．萨博《规律和人》1964年布达佩斯版。

㊳ З．托尔达伊《异化的神话和现实》1970年布达佩斯版。

㊴ Д．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第2卷第574页。

㊵ И．卢卡奇《神的道路》1974年布达佩斯版。

㊶ А．阿格《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的世界》1979年布达佩斯版。

㊷ Э．法尔卡什《自由和个性》1968年布达佩斯版第140页。

㊸ Е．安切尔《自由的困境》1972年布达佩斯版，《历史和选择可能性》1978年

布达佩斯版，《论时代精神》1981年布达佩斯版。

㊹ И．里克《个性和哲学》1969年布达佩斯版。

㊺ Т．胡萨尔《道德和社会》1983年布达佩斯版。

㊻ М．马卡伊《论道德意识的辩证法》1966年布达佩斯版。

㊼ М．马卡伊《论道德意识的辩证法》1966年布达佩斯版。

㊽ Л．加拉伊《个性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存在》1969年布达佩斯版。

㊾ К．库尔恰尔《人和社会环境》1969年布达佩斯版；《社会学史纲》1971年布达佩斯版，《现代匈牙利社会》1980年布达佩斯版。

㊿ Т．胡萨尔《历史和自我意识》1968年布达佩斯版。

51 А．维尔特《什么是社会结构？》1971年布达佩斯版；Ф．柯瓦奇《论工人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积极性和修养》1976年布达佩斯版。

52 А．基什《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批评者》1966年布达佩斯版、《马克思主义和民主》1973年布达佩斯版、《政治理论——政治实践》1979年布达佩斯版；参看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神话和现实》1981年莫斯科版。

53 Л．卢卡奇《审美特征》1963年布达佩斯版第1卷第206页。

54 И．西盖蒂《文学概论》1961年布达佩斯版，《马列主义美学绪论》1966年布达佩斯版。

55 Л．若尔陶伊《现代音乐中人的形象》1969年布达佩斯版，《音乐美学史》1969年布达佩斯版

56 И．乌依法鲁西《现实的音乐形象》1962年布达佩斯版；Я．毛洛蒂《音乐和资产者——音乐和无产者》1969年布达佩斯版；И．维塔尼《音乐心理学》1969年布达佩斯版。

57 И．赫尔曼《七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文化》1981年布达佩斯版。

58 М．阿尔马什《戏剧发展的道路》1969年布达佩斯版，《外观的现象学》1975年布达佩斯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1977年布达佩斯版。

59 И．赫尔曼《康德的目的论》1968年布达佩斯版，《目的论和历史性》1979年布达佩斯版；А．赫勒尔《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古代叙事文学》1966年布达佩斯版，《文艺复兴时代的人》1967年布达佩斯版，《美学史概貌》1976年布达佩斯版；Л．卡洛查伊《笛卡儿的伦理学》1964年布达佩斯版；М．马卡伊《失望意识的世界观》1969年布达佩斯版；Я．凯莱门《本涅狄托·克罗齐》1981年布达佩斯版；Л．切伊特伊《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1980年布达佩斯版；М．费赫尔《让·保尔·萨特》1980年布达佩斯版；З．罗日尼亚伊《哲学的肖像》1970年布达佩斯版；И．山多尔《柏格森的哲学》1968年布达佩斯版；Е．西蒙诺维奇夫人《莱布尼茨》1972年布达佩斯版；З．朔莫蒂《公民的自由》1981年布达佩斯版；И．西盖蒂《德尼·狄德罗》1953年布达

佩斯版。

⑥⓪ 第一次发表在《德国哲学杂志》Ⅰ（柏林，1954年第2期第288—343页）。

⑥① A．阿格《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1974年布达佩斯版第195页，《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形成》1975年布达佩斯版第403页，《〈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观》1976年布达佩斯版。

⑥② Э．法尔卡什《道德和革命性》1979年莫斯科版。

⑥③ Э．罗霞赫季《理论和哲学》1981年布达佩斯版。

⑥④ Д．卢卡奇《列宁》1971年布达佩斯版。

⑥⑤ A．维尔特《作为哲学家的列宁》1971年布达佩斯版。

⑥⑥ A．萨博《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1977年布达佩斯版。

⑥⑦ Л．马特劳伊《文化史》1977年布达佩斯版。

⑥⑧ K．尼利《帝国的精神生活》1980年布达佩斯版。

⑥⑨ И．西盖蒂《匈牙利"精神史"流派批判》1964年布达佩斯版。

⑦⓪ 《二十世纪初的匈牙利哲学思想》1977年布达佩斯版。

⑦① Л．傅卡斯《关于匈牙利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历史》1960年布达佩斯版。

⑦② И．萨博《匈牙利资产阶级的法和国家哲学》1955年布达佩斯版，《匈牙利社会学的第一个工场》1973年布达佩斯版第1、2卷；Ж．A．毛道拉斯夫人《纯粹逻辑学的基本问题》1965年布达佩斯版；З．诺瓦克《星期日的社会》1979年布达佩斯版。

⑦③ Ш．瓦利亚什《哲学著作选》1971年布达佩斯版。

⑦④ 《两次大战之间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1979年布达佩斯版。

⑦⑤ 《人民自由报》1971年6月6日

⑦⑥ И．赫尔曼《捷尔吉·卢卡奇的思想世界》1974年布达佩斯版第404页

⑦⑦ M．马卡伊的这篇文章载于《匈牙利哲学评论》1974年第1期。

⑦⑧ 这一评价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文化政策工作小组为纪念Д．卢卡奇诞辰一百周年拟定的提纲中作出的，参看《社会评论》1983年第8—9期第62页。

Г．安切尔《被震撼意识的神话》1979年莫斯科版。

⑧⓪ M．马卡伊《失望意识的世界观》1969年布达佩斯版。

⑧① Л．埃莱克什《对现代资产阶级科学历史的解释》1975年布达佩斯版。

⑧② Л．法尔卡什《存在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化》1973年布达佩斯版（1977年莫斯科出了俄文版，书名改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伪造》）

⑧③ Б．克佩茨《"新左派"的意识形态》1978年莫斯科版；《新保守主义和新右派》1982年布达佩斯版。

㉞ A，基什《新阶级——幻想还是现实？》1971年布达佩斯版第74页。

㉟《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文化政策工作小组的观点。特别清样》，载于《匈牙利哲学评论》1973年第5页。

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文化政策工作小组的观点。特别清样》，载于《匈牙利哲学评论》1973年第5页。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民主德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发展有深厚的传统作支柱，这些传统渊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渊源于德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В．李卜克内西、А．倍倍尔、К．李卜克内西、Ф．梅林和Р．卢森堡的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

一九一八年德国共产党成立并与列宁的党合作，促进了列宁主义思想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传播和确立。德国共产党在Э．台尔曼、В．皮克和В．乌布里希的领导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分析具体的历史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推翻法西斯主义和在德国建立彻底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

粉碎法西斯主义，以及随后在东德建立工农国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德国发展的崭新阶段奠定了基础。一九四六年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成立了德国统一社会党，这是工人阶级在组织、政治、世界观和哲学理论上的分裂得到克服的标志．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德国共产党的历史性宣言和一九四六年联合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包含了纲领性的结论和任务，这些结论和任务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形成的，并且是在德国现成的条件下对这些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了承认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反法西斯民主党派的联盟（其中包括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自由民主党、德国民主农民党和德国国家民主党）。

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其活动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精神，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并把它变为社会主义德国的意识形态，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及其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所有阶段上的革命政策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是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前提。

民主德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要阶段是由国内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决定的，是由国内劳动者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下已经和正在解决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任务决定的。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纲领性文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哲学理论的种种问题，而且特别注意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同时期的某些理论问题。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德国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民主改革，完成了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为建设社会主义基础创造了物质、政治和精神上的种种条件和前提。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始终不渝地进行反对法西斯的民主改革是迈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一致的。伴随着这时发生的深刻社会变化的是反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国内广大群众处于它们的影响之下）、反对资产阶级哲学和小资产阶级哲学绝对统治的意识形态斗争。党遵循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的革命改造的胜利取决于工人阶级思想意识成熟程度的原理，拟定并实现了对国内整个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的根本改造。德国统一社会党制定并通过了种种文件，提出了关于为德国转向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意识形态前提的途径和手段的最重要的原理。[1]

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政治读物出版社“狄茨出版社”、德国统一社会党理论刊物《统一》（一九四六年开始）和哲学杂志《德国哲

学》（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在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一九四六年在大学里开始设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它们成为科研和教学活动的中心。意识形态工作和理论工作最重要的中心有：以马克思命名的高级党校（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始），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民主德国科学院系统中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历史、国家和法，以及经济科学等各种小组（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后来改为民主德国科学院的各个所）。一九五一年，为所有的专业大学生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必修课。掌握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成了教育青年和培育新人的组成部分。一九五二年第二次党代表会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会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沿着进一步探讨作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任务的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的道路发展。关于从反法西斯的民主改革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的辩证法问题，关于革命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职能问题，关于自觉性与自发性、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哲学家同其他社会学科的代表着手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并概括了新的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成就。这项工作的成果则是以《科学世界观》这一标题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在反对哲学修正主义代表人物（Э．布洛赫等）的斗争中，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同先进哲学遗产之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同社会主义世界观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决议指引学者们深入地把哲学研究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实际任务联系起来。K．哈格强调指出："关于辩证法的整个学说可以而且应当根据我们的直接实践、我们的斗争经验来发展和说明。"[2] 五十年代

末，成长起来了一批专业哲学干部，他们是：Г．克劳斯、К．茨维伊林格、Р．О．格罗普、Э．哥夫曼、Г．列伊、А．库列拉、М．克莱因、Э．阿尔布雷希特、Г．谢列尔，还有青年哲学家А．科辛、В．艾希霍恩、Э．哈安、Г．列德洛夫、М．布尔等人也积极参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随着向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过渡，一九六三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党纲中采取了“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党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提出的任务是：成为“管理和组织生产，以及建立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基础”[3]。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在自觉发挥社会主义全部潜力和完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过程中更加增大了。科技革命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一九六五年民主德国哲学家代表大会则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六十年代提出研究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即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任务是：掌握系统的研究方法。В．乌布利希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应当根据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必要性来提出、着手进行并解决所有的任务。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同其他问题割裂开来看待。我们的出发点始终应当是发展整个社会主义制度。”[1]

七十年代提上日程的哲学问题有：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得胜利后社会主义发展的速度和基本内容，这一时期的种种特殊可能性和界限，新条件下演化过程和革命过程的相互关系，技术、经济、文化的进步同社会进步的相互关系。不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和方法的辩证法、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功能和方法论功能，以及哲学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

学的相互关系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一九七六年 K. 哈格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十分明显，社会主义的辩证法问题应当成为理论工作的中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领域里尤其是这样。”[5]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八一年）在规定八十年代哲学家们的任务时指出:“从理论上令人信服地论证社会主义即当代的现实人道主义，更深入地研究它的规律性和动力、它的优越性和价值”[6]，具有头等的重要性。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全面相互作用、社会主义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日益增长的影响，以及社会同自然的全面相互作用，使哲学家们必须同各种科学的代表人物深入地进行合作，并为增强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的社会效益而提高这种合作的质量。

民主德国的哲学家们在揭露西德垄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蛊惑宣传的反动内容时，揭示了民族和阶级之间的辩证法，并表明了社会主义德国在全国生活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内容和形式方面所发生的原则性变化。研究了社会主义德意志文化和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民族意识的形成、培养劳动者对自己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责任感等问题。

D. 昂纳克确认，“最近几年，民主德国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系列具有高度思想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的著作，我们认为这些著作是对科学管理社会、发展我国人民精神生活和对抗帝国主义的事业的重大贡献。”[7]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哲学家们的科学合作，“从本质上提高了民主德国哲学研究的成果”[8]，并“加快了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9]。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探讨作为认识和建设民主德国发达社会主义的方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进一步培养劳动者

的社会主义意识，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发起进攻——这些任务决定了当前民主德国哲学活动的主要方向。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

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民主德国哲学家对辩证唯物主义领域的研究工作，集中围绕在下述这样一些关键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实质和功能，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系统论方法，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律与范畴之间的统一和内在相互联系，辩证矛盾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论和决定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自然科学和科学发展的哲学问题。学者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任务，从唯物主义辩证法对科学和革命实践的世界观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上分析了它的基本原理、规律和范畴。[1] 无论是五十至六十年代的著作如Г．克劳斯的《基督徒，上帝，物质》（一九五七年）、Р．О．格罗普的《辩证唯物主义概论》（一九六一年）、Г．克洛契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联系民主德国发展中的问题进行阐述》（一九六六年），还是民主德国现在的哲学著作都有这样的特点。

对唯物主义辩证法世界观性质和方法论性质的分析包括三个方面，即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实质、性质和功能，它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的区别，以及它不同于各种具体科学所运用的方法的一些特点。

造成上面那种哲学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五十年代末出现了众所周知的把哲学同控制论、信息论、符号学等局部科学等同起来，并过高估计它们对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起作用的倾向。Г．克劳斯在《控制论和哲学》（一九六一年）、《控制论和社会》（一九六四年）、《符号学和认识论》

（一九六三年）、《合理性——整体化——信息。当代科学发展的规律》（一九七三年）和其他著作中断言，把哲学范畴归为更加一般的、同时也是数学般精确的控制论概念，可以促进哲学精确性的提高和它的概念机制的完善。

直接运用控制论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现象，导致了某些消极的后果：如关于作为历史动力的阶级斗争的实质和作用的学说等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原理，在研究过程中实际上被取消了。在控制论概念中，阶级斗争被解释为“内在的破坏作用”[11]。结果是：对生动而矛盾的社会过程的辩证分析被功能图表所代替，而且从分析范围中消失的恰好是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社会阶级内容。正如 K·哈格所强调指出的：“控制论、系统论、运筹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不相同，也不能在完成这些专门任务中代替它。”[12]克劳斯在《控制论是包罗万象的哲学吗？》（一九七三年）一书中对理解哲学和控制论的互相关系提出了一系列修正的看法，并警告不要沉溺于运用控制论的概念和关系来进行哲学分析。

七十年代，民主德国的哲学家在克服上述倾向时，揭示了作为“当代先进的决定性力量——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哲学表现”[13]的辩证法所具有的世界观性质和方法论性质。在集体写作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一九七六年）、B. 泽格特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方法》（一九七七年）、Г. 黑尔茨的许多论著和其他人的研究中，提出了辩证法是一种方法的定义，概述了它的主要原则和要求，“根据这些原则和要求得出具体条件下的方法准则，并由它们表现出对客观现实性的革命批判态度”[14]。民主德国的哲学家还分析了作为方法的辩证法的相对独立性问题，指出了哲学原则同哲学规律的表述之间的区别。X. 霍尔斯特曼在《对思维的形而上学方式和辩证方式的研

究》（一九七七年）一书中指出，原则既表现了现实的规律性，也表现了对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的客观要求，还表现了客观的阶级利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作为一个整体，是世界观原则和理论原则的综合。

六十年代，主要从逻辑和方法论方面研究辩证法，七十年代则不同于此，形成了综合研究的态度。分析了形而上学方法和辩证方法的社会经济前提和理论认识前提，它们形成的历史，以及形而上学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世界观结论，同时，在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方法论，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历史和社会学这类具体科学中各种形而上学思维现象批判地划清界限的过程中，研究了种种方法的实质和特点。X．霍尔斯特曼在《物理学主义是实证思维方式的一种模式》（一九七三年）中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在理论上和世界观方面是同作为非辩证方法的实证主义相对立的。

为了论证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实质和特点，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同各种具体科学的方法的共同点和差别具有重要的意义。哲学和单个科学的质的特殊性引起了注意。⑮

正如 B．艾希霍恩第一所强调的那样，辩证的方法是“哲学的方法，是认识整个客观世界的方法”⑯。它不同于一些具体科学的方法，它从世界观上指导“在总的情况下和每一个别场合中对唯物主义的坚决贯彻，它是对世界统一体、世界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以及它在认识思维中的反映作出唯物主义阐释的方法”⑰。辩证方法要求从内容上全面考察现实，从发展、变化和相互联系中研究现实，还要分析被认识的对象同人类社会实践的具体历史联系。因此它不可能与控制论、系统论和其他科学的方法相等同。

从哲学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研究了辩证法同系统论方法

的相互关系。在集体写作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还是“系统论社会理论”》（一九七七年）、专著和其他著作，以及许多论文中，证明了系统论的方法对弄清社会过程的具体历史本质是不够的，因为它只限于对现象的分析。系统论思维在辩证法思维中作为它的因素之一被扬弃了。[18] 因此，既不能认为系统论思维对认识是多余的，也不能把它看作与哲学思维等同的东西。B、艾希霍恩第一指出，哲学范畴的普遍性在性质上不同于系统结构论概念的普遍性，它不只限于量的方面（概念的外延），而是以量和质两个方面的统一为前提。哲学中的普遍性，不是“纯粹……形式或结构，而是世界在物质性中的统一”[19]的表现。它是这样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与内容丰富的特殊事物和单个事物不割裂，对它们不冷漠不关心，这种普遍性的东西在特殊事物和单个事物总体运动中有其现成的存在物，并且自身也包含了丰富多彩的特殊事物和单个事物”[20]。如果说系统论的概念是抽象的普遍性概念，那么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概念则是具体的普遍性概念。

系统结构论的概念：系统、因素、结构、功能、介质、行为方式、稳定性等等，在概括的目的方面，与哲学的范畴有原则差别。哲学概括的目的在于：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其他科学的全部知识，为人与其周围世界的关系的种种世界观问题作出回答。黑尔茨和格里泽坚持这一点，并指出，概括目的的不同导致表面相似的概念内容不相同。[21] 例如，“系统”和“结构”这两个概念，哲学和控制论都使用，但其内容却不一样，而且也不能认为它们可以相互代替。不过，在黑尔茨看来，拒绝运用控制论的范畴，以便使各种哲学问题的个别观点更加精确，例如运用它来研究结构、过程同发展之间的联系，结构和过程的规律同发展规律之间的联系，那是一种错误。[22]

集体写作的《哲学和具体科学中的规律概念》（一九六八

年）、《规律、认识、活动。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律概念的报告》（一九七二年）、《规律、发展、信息》（一九七九年）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规律这一概念在世界观、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们对认识现代自然科学所发现的种种规律的意义。从逻辑学分析和语言学分析的角度对规律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按特有的标志和活动的方式分类探讨了规律的类型。学者们特别注意论证被认识和被科学表述的社会、自然界和技术方面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执行的崭新的功能，对社会发展中规律、可能性和偶然性的相互联系，以及社会实践中客观规律和主观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考察。

规律这一概念是由辩证法的全部范畴所决定的，这些范畴是：一般和特殊、可能性和现实性、本质和现象、必然性和偶然性。说明了辩证的决定论不同于机械的决定论，它的联系形式并不只限于必然性、规律性、先定性和预见性。纯粹的和直接的必然性只是一种特殊的偶然。偶然性是规律的表现形式。[23] 黑尔茨区分开特殊的、一般的和普遍的规律，以及结构规律、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他认为，把系统结构论的概念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促进对成对的概念：结构——过程、历史——系统、规律——现实等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这种作法符合辩证法的本质，因为"在这些相互排斥的概念中再现了符合辩证矛盾原则的联系和关系"[24]。对规律和规律实现的条件（专门的和非专门的）、规律和事件，以及规律和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进行了讨论。现在提上日程的问题是："规律中所包含的辩证矛盾、规律性的辩证矛盾，以及对一般和特殊的、相互共存和相互矛盾的、基本和派生的、主要和从属的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25]

民主德国的哲学家还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深入认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在这些规律之

间存在的种种关系。

关于辩证的决定论和发展论的关系的讨论被提到了首位。[26]黑尔茨把决定论看成是一种"为理解发展论创造理论前提"的哲学理论，他建议把发展论和关于决定论的学说作为解释现实生活中不同种类的相互关系的两种哲学理论明确地区分开来。发展论的对象是客观的发展（这是在旧质范围内由种种质变和量变所准备的从起始质到最高质的过渡），同时发展的源泉是辩证的矛盾，而它的方向则决定于辩证的否定之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所分析的不是发展的规律，而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规律和原因之间的辩证法。同时，黑尔茨强调必须把发展论和关于决定论的学说加以综合。他认为，在与决定论观点的统一中使发展论进一步精确化的最有前途的方向之一，就是把现代必要过程热力学（耗散结构论）的成果总括起来，因为这一理论使物质的自我组织在物理上成为可能，并消除了热力学与生物进化论之间传统上固定的矛盾。

然而Г. 施梯勒却认为把发展论和决定论划分开是不合理的。他写道："发展本身是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相互联系形式，而任何一种相互联系都是处于运动和（潜在的）发展的状态，即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参加到运动和发展之中。"[27]辩证法不分解成单个部分。任务应当是，把决定论当作运动和发展的联系理论来探讨，而不是把它当作独立于发展论之外的学科来研究。在施梯勒看来，在决定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起中心作用的是辩证矛盾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而不是从研究最简单的现实联系中得出的规律概念和因果概念。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对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等这种规律性联系形式进行研究的合理性。"物理学中决定论领域的研究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起相当推动的作用，而且问题不可能是对这一点有什么反对意见，而只是在于预先警告

不要把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抽象地和一般地移植到例如社会中去。”[28] Г．施梯勒也否定目的这一概念对唯物主义地解释发展过程的适用性。X．霍尔斯特曼持相似的立场，认为“哲学决定论研究的对象并不是现实的某些断面，而是现实的所有领域中种种客观联系的一般规律性和形式”[29]，它们确定了结构与过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也就是种种客观矛盾的不可分割的统一。

A．科辛、Д．维梯希、K．哥斯勒、K．瓦格纳、Г．奥比契和Г．X．劳在自己的著作中，根据他们在多年讨论“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当中所制定的全部原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对认识问题的立场表现为这一原则：成为国际工人阶级在实现其历史使命中的理论工具 维梯希、哥斯勒和瓦格纳在重要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中写道：这一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是通过“对规定了人类认识本性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的那些规律性所进行的研究”来达到的，“也就是说，它研究这一反映过程的种种自然的、实物的和社会实践的原因和条件、借助个人、社会群体和集团的认识活动实现这一过程的途径以及这一过程的社会意义和历史发展”。[30]认识论的实践方向首先应当表现为考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认识和认识过程的规律性。[31]

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分析认识论问题的观点的统一、以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运用，构成了民主德国系统研究认识论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原则

论证社会主义制度下认识过程的新质，促进了把唯物主义地认识实践及其对认识过程的意义这项工作加以具体化。某些学者把实践这一概念主要同认识论问题联系起来，反对缩小实践的范围和把它归结为生产活动，从而不恰当地扩大了“实践”这一概念

的内涵，把理论活动也作为实践的形式之一包括到实践之中。[32]这种解释使实践这一概念丧失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33]

"实践"这一概念往往被解释得太广泛。有一种说法：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范畴[34]。其结果是把主体看作哲学和认识的出发点，否定了认识过程的自然前提。另一方面，Г. 施梯勒在《辩证法和实践》（一九六八年）中建议只针对认识过程的问题来研究"实践"和"理论"这两个概念。而 К. 哥斯勒和 М. 托姆则建议用实践这个范畴来表示按照自己的目的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人们所进行的有目的的和有意识的物质对象的社会活动。[35]

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对认识过程的影响问题得到了极大的关注，研究了象生产方式同认识方式的相互关系这样的问题，突出了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特有的认识过程的有效因素的问题，对作为认识主体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作用和认识可能性进行了比较。П. 波利哈根、Э. 哈安等人分析了意识形态对认识的作用。还从认识活动的结构这一角度对认识活动进行了研究，对比分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认识活动的类型和科学工作的性质。[36]在 Г.-Х. 劳的一些著作中讨论了社会科学认识的特点。论证了认识过程中认识同价值关系的统一，论据确凿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方法论。

论证了阶级利益同客观真理的联系，尖锐地批判了把意识形态同科学对立起来的种种资产阶级观念。К. 哥斯勒、Д. 维梯希和 К. 瓦格纳强调指出它们的统一，表明了认识活动同社会改造的实践目的的联系。他们写道："形成哲学概念'真理'的目的，在于把对知识的实践意义说来是最主要的特征固定下来。"[37]真理被确定为"符合客观现实事态的论断或符合以客观现实为依据的事态的论断"[38]。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真理这一概念所特有

的特征和世界观内涵的问题，研究了真理的客观性质，以及关于把“真理”这一概念运用于价值判断和艺术创作的问题。[39]

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也得到极大的关注。学者们指出了认识的辩证发展的原因，揭示了实践作为认识过程的动力的作用，表述了人类认识活动的辩证规律性。社会实践同认识的矛盾被看作是认识发展的主要动力。

哲学家们对日常意识的关心是有根据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之一就在于使日常意识符合科学认识。学者们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使科技革命时代的日常意识符合科学意识的过程得以发生的客观条件和形式，揭示了日常思维作为直接实践思维的特征，研究了日常思维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知识和信念的统一问题，是认识论方面所分析的问题之一。在 Б．奥孔的《信念》一书中分析了信念的认识论，知识同信念的相互作用，以及信念形成过程的规律性、因素和条件。[40]

研究语言同思维在认识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语言在认识中的积极作用、语言作为反映现实的特殊手段以及作为知识和经验的积蓄器的功能，对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那种想以某一局部科学——生物学、神经生理学、控制论、符号学、语言学等等——的方法来代替从哲学世界观方面对语言进行分析的企图，遭到了批判。民主德国的学者们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念展开争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的社会性质的原理赋予了特殊的意义。[41] Э．阿尔布雷希特在《语言决定我们的世界图象吗？对现代资产阶级语言哲学的批判》（一九七二年）中指出，关于独立存在着“各种语言的世界图象”的观念，是由于过分夸大了语言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并忘却了语言的社会属性。阿尔布雷希特写道，哲学对语言现象的理解不能被局部科学的理解所代替，并特别指出，“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是一

种社会过程．而从信息心理学的观点看来，它只能被当作个人的过程来加以研究。”[12] 也必须这样看待从控制论立场对语言分析的界限．阿尔布雷希特说明，虽然控制论的方法揭示了现实的本质方面的辩证方面，但“社会过程和语言过程却不能归结为是控制论的。”[13]

民主德国的学者们从认识和交际这两个主要方面对语言进行研究。哲学家们反对现代资产阶级语言哲学中许多派别所特有的否定语言的认识功能并把语言的功能归结为纯粹的交际和调节的作法。他们详细地研究了语法、逻辑同认识论的联系，语言符号的认识功能，语言符号、意义同被反映客体的相互关系，以及语言同概念的联系。

Э．阿尔布雷希特的《语言和哲学》（一九七五年）一书发展了他在《语言和认识。语言的逻辑分析》（一九六七年）中所谈到的思想，探讨了语言同抽象化相互联系的问题，研究了语言在科学抽象概念的形成过程中作为思维客体化手段的功能，分析了语言对现实的反映在抽象化不同阶段上的特征。对语言问题进行哲学史的分析同对知识定形化和许多思维行动自动化的现时代所产生的新问题的分析，以及同对各种资产阶级语言观念的详细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由 В．施密特、И．赫普纳、В．基尔希格斯纳尔和其他一些学者所组成的研究小组研究了语言的交际作用。《语言和意识形态。对语言作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的报告》（一九七四年）一书的作者们揭示了语言交际的实质，研究了它的基本特征、因素和条件，分析了逻辑交往和心理交往方面语言作用的现象。研究了语言在认识过程中的情感功能。[14]

对现代自然科学的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积极进行了研究。大多数有关著作所贯彻的主要原则是：以唯物主义感觉论为

出发点，强调自然科学认识中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之间相互联系和统一的辩证法。同时，正如Г．黑尔茨指出的，“对于哲学家来说，重要的是找出表明认识过程中的这种辩证统一的联系环节。”[15]在讨论自然科学认识过程中的实验、模型和理论的相互关系问题时，发展了这方面的问题。研究了列宁的真理论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的意义，还研究了提出科学假说和自然科学数学化的过程，功能、结构和模型等概念的认识论作用。

科学分化和整体化的强化过程，各种不同学科交界处的一系列综合性问题的出现，各种传统科学学科和领域之间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被冲破，促进了对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如果说民主德国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联系过去多半是从它们作为一般和特殊的相互关系这个角度来进行研究，那么现在重心则转到了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转到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发展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哲学和哲学范畴在形成自然科学假说中的作用，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完善哲学的阐述和提出哲学的假说所具有的意义的研究上了。

确立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些具体的自然科学理论不可能是唯心主义的或形而上学的，虽然也可能得到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解释。У．廖泽贝格在许多著作中批评了那种想把古典力学定为形而上学的企图，详细阐明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同那种导致古典力学的思维毫无共同之处”[16]。形而上学思维是古典力学方法在哲学上的绝对化。

学者们在继续并深入研究象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类当代主要的和相当完善的物理学理论（它们从本质上改造了整个科学思维并使其革命化）的同时，比过去更多地分析在高能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和相对宇宙论一类已经出现而未完成的物理学知识领域中所进行的科学探索的哲学问题。古典力学、统计物理学、热力学、

固体物理学等科学的哲学问题，都从新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在这一基础上将进一步发展下面这些一般的哲学问题：直观性，物理现实性，仪器在认识物理现象中的作用，因果性和决定论，物力规律和统计规律的相互关系，空间、时间同物质、物质结构和物质可分性的相互联系，微型客体水平上的系统、因素和结构等概念的相互关系，以物理知识发展主要倾向为依据的物质无限性的各种表现形式，物理学理论中辩证法表现的特点，以及对物理学成果的现代唯心主义解释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分析等等。

许多著作对二十世纪德国著名物理学家 B. 黑森贝格、A. 爱因斯坦、M. 普朗克、M. 波尔恩、П. 约尔丹、K. Φ. 维茨塞克尔等人的哲学观点进行了分析。Φ. 菲德勒、Γ. 克里马谢夫斯基和 Γ. 左德尔指出："在这些著作中制定了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著名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的活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不仅结束了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多年来的公式化倾向，而且明显地为民主德国哲学家同自然科学家的战斗联盟赋予了积极的形式。"㊼可以列入这类原则的有下述原则：不是分析某一位学者的哲学论断，而是分析他在有关科学领域中的活动的现实哲学意义。

关于生物哲学问题的一些著作，涉及到生物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以及它的一些单个学科：分子生物学、人的遗传学、分类学、进化论、神经生理学、个体生态学等等。㊾ 中心问题是关于生物过程的客观辩证法、生物演化的一般规律性和生物学认识的独有特征等问题，以及对生物学新成就的唯心主义解释和反辩证法解释进行批判。由于所谓的遗传工程学的急剧发展，对学者们科学研究的道德内容以及他们为取得的科学成果及其应用所负的责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五十年代末民主德国在控制论的哲学问题上取得重大发展（Γ.

克劳斯等人），七十年代，主要加强了对哲学和控制论相互关系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揭示了由于控制论的发展而产生的特殊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如信息、符号和形象的相互关系，信息论和反映论的联系，发展控制论的标准等等。[49]

扩大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范围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现代化学、医药学、生态学、航天学、晶体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各种地质科学、农业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成就都被列入哲学分析的范围。批判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解释，仍然是专门从事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学者们的一个重要工作部分。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迫切问题

民主德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决定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向和内容。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Э.昂纳克说："我们为社会科学的专家们规定的目标，首先是研究从民主德国整个社会发展中、从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中、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联盟的加强中，以及从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过程里的作用和责任中产生出的综合性的而又往往是复杂的种种问题，这是必须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给予科学回答的一些问题。"[50]

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为哲学家们提供了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概括的丰富多彩的事实资料。而对社会生活的新过程和新现象的理论思考又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其概念和范畴体系中反映出现时代种种复杂社会过程的辩证法，同时又是科学分析社会现实及其发展前景的方法论基础，是"自觉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完善化过程的理论前提"。[51]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化的条件下，历史唯物主义的

进一步发展是同敌视社会主义的种种社会发展观点作斗争的理论武器。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52]、作为工人阶级世界观及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对它的分析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活动的理论和方法，它的特殊意义被着重指出了。[53] 哲学研究工作的中心是探讨社会主义及其建设、发展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辩证法。民主德国哲学家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九年）专门讨论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的历史过程的辩证法”。民主德国的哲学家们就这个题目的各种理论观点和世界观观点进行了分析，给自己提出了一项任务：“要使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通过反映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相互联系和过程而丰富它们的内容”[54]。对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基础同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同社会主义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对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技术、科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及社会主义个人的进一步形成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建立的整个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研究工作中的一些特点是：第一，哲学家们想在动态中考察社会，把它作为一个不断进行革命改造的过程从理论上进行认识；第二，相当关注关于形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和新人的哲学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原则的方法论作用提高了：首先从发展的起源、动力、规律性和倾向、形成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提等角度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分析。这一点证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哲学知识更加深刻和准确了，在科学分析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了六十年代形成的一系列理论观念，六十年代曾坚持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社会

经济形态的命题，有些夸大系统结构分析对发展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解决民主德国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的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和信念的加强，促使哲学家们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成的规律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同个人意识的相互作用、社会主义个人形成过程中客观条件同教育工作的辩证法等的角度，去深入分析社会意识。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中的哲学方法论问题 即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历史过程的辩证规律性的特殊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主客观的辩证法和社会物质生活同精神生活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的哲学方法论问题，在民主德国被提到哲学研究工作的首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在探讨“辩证法和社会主义”这一题目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这一题目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观点研究得更确切了。民主德国的学者们根据列宁的原理：辩证法这个词的本来含义就是研究对象本质中的矛盾，把从哲学上分析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看作是认识和解释社会现实这一“辩证矛盾体系”[55]。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的目的是：揭示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第一阶段的内在逻辑并以理论上严谨的形式加以再现。集体写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指出，“包罗万象的辩证矛盾的哲学理论，对认识和实际改变社会关系、对掌握历史发展过程，具有非常的意义。在社会中，在毫无例外的所有的社会形态中，一切变化、一切动态、一切从量到质的转变，其基础就是辩证矛盾的作用……。关于辩证矛盾的学说，使我们能够解决有关社会发展动力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56]任务在于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发展”、“自我运动”，认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动态、它的前景和它作为内部矛盾发展的趋向。[57]

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问题达到现在的认识之前，曾经

对下述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是本质的和必然的，还是它们带有偶然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对矛盾的任务应当是什么？应当争取尽快地解决它们吗？可能有完全非矛盾的社会发展吗？对抗性矛盾是社会主义固有的吗？

К．哈格、В．艾希霍恩第一、Г．赫伊顿、П．波尔哈根和Г．施梯勒等人的著作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问题。这些著作促进了对系统结构论方法的缺点的克服，这种方法把社会体系的稳定性、它的最佳对比关系提到首位，而把种种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视为破坏体系平衡和带有瓦解内核的因素。

讨论的结果确立了这样一种意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说成是'部分的'，'派生的'，'从属的'，似乎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质没有关系，这种解释同承认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的普遍性不一致。"[58]无论简单地确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过程中的种种对立的趋向、力量和方面，还是要求立即消除被发现的矛盾，都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问题作出完整的解释。

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它们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的区别，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矛盾的区别。对矛盾具体性质的阐发，促使党制定了关于某些社会现象的政策和自觉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

论证了下述原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消除不仅消除了作为社会矛盾运动形式的对抗性，而且创立了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对抗性矛盾残余的可能性。[59] 揭露了这样一种错误：企图把对抗解释为普遍性的，而不认为它是普遍而无所不包的辩证发展规律的一种历史上一定的和有限的表现。这种倾向曾出现在某些著作中，例如Ю．库钦斯基的著作。[60] 于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相互关系的问题作为理论上失误的问题而取消了。[61] 下述看法得到了承认：在"对抗性"矛盾和"非

对抗性”矛盾这两个概念中，只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社会辩证矛盾发展差别所具有的最一般阶级特征。这一特征对规定社会制度的本质无疑是重要的。但它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矛盾却是不适用的。

在进一步讨论、研究和更准确地说明这个题目的一般理论观点和方法论观点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可以谈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吗?区别促进社会发展的矛盾同阻碍社会发展的矛盾的标准是什么?关于矛盾的学说的方法论作用是什么?这一学说在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方面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这一问题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哲学家承认这种矛盾的存在，并给它下了定义，认为它是社会经济基础在受历史限制的向前发展同社会主义社会为个人全面发展这一历史进步目的所创造的条件之间的矛盾（B. 艾希霍恩第一）；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同组织和领导的旧形式和旧方法之间的矛盾，也是日益发展的劳动者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同满足这些需要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B. 艾希霍恩第一、A. 科辛）；是科技进步的迅猛发展同历史行动主体科学地和有组织地掌握科技革命的速度不够之间的矛盾（K. 布劳恩雷特等人）。另外一些哲学家（Г. 施梯勒等人）则同意苏联哲学家Г. E. 格列则尔曼的意见，对划分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合理性表示怀疑。

观点不同的代表人物有一点看法是共同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辩证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的特殊表现。有人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发展可能完全充分地反映在理论中，主要的办法是把它作为一种矛盾系统再现出来（X. 霍尔斯特曼、A. 朗格、Г. 黑尔茨）。在Г. 巴尔齐和Г. 克里马谢夫斯基的著作《唯物主义辩证法——它的主要规律和范畴》中，“动力”

这个概念一般是同“辩证矛盾”这一概念等同的。[62]

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全部方法论财富归结为辩证矛盾学说的倾向，受到论据充足的批评（В. 艾希霍恩第一、Г. 施梯勒）。人们被提醒必须遵守象观察的客观性和分析的全面性这样的辩证法原则。[63] Г. 施梯勒在《矛盾的辩证法和社会的分析》一书中试图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矛盾同发展动力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主动力，这是工人阶级以及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为首的社会其他阶层结成的联盟所进行的有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内容是，为满足劳动人民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而运用和自觉实现社会的客观规律。因此他认为，把社会主义的动力只视作辩证的矛盾，是不可容忍的简单化。他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推动力整体中，矛盾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因素，而不是单个的实体。”[64]

民主德国哲学家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七四年）对围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问题进行的讨论作了总结，把这些矛盾看作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联系，它们决定性地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而且既是社会进步的客观动力也是社会进步的主观动力”。[65] 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是在所有的劳动者阶级和阶层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不具有对抗性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基础将根据社会的利益和可能为有计划和有意识地解决这些矛盾创造条件。

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同人们的自觉行动之间的辩证矛盾关系，研究了当代历史过程形成的主客观因素的辩证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客观规律性同人们自觉行动的相互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对决定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规律特征持有不同意见者进行广泛讨论的对象。例如Г. 施里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历史过程的特征在于，“历史的自然运动失掉了自

己的自然属性，而日益服从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首的工人阶级所指导的社会。”[66] 其他人（Э. 拉索夫）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带有这种性质，只是由于人们自觉地运用了它们。如果社会“不掌握”这些规律，那么，“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就不起作用，并且有条件使那些阻止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的规律性发生作用”[67]。У. 霍耶尔却建议把社会主义的规律分成不以人们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一种规律和自觉地产生的另一种规律。[68]

民主德国哲学家第四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社会规律是社会活动中普遍的、重大的和必要的联系，它们不存在于人类活动之外，它们产生于这一活动过程之中，并决定于这一过程。[69] 历史过程的主观因素——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他的才能，他的认识能力，他的组织性和意识，在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比在先前的一些社会经济形态中，起着更大的作用。因而它们的意义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正在不断增大。[70]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最终决定着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完整的进程。因此，研究作为社会自我运动根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所特有的种种复杂的相互联系，分析它们的内在矛盾，在民主德国的哲学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完善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的能动功能得到一致的承认。同时也指出，“这种能动性既可能是推动社会发展，也可能是阻止社会发展，还可能是矛盾的——既推动又阻止社会的发展。然而它始终在起作用。不存在对生产力保持中立态度的生产关系”。[71]

В. 艾希霍恩第一、Г. 施梯勒、Г. 科赫和其他学者的著作，专门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并使它具体化，分析生产方式的内部辩证法，探讨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和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В. 艾希霍恩第一批判了六十年代在民主德国广为传播的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的一种认识，即把生产力看成是生产方式的革命因素，而把生产关系看成是生产方式的保守因素。艾希霍恩第一强调说，生产关系不仅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且它本身还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能动性揭示出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机制，即其更替规律的内部辩证法。生产关系"在相应发展程度的生产力所创设的可能性范围内，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动因和动机、方向、规模和速度"。[72]

对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范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基础的概念是涉及生产关系呢？还是包括整个生产方式？А. 鲍威尔、Х. 格吕格尔、В. 艾希霍恩第一、Г. 科赫、Х. 察克、Г. 施托伊斯洛夫论证说,基础这一概念"不包括生产力"[73]，因为：第一，精神生活过程并不直接从生产力中发展出来，它的基础是生产关系，尽管后者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第二，把生产力包括到基础这一概念中可能会导致非科学的结论，即生产力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直接依赖性。

但是，Г. 亚历山大和 Г. 施梯勒认为，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割开是不合理的，他们建议把基础这一概念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74] 狭义的基础概念只应当包括生产关系，广义的基础概念则包括整个生产方式。他们认为，当从社会形态的性质去看社会时，就使用第一种概念，当从社会形态的发展去看社会时则用第二种概念。

Г. 斯托伊什洛夫却认为，无论把生产力完全排除于基础概念之外还是把整个生产方式包括在基础概念之中，都是不合理的。他指出，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是为表现从唯物主义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对社会生活进行分析的原则服务的。基

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不是关于对象的概念，而是关于“包含在各种现实关系之中的普遍联系”[75] 的概念。基础——这是社会生活某一具体现象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上层建筑——这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东西。

有些哲学家发表意见说，由政治、家庭和法等等这一类社会制度所固定下来的意识形态关系应当被看成是基础的因素，因为它们是通过对象间接地表现出来的。《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一书的作者们反驳他们说：对象性不仅不否定社会制度的第二性，正是它使它们在社会发展中具有能动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工人阶级实现历史使命的必要条件。

社会精神生活的辩证法成为民主德国哲学家们特别关注的对象，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的作用日益增强的结果。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自觉性表现在对待劳动和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态度上，表现在对自己为社会进步、为国际的发展进程所负责任的理解上，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社会发展的本质上崭新的观念的动力”[76] 。在自觉地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种种规律，从而它的动力和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得到多大程度的充分表现，以及它们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中起什么样的作用”[77] 。

在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内研究社会意识的场地扩大了，研究的理论水平提高了，概念工具正在完善。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而召开的民主德国哲学家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七〇年）在这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代表大会的主题是发展和掌握社会主义的意识。

关于社会精神生活的内在依赖性、规律性、条件和动力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精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文化和科学的内

容和功能，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的辩证法，价值观念的内容和属性等等，以及形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个人的种种实际问题，都得到了全面的分析。根据研究社会意识的方法论原则（“认识论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有机统一”[78]），揭示出了对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认识的实质（社会意识在哲学基本问题的范围内表现为“反映社会存在的种种观念现象的总和”[79]）；系统地阐明了这种决定的各个方面和角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同社会意识的辩证法学说的世界观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从意识的对象、意识的客观属性的角度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进行的分析，是同从意识的主体的角度对这种关系的分析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从社会意识的反映性质和社会属性，“意义、地位、功能和进程”[80] 对社会意识进行了研究。研究了象理想、思想、意识形态、准绳、价值、目的等等这一类社会意识因素的辩证法，这些因素既是社会存在反映的结果，同时又是观念对现实社会变化的预见。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意识的工作受到极大的重视，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的特征既是一般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又是只有它的形成和发展所固有的规律性。强调指出了展示出社会意识特殊方面的“社会精神生活”这一概念的重要性。

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意识各个因素相互关系的辩证法，而且首先是研究价值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精神上掌握现实所必须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81]），具有理论的和实际的意义。K．哈格在社会学家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明了人的价值观念是“劳动者积极对待自己社会责任的表现”。[82] 探讨劳动人民价值目标的理论基础，研究产生这种目标的规律性和价值观念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的依赖性，分析对社会主义现实价值的认识的机制、认识过程和评价过程的相互关系，在伦理学

和科学共产主义领域的哲学家和专家们的研究工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哲学家们分析价值观念——从思想实际上和理论上掌握社会现实的特殊方式，揭示了价值观念形成的复杂机制，以及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科学、意识形态、道德、社会意识等的相互作用。正确的价值目标决定于对阶级利益和阶级需要的客观而科学的认识，决定于对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的知识。

哲学家们指出了真正的价值同虚幻的价值在内容、构成方式和社会功能方面的原则区别，揭示出工人阶级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民价值观念形成中的作用。他们把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哲学理论的令人信服的批判同创造性地探讨有关价值理论的种种迫切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存在两个国家——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条件下，极其紧迫的问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的认识问题。民主德国的哲学家们驳斥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存在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的错误论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A.科辛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历史上和现时代的民族。就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族理论所进行的研究》（一九七八年莫斯科版）一书中，全面地分析了民族同社会生产力、社会关系、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国家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揭示了社会发展中民族同国际的相互关系，民族的实质、它的历史发展和历史作用，以及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和历史地位。民主德国出版的《哲学辞典》给民族下了一个全面的定义。[83] 科辛指出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同资本主义德意志民族之间的原则区别，这种区别在于两个民族有原则上各不相同的基础、内容和发展趋势；论证了资本主义民族在世界范围内向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的必然性。

研究社会物质生活同精神生活的辩证法，为进一步研究人们整个社会劳动活动的思想理论方面同物质实践方面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和前景，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属于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有民主德国的哲学家对社会预测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原理和原则所进行的探讨工作，这是社会预测学领域中综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哲学史的问题。对资产阶级哲学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一年）后，由于“社会科学领域中央研究计划”的推动，进一步加强了**对哲学史的研究**。这一领域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有三个主要方向：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历史，分析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研究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史根源。继续进行了在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对掌握过去进步哲学遗产（更广地说，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遗产）的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强调了掌握进步哲学遗产对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与资产阶级哲学进行斗争的意义。“进步哲学遗产和社会主义意识”讨论会曾指出，哲学史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是一所理论思维的学校，它“无论对进一步发展系统的哲学，还是对从思想上与资产阶级哲学划清界线，都具有相当独立的价值”[84]。在接着召开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论传统、文化遗产和掌握遗产”的讨论会（一九七三年）上，讨论了进步哲学遗产的矛盾性问题，并与此相连地讨论了掌握过程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

P. O. 格罗普对研讨哲学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论哲学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一九五九年）

一书中，他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方法论的主要原则。格罗普指出，与作为纯粹思想延续的黑格尔哲学史思想体系相反，哲学思想史及其现实具体性和内在财富，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基础上，只有从通过相应方式决定着阶级利益的社会物质条件出发，才能得到认识。他论证了必须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当作哲学史发展的基本对立，呼吁"起来反对妄想缓和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并取消其社会物质基础的任何非科学的企图"[85]。正如格罗普强调的，"无论是把肯定方面还是把否定方面"强加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上面，都会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一来，似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同等地"促进了哲学的总的发展。唯物主义的发展构成哲学史的主导线，这是由它同各种自然科学和进步社会势力的联系所决定的。[86]

O．芬格尔发展了P．O．格罗普的这些论述，并强调指出，唯物主义第一同社会进步、第二同进步的自然科学知识有着最紧密的联系；第三，它具有认识的乐观主义，维护人类思维反映客观现实的原则；最后，第四，它导致了"在形成现实人道主义的世界图景中的最合理的成就"[87]。

民主德国的哲学家把揭示唯物主义哲学中的重大进步意识形态特点看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的主要任务之一。为完成这一任务，Г．列伊写了《启蒙和无神论的历史》，对斯宾诺莎的哲学开展了研究，对十八世纪不彻底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哲学唯物主义所特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行了分析（参看X．霍尔斯特曼的《形而上学的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概论》，（一九七七年版），对资产阶级哲学史避而不谈的德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哲学遗产作了探讨（M．克努岑·Г·瓦格纳、Ф．B．施托什、T·路德维希）。

为出版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进行了大量工作。已经出

版了 A. 艾因齐德尔的《思想》，Л. 费尔巴哈的全集、И. 狄慈根的三卷本著作。开始出版德国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杰出代表格奥尔格·福斯特的第一部全集[88]。发表了 Г. 施塔伊纳、M. 赫克尔、K. 特列格尔、X. 普拉维乌斯、X. 菲德勒等人论述福斯特理论遗产的著作。

民主德国的哲学家们认为，象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所做那样把德国古典哲学归结为唯心主义的一条线：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纠正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解，把费尔巴哈加进去了。现在被列进德国古典哲学之中的还有：Г. Э. 莱辛、И. Г. 赫德尔、Г. 福尔斯特、Г. K. 利希滕贝格、B. 歌德、Ф. 席勒和青年黑尔格派。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才能最全面地阐明德国一七五〇年至一八五〇年哲学思想的全部成就。在这方面，M. 布尔和 Г. 伊尔里茨的著作《理性的追求。德国古典资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一九六八年）很有意义，作者在书中除了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还探讨了莱辛、赫德尔、歌德、席勒的世界观和哲学美学。该书的第二部分打算研究黑格尔、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过程。

为了揭示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上的真正作用，研究它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民主德国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五年发表了近三百种论康德的著作。出版了许多关于费希特哲学的论著。对分析“有多种面貌的”谢林哲学的也极为注意。

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分析占有相当的地位。Г. 施梯勒的《黑尔格“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法》（一九六四年）、《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论述和批判》（一九七〇年），集体写作的《论当代对黑格尔的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黑格尔的贡献》（一九七二年）已试图阐明黑格尔在辩证唯物主义以前的历史中

的真正作用，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思维作为唯心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思维在原则上未能跨越的那些界限。这些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同修正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解释之间的对立，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妄想通过抹杀黑格尔思维同马克思思维的原则区别而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软化”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大大开展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许多著作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参看 ·科尔纽、I. 门德、X. 乌里利希、B. 舒芬豪威尔的著作）。三卷本的《关于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是对巨大研究工作的总结。第1卷（分两册）由M. 克莱因、Э. 朗格和Φ. 李希特撰写（有K－X. 赫耶尔、M. 赫费尔、Э. 米特等人参加），于一九六九年问世；第三卷由B. 伏龙娜、Φ. 李希特主编，于一九七九年出版；第二卷正在编写中。这部著作第一次对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时到六十年代初的历史作了系统的阐述。这部著作的作者们进行研究的主要理论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工人阶级政治统一”[89] 的原则，研究的对象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发展和运用的规律性，以及它同无产阶级和革命工人政党的阶级斗争、同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进步的不断发展的内在联系”[90]。作者们在研究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时揭示出并强调了它同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的密切联系。[91]

对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真实历史，同在现代“马克思学家”中普遍流传的那些什么马克思主义似乎只属于十九世纪、现在“已经过时”、什么青年马克思同成熟马克思相对立、马克思同恩格斯相对立、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变种”、在马克思主义中培育“多元论”是合理的，等等议论，没有任何共同之

处。

民主德国哲学家们在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遗产方面的工作，由于纪念《自然辩证法》出版五十周年（一九七五年）和《反杜林论》出版一百周年（一九七八年）等国际性会议的召开而得到极大的促进。七十年代中期值得提到的是，出版了百卷本国际性科学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头两卷。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还要发表第三者给他们的书信，以及第三者之间有关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书信。

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政治思想作用在民主德国社会生活中的增长，“在不断增多的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哲学的出版物和科学措施的内容广度和理论深度中”[92]，得到了反映。

民主德国出版M·布尔等人编辑的国际性丛书《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出版一百多种）是这方面的成绩之一。丛书的特点是：“理论水平高，批判对象具有现实意义，深刻的科学内容同充分的论证紧密结合，适用于日常的思想工作，从原则性党性出发对阶级敌人的思想进行批判。”[93]

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以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套丛书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种种观点，批判了从自然科学新发现中得出的反动思想结论，批判了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以及社会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

民主德国的哲学家们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形式：结构主义、对人的个体生态学观点、“科学哲学”、语言学哲学。还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指明了自由资产阶级同保守主义的、隐蔽反共同公开反共的意识形态观点在阶级原则性上是“一致”的。民主德国的哲学家们指出，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中，一致（即阶级观点）同矛盾的相互关系有如内部同外部、客观内容同主观表现的关系一样。[94] Э．哈安举出了存在多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客观现实的冲突；阶级对抗社会中社会现实的矛盾性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矛盾性质；资产阶级必须在各个方面进行意识形态的活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品和意识形态发展本身，在一定范围内取决于竞争，同时也依赖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特点。

实证主义哲学受到严肃的批判。М．布尔（《关于对实证主义进行列宁主义批判的迫切性问题》，一九七二年）、Х．霍尔斯特曼（《"物理主义"是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特殊模式》，一九七三年）、Г．李希特、Д．佩里克等人认为实证主义不仅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流派之一，而且从广义上讲，它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衰败时期的一定思维方式。正如布尔指出的，实证主义思维方式是"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因为它"无批判地反映出并从意识形态上促进"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95]。

实证主义者把拒绝讨论哲学基本问题和追求"科学性"，把反对"形而上学"和它的"虚假问题"描绘成是对思辩的攻击和对科学的维护。民主德国的哲学家们令人信服地揭露出，实证主义由于自己的哲学理论前提，恰恰相反地是敌视科学的。

对资产阶级的科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既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单门科学理论的特殊特点，也指出了它们共同的阶级实质。资产阶级的种种科学观点明显地表现出"矛盾性和局限性"，因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排斥对社会现象的科学理解"[96]。

民主德国哲学家们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兴趣提高了。Д．别尔格纳和Р．莫采克在《资产阶级社会理论。论各种资产阶级社会观点的世界观基础和意识形态功能》（一九七六年）一书

中提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理论思想的示意图：它的最高层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最低层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中间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每一个层次依据它同资产阶级现实实际的远近距离和资产阶级的具体阶级利益而执行着自己认识论的（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功能。民主德国的哲学家们研究了实证主义同主观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实证主义支持非理性主义并促进它的发展。

最近，存在主义的影响在资产阶级国家的知识分子中间已有某些减弱，但与政治关系领域有关的许多存在主义思想仍继续保持着它的意识形态作用。因此，在民主德国，无论在研究存在主义哲学本身的哲学同政治的相互作用方面，还是在研究它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关系方面，都对存在主义进行了批判。Г、М．海尔拉赫在《存在主义哲学和政治。同К．雅斯佩尔斯批判地划清界限》（一九七四年）一书中，批判了К．雅斯佩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指出了他的导致同反共意识形态相结合的矛盾性（例如在雅斯贝尔斯的“政治极权主义”模式中）。

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在民主德国是通过在意识形态上同技术治国论、结构主义和社会学主义关于人的观念划清界限来进行的，这种观念是与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主观主义相一致的。这种观念中反映出了垄断资产阶级想借助自然科学、技术和系统论，通过运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希望。

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生物学主义，这是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有影响的流派之一。由于发表了М．斯滕别克和В．谢列尔的文章《论遗传和社会遗产对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影响》（一九七三年）、Г．列伊的著作《论一位学者的种种难处。生物学家热克·莫诺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而在自然科学中不得不服从于哲学》（一九七三年）和А．维尔涅克的著作《生物学

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一九七六年），展开了关于生物和社会的辩证法的问题讨论。

民主德国的哲学家们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把同帝国主义的反共政治和反共意识形态的斗争、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看作是进一步巩固世界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起决定作用的任务之一。哲学家们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专门著作，反驳实证主义、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学说，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左倾激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P. 鲍威尔曼、K. 格耶尔、Э. 尤里埃在《"马克思学"的贫困：对伪造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一书中强调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理论遗产的歪曲，集中在"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和团结具有特殊意义"[97]的那些问题上。"马克思学"著作首先对那些同资本主义有对立情绪的社会阶层（主要是青年）具有危险的影响，其目的在于使这些阶层归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当前对列宁主义的歪曲受到了批判。P. 鲍威尔曼和 Г. И·列切尔的《列宁主义和阶级斗争。反列宁主义的哲学立场和政治立场》（一九七三年）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千方百计歪曲列宁的学说，危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传播真正的列宁思想、破坏社会主义团结、培植共产党内部的修正主义。

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关注对社会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捷克的哲学家集体写作的《在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中的社会改良主义》（一九七七年）一书，以联邦德国、法国、葡萄牙、以色列和日本的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为例，揭露了社会改良主义的所谓"世界观的中性"。许多著作着重批判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

莱比锡大学举行了科学例会（一九七六年），讨论了社会改良主义同批判理性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阐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求助于 K. 波佩尔的哲学的理论原因和政治原因。会上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导之所以把批判理性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替代物，主要是因为这一理论冒充是批判的和"反教条主义的",并呼吁把对现存事物的全面批判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原则。同时，社会改良主义的重要哲学基础仍然是新康德主义，它由于把现代结构科学的概念体系包括到社会改良主义思维中而得到了充实。

在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断斗争的条件下，修正主义具有特殊的危险性。民主德国在七十年代举行了两次学术讨论会，专门讨论同哲学上的修正主义的斗争（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参加）。会上对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在研究反对哲学修正主义理论斗争中的哲学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讨论。

在总结民主德国哲学家多年工作的基础上，出版了重要著作《哲学修正主义》（一九七七年）。其中强调指出，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同公开的资产阶级理论、社会改良主义和左倾修正主义有紧密的联系。修正主义在帝国主义的现代策略中对反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斗争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在今天，犹如在它的历史发展的所有阶段上一样，妄想从理论上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立场，以便在被修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该书的作者们得出结论说，修正主义的主要哲学根源，过去是，现在也还是新康德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

民主德国的哲学家们在现代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战斗队伍之一。他们积极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

义，对敌人进行斗争，并参加解决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迫切问题。

---

① 参看 В. 皮克《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载于《新德意志报》1948年10月15日。

② К. 哈格《辩证唯物主义——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策的理论基础》1958年柏林版第75页。

③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发言》1963年柏林版第290页。

④ В. 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前的社会发展》，载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1967年4月17—22日）》一书1968年莫斯科版第372—373页。

⑤ К. 哈格《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和社会科学：在民主德国社会科学家代表大会（1976年11月25—26日于柏林）上的发言》1976年柏林版第9页。

⑥ 《新德意志报》1981年4月12日第9页。

⑦ Э. 昂纳克《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76年德累斯顿版第175页。

⑧ О. 莱因霍德《发达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创造性的理论发展》，载于《统一》杂志1977年第3期第307页。

⑨ 参看《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2年第5期第595页。

⑩ 参看 В. 乌布利希《目前形势和为新德国而斗争：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报告》1954年柏林版第161页。

⑪ 李卜谢尔《控制论和社会主义的社会过程》，载于《光谱》1969年第1期第7页。

⑫ К. 哈格《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1969年柏林版。

⑬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导论》1978年柏林版第36页。

⑭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1979年柏林版第192页。

⑮ 参看 К. 哈格《发达社会主义社会》1971年柏林版第27页。

⑯ В. 艾希霍恩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1976年柏林版第179页。

⑰ 同上书，第176页。

⑱ 参看：《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问题的学术讨论会》，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9年第3期第352页；瓦恩克《社会认识中的辩证法和系统论思维》，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7年第7期第792及以后几页。

⑲ B. 艾希霍恩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1976年柏林版第154页。

⑳ 同上。

㉑ 参看 Г. 黑尔茨和 A. 格里泽《哲学和自然科学》1968年柏林版。

㉒ 参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第251页。

㉓ 同上书，第202页。

㉔ Г. 黑尔茨和 A. 格里泽《哲学和自然科学》第50页。

㉕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第213页。

㉖ 参看《哲学的发展问题》1977年柏林版。

㉗ Г. 施梯勒《论辩证法和决定论问题》，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3年第3期第344—345页。

㉘ Г. 施梯勒《关于发展学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地位和性质》，载于《哲学的发展问题》第26—27页。

㉙ X. 霍尔斯特曼《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研究》1977年柏林版第127页。

㉚ Д. 维梯希、K. 哥斯勒、K. 瓦格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1978年柏林版第32页。

㉛ 参看 Д. 维梯希《论第六次工人代表大会》，载于《认识论的认识发展问题》1977年莱比锡版第15页。

㉜ 参看 Г. 克劳斯、Д. 维梯希《关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的若干问题》，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61年第11期第391页。

㉝ 参看 K. 哥斯勒、B. 斯托里雅罗夫《对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的评论》，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62年第4期第474页。

㉞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在哲学上的积极意义》，Г. 门德、Э. 朗格编，1968年柏林版；X. 塞德尔《人类对现实的实践关系和理论关系》，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66年第10期。

㉟ 参看 K. 哥斯勒、M. 托姆《认识的物质决定性》1976年柏林版第107—108页。

㊱ 参看：P. 莫采克《当代的科学和社会》，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67年特刊；A. 科辛《科学的科学》1968年柏林版；等等。

㊲ Д. 维梯希、K. 哥斯勒、K. 瓦格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第268页。

㊳ 同上。

㊴ 参看Д. 维梯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客观真理"的普遍适用性》，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1年第8期；K. 瓦格纳《论概念"真理"的世界观内

容 、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3年第 期；等等.

40 Б．奥孔《信念》1978年柏林版

41 Г．克劳斯《符号学和认识理论》1969年柏林版、《政治的语言》1971年柏林版

42 Э．阿尔布雷希特《语言和哲学》1975年柏林版第193页。

43 同上书，第200页，《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同控制论的关系》，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2年第11期第1388及以下几页。

44 参看В．基尔希格斯纳尔《关于理性和情感在认识过程中的统一的问题》1971年柏林版。

45 Г．黑尔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1976年柏林版第447页。

46 Э．廖泽贝格《决定论和物理学》1975年柏林版第13页。

47 Ф．菲德勒，Г．克里马谢夫斯基，Г．尼德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同单个的结构科学的关系》，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2年第11期第1324页。

48 富克斯－基托夫斯基《分子生物学中的决定论和控制论问题》1976年耶拿版；洛特尔《掌握多种学科》1972年耶拿版；Г．列伊《关于单个科学家的重要性》1973年柏林版；瓦西勒《对遗传学和进化论问题的哲学研究》1973年耶拿版；等等.

49 参看：克里克斯《信息和交往》1971年柏林版；佩舍尔《符号和系统的模型形成》1978年柏林版；《规律：发展·信息》1979年柏林版，等等。

50 Э．昂纳克《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第175页。

51 《社会主义的辩证法》1976年柏林版第10页。

52 参看В．艾希霍恩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1976年柏林版

53 参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的真理》1967年柏林版；《工人阶级的哲学》1975年柏林版，等等。

54 《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对哲学概念中所反映的社会发展过程的研究》1978年柏林版第6页

55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67年柏林版第115页。

56 同上书，第118页．

57 В．艾希霍恩第一、А．科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辩证法：关于从哲学上对它进行研究的问题》，载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辩证法》第21页

58 Н．波尔哈根、Л．施梯勒《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源泉》，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2年第2期第198页。

59 参看В．艾希霍恩第一《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1959年柏林版。

60 Ю. 库钦斯基《社会矛盾》，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2年第10期。

61 参看 Г. 施梯勒《论辩证法和决定论问题》，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3年第3期第348—349页；Г. 帕维尔齐格《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2年第3期第338页。

62 参看 Г. 巴尔齐、Г. 克里玛谢夫斯基《唯物主义辩证法——它的主要规律和范畴》1973年柏林版。

63 В. 艾希霍恩第一《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于《哲学问题》杂志1974年第3期第69页；Г. 施梯勒《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8年第3期第299、301页。

64 Г. 施梯勒《矛盾的辩证法和社会的分析》1977年柏林版第56页。

65 Э. 哈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客观规律性和自觉的行动》1975年柏林版第34页。

66 Г. 施里瓦《历史唯物主义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形成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载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民主德国：决议、观点、目标》1974年柏林版第69页。

67 Э. 拉索夫《论社会主义的规律的作用方式》，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4年第8期。

68 У. 霍耶尔《社会规律和政治组织》1974年柏林版。

69 Э. 哈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客观规律性和自觉的行动》。

70 Р. 米勒《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载于《社会主义的辩证法》第144页；Э. 赫佩纳《论"客观"和"主观"、"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等范畴的定义和功能》，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8年第10期第1282页。

71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76年柏林版第193页。

72 В. 艾希霍恩第一、А. 鲍威尔、Г. 科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1977年莫斯科版第131页。

73 А. 鲍威尔、Х. 格吕格尔、Г. 科赫、Х. 察克《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1974年柏林版第40页。

74 参看 Г. 亚历山大《评 А. 鲍威尔、Х. 格吕格尔、Г. 科赫等人的书》，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5年第9期。

75 Г. 斯托伊什洛夫《论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4年第1期第115页。

76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8页。

77 Е. 奥比契《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时期中党的活动的主要方向之一》，载于《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哲学问题》1978年莫斯科

版第156—157页。

⑱ В. 弥勒《社会主义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问题》，载于《哲学家代表大会（70）：列宁和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1970年柏林版第1卷第10—11页。

⑲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第629页。

⑳ В. 弥勒《社会主义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问题》第11页。

㉑ Э. 哈安《价值——阶级观点——世界观》，载于1978年《统一》第7 8期第806—807页。

㉒ К. 哈格《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和社会科学》，载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和社会科学》1977年柏林版第62页。

㉓ 参看《哲学辞典》，Г. 克劳斯、М. 布尔编，1974年莱比锡第1版第2卷第833-834页。

㉔ Т. 亨里希、А. 里贝特《进步哲学遗产和社会主义意识》，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1年第11期第1376页。

㉕ Р. О. 格罗普《历史和哲学。关于历史的方法论、关于哲学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报告》1977年柏林版第144页。

㉖ 同上书，第145页。

㉗ О. 芬格尔《哲学遗产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载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民主德国》第260页。

㉘ А. 朗格《为福斯特全集出版而作》，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7年第4期第492—493页。

㉙ 《关于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从它诞生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1969年柏林版第16页。

㉚ 同上书，第10页。

㉛ 对这部著作的评论，参看《哲学问题》杂志1971年第9期和1980年第3期。

㉜ Э. 哈安、Ф. 李希特《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任务》，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9年第4期第466页。

㉝ 《〈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丛书：对当前丛书的中间评定》，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8年第2期第256页。

㉞ 参看Э. 哈安《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问题》，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75年第9期第1145页。

㉟ М. 布尔《关于列宁主义地批判实证论的迫切性问题》1972年柏林版第37页。

㊱ І. 多敏、Г.-Г. 兰费尔曼、Р. 莫采克、Д. 佩里克《资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科学观的说明》1973年柏林版第250页。

㊲ Я. 鲍威尔曼、К. 格耶尔、Э. 尤里埃《"马克思学"的贫困：对伪造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1975年柏林版第14页。

第 四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波兰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传播的主要阶段

波兰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以丰富的历史传统为依据的，这些传统体现了波兰工人阶级为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的遗产。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波兰的传播和宣传开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为了寻求符合当时革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水平的新意识形态，波兰社会的先进人物开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研究国际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Л．瓦楼斯基（一八五六——一八八九年）、С．克罗辛斯基(一八五七——一八八六年）、Л．克希维茨基（一八五九——一九四一年）等人的著作和活动，促进了波兰工人斗争同本质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这一任务的解决。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代代表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波兰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一八九四年）和后来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九〇〇年）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波兰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更高的阶段，这个党的最著名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是Р．卢森堡（一八七一——一九一九年）、Ю．马赫列夫斯基（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Ф．捷

尔仁斯基（一八七七——一九二六年）等。列宁曾强调指出："波兰社会民主党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它第一次在波兰这个完全浸透了民族主义趋向和狂热的国家里建立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活动家和理论家，而从一九〇六年起则是波兰社会党的活动家（波兰社会党左派），设法把国内工人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提出并探讨了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民族和民族解放运动、阶级斗争的问题。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争取社会主义的农民运动问题的研讨，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具有特殊意义。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国的革命事件使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上接近起来，并开创了在波兰传播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是同列宁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从那时起，波兰的革命运动十分努力地去掌握列宁关于以下问题的思想：在无产阶级起主导作用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解放运动中民族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关系、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军的作用、掌握唯物辩证法、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战略和策略等等。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波兰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是同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波兰社会党左派合并为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该党在一九二五年改名为波兰共产党。在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统治条件下，处于不合法地位的波兰共产党进行了革命活动，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共产党人，在一九一八——一九三八年期间力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于波兰资产阶级国家新历史条件下的革命运动。

Ю．马赫列夫斯基（一八六六——一九二九年）、С．鲁特尼扬斯基（一八八七——一九四一年）、М．科舒茨卡娅-科斯特舍娃（一八七六——一九三九年）、А．瓦尔斯基（一八八六——一九三七年）、Ю．列辛斯基（一八八九——一九三九年）、Е．伦格（一八八六——一九三七年）、Ю．布鲁恩（一八八六——一九四二年）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波兰共产党人在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同时，批判了实证主义、新经院哲学、信仰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法西斯占领的艰苦年代，波兰共产党人积极地投入了争取波兰从法西斯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一九四二年一月诞生的波兰工人党在这些年代起了特殊的作用，它是波兰共产党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波兰工人党在自己纲领里除了提出组织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外，还宣布必须进行社会改造并把全部政权转入劳动者手中，它真正实现了工人阶级在反法西斯主义民族阵线中的领导权，把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同争取民主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彻底结合起来了。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发表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这是人民波兰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在这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波兰的传播和确立有了有利条件。从此在波兰开始了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进行斗争的当代阶段。

波兰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四五年）确认了人民政权在波兰的建立，并拟定了人民民主革命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Б．贝鲁特强调指出，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间，"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职能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和任务的过程，不言而喻，是同我们的革命社会经济改造的各发展阶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服从于这些阶段的"②。到一九四

八年底，波兰工人党为向社会主义措施过渡改组了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治力量，基本上消灭了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势力，或者说使它的最危险的发源地保持了中立。

波兰在上述年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许多特点。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政治领域领先于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还没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基本生产资料国有化问题在波兰工人党纲领中占有特殊地位。基本生产资料国有化在战后特殊条件下不是一次性的破坏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政治行动，而是在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进行的。但国有化没有包括私人的小的工商企业和其他企业，小商品农业生产完全保留下来了，尽管在土地改革后地主所有制已经没有复辟的可能。这一切表明，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没有被剥夺。差不多到一九四七年底（在一些地方到一九五〇年），各种政党还合法存在，而它们的活动是反对波兰工人党纲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但是，波兰工人党把已经形成的人民民主的形式看成是“排挤和逐渐消灭资本主义成分的形式，同时是发展和巩固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形式”③。波兰工人阶级政权和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为使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建立，一定会促使上述任务的实现。

这几年，文化、科学、世界观、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更为复杂得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在波兰社会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种领域里几乎继续畅行无阻。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科学和文化中心是在战前的机构和人员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许多杂志也完全按照战前的样式恢复自己的工作，它们的出版物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哲学。在两次大战之间曾广泛流行的资产阶级哲学和天主教哲学的各种流派开始复活。天主教思想家利用新政权所保障的信仰自由，在国内开展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这一切要求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加快科学、哲学、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文化领域中的改造工作。十分明显，按照旧形式恢复各种科学、文化、艺术等等的机构，是同波兰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正在产生的新内容相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暂时还在高等院校之外宣传。对马克思主义干部的需要增长了。这几年在党的教育网中开始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专家。与此同时，党在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方面展开了工作。一九四九年用波兰文出版的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进入了学术研究领域，没有这部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真正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是不可思议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问题的文章越来越频繁地问世。

党的教育网中培养出来的和从国外回来的马克思主义干部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大学里的学术活动和发表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阶级斗争的复杂条件下，一九四四年七月波兰工人党拟定的民主改造的社会经济纲领的基本任务，在一九四八年基本完成了。于是有必要确定新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改造的奋斗目标。

首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依据工人运动的实际成就，在一九四八年实现了两党力量的统一。两党的统一和以后党的建设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为基础，这一点是由创建中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思想宣言宣告的。

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统一大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把波兰的新国家规定为工人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为今后波兰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奠定了基础。大会制定了在波兰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纲领，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

务，这个任务要在六年计划（一九五〇——一九五五年）的实现过程中实现。与此同时，提出了关于按合作社原则改造农村、在更广泛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以及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采取更有效的进攻措施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中心问题上还没有根据一九四八年已经形成的条件把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具体化，尽管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一些措施。波兰统一工人党纲领强调指出，在现阶段，"在波兰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斗争，就是争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斗争，同剥削阶级的斗争，以及与此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争取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斗争"[1]。

一九四八——一九五五年，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波兰巩固了，服从于建立社会主义基础这个目标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解决了。尽管存在着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困难，六年计划胜利完成了，结果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大大加强了。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这些年代的社会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偏重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偏重于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这到五十年代中期越来越明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发展的和谐。

随着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上对国内社会经济关系的改造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多，文化革命和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敌人的进攻越来越广泛地和富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向思想战线的工作人员，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哲学工作者、文化教育工作者，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劳动群众、中小学学生和大学生的任务。同时向波兰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以往关于波兰哲学遗产的估价重新思考和研究的任务。这一切只有依靠人民波兰的现实的历史实践，依靠社会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规律才能实现。

从提出的任务来看，一九四九——一九五五年时期是开始改

组哲学科学和开始向资产阶级哲学和意识形态的阵地进攻的时期，是对过去进步民主传统以及哲学和社会现实的迫切问题进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年代。哲学社会学部为波兰第一届科学大会（一九五一年）所做的准备工作，对这一切起了促进作用，大会通过的"组织决议和对波兰哲学传统所作的评价是哲学上已经开始的意识形态进攻的基础"[5]。

在干部培训、出版、宣传等等方面一系列组织措施的实现，促进了上述年代整个哲学和社会科学战线工作的改善。一九五〇年成立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科学干部培训学院，后来改名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社会科学研究院。在华沙大学也开始培训哲学干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也大大改善：一九五一年起出版《哲学思想》杂志，代替前几年继承战前资产阶级哲学传统的几家哲学杂志；一九五三年起出版专门的逻辑学杂志《逻辑研究》，并安排出版哲学史年鉴，而后出版伦理学和美学年鉴[6]。

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干部仍然不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次大战之间时期各哲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的影响，还明显地可以感觉到。尽管如此，但在这些年代已经对唯物辩证法规律和形式逻辑规律的相互关系、形式逻辑矛盾和辩证法矛盾的相互关系问题开始进行正面研究了。在这些年代，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观的性质和实质、关于列宁的反映论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讨论，占有特殊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波兰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革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成了重要的研究领域。

由此可见，战后头十年（一九四四——一九五四年）是由人民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方面，这个时期也构成一个独

立阶段，这个阶段分两个很有特点的时期：一九四四——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一九五五年。其中的第二个时期似乎由于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上的专横而常常被估计不足。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和修正主义批评家最乐于夸大这个时期的消极方面。其实，正是在这个时期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抗击哲学的和意识形态的敌人方面表现了最大的积极性。正是在这些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波兰由新的成就丰富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研室和其他中心的数目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战士的队伍壮大了。

但是，战后头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结果不表现在数量指标上，而表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些年代对科学和哲学生活的各方面发生了革命性影响。正是在这个时期，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克服，而且第一次在有利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开始克服波兰精神文化中已经形成的那种把科学和意识形态作为根本“不相容的”把握现实的形式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的现象。一方面，这意味着继承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并把它提到更高的水平，另方面，意味着公开反对还相当强大的非马克思主义传统，反对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波兰“属于异类”的教条。

在上述时期，波兰的新实证主义、现象学和其他资产阶级哲学流派试图复活关于哲学的对象和方法的唯心主义观点，试图影响波兰科学界和学生界的观点，还试图影响马克思主义干部的成长。五十年代初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对新实证主义的批判，虽然从理论角度和政治角度都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毕竟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论在波兰确立起来的特征之一。然而，这种批判通常在报刊上进行，很少在大学讲坛上进行，因为旧的哲学和社会学学派的代表在大学讲坛上仍旧占着优势，尽管他们的

人数在五十年代初已受到部分限制。在这些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仍然是通过党的教育系统，通过青年团和波兰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通过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讲活动以及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工作普及的。

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从前的里沃夫—华沙学派的代表进行了公开辩论，但没有充分估计到另一个重要敌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人，也是整个社会主义的敌人——天主教以及天主教的哲学和神学，在它们内部新托马斯主义又起了主导作用。这给后来同天主教徒的思想冲突带来了消极后果。

除了对天主教的哲学和宗教，对新实证主义和现象学没有进行充分有效的批判外，还对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没有重视。首先是没有重视对从西方输入的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流派以及对大约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出现的修正主义言论进行斗争的任务。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严重缺点是单纯地注释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等等。T. M. 雅罗舍夫斯基在谈到五十年代初教学工作中的缺点时强调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式化的、教条式的叙述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应当用自己的经验向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洞的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7] 况且，由于大学讲坛上继续宣传资产阶级哲学，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教育大学生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了。K. 奥霍茨基指出："波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使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人民波兰头几年里在高等学校中的处境很困难。"[8]

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干部在同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中捍卫了波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成果。虽然在一九四五——一九五五年期间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善于克服旧哲学和社会学学派代表的方法论观点的影响，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成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活动的公认的思想基础，开始在哲学生活领域，即

在科研教学活动和宣传教育工作中赢得了关键性的阵地，这一点毕竟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的领域中赢得阵地，是同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日益稳定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波兰统一工人党认为，要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和六十年代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主要是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包括在农村），把城乡劳动者联合在工人阶级周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同时改造社会关系的总和，从根本上改变阶级结构，成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中的越来越深刻的变动的强大因素。"①所以，波兰统一工人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国家的进一步工业化上，使社会政策和思想教育工作服从于这个任务。

到五十年代末，社会主义工业化已经带来了明显的成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六年计划完成了。在六十年代末，工业生产增长五倍，国民收入按人口计算增加二点七倍，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提高了。但是在经济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任务的解决之间开始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比例失调。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时期中，国内外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别有用心地利用了这件事，也利用了那些年代政治领导方面的某些错误。

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人阶级迅速成长起来了，它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熟练程度提高了，它参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和参与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道德和政治思想的范围扩大了。

在波兰知识分子的职业构成及其职能方面发生了急剧变化。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科学技术人员成了知识分子的基本部分。文科知识分子和国家职员的人数增加了。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影响下，波兰农村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但是代表社会主义类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人数不多。一九七四年，在一千零五十一个合作社中有三十四万九千农户。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小个体农户（5公顷以下），是农业结构的特点。农业的分散性对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装备新技术，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个十分严重的障碍。农业生产落后于国家的工业发展，已经不止一次地在保障居民的食品方面造成消极后果，这一点又不止一次地成为国内社会政治紧张局势的直接原因。

这一时期波兰经济发展的成就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六十年代末需要进一步明确如何解决经济和社会任务。而同实现工业化任务有关的、支配着社会目的的经济政策，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起直到一九七〇年底几乎没有改变。但这个时期在社会结构的发展上，在利用“人的因素”的条件和性质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更。这一点又迫切要求波兰统一工人党改变社会政策，首先在劳动条件和工资，社会保障，住房条件，保健，建造小学、幼儿园、休养所等等方面。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原先的关系已经不符合波兰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利益。

尽管波兰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谈论社会主义在波兰的最终胜利为时还早。上述的波兰的整个发展进程再一次证实，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阶段的具体历史框架不总是一致的。尽管一九七〇年波兰的状况存在着种种复杂和矛盾的现象，但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许多成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这一点是无疑的。

无论哪个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纲领都要求辩证地分析该历史阶段的一切实际情况和各阶级力量的对比。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波兰还没有走完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一些突出现

象只有通过建成社会主义基础才能克服。首先这涉及到波兰经济的多成分的性质，在上述时期波兰经济中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它包括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私人小商品农业生产；私人小商品手工业生产；私人服务业；手工业商品生产；天主教堂和天主教组织系统的分散各地的财产。

同上述每一种经济成分相适应的是一定的社会力量，其中同上述第一种经济成分完全适应的只是产业工人阶级、公有化经济（包括公有化农业经济）各部门的工人。同其他经济成分有关的社会力量，就生产的、社会的和世界观的许多特征来说，不能称为社会主义的，但他们在波兰人口中的比例很大。至于僧职人员、天主教知识分子、制造祭品的手艺人等等，就财产形式、收入来源以及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目标来说，在波兰通常构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交，波兰继续保存着经济的多成分性，社会结构的繁杂性，尚未公有化的小商品农业，意识、道德和整个文化领域内的种种矛盾。有一种论调，说什么文化是处在对抗性阶级矛盾之外的，鼓吹这种论调的不仅有波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历史学家、艺术学家等等。但实际上，阶级斗争的重心在一九五六和一九六八年之间的这个时期里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社会意识、民族文化、传统和习俗的领域。修正主义者和其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人正是把文化、艺术，很大程度上把社会科学和哲学“保留”在自己手里。社会生活的这些领域一直是社会政治争论和意识形态争论的发源地，确切些说，是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发源地。

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党和哲学战线上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反对反社会主

义势力、反对政治修正主义和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在一九五六——一九七〇年间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波兰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五十年代后半期，修正主义者在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攻击中开展了对过去时期的“批判”。修正主义者过分夸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并加以绝对化，他们把这种批判扩展到社会主义的整个政治、哲学和经济的纲领。在对“教条主义”的纠缠不休的批判中隐藏着一种枉费心机的企图：偷运关于议会制作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旧思想，但这是在“整体民主”、“整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力量“自由游戏”等等“新”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

一九五七年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九次全会制定了这样一条路线：要划清党对今后社会主义建设和党内生活问题的立场同修正主义者的批判立场的界限。全会强调指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克服过去存在的缺点时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要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注意必须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但是，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没有贯彻到底，结果修正主义者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再度活跃起来。六十年代的修正主义者继续坚持他们在五十年代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原则，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新特点。首先修正主义者散播资产阶级的趋同论，并根据这个理论鼓吹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和平共处”、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模式”。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六四年）强调指出，修正主义者把他们敌对活动的矛头对着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鼓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调和”、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幻想，来代替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修正主义者企图用“各阶级利益一致论”的概念来代

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等等。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反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意识等等的思想斗争的决定，但在日常的实际活动中不善于彻底地实现这些决定。不仅如此，在组织和干部方面，它的活动在某些场合同五十年代前半期相比反而倒退了。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思想战场的哲学地段尤其如此。

在一九五六——一九六八年，马克思主义的异己分子钻进了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至关重要的行政组织机构。"创造性的修正主义"、"博采众长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出现了，所谓"辩证逻辑"概念没有根据的论调发出了，辩证矛盾的见解被说成是恩格斯和列宁的"错误"，是"黑格尔主义的残余"，等等。

修正主义的"公设"之一是：拒绝科学和文化中的"行政命令"或对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理解"。所谓"错误理解"不仅是指"个人崇拜"的某些后果，而且首先是指当时为限制反社会主义活动而作的那些决定。在实际驱除"党的行政命令"的同时，出现了对哲学、社会学、其他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中的党性原则的背弃。Л．科拉科夫斯基、Е．爱尔施坦、Б．巴契柯、Р．季曼特、З．鲍乌曼等人的修正主义文章发表了，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主要原理，特别是党性原则。

结果到一九六八年资产阶级旧哲学学派的某些传统复活了，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表现出来了。一伙人纠集起来，在科学院、大学、出版社、杂志社、哲学委员会和哲学团体等等中施加强大压力。他们又开始把科学和哲学、科学性和党性的原则、科学机关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有一种意见很流行，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仅仅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所以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研讨似乎只应当在党的机关中进行。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取消"阶

级性、党性的原则的论调。旧哲学学派的代表和修正主义者宣称哲学是一种抽象知识，这种知识应当是“无党性的”。

天主教和“黑暗之堡”的恶势力变得越来越危险。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许多天主教的中等和高等学校完全恢复和巩固了，在这些学校中，哲学、神学、社会学、宗规法、历史学等等教研室全力以赴地工作。天主教僧侣逐渐争取到天主教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能够进世俗机关工作。天主教堂的僧职人员重新积极活动，天主教的机关、出版社、杂志社、社团的网扩大了。

在上述年代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由”辩论，因为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系统哲学部门的多数领导岗位为新实证主义者、现象学者、天主教徒等等所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为积累以天主教哲学、修正主义和新老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后备力量创造了一切“前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向大学生、出版社和杂志社的道路被封闭，党对社会科学的领导几乎被完全无视，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修正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研究工作几乎没有进行。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垄断”的取消，促使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取得政治优势，因为这些力量“老”得多，在意识形态方面更有经验。列宁曾对这类错误提出过警告：“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是幼稚，也就必须愈加积极地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愈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觉悟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10]

一九五六——一九六八年导致向哲学科学提出的要求同这些要求的实现不相适应的更深刻的原因，既在主观条件（其中包括党的领导和担任领导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也在波兰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客观条件。正象上面已经

指出的，波兰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越来越明显，回到资产阶级制度是不会的，社会主义在波兰迟早会最终胜利。反社会主义分子不仅继续被排挤出生产关系的领域，而且被排挤出社会生活的其他的"上层建筑的"领域。

针对这种情况，受国外思想破坏力量一贯支持的反革命运动，加强了自己的殊死斗争。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那个时期在波兰还发生巨大影响。

一九六八年三月发生的事件再次证明，思想攻势的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实际手段和形式方面的缺点、对修正主义采取宽容态度、同陈腐社会集团搞自由主义，导致敌视社会主义分子的活跃。这些消极现象在一九五六——一九六八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巩固，当然不能中止它的发展。那些妄图扮演"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角色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修正主义者决定不了哲学生活的发展，更决定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切实的研究工作，虽然被那些通常由修正主义者强加的吵吵嚷嚷的争论所遮掩，但仍在进行并走自己的道路。T、M，雅罗舍夫斯基在列举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的积极倾向时写道：出现了"大量有关认识论的著作（例如考察反映论、语言哲学、真理问题的著作）、有关本体论的著作（论述决定论，论述量子物理学、宇宙学的哲学问题的著作）、有关伦理学、美学、人的哲学等等的著作，这些著作是从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写的，是对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重大贡献。……对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批判在许多场合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在行的，没有回避分析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提出的那些重大问题。从波兰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社会主义思想史来研究波兰哲学传统（特别是十九世纪的）这一工作在广泛范围内开始了。"[1]

各派修正主义者的言论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除了他们，没有人研究一般哲学问题，阐述哲学同其他科学、社会实践、文化等等的相互关系。其实，在波兰仍在传播关于哲学的对象、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中的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仍在做明确哲学的科学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科学生活和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中的影响加强了。关于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九五六——一九七〇年取得的成就，将在下面几节里更详细地谈。

七十年代初，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七次全会（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和第八次全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而后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提出了所谓加速发展的战略，按照这个战略，党的社会经济政策的重心转到迅速改善波兰全社会的劳动和生活的条件。的确，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这个时期，在解决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六，而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约百分之十。社会保障、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免费医疗、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养老金保证，得到了改善；实行给多子女家庭发补助金；等等。

可是从一九七六年起，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急剧下降，在社会政策方面出现许多困难。

七十年代波兰旨在加速经济发展和大大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不全是如预想的那样进行。七十年代末形成的、一九八〇年八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因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行动而尖锐化的危机局势的基本原因，既是由客观上形成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造成的，也是由某些主观因素造成的。党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对这些原因作了原则性的批判性分析，而后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七、第九、第十二和第十三

次（一九八三年十月）全会上更确切地分析了这些原因。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五——十六日《人民论坛报》上公布的第十三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强调指出："危机局势的根源不是臆想的社会主义的缺点或者社会主义不可能完善，而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严重偏离。这特别表现在对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的破坏，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官僚独裁式的歪曲，思想教育工作的缺点和简单化。在经济政策上，唯意志论造成投资范围的过分扩大以及经济对资本主义信贷的严重依赖。"

七十年代初未经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而采取的"加速发展的战略"，不符合实际的历史可能性和条件，而且激化了波兰社会生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等领域中的实际矛盾，这是最主要的。П．Н．费多谢耶夫就这一点指出："波兰危机局势的沉痛而富有教益的教训之一，是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提出下述论点的试图，这个论点是：在还没有解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任务的条件下似乎可以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12]

在估计波兰社会的发展时应当指出，过渡时期在波兰大大延迟了。已经达到的生产公有化水平，特别在农业中，比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不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还没有成为波兰社会的社会意识、生活方式的整个准则和价值观念体系在形成时所依据的唯一基础。宣扬宗教、精神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教权主义集团至今仍有强大影响。鉴于波兰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种种困难，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十三次全会强调指出："对我国复杂现实的估量是不能用单一含义的公式做完的。有一点毕竟是毫无疑义的，这就是：我们在波兰解决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多数任务。这标志着在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牢固的社会主义结构。在许多领域实现了那些可以归入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在许多场合决定我们今天

的经济潜力。同时也有一些领域的任务我们解决得晚了。在我们的现实中存在着对抗性阶级矛盾的残余。因此，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发展中有不平衡现象。”

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敌对行动对波兰危机局势的加剧起了强烈影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十三次全会强调指出："同帝国主义中心有联系的极端主义势力把‘团结’运动……改造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把形形色色的“组织”和“委员会”联合起来的首先是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十三次全会指出，极端主义派别具有“不同的性质，并求助于不同的、往往彼此相距甚远的思想政治传统。敌视社会主义是公分母。……攻击的矛头对着工人阶级的起领导作用的政治组织——党，没有党，工人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切身利益。他们把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特别是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竭力强加给工人阶级这样一种思想：似乎它可以采取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来保证民主以及同民主有关的权利和自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敌对活动造成了一系列对社会主义来说是消极的现象，使波兰社会的广大阶层在一段时间里迷失方向，把他们卷入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罢工运动。在战后的各个年代里，都有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社会政治力量在波兰活动，它们阻碍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阻碍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和艺术的发展，阻挠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形成，继续散播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和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思想、理论和观点。波兰统一工人党不止一次地号召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更积极地研究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分析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的根源和原因。波兰统一工人党号召波兰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等等，除了研究波兰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

性以外，把他们的创造力集中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问题上，这些问题的解决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波兰社会的社会主义意识能否形成和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予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些问题是：阶级结构和社会意识状况的分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公平原则的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责任感的提高，党的经济政策和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生产管理的参与，工会运动和青年运动中出现的新现象，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病态现象，对市侩作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反共产主义的批判，等等。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六八年）详细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现状。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重建科学研究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决定，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第一次党的社会科学代表会议（一九七三年），波兰哲学家全国会议（一九七四年），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五年）的决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党和担任领导工作的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促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对它的社会作用，对它的世界观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和方法论功能的科学观点的确立。

一九六八年以后，《新路》、《人和世界观》杂志上组织的讨论，为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和人民波兰成立三十周年举行的学术会议等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阵地的巩固。例如，在《哲学研究》杂志（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对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前一阶段作了批判性的评价并强调指出，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不深刻研究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历史，不总结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就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人和世界观》杂志（一九七——一九七四年）发表文章继续讨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对象及其意识形态的、世界观的和教

育的任务。

Я．拉多什、С．柯吉尔-柯瓦尔斯基、З．查茨柯夫斯基、Т．М．雅罗舍夫斯基等人编写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确立。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在以后几版中修订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这项工作的独特的总结。

七十年代初，在相当广泛的战线上对于过去十年中对精神文化起过消极影响的政治修正主义和哲学修正主义开展了批判。Я．柯尔钦斯基、Я．拉多什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⑬明确地指出了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它们的反社会主义实质。后来在个人和集体写的一些著作中，有根有据地指出，修正主义者在政治领域中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是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的。

例如，从"科学主义"立场出发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主义言论，特别是Е．爱尔施坦、С．阿姆斯特丹姆斯基等人的言论，在Я．拉多什、Ч．诺温斯基、Т．М．雅罗舍夫斯基、К．奥霍茨基等人的著作中⑭遭到了切实的批判。Я．拉多什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在揭露"科学主义修正主义"同恩格斯当年称之为"平庸经验主义"的那个流派的血缘关系时指出，哲学上"科学主义"的根本缺陷是抹煞、掩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争论的意义，取消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哲学，取消它的世界观的和意识形态的职能。所以"科学主义修正主义"的重要特征不是对自然科学成果的利用本身，而是企图用实证主义的种种说法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功能和其他功能。

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年代除了批驳"科学主义"修正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观点，同时也彻底批判了哲学修正主义的"人类学"变种。哲学修正主义的这种说法在波兰是

在Л．科拉科夫斯基、З．鲍乌曼、Б．巴契柯的著作中，以及在А．沙夫的某些著作、特别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和人的个体》（一九六五年）一书中提出的。这种说法基本上只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⑮遭到批判。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修正主义的“科学主义”和“人类学”变种的批判的共同结论是，这些变种中的每一种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没有科学根据，从而客观上同有意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共分子的观点一致。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这样一个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现的规律性和它的方法论具有普遍性。因此，不存在所谓“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存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共同贡献。从这一立场出发驳倒了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关于“民族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的臆想。

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的代表，除了发挥批判思想外，七十年代对当代迫切问题作了大量理论概括工作。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对哲学史问题进行了相当广泛的研究。人和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个人的问题，科技革命、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的方法论的问题，摆到了研究工作的前列。

在七十年代有一系列客观和主观因素妨碍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纲领的实现。国内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仍在发展——波兰分析哲学、现象学、天主教哲学的传统在起作用。旧哲学学派的代表在当时党和科学的领导那里曾毫无道理地享有很高威望，他们继续产生明显的影响，关于这一点，Я．拉多什在《哲学中的和平共处》一文（《论据》，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中讲到。由К．埃杜凯维奇、Т．柯塔尔宾斯基、Р．英加尔登等等奠立的流派仍在发展。可以明确地认为，从前

的里沃夫—华沙学派的代表促进了形式逻辑、数学和数理逻辑、语义学、逻辑真理问题等等的研究。但这个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在其两次大战间的和战后的发展时期，终究没有像波兰修正主义者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企图要人们相信的那样起了“唯物主义”的作用。无论旧的实证主义还是战后它的最新形态，都把对“科学”哲学的理解完全同局部科学知识的发展联系起来，不承认独立存在的具有独特性的哲学。

在最近十年，修正主义者和叛徒继续活动，他们同国外思想破坏中心保持接触并煽起反社会主义情绪。出现了一个活跃的类似“马克思学家”的集团，他们自称是“波兹南方法论学派”，这个学派在七十年代毫无根据地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限定词。Л．诺瓦克成了这个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最终滑到了哲学修正主义的立场。这个“学派”的代表们，照例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问题进行切实的研究。他们像西方的马克思学家那样，企图从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出发，重新解释、“说明”马克思的哲学或者他的个别论断“是”什么。这种“重新解释”最终导致波兹南的“马克思学家”否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原则等等。

有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对话看成是思想混合主义，看成是寻找“共同的”即一半马克思主义一半天主教的意识形态，看成是制定一种被承认为“世界观多元论”的社会理想，这给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确立造成了巨大危害。

贬低思想教育工作的作用，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哲学的地位受到消弱。七十年代流行思想粉饰的做法，这种做法使言论和行动之间、人民在道义上政治上一致的口号和社会意识、世界观、道德的实际状况之间、成就的宣传和国民经济许多领域中日益增长的困难之间的脱节越来越严重。这不能不影响到社会

科学和哲学对来自波兰社会发展具体实践的那些问题的研究。许多研究人员在自己的各类著作中回避或者抹煞国内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中的矛盾。行动的“实用主义”，“技术治国的幻想”、对“西方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模仿、七十年代占上风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思想妥协，也消极地影响到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战线的活动。波兰党的第一次全国思想理论工作会议（一九八二年）强调指出：在这些年代，意识形态的教育被归结为“‘经济教育’，而且被理解为‘对成就的宣传’……政治的和世界观的教育被忽略了（当时这种教育只限于确立非批判的官方立场），同时却容许对西方作意识形态上的让步，容许对那些几乎进行公开政治活动和宣传活动的敌对的政治集团采取宽容态度。”⑯

社会主义的敌人在波兰故意闭口不谈波兰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成就。他们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进行恶毒的反社会主义宣传时仅仅抓住了过去国内生活中的消极现象，似乎这些现象证明社会主义也会发生危机，因而对资本主义没有任何优越性。可是一九八〇——一九八一年波兰社会经历的经济动荡和社会政治动荡不是“在党领导下在波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和价值的危机，而是对这些原则和价值估计不足和破坏的结果。这些年的事件掩盖不了这样一个真理：党有正确的经过历史检验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社会革命，建立人民政权，解决国家存在和民族发展的关键问题）的理论作为自己的遗产……虽然今天社会的期望和需要使人们看不清这些成就，但总不能忘记：经过三十六年社会主义变更，国内形成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的潜力，正确地利用这种潜力，就可以克服困难和保证人民有胜利的未来。”⑰

完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的途径，根本改善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科学探索的途径，

是建立在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整个战后年代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创立的基础之上的。归根到底，正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在波兰引起了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造就了许许多多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在波兰社会科学家的活动中奠定了牢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这些传统的发展和加深是确立社会主义社会意识的必要条件。

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的特征是经常关心推进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是由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批判新实证主义、现象学、基督教哲学的必要性决定的。对唯物辩证法迫切问题的积极研究，也促进了一方面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对哲学修正主义和政治修正主义开展更有效的批判。

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对唯物辩证法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在同从前的里沃夫—华沙学派代表就辩证法和形式逻辑、辩证矛盾和形式逻辑矛盾、发展和变化、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和规律等等原则问题辩论的过程中，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它的规律在改造和认识社会和自然中的作用得出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在这个时期，批驳了创立“形式的辩证逻辑”⑱的企图，指出了混淆辩证矛盾和逻辑矛盾这两个概念的错误。

参加辩论的多数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立统一和斗争规律不会导致两个矛盾判断的合取无论从形式逻辑还是从辩证逻辑来看都被认为是真理。

提出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的相互关系问题，已十分接近于懂得阐明辩证逻辑对象的特点的必要性。对此起了促进作用的还有对下述唯物辩证法问题的研究：唯物辩证法规律和范畴的分析，

辩证法原则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波兰哲学家的许多著作，对唯物辩证法的逻辑的、认识论的和方法论的方面作了分析。对如何理解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对立统一和斗争规律、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继续进行研究并作精确说明。T. M. 雅罗舍夫斯基、Ч. 诺温斯基、Я. 拉多什、C. 柯吉尔 柯瓦尔斯基、З. 查茨柯夫斯基、C. 拉因柯、З. 奥古斯蒂涅克等人的新的研究成果，促使人们把辩证逻辑更深刻地理解为反映认识对象发展的概念的运动过程。

对自然科学、具体社会学科中的规律范畴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促进了对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规律的研究。这类问题反映在《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若干问题》（一九五八年）、《规律、必然性、概率》（一九六四年）、《十九世纪的科学规律概念》（一九六七年）、《十九世纪末的科学规律概念》（一九六九年）、《物理学中的对应原则和科学发展》（一九七三年）等集体著作中，也反映在З. 奥古斯蒂涅克、Я. 苏赫、Ч. 诺温斯基等人的个人专著中。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结合反对从前里沃夫—华沙学派的代表所散布的唯名论观点和反对天主教哲学所坚持的唯实论观点的斗争，许多学术著作和学术会议探讨了普遍和个别、具体和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等问题。这些研究的某些成果反映在《科学抽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一九五七年）这一著作中。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对抽象、具体和观念的范畴，以及对客体和主体的辩证法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过程中的再现问题，进行了特别认真的研究。

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除对在认识对象发展过程中再现认识对象的概念、范畴和方法进行研究外，还分析了认识的相对稳定的因

素、认识的结构因素、语言和现实的相互关系。

波兰哲学家分析物质概念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研究工作，对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探讨起了重大作用。对物质范畴的正面研究是同批判形形色色的现代唯心主义和表现在“科学主义”和“人类学”说教中的哲学修正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哲学上偷运唯心主义的流行办法，在五十年代后半期是批判列宁物质定义的所谓“片面性”。在波兰作者写的许多文章中硬说，列宁强调物质的特性“是客观实在”，这似乎只是为了同主观唯心主义作斗争，而在同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就丧失战斗力了。他们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渗透”观点的拥护者，认为除了人类意识还可能存在某种“一般意识”或“一般思维”。但是列宁本人当年就已明确地表示了对这类“观点”的态度：“世界依赖于人们的思维，——这是错误的唯心主义。世界依赖于一般思维，——这是最新的实证论，这是批判实在论，一句话，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欺骗手段！”⑲

列宁的物质定义和物质观遭到“科学主义者”的修正。例如，爱尔施坦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一书中从“物质是物理存在”这个定义出发，通过逻辑推论得出结论说，世界的物质性在于“它的物理性”，社会科学也应当“从物理学上”加以说明。⑳对“物质”、“现实”、“意识”、“客体”范畴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歪曲，表现在修正主义的“人类学”说教的代表Л·科拉科夫斯基和З·鲍乌曼的著作中，后者在《认识过程的文化决定因素》（一九五六年）一书中同意马赫的观点。

“科学主义者”和“人类学者”修正列宁的物质定义和世界物质性学说的企图，在Я.拉多什、Т.М.雅罗舍夫斯基、К.奥霍茨基、З·查茨柯夫斯基、Ч.诺温斯基、С.拉因柯、С.布特伦等人的著作中遭到了批判。与此同时，哲学家们继续积极地探讨运

动和物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同“低级”形式的关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同哲学的关系等问题；还探讨物质和意识、现实性、因果性和偶然性、决定论和非决定论，规律性和必然性等范畴。3．奥古斯蒂涅克等人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把巩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盟看成是同自然科学家一起完成的科学工作的经常性的迫切任务。

从六十年代下半期起，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积极地探讨实践和认识、认识主体的反映和能动性的问题。他们除指出实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基础作用外，还力图指出它对各哲学知识领域的特殊意义。

在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的研究有个特点，就是逐渐克服了对实践的错误解释。第一种错误解释是同这个范畴的主观化倾向联系着的，这个倾向最明显地表现在Л·科拉科夫斯基的著作中，归根到底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为一种主观人格主义的“人的生存”哲学，或者改造为唯心主义的“行动哲学”。㉑第二种错误解释是同把“实践”和“劳动”的范畴混为一谈的企图联系着的，这种企图归根到底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归结为“劳动哲学”。这种解释存在于Я．谢夫契克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一九六九年）和《劳动哲学》（一九七一年）这两部著作中。T M 雅罗舍夫斯基、З．查茨柯夫斯基、Я．拉多什、C．拉因柯、K、奥霍茨基等人的著作指出了把这两个范畴混为一谈的错误。第三种错误解释是完全否定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或者忽视实践的某些认识功能。例如，B．梅鲍姆在自己的“非标准的实践观”中表达了这些观点。㉒

好些著作批判了有关实践的认识功能的错误观点，并对实践

和认识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正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指出，实践不仅一开始把内容提供给认识，这种认识形式本身就是反映在观念中的并被相应地改造过的改造世界的实践形式，而且靠这些认识形式的作用而获得的结果只有在进一步的实际行动过程中才能得到检验。

波兰哲学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论的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作出了贡献，批判了从新实证主义哲学的立场来说明真理本性的企图。从五十年代末起，这种批判针对着哲学修正主义，后者企图“论证”反映论原则和真理、反映和实践不能相容，竭力把列宁的反映论同马克思对实践、认识、真理的观点对立起来。

关于“绝对真理”、“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的概念的定义，引起了最激烈的争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散布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真理观，它们的影响加深了对上述概念进行正面研究的困难。例如，产生这种影响的有K．特瓦尔多夫斯基、K．埃杜凯维奇的著作，还有译成波兰文的用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操作论、约定论等等精神写成的著作。

波兰哲学家在分析相对真理的概念时，往往注意它的以下特点：不完全，即他们认为的对一定认识对象的知识不完全，不可能包括构成正确论断的全部意见，知识不确切或近似。哲学家经常强调，绝对真理的观念只是在同相对真理的对比中才能制定出来。他们在分析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法时提出了以下看法。

科学对所提问题的回答通常是相对真理；随后的每一个回答越来越确切，并具有更多的科学的（“合乎真理的”）价值；绝对真理在这里是个理想目标，对所提问题的直接回答在接近这个目标。

绝对真理从逻辑角度可以看成是有关认识对象的任何特征、

特性的正确论断之和，即把现实界的这一单个对象（片断）的全部特性和特征都包括在内的正确论断之和。而相对真理则相应地可理解为没有把现实界的对象（片断）的全部特性或特征都包括在内的正确论断之和。

绝对真理可以简单地看成是经典意义上的正确论断；相对真理则相应地表现为从经典意义上说是“相对错误的”论断。

最后，可以把相对真理的概念同绝对真理的概念作这样的对比：前者是人类本身在一定的具体历史发展阶段上所掌握的有关周围世界的局部的近似的真理，后者是有关整个现实和历史的最终知识（这种知识原则上是达不到的）。

波兰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使我们能正确地去说明研究工作中的错误和迷误。他们同时强调指出，正确的知识不是出现在一次性的认识活动中，不是现成的，而是在克服认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困难而复杂的过程中获得的。好些著作指出，在科学的认识中并不排除错误和迷误，但毕竟存在着借助有效的真理标准即实践去发现和克服这些错误和迷误的可能性。再说，虽然实践并不取消对科学论断、科学理论等等的真理性的补充标准进行探讨的必要性问题，但理论认识、科学认识的结果只有在实践进程中受到彻底检验。

通过对唯物辩证法的原则、规律、范畴、概念的探讨，到七十年代初，波兰已经具备了撰写从结构上完整表述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性著作所需要的实际理论前提。上面已经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九七六年）教科书首先就是这样的著作。在这本教科书中，辩证唯物主义被看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包括传统称作本体论（关于存在的科学）的那些哲学知识领域，也包括构成认识论对象的那些哲学问题。作者们认为使

用“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名称是合理的，并强调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相互联系。它们之间的相对的差异是由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两个部分的研究对象的性质造成的。属于本体论的对象的是存在的最一般的问题，即现实的本质、性质和结构的问题。整个现实的运动和联系的一般规律性，它的变化和发展，也属本体论的研究范围。而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过程和结构、人的认识活动的结果的学说。世界的可知性和认识的来源问题，一系列同研究取得关于人周围的自然界和社会现实的正确知识的形式和方法有关的问题，也属它的对象。

有关辩证逻辑的理解问题更为复杂，因为人们通常把辩证逻辑不是同辩证方法论混为一谈，就是同整个辩证法混为一谈。拉多什在《辩证唯物主义》（一九七三年）一书中提到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研究，并强调指出，研究辩证逻辑是应当的和必要的。按照他的意见，如果把作为辩证法的形式的辩证逻辑理解为“研究那些表现在获取正确知识过程中的概念思维规律以及以这些规律的知识为根据的概念运用规则的理论，那么辩证逻辑就是获取知识过程中的概念、判断和判断系统的发展的一般理论，以及同这个理论相联系的认识方法”㉓。

上面列举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的定义是波兰书刊中最流行的。这些定义写进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以及高等院校系统的教学大纲。哲学家从这些立场出发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辩证方法使我们能够区分各专门学科的方法之间的界限，正确地评价和利用它们的成果。同时维护这样一个思想：辩证方法使我们可以把各门科学的成果结合成完整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被绝对化为“万能逻辑”的实证主义的“万能”认识模式，还是力图把唯物辩证法变成特种“封闭模式”的各种假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方法论结构，都不能代

替具有认识论功能、逻辑功能和方法论功能的唯物辩证法。这种企图在七十年代是为一批所谓认识方法论者所特有的。

在最近十年，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Т. М. 雅罗舍夫斯基、Я. 拉多什、С. 拉因柯、З. 查茨柯夫斯基、С. 柯吉尔-柯瓦尔斯基、Т. 门德尔斯基、Д. 塔纳尔斯基等[24]，研究了哲学、意识形态、世界观的相互关系问题，对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概念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Я. 拉多什强调指出，整个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和大多数当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是它们的职能的矛盾性。当代天主教哲学就是一个例子，它好象是积极地利用当代科学材料，但同时宣传对世界的反科学观点。近几年天主教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卖力地宣传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分离的思想。拉多什指出，他们中最极端的人建议把世界观理解为有关世界结构和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一般的科学哲学原理、人关于他对“超自然问题”的态度的观念的体系，而且世界观应当不依赖于政治。按照天主教理论家的意见，意识形态应当是社会政治信念的体系，根据不依赖于哲学的政治观点进行的社会活动的纲领。结果成了这样：“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核心）是某种不依赖于实践和政治的东西，而政治观点（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同哲学没有联系”[25]。天主教理论家的主张把我们推到马克思以前的立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要求辩证地、具体历史地分析每一个现象。С. 拉因柯、Я. 拉多什强调指出，以为哲学、意识形态、科学和世界观的相互关系可以通过这些术语的字义的推断来说明，而无须考虑这些社会意识形式发展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联系，这是天真的。如果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区别不太明显，那么不同时代的哲学同现代理解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则是无疑的。如果说不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流派的

特点有一个统一的主要政治倾向性，因而可以把它们统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那么形形色色主观唯心主义的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和假唯物主义的哲学派流和学派等等，则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根据。

不能“一般地”、“抽象地”提出关于哲学的对象和哲学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因为它们不是作为“独立的现象”存在的。谈论一定时代的哲学，它同一定时代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等等，才有意义。正确地反映现今时代的真正科学的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统一的科学体系相一致的还有它所肯定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Я．拉多什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今天可以在原则上与意识形态或共产主义世界观等同起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政治倾向性同哲学的科学性，同时同哲学包含的改变世界的倾向性和政治原则是含义相通的。”[26]但是，这种“同一性”不能理解为取消上述社会意识形式的差异，也不能理解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Я．拉多什建议给意识形态下定义为对道德、宗教、法、政治、科学和艺术的观点的严整体系，而不是上述社会意识形式的一种“总和”。哲学是这些观点的理论上的联系环节，而划分为一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人们的社会政治立场是形成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声明自己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联系，声明它的事业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是改变世界。T．M．雅罗舍夫斯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诞生时起就具有的革命倾向性称为哲学“不故弄玄虚”的意向，因此“不能把‘哲学的自我意识’同人们的实际生活对立起来。哲学应当成为自由、革命批判和革命行为的捍卫者”[27]。C．拉因柯强调指出，既然马克思主义对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发现本身是这种必然性的表现，那么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来临的规律

性不是脱离和不依赖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社会效果而存在的。这一思想是这种规律性的实现的组成部分，而不只是它的社会结果或者认识论上的复写”㉘。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阶级性原则列入对科学哲学的论证之后，对认识过程的社会决定的分析同逻辑方法论的观点一起成为科学的论证和发展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的牢固组成部分。T．M．雅罗舍夫斯基强调指出，把阶级性原则从哲学知识的科学性的论证中排除出去，会违背下述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具有社会性，认识的参与者不单纯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人类社会，这个社会划分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活动的并由共同的阶级利益联合起来的、对人的认识活动发生重大影响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和集团。因此，当修正主义者和叛徒Л．科拉科夫斯基以“青年马克思”的名义宣称科学的思维似乎纯粹是“在认识中创造世界”，在这种“创造”之外不存在其他从主体加以考察的情况时，他是歪曲马克思的真正观点的。雅罗舍夫斯基在批判科拉科夫斯基和其他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时强调说，正是马克思在评述一系列证明一定社会阶级和集团的意向使得对现实的看法被扭曲变形的历史事实的同时，又指出了另一些表明阶级斗争导致对现实的更加准确认识的情况。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同彻底破除资本主义现实的神秘性和认识支配这个现实的真正机制最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社会力量。

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入科学世界观的阶级性和党性的原则，促进科学知识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承认或者否定新的思想和理论体系问题的历史关头。最反对这一原则的是波兰的实证主义者、新实证主义者以及持实证主义观点的修正主义者。这种倾向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开始在波兰流行起来，例如，在З．鲍乌曼和Е．Е．维亚特尔的论文《马克

思主义和现代社会学》（一九五一年）中，在Я．库布斯基的论文《关于哲学基本任务的怀疑论思想》（一九五六年）中、以及在上面已经提到的Б．巴契柯、Л．科拉科夫斯基、Е．爱尔施坦等人的著作中。这种倾向的真正目的是“正式”放弃哲学上的党性原则，从而为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渗入马克思主义打开通道。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Я．拉多什、С．柯吉尔-柯瓦尔斯基、Т.М·雅罗舍夫斯基、Т．门德尔斯基、Л．塔纳尔斯基和其他许多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揭示了实证主义观点和修正主义观点的荒谬，按照这些观点，似乎阶级性和党性的原则在科学认识的前进运动中“起不了”有效作用。Л．塔纳尔斯基在自己的著作中㉙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家的观点时指出：在科学发展的关键时刻，“中立的”立场具有阶级性和党性的形式。意识形态的斗争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但是，如果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公开承认他们的理论体系的“党性”和“阶级性”，那就意味着他们自己承认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是剥削者的保护人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反对者。可是他们当中谁也不愿被认为是奴役制度和黑暗势力的拥护者。所以，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更方便、更有利。列宁早已证明，只限于确认事实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是它描述的现状的维护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是真正的科学的客观性，而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归根到底会成为对实际现象和科学材料的主观主义解释。

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波兰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任务是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活动的基本动因。在这里，研究社会发展理论领域中的列宁的哲学遗产，研究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经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早在战后头十年，历史唯物主义的

方法论已被用于分析从人民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波兰工人党和以后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材料和文件，对研究适合于波兰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原理具有头等意义。上面已经指出，波兰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运用了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列宁"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形式的丰富性和途径的多样性"[30]的思想，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阶段性观点。在党的文件中，特别重视波兰人民政权的独特性，同时强调必须深刻掌握苏维埃国家在发展人民政权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在战后头几年建立的人民民主被看作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波兰劳动人民政权的新形式，它"在已经形成的条件下以最好的方式……"保证"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31]。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的材料中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问题，其中除明确规定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外，还向社会科学家提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任务。在集体和个人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C. 查瓦特斯基、H. 柯洛梅奇克、M. 萨多夫斯基、P. 哈拉巴等人的著作）[32]中试图根据波兰的条件把列宁的社会发展理论具体化。

有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等等逐渐开始转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问题[33]。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对传播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起了一定作用的有：Я. 李特温的著作（《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一九五二年；《谈谈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问题》，一九五二年；《论民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九五三年；等等），Я. 谢潘斯基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若干著作中的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九五二年），Я. 丹涅茨基的著作（《当代波兰的阶级、阶级过程和阶级政策》，一九五八年）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五十年代初一批青

年社会学家开始自己的研究活动，在他们的文章中也给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以一定的注意。

但是，仍然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首先表现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理论、哲学修正主义和政治修正主义没有进行有力的批判，对于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相互关系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没有经常展开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

在战后时期（包括一九四九——一九五四年），农业经济研究所为开展具体的社会学研究作了最初的尝试。对农村社会结构，特别对所谓邻里贷款问题开始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对波兰工人阶级、青年工人等等的形成问题开展了社会学研究。但五十年代中期以前还没有一份社会学杂志，而从前的社会学教研室改名为社会思想教研室，主要研究社会学说史，学院式地介绍西方社会哲学观点，分析国外某些社会学家的观点。

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波兰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辩论，不是仅仅涉及有没有必要发展具体的社会学研究，用不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等等术语，而首先是要阐明这些概念的内容以及它们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出现了把社会学解释成“意识形态上中立的”科学的消极倾向，例如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渗透”思想的拥护者写的文章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同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学结成“联盟”的思想，在Б．巴契柯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前程》一文（载于《二十世纪的哲学和社会学》文集）[34]中得到了纲领性的表述。该文断言，哲学和社会学的党性概念，对不同倾向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合作来说，是不可取的。

某些哲学家在维护社会学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权利时，往往贬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方法论的作用。Ю．霍赫菲尔特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一九六三年）和M．基尔绍维奇的著作《社会学的对抗》，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例如，霍赫菲尔特建议，不仅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完全分开，而且从“不属哪一方的不偏不倚的研究者的超意识形态立场”㉟出发进行社会学研究。不加批判地运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加深了贬低历史唯物主义作用的倾向。这种折衷主义的拥护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运用”具体研究的方法。这表现了他们不懂得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对社会现实各个现象的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之间的一致和差别。在以后年代C．柯吉尔-柯瓦尔斯基、Я．拉多什等人批判了这种倾向，指出，不依存于阐明社会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的“纯粹的”社会描写技术是没有的。

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历史唯物主义遭到来自修正主义者П．科拉科夫斯基、Б．巴契柯、З．鲍乌曼、P．季曼特的攻击，他们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的科学意义。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主义取消派的态度没有受到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及时回击。只是过了很长时间，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三年之间，这些倾向才受到原则性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逐渐形成了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截然分开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不否定社会学的独立意义，不否定它在对社会现实的不同层次的研究中的作用，同时继续探讨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可是某些作者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创造性地探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任务，走上了对马克思关于历史过程的实质、个人和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观点“重新解释”的道路。

从六十年代后半期起，从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能动主义立场出发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开始流行起来，只要细细考察一下就

可以发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能动主义的”解释的基础，实际上是这样一种错误提法：或者是绝对的决定论，或者是意识的绝对的能动性。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能动主义解释的拥护者，通常援引A．葛兰西批判马克思主义中的“宿命论倾向”的有关言论，援引Д．卢卡奇的某些著作或者“实践派”的观点。З．鲍乌曼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概论》（一九六四年）一书中第一个在波兰提出了同马克思主义在对人的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解上的“机械论解释”相对立的“能动主义解释”。在他之后，E．E．维亚特尔在《社会。系统社会学引论》（一九七一年）一书中已经讲到在马克思主义中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学派”——“决定论的”学派和“能动主义的”学派。他把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卢森堡等人列入前一个学派，认为后一个学派的拥护者是列宁、拉布里奥拉、葛兰西、卢卡奇等人。他认为，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多半持‘能动主义’的观点，而后来则持‘决定论的’观点”[36]。维亚特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上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关于这一点，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中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例如，Я．拉多什在《特殊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九七五年）一文中指出，维亚特尔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一九七三年）一书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和平共处”的立场写的。维亚特尔不加批判地搬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原理并把它们归入历史唯物主义，结果把党性、阶级性、辩证法等等原则勾销掉了。[37]

E．托波尔斯基企图“保卫”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宿命论和唯意志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能动主义”提出另一种看法。在《能动主义的历史过程观》（一九七二年）这部著作中，他把“能动主义”解释成一种同宿命论相对立的东西，一种他称之为

人类行动的“辩证法”的东西。实际上托波尔斯基所强调的“人的主观性”的创造力，是反对马克思以前的庸俗唯物主义的论据，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据。Я. 库钦斯基在《人是创造者：人的辩证法绪论》（一九七六年）一书中又把“马克思主义的能动主义”说成是对实践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理解上的一种独特的“造化说”，并把它同“‘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命题的机械的非历史的解释”[38]对立起来。他只是用“造化说”这个更成问题的术语来取代“创造”这个术语，而在其他方面则实际上赞同“抽象人道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的作用的众所周知的意见。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创新”观点时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具体化，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过程观的原则。这表现在Я. 拉多什、C. 柯吉尔-柯瓦尔斯基、З. 查茨柯夫斯基、Т. М. 雅罗舍夫斯基、C. 拉因柯、C. 奥巴拉、E. 拉迪卡的著作和许多集体著作中。好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教科书和参考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作了探讨。

Я. 拉多什和C. 柯吉尔-柯瓦尔斯基对历史唯物主义结构的哲学理论原则作了完整叙述并确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它与社会学的关系。他们在合写的著作《辩证法和社会。历史唯物主义绪论》（一九七四年）中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关于历史过程的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并分析了广泛的问题：社会及其发展的辩证法的概念，社会的结构和各组成部分，社会经济形态和劳动的范畴，社会规律、国家和法的问题。

柯吉尔-柯瓦尔斯基在自己的著作中[39]，彻底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所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于，马克思主义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功能、方法论功能、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功能统一的角度来观察社会生活现象，表

述实际行动的任务，不掩盖自己的评价性的判断并把科学概念同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利益联系起来。柯吉尔 柯瓦尔斯基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指出，每一门专门社会科学都有特殊的研究方法，同时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这样一些原则的总和来利用，这些原则会开辟新的理论前景，保证关于现实的新知识的获得，在或大或小程度上影响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理论的变化和发展，结果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3．查茨柯夫斯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概念》（一九七四年）一书中对社会，人，劳动的起源和发展方向，社会意识的内容、形式和功能，阶级斗争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内容的研究。他根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材料，指出生物心理的、个人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分析法之间的区别，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的方法论的作用和意义。但是书中没有考察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最重要的范畴，因此作者想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概念的实质的意图没有完全实现。

C．奥巴拉、E．拉迪卡、C．拉因柯的著作在很多方面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象的明确化[40]。例如，C．奥巴拉根据当代波兰的和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一九七八年）一书中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关于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动力的科学和认识社会现象的方法论，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过程观。他分析了社会经济形态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意识及其形式、意识形态和价值、意识形态斗争、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对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宗教的批判等问题，指明了研究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发展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从生产方式和社会上层建筑之间产生的辩证联系的总和来考察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即它所具有的

基本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制度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类型，是从这些联系中产生出来的。

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在社会学家的著作中起着重要的方法论作用。在书刊中对社会形态的认识论地位进行着讨论，就是说，是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本身具有认识内容呢，还是说它只是一种抽象公式，是供各门社会科学获得的关于不同社会的现实历史发展的知识同它作对比用的。Я．谢潘斯基这样说明这个理论的方法论意义:“社会经济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来说是个观察‘单位’、进行研究和社会学概括的基本对象…… 社会形态理论给社会学提供明确的研究对象，使注意力放到社会制度的本质因素上，并使社会发展的科学分析成为可能。列宁在评述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的重要性时强调的正是这些因素…… 因而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对象。”㊶

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被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看成是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革命理论、社会意识、社会进步理论的基础。㊷在C．柯吉尔 柯瓦尔斯基、Я．拉多什、Т．门德尔斯基、Е．拉迪卡等人的著作中㊸，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哲学观点，分析了阶级意识在“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过程中的作用，阐明了工人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使命，指出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方法。例如，Т．门德尔斯基强调指出，“阶级斗争理论从社会的整体分析中分离出这样--些社会结构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制约着社会结构的其他因素，而且对一般社会结构、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其他因素的存在和性质具有基本意义。”㊹社会学家C．维德什比尔、Я．谢潘斯基等人也在自己的著作中研究了那些在包括波兰工人阶级在内的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结构中引起重大变化的社会发展新过程。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积极参加了有关“当代工人阶级”、

“阶级界限”概念的定义的国际讨论，批判了所谓工人阶级“消失”,工人阶级“丧失”自己的革命本质等等资产阶级观点。

在七十年代，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研究这样一些题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个人的理论的哲学基础，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关于人的观点，科技革命对个人发展的影响，社会主义个人形成的前景，等等。在T．M．雅罗舍夫斯基、K．奥布霍夫斯基、З．查茨柯夫斯基、T．达什凯维奇、E．柯萨克等人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思想：只有从辩证唯物主义学说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揭示社会和个人发展的相互制约性。T．M．雅罗舍夫斯基在《个人和社会》（一九七〇年)、《对实践的思考》（一九七四年)、《对人的本性的思考》（一九八〇年）这几本书中从社会的客观规律性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受不断发展的具体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制约的，揭示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关于人的观点的错误，指出这些观点超不出在“自由选择”、“两重化意识”、“异化”等等问题上的抽象道德说教。

雅罗舍夫斯基批判了断言个人是个根本“不能交往”和“不可知”的形而上学秘密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具体科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等）的研究成果，把个人看成是相对稳定的整体结构。他从个人与周围世界的各种关系，首先从个人的实践活动方面来确定个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个人的结构体现在行动、行为中，对象化中，人与人的接触中。正是由于个人的活动，他的结构才是可知的。无论根据一般理论分析的水平，还是根据具体科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化理论等等)的水平，这种认识都是可能的。所以雅罗舍夫斯基指出，必须综合性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个性理论。他在分析“个人——社会”的关系时把研究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发展条件问题列入个性

理论的内容。按照他的意见，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任务是：批判地克服那种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个性理论和关于人的哲学观点是否有科学根据的企图；根据在一系列国家实际存在的并在顺利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具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全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人、个人、人道主义问题的理论原理，并加以具体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个人的真正解放只有通过对历史地形成的、个人借以成长起来的具体社会关系进行革命改造才有可能。正确地确定社会同个人的相互关系，确定阶级、社会集团、集体的利益同优先考虑社会利益条件下的个人利益的关系，是个重要的方法论任务

波兰哲学家在解决这一任务时，求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遗产。例如，雅罗舍夫斯基指出，马克思已经证明，个人只有在相应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能发展，同时他是具有自己所特有的特征的个人。雅罗舍夫斯基在揭示内部的和外部的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时，试图一方面说明人为自然界和社会环境所决定，并指出，人在活动产品中的对象化是通过人的主体活动的目的和动机实现的，而不是离开主体活动实现的；另方面指出，个人本身对社会条件的影响依赖于社会关系的类型，也依赖于他的经验、意志力和性格。个人的行为从来不是单纯受心理活动的结构制约的，同样，也不是单纯由社会影响决定的。其他的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坚持有关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这种观点。

在分析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个人成长途径方面，波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取得了重大成果。Ю．邦卡的著作[1]在研究技术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批判资产阶级未来学方面，占有突出地位；在T．M．雅罗舍夫斯基的著作中，在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著

作[47]中，对技术在未来的人的成长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科技革命及其对个人成长的影响的不同方面，在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研究文化、教育、历史问题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人的问题的研究者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仅不应当回避对科技革命的后果的分析，相反地，它作为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应当成为在技术发展，技术干预人周围的自然环境、干预人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方面进行社会控制的理论基础。

可是七十年代除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取得某些积极成果外，对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的解决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没有坚持党的原则性。这涉及对已经达到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总的评价及其特点的确定，对波兰社会中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和思想、世界观的矛盾的忽视，一方面对当代新现象解释上的尚未根除的教条主义观点，另方面对“左”的冒牌创新活动采取调和主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十三次全会强调指出：“修正主义产生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教条主义则产生保守主义和关门主义。前者和后者虽然从不同的方面出发和挂着不同的招牌，但都采用蛊惑宣传，都造成同样的后果：削弱党，削弱党的影响和同劳动者的联系。”[48]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在波兰党的第一次全国思想理论工作会议（一九八二年）上，批评了对七十年代波兰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的估计不足。要对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做出全面评价，对波兰社会主义发展现阶段做出明确规定，不深入地辩证地洞察人民波兰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不可能的。现在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正致力于完成这一任务。

四、对伦理学和美学问题的研究

社会主义改造和新社会的建立，对社会主义个人的教育形式

的探索，迫切地要求在整个战后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确立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和规范。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活动方向过去和现在都遭到来自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力量方面的反抗。在伦理学问题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克服不少困难，这些困难不仅同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有关，而且同反对过去曾占统治地位现在还在广泛流行的、一直妄想取得独立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非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斗争任务有关。在这些学说中间，从社会政治观点来看特别活跃的是那些在天主教哲学和宗教、现象学、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轨道上产生的伦理学观点。

虽然上述非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流派通常只限于抽象地考察道德的起源问题、伦理学的范畴和概念、道德规范和原则的内容，但它们提出的思想的社会影响却越来越强烈。一定的道德准则已经深入到几代波兰人的意识，它们通过家庭、天主教堂、出版物和旧学派的权威人士等等继续影响已经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几代波兰人。这种影响在战后头十年特别强烈，因为它没有受到人数还很少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的应有的反击。里沃夫—华沙学派的代表，特别是T. 柯塔尔宾斯基，试图创立独立的世俗伦理学作为已经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波兰条件下的道德理论，这些尝试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柯塔尔宾斯基的“自主伦理学”及其“效能学”，塔塔尔凯维奇的“世俗伦理学”及其“个人信念哲学”，奥索夫斯卡娅的“道德科学”及其“道德准则分类”——所有这一切都是典型的有关“超阶级的”、“无党性的”道德理论的空想，它们妄想“永恒”存在而又不同现实生活发生冲突，但在建设波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它们不过是软弱无力的道德说教和抽象的理论空谈。同时，这些伦理学说，例如T. 柯塔尔宾斯基的伦理学说，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学识渊博、对各个

伦理范畴、概念等等研究细致。在这一方面，波兰进步伦理学家的研究经验在培育新一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的过程中被广泛运用。

波兰社会主义的建设决定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导致伦理学问题的提法本身和实际道德问题的研究发生重大变化。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八年期间，存在着修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则的企图，当时特别尖锐地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著作的缺乏。从六十年代后半期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者越来越活跃。出现了M。弗里茨罕特、M．米哈里克、C． 卓尔登霍夫、Г． 马斯林斯卡娅、P． 叶泽尔斯基、X． 扬柯夫斯基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分析作为哲学科学的伦理学的对象和特征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研究伦理学的范畴和概念。对伦理科学的研究不再是单个人干的事情；在华沙、克拉科夫、托伦、弗罗茨瓦夫、卡托维兹出现了研究集体。学者们分析了广泛的伦理学问题：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自由、平等、正义的道德方面；波兰社会及其成员的道德意识的形成问题；一般伦理学和职业伦理学的相互关系问题，职业规范和职业的社会作用的问题；对资产阶级、天主教和修正主义的道德影响进行斗争的迫切问题。

波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写成了一些教课书、教学参考书和讲义，特别是《伦理学》（一九七三年第一版，一九七五年第二版)、《伦理学和共产主义教育原理》（一九七四年)、《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问题》（一九七四年）等著作。在上述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九七六年）这本教课书中，强调伦理学是哲学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六十年代起，伦理学家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遗产，

这有力地促进了波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驳六十年代在波兰广泛流行的那种主张必须用存在主义、“伦理社会主义”等等的道德伦理结构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时，对马克思的伦理学遗产、列宁的共产主义教育理论的伦理学含义作了细致的分析。

M．弗里茨罕特写的《青年马克思的伦理学观点》（一九六一年）一书，无论对批判所谓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不成熟的修正主义思想，还是对正面研究一系列伦理学原则和范畴，都作出了贡献。在那些年代，主张对马克思的伦理学观点作决定论解释的人同主张作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解释的人之间发生了争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制约性的理论同人的自由、自我肯定、选择自由等概念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弗里茨罕特发挥了这样一个思想：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人的幸福生活就是最高的幸福；社会人的完善化是社会发展的标准；在社会发展中人的自我肯定原则和人的社会化原则是相互制约的。这个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诸问题》（一九六六年）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弗里茨罕特在书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把一切人的自我实现，而不是把一伙人或社会的一部分的自我实现看作最高幸福。他所说的自我实现是指个人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和个人需要的充分满足，首先是满足“非强制的、自愿的创造性劳动的需要，在这种劳动中，人的个人能力得以发挥和表现……只有按照自我实现原则生活，人才不断地自我完善，成为最高的价值，确立自己的人的尊严，并获得幸福”[1]。与非阶级的幸福观和社会道德观相反，弗里茨罕特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幸福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每一个个人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同全社会的利益恰当地和谐地结合起来

在《元伦理学的主要问题和流派》（一九七一年）一书中所考察的伦理科学的结构中，他建议区分出：道德的哲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或者说道德的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伦理学说史。按照他的意见，他建议的结构可以对多种多样的伦理学问题进行划分，但是要做许多确切规定，特别是对"道德哲学"、"规范伦理学"的概念要作确切规定，还要说明"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关系。弗里茨罕特在"元伦理学"范围内考察的问题（道德内容的确定、道德中的真理、伦理学判断的论证，这些判断的本性和特点），从专业观点来看，无疑是有意义的。可是，把"元伦理学"概念运用于科学、尤其运用于实践的建议，是有争论的。

M．米哈里克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因用俄文出版的《社会主义道德发展的辩证法》（一九七八年）一书而为苏联读者所熟悉。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强调指出，只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才能说明和预见人和整个社会的道德的形成过程。米哈里克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立场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伦理学观点和道德观点进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X．扬科夫斯基、C．卓尔登霍夫、C．叶德纳克等人的著作也论述了波兰社会的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形成、集体主义原则的确立的问题。波兰伦理学家特别注意研究被他们归入规范伦理学内容的那些问题：道德规范和准则的特点（X．扬科夫斯基、M．米哈里克、M．弗里茨罕特）、善、义务、自由和责任心的内容，生活的意义（M．弗里茨罕特、M．米哈里克），行为的规范调节的规律性（X．扬科夫斯基等）。他们积极研究职业伦理学的问题（Г．马斯林斯卡娅、M．米哈里克），职业规范的问题（X．扬科夫斯基、M．弗里茨罕特），社会准则和病态现象的问题，对资产

阶级和天主教的道德的批判问题（Ю．凯勒尔、E．柯萨克、M．弗里茨罕特等）。

尽管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成就，但对伦理科学迫切问题的研究，对社会主义道德形成的实际问题的研究，落后于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这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的。许多著作中存在着客观主义、背离党性和阶级性原则的现象。对七十年代盛行的“新市侩的理想、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世界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立场、各种社会民主主义的、教权主义的或法西斯化的意识形态”[50]，实际上没有进行有力的批判。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本身之间，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明显感到缺乏原则性的辩论。这一切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研究之间的分界线的抹煞，结果常常出现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折衷主义。在一系列道德教育的原则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把意识形态的战场实际上不经战斗就让给了自己的天主教“论敌”。

如果说最近十年社会主义道德的普及宣传工作削弱了，那么对天主教意识形态不能这样说，它不断地往社会意识中灌输一种要人们把“不信神的”社会主义国家看作自己的主要敌人的政治上危险的神话。反社会主义集团的首领们支持这条路线，也往群众意识中灌输一种说什么可以在波兰建立某种小资产阶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制度或者天主教人民共和国之类东西的神话。

官方宗教及其专职人员以宗教信仰“非政治性”为幌子，继续公开从事政治宣传。波兰统一工人党，特别在民族和解的形势下，从来不从政治观点把波兰社会划分为信教者和不信教者，这是另一回事[51]。但是，不能不看到信教者本身同作为政治力量的天主教职业思想家之间的区别。

波兰党的第一次全国思想理论工作会议（一九八二年）指出，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近几年来在帮助居民确立思想道德立场和无神论立场方面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软弱的助手。“波兰摆脱危机的条件，以及顺利对话（对话中党应当是不掩盖自己思想面目的伙伴）的条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妥协，而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彻底实现。”[92]

从人民政权存在的一开始起，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懂得，民族文化传统、文学、艺术等等，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的确，马克思主义在推广社会主义的文化典型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作用，他们努力确立整个艺术文化和美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内容，通过文学和艺术的手段创造社会主义的精神财富。但是，许多研究文化、艺术史等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经常妨碍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传播和确立，他们散布同树立社会主义理想相矛盾的观念。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波兰成长的复杂过程，是在同资产阶级美学的艺术创作观点，同国内非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人物的美学理论的不断冲突中进行的。这些代表人物中有P. 英加尔登、B. 塔塔尔凯维奇、X. 爱尔森贝格、C. 奥索夫斯基、M. 瓦里斯，他们的艺术科学的权威是被长期公认的。在战后年代，这些权威的影响依然强烈，但毕竟有人开始对他们的一系列美学观点提出一些方法论上的和社会政治上的异议。

一九四九年前，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在大学之外，通常是在艺术评论中发展的。一九四九——一九五五年间，开始探讨艺术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出现反对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这种颓废派的第一批言论。在这一时期也出现探讨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第一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期刊的创办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五〇年开始出版一份研究艺术的理论和历史、艺术评论和艺术方法论问题的专门杂志，一九五六年改名为《艺术和评论》；一九五六年开始出版《美学》杂志，一九六四年改名为《美学研究》。

五十年代后半期起，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出现非常活跃的现象。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渐从艺术评论问题的探讨转到一般理论的、历史的和方法论的研究，开始更积极地反对非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些流派依然相当强大（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英加尔登为首的现象学倾向，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是 B.塔塔尔凯维奇的方法论观点），并且有新的流派（语言学——语义学派和圣像学派）补充进来。他们继续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美学遗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实用艺术理论的问题。

在最近十年，美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圈子扩大了，他们中间最知名的有：Б．泽米多克、C．克舍门奥雅克、E．柯萨克、C．帕祖拉。在华沙、克拉科夫、波兹南、罗兹出现了研究集体。

对美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兴趣提高了，特别在说明文化过程时，以及在探讨艺术现象、美学的概念和范畴、哲学和美学的相互关系、美学的对象和方法、美学和其他科学的相互联系、美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同哲学方法论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时，这种兴趣提高了。C．帕祖拉（《关于鉴赏力概念的研究意义的札记》，一九七四年）和C．克舍门奥雅克（《预测——美学的问题》，一九七四年）对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著作中重视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美学遗产。C．帕祖拉的著作《马克思和德国古典美学》

（一九六七年）、E. 柯萨克的著作《列宁和文化》（一九七一年）、C·克舍门奥雅克的文章《列宁和艺术》（一九七〇年）、Л·杜列克的著作《文化和革命》（一九七三年），是闻名的。杜列克在自己的书中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针对社会发展问题对悲剧所作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艺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写了好多著作来研究这个问题。C. 杰姆斯基在《艺术和艺术文化的阶级性问题》（一九六七年）这部著作中考察艺术作品的阶级性问题时，重视作家、艺术家同一定社会环境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和心理学的联系，认为这种联系是影响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性质的因素。按照他的意见，在现代社会中艺术的内容方面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性质，不管作品是从哪个方面——心理学的、伦理学的或者生产的方面——对人物的命运进行考察的。艺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介入社会生活，成为社会意识的形式之一，成为对当代人进行美学教育的基本形式之一。

《艺术和社会》这部集体著作反映出波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批判思想的一定水平。作者在第一卷（《艺术拯救》，一九七三年）中批判了“艺术拯救人”的资产阶级美学观点，指出那些建议当代人把艺术作为医治一切社会祸害的法宝的西方美学家的方法论观点是无济于事的。在第二卷（《艺术的创造职能》，一九七六年）中，作者试图解决三大类问题：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艺术，艺术作品的职能，基本美学范畴。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有关美学史的著作的特点是，对过去的不同观点作比较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对美学的任务、职能和范畴的看法同这些观点作对比。C. 帕祖拉的著作《马克思和德国古典美学》（一九六七年）、Л. 杜列克的著作《卢那察尔斯基的哲

学人类学和美学》（一九七三年），就是这样。同时，在C．杰姆斯基的著作《论二十世纪波兰美学思想中的心理主义的主观主义》（一九六八年）、B．卡林诺夫斯基的著作《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波兰美学中的社会学流派》（一九七三年）中，以及在集体著作《一八九〇——一九一八年波兰美学史研究》、《一九一八——一九三九年波兰美学史研究》、《当代波兰美学研究》（一九七七年）中，积极开展了美学史的研究。

在战后年代，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展美学研究方面，在完善美学研究的意识形态上的进攻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们懂得，文化和艺术应当成为劳动人民首先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斗争中所掌握的武器。但是这个任务没能按照符合社会主义理想的应有的水平完成。今天的波兰文化还背着历史沉滓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最新文化样品的包袱。艺术界和美学界那些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理想的旧知识分子的影响依然存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往往被描写成知识分子本身施加影响的消极对象。文化和艺术在波兰多半还是上层人物、“知识分子的”事情。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发展和传播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上述领域中还没有能够从局部的狭隘的专门性研究转到能够为解决全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任务提出各种实际建议的理论概括。

五、对哲学史和社会思想史的研究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分析的方法论原则，撰写为数众多的哲学思想史和社会政治思想史的著作，看来是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战后时期的整个发展的特征之一。

哲学史和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在五十年代基本上只限于分析过去进步传统的一些代表的观点。例如，在这些年代波兰的马克思

主义者对密茨凯维奇、叶泽尔斯基、柯伦泰、斯塔西茨、兹纳捷茨基兄弟、邓波夫斯基、卡敏斯基等人的民主主义的启蒙观点进行分析。A. 瓦里茨基在评价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时指出:"我同意这样的看法: 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间的著作代表波兰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狂飚'时期，这不可能从我们的财富中勾销。"[63] 就在这些年代第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著作问世了，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波兰本国的产生和发展史领域，只是从六十年代末开始积蓄力量。

从六十年代后半期起，波兰的哲学史家已经为撰写波兰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历史而努力了，这部历史被看作是波兰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部包括七百多年波兰哲学思想发展时期的历史中，在不同时代、在从中世纪到今天的不同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对立的社会思维形式应当得到反映。这些研究的主要成果如下。

在波兰中世纪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突出的一点是阐明它同全欧哲学学说和社会思想史的联系。一九五六年起这方面的工作由先是Я. 列哥维奇、一九六八年起是З. 库克塞维奇所领导的学者集体有计划地进行了。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中，波兰的一些不同哲学倾向和政治倾向的历史学家对中世纪哲学史进行了研究，但有局限性，因为这些研究归根到底是对中世纪哲学家的某种情况介绍。摆在波兰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任务是用崭新的观点来探讨中世纪哲学史。研究的第一阶段是搜集有哲学文章的中世纪手稿并作考证性的加工整理，编新的人物表。

通过这一准备工作，波兰哲学史家编出了内容丰富的资料，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问世的著作有:《克拉科夫大学的哲学史》(一九六五年，З. 库克塞维奇编),《波兰十五世纪的哲

学》（一九七一年，P. 巴里亚奇编），З. 库克塞维奇、Р. 巴里亚奇、Я. 列哥维奇等人的专著。一九七〇年起，哲学史家致力于编辑出版七卷本的波兰中世纪哲学史。[54]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抛弃对中世纪哲学叙述中的陈规，这些陈规或者对中世纪这一哲学知识发展历史时期估计不足，或者相反，夸大它的意义，后者主要是唯心主义历史编纂学代表的特点。这些著作的长处还在于他们揭示了受中世纪社会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中世纪哲学理论观点的思想功能和社会功能。

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文艺复兴时代、启蒙时代和十九世纪的波兰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一系列个人专著[55]和三卷本的著作《波兰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史》（第一卷，一九五五年；第二卷，一九五六年；第三卷，一九五七年）负有盛名。一九五七年开始出版《哲学和社会思想史文库》年鉴（到现在已出二十多卷）。原著以《古典哲学家丛书》的形式和单独的形式出版。

经过广泛的有组织的研究，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有越来越多的论述以往某些思想家的观点和分析整个时代的著作问世。[56]三卷本集体著作《波兰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57]的撰写，是哲学史家取得的重大成就。作者们把哲学和社会思想的历史看作是"意识的形式，因而是波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和波兰精神活动史的一个特殊方面"[58]。他们指出，一八三一至一九三九年这一时期波兰思想家的彼此对立的观点是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一至关重要的总问题的解决相联系的，同时揭示了这个或者那个思想家的观点的优缺点。

应当指出，波兰学者非常重视研究俄国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历史。出版了两部作品选：《一八二五——一八六一年俄国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一九六一年）和《俄国民粹主义的社会哲

学》（两卷集，一九六五年）。出版了俄国杰出思想家别林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的著作。A．瓦里茨基写了好些著作探讨俄国哲学和社会思想史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个人和历史》（一九五九年）、《在保守空想的圈子里。俄国斯拉夫主义的结构和变化》（一九六四年）、《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哲学和社会思想》（一九七三年）。近几年Л．杜列克积极从事俄国哲学和社会思想的研究。他出版了《文化和革命》（一九七三年）一书，在书中分析了“文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对《路标》文集作了详尽的批判，介绍了列宁关于革命和文化的论点，剖析了卢那察尔斯基在文化领域中的活动。E．捷姆金在《巴枯宁与自由的二律背反》（一九六三年）一书中考察了巴枯宁的哲学遗产和政治活动。

马克思主义在波兰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是波兰哲学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在五十年代，这个领域是很少研究的，这些年代出版的一些著作多半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中随意选择一些题目写成的，而且对以往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活动作了片面的评价。例如，A．沙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发展》（一九五〇年）就是这样。对这本书的缺点，波兰和苏联的专家们，如C．杰姆斯基和A．克列夫切尼亚，⑧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五十年代出版了几本分析波兰马克思主义代表的观点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唯一优点是罗列了有关波兰革命运动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广泛的事实材料。至于研究的方法论和对波兰马克思主义遗产的评价，远非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正象《哲学研究》杂志（一九六九年）和《人和世界观》杂志（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组织的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哲学史问题的讨论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波兰的产生及其往后

的近百年的发展，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长期是个很少研究的领域。这一领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缺乏，消极地反映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波兰的传播上。所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史、社会学思想史、伦理学思想史、美学思想史、无神论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领域，在波兰革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史领域，加紧开展科学研究的任务。在这方面已做了一定的工作：搜集、整理和出版了反映马克思主义在波兰产生、发展和传播过程的文献，大量出版了波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的著作。

七十年代出现的有关波兰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著作以及在这些年代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著作，使得完整描述已一百年的波兰马克思主义运动史这一任务的提出成为可能。在这些著作中突出的，有C．杰姆斯基的著作《一八七八——一九三九年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概论》（一九七三年），《“克罗辛斯基派”所理解的社会科学的哲学》（一九六九年）。《波兰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源地》（一九七二年）；还有H．米赫塔的著作《尤里安·马赫列夫斯基》（一九七二年），Я．施梅德的著作《扬·盖姆贝尔。思想和价值》（一九七五年），A．瓦里茨基的著作《斯塔尼斯拉夫·布热佐夫斯基——思想道路》（一九七七年），等等。

C．杰姆斯基的《一八七八——一九三九年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概论》，是关于波兰马克思主义史的涉及问题非常广泛的科学著作。杰姆斯基认为，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诞生和它后来的传播是同波兰革命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同工人阶级形成为独立社会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成为波兰精神文化和波兰革命解放运动的牢不可分的部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波兰哲学家在探讨波兰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史问题的同时，分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的观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思想来源和社会条件。P. 潘纳修克领导的集体集中力量分析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宣传的社会政治条件。哲学家们越来越经常地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发展中的列宁阶段。P. 潘纳修克、T. M. 雅罗舍夫斯基、Я. 拉多什、M. 基姆-库斯特舍巴、C. 杰姆斯基、E. 托波尔斯基等人的著作就是这样做的。[60]

现在没有谁怀疑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研究在波兰十年复十年地积聚了力量。但是不能不看到，随着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力量（天主教历史学家、一部分持“客观主义”立场的波兰历史学家、修正主义者以及反社会主义小集团社会自卫委员会、保卫工人委员会、独立波兰委员会等的首领）感觉到党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和社会思想史家的意识形态进攻已经减弱，历史题材、特别是波兰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民族传统和历史，越来越成为尖锐斗争的场所。波兰的反革命势力选择和宣传这样一些“传统”和事实：它们归根到底助长反社会主义情绪，促使波兰工人运动瓦解、工会分裂、国民社会意识分为社会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助长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歪曲。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指出在利用历史传统来为波兰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服务方面存在严重落后现象，指出决不容许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强调指出：“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是意识形态斗争特别是同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同右派集团恢复名誉的企图及其使国家倒退的政治观点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方面。”[61]

为了改善波兰革命工人运动产生和发展史、波兰马克思列宁

主义诞生和传播史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决定成立专门研究集体从事这些问题的研究，并通过了用波兰文出版列宁全集的决定。

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并不取消一般规律的作用。B．雅鲁泽尔斯基强调指出："波兰发生的事情证实这样一个论点：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时对本民族的条件缺乏创造性的负责的态度，都不可避免地造成歪曲和困难，这些东西很快会被国内外的社会主义敌人利用。"[32] 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和特点，有助于根据社会发展一定阶段形成的具体历史条件采取社会主义措施。

在波兰社会的困难时期，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作用特别有力地表现出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十三次全会强调指出："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并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结成兄弟同盟的波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社会主义和和平力量的强大阵线的可靠环节。我们捍卫社会主义并反击对波兰国际政策原则、对我们同盟的攻击，从而证实了这一历史选择。"[33]

---

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430页。

2 Б．贝鲁特《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4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6页。

3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思想基础》1949年华沙版第50页。

4 同上，第143页。

5 K．奥霍茨基《关于哲学争论》1978年华沙版第195页

6 关于波兰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四——一九六四年期间的出版工作情况详见：《一九四四——一九六四年波兰社会变革过程：图书目录》1967年华沙版。

7 《哲学思想》1956年第1期第110页。

8 K．奥霍茨基《关于哲学争论》第193页。

9 《新路》1954年第52页。

10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1页。

11 Г．M．雅罗舍夫斯基《人民波兰三十年来哲学研究的发展》，载于《哲学研

究》1974年第7期第9－10页。

⑫ Л．И．费多谢耶夫《从苏共二十六大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看社会科学的迫切问题》1982年莫斯科版第16页。

⑬ 参看：Я．柯尔钦斯基《自由欧洲》1970年华沙版，《什么是趋同论?》，载于《意识形态和政治》1970年第1期第49—57页；《在同反共产主义斗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波兰代表团在1970年1月莫斯科理论会议上的报告》1970年华沙版；波梅卡沃《趋同论的根据是什么和为什么服务?》，载于《教育》1970年第10期；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中隐藏着什么》，载于《自由战士》1971年第44期。

⑭ Я．拉多什《关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渊源和特点》，载于《通报》1968年第11—47期；С．杰姆斯基《"科学主义者"和"人类学者"》，载于《人和世界观》1969年第1期；Я．拉多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现代形式》1965年华沙版；Г．М．雅罗舍夫斯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不是科学主义者》，载于《哲学研究》1971年第2期。

⑮ Я．拉多什《现代修正主义的渊源和特点》，载于《通报》1968年第11期，《马克思主义与科拉科夫斯基的哲学观点》，载于《人民论坛报》1968年4月13、14、15日；С．杰姆斯基《"科学主义者"和"人类学者"》，载于《人和世界观》1969年第1期；Г．М．雅罗舍夫斯基《对实践的思考。关于卡尔·马克思的哲学的解释》1974年华沙版。

⑯ 《人民论坛报》1981年4月19日。

⑰ 《新路》1981年第5—6期第207页。

⑱ 这个思想是В．伏德尔在《高等逻辑的产生》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有可能在Я．卢卡塞维奇的研究，特别是他的三位逻辑的基础上创立"形式的辩证逻辑"。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П．基柯夫斯基表示赞同上述观点，他在《论某种非卢卡塞维奇式的三位演算》（一九七二）这部著作中试图提出关于辩证逻辑的最重要联系的形式逻辑观念。

⑲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30页。

⑳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1961年华沙版第74页。

㉑ Г．М．雅罗舍夫斯基在《对实践的思考。关于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解释》（1971年莫斯科版）一书中分析了"抽象人道主义者"所固有的这类倾向的内容。

㉒ 参看В．梅鲍姆《标准的和非标准的社会实践观》，载于《历史主义发展研究的理论前提》1977年华沙版第152—160页。

㉓ Я．拉多什《辩证唯物主义》1973年华沙版第87页。

㉔ Я．拉多什《哲学的对象及其社会作用；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1975年华沙版；C．拉因柯《意识和历史》1978年华沙版，《意识和决定论》1981年华沙版；Г．门德尔斯基《卡尔·波佩尔是方法论学者还是思想家？》1978年华沙版；Д．塔纳尔斯基《难道哲学是必要的吗?》1973年华沙版。

㉕ Я．拉多什《哲学的对象》第46页。

㉖ Г．同上书，第49页。

㉗ Т．М．雅罗舍夫斯基《对实践的思考》第30页。

㉘ С．拉因柯《意识和决定论》第26页。

㉙ 参看Д．塔纳尔斯基《难道哲学是必要的吗?》

㉚ 《一九四四——一九四七年波兰工人运动史概论》1961年华沙版第210页。

㉛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思想基础》第54页。

㉜ 《波兰的国有化和工业重建（一九四四——一九四七）》1967年华沙版第1卷；С．查瓦特斯基《波兰人民民主发展的特点和阶段》，载于《战场上》1966年第4期；М．萨多夫斯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变革和党的体制》1969年华沙版；《波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组织》1977年华沙版。

㉝ 参看《一九四四——一九六四年波兰社会变革过程：图书目录》1967年华沙版。

㉞ 参看《二十世纪的哲学和社会学》1962年华沙版。

㉟ Ю．霍赫菲尔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1963年华沙版第73页。

㊱ Е．Е．维亚特尔《社会。系统社会学引论》1971年华沙版第498—499页。

㊲ 参看Я．拉多什《特殊的辩证唯物主义》，载于《在意识形态辩论的范围内》1975年华沙版第149—171页；А．В．库兹涅佐夫《论一位波兰政治学家的理论观点》，载于《哲学问题》1983年第12期。

㊳ Я．库钦斯基《人是创造者：人的辩证法绪论》1976年华沙版第136页。

㊴ 参看：Х．柯吉尔—柯瓦尔斯基《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1967年华沙版，《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载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1969年华沙版，《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载于《哲学研究》1976年第12期。

㊵ 参看：С．奥巴拉《历史唯物主义问题》1978年华沙版；Е．拉迪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和世界观的实质》1975年华沙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1975年华沙版；С．拉因柯《马克思主义和对它的批判》1976年华沙版，《历史和意识》1979年华沙版，《意识和决定论》。

㊶ Я．谢潘斯基《社会学：问题和方法的发展》1969年华沙版第103、104页。

㊷ Б．米谢夫斯基把社会经济形态看成是建立社会进步理论的基础，他强调指出："在最广泛的范围内，社会进步在于向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革命过渡。"（Б．米谢夫斯基《社会进步》1977年华沙版第59页）。

㊸ 参看：C．柯吉尔—柯瓦尔斯基《马克思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理论》，载于《社会学研究》1969年第2期，《文化和社会阶级》，载于《论据》1974年第4、5期；Я．拉多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1969年华沙版，《阶级和行业》1980年华沙版；Г．门德尔斯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理论基础》，载于《当代波兰工人阶级》1975年华沙版。

㊹ Г．门德尔斯基《卡尔·波佩尔是方法论学者还是思想家?》第331页。

㊺ C．维德什比尔《波兰工人阶级的构成》1965年华沙版；Я．谢潘斯基《工业化过程中的波兰社会变革》1973年华沙版，《波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组织》。

㊻ 参看Ю．邦卡《技术的人道化》1976年卡托维兹版，《反对未来的神经震荡》1977年卡托维兹版。

㊼ 参看《科学技术的进步问题》1977年华沙版；《社会主义社会中个性的变更》1977年华沙版；《科学人道主义的革命》1974年华沙版；《生活方式：看法和建议》1976年华沙版；《社会变革和技术进步》1971年弗罗茨瓦夫版。

㊽ 《人民论坛报》1983年10月15－16日。

㊾ M．弗里茨罕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诸问题》1966年华沙版第56页。

㊿ 《人民论坛报》1982年4月19日。

51 参看《人民论坛报》1983年10月15—16日。

52 《人民论坛报》1982年4月19日。

53 《哲学研究》1969年第1期第117页。

54 参看：M．马尔科夫斯基《逻辑学：波兰中世纪哲学史》1976年弗罗茨瓦夫版第1卷，《科学方法论：波兰中世纪哲学史》1976年弗罗茨瓦夫版第2卷；弗沃德克《存在哲学：波兰中世纪哲学史》1977年弗罗茨瓦夫版第3卷；M．马尔科夫斯基《十五世纪前半期的自然哲学：波兰中世纪哲学史》1976年弗罗茨瓦夫版第4卷；З．库克塞维奇：《人的哲学。灵魂理论：波兰中世纪哲学史》1975年弗罗茨瓦夫版第5卷。

55 参看：H．阿索罗多勃莱《斯蒂芬·恰尔诺夫斯基的生平和著作》，载于《恰尔诺夫斯基文集》1956年华沙版第5卷。辛茨《从宗教到哲学。启蒙时代的精神文化史》1960年华沙版；З．奥古诺夫斯基《波兰的索岑主义》1960年华沙版；A．斯拉特柯夫斯卡《埃德瓦尔德·邓波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1955年华沙版；波尼亚托夫斯基《论亨利克、卡敏斯基的社会哲学观点》1955年华沙版。

56 参看：辛茨《胡果·柯伦泰的哲学》1973年华沙版；З．奥古诺夫斯基《索岑主义和启蒙》1966年华沙版，《十七世纪波兰的忍耐问题》1969年华沙版；A．瓦里茨基《在保守空想的圈子里》1964年华沙版，《哲学和机械论》1970年华沙版，《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哲学和社会思想》1973年华沙

版，《斯塔尼斯拉夫·布热佐夫斯基——思想道路》1977年华沙版；苏齐多尔斯基《当代的人的哲学的发展》1967年华沙版。

57 参看：《波兰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一八三一——一八六三》1973年华沙版第1卷；《波兰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一八六四——一九一八》1975年华沙版第2卷；《波兰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一九一九——一九三九》1977年华沙版第3卷。

58 《波兰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一八三一——一八六三》1973年华沙版第1卷第5页。

59 参看A·C·克列夫切尼亚《波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史概论》1978年明斯克版第7、8页。

60 参看：I．M．雅罗舍夫斯基《列宁——认识和行动》，载于《哲学研究》1970年第2期；E．托波尔斯基《历史研究中列宁的推动》，载于《新路》1975年第4期；M．基姆-库斯特舍巴《列宁的哲学史方法论》，1971年华沙版，《列宁思想和国际工人运动》1975年华沙版；穆夏尔《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一版的历史》，载于《哲学研究》1972年第11—12期，C·杰姆斯基《一八七八——一九三九年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概论》1973年华沙版。

61 《新路》1981年第5—6期第214页

62 《波兰党的第一次全国思想理论工作会议，一九八二年四月二——三日》1982年华沙版第10页。

63 《人民论坛报》1983年10月15—16日

第 五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罗马尼亚

战后罗马尼亚哲学思想的发展是同罗马尼亚社会各领域中的革命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全国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的武装起义为进行革命改造奠定了基础。紧接着革命改造进行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把从前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引到当代社会进步的边界上。

一九四四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罗马尼亚的发展包括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与罗马尼亚共产党（罗共）文件中确定的罗马尼亚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相适应的。

在第一个阶段（一九四四——一九四七年），全国劳动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人民革命，建立了革命的民主制度，摧毁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动统治，掌握了国家政权、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个阶段（一九四八——一九六五年）包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时期。罗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一九六五年）在对这一阶段作总结时得出结论说，罗马尼亚已经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在社会主义生活的一切领域，即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和道德的领域中，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规范。

罗共纲领把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的时期看成是两个阶段之间的中间时期。这个时期的内容是由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及其物

质技术基础所决定的。

与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五年计划同时开始的第三个阶段的内容，是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目的以及同实现此目的相联系的任务，最初是在罗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上规定的，并且在罗共以后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作了更明确和更具体的阐述。罗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七四年）通过的《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罗马尼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纲领》和罗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九年）的文件，对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通向这个社会的道路作了充分的说明。

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开始时，罗马尼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在同在社会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旧的资产阶级哲学进行的斗争中发展的。任务首先在于削弱、然后完全消除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派别的影响，特别是其中这样一些派别的影响，它们直接执行一定的意识形态职能即捍卫资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及其科学理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那一时期，居于首位的是，论证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学说，揭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作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受来自资产阶级哲学家、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家的攻击。

随着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建设达到越来越高的水平，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数量和质量上日益发展，关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就提到哲学科学的重要地位上。罗马尼亚哲学家对国内外哲学史、对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列宁阶段的历史问题所感到的兴趣都明显增加。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哲学的批判大大

加强。

从六十年代以来，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开始深入研究科技革命提出来的哲学问题，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逻辑、逻辑和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中的问题的研究也显著扩大和加深了。所有这一切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国内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造就新人的工具，成为各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罗马尼亚进入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就给哲学家提出了新的、更复杂的任务。罗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指出，社会学家应该把自己的活动集中在“研究我国现在的发展所特有的现象上，对总结社会主义经验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深入研究当代社会的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在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法学领域，我们需要能够提供解决我们社会发展问题的结论性材料的真正科学的研究著作。”①

在哲学和其他某些社会科学领域完成这些任务遇到一定的困难。六十年代中期起在罗马尼亚的哲学和社会学论著中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在这一斗争口号下，对于国内以前二十年精神发展的时期（一九四四———一九六五年），对于这一时期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真正成就，培养了某种虚无主义的态度。这就造成了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看法渗透进来的危险②。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举行的罗共中央扩大的全体会议深刻地分析了包括哲学战线在内的思想理论工作中的错误。在全会的文件中指出，“对罗马尼亚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没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以充分的彻底性加以阐释”。全会强调说，在罗马尼亚社会存在的“只有一种哲学”,而且，“不管哲学家在什么地方工作，他们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家”，“绝不允许在罗马尼亚存在任何其他哲学”。③

执行这次全会规定的意识形态纲领以及当代条件提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的任务，成为政治教育和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一九七六年）的研究对象。在代表大会准备时期，发表了一些文章，分析各种社会科学、文化领域、思想教育工作的各个部分的现状。A. 波波克和Г. A. 卡赞在一篇发表在《火花报》上谈论罗马尼亚哲学的成就和问题的文章中强调说，在罗共中央十一月全会（一九七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加强了自己在当代思想斗争中的积极性和进攻性。④同时，该文指出，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的一些缺点是“客观主义、平铺直叙和技术观点”的表现，在某些研究当代非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罗马尼亚学者的著作中，缺少对这些派别的意识形态特点和社会作用进行深刻的分析。

该文强调说，国内哲学思想顺利发展的主要条件，“就是与社会实践、与科学认识的成就紧密联系，为创造性发展革命理论而作出自己的努力”。⑤该文还指出发展罗马尼亚哲学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家的联系的重要性。

罗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九年）强调指出，对罗马尼亚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深入研究，这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客观要求。必须“更坚决地反对反动势力试图使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经过生活检验的解决我们时代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反对让人退回到已被历史注定要失败的、过时的时代和制度去的号召。”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纲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活动的基础。

罗共、罗马尼亚社会学家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是一九八二年六月举行的罗共中央扩大全会的研究对象。在《关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关于理论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和党的政治教育工作》的报告中，H. 齐奥塞斯库强调说，罗马

尼亚共产党在自己全部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的活动中，依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依靠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创造性地把这一学说的一般原理应用于本国的具体条件。这一活动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H·齐奥塞斯库指出意识形态工作、理论工作、政治教育工作落后于生产力水平、落后于罗马尼亚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巨大进展的某些现象。

全体会议召开前不久在罗共中央理论刊物《社会主义时代》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谈到了罗马尼亚哲学中的问题和困难。在这些文章中以及在对一九八二年春天在罗共中央乔治乌—德治研究院举行的讨论会的评论中都曾指出，包括哲学在内的罗马尼亚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要缺点，是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方面，采取慢条斯理、谨小慎微和墨守成规的态度（参看《社会主义时代》一九八二年第十期）。

H. 戈贡尼阿斯在《我国社会中哲学的使命》一文中强调指出，"我们时代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哲学，只有牢固地站立在提出严肃问题而又不接受轻易得出的现成答案的当前现实基础上，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那就是说，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⑦罗马尼亚哲学家研究极其广泛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科技革命、科学及其认识—方法论工具的发展、国际舞台上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等等提出来的。

大力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逻辑、符号逻辑、科学认识的逻辑基础、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等方面的问题。对社会认识的特点的兴趣，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逻辑的兴趣，其中包括对哲学史研究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的兴趣，都明显增加了。在逻辑—方法论方面，近年来越来越注意人类行为学和语言哲学的问题。

对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类型个人的形成途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美学和伦理学等方面问题的研究范围扩大了。文化哲学今天实质上已成为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独立的流派。价值论也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大力研究科技革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精神影响。

哲学研究成果除了专著之外，还有在以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社会主义时代》（罗共中央理论刊物）、《哲学评论》（社会政治科学院杂志）、《当代》、《布加勒斯特帕尔洪大学校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杂志《罗马尼亚社会科学杂志》（哲学和逻辑类），以及雅西、克卢日和蒂米什瓦拉等大学的《通报》。

一、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

一九六九年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在罗马尼亚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这实际上意味着国家开始过渡到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在这一任务提出后，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出现了大量的论著，这些论著对新社会的建设，它的各个阶段和前景，既从我国已经走过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加以回顾，又从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阶段和它发展成共产主义的前景出发，从它的未来方面加以阐释。

对于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各阶段的分期、基本标准和特征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同时，对于确定整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它的一般标准和实质以及这些标准和实质在国内的具体表现，作出了理论上的努力。

一九七二年出版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和政治科学院特别科学会议的材料也可以说明上述情况。这次会议是分析国

内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的[8]。在出版罗共中央乔治乌—德治研究院的教程《建立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9]时考虑到这次会议的结果。

这一教程具体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基本阶段：(1) 过渡阶段（一九四八——一九七〇年），(2) 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到一九七〇年，在建设统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新的社会结构等方面，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教程的作者们把罗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一九六五年）和十二月（一九六七年）国民议会关于完善生产关系、改进对经济的领导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决议归入这一阶段，同时又指出，实现这些决议实际上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第一阶段的界限[10]，国家逐步进入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

在准备、通过和学习罗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七四年）的总结的时期，人们特别努力从理论上了解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意义。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广泛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关于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和罗马尼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纲领》。纲领具体说明了在社会生活的一切主要领域中新阶段的任务：在经济领域，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在各地区均匀配置生产力，建立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革命成果；在社会—政治领域，不断地完善生产关系、计划工作和对全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科学管理；在精神领域，形成公民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意识。规定所有这些领域按照发达社会主义"全面性"的概念作相应的发展。[11]

Б. 察哈列斯库在《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一书[12]中，分析了关于新阶段、它在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方面发展中的内容和历史地位，强调社会主义发展

各个阶段的继承关系，并且把划分这些阶段的标准同一定的量变和质变联系起来，这些量变和质变虽然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结构的基本性质，但是非常明确地说明了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的这个或那个阶段。察哈列斯库认为，全部政权完全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是过渡阶段的特点，但是，这时还不是全部生产资料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因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做到这一点。后一种情况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过渡阶段是“一切已经走上和正在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包括高度发达的国家，无论如何都要经过的”⑬。这一结论的方法论的意义在于，从这一结论可以看出，那种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属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本身的本质特征是共同的。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⑭

至于谈到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那么，对于一切国家说来，这个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和必不可少的。察哈列斯库论证说：“确实，今天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正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来解决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在苏联，这种社会已经建成……而在工人阶级已经有了发达的工业的国家中，有必要改造经济，建立与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与社会主义在自身基础上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物质技术基础。”⑮

察哈列斯库认为，“在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未必能够再划分出什么中间阶段。苏联现在正处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而在我国，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逐步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客观条件。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指出了今后二十至二十五年的基本发展方向，规定这个方向就是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为建成共产主义创造客观条件。”⑯

罗马尼亚哲学家从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并由一个阶段向另

一阶段发展这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规律性的角度，分析在各国条件下现实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同时也研究这些规律性在罗马尼亚具体条件下表现的特点。罗马尼亚社会学家在确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建设的发达社会主义的特点时，通常都指出这个国家在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时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经济发展起点很低，这确实影响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影响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或那个阶段以及发展程度。由于这种情况，所以例如在开始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之前，还要划分出"巩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中间阶段（一九六五——一九六九年）。

从这一情况出发，一些罗马尼亚社会学家认为，在该国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整个时期中，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公有制与经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适应，换言之，与生产力的效率不适应；虽然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相比要先进得多，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力仍然大大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水平"。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表现出自己是完全（整体上）超过当代资本主义关系的生产力"。[45]

其他一些罗马尼亚作者反对这种问题提法，他们认为，上述矛盾"不是直接表现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只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相比时才表现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换言之，上述矛盾反映一定的国内状况与国外状况之间的矛盾……并且超出罗马尼亚现实、它的当前情况、现有的发展可能性等的

为了比较起见，可以看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者著作中对这一问题的提法。例如，在苏联和民主德国的社会学家的集体著作中指出："毫无疑问，新的社会制度的使命是要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过资本主义。但是，必须对这个问题采取具体的历史的态度……众所周知，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大大落后于高度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特别是落后于美国的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任务正在顺利解决……在历史上，苏联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是在这一任务完全解决之前。”⑲

A．布瑞沃克认为，从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辩证法观点来考察发达社会主义范畴是揭示这一范畴内容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成熟的社会主义的范围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向彻底实现其可能性的方向一往直前的发展。“只有实现并在一定意义上说用尽作为新制度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才为过渡到新制度的更高阶段即共产主义创造了现实的条件”。⑳

罗马尼亚研究工作者认为，发达社会主义性质上全新的内容是，在新阶段上，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在一切方面表现出自己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就象在以前的时期一样，它包含着自己很多只是作为可能性的无可争辩的优越性。但是，A．布瑞沃克指出，“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过程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日渐成熟，而且要求它的一切潜在的可能性发挥出来，活跃起来，这不仅是指一般增长，而且是指具体克服社会主义存在的最初阶段上社会主义本质表现的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限度。”㉑问题不仅在于潜在的发展，而且在于在不断克服的过程中进行质的改造，后者反映不断的现实化，反映在社会主义中蕴藏着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布瑞沃克认为，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一切职能完全充分的实现，是指社会领导的完善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它能彻底地显示和实现制度的一切可能性，特别是人的因素”。㉒

罗马尼亚社会学家X．恩涅在《从人本学角度对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一文中考察了“人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发

展新阶段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者所持的论点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首先是社会结构的自觉创造者，并且试图“实现社会结构中与自己的本质最适合的那些东西”[注]。社会创造的自由，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手段来利用各种社会结构和整个制度，使它们符合人的本质和价值，这一切在“全面发展的个人”的概念中表现出来。

恩涅认为，在分析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辩证法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从行为理论的观点来看，自觉创造历史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答案：(1) 自觉的作用就是预见和预测不可避免的客观情况的能力。在这一场合就谈不到自觉的积极作用；(2) 自觉创造不仅要求按照已经认识了的必然性进行活动，而且要求选择最有效的行动方案；(3) 自觉创造也可能是指对制度发挥职能的条件本身的修改，对制度的内部结构的改组，以便在各种可能的扰动条件下，制度仍然是适合于实现人的本质的；(4) 自觉创造要求克服自发性的发展和选择这样一种方向，它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出发，使人能够积极地显示自己，使自己的期望、理想和价值深刻地影响社会制度的发展，尽可能按照这些期望、理想、价值和希望来组织社会结构。

恩涅认为，最后这种对自觉因素作用的理解最接近恩格斯所说的“自由王国”概念。同时，不能把“自觉建设”社会结构和整个制度的过程绝对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成为对社会行为采取唯意志论态度的出发点。人和社会的变化以人对自己进行的工作为起点，这种工作是借于具体的历史实践并在其基础上实现的。这里的辩证法在于既克服唯意志论，又克服自发性。

从六十年代末开始，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发展的矛盾问题在罗共文件和罗马尼亚学者的著作中占了显著的地位。关于这些矛盾的性质、根源及其解决办法的理论讨论，在罗共中央十一月全

体会议（一九七一年）之后特别热烈，在这次全体会议上，这些问题成了中心问题。

在这次全体会议的材料[24]中，包含着对社会科学代表人物的号召，号召他们克服在了解矛盾问题方面存在的一定的畏缩情绪，在很多场合，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矛盾这一点被否定了，或者把这些矛盾归结为非对抗性矛盾。

罗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强调指出，在建设新社会制度的过程中正在产生并且还将产生矛盾，必须认真地研究这些矛盾，而党将在及时解决这些矛盾方面采取行动。

罗马尼亚哲学文献中所阐述的以下论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敌视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继续存在，以及由于在某些场合那些就其根源来说并不带有对抗性质的矛盾转变为对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并不排除出现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很多专家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把矛盾也按其根源来分类是必要的。例如，К．波尔让努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三大类：(1)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矛盾；(2)所谓的"残留的"(剩余的)矛盾；(3)一般社会的矛盾。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和领域之间互相协调一致的非静态的、"动态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的基本根源之一。并且，"社会经济基础对社会其他部分的系统和分系统具有最后决定的性质，这一点并不排除它们的独立发展。"[25]最后，在解决矛盾的时候，主观因素可能不恰当地起作用。属于"剩余的"矛盾的，是从旧的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等。属于一般社会的矛盾的，作者认为是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因在不同社会形态条件中表现出来而具有不同的性质。

力图克服对社会矛盾进行硬性的、极其概括的分类是近来罗马尼亚学者工作的特点。一些学者试图采用系统－结构方法来

分析矛盾的性质和分类。

例如，H．图多塞斯库在《矛盾的一般理论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的性质》一文中指出，任何制度的性质都是取决于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的运动决定制度的结构和进程，并且，这些矛盾在制度内的相互作用，既可以是发挥职能的（这时，由于相互作用，出现了解决矛盾并保证制度维持下来和得到发展的因素），也可以是破坏职能的。在第一种情况下，矛盾是发展的源泉，在第二种情况下，矛盾是发展的障碍。矛盾是起发挥职能的作用还是起破坏职能的作用，这取决于影响解决（克服）矛盾的机制的主观因素的性质⑳。

与结构主义和职能主义相反，"辩证的结构主义假定因果关系与结构是统一的……使矛盾论与因果论的综合成为可能……矛盾术语和制度术语之间的统一赋予结构主义以创始的前景：制度各因素之间的矛盾关系使制度具有历史性；结构也具有因果一辩证的性质，具有自生和形成的本来源泉。"㉑按照图多塞斯库的说法，分别来考察的因果论和矛盾论会在解释决定论和发展方面得出目的论的结论。确定矛盾与制度、因果与结构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也就能确定因果概念与矛盾的关系。

从它们的综合的角度来看，因果关系被视为内在的关系，而制度的基本矛盾成为这一关系的造成制度的推动力的因果参数，推动力是制度内部固有的矛盾关系的产物，同时又是自我动力，自我发展。制度（和结构）的概念和矛盾（内在原因）的概念的综合使得有可能利用因果论中自我发展的标准，从而由矛盾论中得出制度的自我决定的标准。这样一来，决定论始终要求矛盾的普遍性。在这种情况下，图多塞斯库把矛盾定义为"制度各对立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无论是各因素在制度中的结合，还是整个制度发挥职能（即制度的稳定性），都取决于这种关系。同

时，制度各因素之间的矛盾关系，对于制度的进程说来，也具有因果性质，由此产生出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变化。”[28] 作者认为，矛盾的这一定义确定了在制度的决定中同期的和历时的参数，实现了对制度的结构和进程而言的矛盾的职能作用和因果作用的综合。矛盾的职能作用保证在对立均衡占优势的条件下制度的整体性（质的稳定性，固定性），而矛盾的因果作用则决定在对立相互作用的紧张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制度的发展（它的质的变化）。矛盾的整体 — 制度的职能和因果 — 创始的职能是同时实现的，只有从方法论方面考虑，才会对它们进行单独的考察。

从社会制度结构水平的从属性的观点来看，可以提出如下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矛盾的分类：（1）基础结构方面、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方面的矛盾；（2）生产力领域中的矛盾；（3）生产关系的矛盾；（4）它们在经济、所有制关系和分配方面相互作用的领域中的矛盾；（5）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矛盾；（6）人与人关系方面（在小群体或大群体、社会阶级、共同体等的水平上）的矛盾；（7）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方面的矛盾；（8）上层建筑方面的矛盾——在政治 - 行政组织和政治、法律制度发挥职能的水平上，思想方面（意识形态、道德、法等）的矛盾；（9）表现文化领域中新与旧的斗争的矛盾[29]。

卡林娜·马雷试图克服对抗的这样一种硬性的定义，即把对抗说成只是利益的极端对立，这是很有兴趣的。她认为，对抗的客观内容以不同的深度和广度反映在对社会利益的了解中，这些利益促使人们采取这些或那些行动。因此，利益的对抗只是社会利益的一个方面，虽然是重要的方面。与对抗性矛盾存在着潜伏状态或活跃状态的同时，也可以确认同一矛盾（对抗性的或非对抗性的矛盾）的不同的（激化或缓和）的阶段。在这样的考察下，绝对化的可能性变小了，相反，分析对抗与非对抗相互转化

的条件的可能性（理论的和实际的可能性）扩大了，这对于管理社会生活，预测社会矛盾的发展趋势和解决这些矛盾的可能途径都是十分重要的。㉚

X．乌谢尔逊提出了多少有些不同的方案，他也把矛盾的客观性标志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分类的标准，因此，他区分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矛盾和主观的矛盾，并且根据任何社会现象所固有的客观与主观密不可分的统一这一理由，赋予这一标准以绝对的性质。作者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区分出以下的社会矛盾：（1）物质生活方面客观的（不取决于意识的）矛盾；（2）社会意识方面（例如，科学和宗教）客观的（不取决于人的意识的）矛盾；（3）在物质生活中表现出来、但属于人的意识的现实主观矛盾（例如，干部水平落后的情况）。按照这种划分，社会主义社会中上述第一、二两类客观矛盾不可能具有对抗性，而第三类主观矛盾则始终是带有对抗性的，并且对抗和非对抗与矛盾的内容和矛盾的表现形式有关系，因此，矛盾可能是：（1）按内容和表现形式说来都是对抗性的，（2）按内容说来是对抗性的，按表现形式说来是非对抗性的，（3）按内容和表现形式说来都是非对抗性的，（4）按内容说来是非对抗性的，但是按表现形式说来是对抗性的。㉛

И．斯特洛伊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参加科学论证新社会建设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的辩证法。他认为，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是同承认普遍物的具体性质分不开的，面任何矛盾的特殊具体性质要求作为方法的辩证法不断发展，要求它的形式不断更新，以保证行为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人对社会现实的矛盾采取的态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学说中，哲学是跟随在实践之后的，实践是在没有哲学的情况下进行的，实践中的矛盾大部分是自发地在哲学中反映出来。马克思主义以自己的辩

证方法为哲学与实践活动合理的相互作用奠定了基础，从而使社会意识转变为进步的合理因素成为可能。在这方面，可以认为辩证法是合理"处理矛盾"[32]的方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矛盾，只有通过依靠理论分析结果的实践才能得到解决。这一分析应该从现实生活中矛盾的运动出发。

斯特洛伊谈到了自己关于一个时候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出现的把社会矛盾划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硬性做法的意见，他认为这种做法反映出对意识与行为的具体辩证法不十分了解。这种硬性分类反映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甚至不可能出现对抗性矛盾的看法。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优越性在其他地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可能自觉保证制度的合理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能发生冲突。矛盾与冲突没有同一性。只有在社会行为不能使自己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完全符合的情况下，冲突才是不可避免的。"冲突作为可能性包含在任何矛盾中，就象非冲突状态是矛盾的另一可能性一样。"[33]作为活动的理论和方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使矛盾的合理（自觉）解决成为可能，而又只有在存在进步的、真正辩证的意识的情况下才有这种可能。当矛盾引起冲突或者借助冲突来解决的时候，这就是说，意识落后了，它的辩证法模式已经不再能合理地处理自己与社会存在的相互作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与进步的吻合不是自动达到的，因为我们用自觉解决矛盾的办法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实践所取得的进步进行人道的和合理的衡量。从这一意义上说，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反映出进步只能与以下两点并行不悖：第一、整个社会制度的全面发展；第二、从领导这一过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方面自觉地、科学地管理这一过程。

斯特洛伊在总结时指出，否认冲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矛

盾的可能状态，就等于承认矛盾自动解决的可能性。冲突、对抗的存在或者不存在，作为矛盾发展的可能性，只是根据社会力量对它们的态度、社会力量的意识和实践活动才成为现实。"硬性地把矛盾划分为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就是对宿命论让步，把社会规律贫乏化和简单化"。㉞

罗马尼亚的社会学家也具体分析罗马尼亚社会发展现阶段上的罗马尼亚社会的社会矛盾。考察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中的具体矛盾，以及这两个领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矛盾。特别强调了经济和政治意识对于克服矛盾发展中的职能紊乱方面日益增加的意义，强调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照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来解决矛盾方面党的领导的作用㉟。

一九八二年二月，H．齐奥塞斯库说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在任何人类社会中一样，也有矛盾产生和发展着，而且它们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矛盾，可能造成冲突"。㊱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依靠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可以预见到一定的比例失调现象和缺点（即矛盾）的产生，并且千方百计地促成它们的解决，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

根据罗共的看法，科学管理制度应该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的解决。共产党在这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

二、对社会主义意识和个性发展的研究

由于罗马尼亚向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所以特别努力地研究社会主义意识的问题（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的途径，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罗共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成的十一月（一九七一年）全体会议，以及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大会（一九七六年）都讨论了"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问

题。

主观因素的作用和意义的增大，社会生活的思想、精神文化领域的比重的增大——这是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和表明发达社会主义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日益上升的发展中的内容和历史地位的最重要标准之一。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密切联系发达社会主义概念对它们的提法和理解，都反映在近年来罗马尼亚的一些著作中。这些著作提出了一些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由于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活生生的实践联系在一起而显得十分迫切。因此，也可以看到完善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制定"社会主义意识和个性理论的发展战略"的趋势。

这一战略的基本要素是怎样的呢？首先是指必须对罗马尼亚社会各个社会群体的意识中的实际变动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和概括；其次是借助"新的"方法对以上述方式得到的材料进行考察。最后是掌握边缘学科中制定出的概念，用来丰富意识理论的范畴工具（用信息论、一般系统理论，控制论、新的计量方法等的术语来研究意识）[37]。据认为，通过新的方法来考察积累起来的、甚至一定程度上在理论上被认识的材料，就能揭示出利用旧方法所不能看出的新的界限和关系，使最终能够丰富整个理论的新概念论点得以形成[38]。上述战略的基本要素也指在研究社会意识的过程中利用边缘科学中制定出的一些概念，如动机和其他心理学范畴，在分析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的相互关系时，尤其应该这样做。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的最新成就也可以起这样的作用。

罗马尼亚作者在"经济意识"方面的一系列研究著作，以及他们对全面发展的个人这一概念的详细论述，使人们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意识的研究中，在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把这种意识的推动力形成概念中如何运用这些"战略"，得到一定的了解。关于发

达社会主义问题的科学会议上的讨论谈了这些问题，会议的材料后来编集成书出版，书的名字叫做《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七二年）。在上述讨论中，意识结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的进程的变化问题、个人的与社会的意识之间、日常的与理论的意识之间、现实的与可能的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占了很大的地位。

提出从社会主义意识结构、占主要地位的价值和观点中的变化的观点来分析社会主义意识中的革命改造。

罗马尼亚社会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在国内造就全面发展的个人的现阶段，经济意识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在研究“经济意识”时，他们把它与其他形式的社会意识如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等并提。[20]经济意识被说成是“经济的概念、动机、价值、情绪、思想、知识、理解等的总和，它们反映人们的经济实践，同时，在与社会意识的其他方面和领域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决定人们的经济行为。”[21]

A. 坦纳舍在《人的意识的多面性的历史类型学》[22]一文中分析了经济意识在社会意识整个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意识被说成是几千年过程中的矛盾发展，从原始人无差别的精神感受的混合，到生活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时代的人精神上的丰富。坦纳舍从三个方面考察了产生全面发展的意识的客观前提。一般社会学条件必须以要求生产者全面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代发展水平为前提。认识论的条件要求以科学内容来丰富整个社会意识及其每一个别形式。实践－价值论的条件要求社会意识有日益发展的功能，要求加强社会意识的能动改造作用。

作为理想，全面发展的意识属于新的时代，它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真正成为现实。群众更深刻和更充分地反映社会现实情况的能力首先是同自觉地反映和理解社会关系的两个主要范畴

即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关系和新的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关系对新社会十分重要，因此经济意识的作用提高了。坦纳舍强调说，社会主义经济意识是科学与社会经济实践综合的结果

在与社会意识理论的发展密切联系的情况下，深入研究了人的哲学和社会学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造就全面发展的个人的途径。研究这些问题的著作在罗马尼亚当代哲学文献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包括К．И．古里安、A．坦纳舍、H．贝鲁、O．克赞、A．罗特、H．卡洛希和И．雷赞努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部分地表现出国内在这方面的哲学传统。

罗马尼亚著名的文化理论家К．И．古里安院士的著作在这方面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他首先在伦理学的范围内来研究人道主义、人生意义、道德理想等问题。后来他提出了这些问题的新的结构——在更宽广的方面，包括整个人的存在的问题。这一方法论原则贯穿在古里安的著作《人的问题。试论哲学人类学》中，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一九七二年）一书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两本书论证了人的问题的迫切性，谈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人类学的关系的意见。对弗洛伊德学说、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所创造的当代资产阶级哲学人类学的人的概念进行了批判分析。

古里安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哲学人类学研究了现实问题，但是却提出不正确的、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必须借助批判来克服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和反动的关于人的概念，努力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第一、是各种研究人的局部科学成果的综合，第二、包括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理论在进行研究的一些特殊哲学问题。所以，这门学科的综合性质是双重的——既是各门局部科学成果的概括，又是一系列哲学科目对这些成果进行研究的问题和结果的综

合。作者具体地说明了这个新学科的对象的可能的轮廓，并进一步指出说，这个新学科应该包括人类学和伦理学、心理学和文化史的相互交叉的问题。科学人类学是在人的认识中“上述各学科会合、互相交流经验的场所”。

古里安主要分析问题的两个方面——心理学方面和伦理学方面。至于谈到对问题的“全部掌握”，那么，他只把这一任务作为“方法论的愿望”提出来。他以伦理学应该成为新学科的核心来解释他为什么密切注视哲学人类学问题的伦理学方面。大多数资产阶级哲学人类学家把这门学科的对象说成是一系列传统的问题——自由、价值等。古里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即科学的哲学人类学不应该只是把这些问题重新分类，或者为它们杜撰一些新的名称。它的任务的实质在于最大限度地扩大人的问题，以便有可能对人进行“完全的”分析，并且实现人的认识史上的根本转变。伦理学是人的问题的中心要素，但不是唯一的要素，它只是这一复杂问题的核心。

但是，正如罗马尼亚哲学家П. 贝拉鲁正确指出的，这个新学科的出现应该不只是反映把分散在不同学科的资料加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已经成熟，而且反映新的解决办法正在成熟，这些新的解决办法即使是处于萌芽状态，但按其理论性质和方法论性质说来会超出现有科门的范围。[35] 但是，“哲学人类学”，即使象它的维护者所设想的那样，也不对人的问题提出性质上全新的解决办法。

伊莲娜．雷赞努的著作《在可能性标志下的人》也考察了人的哲学问题。她很有道理地指出，随着在各局部科学范围内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人的知识，对于整个人、人的本质进一步从哲学上来认识的意义就增加了。雷赞努认为，可能性范畴在这一认识中具有很大的意义，“人的本质表现为职能，而不是表现为实

体，表现为不断实现的潜能，可以根据它在人的活动范围中的大多数表现来判断它，而不是表现为某种一劳永逸的东西。”[illegible]可能性范围可以包括人的全部决定，而不必把其中某个决定变为享有特权的决定。对生物学、个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的资料进行的哲学解释揭示出在人的存在的不同水平上都存在有由可能性范畴所标志的情况。原来，从人的“个人能量”中变成现实的一切，甚至没有使人部分地穷尽其可能性范围。И·雷赞努用遗传学关于遗传性的最新资料的“哲学解释”来说明对问题的这一提法。根据这些资料，遗传性只是在数量上不发生变化。在实现了的遗传性和潜在的遗传性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到质的方面：“遗传性只是在数量上，作为总的整体，才是硬性地固定了的，对于在这个或那个时候实现的遗传性不能这样说”。[illegible]

在以对生物学、遗传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资料在理论上的认识来研究可能性范围的同时，也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范围。“可能性范畴在这一水平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因为问题在于人的自我实现的决定性方面”，[illegible]而自我实现只有在社会实践的范围内进行。人是意识到自己的可能性的唯一生物，这是他力求完善、超出自己界限的渴望的基础。可能性的潜力不是无限的，它的界限一方面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在本质与存在“共同参与”的每一时刻，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研究作为新的社会－历史实践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研究在国内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罗马尼亚哲学文献中占了重要的地位。

А. 坦纳舍在研究个性理论时，从五个向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和价值论——进行分析。他在总结对这些向度的评价时得出结论说：“心理学向度确定个人与个人意识的关

系，社会学向度主要强调社会意识，强调个人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社会价值，但是社会价值并没有穷尽个人的本质；伦理学和美学的向度实现从善与恶、义务与责任和美的美学意识的观点来看的主观的“我”和社会－客观的我的某种综合”。[51]价值论的向度实现社会和个人的意识与社会行为的无所不包的、最高的综合。在这一方面，主要强调个人的内部结构，但是，它的方向是在已经意识到的丰富社会关系影响下形成的，这种丰富性最终也决定个人内在世界的丰富性。坦纳舍强调说，“个性理论今天应该从社会主义用来确定人的个人和主观的向度与人的社会和客观的向度的关系的方法出发……从遵守个人自立和自由的社会的规律和无上命令的要求出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完整的个性理论怎样才能把描述性和说明性的社会学、伦理学和心理学概念与规范性结合起来，以及保存它们之间的这种区分具有多大意义。”[52]

A·罗特在《多维的人》一书中研究作为“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又作为它们的能动的主体”[53]的个人。他所理解的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对人在社会活动中、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的多方面的肯定”。作者认为这种多面性有四个向度：“职业特性”，“文明特性”，“道德”，“文化”。A·罗特试图确定关于随着社会的历史发展，个人日益个体化的普遍规律：社会组织越完善，它对社会成员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条件。“个人之间最发展的社会关系，最复杂的联系，既允许也要求最大程度的个体化”。[54]

但是，看来不能主要从个人的个人特征的观点来考察个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时代，个人的发展与其说受制于缺少个人特征，不如说受制于不能进入那些能使人的个性按照自己的爱好、才能等发展的活动领域。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创造了崭新的局面。

某些罗马尼亚哲学家虽然也赞成哲学人类学的独立存在，但是，与К．И．古里安认为哲学人类学也可以成为“文化哲学的核心”的总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哲学人类学的地位应该与“历史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行为哲学”、“科学哲学”等这样一些“实用的”哲学相同。

哲学和局部科学归根到底是研究同一现实，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对于各种关于人的科学知识的综合实际上只有在哲学的水平上才能完全实现。局部科学知识的特点，基本上是把人归结为这些或那些关系（生物学的、生理学的、遗传学的、心理学的关系等）的总和。而哲学不是从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某一种关系出发，却是从人的普遍性和“无穷尽性”的原则出发，而人的生活基础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这种关系的多样化总和。[55]

在哲学知识发展过程中，随着情况变化而对哲学的某一方面（认识论的或本体论的，逻辑的或方法论的，价值论的或人类学的等等）的兴趣占主要地位。所有这一切提高了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面的使命，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对世界的“统一看法”中所起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者，其中也包括罗马尼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56]对从哲学上理解人的问题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的合理性在罗马尼亚进行了广泛的理论上的讨论，并且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进行详细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也讨论了把“价值哲学”、文化学（或文化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划分出来的可能性，而后来则试图在具体的价值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著作中详尽地阐述这两种哲学。

众所周知，在很多国家的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文献中，

都在努力研究范围非常广泛的价值哲学问题，不管这是涉及到个别的领域（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或者伦理的价值），还是在伦理学、美学、人的哲学问题等的范围内对价值论进行更加概括的考察。

Н．卡洛希和А．罗特的专题著作《价值论和伦理学》（一九六八年）是罗马尼亚研究价值论问题和提出建立独立的价值哲学学科的最早著作之一。作为这一学科的对象，提出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大致是К．И．古里安所说的构成“哲学人类学”对象的那些问题。在Л．格伦贝格、И．帕斯卡第、И．图多塞斯库等人的著作中研究了价值论问题。也在伦理学（Н．贝鲁等人）、美学和文化学（А．坦纳舍、М．布里亚祖、И．伊阿诺希）、人的哲学问题（К．И．古里安、И．雷赞努、А．罗特、М．阿基姆等人）的范围内对价值论进行了研究。

关于文化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在罗马尼亚得到广泛的发展。在К．И．古里安的著作《人道主义和文化的起源》（一九六八年）、《历史，人，文化》（一九七〇年）、《历史和文化论的基础》（一九七五年）中，试图建立包括三类独立问题的概念上的综合，这些问题在罗马尼亚文献中依靠三个独立的学科即哲学人类学、价值论和文化哲学来弄清楚。

在А．坦纳舍的著作《文化哲学导论》（一九六八年）、《论人道主义和文化》（一九七四年）、《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一九七六年）、《文化和宗教》（一九七三年，在一九七五年出了俄文版）中，文化被说成是人的认识和实践的结果累积的总体。关于“价值—文化—文明”的问题，他作出了一系列理论概括，这些理论概括对于用描述作为整个人类文明疾病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方法来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家妄想避开尖锐的社会问题

的阶级性质的意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A．坦纳舍指导下撰写的三卷本集体著作中[57]，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文明是崭新类型的文明的概念。社会主义文明“不能归结为社会的物质技术形式和结构，进步的技术性的和工具性的机制，而是文化价值的全部多样性和人的意义的实现。”[58]在社会主义文化中，物质技术进步与精神文化发展之间，物质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与人的价值定向之间的对抗消失了。社会主义文明“贯穿着作为经济和精神发展领域的综合的全面性原则”，这种原则要求“很多向度——认识和评价，客观与主观的关系，文化在形成人的个性、在达到物质与精神、合理与效率的统一中所起的作用等等——在结构统一中的融合”。[59]

七十年代罗马尼亚出版的大量关于文化哲学问题[60]的论著，反映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文化。

也作出努力对一些一般理论问题进行科学的理解，这些问题有社会决定论的实质和标准，从现代科学成果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的角度来看的社会进步的基本特征等。在这方面，可以指出以下著作：K．波尔让努《论进步》（一九六九年），P．弗洛里安《历史的意义》（一九六八年），M．德拉干涅斯库《制度和文明》（一九七九年），H．C．杜米特鲁《社会制度，实践，试验》（一九七五年），M．马里查《社会科学中的系统》（一九七七年），Дж．拉杜《现代世界中的文化进步思想》（一九八一年）。

三、辩证唯物主义、逻辑学和方法论的问题

从五十年代末期起，在罗马尼亚哲学家的著作中就积极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问题，而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就积极研究由于科学认识的蓬勃发展和这种认识的概念工具日益复杂而产生的方法论问题和逻辑问题。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也属于这类工作。

在这方面，为列宁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的周年纪念（一九五八年），列宁九十周年诞辰（一九六〇年），祖国解放二十周年（一九六四年）等面举行的科学讨论会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会议展现了罗马尼亚哲学家在阐释辩证唯物主义、阐释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认识工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基本方向。这些会议的工作成果反映在集体编写的下述著作中：《弗·伊·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版五十周年》[61]，《弗·伊·列宁九十周年诞辰》[62]，《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罗马尼亚的科学思想》[63]等。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64]为总的名称出版的一套丛书，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问题方面占据显著的地位。这套丛书是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出版的，到现在已经出了十七卷。在每一卷中，除了有罗马尼亚学者的论述外，也有苏联作者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论著的罗马尼亚译文。在这套丛书中，实际上研究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所有基本问题。十分注意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来分析现代自然科学的问题，十分注意认识论、科学逻辑的问题（所以，这套丛书的第十一、十三、十五和十六卷是关于科学语言分析和把现代逻辑工具用于这种分析的问题的）。

在六十年代，辩证唯物主义与各门学科的相互作用成为罗马尼亚学者密切注意的对象。在集体编写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局部科学的一般方法论》[65]中，根据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考察了作为科学研究一般方法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种种问题。哲

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共同出版了关于现代科学研究工作中一般方法与局部方法相互作用的两卷本著作。[66]

在七十年代，罗马尼亚哲学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来解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认为，这些解释更加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更加符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取得的成就[67]。在这些著作中，有一本是根据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讲稿编成的集体著作《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该书作者的出发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是科学理论、意识形态学说和工人阶级的行动纲领。[68] 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首先是"形成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存在的一致看法，形成思维的原则和标准以及形成正确的社会行动的理论活动。哲学的使命——综合和结合，把多样性化为一致的解释原则，在我们知识的总和中确立等级、序列和协调一致"。[69]哲学不仅仅如实地描述世界，它还说明世界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因此，哲学要求选择积极的政治思想立场，确定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一定态度，形成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哲学按其性质说来具有社会政治和道德的目的性。

作者们分析了"哲学领域"，即历史地成为哲学研究对象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和活动的领域。这些领域是：本体论（一般存在理论），认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伦理学，美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哲学和价值论（价值理论），人类行为学，科学或社会意识其他形式（哲学、道德、法律、宗教等）的各种元理论。

作者们从这种我们认为是完全不容争辩的对哲学的理解出发，按照以下的题目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1) 世界的物质性。社会和人的存在；(2) 结构性和系统性。系统和社会结构；(3) 联系和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和自由；(4) 发

展和进步，社会发展的辩证法；(5) 反映和意识。社会意识的结构和进程；(6) 认识和真理。科学和社会；(7) 人的活动。社会活动和管理；(8) 文化，文明，人道主义。

作者们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克服传统的教科书和辅助读物中存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一定程度的脱节和隔绝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统一的哲学理论、方法论和理想，它实现自然、社会和个人的存在的综合和结合。

在七十年代，罗马尼亚的哲学家研究那些与进一步准确说明唯物主义辩证法结构相联系的问题，唯物主义辩证法被看成是范畴和原则的统一的和完整的体系。在这些哲学家当中，很多人都认为解决这一任务的途径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概括最近几十年来系统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宝贵的东西。作出这种尝试的，也有И．图多塞斯库在《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和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于一九七八年共同召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纪念弗·伊·列宁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版七十周年）”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他认为，把辩证法只解释为发展论，主要是研究三条基本规律和与这些规律有关的一些范畴，这是眼光狭小的。类似的解释“忽视了决定论的规律，结构分析和系统分析的原则，而这就削弱了辩证法，使它在现代哲学的各种非决定论的、整体论的以及结构和非辩证的流派面前容易受到攻击。”[70] 图多塞斯库认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发展论，同时也是决定论，是对现象进行结构分析和系统研究的一般方法。

按照这种态度，И．图多塞斯库区分出以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范畴和规律：决定论的范畴和规律（其中包括因果规律、必然性规律、或然性规律、反馈规律）；发展的范畴和规律（其中包括矛盾规律，量变到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结构

和系统的范畴和规律（其中包括结构性规律，稳定性规律，系统与结构关系规律，结构逐渐复杂化规律等）；存在和认识的一般规律（其中包括内容和形式统一规律，个别和一般的本质和现象的规律，单一性和多样性的规律）。

图多塞斯库在谈到想以“新的释义学”或“超级辩证法”来补充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企图时强调指出，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切科学的一般方法，是在一切存在物领域中都有效的认识和行动的理论和方法。“这种释义学本身就够了，不需要其他‘新的’或‘超级辩证的’释义学的中介。”[71]

由于要把结构分析的成就包括到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去，罗马尼亚哲学家热烈讨论某些西方哲学家（例如法国的哲学家）打算把结构主义看成一种哲学流派的尝试[72]。他们承认结构方法对一切知识领域中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认为结构主义要作为哲学中的一种流派是站不住脚的。例如，A。瓦尔德在《一般认识的要素》[73]一书中写道，结构主义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绝对化而损害本质与现象的统一，把分析绝对化而损害归纳法，结构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

M。弗洛里斯库在《物质或客观现实性》一书中反对把结构主义理解为意识形态。他认为，结构性是一般性质，是运动着的物质的现象，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他在批评某些法国哲学家关于结构主义的论断时指出，认为结构主义是新的哲学并想从这一哲学得到对现代社会提出的种种问题的回答的那些人是不对的。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它能够正确利用认识的新发现，其中包括物质结构和精神上层建筑领域中的认识的新发现。

否认结构主义是哲学绝对不是说辩证唯物主义轻视结构方

法。弗洛里斯库写道:“对于马克思主义说来，推广研究现实的结构方法，在一切学科中利用控制论的伟大发现和遗传学、语言学、病源学、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这不仅意味着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新的光辉的肯定，而且意味着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完善它的关于世界和社会的概念的经常不断的要求”[74]。

M．弗洛里斯库强调说，无论是在人文科学还是在所有其他科学中，最一般的研究方法是辩证方法。结构分析是辩证研究方法的组成部分，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质。辩证研究方法要求研究发展的一般条件，而结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运动着的物质和构成它的要素（它们是发展的一般条件的组成部分）的组织水平。弗洛里斯库指出，任何结构除了同时既是整体又是部分外，还是（进化的或飞跃的）变革的系统，服从于发展规律（因为具有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性质，具有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稳定性）。因此，显然不可能把结构性与辩证法分开，因为不可能把辩证法与结构性分开。

结构性是物质的普遍性质。伊莲娜·贝鲁认为，“如果说运动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方式表现物质变革的一般能力，空间表现物体和过程的向度和布置，时间表现它们的持续和连续，那么，结构性揭示物质进入相互作用的能力，指出运动着的物质所经受的无穷变化是怎样进行的”。[75]

M．弗洛里斯库在分析物质的结构时写道:“物质的结构是物质微粒相互作用的表现，是物质运动的表现。”[76]他指出，现代科学使物质结构的又一种性质变得十分清楚：更高水平的结构形成总是在自己内部包含较低水平的结构。质变不仅由于量变而产生，而且也由于引起结构秩序的变化却不使数量增加或减少的那些微粒的相互作用而产生。

可以从物质的各种性质出发来描述物质及其本性。弗洛里斯

库强调指出，在各种性质中，质量、空间和时间是三种基本性质。至于谈到这些性质在新知识形成中的相互作用，那就需要更准确说明这些性质的内容。

现代科技革命把分析科学的逻辑结构问题提到首位，其中也包括揭示辩证法的范畴在新知识的形成中的逻辑职能，以及更准确说明这些范畴的内容。

决定论的原则属于那些由于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而引起人们兴趣的辩证法范畴和原则。罗马尼亚学者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十分注意决定论原则。在这方面可以举出以下著作：Л．米洛斯的《决定论和有限性》[77]，А．坦纳舍的《必然性和自由》[78]，М．弗洛里阿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概念》[79]，А．波波维奇的《决定论》[80]，К．马雷的《决定论和现代物理学》[81]，Р．弗洛里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导论》[82]，《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丛书第十二卷，该卷名称是《决定论和认识》。

在《决定论和现代物理学》一书中，К．马雷认为决定论一方而是秩序和必然性的理论，另一方面也是因果性的理论。她认为，采取这种辩证的立场就能回答两个问题：什么是现实性（它的秩序是怎样的；同时，混乱被视为秩序的个别情况，而物体和过程没有不变的结构），为什么这一现实性是混乱和秩序、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研究内在的原因就会去考察作为因果性形式（它对于现象的质的保存是很有代表性的）的自我因果性，从这一角度来研究因果性与相互作用的关系。

特别注意决定论在现代物理学中的方法论作用。К．马雷表明，对于微观世界中过程的制约性、决定性思想的任何拒绝，都是由于所得出的研究结果错误，不然就是对这些研究结果作了错误的解释。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努力研究科学逻辑

（科学认识逻辑）。但是，正如很多研究者所指出，这一学科本身的内容提出不少问题：关于这一学科的对象、范畴，规律等还没有一致的看法；这一学科与也是研究认识过程的其他学科（认识论、心理学、逻辑）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很清楚的。

罗马尼亚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也十分注意去探讨这些问题。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出版了大量的著作：И。皮亚特尼茨基的专著《论科学研究的逻辑》（一九六七年），《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丛书中的某几卷，Аг．若霞的多卷本著作《逻辑研究》（一至四卷）中的一些文章，《逻辑问题》文辑，Кр．若霞的专著《科学哲学研究》（一九六八年），《科学哲学研究》文集（一九七一年），А．弗洛里安的著作《现代思想中具体的辩证法。元逻辑研究》（一九七二年），А．波波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哲学中的思想比较》（一九七三年），Г．恩涅斯库《哲学和逻辑》（一九七三年），《逻辑体系理论》（一九七六年），К．波帕的《认识论》（一九七二年），《决定论》（一九七六年）等。

阿塔纳西·若霞院士（一九〇四——一九七二年）在考察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时强调指出，现代科学需要“新的工具”，而正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应该成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成为任何研究工作的工具。”[68]这一工具可以与现代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怀疑主义相对抗，后者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不相信科学认识的已经陈旧的方法论手段，而另一方面却是忽视由总结现代科学成果而得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最新结论。

在罗马尼亚，科涅尔·波帕是最先使用“科学逻辑”这一概念的人之一。他在《科学研究的逻辑的对象和方法》一文中，发表了以下的观点，即科学研究的逻辑的对象是“分析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利用的合理的理论形式和方法，发现不管特殊的研究对象如何而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共同的东西。科学研究的逻辑依靠古

典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成就，利用它的三段论的格和式，却又不以这些为限，而是通过逻辑一数学的形式主义表明科学认识的途径，赋予这种途径以数学计算的严格性。”[84]

K．波帕认为，属于科学逻辑领域的，是科学解释的理论，以及为了获得新的信息而把用实验方法得到的新知识综合到改变科学的概念和判断的传统理论体系中去的全部问题。他认为科学论断的证实问题和假说的或然性也属于科学逻辑。

K．波帕认为，虽然科学逻辑同认识论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是密切联系的，但是，不应该把科学逻辑与它们混为一谈。科学逻辑的“基础是具体学科的研究范围的客观性，是科学理论反映周围世界的性质的能力，但是，与认识论和各门学科的具体历史不同，它并不专门研究真理问题，也不专门研究学科的各种个别建议的正确性。”[85]

科学逻辑问题是更广泛的问题——所谓的科学哲学的组成部分。Kp．若霞制定出独特的“科学哲学”概念[86]，她认为，现在无论是哲学本身，或者是单独的某种学科，都没有可能完全再现出现实世界，提供自然界和社会的总的情景，更不用说它们的相互作用。她表示相信，这一任务只有“科学哲学”才能承担，因为它既研究科学认识的方法，又研究这些方法所用于的对象。换句话说，“科学哲学”被定义为论证知识的一般理论和客观现实性的一般理论。Kp．若霞认为，作为论证知识的理论，科学哲学又分为：方法论（而作为方法论，科学哲学是科学逻辑）即关于具体学科的个别方法论和一般科学方法的理论；认识论，它研究由于分析科学原理而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科学认识的客观意义，科学认识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检验科学认识的结果的方法。认识论——这是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上发展的认识论。

作为客观现实的一般理论，科学哲学力图把学者们在各自领

域内建立关于现实一定部分的理论所作的努力加以综合，从而构成世界的全面图景。

在所提出的“科学哲学”的概念中，有很多方面还不明确。例如，它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因为“科学哲学”实际上包括对外部世界结构的研究的一切方面和外部世界的反映，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就化为“科学哲学”，更准确地说，被它所吸收。有一种论点，认为不久的将来会产生一种能够充当其他科学的仲裁人的科学，这种论点也是令人怀疑的。创造出世界的辩证图景是最重要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只有依靠所有知识部门的学者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尽管对于解决现代科学研究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所有学者，包括苏联学者在内，都一致认为，科学研究的逻辑应该运用“一切现有的逻辑手段，其中包括现代形式逻辑的手段，以及其他知识领域例如科学创造的心理学中的资料。”[87]科学研究的逻辑应该把科学研究分析中两个明显的趋向联合起来，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立场“来表现整个科学研究，从一切方面来确定把认识描述为科学研究的种种概念的内容。”[88]

罗马尼亚的逻辑学家十分注意现代逻辑的很多重要问题：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数理逻辑与传统逻辑的关系，对这些学科中的每一学科的对象作出更准确的规定等。

在分析逻辑科学的对象时，Ат．若霞认为“实际上只存在唯一的一种逻辑，而这种唯一的逻辑有三个方面：（1）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2）符号逻辑及其各种各样的计算；（3）来自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尼古拉·库桑斯基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89]逻辑的第一个方面与对内容丰富的思维的研究相联系，第二个方面与对形式化语言的创造和翻译相联系。Ат．若霞认为，辩证逻辑是关于世界全部具体内容的发展和

认识这种发展的规律的科学，是表现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的科学。

与其他很多研究者不同，Ат. 若霞建立了与形式逻辑对称的辩证逻辑理论。他的出发点是，辩证逻辑也是研究思维的规律和形式（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似乎是形式科学），并且具有自己本身的规律。这种规律共有三个。其中两个与形式逻辑规律相对称：(1) 具体同一性规律；(2) 矛盾断定规律。正如罗马尼亚学者所强调的，不能把这些规律与辩证方法的规律混为一谈。具体同一性规律是在本体论规律的概念的水平上的表现，它还是赫拉克利特表述的：一分为二。矛盾断定规律反映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规律使得有可能对主体作矛盾断定。因为形式逻辑的排中律是同真理问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可能表述出与其对称的辩证逻辑规律；只可能把它加以修改，以致辩证逻辑的第三条规律，所谓的补充律，分立出来是带有保留和限制的。

另一位罗马尼亚哲学家A．瓦尔德对于解决辩证逻辑的问题采取另外的看法。他的出发点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由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所组成。“本体论研究自然界和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认识论考察认识发展最一般的规律，而逻辑则研究正确思维最一般的规律”[90]。瓦尔德在区分辩证逻辑的规律时，只同意Ат. 约察对矛盾断定规律的解释。至于其他两条规律（具体同一性规律和被修改了的第三条规律），他认为把它们划分出来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们实际上已经包含在矛盾断定规律中。瓦尔德认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对称地来划分辩证逻辑的规律更为合理。

罗马尼亚逻辑学家Д．巴达拉乌（一八九三——一九六八年）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对那些醉心于数理逻辑所取得的成就而轻视传统逻辑的人。他同样地捍卫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逻辑的

价值和数理逻辑的价值，并且批评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归结为普通的公理体系。巴达拉乌认为，三段论法理论所遇到的困难，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克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归纳和演绎是辩证地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互相补充的。[31]

A．杜米特里乌的著作《逻辑理论》[32]（一九七三年）对于逻辑的对象和数理逻辑在逻辑科学的广泛问题中的地位作了更准确的说明。他认为，逻辑最一般的定义可能是这样的：思考自己本身的思维。他强调说，处于自己最高发展阶段上的逻辑就是理论。至于数理逻辑，虽然它也解决诸如建立演绎系统，分析科学语言、排除逻辑矛盾等这样一些问题，但是严格说来，它本身不是逻辑（即关于思维的科学）。对于罗素、奎因和西方其他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说来，认识逻辑形式和认识实际事物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实际上没有本体论就不可能有逻辑。A．杜米特里乌指出，在现代逻辑中见到的逻辑形式与它所反映的现实之间的脱节造成很大的困难。他强调说，辩证唯物主义摒弃没有任何内容的逻辑形式的概念，在非常牢固的辩证联系中来考察内容和形式。

罗马尼亚哲学家Г．恩涅斯库的《数理逻辑导论》、《逻辑和真实》、《符号逻辑》、《哲学和逻辑》、《逻辑系统理论》、《思维的逻辑基础》等著作[33]，对逻辑的对象作了更准确的规定，说明了逻辑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分析了逻辑和元逻辑的基本部分。正如恩涅斯库所强调指出的，考虑到对于任何理论说来，逻辑结构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今天的认识论，一方面依靠具体的科学，另一方面依靠逻辑。因此，今天的学者不能没有逻辑工具的知识，必须能够自觉运用逻辑工具来分析和组织科学知识，把它作为哲学思考的对象。

К. 波帕在考察逻辑与认识论的关系时强调说，对认识过程的分析是在两个向度即符号学的和人类行为学的向度中实现的。揭示认识的符号学方面必须以认识论的基本概念描述与信息领域有关的现象为准，而信息是借助于具有主体间性质的符号和表现来传递的。在研究认识过程时之所以必须采取人类行为学的立场，是因为认识行为是由情境决定的，并表现在情境中，行为是情境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此外，认识行为是作为行为最佳化手段发挥职能的。

К. 波帕认为，现代认识论的建立应该考虑到教育论、启发论、信息论、逻辑、符号学、心理学、教学论等的成就。"依靠所有这些要素，认识论应该研究认识行为和认识活动的一切形式和现象，从儿童、少年或成人在教授或扩大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以人类积累的知识为基础）中掌握最初的语言符号和惯例起，一直到把人类知识地平线出乎意料地往前推进的现代学者的创造性活动。"[94]

П. 波特察图认为，可以把人的思维活动看成是逻辑活动。而逻辑则是关于逻辑活动的科学。波特察图划分出两种逻辑活动：把某种性质从一个逻辑客体转移给另一个逻辑客体，这是传递性类型推理（例如，三段论法）的基础；从其他已有的逻辑客体建立新的逻辑客体，这是数学结论类型的结构性推理的基础[95]。

对逻辑科学的历史，特别是对逻辑科学的创立者亚里士多德抱有浓厚的兴趣，这始终是罗马尼亚逻辑学家研究工作的特点。在这方面，Ат. 若霞和他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逻辑中心（逻辑中心从一九六四年存在到一九七四年）的同事们，以及А. 弗伦基安（一八九八——一九六四年）、К. 诺伊卡、А. 杜米特里乌等做了大量的工作。А. 杜米特里乌的著作《逻辑史》[96]是逻辑史著作当中的重要现象，在这部著作中反映出逻辑

思想发展的一切时期，从原始的思维到今天，从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的逻辑到最新的数理逻辑理论。

因此，罗马尼亚哲学家努力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逻辑、科学研究的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基本问题。这些研究的特点，是力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和范畴同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结合起来，同在本世纪后半期中发展起来的新科学的成就（控制论、符号学、启发法、现代心理学、数理逻辑等）结合起来，以及同在某种科学或科学群体中产生的认识的方法和形式结合起来（例如，结构的和系统的研究）。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这样的尝试并非总是成功的。其中有一些尝试被罗共和大多数罗马尼亚哲学家认为是客观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表现，这些表现的产生是由于对下面这一点估计不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对一切在哲学上解释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非马克思主义尝试作出准确的意识形态的和世界观的评价。

四、哲学史的研究

哲学史的研究在战后年代就已经在国内科学机构的科学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在人民政权建立后，尖锐地面临着关于利用本国社会思想史中的进步传统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必须指出，在确立和巩固新制度的过程中，国内已经开始的革命改造是在本国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理想轨道上进行的。

最初的一些哲学史著作是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进行着急剧的革命变革的年代写成的。它们带有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其中包括围绕着对思想遗产的态度问题展开的尖锐阶级斗争的痕迹。这就说明，为什么这些著作具有极其强烈的论战性质，并且对国

内精神生活史上一系列现象作了直言不讳的评价。

一九六四年出版的《罗马尼亚的社会和哲学思想史》[97]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它是国内学者们从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掌握祖国的哲学遗产和文化遗产而进行多年工作的成果。尽管存在着某些缺点和疏忽，但是，这部著作在罗马尼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98]

由于所做的工作，以后才有可能在更高的科学水平上来研究祖国的哲学史。罗马尼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在新阶段上面临的任务之一，是同必须修改很多已经陈旧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评价以及更深刻地研究个别的时期和哲学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第二个任务是必须进一步研究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法论，完善再现社会和哲学思想史的形式和方法。这些任务的解决，对于了解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本国哲学史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对于该时期之所以如此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本国哲学在《罗马尼亚的社会和哲学思想史》中所得到的解释的正确性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该书对这一时期的哲学史评述（顺便说一下，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作出的第一个评述）实际上带有公式化和简单化的缺点，而在某种程度还带有虚无主义的缺点。这是因为，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社会思想中各种资产阶级的派别，在一九四四年后加紧进行活动，以便破坏罗马尼亚已经开始的革命改造。社会思想中的这些与社会主义敌对的、往往同外国反动势力有密切联系的倾向，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还长时期地以各种不同的表现发生作用。但是，关于这些流派所作的根据充足的结论往往被不适当地扩大到二十世纪前半期本国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就说明，为什么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大量研究著作都同二十世纪前半期罗马尼亚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历史有关。[99]

在研究哲学史过程的方法论问题方面，围绕关于建立罗马尼亚本国哲学史以及揭示在欧洲哲学范围内罗马尼亚哲学史过程的民族特征和历史起源共同性的标准是否可能和合理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些任务在多卷本著作《罗马尼亚哲学史》[100] 中得到了解决（在Д. 吉西和Н. 戈贡尼阿茨的共同领导下）。

罗马尼亚的学者积极研究世界哲学史，其中也包括现代世界哲学史。在七十年代，以前取得的成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01]。在这一时期，罗马尼亚的哲学史科学又对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史[102]，近代哲学史[103] 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史[104] 进行了新的研究。出版了一批由Ал. 波舍斯库主编的关于现代哲学的新著作[105]，以及由А. 波波克、С. 吉捷和Р. 潘塔齐共同主持编写的《世界哲学史研究》[106]。在这批著作的基础上，计划将来出版《现代哲学史专论》。

深刻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它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遗产，是提高哲学思想的科学和思想理论水平的手段之一。最初罗马尼亚学者特别注意研究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围扩大了。对那些专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上进行“人本主义的”伪造，把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成熟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的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进行批判的目的性就更强了。《哲学杂志》[107] 为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五十周年而出的特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Гр. 特拉扬-波帕关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两卷本研究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的哲学》[108] 的问世，是重要的科学事件。特拉扬-波帕认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早期著作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两位思想家的哲学概念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形成”，因为这两方面虽然也是互相紧密联系的，但毕竟不是相同的。按照特拉扬-波帕的说法，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哲学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太长的过程，在一八四三——一八四四年就完结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则包括以后几年，在一八四八年发表国际工人运动的第一个理论的和实践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之后才完结。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方式独立地创造出自己的哲学："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是一个具有充分独立的哲学思维的人"[109]，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是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或费尔巴哈主义者。

特拉扬－波帕认为，这种立场驳斥了那些试图"把马克思的思想形成，甚至把他的成熟时期溶解于黑格尔主义之中"[110]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断的合理性。但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的形成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截然分开未必是正确的。

总的说来，上述两卷本研究著作对本国的哲学史科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罗马尼亚读者第一次有可能彻底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叙述是考虑到这一领域中的一些最新成就的。

P. 弗洛里安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也研究了这些问题。作者抱定的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初结构"作更准确的说明，"回到"这一结构是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今的进步取决于它回到自己最初的源泉"，即"只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才建立的"那个结构。

弗洛里安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它的只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才建立的结构混为一谈"[111]。他认为，"考虑其他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112]正如罗马尼亚的哲学家所指出的，这种态度会堵塞研究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的途径。在这种方法论立场的

范围内，必然对这一发展估计不足，而这一点又影响到P．弗洛里安的进一步的研究[13]。在罗马尼亚哲学家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思想理论斗争中的历史和作用的著作中，彻底研究了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现代社会和科技进步密切联系的情况下的创造性发展，彻底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在这些著作中[14]，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进行对话的“原则性条件”：必须考虑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哲学中的党性原则、哲学与政治的联系。这种对话的可能性是从以下几点得出来的：不能把哲学只归结为它的意识形态内容；对科学资料的哲学解释与科学资料本身之间、问题与其哲学解决之间存在着差别；除了彻底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外，在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着人道主义的倾向和辩证法的要素等。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科学一系列主要趋向在当代罗马尼亚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问题及其在国内具体条件下的表现，对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达社会主义概念的研究，在哲学和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精神生活发展的主要趋向的理解，哲学史的研究等）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归根到底反映新社会及其精神世界发展进程的该国哲学研究有迅猛的发展，整个哲学文化有所提高，罗马尼亚学者们正在力求了解社会发展和哲学科学的范围更广泛的种种迫切问题。

---

① H．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沿着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道路前进》1970年布加勒斯特版第4卷第350页。

② 参看《批判地评价文献遗产》1972年布加勒斯特版第69、71、92、113—114、168—169页。

③ H．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沿着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道路前进》1972年布加勒斯特版第6卷第226—227页。

④ 《火花报》1976年3月11日。

⑤ 《火花报》1976年3月11日。

⑥ H．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党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与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的活动以及党今后任务的报告》1979年布加勒斯特版第102页。

⑦ 《社会主义时代》1982年第3期。

⑧ 参看《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2年布加勒斯特版。

⑨ 《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1972年布加勒斯特版。

⑩ 《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1972年布加勒斯特版第31、32页。

⑪ 参看《罗马尼亚共产党关于建设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和罗马尼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纲领》1975年布加勒斯特版。

⑫ Б．察哈列斯库《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载于《哲学评论》第3期第302—308页。

⑬ Б．察哈列斯库《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载于《哲学评论》第3期第303—304页。

⑭ Б．察哈列斯库《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载于《哲学评论》第3期第304页。

⑮ Б．察哈列斯库《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载于《哲学评论》第3期第305页。察哈列斯库文章中的论点，在其他罗马尼亚作者的文章中也可见到，但他是联系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来谈这些论点的，因而他的文章具有科学意义。

⑯ Б．察哈列斯库《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载于《哲学评论》第3期第305页。

⑰ P．弗洛里安《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1975年布加勒斯特版第66页。

⑱ A．米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载于《社会主义时代》1975年第17期第28页。

⑲ 《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成熟标准，对修正主义概念的批判》1975年莫斯科版。

⑳ A．布瑞沃克《"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范畴的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载于《哲学评论》1970年第9期第1038页。

㉑ A．布瑞沃克《"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范畴的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载于《哲学评论》1970年第9期第1039页。

㉒ A．布瑞沃克《"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范畴的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载

于《哲学评论》1970年第9期第1041页。

㉓ X·恩涅《从人本学角度对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载于《哲学评论》1973年第4期第411页。

㉔ 《1971年11月3—5日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971年布加勒斯特版。

㉕ K·波尔杨卢《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矛盾的性质和作用》，载于《哲学评论》1973年第1期第31页。

㉖ И·图多塞斯库《矛盾的一般理论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的性质》，载于《哲学评论》1973年第1期第13页。

㉗ 同上。

㉘ И·图多塞斯库《矛盾的一般理论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的性质》，载于《哲学评论》1973年第1期第13、14页。

㉙ 同上，第19—21页。

㉚ 参看K·马雷《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动力》1974年布加勒斯特版第8—15页。

㉛ 参看X·乌谢尔逊《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载于《社会主义时代》1973年第18期。

㉜ 参看И·斯特洛伊《社会主义的矛盾辩证法》，载于《哲学评论》1972年第5期第602页。

㉝ 同上，第604页。

㉞ И·斯特洛伊《社会主义的矛盾辩证法》，载于《哲学评论》1972年第5期第611页。

㉟ 参看：P. 弗洛里安《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过程；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1980年布加勒斯特版；《科技革命条件下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1979年布加勒斯特版。

㊱ 《火花报》1982年2月27日。

㊲ 参看《建立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第63页等。

㊳ 参看《建立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第63页。

㊴ 也参看伊凡西乌——瓦里安卢《经济思想、文化、意识》，载于《经济问题》1971年第11期。

㊵ 《建立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第65页。

㊶ A. 坦纳舍《一般文化和文明：人的意识的多面性的历史类型学》，载于《罗马尼亚社会科学评论。哲学和逻辑类》1966年第10卷第4期。

㊷ 参看《社会意识和社会参与》1977年布加勒斯特版；A. 卡兹《社会意识及其辩证法》1980年布加勒斯特版。

㊸ 参看：M. 拉里阿《对人的解释》1946年布加勒斯特版；K. И. 古里安《新

伦理学导论》1964年布加勒斯特版；э．斯佩兰齐阿《人类进化的心理手段》1947年布加勒斯特版；т．维阿努《人的传统理想》1965年布加勒斯特版。

㊹ 参看：к．и．古里安《人的问题。试论哲学人类学》1966年布加勒斯特版，《非洲民间传统说中的人》1967年布加勒斯特版，《哲学人类学》1972年布加勒斯特版。

㊺ к．и．古里安《人的问题》，参看评论文章：а．г．梅斯里夫琴科、а．д．马季卢《关于哲学人类学问题》，载于《哲学科学》1968年第2期。

㊻ 参看к．и．古里安《人的问题》第18页。

㊼ 参看п．贝拉鲁《人一哲学思考的对象》，载于《当代》1966年第43（1046）期。

㊽ и．雷赞努《在可能性标志下的人》1974年布加勒斯特版第11页。

㊾ 同上，第53页。

㊿ 同上，第59页。

(51) 《建立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第74页。

(52) 《建立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第72页。

(53) а．罗特《多维的人》1975年布加勒斯特版第8页。

(54) а．罗特《多维的人》1975年布加勒斯特版第30—32页。

(55) 参看а．г．梅斯里夫琴科《作为哲学认识对象的人》1972年莫斯科版第5、32—33、52、54页。

(56) 参看：萨默尔《人的异化理论》1972年布加勒斯特版；麦尔日尼亚努《人的状况》1973年布加勒斯特版；哈拉普《人的个性》1976年布加勒斯特版；帕姆菲尔，奥多德斯库《人和思想体系》1976年布加勒斯特版；乌尔兹《卡尔·雅斯佩尔斯哲学中人的问题》1976年布加勒斯特版；科特《有创造力的人》1978年布加勒斯特版；米胡《马克思主义和人的本质》1978年布加勒斯特；斯托塞尔，奥多德斯库《人和信息世界》1978年布加勒斯特版；莫依塞尔《科学和人道主义》1979年布加勒斯特版；尼科赖《人、机器、控制论》1978年布加勒斯特版。

(57) 参看：《社会主义文明及其价值》1975年布加勒斯特版；《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协调》1976年布加勒斯特版；《社会主义文明》1979年布加勒斯特版。

(58) 《社会主义文明及其价值》第22页。

(59) 同上，第22—23页。

(60) 参看：э．阿波斯托尔《三种关于文化的考虑》1970年布加勒斯特版；д．古西《对照》1972年布加勒斯特版；к．и．古里安《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文化》1974年布加勒斯特版；э．察姆菲尔《社会学中的系统模式和文化人类学》1975年布加勒斯特版；м．德雷根涅斯库《制度和文化》1976年布加勒斯

特版；A．若霞《哲学和文化》1978年布加勒斯特版；Э．盖尔《具有创造精神的理想》1978年布加勒斯特版；约安尼德《社会和文化》1979年布加勒斯特版。

61 参看《弗．伊．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版五十周年》1960年布加勒斯特版。

62 参看《弗．伊．列宁九十周年诞辰》1961年布加勒斯特版。

63 参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罗马尼亚的科学思想》1964年布加勒斯特版。

64 参看《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1957—1977年布加勒斯特版第1—17卷。

65 参看《辩证唯物主义——各门学科的一般方法论》1963年布加勒斯特版。

66 参看《科学研究中的辩证方法》1966年布加勒斯特版第1、2卷。

67 参看：蒂柏里乌、杰阿普拉日《客观现实的概念》1976年布加勒斯特版；M．德拉干涅斯库《物质世界的深刻性》1976年布加勒斯特版；皮尔乌《科学和哲学中的存在和现实》1977年布加勒斯特版；B．托诺《辩证法和相对主义》1978年布加勒斯特版。

68 还可参看：H．卡洛希《科学、实践、思想》1975年布加勒斯特版；Г．弗洛里阿《思想和认识》1979年布加勒斯特版；E．波波维奇《社会、思想、认识》1976年布加勒斯特版。

69 И．图多塞斯库、M．弗洛里阿、K．波帕合编《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76年布加勒斯特第2版第7页。

70 《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1978年布拉格版第68页。

71 《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1978年布拉格版第70页。

72 参看：K．И．古里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1976年布加勒斯特版；A．波特兹《现代科学中的启发式的研究和结构》1977年布加勒斯特版。

73 A．瓦尔德《一般认识论的要素》1967年布加勒斯特版；A．瓦尔德编《认识论的倾向性》1976年布加勒斯特版。

74 M．弗洛里斯库《物质或客观现实性》1973年布加勒斯特版第274页；《认识的维数》1977年布加勒斯特版。

75 И．贝鲁《结构性是物质的普遍性质》，载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决定论和认识》1967年布加勒斯特版第121页。

76 M．弗洛里斯库《物质或客观现实性》第204页。

77 参看Л．米洛斯《决定论和有限性》，载于《辩证唯物主义研究》1960年布加勒斯特版。

78 参看A．坦纳舍《必然性和自由》1960年布加勒斯特版。

79 参看M．弗洛里阿《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概念》，载于《哲学研究》1963年第4期第921—922页。

⑩ 参看A. 波波维奇《决定论》，载于《哲学评论》1965年第10期。
⑧1 参看K. 马雷《决定论和现代物理学》1966年布加勒斯特版。
⑧2 P. 弗洛里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导论》1979年布加勒斯特版。
⑧3 Ar. 若霞《逻辑研究》1964年莫斯科版第24页。
⑧4 《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1965年第10卷第257页。
同上书，第258页。
⑧6 参看Kp. 若霞《科学哲学的研究》1968年布加勒斯特版。
⑧7 《科学研究的逻辑》1965年莫斯科版第12页。
⑧8 同上书，第13页。
⑧9 Ar. 若霞《逻辑研究》第287页。
⑨0 A. 瓦尔德《辩证逻辑导论》1959年布加勒斯特版第85页。
⑨1 参看：Д. 巴达拉乌《对于一个关于逻辑结构的唯心主义概念的批判》，载于《哲学研究》1959年第5期；《演绎的重复：混杂的推理》，载于《逻辑行为》1959年。
⑨2 参看A. 杜米特里乌《逻辑理论》1973年布加勒斯特版。
⑨3 参看：I. 恩涅斯库《数理逻辑导论》1965年布加勒斯特版；《逻辑和真实》1967年布加勒斯特版；《符号逻辑》1971年布加勒斯特版；《哲学和逻辑》1973年布加勒斯特版；《逻辑系统理论》1976年布加勒斯特版；《思维的逻辑基础》1980年布加勒斯特版。
⑨4 K. 波帕《认识论：关于认识行为的符号学—人类行为学观点》1972年布加勒斯特版第216页。
⑨5 参看П. 波特察图《逻辑活动》1969年布加勒斯特版。
⑨6 参看A. 杜米特里乌《逻辑史》1969年布加勒斯特版。
⑨7 参加编辑的人员是：K. И. 古里安（主编），C. 吉捷，Н. 戈贡尼阿茨，Kp. 若霞，P. 潘塔齐，A. Л. 波舍斯库。
⑨8 关于这方面更详细的情况。参看A. Д. 马季卢《1944—1969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哲学史科学的发展》1973年基希涅夫版。
⑨9 参看：Н. 戈贡尼阿茨（编）《二十世纪前半期的罗马尼亚哲学和社会学》1969年布加勒斯特版；C. 吉捷《1891—1920年罗马尼亚的哲学和科学》1970年布加勒斯特版；I. M. 格冲《米尔西亚·弗洛里安的哲学基本原理》1971年布加勒斯特版；Н. 西奥多《1921—1944年罗马尼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1972年布加勒斯特版；M. 瓦依达《卢西安·布拉加》1975年布加勒斯特版；A. 坦纳舍《卢西安，布拉加：诗人哲学家——哲理诗人》1976年布加勒斯特版；贝克利安鲁《罗马尼亚的精神性》1980年布加勒斯特版；I. 托马《罗马尼亚哲学的持久性》1979年布加勒斯特版；Д. Д. 罗伊卡《在罗马尼亚哲学

中》1979年布加勒斯特版。

100 参看Д．吉西、Н．戈贡尼阿茨（合编）《罗马尼亚哲学史》1972年布加勒斯特版第1卷；1980年第2卷。

101 对50—60年代外国哲学研究著作的分析，参看А．Д．马季卢《1944—1969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哲学史科学的发展》1973年基希涅夫版第83—117页。

102 参看：Г．弗拉杜特斯库《中世纪哲学史导论》1973年布加勒斯特版，《亚里士多德的试验和归纳法》1975年布加勒斯特版；А．杜米特里乌《奇怪的哲学》1974年布加勒斯特版；Е．斯特里《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史》1977年布加勒斯特版；И．班努《从伦理学观点看希腊哲学》1980年布加勒斯特版。

103 参看：Р．斯托依奇茨《黑格尔逻辑学中概念的性质》1972年布加勒斯特版；К．И．古里安《现代哲学史导论》1974年布加勒斯特版；Н．贝鲁《康德的伦理学》1974年布加勒斯特版；В．托诺《G．巴赫拉德心目中的现代科学精神》1974年布加勒斯特版；特兰达夫乌《对英国经验主义解释的要义和因果关系》1975年布加勒斯特版。

104 参看：Г．弗拉杜特斯库《法国的个人人格至上论》1971年布加勒斯特版；А．波波克《尼古拉 哈特曼》1973年布加勒斯特版；《现代哲学史》1976年布加勒斯特版；《现象学和人的科学》1979年布加勒斯特版；В．托诺《开放的哲学》1972年布加勒斯特版；《辩证法和相对主义》1978年布加勒斯特版；Е．斯特里《现代法国哲学学说和趋势》1975年布加勒斯特版；В．蒂斯曼尼阿努《新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1976年布加勒斯特版；С．吉捷《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历史和方法论概述》1976年布加勒斯特版。

105 参看：《当代哲学史概述》1970年布加勒斯特版；《现代和当代哲学[illegible]

106 参看А．波波克、С．吉捷、Р．潘塔齐合编《世界哲学史研究》1969—1980年出版第1—6卷。

107 参看《哲学杂志》1968年布加勒斯特版第5期。

108 参看Гр．特拉扬－波帕《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的哲学》1973年布加勒斯特版第1卷；1977年第2卷。

109 Гр．特拉扬－波帕《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的哲学》1973年布加勒斯特版第1卷第31页。

110 同上书，第23页

111 参看Р．弗洛里安《纠正一篇几乎造成混乱的评论》，载于《哲学评论》1974年第9期。

112 同上。

113 参看Р．弗洛里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导论》1979年布加勒斯特版第

99—174页。

[11] 参看：A. 波波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哲学中的思想对抗》1973年布加勒斯特版；Г. A. 卡赞《现代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1974年布加勒斯特版；K. И. 古里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

第 六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捷克斯洛伐克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取得了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胜利，从而为劳动群众开创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工人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获得了对国家的领导权，这个国家具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人民高水平的专业熟练程度，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和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捷克斯洛伐克在历史上最短期限内实现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一点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与资产阶级宣传的种种说法相反，社会主义原则、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原则也适用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三十五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进步的出发点，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导致劳动人民解放的唯一现实道路。由于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这种社会－经济改造的结果，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城市和乡村都取得了胜利。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在本国具体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掌握和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它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已变成革命地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革命思想和革命的创造力量取之不竭的源泉。Г。胡萨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一九八一年）上说道，“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全部历史证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

的人极其忠于社会主义，相信它的正确性，在艰难险阻面前不退却，甚至在最复杂的生活情况下不丧失信心，而是英勇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进行斗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制定了并从理论上论证了自己的旨在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活动纲领。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指出，“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捷共中央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使我国每一个公民正确理解我们党的政策原则并积极支持这些原则。”[2]

在科学世界观的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取得了重大成就。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七六年）强调指出的，在社会上，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加强了。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是在顽强的和复杂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一斗争的阶段受全部社会－经济的、认识论的和历史－哲学的先决条件制约。

一、主要的发展阶段和研究方向

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取得对反动势力的胜利之后，共和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自己的发展中经历了五个阶段。这样的分期由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阶段所决定，并且是斗争阶段的反映。

在第一个时期（一九四八——一九五六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刚刚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以K．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早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四六年）以及第九次代表大会（一九四九年）上明确地决定了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在群众中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普及化，这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完成这一任务极其困难，因为国家的理论战线在法西斯占领时期损失惨重。Э．乌尔克斯、Я．施维尔玛、Ю．伏契克、К．康拉德、Б．瓦茨拉维克等人在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牺牲了。绝大多数哲学家是青年人。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顺利传播是由下列情况所促成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在五十年代蓬勃发展的速度被国内外视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优越性的明显证明，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在实践上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适用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哲学家中间，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威信逐渐增长。同时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资产阶级的哲学不能够促使社会问题得到解决。虽然如此，但是在哲学家中间仍然有不少人还长期处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思想的传统哲学流派——马萨利克主义、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影响之下。许多人还没有摆脱社会民主主义理想，尤其是那些在一九四八年以前积极参与社会民主党或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活动的人。

一九五二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范围内成立了哲学研究室，该室于一九五七年改组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斯洛伐克哲学研究所在一九四七年就已成立。《哲学杂志》于一九五三年开始出版。在斯洛伐克，哲学杂志于一九四六年就已开始出版。

一九五一年全国各高等院校毫无例外地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列为必修课。虽然哲学干部明显奇缺，但在布拉格、布尔诺、奥洛穆茨和布拉迪斯拉发的大学里，第一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仍然建立起来了。

由于党进行了细致的工作，捷克斯洛伐克于五十年代中期就

建成了二十二个哲学中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创立了制度基础，便使科学世界观的传播有可能不仅在知识分子中间、而且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进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客观条件第一次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成熟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的标志是研究工作的加强，尤其是在哲学史、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领域内研究工作的加强。哲学干部在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发展的理论任务、对人民进行道德—政治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确立和发展，是与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的顽强斗争同时发生的，这一斗争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和困难而并不总是很顺利的。原因之一是对意识形态工作估计不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常不断地指出，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中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意义越来越估计不足，而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右倾机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现在远远不够，并且收效不大。

到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发展中的不良状况逐渐形成，困难增加了，这些困难并非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经济的客观规律，而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性。在“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实际上培植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真正内容完全相反的、旨在摧毁社会主义的思想。所谓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模式的观念，是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性，同利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首先是苏联的经验相对立的。修正主义分子否认共产党的作用，想把共产党变成与列宁主义类型的政党毫无共同之处的团体。国际反动势力想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就像以前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以后又在波兰所干的勾当那样）来诽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信。这就导致了危机状态，这种危机状态也决定了按次序来说是第三个

时期的哲学状态。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估计到六十年代末在共和国内发生的过程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教训的意义，它在研究已发生事件的性质方面，其中也包括在社会科学领域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在捷共中央全会（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上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和社会上危机发展的教训》这一文件。该文件总结了党在研究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发生危机的原因方面所作的集体努力。文件指出，国内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按照当代帝国主义的意图行事，首先指望利用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瓦解的方法。“右派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力量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进行的斗争中特别注意消除党的领导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准备好了并按阶段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向下列体制的转化，这种体制会使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不仅失去全部革命成果，而且还失去基本的政治和经济的保障……一九六八年一月以后的长时期内我国社会中发生和增长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严重问题和危机现象，表现为在哲学、社会学、历史、经济、国家、法和党的建设领域内以及文化艺术领域内歪曲、忽视、后来甚至直接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在文化艺术领域可以看到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公开投降的现象。”[3]

捷共中央四月和五月全会（一九六九年）表达了党内和人民中间大多数人走列宁主义道路的意志。自从这两次全会以后便开始了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中的第四个时期（一九六九——一九七六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在捷共的日常领导下哲学阵线的逐步团结。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和社会上的危机发展的教训》这一文件中已经强调指出了党的思想工作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证实，在意识形

态领域，无论如何决不允许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任何让步，决不能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妥协。这种事件证实，党不能屈服于实用主义、削弱思想工作、把思想工作仅仅归结为政策的宣传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抽象解释。”¹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同右派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力量进行的斗争中站稳了脚根，使社会摆脱了危机，指引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走上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道路。

哲学和它的邻近科学的制度基础从根本上进行了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主席团通过决议（一九七〇年），以三个机构（哲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室）合并的办法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斯洛伐克科学院主席团作出决定（一九七四年），把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斯洛伐克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并成了统一的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和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附设的哲学研究机关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和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附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都恢复了活动。在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它们的任务是培养教员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设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它的职能是对科学院研究生进行哲学培训。

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国家科技发展规划为国家的哲学研究机关规定了三个范围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是共和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第四个时期的特点：

（一）与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二）研究科技革命及其社会方面的问题。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不仅在于它的现实意义，而且首先是因为在当时，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事件以前，探讨科技革命问题在国内是最有成

效的；

（三）综合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批判修正主义的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观念，因为修正主义观念在当时给社会理论的发展以及政治实践带来极大的害处。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七六年）以后开始了哲学发展中的目前第五个阶段。这一阶段证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一年）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提出的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是正确的。这就要求社会科学深入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和准则，研究对建立在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科技革命成就的基础上的社会进行科学领导的问题。捷共中央主席团从这些任务出发，于一九七七年六月通过了《社会科学发展的统一规划》，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是这一规划的主要内容。

必须指出，在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头几个阶段，捷克斯洛伐克的哲学家自己也承认，显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探讨是远远不够重视的。

辩证唯物主义领域的研究活动一开始就针对方法论问题。全国哲学研究机构工作者会议（一九五五年）把发展作为科学和创造方法的辩证法规定为最重要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研究是辩证法发展的基础，这一研究是以分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问题、分析社会实践和科学思想发展史为依据的。

必须把K．哥特瓦尔德的文章和言论以及后来捷共中央专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而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一系列小册子，看成这方面的第一批著作中的一部分。法西斯占领以后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老一辈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

主义者（其中包括Л．施托尔和В．科彼茨基）是这批著作的编写者。З．尼德莱和Л．桑托的言论和出版物以及Л．斯沃博达的著作都为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事业服务。Л．斯沃博达当时把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译成捷克语。

《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集出版较晚（一九五八年），这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条件下顺理成章地叙述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的第一次尝试。这本文集虽然包含有简单化成分和若干错误，但是对于在广大群众中间和学术界宣传唯物主义辩证法原理来说，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

六十年代初，在一次今天称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争论的大讨论中，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弄清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问题，出现了第一批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专著。Б．法依库斯的《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一九六二年）、Э．乌尔邦克和И．特烈泰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一九六二年）等书论述了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些书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和可认识性的基本原理作了通俗化的解释。

在有关认识论的著作中，突出的是О．坦泽尔的著作《认识论的某些问题》（一九五八年），捷克哲学家的论文集《认识论问题》（一九五七年）以及И．格鲁晓夫斯基主编的斯洛伐克哲学家的论文集《认识的辩证法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在这些著作中，考察了主客体范畴及其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中的地位、科学抽象的意义、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真理问题、因果关系的一些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其他方面。这些著作主要带有科普性质，正如它们的作者本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些著作的使命是："引起人们对某些认识论问题的进一步发展的兴趣。"③它们的意义还在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下第一次明确分清了形

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有一系列著作，尤其是я．雅诺什克的《实践和认识》(一九六三年）一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实践本质的看法。这些著作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即认识基础和真理标准的原理作了通俗化的解释。它们证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实践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已在学者中间传播开来了。雅诺什克在上述著作中保卫列宁的反映论不受Г．А．维特尔和М．Г．兰格的攻击；批判地分析了А．塔尔斯基的语义学的真理概念、Р．卡尔纳普的新实证主义思想，批判了Э．胡塞尔的真理观；揭露了实用主义的反科学性质。例如雅诺什克在否认实用主义的真理和真理标准同一说时，写道："有用性的确是实践活动的方面之一。但是，有用性既不能彻底表明实践本身的特征，也不能完全说明实践是真理标准的意义。"⑥

斯洛伐克哲学家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的研究活动重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方法的基本范畴以及认识论问题，关于基本范畴，主要同当代科学发展的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特别是Л．桑托的文章）。

И．格鲁晓夫斯基的著作在认识论问题以及一般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他的《哲学今昔》（一九六一年）一书谈的主要是哲学史问题，但作者以该书全部内容强调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对科学认识的意义。他的《问题、画像、回顾》（一九六五年）一书也是这样一本具有多方面内容、涉及许多哲学问题、在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方面起过明显作用的著作。И．格鲁晓夫斯基的专著《某些认识论问题》（一九五三年）专门分析认识论的迫切问题。

在共和国的哲学战线团结过程完成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接着做出了新的努力（Й．泽列内、

Й. 泽曼、Я. 杜勃尼契卡、З. 雅伏雷克、М. 斯基巴、Й. 斯塔霍娃）。研究了哲学范畴的起源和本质问题、范畴体系和范畴结构的形成问题，逻辑范畴体系和思维史的相互关系问题。正如В. 切尔尼克、Э. 法尔卡晓娃、Й. 维采尼克所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从人们的实践活动来说明范畴的起源，这就使人们能够把哲学范畴理解为现实关系的抽象、人从概念上（理论上和精神实践上）把握客观世界的富有内容的形式，能够说明范畴的本体论方面、认识论方面和逻辑方面的统一。Э. 德拉贡认为整个范畴体系是主要种类的范畴的综合，即物质存在形式、对象性、联系和发展的综合。时空范畴属于第一类范畴，它们是所有其他范畴的规定性的组成部分。对象性范畴更深地表现内在性质，联系的范畴表现外表的性质，而发展的范畴则表现时空范畴的内在性和外表性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间，对于哲学范畴和科学概念（首先是普遍的科学概念）的相互关系，存在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哲学家认为，某些普遍的科学概念（例如，“体系”、“结构”、“信息”等等），已超越了一种科学的范围，成为许多科学部门甚至一切科学部门的研究对象，因而变成哲学范畴。另一些哲学家认为，普遍的科学概念决不能变成哲学范畴。例如М. 苏希断言，科学概念只能间接地转成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构成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个范畴都具有一定的功能，因此决不能从这个体系中随意消除掉什么东西，同样也不能随意给这个体系加进点什么东西。如果随意地使普遍的科学概念享有哲学范畴的地位，那么这必定会引起对整个范畴体系的错误的理解和运用。

分析了范畴体系和认识过程的相互关系问题（Й. 斯塔霍娃），物质、意识和实践的范畴在认识理论中的地位（В. 切尔尼克、

Э. 法尔卡晓娃、Й. 维采尼克）。发展了关于人的认识的多层次性质的思想（M. 布里札）。这一思想也被推广到哲学范畴上去。扩大了对唯物主义辩证法问题的兴趣。考察了相互作用这一范畴的普遍意义（Й. 措乌法尔）。研究了辩证法范畴和系统论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З. 雅伏雷克、Й. 泽曼等人的《辩证法和系统观点》一九七九年版），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Й. 泽曼《矛盾的自然科学方面和认识论方面》一九八一年版），以及抽象、假设、证明、矛盾等范畴，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化问题，科学、哲学和世界观的相互关系问题（Ф. 契热克《理论和经验》一九七四年版）。

科学理论被当作认识论的有机部分进行了研究。B. 费尔科恩从列宁关于由现象到本质、由不深刻的本质到较深刻的本质这一认识过程的观点出发，得出结论说，科学理论应当研究多层次的系统。（为了比较，我们要指出，实证主义研究单层系统，只限于研究现象）。在科技革命条件下，自然科学的发展获得巨大规模，概括这一发展的新成果和批判资产阶级观点的需要增加了。Й. 泽曼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反映论和控制论》一书在解决这个任务方面是一大贡献。① Й. 泽曼的著作谈到自然科学和认识论的哲学问题，对当代物理学、宇宙学、控制论、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等等的新发现的理解。泽曼研究了控制论的认识论问题，力图说明信息论的成果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紧密联系。同时，他试图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寻找自然科学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联系。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举办了跨学科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一九七八年于斯摩林尼采），题目是《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偏重于讨论“从哲学和自然科学观点来看物质和运动”的问题。在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特别注意列

宁著作（主要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解决当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方法论问题的意义。还讨论了科学认识的数学化问题，数学原理的哲学问题，由于最新科学成就而产生的某些宇宙学规律性，以及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看的当代微观世界的理论。

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以自己的发现直接为社会的实践活动服务。在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同苏联学者合写的《社会主义和科学》（一九八一年）一书中研究了在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基础上科学发展的前景，以及在新质量、高水平上改造科学的过程。自然科学的哲学成了Ю．施维格朗、М．斯基巴、Й．普晓娃、И．查普列塔尔的学术研究对象。

认识的方法论的意义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而增长。正如Й．宾卡瓦强调指出的，认识的方法论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在思想斗争中的作用加强了。他揭示了辩证法在克服自然科学领域中重复出现的危机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了实验技术的新性质及其科学理论发展的意义。

经常性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哲学问题研讨会，是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合作的形式之一。研讨会除了别的任务以外，还负责举办学术会议和发表研究成果。例如，发表了《物质和运动》（一九八〇年）和《空间和时间》（一九八二年）等研究著作。

对哲学理论的掌握和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认识手段和程序的掌握的水平。捷克逻辑学家К．贝尔卡的著作，首先是他的《度量。概念，理论，问题》一书⑧，研究了一些科学程序或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概念。К．贝尔卡把度量看成在客观的历史既定条件下被运用的、经验－数学的方法，而客观的历史既定条件是决不能随意变动、忽视或改型的。由于度量问题直到目前为止主要在操作主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和新实证主义

的范围内发展，所以作者批判地分析了这些流派。

出版了几本逻辑学方面的教科书（K. 贝尔卡、И. 查普列塔尔等）。

战后最初年代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基本任务是在一九五五年全国哲学代表会议上确定的。这些任务主要可归结为：必须研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哲学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在这个时期研究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唯物主义历史观、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等问题。

3. 雅伏雷克的专著《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对象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相互关系专论》（一九六二年）在当时出版的著作中占显著地位。作者在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考察了从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的原初抽象规定转为对某种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的研究的方法。在这方面，他批判了在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基础上实现的、传统的科学分类法，并且按照他的看法提出一种以抽象和具体的普遍性的辩证法为依据的、更为深刻的科学分类法。雅伏雷克规定，特殊社会规律性的概念是客观规律性的最普遍的具体形式。因此，他力求既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对象的相对独立性，也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紧密的相互联系。

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在K. 波马依则的著作中。波马依则写了一系列著作，特别在《一九一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的问题。》（一九六五年）一书中，制定了研究民族问题的一系列方法论原则。他强调必须估计到社会发展中主客观的相互作用。波马依则建议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全面研究作为评价主观因素作用的基础的客观任务

范畴，研究具体历史情况下现实存在的条件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可能性以及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他强调指出在某一主体状态下的必然和偶然的差别，论证了批判主观因素作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估计到每一具体情况下历史发展的不同方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波马依则还指出了在研究历史现象时思维抽象的无可辩驳的作用。

K. 波马依则在分析民族问题的一般问题时，特别注意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他批判下面这种对列宁观点的歪曲解释：似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一个以上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胜利。波马依则强调指出，“这种解释显然是歪曲的、错误的。在某种情况下，这种解释甚至具有同列宁的看法完全相反的意思，并且——如果首尾一贯的话——就会在“现实主义地”遵循事实的幌子下变成维护——尽管不是有意地——右翼社会党人的政策，而列宁的论点正是针对这些右翼社会党人的。革命的失败（甚至我们能举出它的全部原因）不是革命不可能胜利的无可辩驳的证明。”③

波马依则批判了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关键性观点的曲解，证明列宁谈到过社会主义不可能同时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胜利。但是列宁不仅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同时在几个国家（哪怕为数不多）取得胜利在原则上是可能的，而且还肯定地提到了这种可能性。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第十五次、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给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改造世界的指南，研究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强调指出了生产力在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复杂的社会体系（B. 贝达、Й. 哈夫林、Л. 彼兹拉尔、B. 克维什）。

特别注意研究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分析这一理论的主要特征（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理论和方法的统一，一般和特殊的统一，以及这一理论的国际性）。探讨了社会革命的问题。A．德沃夏克强调指出了任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这不取决于它的经济水平和社会水平，只依靠人民民主革命，不涉及在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德沃夏克还特别提到那些实现革命的主观条件尚不成熟的工业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他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种国家的实例。

开始探讨社会意识的问题（M．勃鲁日克、Л．图尔昌），研究社会意识的方法论问题（P．科普索娃）。在研究民族问题方面迈出了新的步子（B．普列札、Я．埃尔马日、K．卡拉、Д．海科）。例如在K．波马依则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和国际的相互关系》（一九八一年）一书中研究了民族和国际的辩证法。B．普列札写道："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联邦建立之后，捷克人民和斯洛伐克人民以及居住在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达到了自己发展的新阶段。正因为这样，民族问题也获得了全新的意义。"[1]总结了民族问题研究方面各门社会学科所取得的成果。例如在И．白楚拉的著作以及集体撰写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和少数民族发展的规律性》（一九七九年）一书中反映了这一情况。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的讨论

在上面谈到的全国代表会议（一九五五年）上提出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和方法的问题，这个问题发展成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的多年讨论，从实质上看，就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对象以

及这一哲学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政策的意义的讨论。

参加讨论的大多数学者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和作为它的方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合理性。他们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是决不能脱离辩证唯物主义来理解的哲学科学，只有唯物主义辩证法才能成为它的研究的主要方法。同时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必须对它的基本范畴和概念作逻辑的认识论的分析。

这种观点引起看法上的某些分歧。特别是有的哲学家并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却断言：如果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认识论分析被认定为唯一的方法，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停滞。

参加讨论的许多人支持这一立场，同时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必须以社会学研究、对社会现象的具体研究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而且，他们提出要优先注意社会学研究。自然，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必须考虑到，没有任何必要把这种研究同辩证的方法对立起来，因为这种研究只有在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进行而不是同它并列在一起的条件下，才保持科学的性质。

的确，共和国的主要社会学家曾明确表示过：社会学研究只有助于收集那些需要进一步理论概括的事实，这种研究不能取代辩证法。但是后来，他们把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分开来，把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叫做研究的基本方法，而把社会学本身称为“摆脱世界观”的经验主义。

在讨论过程中，那些在以后（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最积极地参与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家（M．普鲁哈、И．斯维塔克），试图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本身，也就是对列宁所说的“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1]提出怀疑。想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党的政策

对立起来的意图暴露无遗。

И．斯维塔克最积极地试图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他断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运用于各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今它的内容有了变化，它好像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参加讨论的其他人的看法的不成熟性明显地表现如下：他们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同时却反对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彻底推广去研究社会现象这一论点。他们的基本论据是这样一种站不住脚的看法：既然辩证唯物主义的确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似乎就决不能被看成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过程。

好些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彻底推广去研究社会现象的论点，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规定为有关社会的哲学知识体系，强调必须研究它的范畴。这些哲学家确切说明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现象的观点，认为“推广”这一用语本身往往被理解得不完全正确。他们提醒说，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物质运动的最一般规律，但是还有不仅对自然界有效而且也对社会和思维有效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问题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的一般，在个别中，在社会中特殊地表现出来。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即它的演绎。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是社会实践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即对它们的归纳。历史唯物主义依靠辩证的逻辑的分析，来研究社会科学的最一般规律和范畴，是它们的方法和理论。

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和方法的讨论范围内，还讨论了

科学共产主义的对象和方法的问题。参加讨论的大多数人在当时一致认为，科学共产主义的问题长期来部分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内进行了研究，部分地又在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范围内进行了研究，科学共产主义是一门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独立学科。但是，科学共产主义也具有一系列由于它同各国共产党的活动的紧密联系而产生的特点。

я. 克洛法奇和в. 特鲁斯丹反对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解为独立的学科。他们写道，没有理由把科学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划分开来，因为它们的差别只存在于概括程度的不同。根据他们两人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具体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去认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的规律性、从而也完成科学共产主义的任务。

在讨论的过程中和由于讨论的结果而出现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专著，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此同时，讨论也带来一系列的损失。在明确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和社会学的特征的过程中，失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共同基础，这就是说，给理解构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独立学科的统一性和本质带来了损害。结果开始形成了那种在以后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倾向。历史唯物主义逐渐不再被看成社会科学的基础。它日益被具体的社会学研究所代替。使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化”、使它与哲学问题相脱离的意图加强了。出现了把科学共产主义和社会学等同起来的初步尝试。

在叙述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和职能，以及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其他社会政治问题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错误的论点。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教科书以及若干研究著作——я. 克洛法奇、м. 斯沃博达、в. 特鲁斯

丹的《决定论和进步的问题》（一九六三年）、Я．克洛法奇《论社会中的矛盾》（一九六二年）、П．马霍宁《通向无阶级社会的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关系》（一九六一年），虽然在形式上还谈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问题，但实质上已经反映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脱离。尤其是П．马霍宁的著作犯有一系列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他后来的其他著作所叙述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观念上有进一步的表现。

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又回到这次讨论上来，结果是：相当多的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权探讨最一般的题目，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被说成与社会学问题等同，这种社会学"摆脱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实质上说，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学。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讨论，不是办公室里的争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是讨论的基础。早在捷共中央于一九五九年通过的《关于当前哲学状况的报告》这一决议中，在提到当时的哲学著作时就指出："这些著作反映了一定的成就，但也没有消除重大的缺点"⑫。这不是偶然的。这一决议还指出，在相当多的著作中未能避免基本错误，原因不仅在于有某种程度的简单化和庸俗化，而首先在于试图使哲学范畴的研究脱离社会实践，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政策。哲学问题脱离生活、脱离社会实践，尤其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政策这种倾向在国内相当多的哲学家中间广泛传播，他们力求把哲学问题引进"纯"科学的范围，这就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同时产生的最重要缺点。

无论在捷共中央的决议揭露哲学脱离生活的倾向并批判地分析产生这一倾向的根源的时候，还是在后来公开讨论哲学和政治的联系、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时候，哲学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的联系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这种脱离的倾向开始于一九五六年并转化成了围绕哲学的“非意识形态化”口号的斗争。这一发展成多年争论的斗争实质上决定了共和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每一个哲学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从原则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如K．科西克、И．斯维塔克、M．普鲁哈之流）以及进行战斗的、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其中最彻底的有Л．施托尔、Л．桑托、Я．谢德拉克等）都亮了相。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它的这一或那一领域的“管辖范围”的讨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捷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教员集体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科书对历史唯物主义对象的范围和内容作了规定。⑬以Ф.齐赫为首的写作班子撰写的一本书⑭叙述了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学的概念、范畴及其方法论的意义。

著名斯洛伐克哲学家A．西拉茨基院士在《时代和思维》一书中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科学共产主义问题的划分仍可继续讨论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下述结论具有重要意义：“归根到底，应当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某一学科的‘管辖范围’，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从阶级的党的立场出发去研究某些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问题。”⑮

讨论的现阶段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制定了关于哲学同社会改造的实践必须紧密联系的唯一正确观点。⑯共和国的大多数主要哲学家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当作最高程度的普遍性的理论体系，而且从它的地位和任务的观点出发，把它说成各国共产党活动中的方法论指南。研究了作为科学世界观一般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哲学被看成是从理论上把握现实的普遍形式和这一把握的普遍方法。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被确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确定社会科学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发展新阶段的任务这个角度来看，集体撰写的《社会科学中的经验、理论和实践》一书⑰引起人们的兴趣，作者在书中试图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条件下的社会科学发展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的问题。在K。哈耶克的《哲学和专门科学的统一性》（一九八〇年）一书⑱中也强调了哲学和实践的更紧密联系的必要性。按照哈耶克的意见，正是这种统一性才能促使哲学和专门科学的发展，更有成效地解决社会提到它们面前的任务。

三、对科技革命问题及其社会方面的研究

早在六十年代初，研究科技革命问题和科技革命对人和社会的社会后果问题，就是从某种程度上热衷于抽象理论化向研究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关的问题过渡的最初重大转变。在P．里赫塔领导下集体编著的《文明在十字路口》一书（一九六四年版）表现了哲学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有紧密联系的思想，并证明了在科技革命条件下有必要深化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的科学原则，必须最佳地利用目前更高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对科技革命及其后果的研究，使学者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革命的空前规模，社会的物质基础的迅速发展，具有根本革命变革的性质，这种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改变文明的内容并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创巨大可能性。如果说当时工业革命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现代科技革命按自己的内在逻辑是和共产主义的准备与产生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上述那本书的基本结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时并没有把革命任务仅仅归结为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是指生产力的革命改造和在这一体系中的人的状况。该书作者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些思

想、断言马克思曾把科技革命设想为对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定义，工业革命尽管具有不同的形式，但从实质上看，仍然是生产工具的变革。而当代科技革命的特征在于：它作为全部生产力的经常不断的全面变化而发生，它使生产力的全部结构转动起来。

社会主义为科技革命开创了无限的可能性，同时又在科技革命中经受了严重的历史考验。弄清楚不寻常的大变化的意义，本身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所碰到的一系列最重要问题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明，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实行国民经济管理和计划的新体制时所采取的步骤是极其必要的。

捷克斯洛伐克学者估计到自己国家的特点，表述了共和国所面临的、与科技革命有关的、进一步发展的具体任务。从而反映了研究工作的实践倾向性，以及研究工作对共产党和全体人民正在进行的改造活动的巨大意义。

有一个时期（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某些著作对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问题的阐述带有哲学人本主义的偏向。一九六八年在玛丽亚温泉召开的国际性代表会议上的某些发言中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人——科学——技术（对科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经验）》（一九七三年）一书的出版，消除了问题的人本主义化倾向。这一研究著作是对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的科技革命及其发展的完整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综合分析的经验。它由捷克斯洛伐克学者与苏联学者一起集体完成，并且在瓦尔纳第十五次国际哲学代表大会之前出版。

该书作者写道："科技革命是科学和技术、它们的联系和社会功能的根本改造。这种改造会导致社会的生产力在结构和动态上的全面变革，这就是说，科学这一直接生产力渗入到生产的一切

组成部分并改造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在科学的综合的工艺学运用的基础上人在生产力体系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科技革命按其实质来说，表现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代的规律性，科技革命服从于这些规律性，是这一整体过程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从历史的角度为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技术前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和利用它。”⑲

书中进行的分析涉及科技革命的一切基本方面：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自然科学和技术中的革命问题），社会经济方面（与科技革命有关的社会经济变化），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方面（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变化在社会意识中的反映）。

对科技革命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引起人们特别的兴趣。作者力求证明，这个革命是这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正在产生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与它相符的物质技术基础。由此产生了把科技革命的成就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的历史任务。学者们得出结论说，与资本主义的道路不同，存在有一条科技革命发展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从科学和技术中的革命变化出发，通过生产力结构上的变化、经济发展性质上的变化和人的劳动内容上的变化而到达全面发展的个性的形成。

因此，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革命的怪现象和陷入绝境的状态。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革命的怪现象和陷入绝境的状态之所以发生，原因在于：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不到指引，此外，从社会潜力来说，科学和技术既相对不足又有“过剩”。该书作者认为科技革命的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在于：科学对这一革命的过程的影响不仅越来越大，而且在这一革命过程中科学本身的逻辑方法论基础受到根本改造，制定了合理解释世界的新手段。起决定作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渗入到一切科目的科学认识基础，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符合现代科学知识中主客体的

复杂结构的唯一的逻辑－方法论基础。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布拉格共同召开的题为《科技革命和社会科学》的国际会议（一九七六年），对进一步研究科技革命问题很有意义。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中提出的与科技革命有关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科技革命的看法，这种看法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长期纲领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相对的是，资产阶级学者则致力于寻找摆脱深刻矛盾和社会困难的出路，这种矛盾和困难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里采用科学和技术的方法不对头而造成的。

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继续发挥这样的思想：在解决有目的地管理为了人的利益而开发自然的过程这个问题时，社会关系起关键性作用。正由于在技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生产的社会组成部分的过迟发展之间的深刻冲突，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亿万人民今天仍经受着文明史上一种最深刻的危机，即人的生活的价值和人的活动的意义的危机。

哲学家们（Я．奥勃津娜、М．皮特涅，М．胡拉科娃、Л．巴尔塔、К．莫拉契克等人）强调指出科技革命在现代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要意义。科技革命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前景的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竞赛中的最重大因素之一。它加速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加深和扩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同时引起它发展的当代阶段所特有的新矛盾。Р．里赫塔也早已有这种看法，例如在利布利采有关的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科技革命观的理论基础的代表会（一九七七年）上，他就在报告中发表了这种看法。他认为，科技革命在两种对抗制度的条件下把双重任务提上日程：一方面，它要求进一步更深刻地认清这一发展过程的基本原理、性质和社会联系，另一方面，它造成与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修正主义进行思想斗争的空前广阔的场所。这一斗争是通过解决下列问题而实现的：科学和技术在现代世界上的作用问题，怎样才能合乎目的地引导科技革命发展的趋势以及在这方面社会主义优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等问题。

为了具体说明和实现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赞同在彻底采用科技革命成就、促使生产有效的集约化、为发挥人们的全面创造积极性创造有利条件等方面所采取的综合性措施。正如捷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的那样，这些措施构成更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决定性条件。捷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实现科技发展，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真正革命任务”，特别指出，“联邦政府、共和国政府、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一切为实现科技进步负有责任的人，都应当努力促使科学研究基地的管理符合社会实践的需要……现在必须认清，科学和生产的最紧密的一体化是当代最主要的要求之一……必须努力促使科技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中心环节。”⑳

根据捷共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从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采用科技革命成果的角度出发，实现对科技革命前景的综合研究。在这方面研究了工人阶级在建设成熟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的作用（M. 福尔曼涅克）、对社会过程的综合科学领导（K. 哈耶克）、社会的计划和预报（O. 舒尔茨、Й 斯里伐）、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K. 莫拉契克、K. 哈耶克）、科技革命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等等问题。这些研究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科技革命条件下制定对科学领导的有效政策的基础，这些研究已经在集体编写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条件下的科学发展。一九九〇年以前基础研究发展预报》一书（一九七九年）中得到了体现。

四、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分析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问题研究上的重大错误曾引起社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巨大政治偏向。正如《危机发展的教训》这一文件中所指出的，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观的主要毛病在于：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阶级成熟性已达到的水平估计过高，对已经失败的、但还没有完全消灭掉的阶级敌人的力量和可能性估计不足。对国内的和国际上的、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不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而在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中过早地和无根据地提出了只有各阶级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和根本消灭阶级才能解决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也谈到了这一情况："愿望往往被冒充为现实，这是主观主义冒进的原因。由于对社会的阶级的社会结构作深刻分析不够，只能对发展的现阶段给以肤浅的估计，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规定了非现实的期限。"㉑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部在Φ．哈尔瓦特领导下集体撰写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结构及其在六十年代的发展》（一九七二年）一书，以及斯洛伐克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斯洛伐克社会－阶级结构变化》（一九七二年）一书，符合已经成熟的对社会的社会结构分析的需要。这两部书的作者提出了建立对社会主义社会结构观的任务，这种社会结构观可以同那种根据非批判地借用资产阶级的"社会层次论"和结构功能论来表述的观点相对抗。

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结构及其在六十年代的发展》一书中利用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阶级成份的丰富统计材料，这一材料使人们能够作出关于现代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理由充足的结论。在捷克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强调指

出，虽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为加速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社会结构中发生的变化创造条件，但是这并没有提供任何根据可以来任意对待阶级斗争的逻辑和社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阶段。相反，这要求"最大限度地动员力量，来彻底地、真正地克服阶级矛盾的一切残余。"[22]

斯洛伐克社会学家的著作《斯洛伐克社会—阶级结构变化》一书的特点也在于有科学根据，它的结论是在共和国城乡进行的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的。根据这些材料，在著作中考察了斯洛伐克工人阶级中发生的变化、乡村中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知识分子在斯洛伐克社会结构中所占有的地位。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学家编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的第一批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社会学书刊中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已形成的空白，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的立场迈开了最初的步子。

A．瓦涅克的《社会结构》（一九七五年）一书对进一步阐明上述问题很有意义，该书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这一结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变化的过程，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还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层次论，批判了П．索罗金、M．韦伯、T．帕森斯、C．M．李普塞、P．达伦多夫和其他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社会结构观。批判帕森斯的观念是迫切需要的，因为正是他的思想在六十年代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发生过巨大影响。关于这一点，A．瓦涅克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结构观与帕森斯的看法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认为结构依赖于阶级的存在和所有制的性质。而帕森斯对标准和价值的理解带有抽象的非阶级的性质。反共的趋同

论也正是从这里产生的。”[23]

A. 瓦涅克还批判维尔纳的阶层化理论、C. M. 李普塞和Г. Л. 泽特尔贝格的社会流动性理论、P. 达伦多夫的阶级观和社会层次论，这种理论主要是通过“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办法创立的。A. 瓦涅克的这本书的教育意义在于：他考察了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家们”感到“难办”的问题的认识论根源。他写道：“所有这些立论的出发点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理论。反共思想家热衷于利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确证：‘真正的’革命只能是工业革命，而这一革命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生的。”[24]

在这方面，令人感兴趣的还有Ф. 哈尔瓦特、Й. 林哈特和Й. 维车尔尼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阶级结构》（一九七八一年）。该书作者认为，社会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和关系的辩证法造成社会结构，因此，决不能把社会的社会结构仅仅归结为经济结构。应当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意义和目的就在于它的社会完整性，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思想的发展的统一。作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结构的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方面。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它们的组成部分（首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和关系的相互关系，都是由主体和它的活动的辩证法的原则决定的。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学家们十分注意对社会结构的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方面。他们认为，应当把认识的产品估计为一种受数字和语言、数量和质量的辩证法支配的准确性、真理性和使用价值的关系。知识的融会贯通只能从知识的系统部分和历史部分的统一中产生。

然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书刊中指出，在某些著作中，尤其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问题的著作中，未能彻底克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思想、特别是阶层化的观念。正因为如此，所以捷共

中央主席团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通过的《社会科学发展的统一规划》，重新把《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主导作用》这一题目规定为主要题目之一。根据这一规划并在对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形成方面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要在以下领域发展理论的和经验的研究，即在对社会过程进行综合科学管理，首先是对科技革命的可能性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优越性的有机结合过程、科学和生产的结合过程等等进行综合科学管理这个领域内开展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社会发展的综合计划和规则寻找最佳方案。这种研究受对共产党的职能的研究的制约，共产党是这一过程的主要领导力量，它保证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目标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佳发展。

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和社会学家（P．罗什科、M．福尔曼涅克）在实现《统一规划》提出的任务时，研究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社会结构的问题。一九七八年在共和国内，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社会结构现状及其发展趋向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学和统计学的研究。研究成果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理论概括中被广泛利用。这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发生的变化（B．鲍赫、M．卡特里亚克、K．斯利夫卡、Я．弗拉奇尔、A．克瓦斯尼契科娃、A．斯列皮契卡），科技革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影响（C．斯拉杰克），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Ф．卡恩），合作社农民的改造问题（O．贾特科、Я．巴尔托、P．哈斯普拉、M．高兰斯基），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接近的迫切问题（M．弗兰采斯基），培植知识分子的当代倾向（A．马捷耶夫斯基）。出版了集体撰写的专著：《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阶级结构和

社会结构的研究法》（一九七九年），《科技革命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发展，以及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加强工人阶级主导作用的方法》（一九七九年），《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增长》（一九八○年）。

五、对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研究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这一任务要求本国的社会科学深入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性和准则，以及对建立在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科技革命成果基础上的社会进行科学领导的问题。捷共第十六次例行代表大会指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总路线仍然有效。现在我们的直接任务是：研究和具体说明当前时期的这条总路线。"㉕在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研究捷克斯洛伐克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迫切问题，将是今后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重要任务。

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关于社会科学的发展、现状和任务》的决议，并且考虑到对哲学发展的整个过去阶段的批判分析，上面已经谈到，捷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社会科学发展的统一规划》，在这一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了"哲学、社会学和科学共产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要求集中大批力量来研究与科学和科技革命进一步发展有关的问题（尤其是在采用生物学、生态学、控制论和物理学的新发现方面的问题），以及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精神认识并实际改造世界的新阶段所产生的方法论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根据捷共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着手研究的问题的基本范围是：论述成熟社会主义社会建

设的规律性，分析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结构中的变化，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发展，社会各阶级和各社会集团的接近，这些阶级的日益增长的共同性。特别重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作用的实现问题，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作为新社会关系的积极而自觉的体现者的社会主义个人的发展问题。共和国主要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科学院院士A．西拉茨基、З．斯尼梯尔、Р．里赫塔、В．齐尔贝斯、以及Я．佩采恩、Я．涅托皮里克、К．瑞赫塔吉克、М．齐果、В．鲍赫和其他许多人都专门写有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的著作。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解决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文化教育水平的任务时，还力求更加巩固劳动人民的政权，提高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地确信，它在社会改造过程中所取得的社会地位，是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存在和巩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国工人都十分明白，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任何攻击，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反对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26]

有一系列著作，其中包括Б．涅梅茨的论文《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七五年），论述了建设成熟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党的领导作用增长的问题。作者认为党的领导作用的增长原因有二：（一）随着社会主义社会成熟性的提高，党的作用客观地在增长；（二）党的作用必须增长，因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作用的斗争更加激烈了。Б．涅梅茨在考察党的作用的增长的客观原因时，集中注意力研究以下情况：生活领域和社会关系日益扩大和复杂化，这要求自觉地和科学地加以调整，参加积极的历史性创造活动的群众人数的增加，要求提高群众的文化水

平、自觉性和社会积极性；同时还注意科技革命提到社会面前的任务。在Φ. 哈夫里契克领导下集体编著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增长》[27]以及И·胡梯拉的专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现阶段的主导作用》[28]证明党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加强是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的客观社会—政治规律性之一。

在M. 绍尔茨的《党的统一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一书[29]中，揭示了发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工作的日益增长的意义，强调指出必须经常不断地加强党的统一——党的活动能力的基础。作者认为，同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思想工作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一九七五年召开了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性标准的讨论会，这次讨论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党的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对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综合评价的标准上。确认必须注意运用标准的变动情况、研究和实际实现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纲领性原理的标准的统一。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附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同布拉格苏联科学文化馆联合举办了题为《从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和捷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看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一九七七年）的讨论会，对于这个问题的发展富有成效。在讨论会上，特别是在Л. 诺沃提尼的报告中，试图把表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的特征的基本过程确定下来。这就是：把发展社会生产当作发展社会生活的社会领域的前提，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巩固和完善化，提高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提高人民的社会积极性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化表现，提高社会发展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人的个性以及形成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

Я．佩采恩在说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时写道："可以把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描绘成这样的社会：它的经济、社会一政治和文化的生活条件获得全面的和谐的发展，这时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客观规律和原则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里都充分表现出来……成熟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表现为：这个社会具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在科技进步、生产集约化、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工业获得持续的发展。发达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一政治方面表现为：这个社会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它的两种形式的不断接近、国家所有制的作用深化的基础上建立了牢固的社会一经济关系。"㉚

社会科学和社会改造的实践紧密联系的必要性决定了对社会过程的计划和管理问题的讨论的发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特别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参与撰写国际性研究著作《社会的计划和预报》而获得日益广泛的规模。引起人们兴趣的著作有Ф．库塔、М．索古普的《科技革命时代的管理》（一九七八年）以及《社会效益和社会计划》（一九七五年），还有库塔的专著《社会过程管理体制》（一九七六年）。М．皮特涅的著作《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九七九年）、Я．克列依奇戈、М．米契克、В．佩尼采、Ф．齐赫等人的著作，论述了管理问题、对世界问题的综合研究和全球性发展的战略。一九七六年在利布利采召开了题为《社会计划和预报》的国际讨论会。由于这次讨论会的召开，对社会预报问题的兴趣大大提高了（М．索古普、К．瑞赫塔吉克、О．舒尔茨、Й．斯里伐、М．伊里涅等人）。在开展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方面，一九七八年成立的研究社会舆论的研究所起了巨大作用，该研究所的工作成果对领导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科学原理的深化很有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问题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与这

个社会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社会的后果之一。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过程，这个客观过程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过程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产生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这些特征是与消灭人剥削人、建设自由和平等的人们的无阶级社会这一崇高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首先取决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程度。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问题之所以具有迫切意义，是因为这个问题在当代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作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生活的条件、它们的潜力和前景，都是这一斗争的组成部分。

И．阿布拉哈莫维乔娃在说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时写道：这是“相对独立的现象，它包含社会实践（作为自己的前提，作为使它具有一定性质的客观条件，而且也作为自己的因素），包含各阶级和个人在生产和占有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过程中的具体历史活动……因而某种类型的生活方式是在客观上被决定的，它的内容和规模是由生产方式的性质以及从它产生的社会实践来决定的。”[31]

М．胡拉科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问题》（一九八〇年）一书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问题。她在书中还提出生活方式的定义，分析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优越性，表明科技革命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形成的意义，而主要的一点是：她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同时，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活方式的矛盾性质决定文化和文明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胡拉科娃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价值等级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价值加以对比，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文化、科学、教育的优越性，主要是社会主义劳动的优越性，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劳

动是人的自我确认和自我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成为И．赫鲁札、И．苏希、В．勃雷赫纳奇、Ф．赫隆斯基、Ю．苏希、Й．林哈特、Ф．齐赫、О．苏莎、О．舒尔茨、Я．涅托皮里克、Й．维车尔尼克等人学术兴趣的对象。И．赫鲁札强调指出，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形成的基础，那么，后者也将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这一力量将帮助巩固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和人们的意识，“为了我国整个社会和每一个人的进一步全面发展而积蓄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精力”。[33]

捷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的兴趣加强了。捷共中央附设高级政治学校组织了一次有关《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问题的国际会议（一九七六年）。会议参加者得出结论说，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分析，以及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传相对立的、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论据充足的宣传，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在会议参加者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生活方式”一词已成了科学的范畴，而生活方式本身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进行思想对抗的据点之一，因为这一概念的内容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中人们生活的一切重大方面。它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的政治体制、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等。会议参加者确认生活方式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增长。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未把一切归结为这种依赖关系，它着重注意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具有本质的不同。

在集体撰写的专著《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一九七八年）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生活条件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形成》（一九七九年）中，捷克哲学家力求表述区分两种生活方式的基本特点，按照他

们的意见，这些特点表现如下：首先，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具体历史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体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基础、对生产力的运用方式以及对这些特点进一步发展的途径的实现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别的本质不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之间的本质差别。第一、这种本质既对生产力的增长、也对生活水平的发展和以此为转移的生活方式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性，发生决定性的影响。第二，这种本质的影响也表现在生产力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上。生产力的增长从来不会自动地引起全体居民生活水平的同等的提高。这在科技革命时代情况也是如此。一切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最后，第三，生活水平提高对生活方式形成的影响不是自动的过程，它也取决于生产关系，取决于阶级和社会集团在其中的地位。

在集体撰写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一书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合乎目的的发展形成客观的基础，并构成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有机部分”[33]。M．索尔佐娃认为，问题的迫切性的原因首先在于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不研究阶级、社会阶层、社会集团和一定的个体的生活方式发展中的基本倾向，就决不能保证社会的发展、首先是它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当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将为谁而生产，这些人将有什么样的需要和利益。”[34]

在斯洛伐克学者的著作中，问题的迫切性是以主观因素的日益增长的作用来论证的。他们认为：

“（一）生活方式是生活现象的历史的具体结构，首先是不同社会主体活动的结构，通过这种活动结构，社会主体对自己生活再生产的客观条件作出积极的反应。（二）作为生活方式因素

的个别生活表现，也像它们相互交织成的关系一样，首先反映生活的社会条件及其历史具体性和阶级分化，因为生活的社会条件是由该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决定的。

（三）生活方式的内容包括：1)生活过程的一切领域中的生命活动系统；2)产生和满足生活需要的过程；3)调整生命活动的生活理想、价值、观点和标准的体系。”[35]

Я．维杰奇科娃认为，应当成为进一步明确说明生活方式理论观的出发点的不是不同形式的生命活动的这一或那一总和，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重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人的生命活动同社会发展的联系、它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36] Р．鲁吉契卡也注意到有必要明确说明“作为范畴的生活方式”问题的范畴方面。（一九七九年）。

关于人及其意识的形成问题的研究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题为《关于人的科学的一体化的迫切问题》讨论会（一九七三年）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讨论会参加者指出，研究人的问题，不仅是自然科学的任务，而且首先是社会科学的任务，因为社会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是人的形成的决定性方面。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讨论会（一九七六年）上强调指出，尽管关于全面发展的个性的思想早在过去的理论观念中已经存在，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给它以科学基础，才说明了这一思想得以实现的条件。哪儿也没有像在人的问题的解决上，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同时表现得那样明显。

在А．西拉茨基的《人的社会世界》一书（一九七四年）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系中的巨大作用。西拉茨基用克服人本主义的办法来确定人的社会世界，他不仅把人放到历史中，而且放到一定的阶级结构中去考

察。他强调指出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在社会过程的体系中的决定意义，但没有陷入经济主义，他说明经济条件、公有制体系、经济的管理和计划是如何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形成发生决定性影响的。

A．西拉茨基在考察异化问题时，驳斥了那种把异化看成任何社会（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非暂时现象。他把异化的形式同“经济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得出结论说，要消除异化的一切形式，首先就必须奠定社会主义的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西拉茨基得出结论说，“新的共产主义的个性，只有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在性质上全新的社会关系的条件下，才能和谐地发展起来”。[37]

著名斯洛伐克哲学家Л．桑托对人的问题的讨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逝世以前（一九七四年）经常回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来，强调指出科学世界观对个性的形成的作用，把人理解为社会决定的品质同个人特性的辩证统一。

B．弗尔塔夫斯基在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人的问题》一书[38]中表明，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构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本质。近年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这一问题之所以特别注意，是由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特点、培育全面发展的个人和形成人们之间新的共产主义关系的任务而引起的。它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自由和责任心以及他的思想信念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M．马尔希克领导下集体撰写的《人的哲学问题和社会主义个性的形成》[39]一书中，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的观念的基本特点，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的观念，说明了个性的概念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品质的个人表现、社会关系的个体存在形式和人的社会性的尺度，而个体的概念则是生物社会的概

念。开展了对个性发展的规律性的研究（К. 维达、М. 戈卢波娃），对社会和个性、集体和个人的辩证关系的研究（Я. 杜勃尼契卡、Б. 格拉伏娃），对个性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深化的产物和前提的问题的研究（М. 福尔曼涅克）。指出了有必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范围内研究人的专门哲学问题（Я. 波德纳）。捷克哲学家和斯洛伐克哲学家的合著《社会主义的人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一九八三年）引起人们的兴趣，这本书分析了劳动集体在培育个性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方面的作用。捷克哲学家和保加利亚哲学家的合著《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一九八三年）也引起人们的兴趣，这本书分析了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意识的形成、发展和功能的问题。

在意识形态斗争加剧的情况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理论有助于人们区分真正的价值和虚假的价值。在这方面，Я. 斯维特莱的《价值和评价》（一九七七年）、В. 布罗吉克的《价值、标准和世界方案》（一九七六年）、Й. 穆吉克等人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的人的价值》（一九七七年）使人们感到兴趣。

出版了有关世界观形成问题的研究著作。在В. 格鲁里赫的《社会主义个性的世界观剖视》一书[40]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一全新类型的世界观、它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中和个人的精神面貌上的作用进行了逻辑—历史的分析。在《科学世界观和辩证法》[41]和《社会主义社会和人的生活的价值》[42]等书中研究了科学世界观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统一、它的认识论功能和社会的功能、认识和行动的辩证法问题的统一。

在一系列著作中揭示了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发展的基本规律性（Я. 涅托皮里克、Й. 穆吉克），意识和道德的阶级制约性（Й. 劳科特卡），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Ю. 兹

瓦拉），在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中主客观因素的辩证法，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者的活动中一般的、特殊的、独特的因素的关系（З．蒙茨林格尔），社会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对个性的全面发展的意义（M．戈卢波娃）。关于人们意识中旧事物残余问题的研究（T．加列契卡）引起人们的兴趣。

六、哲学史的研究。同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以及在它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事件以后，哲学史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老实说，从Ф．帕拉茨基开始，历史的倾向性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思想发展的一种特点。关于当代问题——民族问题，自由、政权、所有制和党派的问题——的一切讨论，都是在哲学史问题讨论的基础上进行和解决的。

此外，在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阶段之所以注意历史一哲学问题，还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这是由干部的状况决定的。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哲学的大多数代表人物，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立场决不是由于自己观点的深刻进化，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就确定自己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科学兴趣。正如A．西拉茨基指出的，他们认为在哲学史范围内，“分析可以在‘中立的领域’进行，不会有脱离‘纯’科学和‘干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危险”。[43]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初阶段特别注意哲学史问题讨论的原因在于必须恢复共和国社会思想的进步传统。尽管查理大学（布拉格）讲授哲学已有六百多年之久，但资产阶级思想家却力图证明，哲学思维并非捷克人民所固有，实践主义、

实用主义和对理论的厌恶才符合它的民族性格。

在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思想恢复名声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第一任院长З．尼德莱有很大的功绩。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没有官方机构的参与，主要是由革命运动的活动家来实现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把这一历史事实解释为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战线的薄弱。但З．尼德莱认为，恰恰相反，这一事实说明了哲学战线的力量，因为这一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生活、同社会改造的实践是紧密联系的。З．尼德莱号召发扬捷克思想的进步传统，其中包括胡斯主义、捷克的新黑格尔主义、捷克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同时要展开斗争，反对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精神来解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社会思想史。

理论讨论会在研究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史问题方面作出了最初的贡献。在一九五五年召开的讨论会上讨论了哲学史的对象和方法问题，一致决定，把批判地重新评价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史上的问题和方法论、认识哲学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和人道主义思想史中的地位，看作哲学家的最重要任务。

利布利采会议（一九五八年）对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发生巨大影响，这次会议的论题已超出了预定的范围，涉及哲学本身的对象问题和一般哲学著作的观点。З．尼德莱和许多有关哲学史观点的研究者不是把哲学解释为专门学科，而是解释为表现在著名进步人士的各种著作中的哲学思维。他们指望哲学家去研究这些人士的著作或者研究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的所谓光荣时代（胡斯主义、文艺复兴等等）。因此，会议提议在研究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史方面，要偏重于历史上的辉煌时代或著名思想家家的著作（Я．А．考门斯基、Б．鲍尔扎诺、Ф．帕拉茨基、Э．阿尔诺德、А．斯米塔那等人的著作）。

由于在最初讨论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的情况下确立了这种立场，所以主张把意识形态同科学对立起来的那些人就利用这一立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K．科西克批评Φ．梅林关于哲学同阶级斗争有明显联系的看法，与此看法相反，科西克认为，哲学家注意的中心应当是“哲学著作本身的原文”，而决不是阐明哲学思想发展的外部前提或社会条件。

当然，研究历史事实和各种不同的外部情况，并不是哲学的对象。但是，如果不估计到这些事实和由这些事实产生的决定社会政治条件的情况（这一“原文”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那么，任何“哲学著作本身的原文”都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被理解和得到说明。

会议的材料以文集的形式出版，书名是《捷克人民历史中的哲学》（一九五八年）。于是形成了专门论述哲学史问题的作者圈子。写了一系列有关捷克哲学史的重要研究著作。在这些书中特别突出的有M．卡拉布的《奥古斯金·斯美塔那》、Й·切尔尼的《论捷克生理学家依尔吉·普罗哈兹卡的某些自然科学的哲学观点》（一九五六年）和《依尔吉·普罗哈兹卡和德国自然科学的哲学中的辩证法》（一九六一年）、C．施特罗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九六二年）等著作。

一本集体撰写的书《斯洛伐克哲学史简论》（一九五七年）后来经过扩充和修订，再版时书名为《斯洛伐克哲学史概述》（一九六五年），该书是对斯洛伐克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一次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本书对斯洛伐克社会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客观的看法，虽然它的作者也犯了某种程度的主观主义的错误、但主要是对社会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评价不相称。同时，也和捷克哲学家的某些著作一样，这里明显地表现出研究对象与

它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相脱离的倾向。

斯洛伐克哲学和世界哲学的历史在И. 格鲁晓夫斯基的学术兴趣范围内占很大地位。他的《论奴隶制希腊的哲学》(一〇年)一书广为人知。作者在《阶级斗争史中的哲学》这一小册子（一九五二年）中集中注意力于社会和社会思想发展中的革命转变，试图确定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最重要源泉。格鲁晓夫斯基还在《哲学史中的三个首创》这一专著（一九五九年）回过来谈哲学史问题。在这里，他分析了哲学发展中的主要阶段，利用这一分析来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方法论的发展的追切问题。他的《哲学今昔》(一九六一年）一书 实质上是这位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总结，但他并不单纯在哲学史问题的领域内进行研究。И. 格鲁晓夫斯基在回顾哲学发展中的基本阶段时，着重叙述了认识论、本体论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问题。在这方面，他研究了一系列哲学范畴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原则，并通过这种办法力求反映这样的结论：科学认识的一切领域的基本规律性归根结底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为依据的。И. 格鲁晓夫斯基就在这本著作中密切联系所研究的问题考察了有关科学和文化的党性和任务的问题。

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特别是它发展的列宁阶段，那么，对它的研究是不够积极的。Й. 泽列内《谈谈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一九六二年）一书 的出版是一件大事，该书详细地分析了马克思的基本著作的逻辑结构；研究了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所运用的科学分析；探讨了逻辑和历史的相互关系问题，辩证的结论和转化的性质、因果关系和矛盾的概念和作用、现象和本质的相互关系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类型的科学思维发展的某些问题。

Л. 桑托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的发展问

题，他早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条件下就已决定捍卫列宁主义思想，并且一直继续捍卫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Л．桑托坚定不移地批驳了把列宁主义说成纯俄国现象的论断，证明把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是毫无根据的。他断言：列宁主义是国际的革命学说，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时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时代、人民解放运动和殖民制度瓦解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Л．桑托在一九六八年的言论具有特别的意义，尤其是他在《列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一九六八年）中断然驳斥了在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激进主义的广泛流行的精神变态情况下对作为哲学学说的列宁主义进行修正的倾向。

Я．涅托皮里克和З．雅伏雷克捍卫列宁主义，论证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雅伏雷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成是“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情况下不断发展和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结果”。⑭

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的危机发展时期，人们以两种方式“贬低”列宁主义：其一，否认它的国际性质；其二，否认它的哲学意义。因此，现在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旨在克服这些机会主义观点。Ф．哈夫里契克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一九八〇年）一书中证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新时代，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国际解放运动的发展中的新时代。列宁了解社会发展的状况和前景，世界革命过程的主要思潮，不仅总结了三次俄国革命的经验，而且也总结了全世界工人运动的经验，确定了具有国际规模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地域的力量对比关系。

在一系列著作中强调指出了列宁作为哲学家的卓越意义（В．

齐尔贝斯、Я．波德纳、Й．斯塔霍娃、С．施特罗斯、М．胡拉科娃、Р．罗甘），列宁对当代科学认识的原理的形成的贡献（В．契哈克）、列宁的反映论的意义（В．萨依勒），自然科学的哲学观念（М．齐果、Й．泽曼、Я．杜勃尼契卡）、辩证法理论（В．费尔科恩）、科学共产主义发展中的列宁阶段（Ю．兹瓦拉）。在福尔曼涅克的《列宁主义对当代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意义》（一九八〇年）一文中研究了列宁的方法和他的理论的基本特征、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实践和理论的有机统一。

目前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相当大一部分力量仍然在研究哲学史问题。出版了许多关于黑格尔的著作，还有一些关于费尔巴哈、谢林的著作（Й．切尔尼）、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作（Т．蒙茨）、关于柏拉图以及有关苏联各族人民的哲学史的著作（В．盖罗尔德）。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有论述捷克社会思想史的文章（С．施特罗斯）、论述斯洛伐克社会思想史的文章（Э．瓦罗晓娃、М．托波尔斯基），特别是关于胡斯主义的文章（В．盖罗尔德）。

为恢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思想的进步传统，做了以下工作：再版К．哥特瓦尔德著作；重新出版共和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其中包括Я．施维尔玛的《著作选》（两卷集，一九八一年），Э．乌尔克斯、Ю．伏契克、К．康拉德的个别著作；重印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期刊《群众》的所有各期（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七年）。

С．施特罗斯主编的一部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文选《哲学和革命》（一九八二年）的问世，是历史－哲学问题讨论发展中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这部文选证明一九一八至一九四八年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思想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发生和形成的年代。这部文选分析了共和国社会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和不

太知名的人士近五十来人的作品，强调指出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共和国社会思想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形成的巨大意义，指出了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作为革命哲学发展的建制中心的作用。

因此，在哲学史方面，研究了国家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基本阶段，阐明了这一思想的最重要传统，揭露了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史观。这大大地促使人们去重新认识对捷克斯洛伐克文化的进步倾向和一般进步的社会思想的理解。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又一次提醒人们："要求以阶级警惕性和对资产阶级思想不妥协的精神教育人们，这仍然是今后我们全部思想工作的基本准则。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各种牌号的修正主义，反对人们意识中的市侩习气的种种表现和残余，这一原则性斗争是我们经久不变的任务。"[45]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经常面临的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的任务，现在具有更加巨大的意义。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制度基础的成立，就消灭了资产阶级哲学的制度基础，但是资产阶级哲学的思想和观念继续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知识界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按照西拉茨基的说法，直到现在，它们还在"愚弄社会现实，帮助保存庸人，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式的庸人。"[46]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阵地的巩固和哲学干部的成长，出现了第一批旨在反对资产阶级哲学倾向，特别是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传统派别之一的实证主义的重要著作。广为人知的有Й．泽曼的著作《实证主义批判》（一九七六年）和《捷克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批判》（一九七九年）。在一九七九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举办的批判实证主义的讨论会经常展开活动，它的工作成果有系统地刊印发表出来。另一些批判分析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的著作（Й．斯塔霍娃、И．霍拉克）也引

起人们的兴趣。

在为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过程中，为揭露和克服马萨利克主义——帝国主义时期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捷克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早在一九四六年捷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就确定了自己对马萨利克的理论和政治遗产的态度。在捷共文件中，不止一次地强调马萨利克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意义，马萨利克曾为反对教权主义、君主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进行了斗争。但同时始终不渝地注意到他的反苏主义、反列宁主义的反动性质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修正主义实质。

关于马萨利克主义的文章并没有作出深刻的分析（К．科西克、Л．斯列依施卡、М．马赫维茨）。由于为数不少的哲学家当时还很年青，刚刚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一般对于运用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分析资产阶级哲学的意义估计不足，从而对马萨利克主义没有作出深刻的、科学的批判性分析。在Я．奥勃津娜的著作[17]中，特别对马萨利克及其接班人Э．贝纳热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制定的"抽象"人道主义观念、以及成为马萨利克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人道民主制"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非常注意批判结构主义。在对结构主义进行批判分析方面，Л．施托尔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一九六六年，他就敏锐地觉察到结构主义的复兴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科学所包藏的危险性。在他的《论文学艺术的形式和结构．关于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和布拉格文学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基本立场》（一九六六年）一书中证明了社会科学尤其是文艺学同生活联系的迫切必要性，断言在实现这一联系的道路上出现了结构主义的广泛进攻，结构主

义特别在文学中只限于研究作品“本身”。施托尔强调指出，只有从社会发展的来笼去脉来研究作品，才可能有客观的研究。

结构主义也受到社会学家M．卡特里亚克的原则批判．这位社会学家在自己的言论和著作中始终一贯地主张必须以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所研究的现象，并批判了结构主义的形而上学性质。

在《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跨学科会议（一九七六年）上表明了：结构主义是哲学－方法论的唯心主义观念，这种唯心主义观念把结构的范畴当作整个科学范畴体系的基本的和主要的概念。会议促使学者们对结构主义抱正确的态度。同时它表明，结构主义的传统在国内还是强有力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哲学家，例如T．加列契卡和M．托波尔斯基已注意到这一点。

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事件之后进入同资产阶级哲学斗争的新阶段。首先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批判分析，因为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成了“智囊团”，所谓“布拉格之春”的思想家用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貌似科学的观点就是从他们那里讨来的。有关这个题目的最大研究成果表现在З．雅伏雷克及其写作班子的著作中，也表现在Й．切尔尼、П．霍拉克、M．哈维尔卡、M．斯沃博达等人的著作中。

З．雅伏雷克和他领导下的写作人员[48]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史、对该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从M．霍克海默尔起到Г．马尔库塞为止）的理论观点，作了严肃的批判分析。按照作者们的意见，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由民主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所决定，但它不能找到通向革命工人运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寻求自己特有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第三条道路”。书中揭示了资产阶级关于法兰克福学派

似乎是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革命核心这种神话的反科学实质，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应当到马萨利克的观念中去寻找，因为他曾把俄国同欧洲对立起来，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某种神秘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

Р．希玛的专著《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及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一九七六年）对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部专著的基本意义在于：它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是如何从这一学派的“知识”中找出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根据的。

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趋同论使为数不少的哲学家入了迷。对趋同论的批判，符合共和国哲学思想发展的需要。А．西拉茨基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起应当揭露非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社会根源，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受‘后工业’消费社会即普遍福利社会的理论的强烈影响……”[49]

《资产阶级意识的危机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组成部分》（一九八二年）一书揭露了“消费”社会理论的反动实质。Д．贝尔、З．布热津斯基、А．土林的观点也受到了批判（在О．克列依奇、В．高尔尼亚克、Э．乌尔邦克的著作中）。

在Ф．哈尔瓦特和Й．维车尔尼克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阶级和阶层》一书[50]中强调指出，М．韦伯的观点之所以是反科学的，原因首先在于：他用阶级、政党的多元论偷换了社会本质的阶级观和经济观的统一论，用市场偷换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等等。韦伯以后的关于社会的社会结构观念没有超过韦伯的观点的范围。

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加强了对当代资产阶级哲学主要流派的批判：对新实证主义的批判（Й．泽曼、В．齐尔贝斯、Я．波

德纳、К．哈耶克等人），对К．波佩尔认识观的批判（В．切尔尼克），对现象学的批判（Й．皮亚契克等人），对新理性主义的批判（Я．瓦伊达，Я．依拉塞克）。探讨了批判当代民族主义的方法论问题，注意到民族主义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的作用。哲学家在分析当时突然爆发的民族主义时，力求表明：除了主观的思想根源以外，民族主义还有客观的物质根源，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解释了实现共产主义运动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的具体历史原则。证明了这一政策及其一切具体表现具有不变的阶级性和国际性。研究了成为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主义顶点的反苏主义的历史根源，驳斥了民族主义的反苏谣言。[51]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特别强调指出同民族主义和反苏主义进行斗争的意义。在给代表大会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中心力求利用民族问题和民族差别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这迫使我们特别注意要同民族主义和反苏主义的一切表现作斗争。国内和国际的状况要求我们不断加深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意识，准备不仅建设和保卫自己的国家，而且要保卫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和进步。"[52]

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对修正主义的批判，那么，这种批判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修正主义倾向聚积的同时展开的，这一阶段的基本工作集中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内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上。

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Л．施托尔和Я．谢德拉克很明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哲学战线的命运要在这次讨论中得到解决，而在引起讨论的К．科西克和И．斯维塔克的文章中已经露出了修正主义的根底。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

家阐明，哲学“非意识形态化”的要求远非无阶级的要求，而是从一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提出的要求。

《科学和意识形态》文集（一九七五年）批驳了那种把科学和意识形态加以形而上学的对立的说法，它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的总结。在文集中证明，研究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它的自我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意识形态的发展分不开的。

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关于哲学知识性质的效能学的人道主义观点，捍卫了对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解。Й．泽列内属于第一批站出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假唯物主义倾向的人，他对这种倾向作了论据充足的批判。他有根有据地提出警告说，这种假唯物主义倾向，远不是像捷克斯洛伐克当时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无害。Й．泽列内在修正主义倾向聚积时期站出来批判效能学的观点，反对否认外部自然界先于人的实践，即反对否认客观现实的形式之一。

批判修正主义的第二阶段早在一九六八年事件以后就已展开，它的明确目标是分析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的原因和倾向。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著作以外，А．西拉茨基、Я．奥勃津娜、Я．克列依奇戈、М．福尔曼涅克和М．纳尔塔的著作在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上起了主要的作用。Л．何札尔和Я．涅托皮里克的《捷克哲学发展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一九七五年）一书也对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进行了分析。书中谈到了各种西方机构（其中包括流亡者机构）利用危机的情况，这些机构的活动由那种从意识形态上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施加影响的任务所决定。施加影响的目的是瓦解党的统一、对知识分子尤其是科学和文化领域内知识分子进行意识形态加工、把青年吸引到反社会主

义势力方面去，破坏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这两位作者对修正主义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解释中的两种倾向——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倾向，提出了批判性的评价，两种倾向的目的在于使哲学脱离政治和意识形态，使理论脱离实践、知识分子脱离工人阶级。他们表明这两种倾向早在五十年代下半期就已产生，指出这两种倾向在党的思想工作削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同右派势力的意识形态汇合，变成为国内"知识分子反对派"的思想基础。作者写道："一方面，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前途渺茫论，不能有效地解决已成熟的问题，另一方面，对思想工作估计不足，忘记以阶级观点来看问题，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美化形势，这样就促使知识分子形成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对派核心。"㊸

作者在分析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倾向时，批评了捷克斯洛伐克主要修正主义分子之一的K．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一九六五年）一书。实际上，这是对该书的第一次具体批判，正如Я．弗依齐克指出的，评论界的混声大合唱当时曾对这本书推崇备至，如果你不想被人怀疑要制止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只有在它面前诚惶诚恐，毕恭毕敬。K．科西克被批评是因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错误地解释为唯科学主义的哲学、"没有人"的哲学。他提出了创立首先从能动的批判主体出发的"哲学新观念"的任务。他的目的是用哲学造成反对党的政策的批判工具，借助它来按照自己的观点实现对社会主义的修正。正如两位作者指出的："这不仅证明他对自己采取非批判态度，而且证明他没有能力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辩证法、它的发展的倾向和由此产生的任务。"㊹

K．科西克受批评还因为他试图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加进"实践派"的效能学的人道主义观念，这样为修正马克思主义哲

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和列宁的反映论创立前提。科西克把“存在主义的”范畴包括到实践中去之后，就把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归结为主客体的辩证法，从而站到主观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七十年代发表的对修正主义批判的著作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宣传围绕着“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掀起的新浪潮。“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是由国际反共主义挑起的，并且是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家们”的虚妄言词表现出来的。这里指的是И．斯摩科夫斯基的《回忆录》，А．杜布切克、З．姆莱纳日、В．哈维尔、М．雷曼、К．科西克等人的信件，以及某些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签署的《七七宣言》。Р．里赫塔和В．卢姆的《所谓自由》一书（一九七七年）的出版是对《七七宣言》作者们的回答。书中说明了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家们”感到难办的问题，详细地研究了自由的概念，它的历史发展，指出自由受人对自身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掌握程度的制约。

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修正主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在许多场合，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不仅要作出政治评价，而且要正面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他们进行这方面工作指明了方向。

捷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和其他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在指出意识形态斗争的明显激化时，都注意到这一点：对西方来说这一斗争不仅仅是思想的对抗，世界上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人显然蠢蠢欲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在增长。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哲学政论作品中，批判水平显著提高了，如对反共主义的批判（М．马托什、В．费尔科恩、Я．库契拉、З．马索普斯特、Я．谢德拉克、Р．罗什），对资产阶级未来学的批判（О．苏莎、О．舒尔茨、Я．弗拉奇尔），对后工业

社会理论的批判（O. 克列依奇、Й. 斯里伐）以及对资产阶级战争与和平观念的反社会性质、军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根源、它的思想和社会心理因素的批判。批判了当代军国主义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反共倾向性以及它们向非理性主义方面的演变，证明用科技革命的特点，用必须把“升级”当作在核战争边缘上保持经常性平衡这一点来为军国主义辩护，是站不住脚的。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成功地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增加祖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在共和国内，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日益完善化，政治制度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在扩大。在解决这些任务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依据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劳动人民的创造主动性、自我牺牲精神和满腔热情，他们的自觉性，以及社会科学（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就。

---

1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982年莫斯科版第50页

2 同上书，第21页。

3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党内和社会上的危机发展的教训关于党内团结的迫切问题的决议（1970年12月捷共中央全会批准）》，1971年布拉格版第28页，参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党内和社会上的危机发展的教训》，1971年莫斯科版第40—41页。

4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和社会上的危机发展的教训》1971年布拉格版第29页。

5 《认识的辩证法的问题》论文集，1961年布拉迪斯拉发版 第7页

6 Я·雅诺什克《实践和认识》1963年布拉格版第199—200页

7 И·泽曼《认识和信息》1962年布拉格版；《控制论和当代科学》1961年布拉格版；《辩证法、信息和反映》1979年布拉格版；《反映论和控制论》1978年布拉格版。

8 К·贝尔卡《度量的标尺》1972年布拉格版；《优先论的逻辑——方法论问题》，载于《理论和方法》1976年第3期第45—68页；《度量，概念、理论、问题》1977年布拉格版；《伯纳德·鲍尔札诺》1981年布拉格版

⑨ K．波马依则《一九一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的问题》1965年布拉格版。

⑩ B．普列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关系》1979年布拉迪斯拉发版。

⑪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443页。

⑫ 《关于当前哲学状况的报告》，载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决议和文件汇编（从捷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到一九六〇年全国代表会议）》1960年布拉格版第313页

⑬ 参看B．勃雷赫纳奇等人集体编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1978年布拉格版。

⑭ 参看Φ．齐赫等人集体编著的《当代社会学的对象是什么？》1979年布拉格版。

⑮ A．西拉茨基《时代和思维》1979年布拉迪斯拉发版第118页。

⑯ 参看A．西拉茨基、K．瑞赫塔吉克《思维和行动的社会学》1976年布拉迪斯拉发版；A．西拉茨基《时代和思维》1979年布拉迪斯拉发版。

⑰ 《社会科学中的经验、理论和实践》1978年布拉格版。

⑱ 参看K．哈耶克《哲学和专门科学的统一性》1980年布拉迪斯拉发版。

⑲ 《人——科学——技术（对科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经验）》1973年莫斯科版第352页。

⑳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25—26页。

㉑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五月二十五——二十九日于布拉格）》1971年布拉格版。

㉒ Φ、哈尔瓦特等人著《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结构及其在六十年代的发展》1972年布拉格版第19页。

㉓ A．瓦涅克《社会结构》1975年布拉格版第200—201页。

㉔ A．瓦涅克《社会结构》1975年布拉格版第194页。

㉕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23页。

㉖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19页。

㉗ Φ．哈夫里契克主编《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增长》1978年布拉格版。

㉘ H．胡梯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现阶段的主导作用》1978年布拉迪斯拉发版。

㉙ 参看M．绍尔茨《党的统一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1980年布拉格版。

㉚ Я．佩采恩《捷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的社会科学》，载于《新思想》1977年第9期第78—79页。

㉛ H．阿布拉哈莫维乔娃《需要和利益及其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的影响》，

载于《哲学杂志》1976年第6期第920页。

32 И．赫鲁札《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载于《哲学杂志》1971年第6期第786页。

33 《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1978年布拉格版第6页。

34 M．索尔佐娃《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及其在家庭中的形成》1979年布拉格版第10页。

35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理论和实践的问题》1979年布拉迪斯拉发版第25—26页。

36 参看Я．维杰奇科娃《关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出发点》，载于《社会学杂志》1980年第2期第125—142页。

37 А．西拉茨基《人的社会世界》1974年布拉迪斯拉发版第178页。

38 参看В．弗尔塔夫斯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人的问题》1978年布拉格版。

39 《人的哲学问题和社会主义个性的形成》1978年布拉格版。

40 参看В．格鲁里赫《社会主义个性的世界观剖视》1979年布拉格版。

41 参看《科学世界观和辩证法》1978年布拉格版。

42 参看《社会主义社会和人的生活的价值》1979年布拉格版。

43 А．西拉茨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斯洛伐克的发展的五十年》，载于《哲学杂志》（考门斯基大学哲学系学报总第Ⅶ—Ⅷ卷）1971—1972年布拉迪斯拉发版第30页。

44 З．雅伏雷克《列宁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辩证标准问题》，载于《哲学杂志》1970年第2期第272页。

45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51页。

46 《新思想》1980年第23页。

47 参看：Я．奥勃津娜《列宁主义的政治概念》1971年布拉格版；《列宁主义的政治概念和对"人道民主制"的批判》1978年莫斯科版。

48 参看З．雅伏雷克等人著《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和思想体系。（对某些观点的批判）》1976年布拉格版。

49 《新思想》1980年第3期第24页。

50 参看Ф．霍尔瓦特和И．维车尔尼克《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中的阶级和阶层》1978年布拉格版。

51 参看К．波马依则《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78年布拉格版。

52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51页。

53 Л．何札尔和Я．涅托皮里克《捷克哲学发展中的思想斗争》1975年布拉格版第118页

54 Л．何札尔和Я．涅托皮里克《捷克哲学发展中的思想斗争》1975年布拉格版第68页。

第 七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南斯拉夫

马克思主义在南斯拉夫的传播，是与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诞生和发展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在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生活中有悠久的传统。它起源于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创者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一八四六——一八七五年）及其追随者。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有瓦萨·佩拉吉奇（一八三三——一八九九年）、德米特里·图措维奇（一八八一——一九一四年）、弗朗茨·热列兹尼卡尔（一八四三——一九〇三年）、瓦西里·格拉维诺夫（一八六八——一九二九年）等人。

一九一八年建立了独立的多民族王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一九二九年起称南斯拉夫。在此之后，国内哲学思想的特点是两个基本派别，即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哲学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斗争。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于一九一九年建立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民群众奋起为自身的解放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核心形成了。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从而为探讨哲学问题作出了贡献。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理论家中，值得一提的有菲利普·菲利波维奇等人。许多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其中有O·普里察、B、马斯列沙、Дж、约万诺维奇等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民族解放斗争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和政治的成就创造了条件，使反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帮凶的斗争的胜利同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人民民主国家的确立，基本的社会经济改革的实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作为科学理论和革命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反映在党代表大会决议和其他文件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谈到："从整体上理解为科学理论、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培养教育过程的思想基础。全部培养教育活动都应以此为准则。必须使青年人和成年人熟习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著作。熟悉我们的自治团体的理论和实践，以便他们掌握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并创造性地把它运用于实践。"[1]

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七四年）提出的活动纲领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七八年）上得到确认。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注意在内部生活中发展政治的自治制度，注意加强南共联盟的领导作用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南共联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八二年）继续执行前几次大会的路线，表示要在克服困难和消极现象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和提高共产党人的责任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共产主义者联盟从基层组织到中央的政治思想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对于进一步胜利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代表大会满怀信心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阶段，共产主义者联盟将以指导整个社会发展的力量出现。

除其他问题之外，在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一九八三年一月）上也讨论了这些问题。这次会议是专为当前的政治思想活动问题召开的。会议特别指出，近年来，南共联盟对思想

工作的问题，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注意不够。这使党内发生了思想动摇。为了巩固南共联盟的领导作用，一致认为必须改进党在培养社会主义意识方面的工作方法[3]。

在国际关系领域内非常注意发展不结盟运动，巩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及为和平、为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而斗争的问题。

一、南斯拉夫哲学在战后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科学在南斯拉夫的传播和发展，与人民执政年代所进行的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与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每个阶段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和任务，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社会主义革命在南斯拉夫取得胜利和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起，在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方面获得了显著成就。它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中等发达的工业国。在南斯拉夫，在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整个体系进行结构改革的过程中，在国民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证实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般规律性，面且也阐明了在选择社会生活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组织方法上的重要特殊性。所有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的性质。

在战后的第一个十年时期，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把南斯拉夫的理论思想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研究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进步遗产，把理论思想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对社会科学教学大纲的改革，积极地开展了翻译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下述主要著作的活动：《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

命》等。列宁的《哲学笔记》于一九五五年第一次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问世。南斯拉夫的学者指出这一著作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战后的最初年代，南斯拉夫的社会人士极为关注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其中有些著作已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它们对南斯拉夫哲学思想的发展颇有影响。同时也翻译了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

在战后发展的第一阶段，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主要的活动成果是，最终地从思想上摧毁了法西斯的思想体系，克服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学派和流派的影响。

在战后最初年代的南斯拉夫哲学家专门批判唯心主义学派的著作中，应该指出Д．涅杰利科维奇的著作《旧南斯拉夫的反动哲学》（一九四八年）[④]。该著批判了Б．彼得罗尼耶维奇、A．巴扎尔、П．B．帕夫洛维奇、B．德沃尔尼科维奇以及战前君主制南斯拉夫的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观点；还应该指出Б．济赫尔的著作《论存在主义和当代其他的思想颓废现象》（一九五四年）。该著批判了Ж－П．萨特、K．雅斯佩尔斯、M．海德格尔、M．梅洛－庞蒂等人的观点，并说明他们的观点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济赫尔反对把马克思的学说与基尔凯郭尔的哲学硬凑在一起的种种企图，证明这些企图在理论上毫无根据，而且具有反动的思想目的。济赫尔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维护两种斗争——为人道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和为达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具体目的所进行的斗争——的统一，他写道:“任何在无产阶级这个人道主义思想的真正体现者之外寻找‘超阶级的’或‘无阶级的’人性的尝试，必然只有在非理性主义中结束。”[⑤]

为了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南斯拉夫的发展，应该指出：在

战后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显得不够深刻，往往只是把资产阶级哲学的结论同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个对比。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遗产，特别是辩证法的理论，并没有掌握到它的全部精髓。

在战后的最初年代，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的大学设立了新的哲学系，举办了新的哲学讲座。当时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著作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并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选集。

国内哲学界主要注意的是下述问题：分析南斯拉夫革命的一般规律性和特殊性、分析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到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除了M．朱里奇、B．菲利波维奇、M．特卡尔契奇、M．布里达、A．索德尼克之外（他们的观点在战前就已形成），大多数哲学家拥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九四九年由济赫尔编辑出版的。在以后的几年里该书曾多次翻印。再往后还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问世。一九五六年И·科桑诺维奇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一九五九年第二版），一年之后，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第二版）。一九六二年Б．舍西奇和A．斯托伊科维奇发表了作为大学教材的《辩证唯物主义》[6]。同年，他们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九六四年O．曼季奇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概论》[7]。

一九五一年成立了“塞尔维亚哲学协会”，不久之后，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也成立了哲学协会。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南斯拉夫哲学社会学协会，一九五八年该协会一分为二——哲学协会和社会学协会。

南斯拉夫的第一本哲学杂志是塞尔维亚哲学协会创办的，从一九五三年起以《哲学评论》的名称开始发行；后来由《现代哲学论题》年鉴代替。从一九五七年起哲学和社会学协会出版了《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学杂志》；它在一九五八年后到一九七四年以《哲学》和《社会学》的名称发行两种独立的版本。从一九六四年起在萨格勒布以外文版（英文、法文和德文版）和南斯拉夫文版发行《实践》杂志。西方国家为该杂志大吹大擂，但杂志于一九七四年可耻地结束了自己的存在。除了其他一些资料外，该杂志发表了科尔丘拉岛夏季学园的资料。这个学园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工作，于一九七四年结束自己的活动。在学园的历次会议上和在《实践》杂志中提出了各种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潮在思想上共处的纲领。它们成了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喉舌。除南斯拉夫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外，参加《实践》杂志和科尔丘拉岛学园工作的有：A．艾尔、A．阿克塞洛斯、Э．布洛赫、Э．芬克、З．鲍乌曼、Т．博托莫勒、Э．弗罗姆、Л．戈德曼、Ю．哈贝马斯、Л．科拉科夫斯基、К．科西克、А．勒费弗尔、Г．马尔库塞、Ю．斯特林卡和其他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作者。

从一九六六年起，在贝尔格莱德开始出版《辩证法》杂志．在杂志周围集合了一批辩证唯物主义派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该杂志也发表苏联哲学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家的文章，并定期向读者报道关于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的哲学书讯。从一九六九年起，在卢布尔雅那发行《人本学》杂志．在贝尔格莱德发行《理论》杂志。

此外，还发行了《社会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贝尔格莱德），《政治思想》和《我们的论题》（萨格勒布），《观察》（萨拉热窝）等杂志；文学杂志有：《同时代人》、《事业》、《表现》；社会学

杂志有：《社会学》、《社会学评论》等。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等地的大学出版了专门探讨哲学问题的年度文集、半年文集和文选。

南斯拉夫哲学发展的下一阶段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其特点是把重点转移到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在许多哲学家那里变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批判。一批贝尔格莱德的哲学家（M．马尔科维奇、C．斯托雅诺维奇、M．日沃季奇等）和萨格勒布的哲学家（Г．彼特罗维奇、M．康格尔加、P．苏佩克等），以批判教条主义为借口，开始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起初是关于反映论问题的基本原理，后来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定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的基本原理。

在南斯拉夫哲学家中间思想斗争激化了：一部分人力求保持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忠诚，另一部分人则重新审核其基本原理，企图论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九六〇年在布莱德城的座谈会上"新马克思主义派"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代表最终决裂。Д．涅杰利科维奇、B．里巴尔、Л．日夫科维奇、A．斯托伊科维奇、Б．舍西奇等人在会上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他们坚持这样的论点：放弃反映论就意味着哲学同真实的科学分离，意味着不承认在人及其实践之外存在客观世界的特点和规律性，不承认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抽象人道主义的拥护者在这个座谈会上反对辩证的反映论，反对哲学基本问题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这种提法，反对党性原则和反对对社会现实的现象的阶级分析法。

南斯拉夫哲学界"新马克思主义派"头目Г．彼得罗维奇、M．马尔科维奇、C．斯托雅诺维奇以及社会学界的 P．苏佩克、З．佩西奇－戈卢博维奇等人，以西方的马克思学和资产阶级哲学、基本上是以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为指

南，企图制订“人道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方案。他们称这种哲学为实践哲学。在这些观念的制作家们看来，取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矛盾，符合于当代现实的精神，并意味着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译成了哲学语言。A·斯托伊科维奇就此写道：“西欧给我们传来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解说，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关于作为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原则的实践起首要作用的观念，引起了对一切‘教条’和‘药方’的摒弃，对作为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家的恩格斯和列宁的完全忽视。”[8]

在以《马克思和当代》等为题的几次座谈会（一九六三、一九六五、一九七〇年）上，南斯拉夫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进一步两极化了。理论斗争包括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对象、物质和意识、物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特别是人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自由和必然、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实践、异化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尖锐的斗争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特别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及其现状等问题展开了。

在六十年代发表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著作，其中有Г．彼特罗维奇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一九六五年），С．斯托雅诺维奇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一九六九年），Р．苏佩克的《社会学和社会主义》（一九六六年），П．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一九六一年初版，一九七九年第三版），等等。

“实践派”拥护者把资产阶级报刊于六十——七十年代围绕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实践》杂志掀起的轰动一时的宣传，把他们的著作被译成几国文字一事，妄称为是他们的哲学著作水平最高的有力证明。实际上，西方报刊围绕着《实践》杂

志进行的这种喧哗，首先是由宣传的目的决定的。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说的多数代表，有一个特点：完全否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哲学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进程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并在组织上形成了。“新批判派”的追随者们借用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思想、思维方法、方法论和语言，从批判反映论起开始伪造马克思主义。他们宣称反映论与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质是不相容的。

对“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有：存在主义的哲学（M·海德格尔、Ж－П·萨特），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辩证法”（Т·阿多尔诺、Г·马尔库塞）和在思想上与之相近的Э·布洛赫的空想主义。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的基础是在资产阶级范围内制定的非意识形态化观念，即把作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变为“现代人类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的观念[9]。但是，号召非意识形态化，不过是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幌子。正如M·贝尔托利诺正确指出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实际上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对其他的意识形态表示了极端的赞许之情，因为这些意识形态想立即填补已经形成的真空。”[10]换言之，在这一口号的掩护下实现所有修正主义者所特有的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的过渡。

如果说，在六十年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哲学界，特别是在两个主要中心——贝尔格莱德大学和萨格勒布大学——起主要作用，那么，在六十年代末，特别是在一九六八年后，情况发生变化，这个哲学家派别的影响显著下降了。

在一九六八年后，“实践派”的活动与南共联盟的政策直接

发生矛盾。其表现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一些哲学家（M．马尔科维奇、C．斯托雅诺维奇、Л．塔季奇、M．日沃季奇、З．佩西奇—戈卢博维奇）被开除出党，后来（在一九七五年）停止了他们在大学的教学活动。在这一时期（一九七四年）停止发行实践派的主要刊物：贝尔格莱德的《哲学》和萨格勒布的《实践》。科尔丘拉岛夏季学园也宣告终结。

在七十年代初，南斯拉夫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学家以及南斯拉夫的进步社会人士对他们的批判加强了，指出他们的观点是伪马克思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此外，特别尖锐地批判了这样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这些人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南斯拉夫社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获得的成果和成就”[11]。

在批判的影响下，不管是在南斯拉夫，还是在国外，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尖锐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这一派别的危机开始了，并在组织上逐渐瓦解。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称这一派别为“效能学的唯心主义”[12]。

与“实践派”拥护者在组织上瓦解的同时，在该派的许多最著名的代表的著作中出现了放弃最不受欢迎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趋向。“实践派”的一些头目，部分是出于对形势的考虑，部分是由于七十年代中期和末期的著作承认了危机和以前宣布的原理毫无理论根据，于是就力图克服“前途无望的”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主观主义，适应已经发生的情况，重新考虑以前对马克思，特别是对恩格斯和列宁的创作的某些评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适应形势的办法是部分地回到它以前批判过的学说的个别原理，这就为这一派在南斯拉夫社会思想界的某种程度的“巩固”创造了一定的基础。其证据是：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再版了他们的著作；为П．弗兰尼茨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的

著作、M．康格尔加的伦理虚无主义和Г．彼特罗维奇的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等大肆宣传。

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派别的影响下降之后，在七十年代出现了论证某种"中间的"、"温和的"的路线的趋向。这种路线处于"实践派"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之间。这实质上是最"温和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说。它的代表在对南共联盟的作用的评价和民族问题等政治问题上与"实践派"的首领发生分歧，并起来反对他们的反社会主义行动，同时又赞成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解说的某些论点。近年来，他们顽强地、但又是毫无成果地企图在卢布尔雅那、萨拉热窝的大学中心巩固自己的阵地。

二、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问题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非常注意探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Б．济赫尔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的问题时写道："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一方面，它贯穿在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另一方面，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局部科学的成果又使它不断丰富起来。它实际上是科学史上第一流的哲学，是改变世界、为建成无阶级社会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这就是它与所有以前的哲学在质上的差别。"[1]

在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是由科学世界观存在的必然性决定的。科学世界观创造了关于世界和人的知识的统一体系，同时又是必要的和普遍的认识方法论。

A．斯托伊科维奇和Ь．舍西奇在《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一九五七年初版、一九六七年第二版）中探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

对象的问题．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下定义为“基本的、一般的关于世界和人的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不可能只是没有人和与人没有关系的自然界或客观现实，也不可能只是脱离自然界的人本身”[14]。作者写道：辩证唯物主义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它把实在的人与具体的历史地决定的社会关系紧密联系起来考察。他们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仅仅归结为本体论或认识论．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是由作为客观现实的物质世界的运动和发展的形式和规律性决定的”[15]。 斯托伊科维奇和舍西奇认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包括作为自己的基本核心（一般的哲学理论和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且还包括许多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其他哲学科学——伦理学、美学和哲学史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为广义的（即哲学科学的总和）和狭义的，这显然是正确的。作者驳斥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们的论据，他们谴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财富归结为辩证法的某些特征和规律并且不给予人的问题以应有的注意。作者指出：谴责辩证唯物主义是“公式化”，这实际上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和任务的片面理解。

舍西奇和斯托伊科维奇特别注意论证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他们认为，世界观问题范围内的基本问题是作为客观现实的世界和作为这个现实的因素的人之间的关系问题[16]。

在斯托伊科维奇和舍西奇的著作中提出了以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

1）作为客观现实的一般理论和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狭义）；

2）哲学科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

和哲学史。

这样，在斯托伊科维奇和舍西奇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中，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了，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却被分出来，成了一门殊特的哲学科学。对于这种处理方法是难以同意的。

斯托伊科维奇在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下定义的时候写道："辩证唯物主义是从整体的科学人道主义的世界观的观点来理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它是与社会科学有紧密联系的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另一方面，它是共产主义世界和人的价值和理想的体系（伦理学和美学等）。认识的内容存在于物质现实，因此，逻辑的东西处于与历史的东西的统一之中，而逻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则处于与客观辩证法的统一之中。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是在与现实革命运动的紧密联系中，在社会的变动中确立的，而不是从某个思想家的头脑中抽象地推论出来的。"⑰

Б．彼得罗维奇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他划分了以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1）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方向性；2)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统一；3）理论和实践的统一；4）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统一；5）积极行动者的性质。作者分别考察了这些特征中的每一个特征，同时举出了辩证方法的下述基本原则：客观性、唯物主义、决定论、全面的联系、具体性、发展、辩证分析和辩证综合⑱。

О．曼季奇指出必须把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本体论方面和认识论方面区分开来，他写道："在本体论方面，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或关于任何运动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在认识论方面，它是所有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因为，一方面，它确定对具体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论原

则，另一方面，它是人们借以进行上述研究的方法。"[1]

南斯拉夫哲学家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下定义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与为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所进行的斗争的联系。这种做法之所以有很大意义，是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的影响下，总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知识分子的哲学，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哲学。他们不是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而是从空谈"一般社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对当代社会问题作出自己的评价。《实践》杂志最初的编辑之一Д. 佩伊奥维奇就此写道："难道可以和应当不联系任何革命实践来考察哲学学说和马克思的哲学吗？"[2]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驳斥了这一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整体的理论，其中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互为条件和不可分割。例如，И. 约瑟福夫斯基就把哲学看成是社会意识的最高形式，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他写道："因此，哲学不只是关于客观现实的学说，而且还是关于人的现实的学说，包括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3]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定义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意识形态，它与资产阶级哲学有质的区别。Д. 列科维奇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九六七年）一书中贯彻了这一思想。该书从历史上和理论上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并特别注意实践这一范畴。在作者看来，马克思借助这一范畴能做到超过抽象的人道主义，并能够把作为具体人道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问题提出来。

列科维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前提是：工人阶级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登上历史舞台，在许多欧洲国家中工人阶级变为自觉的政治力量，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以及由

此产生的从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运动、同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划清界限的需要。

他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因为他们是天才的思想家，而且还因为，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领袖，应当在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新历史条件下发现社会的，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规律，论证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因此，社会主义不是某个天才思想家的偶然发现，而是两个历史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列科维奇写道：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同一个一般哲学理论的两个方面，一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两种表现。他驳斥了某些哲学家的观点：马克思最初论证了唯物主义，后来论证了辩证法，而在晚年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

列科维奇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1）自然辩证法的学说是否是恩格斯的发现，马克思在其最晚期著作中是否掌握了它？2）马克思曾否仅仅在人类历史的水平上或自然界的水平上对唯物主义进行辩证的改造？3）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自然辩证法理论的意义和可能性是怎样的？

列科维奇令人信服地指出：马克思非常熟悉恩格斯的辩证法概念，并赞同这一概念。承认自然辩证法也是青年马克思的特点，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根本谈不上什么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两个概念，即“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在其发展过程中，不管在历史观上，还是在自然观上，既是唯物主义者，又是辩证论者[2]。

列科维奇在批判那些否认自然辩证法的人时请他们解决下列问题：1）如果没有辩证法，即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量变向质变的转化和否定的否定，那么怎样才能解释自然界的进化？2）如果没有发展理论，怎样才能理解世界和唯物主义一元论的物质

统一？3）如果在自然界中没有辩证法，那么人们的意识和实践中的辩证法是从哪里产生的？4）如果只在意识中有辩证法而在自然界中没有辩证法，那么人们怎样才能有效地作用于自然界并实现自己的目的？等等。列科维奇指出："实践派"没有看到，也不想看到，辩证法的不同形式是与现实的不同水平相符合的，辩证法的这些形式是特殊的，而且彼此是相对独立的[23]。列科维奇的书是有关唯物主义辩证法问题的很有价值的著作。

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下定义时，马克思学说中辩证法和哲学唯物主义的统一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总是企图割断这一联系，硬说作为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的观念是不相容的。

例如，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那里，对辩证法有几种不同的观点：1）反辩证法派；2）存在主义的（萨特的）理性辩证法的拥护者；3）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辩证法方案；4）"否定的辩证法"即否定、毁灭的辩证法。如果说在六十年代，萨特的理性辩证法观念居首要地位，那么在后来的年代里，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则占了上风。

某些哲学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不赞同"实践派"的反科学主义的原理，企图创立自己的观点体系，以之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马尔科维奇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其著作《现代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一九五七年）、《辩证的功用论》（一九六一年）、《人道主义和辩证法》（一九六七年）中，试图建立"辩证人道主义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并把"实践"概念作为这一体系的基础。但是，他的尝试未获成功。

M．马尔科维奇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断，还有点科学的意义，但其中反映出非实证主义

的影响，特别是A·艾尔的影响。

马尔科维奇的《辩证的功用论》一书（一九六一年）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其中考察了一系列科学认识的问题：语言和思维、语言和客观现实的关系，文艺作品、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的功用。他考察了什么是"功用"的问题，他试图综合各种功用理论，以之形成自己的理论。他把功用即关系的综合这个定义作为这种概括性的理论的基础。

Л．佩伊诺维奇提出关于辩证法不是科学认识方法的思想。他是南斯拉夫最先提出这种思想的人之一。他发表了完全否认辩证法的纲领，宣称辩证法是形而上学的、异化了的意识形式。他在《技术和形而上学》一书中认为现代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使人们学会阅读复盖在现代技术上的现实密码"㉔。他怀着这种目的断言，哲学应当摒弃自己的某些命题，例如，关于自由即认识了的必然的观念，关于自然界是在意识之外存在并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观念；应当摒弃全部范畴资料并回到"真正的存在"去。这实质上就是海德格尔和其他非理性主义者所宣布的纲领。

M．康格尔加在否认自然辩证法时，比持主观主义和人类中心论观点的所有人走得更远。他在《马克思学说中的伦理学问题》一书（一九六三年）中否认自然界在人之外存在，并把自然界同"自在之物"、神、绝对精神等同起来。他提出主观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关于人创造自然的命题。康格尔加写道："人生产、创造、设定作为自己的产物的自然界，这个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生产自然界。"㉕

这种见解与马克思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它是按照人类中心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理解辩证法所产生的结果。它是与自然科学的所有材料相矛盾的，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分裂，

导致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这种观点使"实践派"的追随者在解决真理问题以及其他理论和认识的问题时走入死胡同。

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驳斥了这种观点，并针对它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法，即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考察方法。例如，Б．马耶尔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的功用和意义》一文[2]中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宣布辩证唯物主义是已经过时的学说（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论断和Ж．Π．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遥相呼应），这为主观主义打开了大门，并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各种流派——存在主义、释义学和心理分析学——硬凑在一起，从而把它与基本的革命力量——工人运动——隔开，使它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哲学。马耶尔反对把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彼此分开，指出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不同成分，而是一种统一的哲学理论，按其实质来说，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所有其他形式的唯物主义不同的唯物主义。这种区别就在于，它是辩证的、同时又是历史的唯物主义。

Л．涅杰利科维奇分析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律——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量变向质变的转化、否定的否定，同时认为，这些规律是任何辩证发展的具体核心和实质。第一个规律说明了任何运动和所有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而产生的东西的源泉；第二个规律说明了新质的出现。第三个规律概括了前两者，并把它们具体化了，并说明："任何对象在它所具有的诸对立面中，已经包含着对自己的内部诸否定的否定，因此，必然要消灭自身和超过自身，达到新的性质和品质，也就是说，必然要发展。"[2]

А．斯托伊科维奇研究了自然界、社会和人的辩证决定性问题。他在《世界的规定性问题》一文（一九七七年）中分析了决定论的问题，辩证的相互联系、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间断性

和非间断性、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以及辩证规律（自己运动的规律、量变向质变的转化的规律和相反的过程、否定或扬弃的规律）的普遍性质。

斯托伊科维奇认为决定论这一概念是主要的科学范畴之一。作者写道：决定论的拥护者和非决定论的拥护者的斗争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这决非偶然的。它是科学哲学的和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两个主要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常为解决这个问题发生冲突。问题是这样的：世界事件是必然的吗？它们是由因果性决定的吗？它们能否科学地预见到？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规定性和决定性的实质是怎样的，它的形式是怎样的？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非决定性的性质是什么？人的活动的基础又是什么？

因此，斯托伊科维奇考察了决定论的不同形式（机械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不同形式（自然科学的、社会的非决定论）

斯托伊科维奇写道：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认为，因果关系是物质客体本身所固有的客观关系。因此，它是关于自然界、人和思维的普遍的、物质的因果制约性的学说。唯心主义的决定论实质上是伪决定论，因为它用目的论和非决定论偷换了决定论。虽然它承认因果性和必然性的普遍性质，但它以客观唯心主义的形式表达它们，也就是认为它们是神的先定性的表现，或者，以主观唯心主义的形式表达它们，断言决定性是由认识着的主体纳入世界的[28]。

许多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考察了逻辑学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认识论问题上提出新的论点，并把自己的精力集中于探讨高级形式的逻辑——辩证逻辑的问题。这种逻辑是与当代的科学认识水平相适应的。某些哲学家发展了唯物主义的逻辑

学、概率论的逻辑原理，多值逻辑和概率论的关系。在哲学家中，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有明确的逻辑方法论的传统。人们有时称之为贝尔格莱德的逻辑学派。在特别注意辩证逻辑的哲学家中，应该举出Б.舍西奇。他从一九五七年出版其《辩证逻辑论》到一九七一年出版《逻辑学原理》第三版，一直从事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这里包括一系列具有逻辑和方法论的性质的问题，如语言、功用、思维、判断、推理的问题，还包括与符号逻辑有关的问题（陈述逻辑、公理的方法、对类别逻辑的论证、样态的关系）以及基本的逻辑运算和体系、真理和概率、样态等许多其他问题。

舍西奇认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辩证逻辑是关于现实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而初等逻辑的规律则是现实的某些方面和特种思维的规律。逻辑学的直接对象是思维的规律，是以对象为内容的、经过逻辑论证的和在逻辑上有充足理由的思维的形式、过程、原则、规则、规律和方法[29]。

舍西奇考察了对“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有争议的解释，认为误解的原因既应在认识论的领域内，也应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内寻找。在许多国家，冲突围绕着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以及反映论的问题展开了。作者认为，冲突的认识论根源在于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重要问题研究不够，对人本主义问题估计不足；在于在某些著作中存在下述情况：片面地、教条主义地理解辩证法，把辩证法的内容归结为几个基本特征和规律；还在于公式化和简单化。

舍西奇在说明引起哲学争论的社会原因时写道：“在现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来说，反对反映论就意味着反对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对新马克思主义——‘实践派’——来说，反对反映论的拥护者，赞同‘实践’范畴，就意味着

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赞同那种与一切客观条件对立的精神力量的‘自由’游戏。”[30]

舍西奇认为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指出唯物主义的反映观与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的反映观的区别。他也指出了在对这一论点的理解中有某些困难之处。因此，他提出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才能把作为理解、判断和推理的思维本身看成客观现实的‘反映’？”[31]“反映”和“用概念概括”这两个术语的意义不能等同，这也是在把意识、特别是思维理解为“反映”时的困难之一。

舍西奇指出：这些困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机械地理解反映，准确地说，是不理解反映的复杂的和间接的性质。对这一点，列宁作了如下表述：“**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32]

舍西奇指出，把“实践”和“反映”对立起来在理论上是无法成立的，他认为，把任何范畴（其中包括实践范畴）绝对化也是毫无根据的。实践范畴本身太广了，它表示人的，首先是对象性和感性的全部活动。它只有在与“意识”范畴的统一中来考察，才能获得基本的认识论功能，并成为思维的真理性的基础和标准。这一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二条提纲中已经说过。

舍西奇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原理》一书（一九八二年第三版）中考察了一系列关于逻辑和方法论的性质问题：理论和方法的关系，科学认识中的矛盾及其解决途径，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的可能性，科学语言、概念、判断、推理、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的作用和功能。作者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为依

据，在强调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辩证统一的原则性意义时，把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具体化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是一体化的、辩证的、分析和综合的理论。他在分析科学认识过程的问题时揭示了事实和理论、科学规律和对它的说明、科学发现和科学预见之间的关系。

舍西奇令人信服地批判了O．迪尔凯姆、O．孔德和逻辑经验论者的实证主义方法，B．狄尔泰、Г．李凯尔特、M．韦伯的价值论的理解方法，P．麦尔顿、T．帕森斯等人的比较方法、现代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方法。他指出了所分析的概念的片面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历史的辩证的方法的重大优越性，并从具体科学和社会生活中举出实例来证明这一点。舍西奇作出结论说：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由于它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的错误而不能解决问题。

南斯拉夫的哲学家在探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范畴时十分注意"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范畴。在战后时期对这些范畴的探讨首先关系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统一和差别的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形成的联系的原则上全新的性质。但是，早在五十年代，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就出现了把特殊与一般对立起来的尝试，同时把一般看成是某种形而上学的、不动的、吞没了具体事物的全部多样性的、导致极权专制主义的东西。在这种解释中，特殊被理解为某种与一般对立的东西，而不是某种表现一般和充实一般的东西。

Д．涅杰利科维奇在《列宁和哲学》一书（一九六九年）中指出，这样解释一般和特殊是错误的。他从列宁关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的思想出发，着重指出："一般的东西被'抽象地'把握、一般的东西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个别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个人的东西和独特的东西，就变成片面的、形而上学的、

僵化的死板公式。"[33]同时，他也注意到认识一般的东西在某些历史现象中的特点。既然一般的东西通过单个的东西而存在，那么也正是具体的东西体现个别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的本质。涅杰利科维奇在谈到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时认为"自己运动"是辩证法的出发点，并特别注意"扬弃"范畴[34]。

Г. 扎耶恰拉诺维奇也提出这样的思想。"虽然实践概念在认识论中是基本的和重要的，但它不是实践本身，因此不是第一性的一般概念。问题在于：实践需要前提，必须对实践进行本体论的论证。为了进行实践，需要现有的条件：物质活动的对象（客体）和自己的经验（反映）"[35]。

列科维奇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认为，"实践"范畴是"辩证的总体"，即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统一，另一方面是自然界、人和历史的统一。他写道："人们干预世界的所有形式和确证世界的所有形式，事实上都是人们实践的特殊形式。这里说的无非就是活动的整体性，它表现人的整体性。"[36]

在我们看来，只有在特定的意义上才可以说实践是"整体性的活动"。这里必须指出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差别，也就是说，理论是人类活动的另一种形式或方面。

在这一点上，Б. 济赫尔的观点是最正确的。他举出这样的事实：我们不能把实践仅仅限制在科学实践和工业上，我们不能用实践概念去囊括人的认识的所有形式，其中包括纯理论的推断。他写道："这种把'实践'概念弄得含混不清的做法，与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辩证观念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否认实践具有真理（即我们思维的现实性、威力和责任）的标准的意义。"[37]

南斯拉夫哲学家有许多著作都是用来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论的。Д. 日夫科维奇在这方面做了富有成果的工作。他写道："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反映（一部分现象反映在另一部分现象

中)是自然界的普遍过程,因此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哲学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不仅承认物质与意识的联系，而且还承认物质在意识中的反映——大脑的物质反映一般的自然物质,人的主观意识反映客观世界即自然界和社会。”[38]

大家知道，自然过程的相互作用和普遍的相互联系，是自然界存在和运动的普遍方式。这是任何对现象的科学考察方法的出发点。日夫科维奇就是从此开始发表议论的。事物为了能够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它们就必须具有这样的特性：以自身的内部变化和外部反应(这是由事物的特有结构和特有性质决定的)来回答其他事物的外部刺激。这种特有的感应就是反映。由于这种感应，一部分事物的特性出现和表现在其他事物的变化中。因此，日夫科维奇写道：反映是事物相互作用的基础，是特有的方式和特有的形式，而现象的普遍联系则以这种特有的形式，通过它们的性质和结构的特征表现出来。反映是普遍联系的一个方面，是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的主要特性之一，是自然界的普遍过程，而反映这个范畴，则是人的认识的的普遍范畴。日夫科维奇着重指出社会中的反映的不同之处：在人的世界中，反映是由特殊的和特有的方式，即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实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把反映和实践对立起来。与之相反，日夫科维奇在考察反映和实践这两个范畴的相互关系时证明它们是相互交错和相互渗透的。反映，这是认识论的范畴，而社会实践，则是关于人的活动和人在自然界中存在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范畴。反映转化为实践并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加入实践，而社会实践本身加入自然反映的普遍过程，它是自然反映的承担者、传导者，同时也是自然反映的特殊的、人的和最发达的形式[39]。

《辩证法》杂志的编者之一M·贝尔托利诺也同意这一思想。他写道:“事情的实质在于，不承认反映这个范畴的重要性，

就谈不上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谈不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即世界、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革命变化。这种革命变化，如果不以对变化着的事物的认识为基础，那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在这种认识中反映范畴又是必不可少的。"[10]

在六十年代，南斯拉夫的哲学家把注意力移到样态的范畴的辩证法，因为只有正确解决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关系，才能解决许多其他基本范畴，如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等等的相互关系。日夫科维奇在《社会过程的辩证法》一书（一九七一年）中指出：可能性这个范畴处于与规律性这个范畴的辩证统一之中；一个重大的谬误就在于，使可能性与客观现实性分离和仅仅从人的意图、愿望的角度来考察可能性。因此，日夫科维奇认为，自由的问题是"发现和转移可能性，并使其在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进程中实现"[11]。因为现实性是最丰富的范畴，是任何单个对象的发展阶段，所以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正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起决定作用。现实性在当前代表未来。

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关注对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探讨。在这个哲学科学的领域中可以规定几个方面：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论问题，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和控制论的哲学问题。

这方面的工作，从纪念恩格斯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和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时起，明显地活跃起来。在国内就这一问题组织了专门的座谈会，与会的哲学家和知名的自然科学家作了科学报告。

С．斯坦科维奇在《列宁和自然科学的哲学理论问题》一文中指出列宁的方法论原则在解决物理学、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中的意义。他以列宁的方法论为依据，研究生物科学的复杂问

题（人和环境的关系，作为整体组织系统的有机体的构成），并批判了种种机械论和活力论的观念

斯坦科维奇认为，在现代生物学中生命的观念已列入世界总图景。所有其他科学都为世界总图景的创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过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最能说明世界总图景 在描绘这种图景的过程中，显现出科学认识趋于一致的倾向。"现代分子生物学表明，在不同的生命过程中，物理学和化学的规律性与生物学的规律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互相转化 物理学和化学为一方，生物学为一方，这两方面的坚固界限正在逐渐消失。"[13]

这位南斯拉夫的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现在，现代生物学已远远超过恩格斯生活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仍应对生物学的最新成就采取批判态度 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应当成为建设性的。只限于反对科学中的唯心主义趋向，意味着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成为不全面和不充分的！"方法论的作用在于帮助学者正确地提出生活和科学中出现的问题。现代科学（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继续进步，有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最能胜任科学认识发展中的这个任务。斯坦科维奇写道："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所处的革命时代的创造性的哲学，它的使命是给予生物学和其他科学以建设性的帮助。"[14]

斯坦科维奇在考察自然界和人的关系时指出这种关系的辩证的和动态的性质。这种关系表现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人对自然界的依存性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失去片面的机械决定论的性质和盲目的必然性。"人作为有意识的、能动的生物，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认识那些决定自然界和社会中发生的事物的规律，认识其中产生的必然性。这就是人的行动自由的第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制约着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制约

着整个选择的可能性和起决定作用的诸条件和诸因素的变化的可能性。”[45]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恩格斯制定的原理解决了许多问题[46]。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Л·伊万诺维奇的著作《恩格斯和物理学》。伊万诺维奇反对把马克思的观点和恩格斯的观点对立起来的错误做法，他以分析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广泛通信、著作和活动为依据，证明他们之间在重要的哲学问题，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上，没有分歧。

伊万诺维奇断言，恩格斯指明了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他认为，把物理学下定义为考察物质运动形式的科学和反映物质运动的独特形式，这是中肯的，而且在目前仍是可以接受的。在他看来，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顶峰是揭示了运动的各种形式之间的辩证联系。恩格斯证明了自然界的辩证性质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它是现实的科学的和正确的反映——的正确性。因此，与一些人企图低估这位天才学者的功绩相反，伊万诺维奇写道，恩格斯的学说在今天仍然是现实的。

Б．舍西奇在物理学的哲学问题方面发表了一些著作，其中有《物理学的哲学原理》（一九七二年），《物理现实性的现代理论》（一九七四年），等等。其中考察了物理学的哲学原理问题：物质的结构，空间和时间，物理客体的现实性，古典物理学、相对论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的逻辑原理。舍西奇特别注意对物理测量的解释、对称和不对称两这个范畴的作用、对波函数的解释和量子二象性等问题。他在分析这些问题时力求从辩证逻辑的观点对所产生的问题作肯定的解答。

И．古特曼研究了同一、均衡、等值性、相似等认识论范畴及其对自然科学的意义[47]。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下述难题探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

论问题：生命的起源（Д．格尔杰尼奇）、活系统中的组织和秩序（М．托多罗维奇）、活系统中的运动（В．Т．彼得罗维奇）、生物的进化和进化过程的方向（Б．彼得罗维奇、В．约万诺维奇、С．格卢马茨等）。他们驳斥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似乎“进步”这一概念是社会历史范畴，不能把这一范畴运用于生物界。他们指出自然界（不管是生物界，还是非生物界）的所有现象是相互联系的，这些现象都有某些共同特征。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列宁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思想，并得出结论说，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没有哲学的概括，自然科学的成就是不可思议的。В．П．约尔丹诺夫在《现代物理和技术科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成分》一文中提出这种看法：反物质是许多哲学神秘主义的对象。约尔丹诺夫以反物质为例证明：在粒子和反粒子结合的过程中，它们的质量消失（湮没），同时放出相应的能量。作者通过这一现象说明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否定的否定、量向质的转化——的出现。约万诺维奇还用电子计算机发展的后果——可能搞非人道化、把人变成自动机、滥用群众视听、使用窃听器等——做例子，指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意义。

对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来说都不言而喻：非生物界有自己的规律性，但这些规律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发地显现出来的。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这些规律，但不以此为限。认识论和方法论对自然界的认识原则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具有很大的意义。约尔丹诺夫把哲学与物理学和技术科学之间的反馈比做数学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数学不仅在物理学中得到运用，而且在运用过程中得到很大的发展。

Я．达农在分析自然科学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意义时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按照这种观

点、科学本身产生科学技术革命的消极后果。他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总是把科学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同利用科学无情地开发自然界区分开来。达农指出，没有自然科学就不可能有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人道化、社会的和物质的财富[9]。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科学性和人道主义的联系，注意其中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这些性质使这种理论成为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动运的世界观基础[10]。

E．帕夫洛维奇在其专著《自然科学》（一九七八年）中探讨了许多争论的问题。这是“实践派”信徒专为研究“自然界”而写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他试图历史地考察物理学及其在自然知识体系中的地位，考察它同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以及它的对象随着不同时代的宇宙观趋向的变化而变更。帕夫洛维奇似乎是在力求超出“实践派”的追随者所特有的主观主义的范围。他转而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这已经意味着从人类中心论转向唯物主义．帕夫洛维奇在探讨自然界的实质、物质、空间和时间等问题时，除了提出一些现实问题之外，还讲出一些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思想，特别是在探讨达尔文的进化论、评价恩格斯的理论遗产时所讲出的思想。

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许多著作专门论述了科学发现的历史，世界科学的杰出学者（牛顿、爱因斯坦等）的科学活动，以及为世界科学和社会思想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南斯拉夫学者（H．捷斯拉、P．博什科维奇等）的科学活动。

四、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

五十年代末，在南斯拉夫展开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对象和结构的问题，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激烈辩论。这些辩论不仅是在社会学范围内，而且也是在其他社会科学范围内

进行的。六十年代初在南斯拉夫，社会学和政治科学在制度上固定下来。它们不仅同哲学分开，而且也相当迅速地彼此划定了界限。南斯拉夫的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试图论证哲学人本学是一门特别的社会科学，但未获成功。政治科学开始研究政治的各个方面：国家、政党、政权的问题，广泛的社会事务管理范围，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自治、劳动社会化以及其他问题。

关于社会政治问题出版了内容丰富的著作，其中考察了一系列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的社会问题[51]。它们特别注意从理论上论证国家所有制形式改变为下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这种形式的基层组织在南斯拉夫的作者看来就是："集体和生产资料的联合，包括通过扩大再生产的决议。"[52]

在政治科学领域内考察了揭示利益和政治关系的辩证法，公共、个人和集团利益相互作用的辩证法、阶级和民族利益、民族和国际的辩证法等问题。

大多数南斯拉夫理论家在考察现代中心问题之一——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时表明了对代议制民主这个概念的批判态度，并且毫无法律根据地把它与资产阶级民主等同起来，把直接民主原则同它对立起来，同时确定自治是"自治利益的多元论"的特殊形式或"自治多元论"[53]。

许多南斯拉夫的作者（И. 焦尔杰维奇、Н. 帕西奇）坚持这样的论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组织只有作为无党派的直接民主才能存在。这种观点的主要的行不通之处在于，要使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一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同非集中化和"自治利益的多元论"并存。

在构思新科学——政治学——的过程中，它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已非常明确地固定下来，并制订了相应的术语和范畴体系。政

治科学和社会学在形式上彼此分开了，各自试图规定自己的对象。关于它们的方法论问题展开了辩论。辩论最初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对象和结构，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后来又涉及许多其他问题。

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是非常复杂的过程。要研究这一过程，先要弄清社会科学的对象，历史唯物主义和局部社会科学的关系，经验研究在社会学认识中的地位。

在辩论进程中有两个主要观点明确化了：（1）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重合的；（2）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不同的学科。

推论的逻辑大致可归结如下。在第一种情况下，对于一般科学分类的要求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已经确定，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体系中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外还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54]。如果假定有这种可能，那么令人不清楚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一般社会学的对象是什么。

大多数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般的哲学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例如，Б．济赫尔和И．科桑诺维奇的著作就持有这种看法。

Л．日夫科维奇在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对象的问题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主要注意的是现代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制订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种种形式的修正主义。他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功能同它的方法论割裂开来的倾向，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这三个方面是密不可分地统一的。

日夫科维奇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的原则出发，指出人

的实践的独特性。他在考察人的活动的结构时，发现其中各种不同类型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活动的目的和任务，它们赖以实现的手段，作为目的和计划的统一的活动本身，最后还有、结果，也就是现实按照所确定的目的所发生的变化。

日夫科维奇特别注意上层建筑比基础超前发展的问题。他考察了在下述情况下超前的可能性和规律性：1）思想上的预见：空想和意识形态、可能性和现实性；2）在进行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时政治上层建筑赶在经济基础之前；3）科学赶在生产之前和科学对发展生产的影响。

日夫科维奇也探讨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继承性和相互作用的问题，文化从一国传入另一国的规律性。他指出，当思想和制度从一个较为发达的国家传入有相似物质条件的其他一些国家时，这些思想和制度就继续发展，并充实和加速其中较不发达的国家的发展。他引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做例子。马克思主义思想加速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这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又加速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发展。日夫科维奇指出，当外来的形式装入另一种内容时，这外来的材料有可能变样。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深信，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外，任何其他的方法都是狭窄的，不足以概括社会现实的整体性。Л．日夫科维奇、Б．济赫尔、А．菲阿缅戈、В．拉施科维奇、Л．马尔科维奇等人在其著作中指出机械论的、形式社会学的和其他的发展观的局限性。他们表明，与这些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是为了改变现实而说明世界和揭示其规律性的，因此它具有伟大的革命的实际意义。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基本上是这样的，它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的历史，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历史、阶级关系的历史（原始

公社制除外）[55]。

由于劳动即生产性活动和随着劳动资料的改进，人在生物学方面和社会方面都发展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作者特别强调这一因素，因为某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硬说，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庸俗经济学的观点。他们把作为自由创造行动的实践与“经济因素”对立起来。B．拉施科维奇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事实上，既清楚地表现出人与动物的重大类似，也清楚地表现出二者的差别……人是特殊的动物，是能生产工具，能做其他动物所不能做的东西的动物，这一点正是特点。”[56]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维护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的统一的原理，正在进一步探讨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它的任务和功能、意识形态的作用，正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学，那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或是正在部分地向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让步，或是不加批判地借用它们的基本概念。

南斯拉夫的学者在研究社会学问题时十分注意目前南斯拉夫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过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挥功能的，按照社会学家B．米利奇的形象说法，它象是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社会发展的阶段及其实质[57]。

到五十年代末，在南斯拉夫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中探讨了社会结构问题，不过这是在联系到社会的其他社会政治问题时谈的。现在它们已变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在探讨社会阶级结构的问题的进程中，既在方法论的问题上（确定“阶级”、“社会集团”、“阶层”等概念，确定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差别的标准，等等），又在组织经验研究、解释所得结果的问题上，进行了和正

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和辩论。

根据社会学协会的倡议，对南斯拉夫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流动性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主要结果都反映在各种不同的出版物[58]上。M．佩丘伊利奇、M．波波维奇、C．舒瓦尔、C．肖利舍维奇、B．米利奇，O．曼季奇、P．卢基奇、B．拉施科维奇、Ц．科斯季奇、П．马尔科维奇等人的著作专门分析了现代南斯拉夫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不同方面。

由于对所得经验资料的分析，人们弄清了能说明现代南斯拉夫社会的社会结构改革的最集中的过程。

在最近几年来，就业和经济流亡的问题显得非常尖锐，在出版界出现了许多论述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的著作。这就是Ж．坦尼奇、З．科马里察、П．格奥尔吉耶夫斯基、C．波洛维察、M．波格丹诺维奇、Л．什卡拉、И．赖切维奇等人的著作。尽管至今还没有概括性的著作，但整个说来，南斯拉夫的社会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材料。这些材料阐明了南斯拉夫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中发生的真实过程。

学者们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著作中坚持用阶级分析法研究社会的社会结构。他们主要注意的是“阶级”概念。例如，И・温斯基在分析战前南斯拉夫的阶级结构时指出，所有现存的阶级定义实际上可归结为两类：1）以客观事实，即以社会生产系统中所处地位的决定性作用为根据的定义；2）以主观事实，即社会地位、威望等为根据的定义[59]。他以第一类定义为基础，揭示和说明了战前南斯拉夫社会阶级结构的演变。

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拥护者令人信服地表明：阶级斗争是对抗性社会中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近十年期间，南斯拉夫的社会学家集中考察了“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界限问题。一九七三年举行的座谈会讨论了《南

斯拉夫社会的工人阶级》的专题。大多数报告都是为了确定工人阶级这一概念的界限而作的，其中也提出不同看法。许多南斯拉夫的社会学家在这个座谈会上表示赞同阶级概念的广义解释。

例如，C．舒瓦尔把所有直接在物质生产部门和社会服务部门工作的人都列入工人阶级：“所谓的技术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成员。”[60]舒瓦尔认为，劳动的性质，即劳动主要是体力的还是主要是脑力的，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C 普利舍维奇基本上也持有这种观点。他在《现代阶级在改组中》一书中写道：“所有在社会部门工作的劳动者都属于工人阶级，不管他们是在机关还是在企业工作，不管他们是直接生产者或还是不直接从事生产，不管他们是知识界的代表还是从事体力劳动，只要他们按劳动得到报酬。”[61] B．哈吉斯捷维奇提出的出发点是：“不是体力劳动，而是生产性劳动，是工人的阶级特点。”被他列入工人阶级的有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因为他们是生产性劳动中“智力劳动的一种”）和企业职员[62]。

虽然方法论观点引起一定的问题（这部分表现为主观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尤其是功能主义的原理折衷主义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对现代南斯拉夫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研究（特别是经验的研究）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从 B．米利奇、Π．格奥尔吉耶夫斯基、M．波波维奇、C．舒瓦尔和其他一些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可以得到关于南斯拉夫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中发生的真实过程的概念。南斯拉夫社会学家讨论了一系列尖锐的和迫切的国内社会政治生活的问题，如社会主义的矛盾（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分配关系的体制中的矛盾，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发扬民主和加强集中之间的矛盾，管理和执行的制度上的矛盾，扩大群众参加管理的必要性和集中而熟练地领导生产过程、领导社会过程的重要性之间的矛

盾）。与此同时，研究了现实的社会差别、民族关系、居民就业、提高就业者的文化程度和技术熟练程度等等问题。南斯拉夫的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者的解放只能是劳动者本人的事业”的原则，强调指出，不真正扩大劳动者参加管理，就不可能实现“劳动者的民主”。

五、人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哲学问题

近二十年来，南斯拉夫哲学家的著作中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成为中心问题。某些哲学家把人的问题列入辩证唯物主义（例如，Б．舍西奇、A．斯托伊科维奇在《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把它同其他的概念和范畴——可能性和现实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论和非决定论、自由和异化等——并列在一起进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指出，列宁对探讨人的问题作出巨大的贡献。斯托伊科维奇在考察列宁学说的人道主义特征时着重指出，对于列宁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积极的人道主义，它通过革命斗争和社会改造而成为现实。列宁的人道主义的观念的哲学基础是经过辩证解释的自然和社会的决定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的个性解放理论的基础是关于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关于个性全面发展的理论。列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或“阶级斗争的道德”，是与剥削阶级的伦理学对立的。列宁的人道主义观念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联系证明它是正确的。实践检验的可能性证明它比所有其他人道主义观念优越得多。它的决定论的方向有助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的基本道德特征的形成。斯托伊科维奇写道，列宁关于具体的、积极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是当代社会的活生生的组成部分，因为它已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实现[53]。

Л. 列科维奇在其《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一书[64]（一九六四和一九六八年）中对异化的产生、发展及其消灭途径作了最详细的分析。列科维奇详细分析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把它与较后期的著作作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说："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占有中心的地位，但在一八四六年以后则退居次要地位。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人的异化和解放的问题。相反，他考察异化时联系到其他更重要的范畴，这使他能在更高的理论水平上实现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同时，在列科维奇看来，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并未中断，因为成熟的马克思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科学的术语上发展了自己的早期思想。作者批判了资产阶级哲学家、马克思学家和修正主义者的观点，他们引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利用异化概念，以便达到歪曲马克思学说的目的。

列科维奇在提出消灭异化问题时，联系到各种异化形式——政治异化、社会异化、宗教异化等——的消亡、消灭的问题，联系到国家的消亡、城乡本质差别的消灭，并认为这直接依赖于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在列科维奇看来，只有共产主义的高级形式才能最终消灭异化。他批判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和马克思学家，因为他们利用异化概念来达到歪曲真正的马克思学说的目的，并宣传回到"伦理的社会主义"去。

Б. 济赫尔也研究了消灭异化的问题。他把消灭异化的过程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联系起来。国际工人运动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反对全面异化立下了功劳。济赫尔写道："无产阶级为消灭异化的过程创造了开阔的出发阵地，这一过程表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际关系的最深刻本质。"[65]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其他哲学家也坚持这样的观点。例如，Л. 日夫科维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实质就在于把异化视为暂时的历史现象，它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必定消灭。日夫

科维奇写道："异化的现象和形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一定的客观根源，但按其性质来说，这些根源是以前的社会形态的残余，因此，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定消灭。"[66]

B．鲁斯就此写道，消除异化意味着消灭旧社会的一个基本矛盾。这个矛盾和其他矛盾的消灭，为发展新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容创造了必要条件。克服异化还不是现代人道主义的全部纲领，而只是它的特定部分：发挥每个人的所有的基本可能性；发展积极的特殊性和个性；克服社会的和个人的矛盾，把它们变为相对和谐的统一。这种统一将促使人身上的人性的进步[67]。

Б．舍西奇在《现代的人和世界》一书（一九六九年）中也同意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对抗性的分工，这种分工在货币市场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把人变成商品，把人的个性的价值归结为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工人的生命变成获取利润的手段，从而工人的生命就异化了。

在资产阶级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人陷于危机之中，怎样才能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舍西奇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说，社会主义是新的社会制度，它为人类提供新的社会、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人际关系、新的文化、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人的价值学说。

舍西奇从这些社会政治前提出发，考察了人的本质和特性，并试图揭示这些概念的内容。他断言，人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不能归结为为存在而斗争。人的生活的目的，人的存在的基本意义在于"从事精神的、实践的和真实的活动，以便把自然界改造成它的最高形式，即人的世界，这种世界具有人所固有的所有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从生物的和经济的价值起到道德的和精神的价值止"[68]。

舍西奇在考察自由观中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关系时指出，无论是在绝对的决定论的体系中，还是在绝对的非决定论的范围

内，都不能确定人的活动是自由的。他阐明了人的自由的如下重要特征：1）认识各个活动领域的规律；2）认识一定形式的活动中可能性的范围；3）有意识地选择目的并选择实现某种行动的手段；4）追求目的时的坚强意志；5）创造新的可能性[69]。"人的自由在于看到可能性，利用可能性，把它变成人的可能性。"[70]另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Л·日夫科维奇区分了物质生产范围中的自由和在这个范围之外的自由。物质生产中的自由是由必然性和外部的合目的性支配的，物质生产之外的自由则表现为人的力量和才能的发挥。按照日夫科维奇的定义，自由是下述三种因素的统一：1）认识必然性；2）人的旨在控制一般规律性的实践行动；3）使规律性服从于人的需要和目的[71]。

Д．列科维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把真正的自由下定义为自我决定。他十分注意对自由时间的分析。他写道："自由时间扩大了从事创造的余暇的范围，活动变成自我活动，并且是自我决定，而自我活动又成为自由的直接表现和事实上的确证。"[72]

另一些关于人的问题集中在价值问题的周围。就这些问题发表了В．帕维切维奇、В．鲁斯和А．塔诺维奇等人的著作。其中批判了唯心主义价值论的基本原理。

В．鲁斯在《价值的实质和人的价值》一书（一九七七年）中考察的问题有：什么是价值？价值和它与"善"、"效用"、"兴趣"的关系，它与存在、社会进步和道德的关系？作者认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的主要缺点在于它的直观性，因为它没有考察价值怎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功能，价值对人有什么意义等问题。把价值同社会存在割裂，把价值规范的判断同经验陈述的判断割裂，是本体论和人本学的二元论的后果。这种二元论没有看到存在是过程、关系、实存，并且有自己的内容。

鲁斯批判了这样的命题：价值是“自在地”、脱离现实而存在的，它没有原因和结果。事实上，价值与现实界的其他现象有共同的特征：本质、因果关系、相互作用、内部分化等等。它们是这个现实界的、这个物质世界的必然结果，它们不可能属于某个其他的世界、不可能在主体和客体、人的关系和道德之外。鲁斯表示不同意这样的作者，他们把价值视为某种绝对的、比“善”、“效用”、“兴趣”等概念更高的东西。

B. 帕维切维奇作了价值分类的尝试。他以人的基本需要为标准，把价值分为以下几类。他列入第一类的是使享乐主义者的需要即寻欢作乐的需要得到满足的价值；列入第二类的是有实利的价值；列入第三类的是活体的或生物的价值（有实利的价值为这种价值提供手段，如健康）；列入第四类的是社会价值（就其狭义来说，例如，秩序、社会安全）。这些价值借助法律规范和制度得到保障。作者列入第五类的有道德价值（善的概念），列入第六类的有审美的价值（艺术、科学和哲学中的美的概念）。此外，他又把所有价值分为“高级的”和“低级的”；“高级的”价值指精神的（认识的、道德的、审美的），而“低级的”价值则指物质的或有实利的。

帕维切维奇批判了新实证主义者和某些其他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因为他们否认能够预见到未来事件。他指出K. 波佩尔对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歪曲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帕维切维奇写道：“历史表明，在阶级的东西和全人类的东西之间存在的不是对立，而是辩证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73]

Д. 涅杰利科维奇在《伦理学》一书（第一册于一九六九年，第二册于一九七一年出版）中指出劳动在人的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意义。他提到历史无非是劳动使人形成的过程。他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揭示劳动活动过程的辩证结构上，同时考察了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差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发生了革命的变化，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涅杰利科维奇指出，只有在解放了的人民那里，劳动才能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和乐趣。只有在解放了的劳动的基础上，人类才能获得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个人的创造性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劳动合作正在产生并得到发展，这种劳动合作的基本特性就是劳动者的自我活动和首创精神的发展。

六、哲学史方面的研究

南斯拉夫哲学家在研究哲学史遗产方面获得了显著成果。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八年底止出版了十二卷集的世界哲学史文选；发表了具有内容丰富的前言、注释和原本的哲学著作：《古希腊罗马哲学》（一九五六年）、《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一九五六年）、《法国唯物主义者》（一九五五年）、《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一九五五年）、《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一九六〇年）等等。从哲学史方面的其他概括性著作和专论中可举出：M．采基奇《哲学史概论》（一九六六年）、И．约瑟福夫斯基《哲学》（一九六七年）、A．斯托伊科维奇《塞尔维亚人哲学的产生》（一九七〇年）和《一八〇四——一九四一年塞尔维亚人哲学的发展》（一九七二年）、H．魏诺维奇《哲学史概论》（一九六五年）、Ч．韦利亚契奇《东方民族的哲学》（一九五八年）、B．菲利波维奇《现代西方哲学》（一九六八年）、Д．佩伊奥维奇《现代西方哲学》（一九六七年）、Б．博什尼亚克《哲学——哲学思维绪论和词典》（一九七〇年）、Д．佩伊奥维奇《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黑山的社会哲学观点》、Б．彼得罗尼耶维奇《现代哲学史》（1982年）。

Д．涅杰利科维奇为研究世界和南斯拉夫的哲学思想的各种

代表的观点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分析哲学学派和思潮时把注意力转到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他指出，列宁使马克思主义及其所有组成部分发展成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国际学说，发展成对工人阶级在建设新社会斗争中的革命行动的全面论证[74]。

Д．列科维奇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一九六七年）中考察了作为统一整体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面提出了一条总的发展路线。在列科维奇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其敌人的斗争史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第二阶段是列宁与社会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列科维奇写道："列宁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胜利，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现在不单单提马克思主义，而是提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正确的，因为列宁主义不仅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词，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所有组成部分的划时代的发展。"[75]列科维奇所注明的第三阶段开始的日期是一九三二年，他把这一阶段的开始与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联系在一起。

尽管上述分期还有争议，但列科维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的主要里程碑的评定是正确的[76]。

辩证法史的问题在南斯拉夫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Г．扎耶恰拉诺维奇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范围内的分析和综合》一书（一九六六年）中说明了辩证方法的历史，确定了辩证方法中分析和综合的关系。二者彼此之间的差别不单是逻辑结构，更重要的是主体活动的方向。对主体活动下定义，可以考虑三个主要因素：1）出发点；2）思维过程指向的目的；3）主体在历史过程中的行动。扎耶恰拉诺维奇认为马克思

的方法是分析和综合的逻辑方法，并指出，在《资本论》中实现了从抽象的一般到具体、从最简单的规定到愈来愈广泛的综合概括的运动。这种方法可根据研究对象特有的规律性推测它的真实运动过程。在扎耶恰拉诺维奇看来，辩证方法不仅限于再现真实的过程，而是应当给人以创造性地开展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因此，它本身也应当有创造性。

扎耶恰拉诺维奇试图提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类型学。这是很有意思的。他分析了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学说，得出结论说：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四种辩证思维的类型（模式）：1）康德所阐述的现象或外观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2）费希特所阐述的主体和客体的唯心主义辩证法；3）从唯心主义立场说明的实在的辩证法，其中包括谢林的自然辩证法；4）黑格尔的总体的思辨辩证法㉗。

作者认为，黑格尔和整个古典唯心主义的主要方法论错误在于，用抽象的一般的东西作出发点，用演绎法从这个一般的东西中推论出客观实在，从而说明对象性和感性的活动的多样性。

扎耶恰拉诺维奇令人信服地表明，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真正成果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它的弱点却被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利用了。

近年来，南斯拉夫学者对研究民族哲学史问题的兴趣日益增长，但是能够概括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整个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的综合性著作，暂时还没有。

A. 斯托伊科维奇在研究塞尔维亚人的民族哲学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就这个题目发表了许多著作，专门分析了进步思想家（Д. 奥布拉多维奇、H. 捷斯拉、O. 普里察、C. 马尔科维奇等）的观点和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斯托伊科维奇在《一八〇四——一九四一年塞尔维亚人哲学的发展》一书

中考察了哲学的相互作用和分期问题，发现塞尔维亚人的哲学思想与其他南斯拉夫民族、还有俄罗斯民族和其他南斯拉夫民族的哲学是相近的。他写道："塞尔维亚人的哲学发展的历史教训是，哲学应当对所有进步的成果开放，从而应当创立自己的哲学学说，因为塞尔维亚民族只有这样才能发展，才能融化在世界文化的共同体中，换句话说，融化在现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的世界共产主义社会之中。"⑱

Б．博什尼亚克在《作为科学的哲学史》一书(一九五八年)中研究了哲学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他考察了如何对这个或那个哲学学说进行批判评价的问题，并认为，应该考虑产生某个学说的具体历史条件，把它作为一定时代的表现来评价，因为在新的社会经验和最高水平的科学知识的条件下，甚至当时最进步的观念也会暴露出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哲学史"不能容忍"千篇一律的东西，要求制定新的考察方法。作为科学的哲学史的任务不单是研究过去的东西本身，更重要的是研究它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解决了当代问题。博什尼亚克在无神论史和宗教批判方面发表了不少著作⑲。

博什尼亚在后来的活动中，在为《实践》杂志撰稿时，背离了他在《作为科学的哲学史》一书中所表述的许多可信的思想。他与这一杂志的编辑部的长期合作是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的。

在南斯拉夫的哲学书籍中有一些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专门研究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主要资产阶级哲学家：Ф．尼采、Э．胡塞尔、Н．哈特曼、Б．罗素、Л．维特根施坦 、А．艾尔、М．海德格尔和К．雅斯佩尔斯等。Б．舍西奇、И．约瑟福夫斯基展开了对哲学中实证主义观点的批判。М．采基奇研究了实用主义的哲学。З．米契奇研究了哲学的现象论。М．达米扬诺维奇研究了存在主义的哲学。

п. 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著作《马克思主义史》(一九六一年第一版，一九七八年第三版）是“新马克思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例子。作者把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学派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列入马克思主义，还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弗兰尼茨基充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尾巴，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多方案论，并按民族居住地划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指出，试图“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观多元论的原则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毫无根据的。

南斯拉夫哲学家研究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哲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对宗教教义进行了批判。学者们指出唯心主义哲学和现代宗教流派的联系，并批判了没有把宗教的认识论方面包括在内的庸俗社会学纲要。他们认为，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的特有的差别之一是宗教的世界图景倾向于感性的形象和表象，而哲学唯心主义学说则是运用抽象的概念。

南斯拉夫学者在科学无神论和宗教批判方面的著作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科学无神论史的一般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宗教意识形态的批判；第二类是反映现代的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关系的著作。属于第一类的著作有：Б. 博什尼亚克的《哲学和基督教。对非理性意识的理性批判》，Б. 帕维切维奇的《宗教和哲学》，A. 克列西奇的《宗教哲学》[80]。在第二类著作中可以举出以下著作：Э. 奇米奇的《不信神的悲剧》，O. 曼季奇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对话的意义》、З. 罗捷尔的《政治和宗教》、A. 菲阿缅戈的《现代社会中的教会和政治》、И. 姆利沃契奇的《天主教会的现代化》，И. 拉济奇的《南斯拉夫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等等。

博什尼亚克考察了近代和现代的哲学中的宗教和哲学关系，

分析了斯宾诺莎、霍布斯、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新约经文的研究。他特别注意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关系，叙述了社会空想主义者和革命民主派的基本思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为批判宗教意识所提出的原则上全新的东西。

作者在以下两方面对宗教作了批判：逻辑方面（证明新教教义的非逻辑性和矛盾性）和哲学语义学方面，并证明宗教教条是不合理的。在博什尼亚克的书中有一些有争议的命题。他关于真理和自由，关于人的论断是抽象的。他把哲学归结为人本学，他认为末世论和人对他的死的态度是宗教和哲学的中心问题。因此，他不止一次地片面地考察宗教的消亡问题。

在B. 帕维切维奇的科学无神论著作中，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批判现代哲学人本学（M. 舍勒、A. 盖伦），指出它的基本方法论原则的缺陷及其论据的虚伪性，并特别注意批判关于宗教对象独立存在的论点。

A. 克列西奇在《宗教哲学》一书中试图揭示宗教意识的结构，并说明了它在宗教史上的变化。

在无神论的著作中十分注意与宗教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例如，M. 让科、T. 库利奇㉛等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和进程中法西斯意识形态与宗教教义的联系，指出它们的反动的思想方针和反共主义。哲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发觉了旨在使宗教现代化的趋向和天主教、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复活，指出必须加强与宗教的斗争，首先是通过消除产生宗教意识的原因来加强这一斗争。

最近二、三十年来，对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分析表明，总的说来，这一发展是富有成果的和复杂的，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与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斗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企图提出新的马克思主义方案，并以

之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相对立。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作了种种尝试，想解决辩证逻辑、科学认识的方法论和社会活动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密切地关系到在科学技术革命和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的社会任务。尽管环境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十分复杂，但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确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作了和正在作出许多有益的和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创造性活动对于发展国内的所有科学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

① 《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载于1974年6月3日《共产主义者》周报第55页。

② 参看1982年6月30日《真理报》。

③ 参看1983年1月28日《真理报》。

④ Д．涅杰利科维奇《旧南斯拉夫的反动哲学：哲学系文集》1948年贝尔格莱德版第1册。

⑤ Б．济赫尔《论存在主义和当代其他的思想颓废现象》1955年贝尔格莱德版第25页。

⑥ 参看И．科桑诺维奇《辩证唯物主义》1956年萨拉热窝版；A．斯托伊科维奇和Ь．舍西奇《辩证唯物主义》1962年贝尔格莱德版。

⑦ O．曼季奇《辩证唯物主义概论》1964年萨格勒布版。

⑧ A．斯托伊科维奇《简论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载于《社会科学文集》1969年诺维萨德版第53册第66页。

⑨ A．克列西奇《非暴力是人的存在方式》，载于《实践》1970年第1—2期第151页

⑩ M．贝尔托利诺《简论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产生》，载于《辩证法》1975年第3期第60页。

⑪ 1972年5月3日《斗争报》。

⑫ 参看Б．济赫尔《恩格斯、列宁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载于《社会主义》1974年第1、2、3期；A、斯托伊科维奇《现代的反映论》，载于《辩证法》1973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哲学》1977年贝尔格莱德版

⑬ Ь．济赫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51年贝尔格莱德版第1册第16—47

页。

⑭ А. 斯托伊科维奇和Б. 舍西奇《辩证唯物主义》1967年贝尔格莱德版第6页。

⑮ 同上书，第68页。

⑯ 同上书，第63—64页。

⑰ А. 斯托伊科维奇《南斯拉夫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载于《现代哲学》1975年贝尔格莱德版第18页。

⑱ 参看Б. 彼得罗维奇《马克思主义》，载于《现代哲学》1975年贝尔格莱德版第18页。

⑲ О. 曼季奇《辩证唯物主义概论》1964年萨格勒布版第26页。

⑳ Л. 佩伊奥维奇《体系和存在》1970年萨格勒布版第204页。

㉑ И. 约瑟福夫斯基《哲学》1969年斯科普里版第6页

㉒ 参看Л. 列科维奇《唯物主义和哲学》1967年贝尔格莱德版第398页

㉓ 同上，第405页。

㉔ Д. 佩伊诺维奇《技术和形而上学》，载于《今天的人》1964年贝尔格莱德版第183页。

㉕ 《反映论的一些问题》1960年贝尔格莱德版第37—38页。

㉖ Б. 马耶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的功用和意义》，载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第111页。

㉗ Д. 涅杰利科维奇《马克思辩证法的人道主义和现代人道主义的辩证法》1968年贝尔格莱德版第98页。

㉘ А. 斯托伊科维奇《世界的规定性问题》，载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第204页。

㉙ 参看Б. 舍西奇《逻辑学原理》1971年贝尔格莱德版第15页。

㉚ Б. 舍西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重要特点》，载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第104页。

㉛ 同上。

㉜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㉝ Д. 涅杰利科维奇《列宁和哲学》1969年贝尔格莱德版第244页

㉞ Д. 涅杰利科维奇《超越》1972年贝尔格莱德版第15页。

㉟ Г. 扎耶恰拉科维奇《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969年诺维萨德版第131页

㊱ Л. 列科维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342页。

㊲ 《社会主义》1974年第2期第34页。

㊳ Л. 日夫科维奇《社会反映论》1963年萨格勒布版第3—4页。

㊴ 参看Л. 日夫科维奇《社会反映论》第3—4页；俄译本《社会反映论》1968

年莫斯科版第 9 页。

㊵ M．贝尔托利诺《马克思主义和培养教育工作的思想基础》，载于《辩证法》1977年第1期第9页。

㊶ Л．日夫科维奇《社会过程的理论》1971年索非亚版第102页。

㊷ 参看C．斯坦科维奇《活系统中的组织和秩序》，载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问题》1974年莫斯科版第181页。

㊸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问题》第181页。

㊹ 同上。

㊺ C．斯坦科维奇《人的生活环境和地理决定论》，载于《辩证法》1966年第3期第44页。

㊻ 参看B．代约维奇《恩格斯的数学观和现代数学》；M．伊里奇-代约维奇《恩格斯的和当代的空间观念》；Э．斯季帕尼奇《恩格斯论笛卡儿在数学发展中的作用》；И．П．约尔丹诺夫《论微粒子的性质》；П．拉多曼《马克思、恩格斯和生物电化论》，载于《马克思和当代》1966年贝尔格莱德版第3卷第108页。

㊼ И．古特曼《微观物体的同一性问题》，载于《辩证法》1977年第3期第41—47页。

㊽ И．П．约尔丹诺夫《现代物理和技术科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成分》，载于1974年《辩证法》第4期。

㊾ 参看Я．达农《自然科学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意义》，载于《辩证法》1977年第4期。

㊿ 参看 科斯季奇 《恩格斯的科学观》，载于《辩证法》1978年第1期第50页。

(51) 参看A．比比奇在第十九次国际政治科学协会世界会议（1979年于莫斯科）上的报告《南斯拉夫的政治科学》； 焦尔杰维奇《社会主义和民主》1962年贝尔格莱德版；Н．帕西奇《阶级和政治》1974年贝尔格莱德版；Р．卢基奇《国家的政治理论》1962年贝尔格莱德版Б．察拉坦《社会主义和政治》1972年萨格勒布版。

(52) A．比比奇《南斯拉夫的政治科学》第9页。

(53) 同上书，第6页。

(54) Р．卢基奇《谈谈社会学概念》1957年贝尔格莱德版第26页。

(55) 参看：Л．日夫科维奇《社会学概论》1940年萨格勒布版，《社会上层建筑》1960年萨格勒布版；Б．济赫尔《今日中之昨日》1974年卢布尔雅那版；B．米拉诺维奇《社会学》1975年贝尔格莱德版；M．波波维奇和M．兰科维奇《社会发展的理论和问题》1981年贝尔格莱德版；戈尔恰尔《社会学理论概

述》1965年贝尔格莱德版；A 菲阿缅戈《一般社会学原理》1960年萨格勒布版。

56 B．拉施科维奇《社会学》1971年贝尔格莱德版第41页。

57 参看《社会学》1976年 第1—2期第33页。

58 其中最主要的有：《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社会结构和流动性》1963年贝尔格莱德版；《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载于《马克思主义手册》1972年 第1—2期；《社会阶层和社会意识》1977年贝尔格莱德版。

59 参看И．温斯基《南斯拉夫居民的阶级分析和1938年的国民收入》1970年萨格勒布版第6页。

60 C．舒瓦尔《从社会学对南斯拉夫社会的剖析》1970年萨格勒布版第12页

61 C．普利舍维奇《现代阶级在改组中》1976年萨格勒布版第6?页。

62 参看B．哈吉斯捷维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本质的一些[illegible]》，载于《社会学》1972年 第3期第386—387页。

63 参看A．斯托伊科维奇《列宁和人道主义》，载于《哲学问题》1968年 第1期。

64 参看书评：C．M．莫罗佐夫《一部关于异化问题的有创见的著作》，载于《哲学科学》1967年 第3期。

65 Б．济赫尔《论异化或人的自我异化》，载于1964年4月16日《共产主义者》周报。

66 Л．日夫科维奇《社会过程的辩证法》1972年索非亚版第331页。

67 参看B．鲁斯《人和世界的辩证法》1969年贝尔格莱德版第175页。

68 Б．舍西奇《现代的人和世界》1969年贝尔格莱德版第175页。

69 Б．舍西奇《必然和自由》1963年贝尔格莱德版第331页。

70 同上。

71 参看Л．日夫科维奇《社会过程的辩证法》第124页。

72 Л．列科维奇《辩证的自由理论》，载于《马克思和当代》1963年贝尔格莱德版第1卷第33页。

73 B．帕维切维奇《作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载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第352页。

74 参看书评：C．B．布列米诺夫《一个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书》，载于《哲学科学》1971年 第6期。

75 Л．列科维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36页。

76 参看C．M．莫罗佐夫《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新作》，载于《哲学科学》1968年 第2期。

77 Г．扎耶恰拉诺维奇《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1971年诺维萨德版。

⑱ A．斯托伊科维奇《塞尔维亚人哲学的发展，1804—1944年》1972年贝尔格莱德版第564页。

⑲ Б．博什尼亚克《哲学和基督教》1966年萨格勒布版。

⑳ 参看：Б．博什尼亚克《哲学和基督教。对非理性意识的理性批判》1966年萨格勒布版；B．帕维切维奇《宗教和哲学》1974年贝尔格莱德版；A．克列西奇《宗教哲学》1981年萨格勒布版。

㉛ M．让科《与天主教会的关系的现实问题》，载于《宗教和社会》1969年版；T．库利奇《塞尔维亚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学》，载于《社会学》1971年第2期。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英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这就导致不列颠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上地位的削弱。英国仍然是一个大国，但是，它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减小了：六十年代，它最终丧失了自己的殖民帝国的地位。虽然如此，但英国的统治阶级仍妄图保存自己在欧洲、甚至在全世界的特殊作用，它同美帝国主义紧密合作，增加国外投资；跨国的垄断组织的扩张加强了，这些垄断组织是新殖民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在英国共产党的纲领中写道："英国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充当美国小伙伴的角色，把大量资源消耗在军备和海外基地的建设上。"[1]目前国家"处在深刻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2]这种危机是在1974年下半年开始的。

危机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加剧以及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下降上。英国共产党总书记Г．麦克伦南在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有三百多万人失业，大的部门在紧缩，对已经形成的、国家和社会的服务系统不断发起进攻"[3]。

在经济危机、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和不列颠帝国主义地位削弱的情势下，国家的反动作用在增长。国家不仅不是超阶级的，而且相反，它担任"大企业主"和经济"调节者"的角色[4]：重新分配国民收入，刺激投资，以便加强工业公司合并、超级康采恩形成以及资本集中的过程。

国家对整个政治和社会领域（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发生巨大影响。它控制报刊、广播、电视以及其他的大众信息手段。国家不断向极权的小团体性质的国家蜕变、压缩资产阶级民主、加强反共和反苏、取消工会权利和工人阶级的其他成果等等的危险性在增长。一九七九年上台的保守派政府的目的在于：把矛头转向工会，“限制民主权利，鼓励种族主义，并继续在北爱尔兰实行镇压。”[5]

但是，与垄断组织有密切联系的英国政府在试图削弱民主力量的同时，对一定的社会阶层如中间环节的管理人员、国家官员、自由职业者等等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英国垄断资本家利用科技革命的成就，依靠工人基本群众的劳动集约化，来扩大工人阶级的特权阶层的人数。“工人贵族”继续成为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支柱、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影响的主要传播者。

除了轮流执政的、英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主要政党——保守党和工党之外，在国内，极左分子、托洛茨基分子、新法西斯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的组织有了扩展，英国共产党为反对这些组织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的最主要任务——这就是向反民主的进攻挑战，向日益嚣张的法西斯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的组织挑战。”[6]

自从英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一九二〇年）起，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哲学家就为在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中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进行复杂的和紧张的工作。在他们的著作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的创造性研究，同英国共产党的活动、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反对资产阶级观念的斗争、反对改良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观念的斗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是建立在对英国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特点以及对不列颠人民的文化、民族传统和历史经验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英国强有力地发展起来了。

在四十——五十年代的著作[7]中，Г．波立特、П．达特、Дж．高兰、Дж．克卢格曼、Дж．坎贝尔、Э．伯恩斯、М．康福思、Дж．刘易斯、Дж．伯纳尔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评述了英国经济的战后状况和它进一步衰退的原因，批判了工党政府的反人民的侵略政策，反对旨在准备新世界大战的英美帝国主义联盟的“马歇尔计划”。他们研究了迫切的哲学问题，详细探讨了在反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工党右翼分子和宗教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五十年代下半期，即保守党执政时期，英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统治集团践踏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对共产党人实行镇压和歧视的政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压力加强了，修正主义活跃起来。

英国共产党第二十五次非常代表大会（一九五七年）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召开，代表大会对英国国内外情况作了深刻分析，表现了同苏联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代表大会打击了修正主义分子，回击了宗派主义分子，指引共产党人加紧同工党左派力量、工联组织以及其他民主团体的合作。代表大会通过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纲领的新文本（这一纲领在1952年英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通过）。

Дж．高兰、М．康福思、Дж．伯纳尔、Дж．伊顿和英国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了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中的新趋势，揭示了工党右翼分子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尖锐地批评了关于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一般和特殊的相互关系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指责了修正主义者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哲学中的党性原则。М．康福思和其他马克思主

义哲学家指出，修正主义者Г．利维、Р．希尔顿、Дж．沃森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传播者。社会改良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表现为：它们力图恶意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以改良主义思想来代替这一学说。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与改良主义者（“渐进主义者”）相反，英国共产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的方法是展开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获取政权。英国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保证英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

英国共产党的理论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主义和道德》、《艺术家和政治》、《工会是否还存在》、《社会发展的阶段》等专题展开了讨论。Г．波立特、Дж．刘易斯、М．康福思、А．凯特耳等人积极参加了讨论，他们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的实质。

在六十——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特点是：在全世界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这些全新的现象的研究，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英国）中得以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一九六三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有关哲学和艺术的书，由Дж．高兰、Дж．坎贝尔和Б．西蒙执笔，在序言中指出：“过去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可以看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发展有这么大的影响。”[8]

同时，六十年代由于在英国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开展、“新左派”运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产生了从人本主义立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修正主义观点。根据这些观点，马克思的“真正的”哲学是“人的创造”，“实践的人道主义哲学”。

Б．里德、Дж．伯纳尔、Дж．克卢格曼、М．康福思、Дж．刘易斯、А．莫顿在有关空想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主义的

形成、个性和人道主义问题以及科技革命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的专著中，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批判，对英国政治和思想生活中的新现象作出了评价。[9]他们在专著中特别注意论述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他们揭示了英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新倾向，批评了К．波佩尔、Г．马尔库塞、“新左派”思想家（С．霍尔、Р．威廉姆斯、Т．福特鲁普）的观点，批评了修正主义者的理论以及他们发出的马克思主义“非教条化更新”的口号，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徒的对话的意义。

六十年代，在《今日马克思主义》这本理论刊物上，就“辩证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徒的对话”、“侵略性和人”、“工人监督”、“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一党制”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一九六八年，在伦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讲习班，这些讲习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七十年代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在社会矛盾和政治不稳定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И．布卢姆菲尔德写道：“今天，敌人也像朋友一样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巨大的力量、吸引力和思想性。”[10]

为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М．康福思、Дж．霍夫曼、К．韦丁顿、Б．拉梅尔森、Дж．沃迪斯、Дж．克卢格曼等人发表了著作，他们在书中揭示了列宁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英国的创造性发展的深刻影响。Дж．伯纳尔写道：“列宁的著作迄今为止一直是现在和未来新社会科学的基本源泉。”[11]在这些著作[12]中，对资产阶级“马克思学”、现代反动的哲学和社会学进行了批判，指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根据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新发现来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这时候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入门》[13]一书，

激发了许多工人、知识分子代表和其他的居民阶层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愿望。一九七五年，英文版五十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问世，这是由《劳伦斯一韦沙特》出版社、《进步》出版社（莫斯科）和《国际出版社》（纽约）共同出版的。

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展开讨论的题目如下：《人和周围环境的危机》（一九七一年），《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一九七一年），《马克思主义和家庭》（一九七二年），《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一九七六年），有关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дж．刘易斯和л．阿尔都塞之间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进行的讨论（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具有重大意义，м．康福思、г．格雷、дж．格兰特、м．韦顿和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д．高尔斯蒂克也参加了这次讨论。

英国共产党第三十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批准的英国共产党新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发表，是一个重要事件，新纲领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定向标。在《今日马克思主义》和《评论》这两家杂志上，广泛讨论了与英国共产党新纲领有关的问题，从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的角度出发，针对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党的作用、党内民主、社会的阶级结构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九八三年，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英国进步舆论界广泛纪念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诞辰一百六十五周年和逝世一百周年。在伦敦举行了隆重的集会，纪念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老战士和积极分子在会上发了言。同年还出版了в．马修斯主编的集体撰写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一书。

在最近二十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英国基本上是按三个方向发展的：（一）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功能，反对资

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思想家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歪曲和伪造；（二）创造性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探索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道路和形式；（三）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发展中的当代倾向。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在六十——七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进一步巩固、全世界民主力量积极活动的条件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展开了对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工作。[14]马克思主义者维护唯物主义辩证法原则，回击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的进攻，同时强调指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不可代替的理论武器，掌握这一理论武器，就能获得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马克思主义者把辩证唯物主义问题同英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面临的实践的政治任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M．康福思写道："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哲学，是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改造功能，决定它的深刻的党性，哲学的党性与科学认识不仅不矛盾，而且相反，它是认识的必要条件。

M．康福思揭露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伪造，对哲学党性原则的歪曲，他写道："在列宁看来，作为革命世界观组成部分的哲学的党性的思想是中心的思想，它包括：要求掌握辩证法，捍卫唯物主义，揭露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阻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反动思想、诡辩术和折衷论。"[16]

由于目前必需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来理解科技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全球性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以，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科学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K．波佩尔、C．胡克等人）企图否

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教条的体系”。M. 康福思反对新实证主义者K. 波佩尔毫无根据地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科学，他写道，科学的哲学原则要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理的基础上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深入研究它们，“这种方式排除没有根据的教条或逻辑上的荒谬性，符合逻辑思维和科学思维的成果以及当代社会工艺学成果。”[47]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表现在它的深刻的创造性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任何教条主义和僵化停滞状态格格不入，它是在社会历史实践和科学认识进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Дж. 霍夫曼批评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的论点，强调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启示录”，而是建立在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研究的基础上的理论。“这个理论随着它同新的自然科学事实和社会事实相关连的程度而继续发展和壮大起来，因此，它应当在变化的历史情况中始终不断地检验自己。”[48] Дж. 霍夫曼继续写道，它的基本原则应当随着生活向前发展而始终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内容和完善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反对把它们作形而上学的划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基本原理——包括唯物主义的原理和辩证法的原理——总合在一起构成科学的世界观。M. 康福思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性质和它的唯物主义是分不开的……”[49]同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研究自然和社会以及革命地改造世界的统一的哲学方法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特别是根据《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揭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质、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学说的实质，批评了马克思以前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代表人物所特有的唯心主义观点和

形而上学观点。他们指出，新实证主义者波佩尔等人回避与考察物质、意识、空间、时间、因果关系等等有关的哲学的世界观的问题，把哲学仅归结为语言、逻辑和狭隘地理解的方法这种局部性问题。

Дж. 伯纳尔、М. 康福思、Дж. 霍夫曼提出列宁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于：他依据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最新科学发现和社会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提出了物质这一哲学概念的定义，揭示了物质的自然科学观。伯纳尔写道："……列宁成功地避免了教条主义这个极端——盲目照抄马克思原文，也避免了修正主义这个极端——篡改马克思原文，其目的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同当时资产阶级的官方科学流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20] 伯纳尔指出，列宁在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进行斗争的时候，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生动的、战斗的、为进步人类服务的哲学。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一本经常被资产阶级哲学家如Д. 麦克莱伦、Ф. 本德等人[21]选为"批判"对象的书，正是在这本著作中，列宁强调指出，必须把物质的哲学概念同关于物质构成、关于具体的物质东西的自然科学观点区分开来。康福思写道，列宁在这里"指的是物质东西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不依我们或者随便什么人对物质东西的看法为转移。至于物质东西的构成——它们由什么构成，它们的结构怎样，它们的特性如何，那么，这是在研究物质东西的过程中会弄清楚的。"[22] 他继续写道，物质的哲学概念不仅包括关于现实世界的存在不依意识为转移的原理。它还表明，物质世界"具有可以通过感官来认识的基本特性，因为它是在空间和时间内实现的因果过程。"[23]

Дж. 伯纳尔、М. 康福思、Дж. 霍夫曼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问题，捍卫列宁的反映论，防

止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伪造和歪曲。正因为反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所以资产阶级哲学家、马克思学家和修正主义者才把反映论选为自己"批判"的对象。A．施米特、Г．彼特罗维奇和所谓"实践派"理论的其他拥护者断言，马克思似乎否定了反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霍夫曼反驳了这种"论据"，他写道："马克思坚定地把自然的或人创造的全部现实称为物质现实，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正是与意识有区别的物质现实决定意识，因而物质现实是意识反映的那个领域。"[24]

马克思主义者断定，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以及人类意识对客观世界的积极反映，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霍夫曼指出，反映论恰恰"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部分"。[25]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一贯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例如，Дж．刘易斯在他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一九七七年）一书中，一方面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使它免遭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非难，另一方面，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上有时得出的结论也站不住脚，因为这些结论使他的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观点同"实践派"理论的拥护者的观点以及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新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接近起来。

Дж．刘易斯片面地理解主客观辩证法的相互关系，断言"马克思的辩证法观念完全同人和历史有联系，而决不是同自然有联系。"[26]他认为马克思对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反映论这种说法抱否定态度，因为马克思似乎是从人周围的现实是人的社会实践的结果这一点出发的。刘易斯写道，唯物主义认识论不是"逻辑的理论或哲学的理论，而只不过是对有效思维的形式的描绘"。[27]他得出结论说，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哲学）的对象。[28]

但是，在下列著作[29]中，刘易斯在考察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时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没有作出不确切的表述，并且克服了“实践派”观念和现代“时兴的”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的影响。在这些著作中，他批判了新实证主义者的认识论，新实证主义者要求为获得感性经验提供的“实证”知识而克服形而上学的幻想。

刘易斯反对实证主义把两个认识阶段——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混为一谈并对这两个阶段作出唯心主义的解释。刘易斯强调指出，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以及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他写道：“我们同周围现实辩证地发生相互作用，经常不断地掌握现实，科学地认识现实。”[30]他继续写道，人和世界不是处于这样的隔绝状态，以致理性只起观察者的作用。这里，统一体是不可分割的，并且是比较复杂的。意识不像唯心主义者（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是精神的实体、“结构”，意识具有高度组织的物质的属性。意识是物质世界的观念的反映形式。刘易斯写道：“真正的意识只能把现实当作处于发展中的、正在让位于另一种状态或另一种体系的体系那样对待。它反映似乎固定不变的事物的形成过程，揭示事物的实质并表明事物变动的方向。”[31]

康福思、刘易斯、霍夫曼、韦丁顿以及英国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著作中探讨了认识论问题以及与认识论有关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问题，他们追随列宁，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叫做“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关于自然和社会现实的发展的最深刻的和最全面的学说。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具有创造性、革命实践的性质；它是认识物质现实现象的理论和方法，物质现实的特点是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和含义上的依从关系。康福思写道：“辩证法——这是彻底考察

自然界和社会的现实过程中被揭露出来的对立面的联系。在这些过程中，事物不是单个地发生、变化和消失的，而是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中，在'事物和过程的巨大的一般联系'的范围内发生、变化和消失的。"[32]

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不是封闭式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生动的、发展的体系，它对社会实践和科学思维的运动有灵敏的反应。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阐明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和内容，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视为规律和范畴的原则的一定逻辑体系。他们强调指出，在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之间存在有直接的相互依从关系和相互联系；主观辩证法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实践派"理论的拥护者们否认辩证法在自然界的作用，霍夫曼对这种观点给以详尽的批判，他写道："'实践派'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看法是，辩证法只可能是人的活动所固有的，辩证法是人、社会世界创造者的实践尺度。"[33]霍夫曼批驳了"实践派"理论家的这一论点，强调指出："辩证法涉及面比较广，辩证法理论考察物质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一种运动。"[34]霍夫曼强调指出，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肯定，自然科学也像关于人的科学一样，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

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上进行了有关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律在自然界的作用问题的讨论。Дж. 霍夫曼、Д. 格里夫斯、M. 阿顿波查和其他哲学家参加了这次讨论。这次讨论是由于爱丁堡大学的进步哲学家 P. 冈恩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自然界是辩证的吗》一文而引起的。文章作者除了正确解释辩证唯物主义的各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些使他同"实践派哲学"的拥护者相接近的错误观点。冈恩断言，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是恩格斯的，而不是马克思的，他写道："谈论自然辩证法有

没有意义呢？我的回答是：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辩证法的概念按其实质来看是泛神论的，与唯物主义不相容。”[35]

马克思主义者依据哲学的和自然科学的材料，批判了冈恩关于在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的论点。他们证明，物质世界通过无限多样化的对象和现象而存在，它服从于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律的作用。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发展理论的实质，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和社会方面的作用，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见解。

在伯纳尔、康福思、韦丁顿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方面和方法论方面的统一的角度，来阐明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完整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规律和范畴。韦丁顿在说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时强调指出，“事物和过程始终表现出对立的方面和倾向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说，矛盾始终存在于一切事物和过程中。”[36]他继续说道，既然斗争发生在统一的范围内，那么，对立面之间确立的关系按其实质来看是矛盾的。因此，矛盾是在某一整体范围内对立面之间的关系；对立面表现为矛盾的方面。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意味着，消除对立面之一就是消灭整体本身。因此，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理论家提出靠“改良”的办法来改善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定会遭到挫折。他们是形而上学者，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而在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弊病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所固有的；要消灭这些弊病，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本身。

康福思同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波佩尔论战，他肯定说，在考察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时，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碰上辩证法的矛盾或对立面的斗争。他写道，列宁早在《哲学笔记》中就已经强调指出，“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

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37]

康福思、伯纳尔、霍夫曼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原则，从哲学上分析科学和生产之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发生的变化。他们十分注意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对于二十世纪下半期展开的强大科技革命的条件下的科学发展具有非常迫切的、重要的意义。英国进步哲学家C．黎利写道：“科学需要哲学方面的帮助，因为在教学和试验的过程中，理论视觉日益受到限制，而专业的思维习惯的影响极大，以致理论视觉衰退失灵。”[38]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探讨物理学和其他科学的最新成果。他们依据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批判了“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各种流派（唯能论、非决定论、操作主义等等），试图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解决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复杂的方法论问题。伯纳尔写道：“二十世纪是在列宁的天才不仅对经济领域而且对自然科学领域发挥最强烈影响的标志下走过来的。”[39]

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注意生物学问题——生命的发生、人的起源、进化论。[40]这些问题属于现代人本主义和人的哲学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资产阶级学者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伯纳尔、刘易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生命发生的问题不仅对生物学很重要，而且对哲学也很重要。伯纳尔写道，“我们在研究生命的发生时，必然也要研究生命本身的性质、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差别、地球上的生命和其他星球及宇宙其他部分上的生命的联系，也要研究像生长、再现、运动、感觉能力和思维这样一些生命特点产生的意义。”[41]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批判了生物学中退化论、机械论的观念。伯纳尔揭露伪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生机论的实质，

他写道，生物学现象服从于物理学规律和化学规律，“不需要用某种特殊的‘生命力’的观点来为自己解释……生命的统一产生于生命的全部历史，因而是生命起源的反映。”[42] 伯纳尔强调指出地球上生命的发生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他批判这一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念。伯纳尔写道：“关于生命发生问题的争论具有宗教的底蕴，尤其在当初人们认为那种与神造观发生矛盾的、主张内因决定的自生思想被巴斯德的实验彻底推翻的时候是这样。”[43]

伯纳尔利用最新宇宙起源学思想、生物化学和实验有机化学的资料，还依据A．奥巴林和Д Ж．霍尔登制定的生物发生观，试图揭示生命发生的具体条件。他认为，能够生长、繁殖、淘汰的原始生物有机体，是由于在原始海洋（或者所谓原始肉汤）中化学物质浓缩而发生的。伯纳尔指出，“生命的摇篮，无疑是海洋。”[44] 在海洋中最早发生蛋白质和核酸以及同现代活细胞聚合物一样的分子内的组织。生命的全部以后的经过，实质上是由这种生命聚合物的分子内的结构决定的。因此，伯纳尔得出结论说：“从实质上看，生命在于物质的潜在可能性的信息方面的增长和自我复杂化。”[45] 生命不是物质的某种附加的“属性”，而是在活存在物中按复杂方式组织的物质在进化中产生的新功能。伯纳尔关于地球上生命发生的假说，论证了关于物质自我运动、有机物和无机物、自然界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地球上生命的自我产生的辩证过程，强调指出，恩格斯提出的生命定义（“生命，这是蛋白体存在的形式”）被生物学最新资料所证实。运用于二十世纪下半期，这一定义可以这样表达：“地球上的生命主要是核酸和蛋白质的相互作用的功能。”[46]

关于动物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伯纳

尔、刘易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占很大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尖锐地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把某些生物学规律绝对化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强调人类历史与生物进化相比的质的特征。同时，他们也认为进化论有巨大的意义，按刘易斯的话说，进化论“不仅把超自然力量逐出创造过程，而且以生命的自然发展来代替这种超自然力量。”[4]

刘易斯根据古生物学的最新资料，分析人的发生是物质逐渐发展中的飞跃，由有机界向现实的社会形式的过渡。在这复杂的过程中起巨大作用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机体的变化和人脑的发展使人能够成为劳动工具的创造者，帮助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劳动在人和社会的起源和形成中的作用的原理，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其他流派进行了斗争，探讨了科学认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规律来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问题。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和动力的哲学科学，是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它是英国共产党在争取社会进步和现实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中的思想武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Д ж．沃迪斯、Д ж．克卢格曼、Э．伯恩斯、А．凯特耳、А．莫顿、Д ж．伯纳尔、М．康福思、Д ж．霍夫曼、К．韦丁顿、А．亨特、Д ж．刘易斯、Б．皮尔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范围的问题。他们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的著作，详尽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

这门哲学科学的对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霍夫曼写道："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比占首要地位的基本原理，——如果没有一般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不可思议的。因此，社会思想和社会实践的联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是在关于思想和客观现实的联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加以考察的。"[48]

各种流派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哲学结合起来，伪造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内容和结构，与他们相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证明，"批判理性主义"的理论家K．波佩尔也好，"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T．帕森斯也好，还有许多其他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他们都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实质，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研究历史现象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社会发展的大量具体历史材料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社会。"实践派哲学"的代表人物否认唯物主义辩证法可以应用于自然界和社会，Д Ж．霍夫曼在与他们进行辩论时强调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对社会的系统运用，把普遍性和具体性和谐地统一起来。这里使我们能够从真正特殊的现实性角度来具体评价每一社会形态的社会普遍理论……是我们时代最发达的社会理论。"[49]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般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对社会问题的运用。M．康福思写道，"正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从事物的现实变化中来考察事物，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这些结论涉及社会关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涉及在目前可以用来解决当代社会的迫切问题的那种情况），恰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果。"[50]唯物主义历史观消除了在解释历史现象方面的任何主观主义和随心所欲的说法。

М．康福思、К．韦丁顿、Дж．刘易斯等人阐明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并在考察社会生活时加以运用的那些基本原则。按照康福思的说法，这些原则可表述如下：社会的发展，由科学可以发现的那些客观规律来调节；观点和制度，以及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变化是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在物质生活基础上发生的观点和制度，在社会发展中起积极作用。[51]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批判了关于历史事件进程的主观心理学观点，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各种各样的社会灾难的原因就在于个别人物的活动。康福思表明，某些垄断集团力求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原因不在于他们具有特殊的心理、精神气质，而在于物质利益。康福思写道，“如果说现在有一些人企图发动战争，而另一些人竭力保卫和平，那么，这主要不是因为前者具有好斗的精神气质，而后者比较心怀友善和爱好和平；这恰恰因为确有一些人能从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中捞到好处，而另外一些人的利益则在于：要消除这种国际紧张局势。”[52]

М．康福思、Э．伯恩斯、К．韦丁顿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证明历史宿命论是没有科学根据的。М．康福思揭露了利用“命运”、“生命的象征”这些神秘主义范畴的当代这一流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实质，他写道：“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表现为这一事实：它们把社会发展的规律解释为从外面影响社会的‘命运’，以致一切人都变成了单纯的命运工具、外部必然性的工具。”[53]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与这些理论不同，它不是机械的决定论。相反，按照唯物主义的社会观，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承认决定历史事件的所谓天意、命运或外部必然性。“事件完全地和彻底地是由人们在自己所处的那种历史条件下自己采取的行动所决定的。”[54]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反对技术统治论。按照“技术统治论”的观点，社会进步被归结为技术进步，没有技术进步，社会进步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科学发现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生产关系的类型。科学的发展依赖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同时，科学作为直接生产力，同技术有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对生产发生影响。这一影响在科技革命的时代特别加强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也对科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

Дж．伯纳尔、М．康福思、К·韦丁顿等人从辩证唯物主义对科学发展条件的分析出发，指明只有社会主义才促使科学全面发展，而资本主义为了垄断集团和军国主义集团的利益，造成科学的片面的畸形的发展。因此，他们号召全世界的学者坚决为反对把科学用于侵略目的、为使科学服务于和平和社会进步力量而进行斗争。伯纳尔写道，“我们必须永远消除核战争的危险性。”[55]

由于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的分析，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们的基本类型，基础和上层建筑。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分析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社会阶级结构中的新现象。

马克思主义者揭穿了右翼工党领袖所谓英国资本主义的实质发生了变化、它在科技革命条件下已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蛊惑性论调。Дж．高兰写道，“自动化从可能性上说可以意味着富足。但是，资本主义给我们提供的例子足以断定，它的所有科技成就都带有消极的后果。”[56]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揭示了现代英国条件下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工人的实际工资与增长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垄断资本家的利润日益增长，失业人数、生产事故不断增加，等

等。Б．西蒙强调指出，关于科技革命条件下资本主义“变形”的神话同真正的现实处于令人不能容忍的矛盾之中。С．阿罗诺维奇、Дж．沃迪斯、А．格兰特、Г．弗兰克尔、А．亨特、Дж．韦斯特加德、Х．雷斯勒、Дж．科恩写道[57]，在右翼工党的“福利国家”中，科技革命不能消除对抗阶级的存在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相反，它导致阶级对抗的尖锐化，政治家也好，现代资产阶级理论家也好，都无法掩盖阶级对抗现象。

在英国进步哲学家Дж．韦斯特加德和Х．雷斯勒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当代英国研究》中，令人信服地描绘了英国阶级不平等的景象。他们分析了税收问题，以及右翼工党报刊上广为宣传的有关创建“福利国家”的措施，他们得出结论说，这些措施主要只能引起阶级内部的收入再分配，而不是阶级之间的收入再分配。英国进步哲学家驳斥了政权的“多元论”，公正地指出，实际上这种政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由资本实现的。[58]

在《阶级和阶级结构》这本有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哲学家参加撰写的、很有价值的书[59]中，分析了当代英国的阶级结构的变化。书中表明了当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科技革命条件下工人阶级差别的增加，分析了决定“冲刷”“工人贵族”层这一与其他工人阶级相对立的社会集团的因素，以及近十年来“工人官僚”[60] 的加强。

马克思主义者在说明阶级概念时，指出阶级的基本特征：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等等，并认为阶级心理状态、教育程度、专业分工、意识形态因素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出发点是：在英国现代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下，阶级斗争大大加强和复杂化了，阶级行动在扩大，阶级意识在增强，正在探索阶级斗争最有效的形式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十分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条件下

的国家的学说。Дж. 沃迪斯、Дж. 刘易斯、М. 康福思、А. 亨特、С. 阿罗诺维奇、Дж. 克卢格曼、Дж. 科恩、Дж. 霍夫曼、К. 韦丁顿等人根据大量实际材料揭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家实质的理解，把国家看成社会政治结构体系中的组织，揭穿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工党右翼理论家关于国家的超阶级本性的观念的反科学性质。Дж. 克卢格曼和Дж. 科恩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尽管标榜它对周围的一切抱'中立'和'不偏不倚'的态度，但仍然是阶级统治的特别有效的机构。"[61]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指出，Н. 波朗查斯、Р. 米里邦德和另一些表面上指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受К. 波佩尔、"实践派"辩护士以及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其他代表人物的影响的哲学家在著作中表述的国家理论没有科学根据。英国马克思主义者 К. 默塞尔指出，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巨大意义，但认为这一理论不反映资本主义结构发展的现代阶段。默塞尔强调说，正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当前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客观规律性的发展所证实。"[62]

Н. 波朗查斯在创立"威权国家"理论时，形而上学地看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问题的解决，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不谈它们的统一，也不揭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最广泛民主的政权的根本原理。Дж. 霍夫曼写道，"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概念是理解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理论的钥匙。这一概念着重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科学的政策和简单的空想之间的巨大差别。"[63] 他指出，"新马克思主义"、"实践派"理论家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要就是抛弃这一概念，要就是力求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有关这一问题的著作远一点。Дж. 霍夫曼表明了这一关键性的政治概念的巨大意义，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历史必然性。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十分注意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本主义解释，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性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由于Дж．刘易斯就法国马克思主义者Л．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一书发表了文章，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举办了专题讨论，这些问题就成了这次讨论的题目。

在这次讨论中，刘易斯、康福思、格雷等人批判了阿尔都塞，说他把"青年"马克思的观点和"成熟的"马克思的观点对立起来。刘易斯写道："根据阿尔都塞的说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后，发生了脱离所有以前的思维的突然而急剧的断裂。"[64]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见，这一断裂导致以下情况：在一八四四年以后的马克思的著作中不存在青年马克思使用的像"人"、"个体"、"个性"、"人的本质"、"异化"这样一些"人道主义"范畴。这些范畴完全被科学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历史过程"所代替，而"人的解放"问题被"社会结构完善化"的问题所代替。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了阿尔都塞这样把统一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两个方面——人道主义方面和科学—实践方面对立起来的说法。刘易斯、康福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尖锐批判了这个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结构主义的哲学－社会学观点的体系。他们强调指出，结构的方法使阿尔都塞把历史过程理解为"无主体的过程"，以致在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时忘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65]

М．康福思在《谈谈阿尔都塞对刘易斯的回答》和《共产主义的和人的价值》这两篇著作中、Дж．克卢格曼在《人的未来》一书中，刘易斯在《人的独特性》一书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

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规定，详尽地考察了人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个性的形成问题。他们指出，个性是个别的、独特的、独创的，同时强调指出，个性的精神生活中的细微差别和差异，个性的思想、感情和行动的方式的特点，是由它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它所代表其利益的那个阶级产生的。Д Ж．刘易斯写道，“人创造自身和完善自身是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形式为转移的，人达到的是社会在其发展中已经提高到了的那种理智的、精神的和文化的生活水平。”[66]

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地批评了右翼工党思想家著作中表述的人的观念，因为他们以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人的研究，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个人自由。工党对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政策》这一纲领性文件[67]中。在这一文件中，对人进行的考察，是抽象的，同社会隔绝的，没有考虑到人的特殊的社会本质，而这种社会本质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社会之外的个人——这是一种抽象。Д Ж．克卢格曼写道，“每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在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条件下发展的。”[68]

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人的生物学理论拥护者（К．洛伦茨、Д．莫里斯、А．斯托尔等人），因为他们把自然规律挪用于人类社会。[69] 刘易斯写道，按照他们的意见，“人的一切担心，人的侵略性、贪婪性、性欲狂，是对进行残杀、虐待、战争的祖先的“古老”本能的直接继承，”[70] 正是这些东西妨碍人们之间的合作。

马克思主义否定了社会现象的生物学化；人是社会存在物；社会—经济条件是人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刘易斯写道，“人依据社会实践活动的全部历史，改造自然界和自己的个性。”[70a]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的物质生产发展的规律，与有机界本身固有的生物进化规律有质的区别。

м. 康福思、дж. 克卢格曼、дж. 刘易斯等人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性形成问题，强调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的过程中，全面发展的、积极的、新型个性正在形成。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的学说，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一种相应的个性结构，要求人有一定的发展水平，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基础之一，同时又是共产主义建设的动力之一。刘易斯写道，"如果没有社会全体成员自愿采纳的更高一级的社会联系，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存在；今天所达到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程度，离社会主义的目标还很远。"[71]

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自由和必然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角度来揭示自由的实质。к. 韦丁顿写道，"在分成对抗阶级的社会里，个体的个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属于哪个阶级而定。在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中，我们看到在社会的一极是自由，而在另一极是不自由。"[72]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的界限归根结底是由财产制度规定的。资产阶级和右翼工党的自由观，把资本主义世界看作"自由世界"，这是从意识形态上把贪婪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雇佣奴役制神圣化。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有真正的个性自由，刘易斯指出，这时"人恢复了自己的全部丰富的本性，对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才能的无限发展和表现感到满足"。[73]

м. 康福思、дж. 刘易斯、к. 韦丁顿、дж. 克卢格曼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揭穿了资产阶级的假人道主义，其中包括右翼工党思想家的"人道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保存英国当前的社会制度并使它完善化。资产阶级假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企图医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从而巩固它的阵地。дж. 克卢格曼写道，"为人的现在和未来而斗争的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要求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不倦的斗争。如果

我们想使我们的现代社会人道化，那么，我们首先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这一主要的非人道力量。”[74]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把人道主义问题同人民的根本利益、工人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因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从革命行动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它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科学唯物主义理解的基础上。Дж．克卢格曼写道，“我们的任务就是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科学的使命是为人服务，剥削将被消灭，艺术将成为生活的不可剥夺的部分。在这个社会里，个性将自由地、全面地、和谐地发展。”[75]

霍夫曼、康福思、韦丁顿、刘易斯、凯特耳、莫顿、法尔本克等人分析了社会意识的形式——政治思想、法的意识、道德、艺术、宗教，强调指出，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在某一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且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发生很大的影响。社会意识的形式多种多样，它们都带有上层建筑的性质，并表现社会阶级的重大的根本利益。它们的实际社会功能就在于此。K．韦丁顿写道，“一切政治的、宗教的和哲学的体系多多少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阶级利益和社会生活。”[76]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中，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占重要地位。阶级矛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的理论可以是科学的，也可以是非科学的，这要看它们代表社会中的哪个阶级的利益而定。但是，M．康福思强调指出，把科学说成意识形态的抽象反题，这就是一大错误。他批判了法国哲学家Л．阿尔都塞给意识形态下的定义，这个定义说，意识形态是一个因实际社会功能超出理论功能（或扩大知识的功能）而不同于科学的观点体系。康福思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在意识形态中，除了从对人们状况的科学分析中推定的东西以外，别无他

物。而科学分析是在根据经验开展批判性讨论和检验的基础上得以调节和发展的。”[77]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注意艺术问题，捍卫艺术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A．莫顿、A．凯特耳、П．法尔本克、Д Ж．汤姆森、Ф．克林杰德尔等人批判地分析了现代颓废派文学，强调指出英国文学进步的、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传统（莎士比亚、狄更斯、盖斯凯尔、萨克雷、勃朗特）在当代英国社会中的生命力。无产阶级的作家和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中与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和抽象主义相对立的先进文化工作者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

莫顿、凯特耳、法尔本克等人在研究艺术的党性和艺术创作自由的问题时，强调指出，艺术家转到工人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立场，这就为艺术家开创了广阔的创作天地，使他有可能成为为实现人类的伟大理想而进行斗争的自觉战士。莫顿写道，“艺术家获得了新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他在自己狭小的、封闭的‘精英’圈子里永远不会找到的。如果他将成为自己人民的代表者，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自由和潜力才得以增长。”[78]

根据英国共产党文化和艺术小组的倡议，于一九七八年召开了有关“政治和艺术”这一主题的代表会议。进步的艺术家、作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讨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艺术理论和艺术创作自由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在批评艺术和文学中的抽象主义、艺术创作特征的绝对化时，强调指出“对艺术和文学作品的马克思主义评论，是在理解艺术作品方面具有积极价值的东西。”[79]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范围的问题时，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以及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创造性。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原则对社会生活的彻底运用，唯物史观经常不断地在发展，它反映新的规律性

和社会中发生的过程。这一学说的经常不断的创造性发展，是它作为哲学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已被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所证实。э．伯恩斯写道，“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僵化的理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最卓越贡献的是列宁。”[80]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全球性革命过渡的当前时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必要的和具有迫切意义的。

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途径和形式

对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具体途径、方法和形式的研究是英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注意的中心。г．麦克伦南、дж．高兰、дж．克卢格曼、б．马修斯、б．皮尔斯、м．康福思、дж．沃迪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本国条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普遍规律性和特殊规律性的学说。

改良主义的头子、工党理论家照旧宣扬他们那一套理论，即认为不消除按其本质来说是反人道的资本主义制度就能达到社会主义。г．麦克伦南指出，“战后时期六届工党政府，其中包括取得压倒多数的两届政府在内，在社会改造方面都没有取得任何进步，其原因就在这里。”[81]现今的保守党政府代表英国跨国公司的利益，继续搞军备竞赛，向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民主权利进攻。一九七九年召开的英国共产党第三十六次代表大会，研究了在展开反保守党政策的工人运动的条件下争取二者择一的经济和政治战略的斗争任务，还讨论了完善党内民主的方法。

在英国共产党第三十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上通过的《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新纲领中，揭示了英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辩证法、英国特殊条件下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纲领贯穿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精神。纲领是对国家的历史、

传统和文化的深刻研究的总结，是研究科技革命时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阶级力量的配置、主观因素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以及提高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英国共产党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的作用的总结。纲领中谈到，“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我们自己的道路。它将不同于其他国家内存在的道路，这不仅是由于英国本身的特殊情况，而且是由于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已经发生变化的缘故……英国的国家和历史的特殊条件，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使我们有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在英国达到社会主义”。[82]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英国将是长期的革命过程，因为在英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条件还没有成熟”[83]，所以，这“不是瞬息间的行动，而是斗争过程的最高顶点。”[84]英国共产党制定了斗争的战略，这一战略的首要目标是建立有共产党人、英国各政党的代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民族党派代表参加的工党政府。Г．麦克伦南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为了按照我们的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创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长期远景，这是必要的。”[85]英国共产党要求组织广泛的反垄断的民主力量联盟这一战略，是由各阶层人民的斗争产生的。各阶层人民不仅主张保存和扩大民主权利，而且还捍卫自己反对垄断组织的社会要求和政治要求。[86]

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建立这样的政府作为资本主义的大不列颠的制度民主化的手段，这还不意味着这种制度的阶级性质的改造、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在英国共产党纲领中指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问题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夺取政权。”[87]

为了这一目的，必须用深刻民主化的办法来改变国家机器、它的成分和结构，并在军队中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从而为过渡

到新阶段创造条件。纲领中谈到，“这将意味着：民主过程到达它的完成阶段——消灭垄断资本家对社会的统治，把政权和国家机关转到绝大多数人民即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军手里”。[88]

г．麦克伦南说明了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的英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强调指出在这个国家里不经过国内战争也可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一切将取决于国际条件如何形成，取决于“决定世界发展的三股基本力量即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同帝国主义进行的”[89] 积极斗争。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右倾修正主义分子的以下这种观点，即认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通过和平道路——靠在议会中取得席位的办法来实现。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道路绝对化，以致低估工人阶级斗争的群众性方式，这证明右倾修正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同流合污。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的国家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同时指出，把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而进行的斗争的和平方式绝对化也是没有根据的。Б．马修斯写道，在英国共产党纲领中“规定了不经过武装斗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这里并没有说，这一方式是必不可免的。”[90] 她分析了英国共产党的战略，强调指出这一战略提出的社会革命变革的目标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她继续写道，与右翼工党关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建立“普遍福利”社会的观念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国家结构条件下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这一点不抱任何幻想。”[91]

英国共产党的战略不排除国内发生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因此，г．麦克伦南、Дж．沃迪斯、Б．马修斯、Б．拉梅尔森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为反对右倾和“左倾”修正主义者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所作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歪曲，为反对否认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的先锋作用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理论家”Г．马尔库塞的观点。马尔库塞断言，在科技革命的条件下发生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体化”。按照马尔库塞的意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消极地看待社会主义革命，不再在革命过程中起主导作用。Б．拉梅尔森写道，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非是“过去的殖民地世界，它把社会主义革命输入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92]这种机械论的观点使革命过程依赖于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这就导致忽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主导作用。

与“左派”理论家的论断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写道，英国无产阶级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先进的最革命的战士。英国工人运动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工人运动之一，虽然直到目前为止，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Г．麦克伦南写道，“利用它来进行消灭资本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这种利用的程度就更小了。”[93]

Дж．高兰、Г．麦克伦南、С．阿罗诺维奇、Б．拉梅尔森[94]批判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欧洲共产主义”观念。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尤其利用了“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术语。拉梅尔森指出，“利用‘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术语，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不管怎样，欧洲共产主义是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根源分离的。”[95]他强调指出，在制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时，英国共产党“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共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汲取鼓舞力量”。[96]

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就《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纲领中叙述的英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大讨论。C、阿罗诺维奇、M。科斯特洛、Б。皮尔斯等人参加了这次大讨论。在讨论中，考察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是估计到英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民族特点和历史特点的，着重说明了进行反对反动党派的斗争的必要性，这些反动党派中包括"民族阵线"[97]、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组织，以及在消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极端分子。

讨论的参加者指出，在这个革命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以英国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

Б。皮尔斯在自己的发言《工人阶级和广泛民主联盟》中概括了这次讨论的基本思想。他支持英国新党纲讨论参加者所表达的积极评价，强调指出，纲领"坚决批倒英国历史上有过的'左倾'宗派主义派别的错误。纲领是党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的新的有效武器"。[98]

M、康福思、Дж。霍夫曼、K。韦丁顿、Б。西蒙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的著作、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丰富经验，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实质、内容和基本原则。霍夫曼强调指出，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所以，这一制度"还保存它从中产生出来的旧社会胎记。正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应当为向高级阶段过渡创造前提——物质的前提"[99]。霍夫曼反对"实践派"理论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假科学原理，指出列宁把社会主义看成一门科学，这门科学随着具体世界本身的继续发展而使自己对现实的反映不断加深，因此，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不可能像Г。彼特罗维奇以及"实践派"的其他拥护者所断

言的那样，在抽象中进行。霍夫曼写道，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只有从这个时期的具体问题出发才能实现……在“实践派”理论家看来，共产主义不过是渺茫的空想”。[⑩]

在英国共产党的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有一节对未来英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其中谈到，在这个社会里“经济的发展达到这样的水平：它能够满足人民的需要和改善生活的质量”[⑩]。社会主义意味着民主有极大的扩大，并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Дж. 刘易斯写道，“社会主义是理论和很有成效的实践措施的总和，这些实践措施的目的在于，使人们有可能彻底发展个人性格和个性的丰富性。”[⑩]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场最激进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建设要求把革命过程继续下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在革命过程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的批判

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十分注意批判当代反动哲学和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Дж. 伯纳尔、Дж. 刘易斯、M. 康福思、Г. 弗兰克尔和Дж. 霍夫曼对这种批判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他们的著作中，分析了新实证主义的一般发展趋向，揭示了资产阶级哲学的下列流派的唯心主义实质，如Дж. 穆尔的“新现实主义”、A. 怀特海的“机体哲学”、C. 亚历山大的“倏忽进化论”、Б. 罗素的“逻辑原子论”、Л. 维特根施坦的实证主义和 A. 艾尔的逻辑经验论。马克思主义者表明，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各个不同学派的危机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开始，目前还在继续下去。尽管它们彼此之间各不相同，但

仍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它们都敌视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著作，尤其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批评当代唯心主义者企图搅乱哲学的基本问题，把形形色色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流派树立为二十世纪哲学的创新学派。他们表明这些流派在科学上站不住脚，在研究方法上有缺陷：否认科学理论，力图破坏唯物主义的现实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认为它们来源于贝克莱、休谟和马赫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者在说明实证主义观念的基本特点时指出，这些观念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唯心主义体系（如柏拉图、黑格尔等人），它们更精巧地掩饰自己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以及与宗教的联系。康福思、弗兰克尔、刘易斯表明，实证主义者回避哲学的、世界观的问题。它们否认哲学是对宇宙和人类社会本性的解释，从而也就否认了科学，鼓吹抛弃理性和科学似乎就是为了“理性和科学”。

六十年代，新实证主义观念由语言学的哲学完成，语言学的哲学实际上成了英美资产阶级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这一派别建立在哲学即对一般日常语言的语言学分析这种解释的基础上，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一样，毛病在于“对前途有丧失感、对人类及其未来缺乏信念”[39]，以及逃避解决人类进步的大问题。

康福思指出，在语言学学派的哲学家的看法中包括有与批判极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思辨有关的某些积极因素。他强调指出，必须对批判这一哲学采取灵活的、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要看到这种哲学在考察形式逻辑和语义学问题以及使用语言等等方面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要估计到，这种哲学只对使用语言作出描述，而不提世界观。

M．康福思在分析语言学哲学的阶级实质时写道："在今天，这种世界观表现议会民主制的真正实质，在这种制度下，奉公守法的反对派有礼貌地注视着选出的政府的行动，谁也不去想：要认真地怀疑一下那种靠牺牲别人劳动来获取利润的人的权利。"[44]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表明了七十年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实证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和特点。这些新趋势和特点表现在日益发展的主观主义、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论上。按照Дж．霍夫曼的说法，现代实证主义鼓吹它的所谓科学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价值"）、理论无需实践检验等教条，使哲学家到达危险的边缘，这些哲学家早就力图使历史的发展束缚在永恒的"真理"中、"精神的抽象"中，使世界停留在原有状态。霍夫曼写道，实证主义使客观现实陷于经验的片断性，"实证主义打击理性的基础本身，打击我们支配周围世界的能力，此外还以'科学'的名义维护对消极被动和无能为力的崇拜。"[45]

英国哲学家K．波佩尔是这种实证主义流派的典型代表，他的唯科学主义的纯理性主义哲学和主观唯心主义历史社会观在六十——七十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46]中受到详尽的批判。康福思、霍夫曼、科恩等人指出：波佩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毫无根据的，他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九四五年）、《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九五四年）、《推测和反驳》（一九六九年）等著作中阐述的历史－哲学观点具有伪科学的本质。

至于波佩尔的社会发展观，霍夫曼写道，在波佩尔看来，历史没有真正的意义；而对现存世界不作理性的理解，我们就只有假设、解释、推测："我们得到的仅仅是含混不清的可能发生的世界表面现象，而不是客观真理"。[47]康福思、霍夫曼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波佩尔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实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把社会发展看成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波佩尔"批判"

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科学，理由是：这一学说似乎不能在实践上加以检验；还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讲法，一切事物都受“历史的”制约。科恩写道，“再可以补充一点，即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发展天定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把人类历史看成受铁的规律制约的注定的过程。”[⑱]

波佩尔除了指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历史发展天定论”以外，还把“实质论”、“整体论”和“空想主义”这些特点强加给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恩批驳波佩尔的论断，写道：“我们一再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得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不是在真空中创造历史。人们创造什么样的历史，这由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所决定。”[⑲]波佩尔的一切伪造的说法都有阶级的根源，并不是这位资产阶级哲学家错误认识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指出，在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中间，反对实证主义的气氛日益加强。霍夫曼写道，“……这样一种意识在增长：实证主义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它破产了，不可能再提出更多的什么东西来。”[⑳]

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M．达西、X．刘易斯和A．韦德勒的新托马斯主义、神学折衷主义以及基督教和天主教形式的宗教哲学的其他代表人物的理论的唯心主义实质。康福思、伯纳尔、刘易斯指出，战后英国的宗教哲学为了论证自己的神秘主义思辨结构，包含有Φ．布拉德莱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其他非理性主义观念的因素。

Дж．伯纳尔对新实证主义和宗教哲学作了哲学上的和政治上的评述，他写道：“从实际目的来看，实证主义者和神学家之间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没有任何争论的问题。他们都企图证明，对社会现象作理性的评价是不可能的。他们把未经公认的或公认的神秘主义提到科学所研究的物质世界的地位上……新实证主义者和

神学家对理性抱这样的态度，只有利于反动势力，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本来可以成为进步的思想家。”[111]

同时，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某些神学家的积极的政治活动，例如南威尔士主教、坎特伯雷大教堂首席神甫M．斯托克伍德[112]就参加了六十年代根据Дж．刘易斯的倡议举行的对话。M．斯托克伍德和其他神学家同马克思主义者一起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现象、失业、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等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徒反对社会灾难的共同斗争为全体劳动人民在广泛的反垄断联盟中团结合作创造了良好基础。《晨星报》指出，“两大运动之间——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徒之间的对话是未来公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13]

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十分注意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学和右翼工党的正处在严重危机中的社会发展观念。社会学思想越来越放弃弄清楚客观过程的实质的任何尝试，以致它失去了现实意义，脱离了人类的真正利益。“社会的稳定性成为社会学的课题，而无成果则是它的科学命运，保守主义是它的政治功能。”[113]

Дж．刘易斯、П．莱瑟姆、M．麦金托什在自己的著作[114]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没有一种可以在自己的基础上联合相当大一支社会学家队伍的观念。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有不同学派、流派、方针的代表人物如新实证主义者，结构功能主义、经验主义、法国拟人学派、生物社会学等等的拥护者在活动。现象学的和所谓批判的社会学大大加强了，这种社会学排挤在五十年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独占统治地位的T．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分析的观念。但是，社会学理论的各式各样的变化形态丝毫没有改变它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尽管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动进攻，但近二十年内在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中间，可以看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局部

承认。M．麦金托什写道，“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学习过去的重要东西，而且对目前在资产阶级社会学范围内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回答。”[115] A．亨特写道，现在有的社会学家例如A．斯文吉伍德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一九七五年）一书中，试图“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同M．韦伯、Э．迪尔凯姆、K．曼海姆和T．帕森斯所代表的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传统之间的联系”。[116]

马克思主义者在说明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现状时指出，传统的经验主义仍然是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哲学基础。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得以流行的一切观念（如“因素”论、社会层次说、经验主义社会学的许多变种）的特点就是：拒绝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心理学和生物学的某种力量的自生游戏来偷换社会关系。刘易斯写道，“的确，在经验主义者看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是被排除在历史的前进运动之外的。”[117]

虽然某些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开始批判实证主义社会学，并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表示感兴趣，但他们在研究社会过程时仍然遵循抽象的、脱离生活的、反历史的公式。刘易斯注意到，这些社会学家宣称“任何关于现存社会制度的意义、它的发展或改造的可能性、它的未来等问题都是无益的和不科学的”。[118] 与现代社会学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派不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始终一贯地、历史地考察世界，也就是说，认为世界处于发展中。

右翼工党分子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学观念，以及旨在反对现实社会主义和被利用于反共目的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自由主义化的”社会主义的教条，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加紧研究的对象。右翼工党分子为论证自己的理论，尤其是为论证“民主社会

主义”观念（对英帝国主义的辩护，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是这一观念的基础），利用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哲学家们（Б. 鲍尚克特、Ф. 布拉德莱、Г. 斯宾塞等人）的思想，还利用凯恩斯主义、К. 波佩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新实证主义哲学、工艺决定论、人本主义、伦理唯心主义以及各种不同的基督教教义的唯心主义论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揭露了右翼工党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对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性这种观念的反动实质。这些假理论家认为，依靠科技革命的成就在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似乎就能到达“普遍福利”的社会。右翼工党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对英国共产党采取敌视的立场，事实上在捍卫现状即英国资本主义，阻挡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传播。

Дж. 霍夫曼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为了调和当前英国各阶级的利益和削弱工人阶级的斗争，右翼工党分子在七十年代组织了有关所谓工人共同参加管理问题的讨论，这一问题与工党的“工业民主”、“工业合伙”、“工人监督”、“社会主义计划”等理论有密切关系。由于国内左派力量的增长和活跃，右翼工党理论家和领袖们的社会－政治理论甚至在工党内部遭到了批判。

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争取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英国社会的斗争中，对研究与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任务有关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迫切问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批判了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的反动流派，右翼工党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折衷主义理论。

---

①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党的纲领》1978年伦敦版第13页。

②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党的纲领》1978年伦敦版第5页。

③ 《Г. 麦克伦南同志的发言》，载于《真理报》1981年3月1日。

④ 参看Г. 麦克伦南《在共产党第35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载于《评论》1977年第24期第444页。

⑤ Г. 麦克伦南《选举的教训和英国工人运动的前景》，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9年第8期第15页。

⑥ Д.普里斯科特《1978年展望》，载于《评论》1978年第2期第23页。

⑦ 参看П. 达特《不列颠帝国的危机》1950年莫斯科版；Дж. 伯纳尔《社会历史中的科学》1956年莫斯科版；Дж. 坎贝尔《工党运动中的某些经济幻想》1960年莫斯科版；М. 康福思《科学反对唯心主义》1948年莫斯科版，《保卫哲学。反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1951年莫斯科版；Дж. 伯纳尔《科学的社会功能》1944年伦敦版；Дж. 高兰《三十年的斗争。英国共产党的经历》1950年伦敦版；Дж. 刘易斯《马克思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者》1955年伦敦版，《苏联哲学的基础》1947年伦敦版；Г. 波立特《向前看》1947年伦敦版；М. 康福思《社会主义者的哲学》1959年伦敦版。

⑧ 《马克思主义的挑战》，Б. 西蒙主编，1963年伦敦版第5页。

⑨ 参看Г. 弗兰克尔《思想的灾难。批判怀特海哲学》1959年莫斯科版；Дж. 刘易斯《社会主义和个性》1963年莫斯科版，《人和进化》1964年莫斯科版，《科学、信仰和怀疑论》1966年莫斯科版；М. 康福思《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的哲学》1968年莫斯科版，《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1972年莫斯科版；《马克思主义的挑战》，Б. 西蒙主编，1963年伦敦版；《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Дж. 克卢格曼主编，1968年伦敦版；А. 凯特耳《卡尔·马克思》1964年伦敦版；Дж. 刘易斯《罗素——哲学家和人道主义者》1968年伦敦版，《卡尔·马克思的一生和教导》1969年伦敦版；Б. 里德《英国的极左主义》1969年伦敦版。

⑩ Н. 布卢姆菲尔德《序言》，载于《阶级、领导权和政党》，Н. 布卢姆菲尔德主编，1977年伦敦版第8页。

⑪ Дж. 伯纳尔《社会历史中的科学》1956年版第583页。

⑫ 参看：М. 康福思《列宁和哲学》，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0年第6期；Дж. 克卢格曼《列宁对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问题的看法的几个方面》，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0年第1期；Г. 弗兰克尔《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社会学》1974年伦敦版；С. 奎兹摩尔《科学和伪科学》，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2年第9期；Б. 马修斯《英国和社会主义革命》1971年伦敦版；洛克《路易斯．阿尔都塞，哲学和原则》，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2年第6期；Дж. 高兰《改良主义和革命》1978年伦敦版。

⑬ 参看《马克思主义入门》1974年伦敦版。

⑭ 参看：Дж．伯纳尔《生命的发生》1969年莫斯科版；Дж．霍夫曼《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1978年莫斯科版；M．康福思《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1977年伦敦第2版，《哲学的逻辑基础》1977年伦敦版；Дж．伯纳尔《历史中的科学：社会科学》1971年伦敦版第4卷；Ҡ．韦丁顿《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1974年伦敦版；M．康福思《共产主义和哲学》1980年伦敦版。

⑮ M．康福思《辩证唯物主义概论》，1956年莫斯科版第140页。

⑯ M．康福思《列宁和哲学》，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0年第6期第163页。

⑰ M．康福思《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第56页。

⑱ Дж．霍夫曼《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第27页。

⑲ M．康福思《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的哲学》1968年莫斯科版第326页。

⑳ Дж．伯纳尔《列宁和科学》，载于《列宁和当代自然科学》一书，1969年莫斯科版第29页。

㉑ 参看《历史的几个方面和阶级觉悟》，梅斯札罗斯主编，1971年伦敦版；《对马克思的背叛》，Ф．本德主编，1975年伦敦版；Д．麦克莱伦《恩格斯》1977年伦敦版。

㉒ M．康福思《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第66页。

㉓ M．康福思《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第67页。

㉔ Дж．霍夫曼《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第109页。

㉕ 同上。

㉖ Дж．刘易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1974年伦敦版第75页。

㉗ 同上

㉘ Дж．刘易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1974年伦敦版第63页。

㉙ 参看：Дж．刘易斯《真理等级上的偏见。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危机》，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第1期；Дж．刘易斯《人的独特性》1974年伦敦版，《麦克斯、韦伯和没有价值的社会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75年伦敦版。

㉚ Дж．刘易斯《真理等级上的偏见》第45—46页。

㉛ 同上书，第46页。

㉜ M．康福思《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第92页。

㉝ Дж．霍夫曼《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第56页。

㉞ 同上。

㉟ P．冈恩《自然界是辩证的吗？》，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7年第2期第60页。

㊱ Ҡ．韦丁顿《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第47页。

㊲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712页。

㊳ С．黎利《马克思主义和科学》，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69年第11期第390页。

㊴ Дж．伯纳尔《列宁和科学》第29页。

㊵ 参看Дж．伯纳尔《生命的发生》，《社会历史中的科学》；Дж．刘易斯《人和进化》；Дж．刘易斯《人的独特性》。

㊶ Дж．伯纳尔《生命的发生》第26页。

㊷ Дж．伯纳尔《生命的发生》第13、15页。

㊸ Дж．伯纳尔《生命的发生》第28页。

㊹ Дж．伯纳尔《生命的发生》第30页。

㊺ 同上。

㊻ Дж．伯纳尔《生命的发生》第27页。

㊼ Дж．刘易斯《人和进化》第22页。

㊽ Дж．霍夫曼《唯物主义辩证法、反映论和社会科学》，载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当代科学》一书1978年布拉格版第33页。

㊾ Дж．霍夫曼《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第169页。

㊿ М．康福思《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第74页。

51 参看М．康福思《历史唯物主义》1956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151页。

52 М．康福思《历史唯物主义》第2卷第155页。

53 М．康福思《历史唯物主义》第2卷第159页。

54 同上。

55 Дж．伯纳尔《和平的展望》1960年伦敦版第8页。

56 Дж．高兰《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状况》1966年伦敦版第17页。

57 参看С．阿罗诺维奇《英国经济。二者择一的战略》1978年伦敦版；А．格兰特《社会主义和中等阶级》1968年伦敦版；Г．弗兰克尔《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社会学》1970年伦敦版；Дж．韦斯特加德、Х．雷斯勒《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当代英国研究》1975年伦敦版；《阶级和阶级结构》，А．亨特主编，1977年伦敦版；Дж．科恩《关于今日工人阶级的一些想法》，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8年第10期。

58 参看Дж．韦斯特加德、Х．雷斯勒《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第252页。

59 参看《阶级和阶级结构》，А．亨特编，1977年伦敦版，此书根据1976年英共"社会学小组"召开的代表会议的材料写成。《英国社会学协会》的社会学家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

60 工党领导干部中资产阶级化的分子、工会和合作社组织的活动家、在康采恩和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委员会中（尤其在实行了国有化的那些国民经济部门中）的"工人代表"都属于"工人贵族"。

⑥① Дж. 科恩、Дж. 克卢格曼《马克思主义学习指南》1960年伦敦版第30页。

⑥② К. 默塞尔《国家、危机和民主传统》，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8年第8期第25页。

⑥③ Дж. 韬夫曼《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第281页。

⑥④ Дж. 刘易斯《阿尔都塞的问题》，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2年第6期第24页。

⑥⑤ 与此同时，М. 康福思、Г. 格雷、Д. 格兰特、Дж. 乌拉依德里、М. 乌拉依格里、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Д. 高尔斯蒂克指出Дж.刘易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采取非辩证的态度。刘易斯认为，《手稿》和这个时期马克思的其他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虽然还不符合"成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些作者强调指出，刘易斯没有估计到马克思创作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辩证特点。此外，刘易斯还夸大了主观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

⑥⑥ Дж，刘易斯《人的独特性》第25页。

⑥⑦ 参看：《个人自由。工党对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政策》1976年伦敦版。

⑥⑧ Дж，克卢格曼《人的未来》1974年伦敦版第3页。

⑥⑨ 参看：Дж. 刘易斯《社会主义和个性》；М. 康福思《辩证唯物主义》；Дж. 伯纳尔《历史中的科学》1971年伦敦版第4卷；Дж. 刘易斯《人的独特性》。

⑦⑩ Дж. 刘易斯《人的独特性》第187页。

70a Дж. 刘易斯《人的独特性》第58页。

⑦① Дж. 刘易斯《社会主义和个性》第103页。

⑦② К. 韦丁顿《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第96页。

⑦③ Дж. 刘易斯《社会主义和个性》第29页。

⑦④ Дж. 克卢格曼《人的未来》第30页。

⑦⑤ Дж. 克卢格曼《人的未来》第31页。

⑦⑥ К. 韦丁顿《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第98页。

⑦⑦ М. 康福思《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第517页。

⑦⑧ А. 莫顿《艺术和人民》，载于《马克思主义的挑战》（Б. 西蒙编）伦敦版第142页。

⑦⑨ 《党的新闻公报。关于政治和艺术的代表会议》，载于《评论》1978年第4期第50页。

⑧⑩ Э. 伯恩斯《马克思主义入门》1974年伦敦版第10页。

⑧① Г. 麦克伦南《在共产党第三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第414页。

⑧②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36页。

83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37页。

84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37页。

85 《Г. 麦克伦南同志的发言》，载于《真理报》1981年3月1日。

参看《第三十六次代表大会报道》，载于《评论》1979年第24、25期第444页。

《第三十六次代表大会报道》，载于《评论》1979年第24、25期第444页。

88 同上。

89 《Г. 麦克伦南同志的讲话》，载于《真理报》1977年2月4日。

90 《评论》1969年第2期第32页。

91 Б. 马修斯《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民主斗争的看法》，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8年第3期第80页。

92 Б. 拉梅尔森《英国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国际方面》，载于《列宁的学说和当代革命过程的问题》一书1979年布拉格版第77页。

93 Г. 麦克伦南《成功的保证在于左派力量的统一》，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80年第1期第29页。

94 参看：Дж. 高兰《改良主义和革命》1978年伦敦版；Г. 麦克伦南《开幕词》；С. 阿罗诺维奇《欧洲共产主义：论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8年第7期。

95 Б. 拉梅尔森在国际科学理论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在实现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斗争时期经济和政治的辩证法》，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8年第6期第59页。

96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8年第6期第59页。

这是英国最大的法西斯集团，成立于1968年。它的活动的思想基础是种族主义和反共主义。

98 Б. 皮尔斯《工人阶级和广泛的民主联盟》，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9年第11期第25页。

99 Дж. 霍夫曼《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第269—270页。

100 Дж. 霍夫曼《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第268页。

101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54页。

102 Дж. 刘易斯《社会主义和个性》第18页。

103 М. 康福思《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的哲学》，1968年莫斯科版第8页。

104 М. 康福思《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的哲学》第310页。

105 Дж. 霍夫曼《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第18页。

106 参看М. 康福思《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Дж. 霍夫曼《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等书。

107 Дж. 霍夫曼《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第15页。

108 Дж. 科恩《中等阶级和文明》，载于《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1979年第3期

第120—121页。

⑲ 同上。

⑩ Д Ж．霍夫曼《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第11页。

⑪ Д Ж．伯纳尔《历史中的科学》第4卷第1161页。

⑫ 1977年M．斯托克伍德发表了题为《十字架和镰刀》一书，书中考察了两种世界观：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

⑬ 《对话是目前的一大需要》，载于《晨星报》1978年10月21日。

⑬ Д Ж．刘易斯《真理等级上的偏见》第48页。

⑭ 参看：Д Ж．刘易斯《韦伯和没有价值的社会学》；M．麦金托什《社会学的当代趋向》，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8年第9期；П．莱瑟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的几个方面》，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5年第3期。

⑮ M．麦金托什《社会学的当代趋向》第51页。

⑯ A．亨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5年第12期第374页。

⑰ Д Ж．刘易斯《真理等级上的偏见》第48页。

⑱ 同上。

第 二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法国

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法国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表达者，是西欧最有影响的共产党之一。它的活动在六十——七十年代是在很复杂的环境中展开的。法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设法制订了独立的对外政策方针，改善了法苏关系），但在解决严肃的对内政策问题上则遭到了明显的失败。国家管理的极权性质、官僚机器的低效率、经济发展的比例失调，使得社会经济问题、文教领域业已成熟的危机得不到解决。一九六八年五——六月间，第五共和国发生了沉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劳动群众对当局对内政策的不满情绪汇成了广泛的青年风潮和总罢工，法国工人阶级在这一总罢工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当局陷入了很困难的境地，它只有在分裂了与它对立的力量并对劳动人民作出某种让步以后才找到出路。一九六八年“红色五月”的后果在法国社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不同领域中直到今天还可以感觉得出来。

法国的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在戴高乐下台后没有继续多久。七十年代初的新经济危机使得通货膨胀无法控制，就业率下降，生活费用急剧上升。这次危机与其说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对解决能源问题没有作好准备引起的，不如说是统治集团的政策引起的，统治集团甚至在如此沉重的经济形势中仍然损害广大劳动阶层的迫切需要来维护垄断集团的利益。失业率空前增长，对二十

五岁以下的青年打击尤其沉重，在一九七七年初他们几乎占法国总失业人口的一半。危机不仅触动了经济、而且名副其实地触动了现代法国社会的一切领域：劳动的条件和内容、消费的性质和方向、教育、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观念、国家政权机构等等。正如ж。马歇在法共第二十四大（一九八二年）上指出的，这场危机"并非出于外部的或不可解释的原因。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①

受到垄断资本压迫的不仅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而且还有脑力劳动者和中小资产阶级，这为把最广泛的劳动阶层团结在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政党周围创造了客观基础。法国共产党人为了加强和群众的联系，团结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和民主力量，以根本改变法国社会的社会本质，而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法国共产党成功地克服了第五共和国当局对它的活动造成的困难，依旧是西欧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共产党之一，拥有七十多万党员。法共受到广大选民的拥护，证明法共几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国通过民主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获得成功。在一九八一年，共产党人进入了政府。

由于需要确定法国共产党在大大改变了的新历史条件下的战略和策略，需要科学地解决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迫切问题，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重视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早在五十年代，苏共二十大和法共十四大的决议就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并且有力地促使他们克服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在现代条件下对它作进一步创造性的发展。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家进行斗争的迫切任务也坚决要求这样做，这些思想家用"新资本主义"、"深化的自由主义"、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社会"的理论来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现时代社会发展的学说相对立，宣扬资本主义逐渐长入社会主

义和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与马克思主义处于或明或暗对立状态的有法国社会学家P．阿隆、Ж．富拉斯季耶、M．杜维尔热，存在主义哲学家Ж．－П．萨特、M．梅洛－庞蒂、A．加缪，人格主义者Э．穆尼埃、Ж．里亚克鲁阿，结构主义者K．列维－斯特罗斯、M．福柯、Ж．拉康。

如果说在战后头二十几年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揭露马克思学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各样的伪造上，那么在六十年代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把意识形态斗争和主要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正面研究结合起来的倾向。六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时，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道主义应是什么关系、如果说它是人道主义的、那么应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它与许多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理论的差别何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Л．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反人道主义"的论点赋予讨论以特殊的尖锐性，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这次讨论的反响。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意阿尔都塞的观点；但是P．加罗迪（后来被开除出法共）所捍卫的那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许多论点受到了更加坚决的批判。一九六六年在阿让特伊举行的法共中央意识形态问题全会上，对讨论结果进行了批判分析，对阿尔都塞和加罗迪提出的理论作了原则的阶级的评价。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修正主义的偏向和伪造（A．勒费弗尔、P．加罗迪）的克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发展指明了道路。

在这同时，结构主义开始在资产阶级哲学的意识形态前台起积极的作用。以前占支配地位的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和宗教哲学开始失去影响。结构主义最重要代表人物（K．列维－斯特罗斯、Ж．拉康、M．福柯、P．巴尔特）的著作中提出的新的历史、心理分析和文化理论，在不小的程度上促进了结构主义思想的广

泛传播。一些法国马克思主义者（Л．阿尔都塞、Э．巴里巴尔、M．戈德里埃及其追随者）的个别著作也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对阿尔都塞的一系列论点展开了讨论和批评，这些论点的争议性很大，但是促使人们去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它们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后来，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对自己以前发表的观点作了部分的自我批评，大多数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这看作是他们克服结构主义影响的积极行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注意对作为科学理论和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结构主义进行批判分析。

一九六八年以后，各种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把结构主义排挤到一边，并且部分地利用它的思想原理，开始积极地流传开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法国社会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在失去道义方向和社会政治方向的前景面前产生了缺乏信心和思想混乱的状况。一批所谓新哲学家（Б．A．列维、A．格吕克斯曼、Ж．－M．贝努阿、Ж．П．多列、Г．拉尔德罗）采用折衷主义的手段（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成分、柏格森主义成分等），以大叫大嚷、广泛利用报刊电视的方式，企图一举批倒马克思主义，搞臭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新哲学家们”的思想、他们的反苏反社会主义倾向性，在法共二十三大上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报刊上受到了法国共产党人尖锐批判。

在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同时，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进行了大量正面的研究。对社会发展过程、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理论的研究得到了特别的发展。对政权、科技革命、家庭、学校等问题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法和认识论）、科学的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加强

了，如果考虑到在法国存在着自己的认识论学派（巴歇拉尔、康吉叶姆等人）以及K．波佩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在七十年代开始在法国产生影响，那么这种研究的加强则是非常及时的。对意识和个性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在A．瓦隆和Ж．波利采尔的著作中已经奠定了牢固的心理学基础，然而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直感觉到这种研究的需要。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哲学工作范围之广，下面这一事实也可以说明，即仅仅在最近十年来，巴黎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心就以下面这类重要而迫切的问题为主题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和讲座：《列宁和科学实践》、《哲学和宗教》、《论辩证法》、《语言学和文学》、《文学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向新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理论》、《十八世纪的长篇小说和启蒙运动》等等，在《思想》、《新评论》等杂志上进行了理论讨论。这些讨论和学术会议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圈子中，而是和其他倾向的理论家建立联系。企图借助创造性的和原则性的讨论影响他们的思想和政治立场。

“社会出版社”的出书范围大大扩大了，在六十——七十年代出版了许多关于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军国主义发展的危险和在国际紧张局势缓和条件下裁军的必要性、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法国迫切的教育民主化和建立新学校的问题以及发展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的问题、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问题等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开始在“加里马尔”、“安特罗波斯”“马斯佩罗”等资产阶级出版社出版，这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它不仅反映了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兴趣，而且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崇高学术威信和影响。

在组织研究工作、举行讨论会和学术会议、培养马克思主义干部方面，主要担子落在莫里斯·多列士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心（CERM）的肩上，后者在一九七九年改组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所（IRM）。法国共产党人办的刊物②和报纸③积极参加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法共政策，并进行多方面的理论工作。

法共各次全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法共领导人与共产党知识分子代表的经常会见和磋商（特别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和一九八〇年二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些会见中讨论了关于积极吸收知识分子来解决党所面临的意识形态任务和实际任务的问题，关于加强工人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在为争取法国社会主义未来的共同斗争中的联盟问题。

一、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社会发展问题

对法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政治条件的分析　在六十——七十年代，在法国马克思主义书刊中，由于政治环境的复杂化和尖锐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以及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学生、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工程技术干部）进入政治舞台，社会学的和社会政治的问题开始占主要地位。研究法国社会的社会发展规律开始成为对今日法国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民主、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相互关系、知识分子和青年的作用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地位。

在我们的时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现代的法国是最接近这个历史界限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高度激化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和巨大而有影响的共产党、促进法国人民的爱好自由和论战精神的丰富的民族革命传

统——这一切使得与确定法国发展前景、这个国家必须向更高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阶段过渡有关的任务变得更加现实。

所以，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合乎规律的。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不是新问题。早在二十年代初期，这个问题就在法国建立新型党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在一九四六年，莫里斯·多列士发展列宁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把这些思想运用于法国独特的民族和革命传统，运用于法国政治制度的历史特点和共和特点。他估计到法国新的社会政治形势和全世界改变了的力量对比，发表了关于这个国家可以用独特方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在一九五六年举行的法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采取了关于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和平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论点。后来，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思想在著名法共活动家B．罗歇、Ж．杜克洛、Ж．谷尼欧、Ж．马歇的著作中，在其他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研究著作中得到了发展和加深。多列士关于在新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规律和民族特点、关于与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进行密切合作的历史必然性、关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相结合、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法国文化先进传统的发展等论点①，不仅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宝贵贡献，而且一直是法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

共产党人从现代法国的现实条件出发，着手研究在法共纲领性文件中有所反映的相应问题，这些论点在法共的历次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上，在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中不断得到发展和丰富，它们认定法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有一个为在全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作准备的中间时期。法共领导曾不止一次指出，象法国这样拥有强大的国家垄断机器、牢固的资产阶级民主和工团主义传统和多党制的高度发达国家，只有通过各种不同

阶段的逐渐更替、经济和社会政治的结构形式的逐渐改变，才能达到社会主义。[5]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相结合是第一个必要的前提，没有它，这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就不可想象。在六十——七十年代（在一九七八年选举以前），这一结合被设想为两个分开的阶段:“先进民主”的阶段和在已经获得的民主成果基础上直接争取社会主义的阶段。后来，这种纲领性的提法改变了：取消了阶段的划分，提出了直接通过“民主推进”途径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这样那样的民主问题成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中心课题。早在法共十五大上（一九五九年），把民主作为这个国家达到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最可靠途径加以捍卫和发展就被宣布为法国社会一切进步力量的最重要任务。在以后的十六大（一九六一年）、十七大（一九六四年）和十八大（一九六七年）上，这个问题得到继续研究和深化。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香比尼召开的法共中央全会上，这个问题特别尖锐地提到了共产党人面前，在那次全会上通过了《争取先进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国》的宣言。这个宣言把争取民主的斗争看作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组成部分。在“先进民主”的概念中，除了实行经济改革（把垄断部分国有化、争取经济中的关键地位、发展民主计划工作）以外，还包括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建立国家政权机关（参议院、国民议会、市政府）的公正的选举和按比例选派代表的制度、参加企业管理、工人监督、争取民族独立。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必须首先改变国内的力量对比，而扩大民主在这当中起最重要的作用。在十九大（一九七〇年）、二十大（一九七二年）、二十一大（一九七四年）、二十二大（一九七六年）、二十三大（一九七九年）和二十四大（一九八二年）的文件中，以及在一系列公开发表的

著作中，民主的概念不断深化和变得更加确切；它开始被看作是“彻底的”民主，是劳动人民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最有效手段。在法共二十二大上，除了经济和社会民主以外，特别强调政治民主的意义，政治民主将使得一切公民有可能“选择、决定、监督和管理”⑥。民主的管理也就是政治的管理。从法国共产党人的观点看，民主化意味着以国家本身的手段、但是在劳动者、全体公民的直接参加下破坏国家的垄断的、官僚主义的内容。因此，民主不仅被理解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阶段，而且被理解为这种过渡的形式，而且是革命的形式。“民主不可能是中立的或防御的，它首先应该是进攻的……”⑦。

为了实现这些根本的经济任务和社会政治任务，首先要求统一。工人阶级必须统一，必须和其他社会阶层结成联盟，所有雇佣劳动者必须行动统一，必须有“从下至上”和“从上至下”的统一——这成了全国进步力量的主要战斗口号。统一问题成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它最充分地反映在人民统一民主政府纲领（一九七一年）和与社会党人和左翼激进党人共有的左派力量共同施政纲领（一九七二年）中。

一九七三年的议会选举成了共同纲领巩固性的第一次检验，那时左派力量获得了一千一百万选票，即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四十五。在一九七七年的市政选举上这个数字增长到一千三百万（百分之五十一点五），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民群众高度激进化的程度。然而，后来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产生的分歧造成了政治力量分布中的紧张形势，立刻影响了一九七八年三月的议会选举结果，使左派力量遭到了失败（百分之四十九点二九对右派多数的百分之五十点四九）。法共和社会党之间的分歧是如此之大，共同纲领在一九七八年已不再存在。现在法国共产党人指出，共同纲领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也曾有一些消极面。例如，它“散

布了对社会党的幻想"，"抹煞了两党之间的区别"[8]。这种情况被社会党人利用了，结果是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党的变化。

法共提出的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纲领，在Ж. 马歇的《民主的挑战》一书中得到详尽的说明和论证[9]。"法国人民联合起来"争取民主变革的团结问题，在法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成为主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报刊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0]一九七六年召开的法共二十二大，从党的领导人的观点看，"在法共历史和全国政治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11]

在二十二大决议中提出了必须建立具有法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和考虑到法国特殊性的"三色的法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法国国旗为三色）。"法国共产党的政策决定法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法国式的社会主义。"[12]二十二大同意了《共产党人想为法国做什么》这一纲领性文件，并且号召法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建成这样一个社会而斗争，在这个社会中，社会的事务"将是全体法国人的事务"。[13]同时应该保存法国社会的"多样性"，保存创作、思想、信仰、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大致在这同一时期（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产生和开始积极传播"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西方共产党的一些理论家和政治领导人认为这是一种能够确立和加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立民族政策的理论、反映了一些党力求独立探寻社会主义的前景。然而过分夸大自治和民族特色在西方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意义，往往导致明显地低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的共同规律，贬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各兄弟共产党在争取人类社会主义未来的斗争中相互阶级支援和彼此协调行动的历史经验。后来，"欧洲共产主义"倾向走向低潮，"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本身在马克思主义书刊中用得越来越少。

这些倾向在某些法国研究者的著作中有一定程度的反映，最明显的例子是在一九七八年年中在巴黎出版的五个作者写的一本书《苏联和我们》。⑭

在苏联书刊中对《苏联和我们》一书进行了充分说理的批判，它的主要缺点首先是作者对苏联情况缺乏了解，一些说法和评价主观片面，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写得很肤浅，对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国家的作用不够理解。⑮

苏共二十六大的报告中说道："在一些共产党中，有时对我国发展的某些具体方面提出批评意见。我们丝毫不认为，在我们这里一切都很理想。苏联是在难以想象的复杂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党在处女地上开拓前进。谁也不比我们更了解，在这条道路上有过什么样的困难和缺点，还有哪些没有被克服。

对同志式的建设性的批评，我们细心地听取。但是我们坚决反对那种歪曲社会主义现实、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帝国主义宣传、为阶级敌人效劳的'批评'。"⑯

在七十年代，历史学家、现在已经是前法共党员Ж．艾伦施坦的著作有尖锐反苏的倾向。⑰艾伦施坦抛弃马列主义学说的理论原则，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否定苏联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类型国家中的历史作用，并且提出关于未来社会的乌托邦的、反科学的纲领。

在二十二大上以及在会前的讨论中，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曾由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作过肯定的解决（在法共十六大和十七大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星期刊》上、一九六六年在阿让特伊的讨论中）。在二十二大的决议中和以后发表的材料中，这个问题得到了新的解释。它们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本身对现代法国的正当性，无产阶级专政被解释成为由一个阶级实行的少数人的统治，被解释成为强制取

消多党制和限制政治自由。

二十二大的材料中说，虽然无产阶级在争取法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起先锋作用，它并不代表所有的劳动者，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会限制把人民大多数团结在它周围的可能性："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揭示我们政策的现实性，我们向国家提供的东西的现实性。"[18]

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系列著作中[19]，作了从理论上论证把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作为过时的和不符合现代法国现实情况的概念加以拒绝的尝试。法共不再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来说明在法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权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Л．阿尔都塞、Э．巴里巴尔及其他一些人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20]

在这方面，回过头去看看莫里斯·多列士的思想是合适的。多列士在按照法国条件发展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时，曾不止一次指出，过渡时期的国家依然是具有与资产阶级国家根本不同职能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不单单是"专政"——"自为的专政"，而是使得在过渡时期有可能建立和加强完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无产阶级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夺取和保持政权的历史必然性而产生的。如果不这样，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阿尔都塞也是这样进行论证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只能从阶级斗争的立场才能理解。决定社会的法律和立法结构的阶级关系，总是或明或暗的暴力和强制关系。因此，国家政权总是掌握在一个阶级手中：或是资产阶级专政，或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第三种可能。拒绝无产阶级专政，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见，意味着"连同水一起把婴儿也泼掉了"。Э．巴里巴尔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在马克思主义报刊上积极地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按照他的

信念，“法国人民联盟”作为出发点的原则需要更深刻的论证，要考虑到反革命的潜在危险，甚至在向社会主义建设最“和平地”过渡时，反革命的威胁也丝毫没有消失。

在法共论坛上讨论过的社会政治问题，在法共二十三大（一九七九年）和二十四大（一九八二年）上继续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的中心。现在基本任务被规定为“通过民主途径使法国人民向社会主义推进”㉑，团结全国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在争取法国人民迫切需要的斗争中，首先在下层达到行动的统一。同时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它在“生产方式革命化”中的历史使命。“法国民族的未来和工人阶级的未来是联接在一起的。”㉒

在法共的国际战略中，除了确认民族主权和独立的原则以外，明显地表现出承认民族因素和国际因素之间更密切联系的倾向，要求处理好法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份量已大大增长。法共二十三大不象过去那样用法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来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相对立，㉓而是对“现存”社会主义的经验作了肯定的评价，并且号召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扩大国际团结。按照法国共产党人的观点，形势的多样化以及共产党之间现存的个别分歧不应该被看作是它们发展合作和国际团结的障碍。Ж．马歇在法共二十三大的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希望领域转到了实际现实的领域”㉔。

近年来越来越活跃的反共反苏宣传企图破坏劳动人民的团结，贬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法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这种宣传，为争取实现这些基本原则，争取不仅在自己国内，而且在“各国人民的大家庭”中实现进步的、民主的改革而进行不倦的斗争。所以，在二十三大和二十四大上，对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对整个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予以特别的注意。象建立有利于

解决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任务的新世界力量对比、消灭人对人的剥削、为争取和平、裁军而斗争这样一些因素，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所选择的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所以法共对它们发展结果的评价“整个说来是积极的”,并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在前进，资本主义的阵地在削弱。

法共忠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民族传统，把与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团结看作是自己最主要的义务。Л.И.勃列日涅夫在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柏林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这种同志式的团结，共产党人举着它的旗帜前进已经有一百多年，它在我们今天仍然完全保存着它的全部伟大意义。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各国共产党和整个工人运动的强大的和久经考验的武器”[25]。

在二十二大和二十三大上拟定的法共政治战略的总路线，在二十四大上得到了确认。正象在Ж.马歇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从对七十年代“左翼力量”联盟经验的思考中得出的最重要教训之一，是必须拒绝对法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作“硬性规划”。为此取消了“先进民主”的口号，而代之以朝社会主义“民主地迈进”(avancée démocratique)的概念。[26]

在八十年代，经过充实了的“左翼力量”联盟的政治战略产生了令人难忘的结果：在一九八一年五月十日的总统选举中，社会党人Ф.密特朗获得了胜利，在他当选之后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国社会的进步力量又获得了成功。国家领导中的这种重大变化和新政府所承担的义务（在国有化、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改革），要是没有法国共产党人是不可能的。新政府成员中也包括了共产党人。

马克思主义者密切联系法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研究了经济问题、国家问题、法国社会的阶级结构、青年、左倾观点和

“新左派”问题、知识分子及其与工人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27]。

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有关吸收全体劳动者加入共同反帝斗争的问题时，按照新的方式提出了共产党人对宗教和教会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之间继续进行广泛的对话。这一对话的目的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则，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妥协（这是P．加罗迪的主张），而是共同对资本主义提出抗议，在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争取人民团结和民主改革的斗争中达到行动一致。法国的大多数居民（妇女的百分之八十三，男子的百分之六十四）信奉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也有新教），与宗教和教会、与广大信教劳动群众的关系问题过去和现在一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仔细地注视着由逐渐加剧的信仰“无神论化”过程引起的天主教会现代危机的发展，力求理解在教皇通谕和第二次梵蒂冈代表会议决议中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中的新内容。

对现代天主教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进行分析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A．加桑诺瓦的《天主教代表会议的特点》、《共产党人和基督教徒》、《第二次梵蒂冈代表会议和教会的演变》（一九七三年的俄译本改名为《第二次梵蒂冈代表会议。对现代天主教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批判》）、《社会、教会的危机和人民联盟》；P．勒鲁阿、A．加桑诺瓦、A．穆安合写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天主教世界的演变》；M．多列士、B．罗歇、Ж．马歇的论文集《共产党人和基督教徒》[28]。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天主教的《社会周》，而天主教理论家参加《马克思主义思想周》和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心举办的《哲学和宗教》讲座（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则是对话的发展。共产党人和基督教徒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法共二十二大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在二十

三大的材料中也有所反映。

正如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无论是宗教的空幻理想还是它的道德标准，都不能阻止人们日益增长的思想动荡，甚至在那些从来就是教会的传统支柱的居民层中也是如此。因此，教会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策，“从诅咒转向与马克思主义者对话”。马克思主义者则“向信徒们伸出手”,设法在共同的经济和社会任务的基础上与他们接近，寻求不顾世界观上的差异而采取共同行动的可能。这是共产党人和信徒相互关系中的新阶段，有助于消除许多障碍并使得有可能大大扩大接触和共同行动的新立场。它在《思想》杂志专辑（一九七七年第一九二期）中有所反映，在这一期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外，还有著名的神学家发表文章，明显地表现出了双方立场接近的路线。

能说明问题的是，近年来法国有一系列宗教组织和团体在设法寻求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争取和平和社会变革的共同道路。对教会的这种演变以及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广泛的信奉天主教的居民群众被吸收进反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共同民主斗争，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赋予重大的意义㉙。法国新教联合会在一九七六年发表了《教会和权力》的宣言，在其中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批判，认为它“与福音的要求不能相容”。

这一切事实证明，基督徒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对话正在采取新的形式：它从对抗、分歧和妥协变为联合，寻求为争取民主、和平和进步而采取共同行动的形式。

社会的结构。 在所考察的时期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研究了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问题——社会结构、人道主义、个性、文化、意识形态等问题。同时不仅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个别范畴，而且还提出了一些理论见解，围绕它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六十年代中期，Л. 阿尔都塞和他的追随者（Э. 巴里巴尔、

П. 马歇雷、Д. 勒库尔等）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问题、首先是社会结构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解释，他们的著作在法国、接着在别的一些国家广泛闻名。这些哲学家反对P. 加罗迪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严格的理论和科学性质。

他们认为解决这个任务的途径，首先是把一切非科学的因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清除”出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包括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理论绝对对立起来。他们在这样做时，提出了某些“言过其实”的说法，其中一部分完全是有意识的（“矫枉必须过正”），另一部分则是错误的，Л. 阿尔都塞本人在他活动的第二时期，即在1967年以后已承认了这些错误。然而，阿尔都塞和他的同志们是提出了许多值得予以认真对待的理论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其他许多国家都引起了热烈的哲学讨论，即使对不同意阿尔都塞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也促进了哲学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在阿尔都塞和他的同志们活动的第一时期，他们注意的中心是社会结构问题，即各种社会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问题。在阿尔都塞的论文集《保卫马克思》（一九六五年）和集体撰写的两卷《读〈资本论〉》中，分析了这些问题。而在第二时期，即一九六七年以后，着重点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是对抗性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成了注意的中心。这个问题反映在阿尔都塞的《列宁和哲学》（一九六九年）、《答约翰·刘易斯》（一九七三年）、《自我批评材料》（一九七四年）、论文集《立场》（一九七六年）、巴里巴尔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五篇札记》（一九七四年）和《论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七六年）中。

阿尔都塞认为，为了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以更严格的理论性质，为了使这种社会观不受到机械的和唯心主义的歪曲，必须明确地肯定作为整体的社会从一开始起就是有结构的复杂统一体。在社会中不存在表现为实体、本质或行为的“原始简单统一体”,而是存在着“给定的有结构的复杂统一体”[30]。这意味着，社会的复杂统一体不能象在黑格尔或费尔巴哈那里那样，既不能用某个简单本原的展开或异化、也不能用它在一切社会领域的“隐蔽存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讲的统一性是复杂整体的统一性，复杂整体的组织方式和构成方式恰恰就在于它是一个统一体。”[31]

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科学的社会观以后，不是通过对各社会因素的简单的重新排列或替换，而是通过它们之间的联系本身进行原则上不同的解释而造成了革命。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正是因为如此，应该在开始把真正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结构的概念提到首要地位。

社会的结构（被理解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复杂的有秩序的总和）不是“建立在”某个无孔不入的单一本原上，而是“建立在”各种社会领域（阿尔都塞有时称为“层次”）的特殊联系上。这些“层次”同时是各种不同的人类实践——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科学实践。所有这些实践在结构上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是一定手段为了取得一定产品和结果而对一定对象的作用。但是在它们当中，“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作为“最终层次”的、作为任何社会的基础的经济实践。全部问题就在于正确理解其余“层次”对这“最终层次”依赖的类型。为此，阿尔都塞诉诸列宁的一系列著作，特别是总结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经验的著作，并在其中找到了一个处于“实践状态”的新概念，可用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辩证法的范畴体系。他把这个概念叫作“多层次决定”(surdétermination)。

大家知道，革命在俄国爆发和获胜，并不是因为俄国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和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制度）的一系列新旧矛盾的“关节点”，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各种不同社会矛盾的这种“相互作用”、各种不同社会力量的这种结合是一种规律，它意味着，革命取得胜利（或者遭受失败），不是仅仅由于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经济矛盾的作用，而是由于其他的、“起多层次决定作用的”矛盾对它的总的作用。换句话说。这些其他的、“起多层次决定作用的”矛盾的影响，不应该只被看作是阻挠或者加速发展的偶然机遇，而应该被看作是为解决基本经济矛盾所必需的因素。

这样，阿尔都塞就在理论上论证了关于必须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结合起来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原理、关于必须为完成革命建立阶级组织的思想以及其他许多以“实践状态”包含着“多层次决定”概念的思想。

但是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多层次决定”的概念不仅可用以说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从而经济基础和各上层建筑“层次”之间的必要内部联系，而且能有助于论证这一联系、全部社会结构及其辩证法比无论是黑格尔的还是机械的社会观更为灵活的性质。阿尔都塞在分析列宁关于在不同时期把矛盾的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关于必须每一次都找到一旦抓住就能“拉出整个链条”的“主要环节”的原理时，用多层次决定的各种各样的性质来进行解释。各种不同“层次”、各种不同矛盾相互之间的多层次决定作用，它们在彼此中的“反映”，不是单义的、一劳永逸地决定了的。它可能产生加强的或削弱的作用，使某些具体矛盾激化或缓和。它可能表现为重心转移、矛盾的主要方面变为非主要方面，而非主要方面变为主要方面，或者表现为导致革命爆发

的矛盾的累积。

“多层次决定”的概念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起很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和象“接合”（一定的联系类型）、“主导”（一定社会领域占主导地位）、“不平衡性”（结构联系的不对称和不和谐的性质）等概念一起起作用。至于“层次”的概念，它引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争议的反应，阿尔都塞对它并不坚持，常用“领域”或“平面”作为同义词来取代它。

后来，阿尔都塞对这一范畴体系作了一系列修正。例如，他区分“多层次决定”和“少层次决定”（sous-détermination），指矛盾起作用的两种类型，前者激化、导致矛盾的解决，后者减缓、导致发展的停滞。他区分支配联系的两种类型——“决定”（经济起这种作用）和“主导”（在经济本身的影响下某一领域占居首位）。

阿尔都塞在探讨社会历史的问题时，建议弄清历史时间本身的结构。他认为，必须克服日常关于历史时间是统一的、单纯的、连续不断的过程的概念，承认各种不同的社会“层次”或平面都有特殊的时间模态。

阿尔都塞用这种概念来不仅同日常对历史和历史时间的理解，而且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在例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中流行的所谓历史主义相对立。阿尔都塞故意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反历史主义”，批评把哲学和历史等同起来的思想、使科学理论完全服从于最“生动的”历史思想，这种思想产生的根源是把科学理解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且把它归结为相对主义的经验主义。㉜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阿尔都塞的理论在一系列国家展开了尖锐的讨论。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发表文章反对阿尔都塞的理论。这

些文章中有许多的基调是力图把阿尔都塞“开除出”马克思主义、把他说成是企图“给马克思主义套上静态结构主义范畴的拘束衣”的结构主义者[33]，此外还想在马克思主义本身中发现结构方法和辩证方法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34]。

在大多数场合下，这种批评都很粗鲁，为了驳倒对方而不择手段。

最富有成果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发表的批评意见。不过，它们大多是针对阿尔都塞关于人道主义的解释和他对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理解的（将在下面讨论）。至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辩证法的理解，那么“多层次决定”的概念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承认。[35]

同时，一系列法国、意大利、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的理论的某些薄弱方面。这一理论赋予社会结构及其各种变体的意义是否太大？如果说任何社会领域都能够“主导”，这是否贬低了经济的“决定”作用？例如，特克西埃在批评э．巴里巴尔的某些提法时就发表了这种看法。他还提出了自己对问题的解决办法：譬如政治或宗教在一定社会时期的主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谈到这一点），只应该理解为该领域在上层建筑范围内，而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主导[36]。

另一方面，在这种结构理论中，有意识的、主观的因素的作用是否象在结构主义中那样归于消失呢？能否撇开这一因素来解释对社会结构的革命改造呢？

在回答这一批评时，阿尔都塞认为必须首先同结构主义划清界线。他指出，决定、多层次决定、主导之类概念与结构主义理论毫不相干，在结构主义理论中，结构服从于形式的组合分析，不包括“力”的关系。同时，他承认，他在头几篇著作中同结构主义术语“调了情”，例如使用了象“结构因果性”这样的名词，

虽然“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完全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 的 因 果性”[37]。

至于有意识的、主观的因素，那么阿尔都塞一方面在他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范围内对相应问题进行了研究、另一方面他把阶级斗争的作用提到了首位。

阿尔都塞批判人本主义时，例如在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来·刘易斯论战时，批驳了他关于“人”由于“超越”即“否定”、超出现在的界限而“创造历史”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是唯心主义的。他针对这种说法提出了“群众创造历史”和历史的动力是阶级斗争的原理，认为这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

但是阿尔都塞认为，“群众”不能算作“主体”，“主体”的概念只适用于“人”，因为群众是由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组成的，其成份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变化。此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应该是“谁创造历史”，而应该是阶级斗争及其物质基础，后者也就是阶级本身。阿尔都塞说，这样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关于历史主体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毫无意义：“历史是过程，是无主体的过程。”[38]

然而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这一切决不意味着，有主动性、意识、组织等的活人从历史中消失不见了。相反，正是由于排除了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的人的概念，才有可能科学地研究这一切具体问题，并且从分析生产、政治、法律及其他社会关系出发，对实际斗争作出正确指导。本身。

阿尔都塞在后来的著作中把阶级斗争规定为“不仅是实践中，而且是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哲学中的‘主要环节’”[39]，并且从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出发来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问题。

阿尔都塞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发表的主要观点大致就是如

此。这些观点也有一定的实际倾向性，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近年来特别强调这一点。例如，他们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没有根据的，并且用阶级社会关系的“力的”性质来说明这种专政的必要性。[40]

社会结构的问题在M．戈德里埃的著作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位哲学家曾积极参加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并且专门从事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一般认为，他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立场，特别是在论文集《经济学中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一九六六年）中，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最大程度地接近结构主义中所运用的结构方法。M．戈德里埃不仅试图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发现结构方法和辩证方法并用的现象，而且提出了他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联系的解释。

戈德里埃问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适应或不适应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可以被理解为两种结构相容或不相容。按他的观点，不仅生产关系是一定的结构，而且生产力本身也是按结构方式组织起来的，因为它们的成分是由技术性质的联系结合在一起的。这两种结构的相互关系起初是不矛盾的，而后来，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产生出矛盾，这种矛盾就导致革命变革，向新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

戈德里埃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描述成“结构间的”矛盾，除了这种矛盾以外，还存在着“结构内的”矛盾，即在生产关系内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然而在一定社会形态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这第二种矛盾起着从属的作用。它本身只是反复再现出来，只有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间的”矛盾得到发展以后才能得到解决。

戈德里埃关于社会形态中的结构间的矛盾和结构内的矛盾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和他对《资本论》的解释，受到其他一些马克思主

义者，特别是Л．塞夫的批评。他和戈德里埃在《思想》杂志上进行的讨论很有理论意义。㊶

Л．塞夫提出的反对意见的实质可以归结为，这一理论把主要作用赋予两种不同结构之间的外部矛盾，这种矛盾被看作是发展的外部障碍。这样一来，阶级斗争的作用，作为发展动力的内部矛盾的作用就被贬低了，整个理论带有机械的、非辩证的性质。

戈德里埃在回答批评时，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一定的修正。他指出，结构间的矛盾对生产方式说来是内部矛盾，他同意塞夫的看法，这一矛盾也和结构内的矛盾一样，从社会形态产生的时候起就存在着，只是以隐蔽的方式。同时他强调指出，阶级斗争不管如何重要（它对解决结构间的矛盾是必要的），不能作为说明全部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则，因为在非对抗的社会形态中并没有阶级斗争。

戈德里埃坚持认为，使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产生和消失的历史动力、基本矛盾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根本矛盾贯穿全部历史，它在每一场合决定阶级斗争的作用（当存在阶级时）和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过渡的决定时刻（如果有的话）表现的形式（革命与否）”㊷。

塞夫在指出观点有一定接近时，还是不同意把这种矛盾理解为结构之间的矛盾。按照他的看法，为了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被当作真正内在矛盾考虑，应该承认，“生产力就其本身而言不是经济结构（与生产关系“完全不同”），因为它们的基本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㊸。的确，生产力的诸因素是由一定的技术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它们的结构不在于此。主要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分工，它作为生产关系才构成生产力结构的主要部分。塞夫写道，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

的矛盾被理解为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它“采取阶级之间矛盾的形式”，这“使得有可能理解阶级斗争的推动作用”[44]。

这个问题在塞夫最近一部巨著《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一九八○年）中得到了进一步研究。塞夫在这部书中重新阐述了一系列哲学问题，他建议重新考察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规律，并以下述方式明确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根本作用”，决定它的一般逻辑，而生产关系，从而阶级利益、阶级斗争，起“决定作用”，对各种发展可能性作出直接选择[45]。阶级斗争应该被理解为“不是有时，而是经常”的发展动力[46]（这也是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的观点）。

这里以极简略的方式叙述的关于社会结构问题的讨论，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决没有结束。毋宁说，这只是为了加深对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及其在社会形态范围内的相互联系的科学理解而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的开端。

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问题 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问题（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社会结构内部决定作用的等级和层次、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相互作用的性质等），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占中心的地位。“过渡”问题研究的范围不仅包括象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和规律这种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以及在政治和实践方面都尖锐的问题（在关于法国社会主义未来的讨论背景上），而且包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从阶级以前的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按照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正是广泛研究从一种具体历史的社会形态到另一种具体历史的社会形态过渡的各种特殊形式，才能有助于加深对法国现在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过渡”问题的多学科研究的范围今天才显得如此广阔。这个问题现在已积累了大量材

料[47]。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不同方面进行了许多讨论（其中应该特别指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研究问题的未结束的讨论，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报刊上都曾引起广泛反响的根据法国大革命材料进行的关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

在社会经济形态方面、对民族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技术史、社会人类学、生态学等问题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前法国享有很高的科学威望。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有某种共同规律（或不变式），因为发生在自然过程一定地方上的任何过渡都有自己的特殊性。甚至在一种或几种社会经济形态由同样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不应该认为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结构的决定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应该相同。所以，正如所进行的讨论和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的，过渡和转变的规律就历史上的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说来都有其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但是，正如研究者们强调指出的，这并没有取消关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应该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方式本身在这个或那个历史形态中可能获得独特的特征。那是另一回事。

在战后时期，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加了国际上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讨论[48]。六十年代初期在巴黎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心建立“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小组，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有可能全面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发展问题，并且吸收各种不同人文学科的马克思主义者来从事这一工作。[49]

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著在法国马克思主义报刊上只是偶尔出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最重要阶段，应该认为是六十年代中期，那时《思想》杂志出了一期几

乎完全是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九六四年第一一四期）。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成了讨论的中心。马克思在手稿《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大致描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是不是不仅适用于存在于古代东方的一定国家形式，而且还可用于描述非洲、中美洲或亚洲在从原始公社向封建社会过渡时产生的“混合”社会经济形态？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以便清楚地揭示它们在历史中运转、复现和转变的规律？根据现在大大增加了的新的事实材料来看，把各种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五阶段的经典图式有多大程度的正确性？之所以必须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是因为想要理解现代世界历史的一定社会政治过程。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瓦解的结果，在非洲和亚洲开始产生新的独立国家。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特点是“多种方式并存”，封建制关系、在某些地方则是奴隶制关系的各种残余形式与资本主义的经营形式混合在一起，这使得不可能把这个或那个亚非国家直接归入现代社会的某一类型。如果考虑到许多亚非国家拒绝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求把经济和社会关系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那么这种类型的社会怎样才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呢？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具有特别迫切的意义，因为有许多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学说不能把这些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考虑进去，更不要说论证它们向社会主义型社会过渡的可能性了。这类理论的作者们在捍卫亚非国家发展的“独特道路”的幌子下，有时求助于历史科学中已完全破产的种族理论和民族中心主义理论。

坚持主张历史唯物主义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在法国有Ш．巴伦、Ж．秀勒－康纳尔、Ж．－Ж．戈卜洛、М．戈

戈德里埃和Ж.谢诺。按照他们的意见，“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仅仅是历史上个别的生产形式，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一种介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之间的社会经济形态。例如，秀勒一康纳尔认为，只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能够使许多非洲问题研究者摆脱困境；在分析赤道非洲、中美洲的殖民以前的社会时，传统意义的奴隶制和封建制范畴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然而，随着讨论的展开，发现对于主要问题，即是否在原始社会和奴隶制（或甚至封建制）社会之间存在过一个可以称作“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单独的”社会经济形态，并没有得出最终的答案。可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都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可以说明有阶级以前的社会和阶级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虽然这一讨论并未能使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研究采取一致的态度，然而它在更确切地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概念方面还是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在六十年代末，围绕着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涉及到“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最重要论述的理论论战让位给更广泛的方法论问题：通史的分期、对象“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等这类概念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内容的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心的倡议，在一九七一年举行了关于确定“社会经济形态”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理论地位的讨论。导火线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Э.塞伦尼的文章《从马克思到列宁:“社会经济形态”范畴》[50]。讨论参加者一致认为，不确定“社会形态”范畴的理论内容，不可能对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问题作出回答；社会主义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社会形态抑或只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漫长阶段这一问题也同样不可能弄清楚。塞伦尼建议把社会经济形态

确定为由于社会生活一切因素“总计的”、“综合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形成的独立“整体”[51]，按照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这没有考虑到涉及一定历史形态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内部等级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一些讨论参加者（Ж．拉比卡）指出，不考虑到生产方式对一定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对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的理解就不够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象塞伦尼那样说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综合的”相互作用就是错误的[52]。另一些参加者（P．加利索、Г．多库阿）强调指出，塞伦尼的理论解释不能用作分析资本主义以前社会时的模式，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经济起独特的作用，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53]。

从关于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讨论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对社会形态概念的独特“具体化”。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用这个概念不是去表示“纯粹的”封建制、“纯粹的”资本主义等，而是去描述存在于各种历史时期的各种具体社会。

在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志方面研究与资产阶级的原始社会理论划清界限，自主进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后者妄图“校正”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论，说它不适用于分析古代社会制度。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懂得，只有在按照方法论制订的广泛研究规划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解决这个任务。这种研究规划在今天更加需要，因为资产阶级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企图在“新进化论”的思潮中把结构方法、进化论和部分马克思主义因素折衷主义地结合在一起。

П·彭特企图提出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规划。他认为第一个研究方向是建立“人化过程”的理论；第二个方向是“生产方式理论”，将其应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第三个方向是制定“人类社会区分理论”[54]。A．勒鲁阿－古朗、

А. 奥德里库尔、Ш. 巴伦、Г. 布阿托、Ж. 秀勒-康纳尔、Ж.-Ж. 戈卜洛、М. 戈德里埃等人的研究，对"人化过程"和"人类社会区分"的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理论立场同职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领域远非总是吻合，而且，在法国著名的学者，无论是勒鲁阿一古朗还是奥德里库尔（前者是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和技术史方面的专家；后者是语言学、民族动物学和民族植物学方面的专家），都不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讲话，虽然积极捍卫人文科学领域的唯物主义立场[55]。

在生产方式理论和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理论的发展中，除了已经知道的巴伦、谢诺、秀勒--康纳尔、戈卜洛、戈德里埃的研究著作以外，倾向性略有不同的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К. 梅雅苏、Э. 特勒、П.-Ф. 列伊的著作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企图把Л. 阿尔都塞和Э. 巴里巴尔的某些思想用去分析植民以前的非洲社会。

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量专门分析澳洲、中美、西非的古老社会的研究著作中，集体撰写的《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九六九年），《今天的历史》（一九七四年）、《民族学和历史》（一九七五年）占有重要的地位。还应该提到集体研究著作《畜牧社会》（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它的第一部分探讨这类社会的技术和经济组织的研究问题；第二部分分析东非游牧社会经济组织。按照作者们的看法，资产阶级人类学和民族学在对这类社会的研究中没有超出承认人口和生态因素具有决定性质的范围。无论是社会再生产问题，还是游牧社会向其他类型社会过渡、转变的问题，都在考虑范围之外。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家把游牧社会中的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社会生产组织的特殊形式的问题提到首位，这使得有可能把对这类古老社会的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

M.戈德里埃在六十——七十年代制定的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理论值得特别注意[56]。戈德里埃的理论在法国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戈德里埃在研究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机体——印加人的国家、非洲姆布提人的氏族组织、澳洲土著的社会——时，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揭示它们发挥社会职能和再生产的特点，而不越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范围。他强调指出，马克思关于经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论点最终也能被运用于原始类型的社会。而这决不意味着为了讨好形式的公式而歪曲历史现实。按照他的看法，有阶级以前的社会的特征在于亲属、政治和宗教关系的结构的特殊地位，它们在这类社会中起复杂的双重作用：同时既作为上层建筑的因素又作为基础的因素而起作用。

戈德里埃批判列维-斯特罗斯的结构主义，同时寻找在对有阶级以前的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领域运用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积极成果的可能性[57]。与列维-斯特罗斯不同，他的目的是在古老类型社会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按职能意义估计各种不同活动（从象征性活动到生产活动）。为了说明古老社会制度（有阶级以前的社会制度）发挥职能的独特性质，戈德里埃采用了亲属结构"多职能性"的概念[58]。这意味着，亲属结构在这类社会中不仅具有有限的职能（例如，调节婚姻关系、建立联合体等），而且表现为"政治关系",表现为"原始思维的社会学配件，充作社会生活的表达方式、组成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神话概念的意识形态电码"[59]。另一方面，而且这一点最重要，正如戈德里埃指出的，亲属关系保证生产资料和劳动产物的分配、个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对自然财富的权利。因此，戈德里埃得出结论说，如果要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有阶级以前社会的职能机制的说明充分成立，只有承认亲属关系同时既作为基础又作为上层建筑起作用：

当亲属关系在经济上起作用时，它们是基础；当在非经济方面起作用时则是上层建筑。因此，亲属关系只是在作为生产和生产关系的结构起作用时才是原始社会中的起决定作用的层次。

远不是所有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戈德里埃提出的关于原始社会亲属结构“多职能性”的假说具有说服力。例如，P．马卡里乌斯根据塞夫的批评意见[60]，认为戈德里埃破坏了基础和上层建筑分别存在的“明确定义”，按照他的看法，把亲属和亲属关系概念混为一谈更是不可容许[61]。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Э．特勒在《马克思主义在原始社会面前》一书中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对现代的民族学家说来，特别是在列维－斯特罗斯的研究之后，亲属关系结构是不是已经成了独特的民族学“偶象?”[62]戈德里埃追随列维－斯特罗斯，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亲属关系结构对所有原始社会形态说来并没有绝对“第一性的”和“全面的”意义，而且它们“按照生产的要求”而发生形态变化[63]。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K．梅雅苏、Э．特勒、П．－Ф．列伊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以阿尔都塞的某些思想作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例如非洲“氏族”社会从殖民前的阶段向殖民主义阶段和新殖民主义阶段过渡的问题。对这种社会非常需要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能够促进对非洲大陆最落后地区的发展作出社会预测，有助于弄清楚非洲走向进步型社会组织的独特道路的特征。

然而这些作者所得到的结果，正如巴伦、秀勒－康纳尔、戈德里埃、彭特所认为的，由于他们对经济在非洲“氏族”社会中的决定作用作“机械”、“片面”的理解，明显贬低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和重要性，而受到了歪曲[64]。例如，列伊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亲属关系在非洲“氏族”社会的社会生产中不是占主导

地位的关系；现代民族学和人类学“虚构了”亲属在古老社会中的作用。彭特反驳说，这样的话，亲属就是生产关系的简单反映，可是事实上它被包括在“氏族”社会内部的社会生产的广阔范围内，对社会生活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其中也包括对生产结构产生形形色色的影响。而且，有用纯粹经验主义方法取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危险，结果将使得完全不可能揭开支配这类社会转变过程的规律[65]。

按照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特勒、梅雅苏、列伊试图把社会生产过程、社会分工的概念与劳动技术过程和工艺分工的概念等同起来，使得他们对社会经济结构在老社会中的作用产生了庸俗经济的理解。戈德里埃认为，Э．特勒失败的原因正在于此，他“依靠Л．阿尔都塞和Э．巴里巴尔来认识‘真正的’马克思，‘重新阅读’梅雅苏，在非洲古罗部落（象牙海岸）那里，存在有多少种劳动过程形式，他就发现了多少种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方式、‘亲属遗传’生产方式等”。[66]戈德里埃还指出，这种立场使得某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家走得这样远，以致他们抛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始”或部落社会与“阶级”社会之间所作的明确区分，企图把一切社会范畴都归结为“阶级”，以便使“阶级理论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同时代和社会形态[67]。

对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生产方式、亲属结构在资本主义以前社会中的作用等）的许多讨论和理论研究，促进了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入研究，使对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解的方法论原则恢复了活力。

人和人道主义问题关于人和人道主义问题，在战后头几年就在马克思主义和在法国以Ж．-П．萨特为首的存在主义之间展

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在这一斗争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正面研究。

从五十——六十年代之交开始，人和人道主义问题被以新的方式提出来。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教条主义的限制进行批判时，也批判地重新考察了自己理论活动的成果。这一重新考察把全部思想工作提高到一种新的理论水平上，但是它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当时对于应该在何种程度上重新估价自己的理论立场和自己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还很不明确，有些哲学家提出要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中有几个团结在《论据》杂志的周围，公然宣称自己是修正主义者。另一些哲学家毫无根据地声称自己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Л．勒费弗尔成了修正主义的最著名人物。几年之后出了P．加罗迪。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主义歪曲是按这种方式进行的：拒绝它的阶级性和党性，以对人和世界关系问题的抽象人道主义提法来取代哲学基本问题，在这一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和当代的资产阶级思辨哲学接近起来。例如，勒费弗尔反对"唯物主义公设"，宣布现代世界中人的异化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加罗迪起初批判勒费弗尔，后来自己宣布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人道主义学说"，并且开始通过对青年马克思著作、费尔巴哈、黑格尔和费希特哲学作出相应解释，通过借用存在主义、天主教哲学及其他资产阶级流派的一系列"人道主义"论点来"丰富"它。

加罗迪的哲学折衷主义在六十年代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成了严重的理论危险，尤其是因为他在党内占据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领导岗位，而且他的修正主义与其他一系列国家的类似思潮合流。

Л．阿尔都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来说话的，他在六十年代

初的文章中提出了阻止这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溶合在其他思潮中的任务。除了上述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思想以外，阿尔都塞在反对以人道主义为幌子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斗争中提出了一个带有尖锐论战性的论点："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

这是针对加罗迪和其他"抽象人道主义者"的一个有意矫枉过正的提法。他们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人本主义）把一般的人或抽象的人的本质的概念作为出发点。但是，正如马克思在他的一部后期著作中指出的，他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⑱]阿尔都塞就是援引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个以及其他的论点，否定了这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之间的原则界限被抹去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

同时他设法驳倒勒费弗尔、加罗迪及其同道者的主要论据，即援引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其他几篇早期著作中的"人的哲学"。阿尔都塞在后来被收入论文集《保卫马克思》的三篇论文中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理解，根据这种理解，马克思只有在与这种"人的哲学"决裂，不是把人、而是把社会、把决定人本身的社会关系作为基础之后才能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

其实，这一思想本身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并不新鲜。阿尔都塞只是设法给他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论据。但是，由于有点片面地强调了马克思所进行的科学和哲学革命的彻底性（所谓认识论上的断裂），阿尔都塞不仅加剧了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辩哲学的修正主义者的分歧，而且加剧了与许多已开始研究"人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部分论据是革命并不排除一定的继承性，而这是完全有道

理的。

与修正主义明确划清界限当然是必要的。为那些迷恋一般人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不觉滑向修正主义设置一定的"理论障碍"也同样是必要的。但是这还没有解决人道主义问题、"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意义问题。

至于这个问题不纯粹是理论问题，也是一定的实际需要的产物，阿尔都塞本人也意识到了。他提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论点的那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开始就谈到这一点。但是，他在考察了人道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以后，提出了实践在其中只有肤浅的、不科学的反映的结论。这一理论指出现实的重要问题，提供对它们的评价，但是并没有提供对它们的科学认识。

这种把科学和哲学理论与人道主义理论硬性分割开来的问题提法，在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的《新评论》杂志上引起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尖锐讨论。阿尔都塞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观点交锋的主要问题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地位问题。然而，关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人道主义的内容本身、它与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的区别、它与包含在马克思《一九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的关系，也发表了不少很有趣的看法。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如果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指劳动者从剥削下获得解放，建立保证个人全面发展的无阶级社会，那么这个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都没有引起任何分歧。这次讨论中所谈的问题是：是否需要一种建立在对一般的人、人的本质、需要等的研究之上的专门的哲学人道主义理论，如果需要的话，它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基础、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而言处于什么地位？

在一大批受到法国及其他国家修正主义者支持的资产阶级马

克思学家看来，人道主义理论，即关于人的本质、它的历史进程中异化和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复归或实现的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哲学基础本身[19]。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20]，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积累了与马克思学家进行思想斗争的经验。也有过与萨特进行斗争的经验，萨特曾企图把人的概念说成不仅是存在主义、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所以，这种问题提法在这次讨论中没有得到支持。它的大多数参加者宁愿采取谨慎的立场。他们同意阿尔都塞说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至少在当前不是一种严密的科学理论或哲学理论，但是同时不同意把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加以硬性分割。M．西蒙、И．维列、Ж．纳瓦里、M．布罗萨尔等人在文章中揭示了科学和意识形态的联系的不同方面，说明了人道主义无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中都有实际作用[21]。

在阿让特伊召开的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法共中央全会（一九六六年），在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会上对P．加罗迪的后期著作和Л．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的著作的实践政治方面进行了批判分析。指出了在加罗迪那里，特别是在他的《从诅咒到对话》（一九六五年）一书中，使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基督教人道主义接近是不对的。同时也批评了阿尔都塞理论与实践分离，例如他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道主义，又承认人道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实际重要性。

在当时法共中央总书记B．罗歇的总结发言和全会的决议中，提出了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道主义性质的重要论点（虽然,正如Э．法戎在自己的发言中指出的，它们并不意味着讨论中所得提出的关于人道主义的理论地位的问题已得到解决）。B．罗歇说道："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来，人道主义首先是热爱

劳动者和人民，为他们的幸福、为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有内容和富有成果而斗争，为保持和平、反对世界核灾难而斗争。我们的人道主义不是只表现在关于人的个性的空话中的、抽象的、无结果的人道主义。这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它号召人们行动起来，走向更高级的社会，走向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共产主义”。[72]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认为，个人的发展就是目的本身，这个原则不仅是对遥远的未来有效，共产主义者在自己的活动中经常受到它的鼓舞”[73]。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Л．塞夫的巨著《马克思主义和人的理论》（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年出俄译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塞夫在这里提出了确定心理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个性心理学基本范畴的任务。同时力求建立起科学人道主义理论，即批评加罗迪的思辩人道主义，也批评阿尔都塞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

他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即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出发点。按照塞夫的看法，这一条应该按照最直接的意义去理解，即人的本质在人之外——在社会关系中。塞夫认为，人的本质的这种“离心”，体现为非心理的形式，使得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科学理论建立起来。塞夫写道：“个人的全面发展在无阶级社会中成为可能，完全不要”象思辩人道主义那样“理解为自古就有的人的潜力得到实现，而要理解为个人掌握客观社会财富的障碍被消除了，在每一个时代，个人都是在社会财富的基础上发展的。”[74]

塞夫在从个人的活动和这一活动的具体历史结构的观点考察人的个性时，为建立科学的个性心理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范畴——具体活动和抽象活动、个性的基础和个性的上层建筑等。按照塞夫的看法，个性心理学作为科学应该研究“具体个人的行为之间

的社会关系的生动体系”[75]。在这种条件下，“它使得有可能认为在经验上建立某个一定具体个人的概念，即合理解决关于个人的科学的根本问题是可以实现的科学目标”[76]。

塞夫这部书在一系列国家被翻译出版，既引起了肯定的也引起了争论的反应。例如，有人对于这种个性心理学在多大程度上是心理学、是不是更可能是个性社会学表示怀疑。整个说来，这一理论被评价为对研究个人和社会、心理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相互联系问题的重要贡献。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还研究了这个问题的一些细节方面——个人的能力及其实现、人的需要、需要的发展和满足、异化及其消灭等问题。对它们的考察都是以具体历史的方式，密切联系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实际斗争任务的解决。还应该提到三十年代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Ж．波利采尔（一九四二年被德国占领军枪杀）和一大批唯物主义心理学家——A．瓦隆、P．查佐、Ж.—ФР．列·尼等——的著作中从心理学和哲学相互联系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文化和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由于和人、需要、主观有意识因素的问题有密切联系，在最近二十年来在法国获得特别现实的意义。由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和对中国所谓文化革命的批判这样一些具体历史事实，由于工人阶级发展的一般过程，即知识分子地位的改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各种不同领域的危机和意识形态斗争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尖锐化，这些问题被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上。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时，力求考虑到符号学、语言学、民族学、精神分析这些人文学科的最新成就，正象Ж．米约说的，这些学科“使得只限于精神形式和文学艺术、与文化工作者和文化人的旧框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文化概

念发生了变化”[77]。文化已经不是被看作是“文化精英”的活动结果。按照正在形成的新文化概念，它包括“社会的行为模式、文化适应的现实性和问题、调节行为和活动的象征职能和符号体系”[78]。

在对文化作这种较深刻的理解时（虽然这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就以新的方式提出了文化发展和满足劳动者和整个社会的文化需要的问题。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文化的无孔不入的性质、它与生产发展的需要、与作为生产力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者的需要的有机联系。这里表现出现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新特征：一方面，为了执行直接生产职能，劳动者必须有广泛的文化发展，另一方面，在追求迅速获得最大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情况下不可能满足这种文化需要。

在《文化、人和社会》（一九七三年）一书中，Ж．贝卢安更广泛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人类活动各种不同领域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它同日益增长的专业化一样是现代科技革命的后果之一。它写道：“发生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化，这使得每个人参加社会管理成为客观的必要性。各种人类活动的这种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双重发展使得个人产生新的文化性质的需要。”[79]

但是，恰好是这些新的需要——对知识、信息、参加民主管理、为发展自己个性的自由时间等的需要——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能被满足。Ж．贝卢安强调说：“社会危机必然反映在文化领域中，文化生活、文化本身陷入了危机。”[80]

危机表现在获得文化的可能性受到限制、物质资料和文化发展的机会不够以及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体系的崩溃。“大资产阶级不能够为我们时代的人们提供对确定生活和活动规则有用的价值观念体系，却把它归咎于文化……从来还没有说过和写过这么多

反对科学、艺术、哲学、文化、知识的东西。”[81]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意识支持的文化分散状况，他们强调指出：“文化是一种完整的东西。”[82]这既然表现在生产劳动的知识化，也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民主化”，也表现在技术、科学和艺术的相互影响，也表现在大众信息手段的最广泛发展。

这些过程的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后果之一，是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联盟的客观可能性增加了。法共总书记Ж、马歇在给P· 勒鲁阿的《现在的文化》（一九七二年）一书写的序言中，就这个问题提到B. 罗歇说过的一句话：“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盟正在成为最重要的事情。”[83]而P. 勒鲁阿在说明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利益和意向客观上接近的情况时，谈到必须认清这种共同性，为此，进一步研究马列主义关于文化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理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在这方面，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既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性质的极左倾向，这种倾向特别由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和毛主义小集团的活动而得到了广泛流行。

P. 勒鲁阿、П. 儒坎、K. 普雷沃和Ж. 贝卢安等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依靠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批判文化虚无主义、“反文化”和艺术“超政治化”的思想，对制定辩证唯物主义和文化观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文化观把最重要的文化财富的继承性和文化的质的变革、文化的统一和它的不同层次的特征结合在一起。

六十——七十年代是积极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时期。上面已经指出，阿尔都塞由于他对人道主义的解释，以后又由于研究各种不同社会领域的相互联系，而提出了对意识形态的特殊理解。

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定的社会活动（“意识形态实践”），这种活动不仅反映现实和表达阶级利益，而且还能动地形成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他力求揭示意识形态的内部和外部机制。他把每一种意识形态分成“实践”和“理论”两类（道德和伦理学理论、宗教和神学等等），并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各种“实践”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的作用上。阿尔都塞说，这些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实际起作用，是因为在他们当中，人们对他们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的表达与“想象关系”结合在一起，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革命的），甚至一种希望或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㊳。

但是，既然意识形态在“溶入人们的血液”、成为行为习惯的时候能最有效地起作用，那么它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无意识（米约补充说，这是“集体的无意识”）。而对意识形态的掌握是通过大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校、教会、政治机构、信息手段等进行的。它们基本上都是用来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们对现存制度的“自然”感、“正常”感，以便他们在其中占有自己“自然的”地位。镇压性国家机器借助暴力来解决同样的任务，意识形态机器则设法使人们自愿地、“自由地”服从现存秩序。为此，人们应该想象自己是“自由的主体”，使自己“自由地”被纳入现存的生产关系。因此，意识形态在这些生产关系和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的再生产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㊴中所阐述的这一理论，在法国及其境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Л．塞夫认为必须对它作一定的修正：既然说的是再生产，就应该把生产本身中实现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与借助意识形态手段把个人保持在自己阶级范围内的过程区分开来。无论如何，在研究国家对资本

再生产过程日益增长的干涉时，不应该贬低经济基础在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

可是，这种靠强调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在再生产中的作用来贬低基础的作用的作法，实际上在阿尔都塞的某些没有直接进入他的圈子的追随者的著作中发生了（阿尔都塞本人指出，在再生产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这种唯心主义偏向受到其他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

对于被阿尔都塞起初截然分开的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后来他对他的这一理解作了修正），以及对于他所提出的“主体”是由意识形态形成的看法，都展开了认真的讨论。Ж．来约在他的总结性著作《马克思主义在运动中》（一九七五年）用了许多篇幅论述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这里引用他的一点看法。他认为阿尔都塞关于“主体”范畴是哲学绝对化的批评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同时不同意把这个范畴完全归结为意识形态的虚构。按他的观点，必须把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人和这个主体借以想象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直接经验的‘意识形态倒转’（恩格斯语）”区分开来㉙。

总之，应该指出，最近几年来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出版了许多严肃认真的研究著作。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以举出M．瓦德的《意识形态》（一九七三年）、Ж．洛日金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一九六九年）、K．普雷沃的《文学、政治、意识形态》（一九七三年）、П．巴尔贝里斯的《现实的阅读》（一九七三年）、Φ．维尔尼埃的《文字和本文》（一九七四年）、论文集《文学和意识形态》（一九七〇年）、M．迪翁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一九七三年）、Ж．－П．列贝尔的《电影和意识形态》（一九七〇年）、论文集《哲学和宗教》（一九七四年）、Б．埃德尔曼的《一张照片

所抓住的权利》（一九七三年）等。

二、对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分析

哲学的对象 对哲学对象问题的讨论，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在六十年代初由于批判教条主义和要求彻底审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而开始的。在一九六一年的讨论中发表了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只是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学和辩证法（这里包含认识论）。关于这个问题，B．罗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四日在哲学会议上说道，正确的是另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广泛的活动领域，它应该为一切领域的科学成果提供理论总结，它是科学的世界观”[87]。

在一九六五年Л．阿尔都塞的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出版以后，这个问题的讨论开始了新阶段。这两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的定义是“理论实践的理论”。这个定义同把一般哲学理解为比现有知识“高一层楼”、是“知识的知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被理解为不仅是关于知识，而且是关于在“理论实践”进程中知识生产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其他实践不同的特点以及它与其他实践（政治、经济等）的联系的严格科学的理论。后来阿尔都塞放弃了哲学是“理论实践的理论”这一定义，并且放弃了“理论实践”这一概念本身，承认他以前的著作中存在“理论主义偏向”。在《读〈资本论〉》一书新版（一九六八年）中作了相应的修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审查对《资本论》的解释本身。因为他认为，对科学知识的这种理论研究基本上不是属于本来意义的哲学的范围，而是属于专门的认识论科学的范围，然而，为了不致陷入唯心主义，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对它进行研究。

阿尔都塞在意共《团结报》和《思想》杂志（一九六八年第

一三八期）上发表的答记者问《哲学是革命的武器》中，阐述了他对哲学的新理解。这里强调的是哲学的阶段性、它的首先表现在与敌对的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中的实践职能。

这一哲学概念后来由阿尔都塞在报告《列宁和哲学》（一九六九年）和《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一九七四年）一书中作了发挥。阿尔都塞在这里指出，关于哲学的阶级性、党性的学说是列宁对哲学的最重要贡献，它揭示了哲学的本质及其实际政治职能。

阿尔都塞在考察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基本思想时，指出列宁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把科学和哲学、科学概念和哲学范畴（例如物质范畴）明确区分开来，并且提出了哲学区分的概念本身（例如对真理和实践是真理标准的理解）。

阿尔都塞把科学和哲学的区分按逻辑贯彻到底：如果说科学生产知识，那么哲学只是把科学知识同各种不同意识形态、政治、阶级利益联系起来。哲学本身作为“中介环节”并不生产新的知识，因此不是科学。科学总是提出新的问题，并且通过解决它们积累知识。而哲学总是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且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解决它们而进行斗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或意识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反映出阶级力量不断变化的对比。

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由此产生出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实质上，哲学没有真正的历史”和“哲学事实上没有在科学有对象的那种意义上的对象”⑧。换句话说，哲学史不很象历史，如果在它当中基本上总是重复同样的东西的话。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哲学在表面上是一种认识，实际上并不象科学那样深入自己的对象，解决认识问题。不然的话，哲学家会象科学家那样对确立的基本真理取得一致看法。但是恰好是一些哲学家的基

本哲学原理不断遭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批驳。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哲学虚无主义。哲学斗争是必须的，但是这与科学内部的斗争不是同一回事。这是赞成还是反对科学本身的斗争，是为了一定阶级利益的斗争，这一定的阶级或是需要这一科学，或是感到它危险。

阿尔都塞所特有的对问题的尖锐论战提法，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争论。他们认为阿尔都塞强调哲学的阶级性、党性、指出哲学在实际阶级利益和理论之间的“联系职能”、在理论中归根到底反映阶级斗争，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但是能不能把哲学的作用仅仅归结为它的这一职能呢？能不能否定它的认识意义，否认它有自己的认识对象呢？

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多数人不同意这样缩小哲学职能，坚持哲学有自己的认识对象的论点。为此在讨论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它的认识和方法论职能的问题。

在集体著作《列宁、哲学和文化》中，M·西蒙写道：“哲学与阶级斗争不可分。它与科学本身的运动不可分。但是它有自己的对象：这就是‘范畴’，唯物主义世界观也被归结在范畴中。”[89]

米约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统一性，他也强调哲学范畴的认识意义，科学知识就被集中在范畴中。米约写道：“的确，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范畴是集合点，科学理论化的工作在这些点上达到顶峰，而且它们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90]

在理论讨论会《列宁和科学实践》（一九七一年）上也讨论了关于普遍规律和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问题。在这次会上发表了关于哲学是“概念研究实验室”的看法[91]。谈到了“哲学需求”随着具体科学的发展而增长，以及对当代文化和社会过

程的全面理解需要广泛的哲学概括。

同时，参加会议的一系列科学家和哲学家强调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他们还指出，为此哲学家本人还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工作。例如，必须从一般理论上和历史上分析哲学范畴的性质、它们的特征和与具体科学概念的联系。这一问题被归纳为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地位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对它也产生了分歧。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它的性质、规律和范畴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三十年代起积极讨论了辩证法问题。当时就已经有必要反对资产阶级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关于辩证法具有唯心主义性质、与唯物主义不能相容的观点。但是这个问题在战后时期获得特别现实的意义，因为这时与存在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现象学、天主教马克思学家展开了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们不仅用主观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而且企图按这种精神来歪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身。

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萨特、梅洛-庞蒂、伊波利特、卡尔维兹等人的讨论对象。这一讨论的最高潮是在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周”期间（一九六一年）的公开辩论。辩论的题目是关于自然界存在辩证法的问题：资产阶级哲学家否认这一点，他们把辩证法局限于人类的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社会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异化问题。参加这一辩论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利特，在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同时，否认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相似，按照他们的观点，为了“拯救”人类个性的独特性及其自由，必须这样做（他们把人类个性的自由与自然界的宿命性对立起来）。而自然科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Ж．奥尔塞尔、Ж．—П．维日埃和Р．加罗迪（当时还未成为修正主义者）则坚持辩证法既是关于

自然发展也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共同学说，正象马克思所证明的那样，社会是以“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发展的。

承认社会发展中的“自然历史”规律性，也就是与存在主义以及和它近似的各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潮的哲学争论中的主要之点。有了这种承认，才有对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规律性的承认，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否定这种必然性、规律性的。

在这次辩论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得以迫使自己的唯心主义对手做了让步。萨特不得不承认在自然界存在辩证规律，虽然这种规律与社会的规律不同。在这里就产生了自然辩证法与社会辩证法相比的特殊性问题，用更概括的说法就是在不同发展层次上的不同辩证程度的问题，这被称作“区域性辩证法”理论。[92]

这个问题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理论研究。一方面是由于开始放弃对辩证法的“纯粹本体论”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特殊性问题成为首要问题，由于加罗迪在标题为《上帝死了》的书中（一九六二年）宣布“回到黑格尔去”，阿尔都塞针锋相对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上面已经谈到阿尔都塞提出的多层次决定的理论、他对社会整体性和作为动力的矛盾的理解。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对立起来，提出要拒绝象“分裂”、“否定”、“否定的否定”、“扬弃”这种黑格尔概念。因为在黑格尔那里，这一切概念相互联系起来构成这样一种辩证过程的根本结构，它必然要回到出发点，恢复被分裂和否定所破坏了的最初的整体。这种辩证法根本上是有一定目的的、唯心主义的，因为终点在这里从一开始就被给定了。如果马克思主义仅限于把黑格尔辩证法按唯物主义倒转过来，对它的结构保持不变，那么这种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也会依然如故。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应该被

理解为按其结构本身与黑格尔辩证法根本不同的辩证法。

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一系列哲学史性质的看法——关于在黑格尔那里体系和方法的关系、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态度、关于应该如何理解把黑格尔辩证法“从头到脚”颠倒过来[98]和发现它的“合理内核”、关于否定的否定规律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作用、关于列宁对这一规律的评价等等。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就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意见分歧，在这样一点上还是达到了一致看法，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是一种复杂的和慢长的过程，决不可以归结为“一次性的从头到脚颠倒过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按其结构的确不可能与黑格尔辩证法完全相同，它不可能通过简单地把唯心主义原则换成唯物主义原则、把普遍逻辑规律换成可用以解释一切现象的普遍物质规律得出来。在注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按照不同的方式考虑一般和特殊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在Л．塞夫的一系列著作中表明了，如罗迪所提出的人道主义理论是回到思辩的黑格尔公式（自古就有的人的本质被丧失，然后被恢复）。从一般哲学原理中得出某些部门科学真理的企图，即所谓“演绎主义”，也受到了批判。

然而，与黑格尔辩证法明确划清界线是否意味着必须放弃一系列与否定的否定规律有关的范畴以及这一规律本身呢？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阿尔都塞的这个建议。同一个塞夫虽然指出“这一切范畴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起作用的确切方式值得研究”，“重新提醒马克思主义者注意这一点是正确的”[99]，但是他反对把这些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勾掉。Л．塞夫说、否定、扬弃、否定的否定规律这些范畴以及对立统一的思想（M．戈德里埃反对这种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理解与在黑格尔

那里不同。它们的内容被改造了，但是黑格尔那里的有价值的成分被保留下来了。首先，这是发现发展中的继承性——在旧东西中预见到新东西，在新东西中保存旧东西的因素。不这样，辩证的飞跃，用塞夫的话说，就有点象"不带行李的迁居"。

在围绕否定的否定规律的论战中，主要的是论证这种"循环"过程的必要性。塞夫在《列宁和科学实践》讨论会上的报告中说，之所以必然有第二次否定，是因为第一次否定并没有彻底消除原始矛盾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中，塞夫把否定的否定与非对抗性矛盾联系起来，说每一个分裂开的对立面（例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发展进程中都表现出另一个对立面的因素，这也就是它们接着在更高级的综合中融合为一（否定的否定）的原因。

塞夫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把否定的否定规律同异化理论联系起来，他的异化理论既不同于加罗迪对异化的思辩理论，也不同于阿尔都塞对异化的虚无主义态度[46]。还应该指出，在数学家Φ．卡泽尔的《数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九七一年）和物理学家Э．比查吉斯的《现代物理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九七三年）和П．热格列的《论空间和时间》（一九七六年)等著作中，用具体科学材料说明了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其中也包括否定的否定规律。例如在最后一部著作中，对量、质、度等范畴和量变质变规律发表了很有趣的看法。

至于辩证法的"核心"——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规律，那么应该提到塞夫在批判毛泽东的辩证法观点时提出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的理论。毛泽东说到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相互转变。从塞夫的观点看，这意味着把矛盾的类型和解决矛盾的方式混为一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不能成为非对抗性矛盾。但是它可以用尖锐冲突的方式或者相对和平的方式

来解决。塞夫说，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对于确定“在象法国这样的国度中不经过内战，在全人类范围内不经过世界大战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有可能既驳倒右的机会主义，也驳倒左的机会主义。

按照塞夫的观点，大致可以把对抗性矛盾定义为这样的矛盾，在那里，一个对立面的发展是为了消灭另一个对立面，而非对抗性矛盾则是这样的矛盾，在那里，一个对立面的发展只是为了与另一个对立面分离（而且在两种场合都存在着统一的趋向）。因此这些矛盾的解决有不同的内部逻辑——在前一种场合是消灭对立面之一，在后一种场合则是两个对立面在更高的综合中融合为一。因此也就有解决这些矛盾的不同方式。对抗性矛盾由于有内部发展障碍，通常带有爆炸性。然而，如果这种内部障碍丧失自己的力量，它就可以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而非对抗性矛盾一般说是和平解决，但是如果出现外部障碍（例如，对解决矛盾的不正确的主观态度），它也可能获得爆炸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中，塞夫考虑到ж·洛日金的意见，使这一理论大大复杂化了。他把对抗与对立面在时间上的相互排除相联系，把非对抗性矛盾与对立面在空间上的分离相联系，说任何矛盾都既包含有前一种特点，也包含有后一种特点，只是包含的方式不同，取决于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的角度去考察它。[⑨]

在辩证法的范畴当中，近来特别引起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的是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一般和特殊这些范畴。他们力求揭示这些范畴对子内部的更灵活的辩证联系，例如，他们利用这些范畴来理解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中的一般和特殊的东西[⑧]。

在《马克思主义和人的理论》一书中，塞夫与阿尔都塞及其

他认为本质概念在现代科学中“不起作用”的哲学家们论战，提出了本质（例如人的本质）是“关系和过程”的概念。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一书的出发点和基本点。塞夫认为，如果说全部以往的哲学把本质、一般、理性理解为某种从中产生出不可解决的形而上学对立的东西（本质——现象、一般——特殊、理性——感性），那么辩证唯物主义思维的特点就是把本质理解为关系和过程。他写道：“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第一个‘要点’：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专门概念不是事物的概念，而是关系的概念。”[99]例如，资本是生产关系，国家是经济关系的集中，意识形态是人们对其生存条件的关系，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哲学的特殊对象是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等等。

近来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争论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性质和地位的一般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其他部分和现实本身的关系问题。Л·塞夫在《列宁和科学实践》讨论会上做开幕报告时用了很多时间谈这个问题，他批评了以前存在的“对辩证法的假唯物主义理解，它认为辩证法以其逻辑形式存在于事物本身中，幼稚地使辩证法‘归化于自然’，实际上是一种思辩的理解”；这种“歪曲既给科学实践也给政治实践造成了危害”[100]。塞夫说，辩证法既不是纯粹主观的，也不是直接客观的。它的规律和范畴（与物质或反映的范畴一样）不同于部门科学的甚至最一般的概念。“这是不直接涉及存在，而是涉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或作为思维对象的存在的规律和范畴；它们都包含有认识论的方面，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它们只有主观的和方法论的意义。按哲学说，辩证法不是本体论，而是借助批判的认识论走向客观本质的道路。它的对象不是直接就其本身而言的‘世界’，而是客观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的基本范畴和规律。”[101]所以，用塞夫的话说，辩证法应该研究的与其说是某门科

学的内容，不如说是科学本身及其历史，与其说是某一政治斗争的内容，不如说是这一斗争本身及其发展。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辩证法扼要描述出认识、实践、任何过程的普遍发展形式呢？可不可以把它定义为一种“知识的考古学”（M．福柯的术语），即“关于在客观上指导自然和历史科学实践的理论基础的科学”[18]呢？这种观点是《列宁和科学实践》讨论会的参加者之一Ж．К．米歇阿提出的，它在专门组织的《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地位》讲习班上引起了新的讨论。[19]

还发表了别的一些引起讨论的观点。按照其中一个观点，辩证法作为关于联系的科学应该研究现象的各大领域之间以及存在和思维之间的主要过渡。按照另一种观点，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成为严格的科学，应该使它具有一定的形式。这一想法是И．Б．加斯托夫特在同一次讨论会上提出的，他谈到的理由中，有一点是现在有人试图赋予黑格尔的逻辑学以一定的形式。但是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也出现了直接相反的观点，即根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统一的辩证法，因为辩证法只在各种不同的现实和认识领域以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现实地存在着，不可能“以纯粹的状态”从那里分离出来。这个观点在Л.塞夫的报告中受到批评，然后稍后又被提出来讨论。

在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心组织了一组讨论性质的公开讲演，以后在《论辩证法》的共同标题下出书（一九七七年）。这些讲演中的第一篇的作者Э．巴里巴尔，正好提出了辩证法极其具体、不可能把它从不同具体领域中抽象出来的思想。他把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对辩证法的不同理解联系在一起。他对表明辩证法本身内部矛盾性的各种不同客观主义性质和主观主义性质的“偏向”提出了自己的分类，并且认为这一切偏向产生的根源在于

"唯物主义辩证法（至今为止）以阶级斗争为自己的对象，同时本身是阶级斗争的形式"[38]。矛盾范畴是辩证法中的中心范畴。然而按照巴里巴尔的看法，不存在矛盾的哲学"模式"。矛盾应该总是按其特殊性来研究，而普遍哲学范畴之间的矛盾（主体——客体、必然性——偶然性等）则是唯心主义辩证法所特有的假矛盾。

Э. 巴里巴尔的主要对手是Ж.-П. 科顿。他在标题为《能否把辩证法'分离'出来？》的讲演中，既从理论方面又从历史哲学方面考察了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巴里巴尔（追随阿尔都塞）把哲学的抽象与部门科学的抽象区分开来，那么科顿则从这样的原理出发（贝斯也强调这一原理），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因此它的抽象也和其他的科学抽象一样与具体现实有关。"全部问题在于以非亚里士多德方式来理解这种规律的普遍性与'特定场合'的局部性之间的关系"。按照科顿的看法，哲学的辩证范畴与部门科学的概念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反映现实各大领域之间的一般联系，形成一种记录下思维在一定"认识论领域"范围内的一般运动的"共同理论概念"。

在这组讲演的其他几篇中也包含有有趣的看法。例如，Ж. 拉比卡把注意力放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上，根据列宁的一系列著作考察了这个问题。П. 热格列探讨自然辩证法、物理学中所研究的辩证过程。Ж. 特克西埃就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与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论战。最后，Г. 贝斯阐述了辩证法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在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中的表现。Г. 贝斯在自己的讲演中，也和在开幕词中一样，表示反对"象唯名论那样"贬低普遍规律，反对把哲学归结为认识论，强调指出一般和特殊、实践和理论的辩证统一、相互渗透。

认识理论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对认识问题感兴趣。他们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乐观主义，把

它作为"现代理性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非理性主义、不可知论、蒙昧主义相对立。为此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法国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性。

还必须捍卫列宁的反映论，反对资产阶级哲学家、然后是修正主义者勒费弗尔和加罗迪的攻击。加罗迪以前自己捍卫过反映论，在六十年代开始特别强调认识的能动性、创造性，象其他修正主义者一样得出了这种能动性与反映不能相容的结论。他在《列宁》（一九六八年）一书中把列宁的《哲学笔记》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立起来，把事情描述成这样，仿佛列宁本人拒绝了反映范畴，而代之以"认识过程"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者Г．贝斯、Л．塞夫、Ж．-Ж．戈卜洛、M．西蒙、Д．勒库尔等人对这种修正主义的伪造进行了回击。他们证明了列宁在他的两部基本哲学著作中的立场在原则上的一致，强调指出了反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例如M．西蒙写道，如果意识不被理解为反映，那么"社会实践，特别是政治实践便失去一切合理基础。那时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落后）就与社会物质基础的变革无关，意识形态就根本失去阶级根源"[①]。Л．塞夫在《差别。列宁主义概论》（一九六〇年）一书中对勒费弗尔的观点进行了类似的批评。

在Г．贝斯的《社会实践和理论》（一九六三年）一书中，对马列主义认识理论的基本原理作了正面的阐述。作者在这本按古巴同志的要求为教学目的撰写的小书中，把注意力放在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上，认为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差别。书中阐明了（包括利用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实践作为认识的出发点、从感性阶段向理性阶段过渡的必要中介环节以及真理的标准的意义。贝斯写道："实践是认识之母。所以，有组织的革命运动在每个发展阶段上的任务之一、就是为认识和

解决历史为劳动群众提出的问题创造最适当的实践条件。群众在自己的实践中学习，而列宁党的作用不仅在于依靠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阐明这种实践，使它变得可以理解，而且在于从客观条件出发，发现使群众自己能够提出和解决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的具体经验。”[107]

从六十年代后半期开始，认识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成了讨论的对象。这些讨论是围绕着阿尔都塞及其追随着的著作产生的，因为它们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格科学性的要求，并且把这种要求与经验主义对立起来。同时产生了如何对待法国认识论学者巴歇拉尔、柯伊列、康吉叶姆、福柯关于科学的历史和理论的研究著作以及以列维－斯特罗斯为首的结构主义学者的著作的争论问题。于是，在认识论问题的讨论中重心就转移到了科学认识的问题上。

在法国认识论学者的研究著作中，强调指出了科学与日常知识不同的特征，阐明了科学在产生时要与这种日常知识决裂。同时要克服“认识论的障碍”，然后它在一个单独的理论平面上发展，在这个平面上不时发生彻底的结构改组，这就是理论综合所引起的科学革命。科学认识每一次都是从先前的知识及其问题开始，而决不是象把科学认识与日常知识混为一谈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所设想的那样从直接感性认识开始。

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总的说来高度评价法国认识论学者的著作，虽然也指出它们的一些薄弱方面——对意识形态因素估计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把科学史与按唯物主义理解的社会史分割开来。阿尔都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利用这些著作作为出发点，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对经验主义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科学认识理论。

首先他强调必须明确区分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并且克服经

验主义关于认识过程是与现实对象本身打交道的幻想。实际上，科学的认识过程（“理论实践”）是从以前的认识、从以前关于现实对象的观念或概念出发，它把这些观念或概念改造成为一个新的概念总体，即建立一个新的认识对象，这一新的认识对象以后又被改造成为新的知识。阿尔都塞说，“知识的生产”就是这样进行的。

科学认识的过程与物质生产的过程及其他改造性的实践相同。原来的“原料”借助一定的工具被改造成为一定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原料”是以前的知识，工具是研究方法，而产品是新的知识。在所有三个环节上都是观念或概念，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即某种“一般”。

在《读〈资本论〉》一书中，阿尔都塞和他的追随者在细心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是如何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概念的。总的说来，这个过程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表现为与经验主义的理论框架决裂（“认识论上的断裂” 和在新的广阔的；多层次的、有辩证联系的非经验主义理论框架中建立起新的认识对象（《资本论》中的“思维具体”）。

阿尔都塞说，马克思就是这样进行了伟大的科学革命，仅次于在古希腊建立数学的革命和在近代建立古典力学的革命的历史上第三次科学革命。这三次革命中的每一次都为科学认识开拓了整个大陆，在那里创立了成套的数学科学、物理化学科学，最后又由于马克思的发现创立了成套的社会科学。这些伟大的科学革命也引起了哲学中的革命——建立了古希腊的哲学、近代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108]。

在这一相当严谨的科学认识和科学史理论中，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新事实、感性认识、意识形态、实践的作用是什

么，为什么发生科学革命等。实际上这里只谈到了新科学知识“生产”的内部机制。后来，阿尔都塞和他的追随者M·费尚、M·佩歇、Д.勒库尔等人对此作了补充和修正[109]。例如，说明了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相互作用，提出了革命意识形态对科学的积极影响的问题。阿尔都塞在《自我批评材料》中强调指出，只有马克思由于提出新的实践任务，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才为他完成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创造了条件。

但是，正象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一九六七年以后的时期中，阿尔都塞重新考察了自己对哲学的理解，把科学认识的理论即认识论从哲学中取了出来，承认它是一门具体科学。哲学被定义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失去了自己的认识对象，显然也不能从事对日常认识的研究。阿尔都塞完全合乎逻辑地建议放弃哲学的认识理论（他提到的理由中有一条是，这个名词本身是新康德主义者提出的）。这意味着，如果说以前研究认识的是哲学家，那么现在则应该是具体科学——心理学、生理学、认识论、科学史。而唯物主义哲学的任务则是与对认识理解中的唯心主义歪曲，特别是那些在哲学认识理论的幌子下堵塞具体科学研究道路的歪曲进行斗争。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正是这样做的。按照阿尔都塞和勒库尔的看法，虽然列宁在这里按照传统谈到认识理论，但是他并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认识理论，即例如对从感性阶段向理性阶段过渡提出说明的理论。他只限于“关于认识的论点”，即批驳经验批判主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最一般的哲学原理。在这些论点当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反映的论点，而且这种反映是过程，反映不是主体和客体的镜子般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同一[110]。

在由于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的理论而受到讨论的问题当中，

可以举出两个主要的问题：关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和关于列宁的认识概念与经验主义的关系问题。Ж．米约和其他几位哲学家指出阿尔都塞对感性认识估计不足。可是这种认识从哲学观点看极为重要，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它也极为重视。因为正是通过感性认识实现意识与现实的直接联系，在认识活动中表现出物质作用的第一性。

然而，对认识这一方面的强调特别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列宁的认识概念不是象列宁主义的许多资产阶级批评者所断言的那样，是与十七—十八世纪的认识理论类似的经验主义感觉主义的认识理论吗？无论是阿尔都塞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是一致的：不，这一概念不是这样的。而他们提出的论据各不相同。从阿尔都塞的观点，列宁走上经验主义的立场，是受与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者进行哲学斗争的逻辑所驱使。然而，列宁在经验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议论问题时，把传统经验主义的概念“颠倒过来”了。（顺便提一下，阿尔都塞一般都是用必须站到对手的立场上来解释任何哲学的内在矛盾性。）勒库尔指出，当把哲学原理与具体科学说明混为一谈时，就产生出经验主义的假象。米约和其他几个哲学家强调指出，在列宁那里，认识论范畴、特别是反映论范畴具有抽象的性质，并没有专门经验主义的或感觉主义的概念（如印象、痕迹之类）。但是，不言而喻，这一切再一次提出哲学方法和具体科学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科学和哲学的联系问题。

哲学和局部科学　在哲学和具体科学的相互联系方面，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做了不少工作，积累了大量经验，使得有可能既考虑到成就，也考虑到缺点。在成就方面，首先应该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也许比任何其他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更多的科学家站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力求把具体科学研究与有意识的辩证

唯物主义方法结合起来。在这些科学家当中，首先应该提到杰出的物理学家П．郎之万和Ф．约里奥一居里、天文学家П．拉贝伦和Э．沙茨曼、矿物学家Ж．奥尔塞尔、心理学家A．瓦隆和他的一大批学生、语言学家M．科恩和Ж·杜布瓦、历史学家A．索布尔、Щ．巴伦、Ж．П．维尔南、П．维拉尔 。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盟在法国三十年代就已开始建立，当时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个标题下出版了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两卷著作（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年）。在一九三九年，П．郎之万和Ж·谷尼欧创办了马克思主义刊物《思想》，这是一家现代理性主义的刊物，为它撰稿的既有科学家，又有哲学家，既有共产党人，又有非共产党人。进行这种合作的另一重要机构是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以及其他机构组织了一系列学术会议、讲习班、讨论会和辩论会，使哲学家和科学家有机会在一起讨论了科学的、哲学的和社会的问题。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鲁阿约蒙举行的题为《人类将有什么样的未来？》的国际讨论会（一九六一年）、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辩论（一九六一年）和《列宁和科学实践》讨论会（一九七一年）、《郎之万和唯物主义》讨论会（一九七三年）以及从一九六一年起每年举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周。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写了一系列专门探讨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的严肃著作。这是M．普勒南的《生物学和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五年）、П．拉贝伦的《行星的起源》（一九三九年；莫斯科，一九五七年）、Г．加桑诺瓦的《数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九四七年）、Э．沙茨曼的《行星的起源和演变》（一九六四年）、Ж·吉约莫的《控制论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九六五年）、Ж．-Фр·列·尼的《心理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九七一年）、Ф．卡泽尔的《数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一

九七三年）、Э．比查吉斯的《现代物理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九七三年）、П．热格列的《论空间和时间》（一九七六年）。

在这些著作中，进行了与旨在把科学资料用于反科学目的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概念的斗争，说明了具体科学发展的辩证性质及其与实践的联系；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表现的角度分析了许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了对量子力学、相对论、宇宙学和天体演化学问题的唯心主义解释以及数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当中的唯心主义。特别有意义的是对法国著名科学家和宗教哲学家П．泰雅尔·德·夏尔丹的观点的批评（例如在生物学家Э．卡安和哲学家Л．塞夫的著作中），以及对生物学家Ж·莫诺的观点的批评，莫诺在他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一九七一年）一书中反对了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通过共同努力，对主要结构主义科学家K．列维－斯特罗斯、Ж．拉康、M．福柯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分析，而且考察了结构方法和辩证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12]。哲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者共同考察了结构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关系问题[13]。对批判理解精神分析以及与此有关的无意识问题，予以了很大的注意（例如，在Б．缪尔德沃尔夫和K．巴克斯－克列曼等人的著作中）[14]。最后，对教育、保健、城市建设、未来学、环境保护等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15]。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切积极的极富有成果的活动是在经常与唯心主义论敌对峙的很不轻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些论敌力图利用他们的每一次失误、任何一点含糊和疏漏的地方来阻碍辩证唯物主义在科学知识分子中的传播，阻止科学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接近。例如，资产阶级宣传曾设法从四十年代末对遗传学、控制论及其他科学犯的错误中得到尽可能最大的好

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提出了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科学”的论点，不久自己就对它进行了批判。然而这种错误提法的思想后果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产生影响（M．普勒南退出共产党和Ж．莫诺发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与此有关）。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为自己作出了一定的批判性结论，开始在把哲学作为方法论应用于具体科学的问题上表现得比较谨慎。正象上面已经指出的，谴责了“演绎主义”，即从哲学的规律和范畴中推演出具体科学知识的作法。“例证”方法，即从具体科学中挑出大量能证实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实例的作法，也被承认不能令人满意。为此就要求弄清楚哲学知识和具体科学知识的相互关系问题。到底应该怎样应用哲学方法？哲学为部门科学到底具体能够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么？

Л．阿尔都塞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从哲学不能为科学家解决那些由具体科学解决的问题这一正确的原理出发，提出哲学应局限于纯粹意识形态的作用。哲学作为“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它介入科学实践，应该只是为了在那里进行反对敌对哲学的斗争。在这种场合，唯物主义哲学家站在自己哲学知识的坚实基础上，不奢求解决他无力解决的问题，同时却给予具体科学研究以现实的帮助。他将清除前进道路上的唯心主义思辩，从而有助于科学问题的正确提出（正是提出，而不是解决）。

这些思想阿尔都塞在《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一九七四年）一书中阐述得更加详细。例如，他在这里谈到，每个科学家都有自己的自发哲学，这种哲学照例是矛盾的，既包含唯物主义因素，也包含唯心主义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和科学家一起为争取唯物主义因素战胜唯心主义因素而斗争。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具体科学之间的联盟正是应当建立在这一点之上。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解决这种任务这一点，其他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意。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应该只限于解决这种任务呢？这个问题是提到《列宁和科学实践》讨论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大多数讨论参加者都倾向于哲学应该对科学研究起更积极的作用。然而，对这种积极作用的更确切的定义取决于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地位问题的解决，正象上面提到的，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尽管如此，大多数讨论参加者都同意，哲学应该研究主要科学概念在意义上的演变情况，帮助科学家克服在这里产生的困难；哲学应该从具体科学中来，又回到具体科学中去。

三、对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向非常重视哲学史领域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对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主要流派的批判[16]。他们不局限于哲学史的狭隘学术兴趣，而是经常把哲学史问题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日程上的科学和意识形态问题联系起来。对各种流派都进行了大量哲学史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遗产的系统研究占有特殊的地位。专门分析法国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发展线索的著作，以及对哲学史分析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也起着重要的作用[17]。

在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斗争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力求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来证明自己论据的正确，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系统的发展是对意识形态敌人最好的回答。

在六十——七十年代，法国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发生了一系列危机的变化，使一些在战后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受到影响。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宗教哲学的各种不同

派别的影响大大下降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显著加强了。大约从六十年代初期起，在相当平静的政治形势下出现了结构主义，并且开始占据主要阵地，在人文科学的各种不同领域越来越多地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然而，在一九六八年事件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经济和社会政治性质的危机倾向，它们破坏了这种相当不稳定的科学乐观主义和指望资产阶级社会能得到"合理"革新的气氛。虽然结构主义方法并未失去对广大法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但是结构主义已不能充当对未来充满理性信念的笛卡儿传统的后继者。

出现了资产阶级哲学的各种新变种，它们七拼八凑，标新立异，以思想的极端"时髦"弥补科学性的不足，不能在世界观上把法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新哲学"[18]的产生本身，是法国在七十年代到处可以感觉到的对国内经济和社会政治过程的理解发生危机的直接后果。法国"理性"传统在欧洲大陆上的自主地位，正是在这一哲学中遭到最大的怀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政治哲学形式明显回潮，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艰涩语言被想方设法"移植"到法国的"土壤"上。一面诉诸柏格森，一面又坦率的搬用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把国内当前的意识形态形势评价为非理性主义的大举进攻。在《新评论》杂志上（一九七六年）发表了Э．巴里巴尔和Ж．Л．科顿的文章，他们不仅想要弄清楚在法国社会当前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引起非理性主义情绪"大繁荣"的原因，而且还企图制定出对当代非理性主义的各种不同形式和流派所应采取的原则的马克思主义立场[19]。

按照巴里巴尔的看法，对当前的非理性主义至少应该区分三个流派（或形式）。第一个流派是各种所谓庸俗非理性主义（大

众的蒙昧主义意识）：各种副科学概念、各种迷信的预兆、“新的”魔术和星相术的广泛流行，对各种引起幻觉的手段的迷恋，精神和道义上的“逃避现实”等等。但是这种非理性主义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资产阶级的大众文化中不是纯粹“自发的”现象，相反，它完全合理地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统治阶级放任非理性主义流传，是企图使人民群众不去真正科学地理解当代世界。巴里巴尔和科顿把非理性主义的下一个流派称作“有组织的非理性主义”（或“哲学的非理性主义”）[120]。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核心是这些主题：愿望、生命、空洞的反抗、权力、暴力等。按照科顿的看法，所有这些题目都是从尼采、海德格尔和柏格森的哲学中搬来的，散发着他们的哲学的味道[121]。

代表当代法国非理性主义的几个在思想方面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是Ж.德列兹、Ф.格瓦塔里、Ж.Ф.里奥塔尔，他们有时被称作“新柏格森主义者。”法国社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总危机在一九六八年以后的特征，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发生深刻的贬值，这不仅表现在新型的“战斗”非理性主义——“新柏格森主义”的流行，而且表现在它在政治上指靠政治无政府主义思想，换句话说，指靠所谓非党的、非阶级的立场及其行动主义的表现[122]。

按照一些批评者的看法，德列兹、格瓦塔里及其一伙人的政治语言虽然非常漂亮，他们的政治立场实质上是返回到M.施蒂纳的政治无政府主义概念[123]。在哲学方面，正如巴里巴尔指出的，这些非理性主义的职业家们提出的概念“毋宁说是反科学的、副科学的”[124]，它们利用象生物学、符号学、民族学、精神病学这种今天蓬勃发展的科学中的矛盾和未解决的问题来投机，在意识形态上予以装饰。

德列兹和格瓦塔里这伙人的著作的特别明显的、并且细心加

以保护的哲学上的秘传性质，并没有使他们的政治的和真正哲学的立场与现在臭名远扬的（而且不仅在法国）一群自称“新哲学家”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Б．－А．列维、А．格吕克斯曼、Ж．－М．贝努阿、Ж．П．多列、Г．拉尔德罗等）截然区分开来。只要看一看这些人的书取的“挑逗性的”、超现实主义式的名称，就能理解它们是迎合什么样的读者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写的了:《带有人的面孔的野蛮》(Б．－А．列维）、《仇视思维》（Ж．П．多列）、《逻各斯的暴政》（Ж．－М．贝努阿）、《厨娘和吃人者》（А．格吕克斯曼）。“新哲学家们”积极利用了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的传统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思想。他们所接受的非理主义者的虚无主义、挑衅式地提出的反抗理性的口号——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对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而他们的“精神”财富性质有点不同：这首先是反马克思主义和疯狂的反苏主义。正因为如此，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的“非理性主义”评价为赤裸裸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掩饰形式。

尽管“新哲学家们”提出的历史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明显地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并且违反科学，法国共产党人还是完全意识到这种反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带来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危险性。因此，Ж．马歇在法共二十三大的报告中对“新哲学家们”的政治和世界观立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不是偶然的。他说:“只有瞎子才看不见。无线电和电视、报刊和出版社是在什么条件下并且怀着什么目的在共同纲领作者竞选期间把所谓‘新哲学家’放出笼的。‘新哲学’的中心思想在于任何革命都既不可能，也不需要，什么也不能相信，什么也不能希望……这些作者说‘神话已经死了’：如果相信他们的话，那么科学‘已经死了’，马克思‘已经死了’，社会主义‘已经死了’，不仅是在它存在的那些国家里，而且作为所有国家的可能性和具体期望也

同样‘已经死了’。然而，如果把社会主义作为神话抛掉的话，那么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以外，人们还有什么出路呢？”[125]

当代非理性主义的第三种类型在巴里巴尔和科顿的文章中被称作“科学家的非理性主义”[126]。这里指的是研究科学家的‘自发’哲学和加深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世界观形成的影响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由阿尔都塞于一九七四年在《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中提出。）正象科顿指出的，科学家的“非理性主义”（“不相信科学”、“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基准抱怀疑态度”等）通常是由于某些复杂的科学问题暂时得不到解决，在专门科学知识领域发生危机而产生的[127]。正因为如此，正如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与当代科学实践的复杂联系中，作用不断增长。

在六十——七十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研究中继续对批判和系统分析结构主义和认识论的科学理论、文化理论和个性理论极为重视[128]。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和传统的法国“认识论”学派（巴歇拉尔、柯伊列、康吉叶姆等人）互相促进，至今还是法国当代人文科学最富有成果和最有影响的领域。

最近，M．福柯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福柯可能是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认识论”学派最突出的代表。他在最后的一部著作《监督和惩罚。监督的诞生》（一九七五年）中分析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司法和国家结构，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研究限制在权力和认识的相互关系的技术方面（惩罚制度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必须对国家权力、统治阶级、阶级矛盾作具体历史的分析。福柯理论的这一薄弱方面深受某些“新哲学家”的欢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科顿和勒库尔正是把批判的重点放到这上面。勒库尔指出，由于福柯采取这种立场，马克思在他那里成了“剥削的理论家”，并没有创立政权的理论[129]。

作为认识的权力主题本身与尼采的权力概念相呼应。福柯把尼采的思想运用于文化史领域，他认为，关于人的科学的现代面貌的形成系根据一定的司法“原型”：权力技术（监督、惩罚等）是那些导致建立现代人文科学的认识程度的基础[30]。

对福柯最后几部著作的讨论和批判分析，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才刚刚开始，当然将继续下去。因为福柯的著作对法国的精神和政治形势的影响，有时是消极的影响，决不能低估，特别是在今天，权力和政治行动、阶级矛盾和司法政策的问题成为广大公众注意的中心。

最近十年来，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中可以看到对研究意识和个性理论的根本问题的明显兴趣（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语言和思维在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的过程中的相互联系、心理定向和有意识定向在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中的变化问题等）。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对精神分析理论及其现代解释（Ж．拉康）非常注意，并不是偶然的。关于精神分析在社会科学体系中可能占什么地位、它在精神病学中有何实用意义、它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问题，在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成了尖锐讨论的对象。

阿尔都塞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头几个企图重新提出和解决“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人之一（在Ж．波利采尔的著作之后）[31]。能不能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的科学理论意义（理论的对象、概念手段等）与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中同精神分析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反动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弗洛伊德本人也在不小的程度上用《图腾和禁忌》、《我和它》、《文明的微恙》这种文化哲学的著作促进了这种反动意识的流传。）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见，精神分析学家Ж．拉康着手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而通常，正是把他的著作同所谓法国弗洛伊德的概念联系在一

起[132]。

拉康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解释，当然与那个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从具体科学“移植的”术语（生物学的、唯物论的、生机论的术语）以进化论语言说话的弗洛伊德无关。弗洛伊德的思维虽然与这些概念有关系，但是它们在他的理论中不起与自己的现实意义相符的认识作用，而且还带有弗洛伊德那个时代的、他作为一定科学时代的学者所不能回避的意识形态的痕迹。正如阿尔都塞认为的，拉康坚决克服弗洛伊德理论“语言”的自然主义局限性，使得他有可能提出建立关于无意识的心理过程（人的个性形成的基础）的“精确”科学的问题[133]。

阿尔都塞重新思考拉康“阅读”弗洛伊德的经验，得出结论说，把弗洛伊德的“科学发现”与它的反动含义区分开来是完全可能的。他写道：“然而今天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者本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成了他们所揭露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头一批牺牲品，因为他们把这种意识形态与弗洛伊德的革命发现混为一谈，从而在事实上同意了自己论敌的观点，接受了他的条件，并且承认了他强加给他们的概念是真正的精神分析。”[134]

但是阿尔都塞是否正确呢？无论如何，塞夫在分析弗洛伊德的意识形态追求时，保留了不同意阿尔都塞以及与他观点接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利。弗洛伊德明显地力求把精神分析方法扩展到对人的综合研究的一切领域，这不是“偶然的和纯粹表面的”作法。塞夫确认波利采尔的观点是正确的[135]，他指出，“弗洛伊德和大多数后期的精神分析学家在研究人类存在的一般概念时所犯的主要错误正好在于，按照他们的看法，可以‘用心理学解释历史，而不是用历史解释心理学’”[136]。塞夫并没有取消关于精神分析的对象及其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的问题，相反，按照他的看法，只有在精神分析应用的对象领域完全摆脱最精巧的意

识形态追求时，才能明确地指出这一对象领域[137]。

所以，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整个说来不接受拉康的研究精神状态和意识形式的方法，虽然也承认它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要的成就。拉康在自己的著作中自始至终没有跨出重要的和必要的一步：他没有考虑到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而把自己封闭在“语言——身体”的圈子里，把注意力集中于分析无意识的个体化语言的个别象征的形成，仿佛这些象征完全不受中介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

按照大多数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研究意识和无意识的形式结构方法的消极后果，使得不大可能对个性在其早期发展阶段的形成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结果，“对这种形成过程进行研究的辩证法就被偷换成这样一些‘解决办法’，它们的特点是为了‘一般人性’问题而牺牲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的主题，至于这个‘一般人性’是由上帝决定还是由现代所说的遗传秘码决定，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138]。

《新评论》杂志组织了题为《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一九七〇年）。参加讨论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后来的一切精神分析流派的主要特点，在于赋予家庭关系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形成以过分夸大的意义（俄狄浦斯情结），而且在考察家庭关系时采取片面的方式，离开形成家庭的具体历史过程，不考虑在不同阶段渗透和决定家庭关系结构的各种复杂的社会生产联系。一位讨论参加者以下列方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整个说来，我认为：家庭问题应该换成社会个人在这个历史社会缩影中再生产的更一般的问题。既然家庭的具体历史结构的组织方式归根到底由任何社会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决定，家庭内部的关系占有重要的、然而是从属的地位……[139]。

格林和列克列尔克在讨论中企图论证家庭内部关系在个性结

构中的特殊的和独立的地位，甚至赋予它以某种“超时间”的结构主义，塞夫在回答他们的论据时指出，具体个人的形成既不能归结为生物性的喜爱，也不能归结为生育者和被生育者的关系，而应该与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有关。如果的确存在某种类似秘密规律的东西，那么它应该掩藏在生产关系中。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只是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形成的科学，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是“个性的历史社会形式的理论”[140]。

到七十年代末期，在法国开始感觉到那种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被说成是K．波佩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新实证主义日益增长的影响。波佩尔的书被匆忙地翻译出来，大量出版，在法国各大学中进行研究。如果说这种影响在法国有强大传统的哲学和科学史领域远不是无条件的，那么波佩尔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妄图充当新的欧洲社会改良模式的哲学史概念则被右翼社会党理论家所采用。应该指出，“批判理性主义”已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官方教义之一。

在法共二十三大上，Ж．米约极其尖锐地提出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击新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侵略”以及统治集团利用波佩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教义的企图的问题，这些统治集团认为这种教义由于“温和”和主张“政治改良”，似乎能够医治现代法国社会的创伤，而无须利用“极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它进行根本社会改造。[141]《思想》杂志有一期（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份）几乎完全用于对波佩尔概念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批判分析。作者们不局限于只消极地批判“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而且还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正面的研究。[142]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法国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研究社会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问

题、对批判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哲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系原则的创造性发展，为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崇高科学威信的加强以及它在法国国内外现代社会知识各种不同领域的影响。

---

1 《共产主义手册》1982年第2—3期第25页。

2 《共产主义手册》、《思想》、《新评论》、《革命》、《莫里斯·多列士研究所历史手册》、《经济和政治》、《巴黎公社》、《学校和民族》、《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心手册》。

3 《人道报》、《人道报星期日刊》、《环球报》。

4 参看M．多列士在法共十一大、十二大、十四大和十五大上的报告（《选集》，莫斯科版第2卷），以及他的著作《人民的儿子》（1960年莫斯科版）等

5 参看：B．罗歇《文章和演说选集》1972年莫斯科版第383页；《共产主义手册》1982年第2—3期第66页。

6 《法国的社会主义：1976年2月4日至8日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1976年巴黎版第69页。

7 Ж．马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及其民主变革》，载于《共产主义手册》1976年第4期第19页；《使国家机构民主化》，载于《共产主义手册》1977年第7—8期。

8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法共二十四大决议》，载于《共产主义手册》1982年第2—3期第351页。

9 参看Ж．马歇《民主的挑战》1973年巴黎版

10 参看：《法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法国人民联合起来争取民主变革》，载于《共产主义手册》1974年第11期；Ж．马歇《法国共产党的政策》1974年巴黎版；P．皮凯《法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今日法国》，载于《共产主义手册》1974年第10期；J．法戎《马克思主义和法国人民联盟》载于《共产主义手册》1976年第12期。

11 《法国的社会主义》第10页。

12 同上

13 Ж．马歇《民主的挑战》第99。

14 参看A．阿德勒尔、Ф．柯恩、M．德卡伊约、P．弗里乌、Л．罗贝尔《苏联和我们》1978年巴黎版。

15 参看E．阿姆巴尔楚莫夫、Φ．布尔拉茨基、Ю．克拉辛等人《反对歪曲现实社会主义的经验》，载于《共产党人》1978年第18期。

16 《苏共二十六大材料》1981年莫斯科版第17页。

17 Ж．艾伦施坦以其反党声明使自己置身于党之外，按照法共巴黎市委决议1980年被开除出党。

18 《法国的社会主义》第86页

19 参看Ж．法布尔、Φ．恩克尔、Л．塞夫《共产党人和国家》1976年巴黎版。

20 参看：《人道报》1976年1月22日；Э．巴里巴尔《论无产阶级专政》1976年巴黎版；Л．阿尔都塞《二十二大》1977年巴黎版。

21 《共产主义手册》1979年第6－7期第56页；1982年第2—3期。

22 《共产主义手册》1979年第6—7期第56页。

23 例如，这涉及到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概念的分析，说它不符合法国的历史传统和现代条件，束缚个别党的主动性并剥夺它们对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选择自由。提出用"国际团结"的概念来取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概念。在法共二十二大上还建议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名词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上保存它原来的意义。

24 《共产主义手册》1979年第6－7期第30页。

25 Л．И．勃列日涅夫《按列宁的方针办：演说和文章》1978年莫斯科版第6卷第63页。

26 参看《共产主义手册》1982年第2—3期第17—22、44页。

27 参看：B．罗歇《1968年5－6月的教训》1968年巴黎版；Ж．杜克洛《无政府主义的昨天和今天》1968年巴黎版；A．加桑诺瓦、K．普雷沃、Ж．梅泽尔《知识分子和阶级斗争》1970年巴黎版；Ц．博卡拉《论〈资本论〉的运动》1978年巴黎版；Ж．洛日金：《马克思主义、国家和城市问题》1977年巴黎版。

28 参看：A．加桑诺瓦《天主教代表会议的特点》，载于《新评论》1966年第176期，《共产党人和基督教徒》，载于《学校和国家》1971年第197期，《第二次梵蒂冈代表会议和教会的演变》1969年巴黎版，《社会、教会的危机和人民联盟》1973年巴黎版，P．勒鲁阿、A．加桑诺瓦、A．穆安《马克思主义者和宗教世界的演变》1972年巴黎版；M．多列士、B．罗歇、Ж．马歇《共产党人和基督教徒》1976年巴黎版。

29 参看Г．贝斯《共产党人和基督教徒：法国的对话问题》，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1年第12期。

30 Л．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65年巴黎版第204页。

31 同上，第208页。

32 参看Л.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50—184页。不应该把意大利流行的所谓"历史主义"同本来意义的历史主义混为一谈。它指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历史方法，而是对葛兰西哲学遗产的特定解释。顺便提一下，最近这种解释甚至受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多的批评。

33 П.皮康纳《马克思主义是结构主义的吗？》，载于意大利《抉择》杂志1971年第121期第84页。

34 例如参看格兰巴《辩证法和结构》1974年米兰版。

35 例如参看《列宁和科学实践》1974年巴黎版第25页。

36 参看Ж.特克西埃《论归根到底的决定》，载于论文集《法国马思主义者论辩证法》1982年莫斯科版。

37 Л.阿尔都塞《自我批评材料》1974年巴黎版第55页。

38 Л.阿尔都塞《答约翰·刘易斯（自我批评）》，载于《今日马克思主义》1972年10月号第316页。在这篇回答刘易斯的批评文章之后，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上展开了讨论。

39 Л.阿尔都塞《立场》1976年巴黎版第61页。

40 参看Э.巴里巴尔《论无产阶级专政》1976年巴黎版。

41 参看《思想》1976年第135期；1970年第149期。在意大利，这一讨论出了单行本，标题是："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1970年罗马版）。

42 M.戈德里埃《辩证逻辑和结构分析》，载于《思想》1970年第149期第8页。

43 Л.塞夫《答莫里斯·戈德里埃》，同上，第32页。

44 同上，第34页。

45 参看Л.塞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1980年巴黎版第194—195页。

46 参看Л.塞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第183页。

47 参看：《今天的历史》1974年巴黎版；《论封建主义》1971年巴黎版；Ж.巴伦、П.维拉尔《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以前制度中的社会阶级》1968年巴黎版。

48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有一段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十和三十年代。最初参加讨论的是苏联学者B.斯徒卢威、A.叶菲莫夫、M.科金、E.瓦尔加等。印度和中国的政治事件成了在关于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范围内研究资本主义以前各发展阶段的导火线。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从五十和六十年代到现在。讨论采取了国际的性质：除了许多苏联学者以外，积极参加的有法国马克思主义者Л.巴伦、Ж.谢诺、Ж.秀勒—康纳尔、M.戈德里埃以及民主德国学者Э.魏尔斯科普弗、匈牙利学者Ф.托凯伊等。

49 参看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各种评述：A.И.巴甫洛夫卡娅《〈思

想〉和〈爱伦〉杂志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概况》,载于《古代史通报》1965年第3期;Ю.В.卡恰诺夫斯基《国外马克思主义报刊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载于论文集《东方国家中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问题》1971年莫斯科版;还可参看:Ю·В.卡恰诺夫斯基《奴隶制、封建制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1971年莫斯科版;В.Н.尼基福罗夫《东方和世界史》1977年莫斯科版;М.Н.格列茨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法国》1977年莫斯科版。

㊿ 参看Э.塞伦尼《从马克思到列宁:"社会经济形态"范畴》,载于《思想》1971年第159期。

(51) 同上,第30页。

(52) 参看Ж.拉比卡《关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的四点看法》,载于《思想》1971年第159期第90页。

(53) 同上,第62页。

(54) 参看П.彭特《为何出这期"民族学专刊"?》,载于《思想》1973年第171期第8页。

(55) 参看П.彭特《为何出这期"民族学专刊"?》,载于《思想》1973年第171期第36页。

(56) 参看:М.戈德里埃《经济学中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1966年巴黎版;《人类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前景、道路》1973年巴黎版,1977年第2版;《一个有争议的领域:经济人类学》1974年巴黎版。

(57) 戈德里埃认为,在现代关于有阶级以前的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中,不可能回避列维-斯特罗斯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比。他高度评价列维-斯特罗斯对研究古代社会、特别是亲属结构的贡献。同时,他批评列维-斯特罗斯的结构主义分析,认为他"只揭示了亲属结构的形式转变的逻辑的一部分,而没有分析它们的职能的转变"。因此,戈德里埃认为,结构主义分析不可能理解历史,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把对亲属关系的"形式"的分析同对它们的"职能"的分析分割开了。参看М.戈德里埃《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前景、道路》第327页。

(58) М.戈德里埃《经济学中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第108页。

(59) М.戈德里埃《辩证逻辑和结构分析》,载于《思想》1970年第149期第10页。

(60) 参看Л.塞夫《答莫里斯·戈德里埃》,载于《思想》1970年第149期。

(61) 参看Р.马卡里乌斯《亲属关系和基础》,载于《思想》1970年第149期第54页。

(62) 参看Э.特勒《马克思主义在原始社会面前》1969年巴黎版第135—136页。

(63) 参看Э.特勒《马克思主义在原始社会面前》1969年巴黎版第138页。

(64) 参看Ж.秀勒—康纳尔《一种不同的民族学》,载于《思想》1976年第187第116页。

㊳ 参看П．彭特《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于《思想》1973年第171 期第96页。

㊴ M·戈德里埃《生产方式、亲属关系和人口结构》，载于《思想》1973 年第172 期第26页。秀勒-康纳尔也发表了同样否定的意见 按照他的看法，在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非洲不存在（甚至从未存在过）"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自我维持的生产方式，或'血缘生产方式'"（Ж．秀勒--康纳尔《社会科学的迫切问题》，载于《思想》1975年第184 期第11页）

㊵ 同上。

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15 页。

㊷ 参看：П．比果《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1953年巴黎版；Ж．И．卡尔维兹《卡尔．马克思的思想》1956年巴黎版；Г．李希特海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法国》1966年纽约版．《意识形态的历史》1979年巴黎版。

㊸ 参看A．德尼等人《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自己的天主教批评者》1958 年莫斯科版。

㊹ 关于这次讨论的简略介绍，参看T．A．萨哈罗娃的文章（《哲学问题》1966年第8期）和M．H．格列茨基的文章（《哲学科学》1966年第4期）。

㊺ B．罗歇《马克思主义和未来的道路》，载于《共产主义手册》1966年第5－6期第296 页。

㊻ 同上书，第294 页。

㊼ Л．塞夫《马克思主义和人的理论》第3版后记，1974巴黎版第34页。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在该书第3版后纪中还与A．沙夫和《哲学问题》杂志（1972年第4期）的书评作者进行论战。

㊽ Л．塞夫《马克思主义和人的理论》1972年莫斯科版第402 页。

㊾ 同上。

㊿ Ж．米约《马克思主义在运动中》1975年巴黎版第93页。

⑱ 同上。

⑲ Ж．贝卢安《文化、人和社会》1973年巴黎版第154 页。

⑳ Ж．贝卢安《文化、人和社会》1973年巴黎版第162 页。

㉑ 同上书，第164 页。

㉒ П．儒坎《现实的意义》1971年巴黎版第16页。

㉓ Ж．马歇《序言》，载于P．勒鲁阿《现在的文化》1972年巴黎版第10页。

㉔ Л．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40 页。

㉕ 参看：《思想》1970年第151 期；Л．阿尔都塞《立场》。

㉖ Ж．米约《马克思主义在运动中》第132 页。

㉗ B．罗歇《论文和演说选集》第149 —150 页。

⑱ Л. 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69年巴黎版第42、44页。

⑲ Г. 贝斯、Ж. 米约、M. 西蒙《列宁、哲学和文化》1971年巴黎版第50页。

⑳ Ж. 米约《马克思主义在运动中》第173页。

㉑ 《列宁和科学实践》第170页。

㉒ 关于这一点的更详细情况，参看：M. H. 格列茨基《自然界存在辩证法吗?》，载于《哲学科学》1964年第6期；Л. Ф. 叶夫麦诺夫《辩证法和革命》1969年明斯克版。

㉓ 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颠倒"问题，在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发表了大量的著作。

㉔ 《列宁和科学实践》第43页。

㉕ 参看 Л. 塞夫《对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宗教和政治经济学》，载于《哲学和宗教》1974年巴黎版。

㉖ 《列宁和科学实践》第37页

㉗ 参看 Л. 塞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第491—493页。

㉘ 例如参看：Г. 贝斯《列宁——政治思想家和战士》，载于《共产党人》1980年第1期；《对法国民族研究的进展》，载于《共产主义手册》1975年第4期。

㉙ Л. 塞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第70页。

⑩⓪ 《列宁和科学实践》第30页。

⑩① 《列宁和科学实践》第30—31页。

⑩② 同上书，第256页。

⑩③ 《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地位》1973年巴黎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心版。

⑩④ Э. 巴里巴尔《再论矛盾》，载于《论辩证法》1977年巴黎版第41页。

⑩⑤ Ж. П. 科顿《能否把辩证法'分离'出来?》，载于《论辩证法》1977年巴黎版第147页。

⑩⑥ Г. 贝斯、Ж. 米约、M. 西蒙《列宁、哲学和文化》第27页。

⑩⑦ Г. 贝斯《社会实践和理论》1963年巴黎版第54—55页。

⑩⑧ 参看M. H. 格列茨基《科学——哲学——意识形态》1978年莫斯科版第47—76页。

⑩⑨ 参看：M. 费尚、M. 佩歇《论科学史》1969年巴黎版；Д. 勒库尔《为了对认识论的批评》1972年巴黎版。

⑪⓪ 参看：Д. 勒库尔《一场危机及其赌注：论列宁在哲学中的立场》1973年巴黎版。

⑪① 参看：H. C. 普里戈达《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学者著作中关于哲学和局部科学相互联系的论述》1976年莫斯科版。

⑫ 参看：Л．塞夫《论结构主义》，载于《和平社会主义问题》1971年第5、6期；《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载于《思想》杂志专刊1967年第135期。

⑬ 参看：《今日历史学》1974年巴黎版；《民族学和历史》1975年巴黎版；Н．穆卢德、Г．贝斯、Ж．西蒙《语言、科学和历史》1972年巴黎版。

⑭ 参看К．克列曼、П．布柳诺、Л．塞夫《对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1976年莫斯科版。

⑮ 参看：Л．拉瓦列《争取对未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1974年莫斯科版；Г．比奥拉《马克思主义和环境》1975年莫斯科版。

⑯ 参看：О．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共三卷，1959—1968年莫斯科版；Ж．拉比卡《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地位》1976年布鲁塞尔版；Д．勒库尔《一场危机及其赌注》1973年巴黎版；Л．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69年巴黎版；С．梅西埃—约萨《为了阅读黑格尔和马克思》1979年巴黎版；Г．贝斯、Ж．米约、М．西蒙《列宁、哲学和文化》。

⑰ Л．阿尔都塞在《哲学是革命的武器》（1967）、《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简单的吗？》（1975）及其他论文中，提出了哲学史分析的独特方法论原则。阿尔都塞试图提出"哲学中的阶级斗争"概念。П．马歇雷、Э．巴里巴尔、М．佩歇、Д．勒库尔曾试图加以发展。例如，马歇雷认为，哲学史作为客观历史过程，其内容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倾向斗争"。这种矛盾是"普遍的"，"本身是各阶级在哲学中斗争的结果"（П．马歇雷《被看作倾向斗争的哲学史》，载于《思想》1976年第185期第25页）。然而，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同意这种观点。例如，按照米约的看法，这种态度可以导致把许多最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在它们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科学的遗产的借口下从马克思主义中排除出去。参看Ж．米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载于《思想》1978年第202期。

⑱ 参看Л．品托《哲学的政治（1960—1976）》，载于《思想》1978年第197期第57页。

⑲ 参看：Э．巴里巴尔《以理性的名义吗？》，载于《新评论》1976年第99期；Ж．－П．科顿《今日法国的各种非理性主义》，——同上。

⑳ Ж．－П．科顿《今日法国的各种非理性主义》，载于《新评论》1976年第99期第70、79页。

㉑ 同上，第78页。

㉒ Ж．德列兹《知识分子和权。米歇尔·福柯和吉尔·德列兹的谈话》，载于《弓》1972年第49期第4页。

㉓ 参看《矛盾理论》第72页。

㉔ Э．巴里巴尔《以理性的名义吗？》，载于《新评论》1976年第99期第70页

⑫5 《共产主义手册》1979年第7-6期第72页。

⑫6 同上书，第71，79页。

⑫7 同上书，第79页。

⑫8 参看：《思想》1967年第135期；1970年第149期；Д 勒库尔《为了批判认识论》；《巴歇拉尔。昼和夜》1971年巴黎版；M 瓦德《巴歇拉尔或认识论的新唯心主义》1975年巴黎版。

⑫9 参看：Д 勒库尔《不同政见还是革命？》1975年巴黎版第76页。

⑬0 参看Ж. П.科顿《真理在过程中。关于米歇尔·福柯的几页》，载于《思想》1978年第202期第92页。

⑬1 参看Ж·波利采尔《著作集》第2卷《心理学的基础》1969年巴黎版第282—302页。

⑬2 参看《法国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结构主义研究》，载于《耶鲁法国研究》1972年第48期。

⑬3 要是不利用现代语言科学的概念，要是没有列维 斯特罗斯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和《结构人类学》(1958)等著作中所作的一系列原则结论，Ж·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是不可能的。上述这些借用也使得拉康有可能希望在建立"精确的"精神分析科学方面获得成功。

⑬4 Л·阿尔都塞《立场》1976年巴黎版第9页。

⑬5 参看《新评论》第7期第61页。

⑬6 K· Б·克列曼、П·布柳诺 Л· 塞夫《对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1976年莫斯科版第272页。

⑬7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以及拉康对它的解释）的应用和应用条件作了广泛的研究：在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中（Б 缪尔德沃尔夫）、在艺术和文学中（E·鲁迪涅斯柯）、在语言哲学和意识形态中（K· Б·克列曼）、在认识理论和人类学中（П 布柳诺）。参看：K· Б·克列曼《在精神分析中的无意识和语言》；П·布柳诺《精神分析和唯物主义》，载于《新评论》1976年第97期；Б. 缪尔德沃尔夫《精神治疗和精神分析》，载于《新评论》1976年第99期；Б. 缪尔德沃尔夫《弗洛伊德》1976年巴黎版；E·鲁迪涅斯柯《为了一种精神分析的政策》1977年巴黎版。

⑬8 K· Б·克列曼、П·布柳诺、Л.塞夫《对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第163页。

⑬9 《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载于《新评论》1970年第37期第22—36页。按照Б. 缪尔德沃尔夫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有另外的研究领域，由于是关于社会形态的科学，它也完全能够对历史个性化过程作出解释。而精神分析的对象是在家庭范围内研究个性（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构），即"人性论"的过程。所以，

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说来，“人性化”和“个性化”的相互联系问题是非常现实的（同上，第25页）。

⑩ 《新评论》1970年第37期第23页。

⑪ 《共产主义手册》1979年第6—7期第281—285页。

⑫ 参看《思想》1979年第208期第8—61页。

第 三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大利

由于意大利的特点，即工业发达的北方和农业落后、工业中存在大量小企业的农业地区南方之间的发展的不平衡，经常不断的政府危机（最近三十五年来意大利更换了四十多届政府，其中基督教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占大多数），右的和“左”的极端主义的增长，席卷资本主义各国的普遍危机在意大利表现得最尖锐。

这一危机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特点是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压缩生产的趋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进攻，而且这种进攻首先表现在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的加强。意大利企业主力图不惜一切代价提高生产效率，采取在解雇工人的威胁下强化工人劳动的方针，缩减用于劳动保护和安全技术的所谓“非生产费用”，结果是工业和农业中的生产性外伤率提高了。在国内，价格不断上涨，失业大军不断扩大，通货膨胀率不断提高。

国家所经历的危机也不可能不反映到政治生活上。意大利反动派炮制出旨在造成国内不稳定局面和建立“强硬政权”制度的计划。危机具有了下述特征：反共主义宣传的猖狂，政府对新法西斯主义分子的纵容，来自右的和“左”的极端主义分子的恐怖主义的增长。

危机的消极后果同样也在精神领域中表现出来，表现为伦理

价值的蜕化——这种蜕化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国内犯罪率的不断上升。危机也改变了信教者的思想倾向，引起了他们的分化，造成了淡漠情绪和弃权主义。

为加强工人阶级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同盟而展开的斗争，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攻劳动人民的权利、分裂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企图的反击。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按其规模来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为可观的一个。最近十年来，意大利参加罢工运动的劳动者人数，比所有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者的总人数还要多。最近几年来，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其中有关于劳动者在企业中的权利的规定、禁止进行政治罢工的法律的取消、选民的选举法定年令降低至十八岁以及其他许多成就。

意大利共产党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显著的作用：实际上，劳动者的所有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行动都是由意大利共产党组织并领导的。共产党员在下议院、上议院、工会和企业中进行积极的工作，参予国内许多领域的领导（所谓的《红色委员会》）。

意大利政府没有能力使国家摆脱慢性的危机，因此全国面临的问题是必须组织起一个包括意大利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民主力量参加的政府来改变现状。意大利共产党人进入政府的可能性使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极其不安，而在国内，各资产阶级政党又反对意大利共产党人进入政府。以基督教民主党为支柱的垄断资本力图损害意大利共产党的名誉，引起劳动群众对它的不信任，力图分裂左派力量。

意大利共产党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积极参予，以行动来对政治问题作出反响的必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哲学研究的特点，这就是对社会发展问题的优先注意。这也是由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统所决定的。

A．拉布里奥拉以及后来的A．葛兰西和П．陶里亚蒂把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方面（拉布里奥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制定的社会发展理论，葛兰西提出的“领导权”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的概念，陶里亚蒂制定的“结构改革”政策）。就是在今天，意大利共产党人主要还是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此外，在最近几年里，除分析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这样一些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之外，还出现了一系列著作，它们的作者力图扩大所研究的问题的范围。出版了研究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问题的著作，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问题得到了详细研究。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分析了国内外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理论。

为了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意大利共产党人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主要的形式是举行科学理论会议以吸引来自其他政党和国外的学者[2]。广泛地利用了会见记者（座谈会）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这些会见中阐述自己对共产党刊物[3]和资产阶级出版物上的现实哲学问题的看法。

必须指出，在意大利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当然不仅仅是共产党员哲学家。就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进行著述的还有社会党人哲学家，他们主要是在意大利社会党的政治理论刊物《劳工世界》上发表东西。在所谓独立派哲学家出版的刊物（其中有《抉择》和《皮亚钦蒂尼手册》）及其他出版物上，发表了许多研究性著作。本章的任务不是分析这个国家所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党员哲学家的主要研究活动上，而且不追求面面俱到，不想把意大利的共产党员哲学家所分析的全部问题都包括进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大利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处在不断的发展中，昨天强调的论点不同于

今天强调的论点。全面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战后意大利的发展历史，这是进一步科学研究的任务。

一、对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研究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论成果，首先是“领导权”的概念．是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多数研究著作的基础。葛兰西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的断裂的思想为根据，从下述思想出发，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间也存在着薄弱环节，意大利就是例子。他认为，“强有力的环节”在统治阶级不能以应有的方式治理国家．而占大多数人的阶级成为领导阶级的情况下可能被削弱。

这一原理是葛兰西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的核心。葛兰西在自己的著作，特别是《狱中札记》中把相当大的注意力放在政权和国家、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他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在意大利采取“阵地战”的斗争形式，也就是说，必须采取和平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这一点在具体的历史时刻需要的时候并不排除武装起义——“运动战”。

葛兰西认为，在阵地战的条件下，本国工人阶级面临着复杂的、极为重要的任务——它在获得政权以前就已经应该成为领导力量、而这种领导应该是获取政权本身的根本条件。他写道：“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为两种形式、即‘统治’的形式与‘精神’领导和道义领导的形式”④。第一种形式是对敌对集团而言的．第二种形式，也就是“精神和道义领导”，意味意领导权——葛兰西的学说的核心，而且从葛兰西所制定的“历史联盟”概念中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首先建立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后建立起政治领导权⑤。

许多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领导权”这二个概念之间有着深刻的继承性。他们着重指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所强调的不是暴力，而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领导作用，也就是领导权。但是，在意大利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中“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消失不见了。

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必须有一个“能够说明阶级的经济地位和阶级意识、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极其复杂的关系”[6]组织中心和领导中心。党就是这样的中心。在葛兰西看来，党是给阶级灌输最终目的意识的“集体智慧”。与此同时，“党把传统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这一方面，从而能够领导除工人外还包括农民、技术劳动者、知识分子”[7]在内的人民力量阵线。根据卡·马克思和弗·伊·列宁的学说，葛兰西把党看作不仅在自觉制定政治路线、而且在精神领导和道义领导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的革命主体。没有党，理论和实践就没有可能统一，从属的阶级就不能获得独立，也不可能实现自己成为领导者的能力。

葛兰西关于党是“集体智慧”的原理在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得到了应用。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研究所所长H. 巴达洛尼写道：“党作为一种历史意志在成长和成熟的结构，在它那里实现着现实和应当、现实和思想之间的融合过程。知识分子，也就是党的领导者，促进着这一融合过程，于是这一过程越出党的界限，渗入到极其不同的各个社会集团，在那里意志发生改变，在质的方面有所失，但在量的方面却有所得”[8]。这个综合体，或者说“制度化的结构”，表现为潜在革命力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是一个“使得对改造社会的渴望有可能发展的多边结构”[9]。

葛兰西和陶里亚蒂指出了工人阶级在反垄断斗争中的联盟政策的决定性作用，而在葛兰西那里，联盟政策是“领导权”概念

的有机组成部分。H·陶里亚蒂写道："遵循列宁的学说，安东尼奥·葛兰西教导我们党要正确理解，工人阶级应该同哪些社会力量结成紧密的同盟，在消灭资本权力的斗争中应该中立哪些社会集团和政治集团。他不仅把雇农即工人的传统战友看作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他也把中农和小农看作无产阶级的同盟者……”[1]

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关于扩大工人阶级同盟者范围的论点，在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得到了新的解释。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者考虑到民主阵线的规模，认为工人阶级应该实现对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城市阶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1]。中央党校校长卢契安诺·格鲁皮在《团结报》上从理论上向广大读者论证了意大利共产党的立场。

格鲁皮在《统治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一文中论证了意大利共产党对当代意大利工人阶级在改造社会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应该表现的形式所采取的立场，他写道，意大利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资本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运动的形式上的越来越大规模的集中和垄断化，而另一方面则是由许多社会阶层和等级组成的极其不同的中等阶层的相当大的影响。垄断资本和各中等阶层之间的尖锐矛盾越来越驱使后者加入工人阶级的反垄断斗争。为了拯救民主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发展民主，用越来越具体的经济内容和社会内容充实民主，意大利共产党把垄断资本确定为必须战胜的主要敌人。

格鲁皮写道，在上述社会经济条件下，“出现这样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就是必然的，在这种概念中，对这一过渡的领导属于与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状况相比远为广泛和多样化的社会联盟，在这一联盟中有农村中等阶层和城市中等阶层直至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既然这样的社会联盟是复杂的，其成分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它的成分的多样性也应该在政治

层次上表现出来，表现为多数政治力量和运动可以共同领导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建设”[12]。

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如此复杂的统治联盟中，内部矛盾（例如，工人和小企业主或者中等企业主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如此，格鲁皮认为，正是由于复杂性和成分的多样性，“这样的联盟只有在甚至能给这一联盟的任何一个成员提供转向反对立场的可能性的自由民主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因此，必须确认采取一般反对立场的权利”[13]。

格鲁皮接着写道，人们为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周围建立起新的统治联盟而进行斗争时，是意识到“民主和社会主义、劳动者以及人民群众的斗争和民主制度的作用之间的联系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密，“意识到必须在最广泛地发展民主……扩大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自由的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的”。“正是在这种同经济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基础上，工人运动，而首先是意大利共产党，在统治的联盟中引起了危机，新的统治联盟的建立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却在不断前进”[14]。

格鲁皮接着写道：“由于对工人阶级和劳动者获得政权、社会主义建设本身有了新的概念，自然就出现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迄今为止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拒绝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过去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葛兰西就已经用“领导权”这一术语来表示无产阶级专政，他在这种专政中力图强调的首先是领导的因素和争取社会赞同的因素，他所指的是革命战略，这一战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发展应该与过去革命中的战略有所不同”[15]。

格鲁皮着重指出，如果说只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建立起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具有广阔范围和多样性的力量联盟来进行争

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那么决不能以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强制来保持这一联盟的统一。“这个联盟主要应该建立在它的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之间的民主关系和民主竞赛的基础之上，而工人阶级的任务则是为保证这些关系的民主性质而斗争，为用民主方法解决联盟内部可能出现的矛盾而斗争”[16]。

当然，强制不会消失，因为不“在国家法制范围内采取坚决的、彻底的行动来反对大资本的反动的破坏力量，就不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在这种场合，强制将要由领导社会改造的整个统治联盟来实现……至于统治联盟内部，为了建立和保存这一联盟，必须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17]。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九年）重新强调了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的原则。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Э. 贝林格指出：“我们相信，工人阶级具有不可取代的领导作用。这不仅是由于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客观地位，而且也由于工人阶级在这里，在意大利，起先是在抵抗时期，后来在这三十年时间里，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活动。我们认为，在有能力完全实现这种领导作用的工人阶级身上实现政治的和思想的团结是必要的”[18]。

在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对工人阶级的联盟政策的论证明显地不同于葛兰西和陶里亚蒂著作中制定这一政策时的论述。从一九七三年起，“历史妥协”的观点成了意大利共产党的正式的战略路线，这一观点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同本国天主教力量达成合作的思想。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指出，这种政策并非总是能得到工人的理解。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政治刊物《共产党人》写道：“正如意大利共产党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在实践中实现‘历史妥协’的试图导致了党的革命形象在居民心目中的淡薄，导致了党的影响，特别是在青年

中的影响的削弱”[19]。

在今天，“历史妥协”这一概念从意大利共产党的文献中消失了，而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一九八三年三月)上，以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为基础的“民主抉择”纲领被宣布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正式战略路线。这个观点谈到了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的必要性（这一论点没有任何新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把它看作公理了），批评了社会民主党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尝试。但是，“第三条道路”的实质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并不清楚。

在深入研究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时，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未解决的问题。“在最近几年里，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思想坚持寻求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应采取何种道路这一问题的回答……但是，提出的某些论点具有假定的性质，需要经过抒验和更深入的论证”[20]。重要的仅仅是理论探索要遵循正确的方向。

二、方法论问题

从葛兰西到当代，贯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理论问题是历史主义的问题[21]。

在意大利，除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在葛兰西之前发表的某些见解之外，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历史主义”，是同葛兰西的著作一起出现的。二十年代初，在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是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历史主义。葛兰西的概念正是在反对克罗齐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形成的。葛兰西把克罗齐关于历史主义“就是确定生活和现实是历史，仅仅是历史”[22]的定义作为出发点，在克罗齐的概念的自身范围内对这一概念发动攻击，从内部展开批判，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概念的不彻底性和在这一概念中

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他令人信服地证明，克罗齐的历史主义带有神学的和思辩的性质，因为它把“精神”当作历史的主体，而不是把现实的人、阶级斗争当作历史的主体。葛兰西认为，一切现实的东西是历史，但是社会史和自然史通过劳动结合在一起。格鲁皮写道，当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历史主义时，他所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是在劳动中创造出自身的人的肯定，因而是作为历史的结果和历史的主要角色的人的肯定”[23]。

毫无疑问，历史主义态度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极为重要的和必要的原则之一，但是，这一原则在葛兰西的分析研究中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则成了唯一真正的和彻底的历史主义。

葛兰西表述了扩大的唯物主义观点，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把历史理解成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不断的相互作用和统一，而这些相互作用和统一在每个具体社会中构成特定的“历史联盟”。他坚持认为，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机制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在每一个具体场合都应该通过这一机制的棱镜来分析这些历史现象。

葛兰西的历史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大利的发展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贡献。在这种历史主义中强调的是对主体和客体、作为革命主体的党和客观历史状态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同时，这既是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也是反对机械决定论的斗争。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权正是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与此同时，在这一概念中暴露出了历史主义的实质本身所产生的片面性的因素：（1）对人和自然、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注意不够，因而对自然科学问题和认识论问题注意不够；（2）在某些场合，对社会经济结构注意不够。

历史主义题目始终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的中心，实际

上在所有的讨论中都离不开这一题目。在一九六五年展开的讨论中，这一题目受到的关注最多。参加这次讨论的有Ч．路波里尼，Д Ж．普雷斯蒂皮诺，Э．塞伦尼和У．切罗尼。

路波里尼不同意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提纲》中强调"革命历史主义"的作用，把这种历史主义看作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东西。他担心，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历史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考察各个别现象的意图，会使人不再注意这些个别现象同整个经济结构的联系。这里很明显有根据个别的、有时是偶然的事实为整体辩护的相对主义危险，因为忽略了对事实的任何批判立场所依据的牢固基准点，也就是只有靠认识在其内部发生该事实的整个结构才是可能的阶级立场。此外，按照路波里尼的意见，这条道路上，在事件在历史上出现的一次性中"淹没了"它们的重要性；但是在这种重复性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科学。

格鲁皮在分析路波里尼的观点时表述了下述看法："路波里尼如此偏重完整的体系（个别的事件应该从这一体系中产生出来并且在这一体系中得到说明），以致达到了把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分离开来的地步，由此达到了割裂理论和政治的地步，而且这种割裂恰恰会给我们希望杜绝的平庸的经验主义及其危险后果敞开大门"[24]。

路波里尼把逻辑方法同历史方法对立起来，同时否定了恩格斯关于任何方法的选择取决于方法论考虑的观点。恩格斯写道，逻辑方法实质上"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25]。路波里尼的这一论点用马克思的下述论点来与恩格斯的观点相对立："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26]。

普雷斯蒂皮诺在同路波里尼辩论时指出，路波里尼忽略了一

八五七——一八五八年《导言》中的主要论点。马克思在那里说道："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后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27]。因此，普雷斯皮诺强调指出，不是比较抽象的范畴在历史上先于具体的整体，而是比较抽象的范畴在比较简单和比较不发展的整体中的主要作用先于这些范畴在比较复杂和比较发展的整体中的从属作用。由此"不是叙述历史的'逻辑'顺序改变了'历史的'顺序，而是历史进程本身'改变了'先于这些比较抽象的范畴的过程的逻辑顺序和按时间先后的顺序"[28]。

埃米利奥·塞伦尼同普雷斯蒂皮诺一样反对路波里尼的下述论断，即在认识论方面，历史编纂学研究方法应该从属于逻辑的研究方法，他坚持认为这两种研究方法具有同等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同意塞伦尼把逻辑方法与社会学结构主义方法等同的做法，这种等同使塞伦尼最终接近路波里尼的立场。

路波里尼与阿尔都塞的立场相接近，提出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方法看作"结构主义的"。这一提法引起了包括普雷斯蒂皮诺、卡萨诺和格鲁皮在内的大多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例如，格鲁皮写道，逻辑方法"并不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从说明资本主义制度职能的那些范畴的规定出发，接着转而描述这一制度的产生过程，他在《资本论》中描述大机器工业在工厂生产、手工业和家庭经济中完成的革命以及描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过程或原始积累的起源时，也借助上述范畴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29]。

关于历史主义和由此产生的历史和逻辑之间的关系的讨论，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大利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一讨论指出了把历史研究方法的意义实在化（‘历史主义’）的危险，迫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对待历史主义概念本身，因为哲学和历史的某种等同，也就是现实和意识的某种等同（葛兰西称为‘绝对历史主义’）会导致陷入唯心主义的危险。与此同时，这一讨论促使人们更多地注意到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形态、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一些主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

六十年代，在意大利展开了关于所谓的科学的地位的讨论。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讨论，讨论中提出了两个论点。

（一）科学是社会关系的从属现象，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科学的“中立性”是当代资产阶级散布的论点，这一论点不仅就科学本身的任务、手段和目的而言是错误的，而且就科学的认识论地位本身而言，就科学的概念、认识工具而言，也是错误的；在科学的工具和科学的工艺技术的应用之间、在科学概念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科学在今天，而且在将来更是表现为直接的生产力，科学受社会的制约，从统治阶级那里得到的远不是“中性的”要求，它无论在理论前提领域中还是在自己的实际实现中，都是象能源和原料的源泉一样受某个统治阶级支配的武库[30]。

第一个论点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成了“新马克思主义左派集团”的武器。潘齐耶里[31]在《红色笔记》上阐述了这一论点。他写道：“生产关系进入资本所形成的生产力”[32]。潘齐耶里在自己的分析中求助于个别企业，“工厂”，力图在分析个别企业中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得出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他在五十年代末看到了意大利经济所经历的虚假繁荣，于是得出结论说，当代发展阶段上的资本主义不再有危机，它有能力进行自我调节，把个别企业范围的计划化转用到整个社会范围，

从而克服无政府主义。按照潘齐耶里的意见，计划化过程扩大到整个社会似乎会把社会变成一个工业企业，而全部社会关系开始转化为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总体工人——总体资本家”的关系或者“雇佣劳动——资本”的关系。现在资本主义成了“刺激科学技术进步的最大的动力”，而不再是生产力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潘齐耶里写道：“内在的矛盾不在资本的运动中，不在资本的‘内部’。资本发展的唯一界限不是资本本身，而是工人阶级的反抗”[33]。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着的生产力和抑制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由此“消失了”，而资本主义的唯一矛盾是“资本主义计划的合理性”和工人阶级的旨在反对这种计划的行动之间的矛盾。按照潘齐耶里的意见，这一矛盾的成熟程度取决于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而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不是取决于自觉的组织性，在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能力，而是取决于自发斗争的规模。

因此，潘齐耶里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归结为工人在自己的企业范围内进行的经济斗争[34]。朱泽佩·瓦卡认为，潘齐耶里在这里是力图从理论上改造工人阶级的战略，把资本理论降低到劳动过程理论水平。此外，他把阶级斗争历史的不同阶段解释为榨取剩余价值过程的工艺技术结构发生变化的机械结果，而自以为自己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内在规律：作为揭示利润规律的本质的计划规律[35]。

“工人主义”（“Операизм”）的理论家之一M．特龙蒂写道：“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高阶段上，社会关系成为生产关系的要素之一，而整个社会成为生产的要素之一，也是是说，社会发挥着工厂的作用，而工厂则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整个社会。国家政治机器在这一基础上总是力图与集体资本家的身份完全等同化，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从属现象，因

而成为资本家的从属现象。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发展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元结构的程序，不再允许形式上独立于社会关系网的政治领域的存在”[illegible]。问题的这种提法使作者只是突出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经济方面。特龙蒂拒绝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权利和必要性，认为政治领域已不再存在。Э Ж，瓦卡指出：“问题的这种提法的结果是否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问题，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为过渡国家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illegible]。

工人主义者认为，接受“生产关系进入资本所形成的生产力”的论点，会导致资本的内在的客观矛盾性的消除，导致阶级矛盾的客观物质力量的消失。瓦卡强调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新经济学的歪曲，不仅力图消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本质，把政治经济学变成对工艺技术过程的分析，不仅试图以欺骗的手段，利用典型的资本主义辩护论，硬塞进关于劳动过程的自然主义观点，而且也直接试图把唯心主义塞进马克思主义。工人主义加速了若干年后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加以发挥的观点的出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尔库塞力图按照“工艺技术思想和美国社会学的模式”[illegible]“从左面”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上打开缺口。

普雷斯蒂皮诺在分析为大多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关于科学是直接的生产力的第二个论点时，得出结论说，问题的类似提法使问题的实质简单化了。按照广泛传播的马克思所表述的论点，他拒绝把科学看作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普雷斯蒂皮诺认为，人们在这一场合对马克思采取过分直线式的态度。普雷斯蒂皮诺写道：“无论从语言学的角度还是从科学本身的角度来看，唯一可以接受的合理解决是接受直接同生产力的（基础）部分联系在一起的上层建筑概念”[illegible]。这样就有了与二个基础部分相适

应的二个上层建筑部分：与物质生产力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科学的文化的认识的作用，而与生产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意识形态的作用[40]。

格鲁皮认为，普雷斯蒂皮诺的观点的目的是要搞清楚极为重要的情况，如果科学是生产力，那么只是在特殊的意义上是这样，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其他生产力。这一观点的另一个任务是着重指出，科学与其他的生产力相比，要受到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更为复杂的影响。

这一观点是以中介环节概念为依据的，而普雷斯蒂皮诺把中介环节看作是技术这一基本中介环节。科学由于自己的应用成为生产力。格鲁皮在着重指出普雷斯蒂皮诺的观点的积极的方面时，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反对意见："普雷斯蒂皮诺在试图充分证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联系，因而充分论证它们之间的区别的同时，由于某种片面性而把生产力要素从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相当丰富而复杂的社会联系中孤立出来了"[41]。

格鲁皮认为，普雷斯蒂皮诺只把注意力放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产生出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是过去的理论家所没有避免的，他们正是把生产力的发展说成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对斗争和政治权力的决定因素没有予以注意[42]。

人所共知，资产阶级理论家和修正主义理论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普雷斯蒂皮诺力图考察科学同生产力的联系，不直接把科学归入生产力本身，是因为希望"比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论述更精确地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状况[43]，希望证明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与此同时，他清楚地看到错误解释他的观点的危险性，因为他考虑到他的观点不会轻易地使人们"避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旧的二元论的提法（批判社会学观点在六十年代重新提出了这种旧的二元论提

法）”[44]。普雷斯蒂皮诺在阐明自己的思想时引用了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马克思在那里写道，社会经济变革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表明[45]。普雷斯蒂皮诺着重指出，马克思说的不是通过自然科学来表明（这是“物理主义派”固有的特点），也不是把社会归结为自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这样做过），而是上层建筑的、理论实验性的干预，这种干预在任何认识论途径包括作为客体的社会、作为客观性的自然中都存在着，并且在社会历史（生产关系）中揭示出自然（生产力）历史的继续和发展。普雷斯蒂皮诺写道：“当我们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时，我们正是指这种旨在揭示这一客观性和这一发展的方法论方面”[46]。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政策的特点正是在于这种使人们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践效果的方法论方面。

按照普雷斯蒂皮诺的意见，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政策直接影响着生产关系并使生产关系“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地作用于生产力，而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是工人，从而为工人阶级科学地意识到自己的决定性的革命作用开辟了道路[47]。

马里奥·罗西也非常注意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他写道，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借口马克思在著作中只有一次谈到过这个问题而想避开它。罗西着重指出：“我却认为，这一区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谁不接受这一点，谁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48]。罗西接着写道，马克思在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到《资本论》为止的许多著作中都谈到了这一问题。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不仅可以知道，这些关系存在着，而且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而且还可以知道，为什么它们存在着，它们为什么服务以及它们是如何被决定的。它们同人的特性毫无关系，也不是按照肉体和灵魂的差别的类比构成，而是同生产有关，首先是同经济的生产和社会关系

的生产有关，而后是同文化、法律和政治的生产有关。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在已经过时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发展。这一冲突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导致试图寻找解决基础中矛盾的合适形式；因此，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具有解决问题的性质。

三、对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过去和现在都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使这一问题具有了现实意义。

路波里尼在批评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片面解释时提醒人们说，马克思的论点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是反对唯心主义的，指明了上层建筑形成的“最初的过程”。但是，马克思的这一提法并不排斥，甚至还要求“相反的决定”，也就是说，既要求承认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也要求承认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作用。

按照这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辩证的矛盾整体。这一整体的具体内容是：上层建筑是基础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硬性被决定的，它有各种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基础的改变不是立即导致上层建筑的改变。

格鲁皮也指出了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片面解释的不合理性。他在对恩格斯在九十年代写的书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恩格斯看到了歪曲马克思的思想的危险性，并规定了分析这些关系的方法论准则。格鲁皮认为，这一准则的内容是，经济结构制约或决定政治制度、国家机构、文化、但不是直接地决定，而只是“最终”地决定。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因此，“基础作用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作用

于基础”这种直线式的论点是不正确的，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形成的是辩证的依赖性，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作用来自基础对上层建筑所实现的决定作用，而不是相反”[60]。

二十年代初，在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是克罗齐的新黑格尔主义哲学，按照这种哲学，历史被看作是同经济基础没有联系的思想、“精神”的历史。葛兰西在同克罗齐主义的斗争中制定了“历史联盟”概念，这是“通过意识形态实现的经济基础和国家上层建筑的统一，意识形态把社会形态的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61]。

知识分子实现着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思想政治中介。如果没有这样的中介，经济统治就不可能转化为政治统治。因此，“一个统治阶级或多数统治阶级可以通过统治、暴力的办法，以及通过说服、影响和思想教育的办法来建立起使历史联盟即通过意识形态实现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权力的统一得以出现的权力”[62]。

统治阶级在保卫自己的思想的同时建立起一定类型的政治制度，并竭尽全力地使这些思想渗入到社会上各被压迫的集团中去。统治阶级利用学校、宗教、电影院、电台、电视等等来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总的说来，强加于被统治阶级的不是它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按照葛兰西的意见，“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倒是应该用“统治阶级——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63]的关系来补充。一定的意识形态的统治，这是复杂的过程的结果：在同前一个历史联盟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激烈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新的意识形态，试图改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克服它，同化它的要素。因此，历史联盟在政治上

不是单一性的，它包含着带有往往是对立利益和相抵触的利益的不同阶级，还不具有自己的世界观的被压迫阶级继承先前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意识形态、文化；与此同时，它还没有能力批判地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被压迫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后来历史地、不可避免地使它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政治作用、它在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中为自己提出的政治目标。

葛兰西经常强调说，被压迫阶级的斗争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领域。它也包括意识形态的斗争、文化领域的斗争；这里包括批判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建立应该推广到全社会的新文化。葛兰西写道："对自身的批判认识是通过对立派别起先在伦理领域而后在政治领域为争取政治'领导权'的斗争产生出来，并且在制定自己的现实概念中臻于完善的"[54]。

巴达洛尼在分析"历史联盟"概念时写道："葛兰西……丰富了列宁关于'自发性——自觉性'关系的论题"[55]。结果是"历史联盟"概念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纯经济的自发运动与自觉的伦理性政治运动融合的基础"[56]。这使葛兰西创立了"集体理性"概念。按照葛兰西的意见，对政治运动的自觉领导并不否定群众的自发运动，相反还给予它以力量："'自发性'和'自觉领导'、'纪律'的这种统一，是从属阶级的现实的政治行动，是群众的政治"[57]。在自发性和自觉领导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联系：社会领导并不消除自发性，而是弥补它的不足。

众所周知，作为第二国际滑向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原因的那些主要的理论错误之一，是它的思想家们用庸俗经济学的决定论来解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下述一段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

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58]。在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阶段，由于受到阿马德奥·波尔迪加的观点（波尔迪加主义）的影响，机械决定论占着统治地位。在这里，“历史联盟”概念是理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态度的钥匙。

葛兰西写道：“为了正确地分析那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发生作用的力量，为了阐明这些力量之间的关系，必须正确地提出和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里要遵循两条原则：（一）如果解决某些任务所必要的现实条件还不存在，或者说，如果这些条件丝毫还没有处在发展和完全形成的阶段，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在自己面前提出这些任务；（二）任何社会在它的关系内在固有的全部生活形式发展成熟以前都不会灭亡，也不可能为另一个社会所取代”[59]。

按照葛兰西的意见，在研究经济基础时必须区别相对稳定的运动和那些具有偶然的、表面的性质并且几乎是突然出现的，因而被葛兰西称为“暂时的”运动。葛兰西集中注意的稳定运动是客观的，这就是说，它们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巴达洛尼在自己的评论中强调指出：“它们的普遍性不是历史联盟……而是各历史联盟根据基础中存在的矛盾发生冲突（展开的阶级斗争）的场所”[60]。葛兰西揭示了由于错误地解释稳定的运动和暂时的运动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两个极端的认识论根源：在一个场合是“经济主义”，或者说迂腐的保守主义；在另一个场合是“意识形态主义”。“在第一个场合，过分夸大了机械原因，在第二个场合，过高估计了唯意志论因素和个人的意义”[61]。葛兰西在分析力量关系时特别指出了三个说明这些关系特点的主要因素，阶段：（一）同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取决于人们的意志的关系，这些关系使人

们能确定，在社会上是否存在着改造社会所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二）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估计各个不同社会集团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团结一致、自觉和有组织性。葛兰西又把这一段细分为三个阶段：（1）经济团体阶段；（2）社会集团所有成员的利益“在经济上达到一致”的阶段；（3）第三个阶段是主要阶段，人们随着这一阶段的到来意识到，自己的团体利益越出了纯经济集团的范围，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其他从属集团的利益。葛兰西写道：“这一阶段主要具有政治性质，清楚地标志着已经表现出来的从经济基础向复杂的上层建筑领域的过渡。在这一阶段上，先前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转化为“政党”，互相发生冲突，投入斗争，这一斗争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这些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开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62]。最后，第三个因素，这就是时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力量的相互关系。

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的上述三个阶段，构成了葛兰西的“历史联盟”的基础。对这三个阶段的分析使葛兰西能精确地阐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正如巴达洛尼指出的那样，上层建筑在今天被看作是分析客观条件的工具，在这一分析基础上人们制定出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

社会经济形态的问题始终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的中心。但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范畴的研究表现出最大关注是从一九七〇年开始的，那时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专刊》上发表了э．塞伦尼的文章《从马克思到列宁。‘社会经济形态’范畴》[63]。这篇文章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国外，也包括在法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64]。在党的刊物上发表意见的有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杰拉塔纳，他不仅就社会经济形态概念写了文章，而且还研究了过渡时期的问题，分析了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65]；瓦卡把对意大利

南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研究、对意大利南方脑力劳动工作者所处的条件的研究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结合起来[66]；路波里尼分析了弗·伊·列宁对这一范畴的发展[67]；普雷斯蒂皮诺重新提出了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关系问题[68]。过几年之后，格鲁皮回过头来分析了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讨论[69]。

塞伦尼指出，在第二国际时期，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把"社会经济形态"忘得一干二净，拒绝对作为整体的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分析，只考察生产关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变得空洞无物，把它化为经济决定论。只有列宁恢复了整体性范畴的认识论意义，把它看作中心范畴之一。

塞伦尼在分析马克思使用的术语"形式"和"形态"（"社会形式"，"经济形态"）之间的相互联系时提出了下述假说："这是从使用一个表示（静止）状态的词即"形式"（form）向表示行动状态的词即"形态"（formation）的过渡"[70]，这就是说，他力图把资本主义形态同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社会形式区别开来，着重指出它的更活动的性质。

塞伦尼对"形式"和"形态"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解释，引起了许多不同意见。杰拉塔纳坚持认为，"社会形式"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比"社会经济形态"概念更一般或者说更具概括性的概念[71]。因此，问题不在于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同先前的社会形式区别开来，而是在于从一般中区别出特殊。

普雷斯蒂皮诺参加了讨论。他着重指出，杰拉塔纳的假说只具有类比的意义。杰拉塔纳所提到的马克思著作中的那些论述倒是证明了，"在两个术语之间存在着历史编纂学辩证法所固有的语义学差别"[72]。此外，按照普雷斯蒂皮诺的意见，"社会形式"在马克思那里始终表示过去或者先前，而术语"社会经济形态"几乎总是与现在有关。因此，马克思只是在历史编纂学范围内，

也就是说，在谈论已经消失的社会经济形态时，才对过去使用“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术语[33]。

路波里尼也批评了塞伦尼的假说，他认为，在研究社会时把“静态”和“动态”进行对比是“没有根据的”[34]。他从词汇学、语文学和分类学这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一问题。

在词汇学方面，路波里尼着重指出，他认为不存在任何可以把“形式”与某种静态的东西，而把“形态”与某种动态的东西等同化的理由。他写道：“我认为十分显然的是‘form’一词可以表示发展着的形式，因而是动态的，而‘formation’一词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相反的意思，这就是说，这两个术语如果离开上下文的联系，就其本身而言根本谈不上它们的静态意义和动态意义”[35]。

路波里尼责备塞伦尼，说他错误地解释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路波里尼证明，在序言中，术语“社会经济形态”总是在单数上使用，“社会形态”则是在复数上使用，并且对单数的使用不仅在语法意义上，而且也在逻辑意义上。为什么马克思总是着重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独一无二的”性质？路波里尼认为，从马克思研究“许多‘生产方式’的历史序列”[36]（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一点可以找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每一个生产方式相应的是一定的“社会形态”，或者按照路波里尼的说法是，与一定多数的生产方式相应的是一定多数的社会形态。各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受下述规律的支配，这个规律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37]。在这里显示出了社会形态的灭亡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社会形态的灭亡并不消灭生产力，它们会转入另一个

社会形态．路波里尼写道："这就是说，在历史'时代'的间断性中应该存在着理论上可以识别的生产力的连续性（原则上是可以比较的连续性）的领域。马克思正是把这一领域称为'社会经济形态'"[78]。社会经济形态在这里是通过时代、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间断性的独一无二的连续统一体（unicumcontinuum）。因此，按照路波里尼的意见，不能象塞伦尼所做的那样把形式和形态分开，从而割断间断性和连续性之间的辩证联系。

我们在上面概述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讨论，目的是阐明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讨论带来了哪些有价值的东西。格鲁皮写道："塞伦尼的功绩在于他恢复了这样一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中，社会同由它的发展所决定的全部因素和阶段，同它的全部丰富的细节一起表现为一个整体"[79]。尽管社会形态的特征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但在相应的概念中它却拥有自己的全部表现形式。这"恰恰是列宁向我们谈到的著名提法，即赋予资本主义骨骼以血肉"[80]。

概述的作者在分析路波里尼的观点时发表意见说，路波里尼完成了十分重要的任务，他表明了，在马克思那里，在把社会历史区分为各个形态的背后是连续性原则，尽管这一连续性原则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这一原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着重指出这一点很重要，还因为"我们过去经常遇到，现在还继续经常遇到那样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否定生产力，把我们推回到早被列宁称为反动的'经济浪漫主义'"[81]。

格鲁皮考虑到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一书中重新回过头来分析这次讨论。格鲁皮在谈到塞伦尼的假说时发表意见说，塞伦尼徒劳无益地"在分析社会时在'静态'和'动态'之间划出分界线"[82]。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包括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看作是某种静止的东

西；相反，它们具有鲜明的动态性质。与此同时，格鲁皮提出了与杰拉塔纳的假说相对立的假说。按照格鲁皮的意见，术语“形态”是概括性的，也就是说，“形式”是“形态”的要素[83]。在“马克思没有想用术语‘形式’来说明某种与术语‘形态’不同的东西”[84]这一点上，格鲁皮的观点是与杰拉塔纳的观点相接近的。马克思在针对社会使用“形式”这一术语(奴隶占有制形式、封建形式等等）时，他所指的是，形式并不表示“某种外在的东西，而是，根据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传统，物质内容所固有的东西”[85]。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形式概念的目的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要素借以形成和互相作用的方式。在这一场合，形式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是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在结束对讨论的概述时，格鲁皮力图驳倒那种认为只能用马克思的思维发展过程来解释概念“形式”向概念“形态”过渡的观点。格鲁皮写道，事情不在于此，而在于马克思力图揭示社会在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过渡时的客观发展规律。在过渡时代，前一种形态的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不会完全消失，而是以转化的形式存在于后来的形态中，从属于新的生产方式。因此，格鲁皮认为，马克思没有把形式和形态分开，而是在辩证统一中考察它们：引入“形态”这一术语标志着马克思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上。

从七十年代开始，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相当重视对科技术革命和工艺技术革命的认识[86]。科学的迅速发展、电子技术的采用、自动化和控制论的成就在西方产生了幻想，以为不经过长期的和坚决的政治斗争就可以满足人的需要。出现了许多概念，如“增长阶段论”、“管理人员革命”、“后工业社会”、“技术统治社会”等等。所有这些概念都贯穿着一个企图，这就是要使劳动群众相信政治斗争没有用

处，要使劳动群众相信，无须他们的干预，“天堂自己就会来到人间”。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对科技革命、工艺技术革命的这种盲目信念的危险性。他们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科技革命和工艺技术革命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会导致何种结果，分析了这一革命的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

Д.Ж.贝林格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在《自动化与健康》、《患病的医学》、《人—机器》、《社会保险和社会的危险》、《企业中的健康》、《精神病学和权力》等著作以及文章和演说中，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丰富材料来分析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说明了科技革命的成就对人们的劳动条件、生活和健康的影响。

Д.Ж.贝林格把科学看作直接的生产力，他强调指出，科学不仅在生产方面，而且在认识方面都具有很大的意义，不仅影响经济，而且影响文化，影响社会关系总体。贝林格写道，科学在当代已经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起着“人类中心生产力的作用并且在实际上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87]。科学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由于下述因素而变得更为紧密了：

（一）发明和发明的应用之间的时间缩短；

（二）集体活动形式与人的直接劳动相比作用增大，智力与体力相比作用增大；

（三）个人科学活动向组织化和程序化过渡。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阶级对科技革命成果的利用决定了科技革命的二重性：一方面，近几年里完成的发明对人们有好处，另一方面，用于一定目的的许多发明造成了对整个人类的死亡威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自然的支配转化为对人的支配，而且“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劳动中：科学使发展计划化，生产出来的东西比满

足基本需要所必需的东西多得多。但是，统治阶级获得的'对科学的享有特权的利用'只有利于垄断性的集中，使需要变形、分工更细，使劳动群众不能决定他们在其中就业的企业的未来……"[88]

科学的多方面的活力——解放或者压迫的新工具——在全世界面前提出了新的问题。贝林格着重指出，科学的军事化、科学被利用来镇压解放运动和奴役劳动，使人对人的剥削全面化，同时又为国际范围内全体劳动者的联合创造出现实基础。

当前，劳动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联合过程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发展着。贝林格指出，与此同时，这一斗争遇到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是主观的障碍，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很难在国际范围内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统一起来，完全实现自己的解放作用；第二个障碍是客观的障碍，其原因是资本主义不仅能表现出"垂死挣扎中的痉挛运动"，而且还有能力在普遍危机的条件下克服个别的危机。贝林格提出了"科技革命和社会的革命改造"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使其他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普雷斯蒂皮诺和杰拉塔纳感到不安。普雷斯蒂皮诺写道：关于科学任务的错误意见和对科学的起积极作用的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不理解，同对物质生产上的辩证法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又同一又有差别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不理解，照例是齐头并进的"[89]。科学的实在化使许多脑力劳动工作者把科学看作某种独立的、不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东西；而这一点又会产生出错误的信念，以为科技革命不管社会制度如何会向人们提供足够的食物，战胜疾病，消灭文盲，甚至用生物学的方法改变人的本性。贝林格写道，这些人不懂得，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疾病的唯一有价值的疫苗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相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字，似乎为了消灭文盲必须在十年内耗资三千亿美元，而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例如在古巴，由于年轻人的革命激情和从事教育工作的激情，全国

在三年之内就消灭了文盲[93]。

杰拉塔纳也指出了对科技革命的盲目信念的错误。他在强调了科技革命的二重性之后写道："对科技发展可能自发地带来的进步结果的无批判的信念，会在科学的价值和资本主义条件下利用科学的结果之间的矛盾面前碰壁。这个二律背反只有通过有效的革命实践才能得到克服"[94]。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科技革命看作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并在自己面前提出任务，这就是把科技革命的成就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结合起来。

四、辩证法问题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讨论得最活跃的问题之一，过去和现在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包括黑格尔辩证法在内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原则区别的问题。决定这一问题的现实性的首先是同那种论证马克思主义与辩证法不相容的企图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的必要性。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国外，过去和今天都有人企图这样做。对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使得有可能"确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形式，而这种形式首先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的特殊性即一定的历史矛盾或客观的阶级斗争水平所决定的"[95]。

五十年代中期，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广泛传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三种解释：历史主义的解释，人道主义的解释和唯科学主义的解释。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解释中，每一种解释都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做出自己的解决。

杰拉塔纳所写的一封公开信《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关于弗·

伊·列宁的‘哲学笔记’）》揭开了关于“马克思主义——黑格尔”问题的讨论[93]。杰拉塔纳在分析了J．科莱蒂[94]为《哲学笔记》意大利文译本写的序言时，对他作出的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对立，而且与之毫无共同之处的总的结论进行了具有充分论据的批判。

杰拉塔纳正确指出，科莱蒂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掉”黑格尔辩证法，这并不是什么独创。伯恩施坦早在他那个时代就把黑格尔辩证法看作“马克思学说中的狡猾因素，对事物进行彻底分析的道路上的陷井”[95]。

问题的类似提法不可避免地使伯恩施坦站到了经验主义的立场上。与此同时，伯恩施坦与科莱蒂不同，他并没有想如此尖锐地把马克思同恩格斯对立起来[96]。这种对立使科莱蒂同索列尔的修正主义接近起来了[97]。

杰拉塔纳在谈到科莱蒂把青年马克思与成熟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的问题时写道，科莱蒂忽略了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杰拉塔纳认为，科莱蒂“故意避开这个题目，追求着完全特定的目的：他在着重指出（这是正确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质的同时试图怀疑黑格尔辩证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98]。

科莱蒂在复信中指出，他之所以要对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进行批判的再认识，那是由于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积极的改造，换句话说就是要说明马克思的科学的（历史的和理性的）辩证法的意义[99]。

杰拉塔纳在第二封信中再一次回过来讨论黑格尔的辩证法问题，并指出科莱蒂在阐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时试图把它同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详细的理论分析对立起来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杰拉塔纳在讨论中引进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广泛流行的概念“被决定的抽象的方法”，它的意思是指

马克思的从抽象向具体运动的科学方法。杰拉塔纳写道，“对马克思来说，被决定的抽象的方法无非就是正确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四]。只有沿着从抽象到具体的道路，思维才能在具体的总体上，在它的统一中再现具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黑格尔的方法，但是“黑格尔犯了错误，他把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过程看作是具具体本身的形成过程，管黑格尔方法的这一方面的价值正是在这样一点，即具体在思维过程中通过科学认识被创造出来”[四]。杰拉塔纳指出，仅仅这一个方面还是不能完全包括被决定的抽象的问题，而科莱蒂就连这一方面也没有能正确地理解。在把思维过程与具体本身的形成等同起来的黑格尔那里，逻辑与历史相一致，一切历史时代所共有的比较简单、比较抽象的范畴是原始的，具有历史的形式。马克思认为，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只有在把它看作最不发展的抽象形式的情况下才可以接受。处在发展形式上的最抽象的范畴，只是在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才成为可能（例如，“劳动”范畴）。因此，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上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中逻辑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杰拉塔纳讽刺说，在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寻求中同黑格尔逻辑的决裂，会使科莱蒂拒绝恩格斯的大部分著作，列宁著作的四分之一，以及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的相当大部分。

杰拉塔纳和科莱蒂之间的争论涉及到了辩证法的某些基本问题，这一争论表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相当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使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走进了修正主义死胡同。与此同时，而且这是主要的，争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问题的研究，引起了许多研究家对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注意，提出了加强对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问题。

后来在杂志《再生》（一九六二年）上展开的讨论中，除辩

证法问题外，还提出了历史问题。对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观点应该怎样理解，因而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讨论的主要参加者是Ч.路波里尼和Г.德拉·沃尔佩[12]。讨论的题目是方法问题，这是德拉·沃尔佩研究的中心问题。德拉·沃尔佩力图把马克思的方法的"实体的历史性"与这一方法的逻辑性质"调和起来",他提出了"具体——抽象——具体"的研究方法，他想借助这一方法来阐明当前时代的特殊性质、下层基础，"使之摆脱一切时代所固有的普遍性"[13]。德拉·沃尔佩写道："因此，客观矛盾的问题转化为被决定的或者科学的抽象的辩证法，而只有这种形式上的抽象适合于揭示和支配具体现实的物质的和永恒的矛盾"[14]。

德拉·沃尔佩的方法引起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批评意见。巴达洛尼写道："由于把特殊性（Specifita）作为认识的唯一途径提出来,就可能出现夹入神秘化的普遍性的危险。赋予特殊性以绝对的意义，人们就会把作为黑格尔的'神学'出现的辩证法同作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出现的科学对立起来。把科学作为伽利略所开创的方法孤立起来，这就意味着使它失去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15]

德乔瓦尼谈到了德拉·沃尔佩的观点在政治领域的消极面。如果说在理论领域内拒绝整体性，把辩证法归结为对特殊的认识，会为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联系进行历史分析设置障碍，那么在政治领域内把整体性排除出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这种排除的后果的对辩证法的阉割，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有能力成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一方式相应的意识形式的批判综合科学的否定。"坚持特殊性有可能成为只适用于阶级斗争防御阶段的意识形态，在这一阶段，矛盾之间的联系的普遍意义失去了……而无产阶级作为领导者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因为分

析已经不再把无产阶级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历史的历史主体”[106]。朱泽佩·瓦卡对德拉·沃尔佩的观点做了详细的批判分析[107]。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关于辩证法的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大利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哲学家们对德拉·沃尔佩的方法[108]，特别是对他的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了有充分论据的批判，他们指出，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中排除出辩证法是毫无根据的，这种尝试实质上是为迎合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新”流派即新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而实行的新康德主义手术。巴达洛尼指出：“今天对德拉·沃尔佩的观点的唯理智论方向和纯方法论方向的批判表明了这种观点的危机并重新提出了辩证法的问题”[109]。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同德拉·沃尔佩学派进行的争论必然在他们面前提出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问题。他们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见解的调子是相当矛盾的：其中包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完全否认，也包括对它作为认识理论的承认。当然，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德拉·沃尔佩、切罗尼的观点[110]属于前一种见解，而路波里尼的立场则与这一种见解相近。我们在巴达洛尼、瓦卡、格鲁皮、杰拉塔纳、普雷斯蒂皮诺那里可以看到向认真研究恩格斯的遗著、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过渡。承认、研究并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有卢多维科·杰莫纳特和他的学派（Э.贝洛内、Д Ж·焦雷洛、С·塔利亚甘贝），以及Э.菲奥拉尼、和A.蓬佐。

安东尼奥·班菲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认识论的最初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班菲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无产阶级对它的人的要求的合理性和根本革新整个社会结构的必要性的认识”，他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消除辩证唯物主义中的任何对思维的形而上学的歪曲，把现实规定为完全可以改善的普遍关

系体系和统一综合的辩证过程……保证着这一意识在理论方面的自由发展”[11]。在今天，这样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有贝洛内、杰莫纳特、焦雷洛和塔利亚甘贝。

贝洛内、杰莫纳特、焦雷洛和塔利亚甘贝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现状》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只有常常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甚至某些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家们的辱骂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能给予我们指导线索，以便我们制定真正与当代科学知识水平和我们社会的最深刻的要求相符的新的世界观、自然观和社会观”[12]。

朱利奥·焦雷洛在自己的文章中分析了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焦雷洛把列宁理论中的反映因素和深化因素看作与认识不可分割的因素，而它们作为这样的因素能够防止认识转化为经验材料的简单的机械的记录，否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科学概念的实在化和科学的绝对化。焦雷洛写道：“反映理论正是通过科学的历史即辩证法的试金石得到了充实”[13]。焦雷洛继续写道，一方面，“列宁的反映论向我们保证，被反映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意识的部分，另一方面又保证我们不会陷入幼稚的见解，以为既然表述科学理论所必要的全部工具是历史地决定的，正如任何科学研究的界限也是历史地决定的一样，那么科学知识就是可以穷尽的（就有可能‘改变’现实的所有组成部分的‘名称’而言）。正是从这些界限和限度的历史性质出发可以有根据地驳斥科学思想危机的理论家们赋予科学的工具作用，——科学思想危机常常伴随着正在经受类似‘危机’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这完全不是偶然的”[14]。

恩利科·贝洛内对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分析。他写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自然’仅仅以人在实际上同自然相互发生作用的程度出现在人面前时，才开始考察

自然概念”[105]。因此，贝洛内用嘲讽的口气说，人不进入同现实世界的关系，尽管人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现实世界，而是“真正创造了自然：在这个自然中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归结为人或者说没有什么东西处在人之外”[106]。因此，在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归结为人的实践的科学理论中，不再留下任何客观内容：认识问题被错误地宣布为“坏的资产阶级科学的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体系不是被宣布为科学的特权，而是被宣布为实践的特权，而这种实践又被描述为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活动，被描述为解放。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以及其他具有明显宗教色彩的、充满反科学性的‘主义’的混合”[107]。

卢多维科·杰莫纳特在描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时，指出了它的如下特征：

1. 存在着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客观现实。

2. 这种客观现实是可以认识的，而可认识性不是绝对的：主体和客体在认识过程中的关系具有分段接触的形式，“顺序接近的”形式。

3. 客观世界概念反映无数认识阶段，其中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看作是最后的和最终的，因为实在（现实）处在不断生成的过程中。

4. 认识过程具有活动的形式：认识意味着从一个知识阶段上升到另一个知识阶段。

5. 认识过程具有辩证的性质。

6. 认识过程是感觉和理论分析即抽象过程、形式化过程的综合。

7. 感觉和概念不是认识过程的对象，而是主体借以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108]。

Л. 杰莫纳特及其学派对认识论的详细分析证明，他们反对

把反映理解为消极的认识过程，他们强调主体对认识过程的积极干预。

杰莫纳特及其学派的理论活动引起了哲学家们对列宁的反映论的注意。与此同时，杰莫纳特、贝洛内、焦雷洛和塔里亚甘贝指出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所固有的一系列重大缺陷，其中主要的缺陷是力图仅仅在人的历史联系中考察自然界，也就是说，否定自然界的内在的发展规律。

五、哲学史的研究

今天，对哲学史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问题的研究，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的中心。

哲学史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提出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使得有可能弄清问题的各个方面，给予这一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应有的批评。这种方法是在意大利定期召开的大多数科学理论会议、国际讨论会以及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的特点[18]。

哲学史研究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六十年代末和今天达到了最大的规模。这首先是因为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在这些时期内发展了，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问题受到了更多的注意。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遵循A．拉布里奥拉和A．葛兰西所开创的传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直接看作马克思主义[19]，而把马克思主义本身看作工人运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此同时，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工人运动的历史等同起来的试图。杰拉塔纳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书中写道："通常以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名义而坚持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工人运动的历史看作直接吻合的倾向，有两种基本方式：辩护式……和表面上对立式，表面上对立式从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

批判出发，力图把这种意识形态加进马克思主义”[121]。

辩护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排除出工人运动低落和失败的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表述为神圣的历史”[122]。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作纯粹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而这种意识形态历史最终“会成为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成为时而制约着工人运动历史的各种实践要求的职能结构”[123]。杰拉塔纳写道，意识形态式力图同辩护方式划清界限，却不能避免辩护论式的方法论上的缺陷，因为它似乎是从外面考察工人运动的历史，并且在每一个个别场合只是得出经验描述的结论。相反，杰拉塔纳得出结论说，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看作是这样一种历史，它“不仅不是某种外在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东西，而且还直接创造出它的结构”[124]。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能够避免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融化”在工人运动历史中的正确方法论标准，是分析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分析）和工人运动队伍中自发产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科学——意识形态”问题被提到首位。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科学，都直接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只有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实践所引起的冲突的具体发展中，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才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组成要素之一”[125]。如果对这一冲突的原因没有深刻的理解，那么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杰拉塔纳接着写道，马克思主义所制定的科学的世界观只有它本身成为改造现实的因素即它必须承担起直接的社会实践职能的情况下才完全与对这一现实的理解相符合。科学的世界观向社会实践的转化，只有在科学意识发展成为历史意识，即发展成为现在的间断性中的过去和将来的不间断性的情况下，才不会把科学转化为意识形态。杰拉塔纳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复杂的理论形成过程，当具体的社会实践暴露出某些阶段的幻想性质和

意识形态化的性质，暴露出这些阶段与一般过程的科学性质不相容的时候，这一复杂的理论形成过程就会由进一步的发展所必要的局部停顿和后退过程相伴随”[126]。

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时期主要反映在Л．杰莫纳特的七卷本基本著作《哲学思想史和科学思想史”[127]中。

伟大的法国启蒙者卢梭和伏尔泰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产生的影响，首先引起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思想家的观点的注意。B．杰拉塔纳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书中用一章研究这一问题，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以“对卢梭的马克思主义批判”[128]作为自己发表在杂志《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上的文章的标题，一年后他写了《卢梭和马克思》[129]一书。德拉·沃尔佩和杰拉塔纳在这里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尽管“马克思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直接承认理论上与卢梭的政治思想的近似性”[130]，但是必须指出“马克思的概念的发展和深化过程客观上同卢梭的思想线索发生直接关系的各个方面”[131]。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很重视研究黑格尔的理论遗著，而首先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Г·德拉·沃尔佩[132]、M．罗西[133]十分注意对黑格尔学说的分析，研究这一问题的有Б．德乔瓦尼[134]、Дж．瓦卡[135]、Ч．路波里尼[136]等等。

当然，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分析马克思的原理以及马克思的观点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况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著作是极大多数。实际上，所有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转向马克思的著作，分析它们，作为自己的理论研究的基础。H．巴达洛尼、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切萨雷·路波里尼、马里奥·罗西对卡·马克思著作的研究做出的贡献最大。

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理论遗产的态度，在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西方的讨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同辩证唯物主义的

地位的确定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包括翁贝托·切罗尼在内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拒绝辩证唯物主义存在的权利[138]，那么，象卢多维科·杰莫纳特、恩利科·贝洛内、朱里奥·焦雷洛、西利瓦诺·塔利亚甘贝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恩格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贡献[139]，而埃莱奥诺拉·菲奥拉尼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得出结论说，“反恩格斯主义”是改良主义的理论根源[140]。朱泽佩·普雷斯蒂皮诺的深刻而有意义的著作《自然和社会（对恩格斯著作的重新阅读）》[141]是对恩格斯的理论遗产进行正确解释的尝试。普雷斯蒂皮诺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分析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尽管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很少能遇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术语，但是人们仍然在研究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贡献（诚然，这一贡献不是始终得到恰如其分的解释）。杂志《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编辑部定期出版所谓的专刊（杂志的附刊），登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论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论文。一九七〇年，这些附刊中有一期的刊名为“列宁，革命理论家和革命领袖”[142]。这篇论文分析了列宁的革命理论，它对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意义。巴达洛尼在《作为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了马克思的学说和列宁的学说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格鲁皮[143]、杰拉塔纳和贾纳尔多在自己的著作中研究了列宁的国家理论，普雷斯蒂皮诺、焦雷洛和塔利亚甘贝在自己的著作中研究了列宁的反映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很重视研究意大利的哲学史。一九六六年，Э·加林的著作《意大利哲学史》[144]问世。除加林外，Н·巴达洛尼在《作为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也分析了资产阶级哲学，包括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不过巴达洛尼采取了另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历史主义问题对于转而分析意大利最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安东尼奥·葛兰西、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思想遗产的许多研究人员来说，是中心问题。

Э．拉焦湼里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一书中分析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活动，指出了A．拉布里奥拉和A．葛兰西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145]。杰拉塔纳、贾纳尔多、格鲁皮在自己的著作中分析了拉布里奥拉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巴达洛尼在“政治家和哲学家拉布里奥拉”一文中对拉布里奥拉的著作作出了评价[146]。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注意分析A．葛兰西的著作。一九五八年在罗马召开了“葛兰西研究”科学理论会议，研究葛兰西的富有创造性的遗著，研究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的影响[147]。不仅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许多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来自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都积极参加了会议的工作。另外，一九六七年在卡利亚里和一九七八年在佛罗伦萨，召开了研究葛兰西的国际会议。一九七七年在米兰出版了有巴达洛尼、格鲁皮、斯皮内拉及其他人参加创作的著作《葛兰西的现实意义。领导权、国家、文化、党的方法》[149]。在研究葛兰西著作的个别著作中，反响最大的是格鲁皮的著作《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150]、巴达洛尼的著作《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从神话到政治改造》[151]、普雷斯蒂皮诺发表在杂志《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二期）上的文章“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

在意大利，人们对П．陶里亚蒂和A．葛兰西的著作给予了很大的注意。分析陶里亚蒂的著作的有格鲁皮所写的《陶里亚蒂和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52]一书，埃米利奥·塞伦尼发表在杂志《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一九六六年第二期）上的论文“在陶里亚蒂的思想和活动中的民主和社会主义”。

从六十年代开始，在意大利和国外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分

析著名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班菲和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的理论活动。召开了分析A．班菲的著作的科学理论会议（一九六七年）。这次会议的材料发表在《安东尼奥·班菲和当代思想》[53]一书中。A．贾纳尔多在《哲学和社会主义》一书以及Л．西基罗洛在发表在杂志《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一九六七年第三期）上的"班菲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研究了班菲的著作。

许多当代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实际上亲眼看到了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的创造活动的展开，因此这位学者的活动可以说是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发展阶段的结合点上被考察的。今天，Г．德拉·沃尔佩的观点同过去一样仍然是许多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的中心，一九七〇年出版了朱泽佩·瓦卡的著作《科学、国家和阶级的批判。Г．德拉·沃尔佩和马克思主义》，瓦卡在这部著作中根据对德拉·沃尔佩的主要著作的批判分析评价了他的活动，指出了德拉·沃尔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意大利的发展所起的作用[54]。在杂志《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上发表论述德拉·沃尔佩的文章的还有马里奥·罗西、加兰托尼·加布里埃莱等人。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注意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和改良主义观点：在杂志《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上开辟了专栏"观察"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这些专栏对世界上出版的主要哲学著作和社会学著作进行了批判分析[55]。专门批判资产阶级哲学的著作并不多，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多数著作却都包括这一批判[56]。

关于社会主义各国、苏联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主要是按照历史的线索进行写作的：被考察的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哲学史，有时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哲学史。实际上，没有任何著作论述社会主义各国当代哲学思想的成就。在论述当代世界上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现实问题的一系列著作中，可能存在着对社会主义各国的状况的有偏见的评价，没有引证苏联学者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的著作。

在一九七九年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意大利共产党章程中这样写道："意大利共产党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传统和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基础和鼓舞力量是由于列宁的创造性思想和著作而获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推动因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意大利共产党在丰富这些遗产的同时，以可以同现代思想的任何流派相媲美的对问题的独立分析，沿着A．拉布里奥拉的著作所体现的批判分析、A．葛兰西和П．陶里亚蒂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方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7]。共产党员哲学家在党的方针、意大利工人运动问题的理论分析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其他某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大利的发展特点，包括过分强调"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特殊情况，抹杀而有时是否定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同规律的作用，过高估计历史主义概念的方法论作用，以及作为必然结果的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的低估，——所有这一切为解决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具有丰富的传统，这个国家拥有的哲学干部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意大利的发展给予新的推动力。

---

① 根据1982年10月31日《团结报》上的资料，意大利共产党拥有一百六十七万党员。

② 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以"葛兰西和当代文化"（1967年）为题的国际会议，以"六十年代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一代人在理论政治方面的成长"（1971年）、"人、自然、社会"（1971年）为题的会议。1962年和1971年在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周刊《再生》上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大利的状况的讨论，在意大利哲学家中间以及在国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③ 中央机报——日报《团结报》，刊物《再生》，政治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以及专门按经济、历史、教育、法律问题出版的月刊：《政治和经济》，《教育改革》、《历史研究》、《民主与法》等等。

④ 《葛兰西选集》1959年莫斯科版第3卷第345 页。

⑤ 关于“历史联盟”概念的更详细的内容见下文。

⑥ Л．格鲁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1978年罗马版第215 页。

⑦ 《葛兰西选集》第3卷第348 页。

⑧ 《六十年代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一代人在理论政治方面的成长》1972年罗马版第699 页。

⑨ 《六十年代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一代人在理论政治方面的成长》1972年罗马版第699 页。

⑩ Л．陶里亚蒂《论文和演讲选》1965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473 页。

⑪ 1974年，意大利共产党就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问题在米兰召开了研讨会。意大利共产党的这次研讨会考虑到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渴望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建议小企业主和中等企业主联合起来。

⑫ 《团结报》1976年2月3日第3页。

⑬ 同上。

⑭ 同上。

⑮ 同上。

⑯ 同上。

⑰ 《团结报》1976年2月3日第3页。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翻版，也就是幻想阶级和平，在一个“统治联盟”内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成功地”合作和参加“民主竞争”。人们试图用转向反对派的可能性来熄灭尖锐的矛盾，而忽视了有可能破坏这一联盟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存在。

⑱ 《团结报》1979年3月31日第14页。

⑲ 《共产党人》1982年第4期第84页。

⑳ 《共产党人》1982年第4期第82页。

㉑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概念预先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里所研究的问题范围的选择；现在国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是按照这一概念的方向进行的。对意大利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坚持辩证法的题目，而与此同时却又长期拒绝接受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体系的原因。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概念也是A．葛兰西和Л．陶里亚蒂所制定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战略的基础。

㉒ 参看 ·格鲁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1978年罗马版第257 页。

㉓ 《葛兰西和当代文化》1975年罗马版第1卷第163 页。

㉔ Л.格鲁皮《关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载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974年第6期第129页。

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

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8页。

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2—753页。

㉘ Дж.普雷斯蒂皮诺《自然和社会》1973年罗马版第262—263页。

㉙ Л.格鲁皮《关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第131页。

㉚ 参看《六十年代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一代人在理论政治方面的成长》1972年罗马版第173页。

㉛ 左派激进理论家，他的观点是意大利许多极左集团的活动的依据。

㉜ 《红色笔记》1961年第4期第271页。

㉝ 同上。

㉞ 这就是潘齐耶里的被称为“工人主义”（‘Операйо’按意大利文的意思是‘工人’）的观点的基础。

㉟ 《六十年代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一代人在理论政治方面的成长》1972年罗马版第82页。

㊱ 《红色笔记》1961年第2期第20页。

㊲ 《六十年代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一代人在理论政治方面的成长》1972年罗马版第87页。

㊳ 《六十年代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一代人在理论政治方面的成长》第85页。

㊴ Дж.普雷斯蒂皮诺《自然和社会》1973年罗马版第47页。

㊵ 同上。

㊶ Л.格鲁皮《关于意大利的理论争论》第139页。

㊷ 同上书，第140页。

㊸ 同上书，第139页。

㊹ Дж.普雷斯蒂皮诺《自然和社会》1973年罗马版第219页。

㊺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㊻ Дж.普雷斯蒂皮诺《自然和社会》1973年罗马版第219页。

㊼ Дж.普雷斯蒂皮诺《自然和社会》1973年罗马版第219—220页。

㊽ 《与M·罗西的谈话。批判的思想和革命》，载于《再生》1971年第27期第20页。

㊾ Л.格鲁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1978年罗马版第66页。

㊿ Л.格鲁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1978年罗马版第169页。

(51) Л.格鲁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1978年罗马版第211页。

(52) Л.格鲁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1978年罗马版第211页。

㊽ Л．格鲁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1978年罗马版第211 页。

54 A．葛兰西《狱中札记》1975年都灵版第1386页。

55 《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1972年罗马版第81页。

56 同上。

57 A．葛兰西《过去和现在》1971年罗马版第86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59 《葛兰西选集》第3卷第163页。

60 《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1972年罗马版第88页。

61 《葛兰西选集》第3卷第165 页。

62 《葛兰西选集》第3卷第169 页。

63 Э．塞伦尼《从马克思到列宁。'社会经济形态'范畴'》，载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专刊》1970年第4期。

64 在巴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倡议下组织了讨论，讨论是在杂志《思想》、《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上进行的，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意见的有法国哲学家：多库阿、特克西埃、厄尔佐克、加利佐、格吕埃、拉比卡、格吕克斯曼、戈德里埃。

65 B．杰拉塔纳《社会的形成和过渡的社会》，载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972年第1期。

66 ДЖ．瓦卡《理论和阶级斗争的现实水准》，载于《再生》1971年第39期。

67 参看Ш．路波里尼《辩证法和唯物主义》1978年罗马版第213 —294 页。

68 参看ДЖ．普雷斯蒂皮诺《自然和社会》1973年罗马版第258 —296 页。

69 参看Л．格鲁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1978年罗马版第93—99页。

70 Э．塞伦尼《从马克思到列宁。'社会经济形态'范畴》，载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970年第4期第34页。

71 B．杰拉塔纳《社会的形成和过渡的社会》，《载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972年第1期第58页。

72 ДЖ．普雷斯蒂皮诺《自然和社会》1973年罗马版第286 页。

73 ДЖ．普雷斯蒂皮诺《自然和社会》1973年罗马版第287 页。

74 Ш．路波里尼《辩证法和唯物主义》1978年罗马版第213 页。

75 Ш．路波里尼《辩证法和唯物主义》1978年罗马版第213 —214 页。

76 Ш．路波里尼《辩证法和唯物主义》1978年罗马版第218 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78 Ш．路波里尼《辩证法和唯物主义》1978年罗马版第219 页。

79 Л．格鲁皮《关于意大利的理论争论》第135 页。

80 Л．格鲁皮《关于意大利的理论争论》第135 —136 页。

⑧ Л．格鲁皮《关于意大利的理论争论》第138 页。
⑧ Л．格鲁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第95页。
⑧ Л．格鲁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第95页。
⑧ Л．格鲁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第95页。
⑧ Л．格鲁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第95页。
⑧《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982年第5期）用全部篇幅刊登关于工艺技术革命问题的文章。
⑧ Дж．贝林格《科学的政治》1970年罗马版第31页。
⑧ Дж．贝林格《科学的政治》1970年罗马版第38页。
⑧ Дж．普雷斯蒂皮诺《自然和社会》1973年罗马版第196 页。
⑨ Дж．贝林格《科学的政治》1970年罗马版第12页。
⑨ Ф．杰拉塔纳《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载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971年第2期第169 页。
⑨ Ф．卡萨诺《马克思主义和意大利的哲学（1958—1971）》1973年巴里版第354 页。
⑨ 参看《杰拉塔纳致科莱蒂的信》，载于《当代》1958年第9期第87—96页。
⑨ 曾是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已退出党的队伍。
⑨《杰拉塔纳致科莱蒂的信》第90页。
⑨ 科莱蒂认为，从恩格斯起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衰落时期，因为恩格斯似乎非批判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引入了马克思主义。
⑨ 参看《批判》1929年第50页。
⑨《杰拉塔纳致科莱蒂的信》第94页。
⑨ 科莱蒂作为德拉·沃尔佩学派的代表（属于这一学派的还有德尔克尔、梅尔库里、彼得鲁乔利、彼得拉内拉、罗西、菲古雷利、切罗尼）在这里让德拉 沃尔佩加入了讨论。
⑩《杰拉塔纳致科莱蒂的信》，载于《当代》1959年第12期第113 页。
⑩《杰拉塔纳致科莱蒂的信》，载于《当代》1959年第12期第113 页。
⑩ 参加这次讨论的还有Н．巴达洛尼、Л．科莱蒂、Л．格鲁皮、М．菲古雷利、Э．梅尔库里、Б．彼得鲁乔利、Э．潘齐、М．罗西。А．纳塔为讨论作了总结。
⑩ Б．德乔瓦尼就这一点写道："德拉·沃尔佩非常怀疑如'普遍性'这一类范畴。他竭尽自己的全力来建立特殊客体的特殊逻辑"（《再生》1971年第32期第20页）。
⑩《再生》1962年第19期第28页。
⑩《再生》1962年第13期第28页。

⑯ 《再生》1962年第13期第20页。

⑰ 参看Д．瓦卡《科学，阶级的现状和阶级的批判：Г．德拉·沃尔佩和他的马克思主义》1970年巴里版。

⑱ 这里只考察Г．德拉·沃尔佩的活动的一些方面，也就是与辩证法有关的方面。总的说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大利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⑲ 《再生》1962年第13期第24页。

⑩ 切罗尼的立场是十分不彻底的。切罗尼在"根本"拒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二十—三十年代苏联哲学家"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力图把列宁的学说同辩证唯物主义"分开"。切罗尼承认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可以把列宁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说成是政治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见 ．切罗尼《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1976年莱切版第36页）。Дж．焦雷洛指出了对列宁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理解的这种不彻底性："列宁的论战正是哲学领域而不是在政治领域进行的：贯穿这部著作的红线是保卫唯物主义世界观，就这一方面阐明对自然科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同样重要的理论的作用"（Э．贝洛内、Л．杰莫纳特、Дж．焦雷洛、С．塔利亚甘贝《辩证唯物主义的现状》1978年罗马版第15页）。

⑪ А．班菲《选集》1965年莫斯科版第40页。

⑫ Э．贝洛内Л．杰莫纳特、Дж．焦雷洛、С．塔里亚甘贝《辩证唯物主义的现状》1978年罗马版第8页。

⑬ Э．贝洛内、Л．杰莫纳特、Дж．焦雷洛、С．塔里亚甘贝《辩证唯物主义的现状》1978年罗马版第41页。

⑭ Э．贝洛内、Л．杰莫纳特、Дж．焦雷洛、С．塔里亚甘贝《辩证唯物主义的现状》1978年罗马版第41页。

⑮ Э．贝洛内、Л．杰莫纳特、Дж．焦雷洛、С．塔里亚甘贝《辩证唯物主义的现状》1978年罗马版第58页。

⑯ Э．贝洛内、Л．杰莫纳特、Дж．焦雷洛、С．塔里亚甘贝《辩证唯物主义的现状》1978年罗马版第58页。

⑰ Э．贝洛内、Л．杰莫纳特、Дж．焦雷洛、С．塔里亚甘贝《辩证唯物主义的现状》1978年罗马版第58、59页。

⑱ Э．贝洛内、Л．杰莫纳特、Дж．焦雷洛、С．塔里亚甘贝《辩证唯物主义的现状》1978年罗马版第95—124页。

⑲ 参看В．杰拉塔纳《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1972年罗马版；《葛兰西和当代文化》；Л．格鲁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Л．格鲁皮《社会主义和民主》1969年米兰版；Л．格鲁皮《历史性和马克思主义》1976年罗马版；Дж．普雷

斯蒂皮诺《自然和社会》1973年罗马版。

⑩ B．杰拉塔纳写道："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一回事"（B·杰拉塔纳《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第Ⅶ页）。

⑪ B．杰拉塔纳《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第ⅠⅩ页。

⑫ B．杰拉塔纳《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第Ⅶ页

⑬ B．杰拉塔纳《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第Ⅸ页。

⑭ B．杰拉塔纳《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第Ⅶ页。

⑮ B．杰拉塔纳《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第Ⅹ页。

⑯ B．杰拉塔纳《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第Ⅶ页。

⑰ Л．杰莫诺特《哲学思想史和科学思想史》1964—1976年米兰版。

⑱ 《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963年第2期第84—95页。

⑲ Г．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1964年罗马版。

⑳ B．杰拉塔纳《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第58页。

㉑ B．杰拉塔纳《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第58页。

㉒ 参看Г．德拉·沃尔佩《积极的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解放》1964年苏加尔版；德拉·沃尔佩《当代意识形态批判》1967年罗马版。

㉓ 参看Б．德乔瓦尼《黑格尔和资产阶级社会历史时代》1970年巴里版。

㉔ 参看Б．德乔瓦尼《黑格尔和资产阶级社会历史时代》，1970年巴里版。

㉕ 参看Л Ж．瓦卡《科学、阶级的状况和批判》。

㉖ 参看Ц．路波里尼《辩证法和唯物主义》。

㉗ 参看H．巴达洛尼《作为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962年米兰版。

㉘ У．切罗尼《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1976年莱切版。

㉙ У．切罗尼《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1976年莱切版。

㉚ Э．菲奥拉尼《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辩证唯物主义》1971年米兰版。

㉛ Л Ж．普雷斯蒂皮诺《自然和社会》1973年罗马版。

㉜ 《'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专刊》1970年第5期。

㉝ Л．格鲁皮《社会主义和民主》；格鲁皮《历史性和马克思主义》。

㉞ Э．加林《意大利哲学史》1966年都灵版。

㉟ Э．拉焦涅里《马克思主义和国际》1972年罗马版。

㊱ 《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971年第2期第16—35页。

㊲ 《葛兰西研究。1958年1月11—15日在罗马召开的葛兰西研究所会议记录》1973年罗马版。

㊳ 《葛兰西和当代文化》。

㊴ H．巴达洛尼等《葛兰西的现实意义。领导权、国家、文化、党的方法》1977年米兰版。

150 Л. 格鲁皮《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1972年罗马版。

151 H. 巴达洛尼《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1975年都灵版。

152 Л. 格鲁皮《陶里亚蒂和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74年罗马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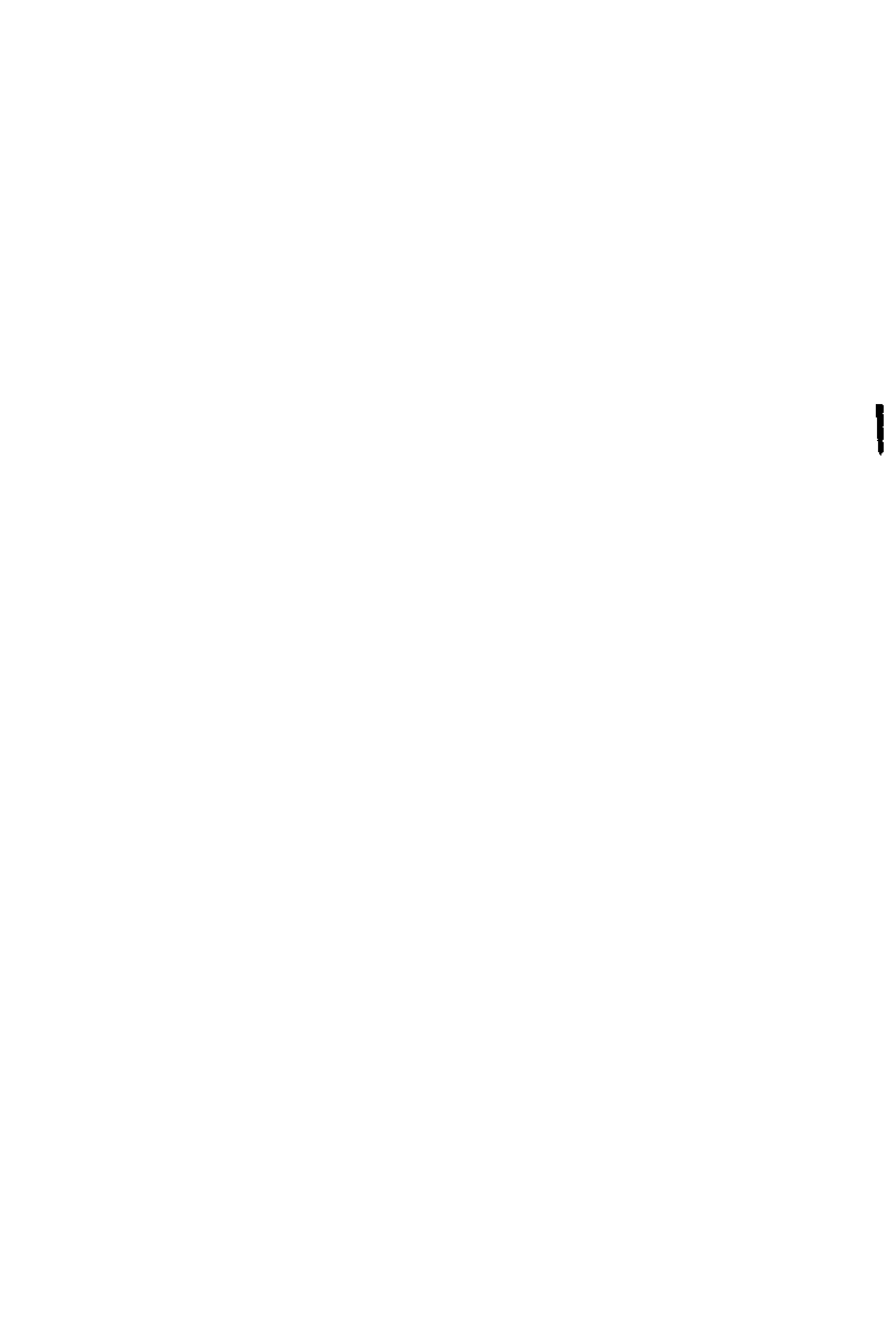
153 《安东尼奥·班菲和当代思想。班菲研究会议记录》1969年佛罗伦萨版。

154 参看Дж. 瓦卡《科学、国家和阶级的批判》。

155 C. 路波里尼《萨特和共产党人》，载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963年第2期；M. 斯皮内拉《乔治·古尔维奇的辩证法和社会学》，载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963年第2期；K. 曼奇纳《戈德里埃的结构和矛盾》，载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971年第4期；A. 卡西恰《客观规律和被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概念》，载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972年第2—3期；Л. 杰莫纳特《新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载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972年第6期；Дж. 瓦卡《工艺技术和社会关系：达伦多夫、马尔库塞和马莱》，载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1967年第6期。

156 Ф. 卡萨诺《现代社会学的自我批判。韦伯、米尔斯、哈贝马斯》1971年巴里版；Дж. 费拉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载于《再生》1965年第44期；Г. 德拉·沃尔佩《马克思主义反对结构主义》，载于《再生》1965年第44期；Г. 德拉·沃尔佩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载于《再生》1965年第46期；Дж. 瓦卡《论马尔库塞》，载于《再生》1968年第27期；B. 杰拉塔纳《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Э. 拉焦涅里《马克思主义和国际》。

157 《团结报》1979年4月5日第23页。



第 四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联邦德国

德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和法西斯制度的崩溃不仅使德国人民摆脱了法西斯专政，而且在德国人民面前揭开了沿着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前景。但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在西部德国恢复了垄断资本的统治。它走上了分裂国家的道路，于一九四九年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此同时，东部德国的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从那时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全部历史,整个阶级斗争的进程，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取决于联邦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反对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中欧战后历史上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五十年代中期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把这个国家同侵略性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拴在一起，使它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重新实现了军国主义化，并把反对共产主义的政策奉为国家学说。

一九五六年，德国共产党被禁止；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受到了迫害。在七十年代，当联邦德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积极的转变时，反动力量采取了“禁止职业”的办法来对付一切持不同思想的人，其中包括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反对派力量的迫害，在“保卫国家”的借口下对民主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为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造成了极其复杂

的和困难的条件，所有这一切都在极大的程度上使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的传播和研究遇到了困难，但是这并没有阻止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应该指出，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在民主德国的建立和发展，毫无疑问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联邦德国的传播。

广大的议会外反对派的出现，是政治思想形势中对这一进程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巴特戈德斯贝格纲领（一九五九年）中载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拒绝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党的领导转而采取支持反动对外政治方针的立场，使社会民主党内的分化加剧了。当德国社民党的右翼领导进入波恩政府（一九六六年）并组成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社民党的“广泛”联盟或者“基督教——社会”联盟时，国内被剥夺了议会中真正代表权的左翼力量，联合起来组成了“议会外反对派”的广泛运动。这一运动（在共产党人的合法活动受禁止的条件下）拥有自己的思想家，包括哲学家，他们的影响在议会外反对派的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性行动期间特别大。反对原子战争危险、反对反动的“非常法”、反对新纳粹主义的威胁和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侵略的人们所进行的“复活节进军”，成了议会外反对派左翼力量的独特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为六十年代末在联邦德国政治思想生活中出现的进展准备了条件。

在秘密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共产党人也积极参加了议会外反对派的政治路线的思想理论准备工作和制订工作。在议会外反对派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有这样一些左翼社会主义理论家：直至六十年代初领导德意志工会联合会理事会所属的经济科学研究所的B．阿加尔茨、著名的进步法学家Г．里德尔、特别是左派社会主义者、马尔堡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所长B．阿本德罗特。这位哲学家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尔堡学派的奠基人，该学派培养

出了一代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其中许多人成了积极的共产主义者

在六十年代的联邦德国，由于一般民主运动的加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提高了，首先是青年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提高了。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功绩在于他们在反击反共主义的进攻的同时能够满足这种兴趣，并在劳动群众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成就。《马克思主义大学生联合会'斯巴达克'》多年来对联邦德国的大学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并不是偶然的。

与此同时，在六十年代的左翼力量队伍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思想获得了很大的影响，这一学派不仅在联邦德国，而且在美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成了"新左派"的思想旗帜，首先成了"极左的"大学生的思想旗帜。对联邦德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这一学派的哲学基础的批判具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地展开了这一批判。与此同时，为争取共产党人活动的合法化、因而争取建立合法的德国共产党而展开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从德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获得合法工作的可能性（一九六八年）的时候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九六八年末，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建立了以И．施莱夫施泰因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了在联邦德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重要的组织机构。在该所的科学理论工作计划中，哲学问题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十年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出版了三十二期《马克思主义文摘》，它们向联邦德国的读者介绍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论述社会科学现实问题的最优秀的著作①。关于认识论和心理分析批判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很大的兴趣。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组织的国际科学理论会议的工作中，哲学问题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些会议的内容是：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一九七〇年），批判当代经济理论和关于工人运动的政治战略观点（一九七一年），讨论有关分析联邦德国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方法论问题（一九七三年），讨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一九七六年），讨论联邦德国的工人阶级的文化需要（一九七七年），讨论已经开始的危机对工人意识的影响（一九七八年）。会议材料在研究所的集体著作中得到了反映。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袖珍手册》），各种专著，其中有哲学研究专著②。

《马克思主义读物》在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宣传中起着特殊的作用。该杂志最初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一个不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出版，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已经联合起来组成奥古斯特·倍倍尔协会，并以宣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的任务。这个小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大加强了。在它出版的杂志的基础上成立了联邦德国规模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社《马克思主义读物》。在德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建立后，《马克思主义读物》刊物成了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理论机关刊物，科学理论会议的组织职能则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和其他机构手中。

因此可以说，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出版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更广泛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读物》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同出版了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许多著作的出版社《帕尔一卢根施泰因出版社》(科伦）、《消息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贝尔特克赖兹出版社》（多特蒙德）进行了合作。在《帕尔一卢根施泰因》出版社出版的《小丛书。政治、科学、未来》著作中，马克思主义

哲学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九六八——一九七八年期间，这一套丛书出了一百四十多本书；其中几乎有一半是哲学著作。这一套丛书的主要作者是X．X．霍尔茨、X．霍尔采尔、Г．桑德屈勒、Й．施莱夫施泰因、K．佳滕和Ф．德普。

在德国共产党的合法活动的最初十年时间内，具有特征意义的事情是在曼海姆代表大会（一九七八年）上通过了新的党纲。这样一个党纲在联邦德国的共产党人那里是第一次出现。它“是根据具体条件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来解决当代基本问题的结果”③。在这一文献中注意并总结了德国共产党在最近几年里的实践斗争和理论斗争的经验，对联邦德国的社会生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科学分析，同时也指出了在进一步加强德国共产党方面的最重要的任务。纲领中对思想斗争问题给予了很大的注意，这一斗争的基本内容应该是更积极地宣传基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思想，揭露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最危险的变种的反动实质。所有这些都应该以加强一切民主力量的共同斗争为目的。

哲学家们对于这一纲领的草案的制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出版了关于联邦德国二十年内（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的三卷本研究著作，制定了为反垄断主义的民主而进行斗争的思想。B．格恩斯和P．施泰格瓦尔德系统地发展了这一思想，在《反垄断斗争的战略问题》④一书中介绍了这一思想。德国共产党参加欧洲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柏林会议（一九七六年）的工作，对于这一思想的制定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一般理论方面，应该指出反垄断主义斗争思想的制定者们对制定联邦德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规律和具体历史的特殊民族特点之间的辩证法所作出的贡献。这一思想的重要

特征是注意到了克服工人运动的分裂以及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垄断资本斗争中必须达成统一行动的必要性。B. 格恩斯和P. 施泰格瓦尔德着重指出，在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为争取反垄断主义的民主而进行斗争的阶段，工人阶级应该在斗争过程中发展自己的革命的阶级觉悟，成为一切反垄断力量的领导者。所制定的反垄断斗争的思想注意到了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

德国共产党主席赫伯特·米斯就这一方面写道："德国共产党始终同苏联共产党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以服务于工人阶级和联邦德国的居民的利益"[5]。

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联邦德国的发展来说，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同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家们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具有创造性的合作关系。这一合作如果说在一九六八年以前由于总的"冷战"气氛和德国共产党被禁止而遇到极大的困难的话，那么这一合作在七十年代则获得了比较广泛的发展。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开始积极参加各种国际性哲学和社会学大会、会议和讨论会，而且在国内也开始采取类似的国际性措施。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为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而召开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哲学的国际会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上，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家们发了言，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发了言。从那时起，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参加了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会议。

哲学家P. 施泰格瓦尔德、Й. 施莱夫施泰因、И. 冯·海泽勒、Г. 容克等人曾不一至一次地参加了社会主义各国的不同会议，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以及苏联的出版物上发表了见解。

联邦德国、民主德国、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哲学家的合作，也体现在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共同出版的以《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为标题的丛书中。到一九八三年，这一套丛书出了一百多本书，包括P．施泰格瓦尔德、P．阿尔布雷希特、I．桑德屈勒、B．格恩斯、X·霍尔采尔的著作以及联邦德国其他哲学家的著作。这一套丛书以及其他共同著作的出版具体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日益牢固的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合作。

以德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成员P．施泰格瓦尔德为首的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小组参加第十六次世界哲学大会（一九七八年于杜塞尔多夫）的工作以及人数很多的苏联学者小组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于这次大会开始前不仅在杜塞尔多夫召开的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国际科学理论会议的工作，是发展合作的新的一步[6]。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民主德国的学者的合作正在富有成果地发展着。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七十年代的联邦德国的发展具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同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和民主德国的哲学家的越来越广泛的和富有成果的合作。

必须着重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对联邦德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工会运动的左翼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不得不采取专门的措施以防止“青年社会主义分子”的左派转而采取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立场。在马克思主义大学生联合会“斯巴达克”（一九七一年成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增长了，而且这种增长正在远远超出它的范围（例如，在高等院校社会主义联合会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也增长了），联邦德国左翼大学生运动的定期出版物和理论会议就是这种兴趣增长的证明。

尽管七十年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成就，尽管德国共产党的威信和主动性有所增长，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活动中仍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和问题。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交替之际，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任务是要对联邦德国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倾向于对抗和军国主义化政策的新趋势作出分析。德国共产党在制定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同时，支持苏联方面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和平倡议。Г．米斯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这次代表大会，不仅为我们共产党人，而且也为一切具有善良意志的人们，为一切对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军事工业黑手党所奉行的冒险主义武装政策感到恐惧的人们，指出了方向"⑦。

共产党人参加反军国主义化运动的问题，动员人民群众为争取和平而进行斗争的问题，是德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八一年五月于汉诺威）注意的中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Г．米斯做了题为"一切为了和平！保卫社会的和民主的权利！"⑧的总结报告。联邦德国的共产党人拥有组织保卫和平、社会进步的广泛行动的现实可能性。加强对劳动者的思想教育、普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是为这些目的服务的。

一、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斗争

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研究是同本国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特别受到注意的是那些研究结果会对社会实践有利于联邦德国劳动者的发展产生影响的问题。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及其他哲学部分的大多数著作都贯穿着他们的实践应用、意识到必须为阶级斗争、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任务服务的精神。许多著作都以广大读者为对象，完成普及任务。

为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联邦德国出版了一系列反映已经达到的研究水平和宣传哲学知识方面的丰富经验的著作。й．施莱夫施泰因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研究入门》⑨一书中始终一贯地引导读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他把重点放在辩证法的普遍性质上、驳斥了任何否定自然辩证法和把辩证法归结为单纯的社会进化理论的企图。施莱夫施泰因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辩证方法的制定上，他引证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再论工会……》等著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历史的叙述，特别是列宁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法问题的提法，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й．施莱夫施泰因在分析了对社会、人的起源以及劳动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的科学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之后，阐明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形态"、"历史的"规律和人的自觉活动的"相互作用"等范畴的含义，阐明了自由和必然性的辩证法等等。作者引证恩格斯关于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的思想，不同意对上层建筑的简单化的解释。他同那些把上层建筑独立于经济基础的假象绝对化的人进行辩论。施莱夫施泰因在向读者介绍马克思和列宁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时，对那些把工人阶级的客观地位和它的意识混为一谈的人进行了批判。他在国家部分中指出，阶级的政治统治概念和阶级的专政概念是同一的。

在为纪念恩格斯诞生一百五十周年而在联邦德国出版的《反杜林论》的详尽《注释》中所表述的思想⑩，与й．施莱夫施泰因的著作的思想相近似。作者们着重指出，在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之后的一百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认识的发展证实了恩格斯所制定的哲学思想，尽管这一发展也

对一系列原理（关于数学科学的对象，空间和时间、物质和能量之间的联系，宇宙过程等等的原理）做了某些更精确的说明和补充。注释的作者们确认，A．И．奥巴林和其他学者的理论在理解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源方面作出了许多的贡献。注释表明，民主德国、奥地利和联邦德国这三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如何帮助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同科学认识的发展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P·施泰格瓦尔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青年指南》[31]这一通俗著作，是对宣传哲学知识采取不同态度的一个具有特征意义的例子。施泰格瓦尔德以具体的令人信服的事实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向青年读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他卓有成效地领导着共产党人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的、范围很大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夜校网。在他的参加下制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和教科书反映了联邦德国的哲学科学水平。

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用批判唯物主义的态度掌握德国资产阶级古典哲学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之一，是为争取传播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的重要部分。他们积极参加由他们在一九五六年成立的国际黑格尔学会的工作，积极参加他们定期召开的国际黑格尔会议，积极参加《黑格尔年鉴》的出版工作。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自己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看作是在联邦德国的具体条件下执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批判地、唯物主义地掌握黑格尔辩证法的遗训。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系列的专著中从批判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歪曲黑格尔思想以论证“极权主义国家”观点的企图开始，批判了当代资产阶级对黑格尔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全部遗著的解释和歪曲。此外，他们对于最近十年来在联邦德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关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黑格尔

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之间的关系的修正主义看法，给予批判性的评价。

为了同二十世纪的新黑格尔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相对抗，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次在国内使广大读者有可能了解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列宁的战斗的唯物主义，他把黑格尔辩证法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定革命理论的任务直接联系起来、同革命实践的需要联系起来的态度，列宁的《哲学笔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全部财富，在今天已经有可能为西德社会人士所了解并成了国内马克思主义者的武器。例如，P．施泰格瓦尔德指出了列宁对作为德国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哲学源泉的新康德主义的批判的现实性。

八十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开始定期出版《辩证法》专集，这些集子反映了对辩证法问题的研究的现状，包括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研究的现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Й．Г． 桑德屈勒和X．X．霍尔茨所出版的辩证法问题系列专著包括三十多卷。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在联邦德国成功地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研究和批判地掌握德国古典哲学遗产，首先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浓厚兴趣。

用德语出版的苏联哲学家和民主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对于在联邦德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很大的意义。在这一方面，联邦德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具有某种优越性，因为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许多出版物，包括在那里用德语出版的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在联邦德国的图书市场上可以买到。但是，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也为了使本国社会人士能看到他们的国外同行（包括苏联学者在内）的对他们最现实和最重要的著作，做了许多工作。例如Г．Й．桑德屈勒教授出版了国外

马克思主义作者（包括苏联作者）关于批判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识论、科学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等等问题的一系列集子。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拥有了解苏联哲学科学的多得无可比拟的可能性并且广泛地加以利用的极大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联邦德国存在的时间尽管比较短，尽管发展的政治条件复杂，但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积累起来的经验、新的青年干部的涌现促使它转而采取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水平相适应的较高的理论立场。

马克思主义的壮大，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对新阵地的占领，首先发生在寻求对当代科学认识和社会实践的迫切问题的积极回答方面。拒绝资产阶级哲学的思辩和幻想，对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像资产阶级哲学家所经常说的那样意味着“哲学本身的终结”。相反，对唯心主义哲学的积极否定，克服它的根本性的方法论缺陷，并不会留下真空，而是有助于对现实的正确理解。Г．桑德屈勒在引证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的著名思想时写道：“工人运动开始这种继承，辩证地否定它，按新的方式确定哲学的任务……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新的历史主体即工人阶级的这一新哲学的主要学说”⑫。

在联邦德国，研究辩证法的最重要方向之一是同科学认识问题，同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辩证法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方向是Г．桑德屈勒和他的同事在不来梅大学制定的。他的著作《实践和历史意识。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释义学概述》（一九七三年）⑬，在联邦德国是企图揭示辩证逻辑实质的最初的尝试之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注意的中心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认识过程中逻辑和历史的关系，揭示列宁关于辩证法、

逻辑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原则的方法论意义，揭示相关范畴的意义。

作为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的基础的辩证方法，是创造认识世界的统一画面的连接环节。辩证法成为研究社会、人和自然的指导原则、普遍方法。在联邦德国，在哲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国际合作的基础上，人们第一次指出了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对于研究自然的必要性；辩证法被宣布为自然科学的纲领[14]。

只有辩证法由于自己的革命本质能成为不仅涉及社会政治领域而且涉及精神生产领域的斗争的有效手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发生兴趣的原因。所有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被卷入这一斗争，而在这些科学的范围内又发生着以世界观作为基础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发生冲突的条件使辩证法问题变得特别重要和迫切。制定理解新的认识阶段和新的社会现象的思想方法的必要性，要以解决大量具体任务为前提，而这种解决又只有在辩证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以辩证法思想为中心思想的政治、经济、科学、哲学、国家、社会学问题《小丛书》有助于这些任务的解决。属于这一套丛书的还有《辩证法研究》专著，也就是目的在于向联邦德国社会公众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就的专题著作和专题著作性质的文集。在《辩证法研究》范围内开始出版以“辩证法”为标题的文集，这些文集在说明现实问题方面更有成效，因为它们的内容包括关于举行大会的最新信息，科学报道、讨论记录等等[15]。

分析科学理论的性质，分析科学理论的认识论作用，属于对西德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具有现实意义的最重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问题的解决是针对那些把哲学同科

学，把自然科学同“精神科学”对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理论的。这种对立从传统上说是以起源于新康德主义的关于世界的唯心主义描述的二元论为基础的。

与现代科学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讨论，是由一系列客观情况引起的。第一，科学的社会作用的扩大，克服把科学理解为物质“基础”的机械复制的必要性、引起了对科学问题的研究的加强。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科学的社会规定性："科学活动越来越多地由社会个人、集团和阶级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科学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不能被看作是类似的东西或者相同的东西、而是构成相互关系的复杂体系"⑯。

第二，科学是集体取得的成就，它由于各类学者的合作而必然地向前发展着。这个集体所生产的认识是社会体系的一体化因素，这一点由于科技革命而变得很清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科学发展的需要和科学的社会作用之间出现了客观的对立。此外，关于科学的地位和科学的不同领域的关系问题，超出了科学理论的范围。问题涉及到对现实本身，对社会实践对象的态度、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同世界观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这种政治是否由于自己的目的和手段的“自然必然性”而建立在对社会条件和需要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或者说，政治解决的必然性是否在对社会条件和需要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这个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意义⑰。

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着重指出，只有对情况作出客观的科学的分析，才有助于达到最好的未来，有助于克服制度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危机。因此，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科学问题表现出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科学潜力的增长客观上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出前提。

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出发来总结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并促使国内各科学界支持民主运动作为自己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比较容易了，因为今天在联邦德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转而采取了反军国主义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反垄断主义的立场。

科学就其实质来说是唯物主义的，在客观上是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切反共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倾向相对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补充。“关于法律和国家，关于经济和历史，关于语言、文学和艺术、关于自然和技术的各类科学，今天同唯物主义辩证法一起组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认识力量、客观性和党性使得人们有可能理解按规律发展的现实，把科学、世界观和行动统一起来并自觉地计划人们的未来”[18]。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四月的演说中谈到的关于唯物主义科学与工人运动的联系的原理，同过去一样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19]。

这一结论在不来梅历次科学讨论会的工作中得到了明确的表现。这些讨论会的目的是在对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社会学和历史科学的现实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把这些问题同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过程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讨论科学发展的一般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

不来梅讨论会根据自己的目的确定了讨论的题目。第一次讨论会《认识论问题和科学理论问题》（一九七六年）[20]讨论了认识论理论研究的意义，还制定了论证科学发展的一般概念的若干单项课题。第二次讨论会（一九七七年）[21]考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英国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第三次讨论会（一九七八年）[22]参加者注意的中心是关于历史的主体、进步的推动力量和社会承

担者、社会改造理论的作用等理论问题。

近几年来，科学领域内的研究工作在联邦德国和其他国家强化了，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是完整的社会肌体的体系之一，表现出现实的实践力量，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发生的现实过程的内容负有很大部分的责任。因此，他们非常尖锐地提出了关于科学的社会效果问题。

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说明联邦德国当前科学的状况时，确认了它的危机、解释价值和启发价值的降低，而科学的这一价值的降低导致了在资产阶级学者中间对科学现状的不满情绪的增强[23]。同时可以看到，把科学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导致科学代表人物的社会作用在性质上发生变化，因为科学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手段，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剥削关系的组成部分。在科学的社会学中被描述为"大科学"的东西，是科学活动垄断化的形式。知识潜力的增长，知识的滥用，对认识过程的行政管理，对职业的禁止——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科学发展的因素[24]。

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突出了科学活动的社会历史方面，因此他们在评价概括科学活动的无所不包的过程这样的科学规律时能够选择正确的角度。Г.桑德屈勒着重指出了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的科学的作用和意义，同时提出了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进步当前阶段的特点和远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一系列问题。科学进步是否会使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科学和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否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形成？科学发展的可认识性问题和预测问题，资本主义关系条件下科技革命的本质规定，都是同科学在资本主义条

件下的生产作用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Ф. 比亚拉斯分析了科技革命的性质、它的本质和趋势，把它看作包括全部社会问题在内的社会过程㉕。Г. 朗格指出了作为科学学科的"技术史"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是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矛盾性的征候，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科学的体系中的矛盾的征候，是科学在技术面前让步从而导致技术的不受控制的、自发的发展的征候㉖。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总的来说，联邦德国的科学技术进步趋势反映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反映着社会的政治法律结构和社会的阶级倾向性。

由于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认识过程的复杂化，研究实践和认识、认识活动发展的规律性和在实践中利用认识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成了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依据科学理论和科学认识逻辑，在为加速并增强社会及个人掌握科学认识过程的效率方面，起着重要的制定准则的作用。

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功绩就在于他们在联邦德国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充满紧张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坚决、彻底并有论据地保卫和制定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理论看作分析人类认识的形式和阶段的可靠手段，因为这种认识理论运用不同的范畴体系，与许多科学学科——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个性理论等等处在相互的作用中㉗。

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认为，在工人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条件下，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应该论证社会进步的必然性，自然和历史的辩证统一的必然性。因此，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联邦德国的发展，不仅对于同资产阶级哲学进行的斗争，而且对于把资本主义革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现实

的意义。桑德屈勒写道："……认识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的世界观基础之一，因为认识理论包含着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部分回答，即我们的认识可以反映客观现实"[25]。

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涉及到整个人类认识的过程和整个人类知识。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对于说明各个个别科学的意识形态世界观问题和认识论问题，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唯物主义认识理论是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工具，社会认识过程和个人认识过程的性质借助这一工具成了可以理解的事情。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意识受到操纵，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在今天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是着手于全部日常知识和日常意识。

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考虑到社会生活的物质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互相作用的复杂形式的基础上，首先把认识理论基本问题应用于社会认识。如果我们经常把社会意识与现实加以对比，那么我们就会知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的最重要的范畴是不能被看作与认识活动的主体即无产阶级无关的"反映"。"反映是表示观念再生产过程的党性思想范畴……"。"在'反映'中，物质存在在质上成为意识存在。'反映'在组织劳动的过程中执行着创造性的职能，改变着现实并且自身创造着新的客观"[26]。

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逻辑、辩证法和认识理论相一致的原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基本原则，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认识论进行的尖锐意识形态斗争中得到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联邦德国的发展证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不仅是哲学问题，而且在新的特殊的阶级斗争形式中也表现出现实意义。

二、对联邦德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科技革命后果的分析

如果说资产阶级历史哲学流派和一般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的传播时，还能够忽视西德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门科学所作出的贡献，那么在七十年代则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在联邦德国社会学家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七四年于卡塞尔）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已经作为向代表大会派有代表的一般社会学理论的五个流派之一出现了。除了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Ю．哈贝马斯、Н．卢曼、И．马捷斯和К．奥普）之外，卡塞尔普通高等学校的教授К．佳滕也在大会上阐述了研究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马尔堡学派培养出来的佳滕在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社会制度和社会变化》、《后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关系》、《社会分析的方法问题》、《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理论》等等）[10]中不仅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理论的重要性，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联邦德国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佳滕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现实任务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得出的重要结果是他的这样一个原理，即如果忽视我们的时代是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两个对立性的社会制度相对抗的时代这样一个特点，那就不能认识和科学地研究当代的一般资本主义制度和特殊的联邦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佳滕在《自然的进化、社会形态、世界历史》一书中写道：“最重要的、因而是最困难的理论任务……在于把当代世界的历史性的各社会形态的互相联系既理解为相互作用，也理解为未来事件过程的内容……对立的具体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扩大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于不可能再对自我生产的生产方式进行孤立的考察，与

此相应，不可能再对独立的社会形态进行孤立的考察，因为它们是全面社会化的互相中介的多种多样的组成部分”[31]。

如果撇开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历史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联邦德国内部过程的影响，那就不可能理解联邦德国社会制度的危机局面、矛盾的现实，并对此作出预测。我们时代的影响、它的革命性质的影响，恰恰在联邦德国比在其他资本主义制度国家表现得（通过民主德国的中介）更为强烈。佳滕在《社会制度和社会变化》（一九七二年）一书中也贯彻了这一思想。X．霍尔采尔的《进化还是历史？社会发展理论导言》（一九七八年）一书中也包含着同样的思想。

在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著作中，从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考察的关于人类起源和人类社会起源的问题，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个问题在展开科技革命的条件下对于解决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具有现实的意义。X．霍尔采尔[32]、K．霍尔茨康普[33]、K．佳滕[34]、y．霍尔茨康普-奥斯特康普[35]依据研究人的起源问题的各门科学的最新成就，开始着手这一问题。霍尔泽尔总括地代表了这些作者的思想，他以这些思想同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和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新变种（哈贝马斯、卢曼等人的进化论的职能主义思想，从系统的观点看待社会的方法）相对抗。

对霍尔采尔、佳滕、霍尔茨康普、霍尔茨康普-奥斯特康普著作中提出的原理的分析表明，他们在试图制定当代历史发展的总概念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力图克服在国内广为流行的关于历史发展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H．卢曼的社会制度进化理论；Ю．哈贝马斯和他的学生埃杰尔提出的相互作用和语言交流对社会形成的第一性思想，人类社会最初形式的生物社会制约性理论等等）。对资产阶级观点的某些让步，不彻底性的表现，看

来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估计过低，由于对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学说没有充分的理解。

到七十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最有意义的总结是三卷本集体著作《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期间联邦德国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发展。理论、讨论、社会统计分析》（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36]。这本集体著作的主要作者——Г．容克、Й．施莱夫施泰因、K．佳滕、M．佳滕-施泰因豪埃尔、X．基芬海姆和Ф．德普——于一九七〇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周围联合起来了。在第一卷《阶级结构和阶级理论》中详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分析了这一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以及把它应用于具体分析联邦德国的社会结构的方法。第二卷分析二十年来（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国内工人阶级的发展，第三卷分析同一时期内知识分子阶层的发展。这一研究的参加者之一A．莱塞维茨于一九七七年出版了该书的更通俗的缩略本[37]。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J．施莱夫施泰因为苏联读者简单地概述了该书的主要思想[38]。

这部著作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它从科学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论证了关于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它表现为西德社会的社会结构所发生的一定变化）。社会在二十年时间内明显地两极分化为两个主要的阶级——工人和资本家；科技革命引起了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相当大的变化；在工人人数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职员的人数急剧地增加了。

这一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利用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原则来确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概念。Й．施莱夫施泰因写道："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以及属于工人阶级的社会集团和个人的社会经济规定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39]。充分发展的劳动力商品形式，是大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产物，是

工人和劳动过程实际上从属于资本的产物。但是，施莱夫施泰因指出，这并不是说只应该把那些“从事物质生产并直接生产剩余价值”[40]的雇佣劳动者列入工人阶级。作者们反对把工人阶级概念局限于体力劳动范围的试图，把职员的基本群众也列入了工人阶级。

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说明资本家阶级时，揭示了这一阶级的分化，首先注意到了资产阶级中垄断阶层和非垄断阶层之间的矛盾。经理，特别是他们的高级阶层，被看作是“资产阶级中的职能集团”。属于这一集团的还有高级职员和国家垄断制度的官僚。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中间阶层，总的说来，中间阶层的份量下降了。“作为特殊的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具有双重的社会地位，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从历史上来看）不仅具有客观的进步作用，而且同时是资本剥削和统治的手段”[41]。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对联邦德国社会结构变化的考察结果，研究社会意识和国家中发生的过程。结果是到七十年代末得出了被用于科学地论证德国共产党的新的纲领草案和发展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论的资料。

正是方法论的不完善导致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作出有争议的或者错误的结论。这涉及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性质，涉及到对危机现象的估计、不同阶级的意识发展的特点、工人阶级的斗争，最后还涉及到对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的估计。

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建立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和认识方法论，指出了以P. 杜奇克为首的

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极左流派以及以 Й．比绍弗为首的集团的反列宁主义的著作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也反对奥芬巴赫（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局”的理论家。Й．施莱夫施泰因、Р．施泰格瓦尔德、В．格恩斯、Г．阿达莫、Г．桑德屈勒、И．冯·海泽勒在批判反列宁主义理论的著作中，对制定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问题涉及到列宁主义在当代的国际意义（在反对企图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多变种的马克思主义”的纯“东方的”而且似乎是“已经过时”的变种的做法的斗争中），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辩证逻辑理论，特别是列宁关于逻辑和历史的辩证法理论（与把社会理论的逻辑方法和体系结构方法绝对化相对立）的一般方法论意义。

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指出，列宁在制定帝国主义理论时期研究辩证法的一般理论并写作《哲学笔记》并不是偶然的。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逻辑和方法论，这是有效地达到对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所必需的条件。我们从马克思分析“商品”范畴和列宁分析“垄断”概念的例子可以看到，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首先是从研究对象的内在矛盾、本质矛盾出发的；它要求在现象的背后看到不只是隐蔽的、而且常常是与现象相矛盾的本质；它要求对那些由于错误地解释歪曲反映本质的假象而得到广泛流行的表面的、非辩证的观点进行批判。

列宁不是把一般理解为抛开全部丰富多彩的特殊和个别的死的抽象，而是把它理解为包含着全部丰富多彩的具体的生动活泼的、发展着的整体，列宁的这一理解对于科学地理解联邦德国的社会现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社会意识的形成时，依靠经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科技革命进程、工艺的和职业的变化过程所引起的工业工人的意识发展中的新趋势。由于围绕着从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推出”意识形式的尝试而展开的讨论，证明了资产阶级社会学企图把社会意识与被经验地理解和分类的“社会（或个人）意见”现象等同起来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资产阶级理论以及这些理论“证明”任何阶级意识都会瓦解的试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与此同时，他们还揭示了在许多工人的意识中确实占统治地位的那些资产阶级意识的具体形式：社会伙伴关系思想和反共主义因素。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是证实了当代阶级斗争的经验对工人意识形成的影响[43]。

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Φ．德普得出了下述结论：“社会意识的完整的定义不可能局限于把经验地确定的意识形式机械地归结为（指劳动和生活的经验意识的消极反映）或者形式上列入先验地演绎出来的范畴（例如，工联主义的阶级意识范畴）。同批判心理学的合作应该能有助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理解客观社会关系在工人意识中的反映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对工人的行为和活动的实际方向的意义，从而使强化的经验研究也能做到这一点”[44]。

Φ·德普认为，对联邦德国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政治意识的研究，无论在政治意识形成过程的理论方面，还是在对这些过程的经验研究方面，都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同时，关于当代国家及其在政治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科学讨论，对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联邦德国的工人的社会意识、首先是当代意识的发展过程的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是七十年代在联邦德国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派注意的中心。西柏林的马克思主义者K．霍尔茨康普教授是这一流派的最初的理论家之一。他依据苏联心理学科学的思想，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批判在西柏林大学和联邦德国各大学的心理学讲坛上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学理论和学说。K．霍尔茨

康普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制定自己特有的理论，并且为了表示同资产阶级学说相对抗，把这一学说称之为“批判心理学”[45]。

批判心理学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九年于马尔堡）的内容是研究社会意识的发展。大会的主题“对劳动和失业的批判心理说明”使得有可能不仅吸引心理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且还吸引工会运动的活动家参加它的工作。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的代表的合作是非常富有成果的，其中包括哲学领域里的合作。

因此，最近五十年来在联邦德国形成了一个研究社会意识发展的现实过程并制定这些过程的一般理论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流派。这一流派的鲜明特点之一是哲学家和批判心理学的代表人物的紧密合作。这一流派的主要研究成果在联邦德国的共产党人、工会运动左翼积极分子、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活动实践中得到了利用。

完全有理由说，在联邦德国不仅存在着资产阶级社会学，而且还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早在一九七四年召开的第十七次联邦德国社会学家代表大会就不得不承认它所取得的成就。在一九七〇年召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会议上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的批判，就是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郑重声明要科学地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的最初行动之一，在这之前，从“左的”立场上来考察这些问题一直被看作是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的“特权”。对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科学的最主要贡献，是Э．德涅、Г．容克、Х．基芬海姆、Д．波尔曼、M．佳滕-施泰因豪埃尔、K．佳滕等人的著作《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期间联邦德国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此外还出版了K．佳滕的专著《社会制度和社会变化》（一九七二年）、K．佳滕和M．佳滕-施泰因豪埃尔的专著《晚期资本主

义中的阶级关系》（一九七三年）、X．基芬海姆和A．莱塞维茨出版的文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意识》（一九七三年）。此外还有一系列研究联邦德国工人的阶级斗争及其意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著作。

在这些研究著作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同事们逐年出版关于罢工斗争和其他群众性社会运动的分析性综述。关于争取工人共同参予管理的研究著作获得了根本的意义；属于这类著作的首先是集体著作《为争取共同参予管理而斗争》（一九七一年[46]。研究科学社会学的有Г．Ю．克里斯曼斯基的著作《社会制度和科学》（一九七二年）和P．里林的著作《理论和科学社会学》（一九七五年），这些著作注意到了随着科技革命的展开而出现的问题。

代表社会意识社会学——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个新的部门——的著作有Φ．德普等人的《工人的意识。工人意识的政治社会学概述》（一九七一年）、P．佐尔格的《意识形态理论。社会意识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一九七六年）等等。在《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一九七四年）、《劳动青年——意识和行动》（一九七六年）等著作中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于一九七三——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历次科学会议的材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新流派的形成过程。

在研究联邦德国的社会意识的发展的著作中，最基本的著作是И．冯·海泽勒和他的合作者所写的《大型企业中的青年年。劳动青年的工会意识和政治意识问题概述》（一九七八年）一书。在这里第一次揭示了七十年代所特有的、在联邦德国部分劳动青年的社会主义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开始克服“社会伙伴关系”的幻想以及在老一代工人意识中曾占统治地位的若干主要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

对“群众性信息”的分析在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X．霍尔采尔在《信息社会学》（一九七三年）[8]中详细地研究了由于在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出现了群众性信息形式（电视、电台、报刊、教育体系等等）而产生的保卫和巩固联邦德国的资本权力的新的方法。他一一分析了反对利用群众性信息手段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新的斗争形式，这些新的斗争形式是当代无产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是为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取得成就的必要条件。霍尔采尔所考察的为争取整个群众性信息体系民主化而进行的斗争的形式和方式，包含在为争取反垄断主义的民主而进行的斗争的概念之中。

X．霍尔采尔早在自己的博士论文《群众性息和联邦德国的民主》（一九六九年）中就已经开始研究群众性信息手段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新的作用，后来又在《已经破产的教育？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和信息》（一九七一年）[9]中继续了这一研究。他在这部著作中分析了联邦德国的群众性信息手段领域内的实际权力，首先分析了报界巨头A．施普林格的无上权力。

X．霍尔采尔（与K．施泰因巴赫合作）出版的文集《语言与社会》（一九七二年）[10]表明了，各种社会理论如何用阶级和社会阶层的特殊差别来说明语言、思维和教育水平的差别。在这部文集中特别是苏联学者Л．С．维戈茨基和民主德国的哲学家Г．克劳斯的著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语言和思维的联系的理解。霍尔采尔在为文集中发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所做的注释中指出了斯金涅尔、霍姆斯基、哈贝马斯的思想是站不住脚的，初步提出了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他在后来的著作《关于群众性信息手段的唯物主义科学》（一九七三年）、《电视理论》（一九七九年）中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更深刻的解决办法。后来X．霍尔采尔的科学兴趣发生了某些转移：从

《作为体系的社会。在美国和联邦德国的社会学中的宏观社会学制度理论》（一九七七年）一书到《进化还是历史？社会发展理论导言》（一九七八年）这一研究著作，可以看到向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理论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社会哲学领域内的主要成就是：揭示了工人阶级在联邦德国的社会发展中的日益增长的作用；关于现实社会主义对本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日益增长这一原理的具体化；阐明了群众性信息手段在社会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确定了各种社会力量在争取反垄断主义的民主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现实可能性；揭示了吸引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即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社会进步、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同盟者的新的道路；批判了最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哲学和修正主义。

三、对资产阶级哲学、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批判

德国的资产阶级哲学、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今天仍然是国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主要敌人。因此，同这些敌人进行的斗争，在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九四五年以后作为主要流派出现的是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后者在社会学中表现得最强烈）。在战后的最初年代里，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全面展开反对资产阶级“学院派”哲学的斗争。在那个时期，他们注意的中心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50]，而后是对新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好战的复仇主义和露骨的反共主义的批判。

随着力量的积累，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已经有了一定进展的资产阶级哲学方面展开了认真的工作。在六十年代，在左翼反对力量的队伍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

而对这一学派的批判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最迫切的任务。在建立合法的德国共产党的时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反对那些年代以"新左派"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极左派力量的哲学思想基础的斗争中，已经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极左派力量企图起到议会外反对派的先锋队的作用，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思想在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斗争的旗帜下越来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

Р. 施泰格瓦尔德、Й. 施莱夫施泰因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新左派"的思想，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一样，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按其阶级实质来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的变种。这一学派的理论家自以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创造不过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变种。

Р. 施泰格瓦尔德在揭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的思想理论源泉时指出，早在二十年代，成为这一学派组织中心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成立就是由于社会党人试图一方面在当时德国各大学的"学院式"知识分子中间得到支持，另一方面制定出防止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传播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九六七年，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反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这一思想在Г. 马尔库塞、М. 霍克海默尔、Т. 阿多尔诺、Э. 弗罗姆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的著作中的哲学论据。Й. 施莱夫施泰因批判了Г. 马尔库塞在南斯拉夫科尔丘拉岛举行的国际修正主义者聚会（一九六四年）上的发言。Р. 施泰格瓦尔德对Г. 马尔库塞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作了批判分析。这一工作的最重要的总结是Р. 施泰格瓦尔德的著作《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第三条道路'》[51]。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于一九七〇年组织的纪念列宁诞生

一百周年的国际科学理论会议，详细地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它作了全面的评价[52]。从那时起，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批判“判批理论”所作的贡献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本国范围。上述会议的材料在包括苏联在内的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广泛的反响[53]。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试图把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54]。弗罗姆成了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新弗洛伊德主义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的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并且指出，在“新左派”运动中相当流行的弗洛伊德主义变种在科学上是毫无根据的，它的倾向性是反动的。

在五十——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宣称他们对科技革命的后果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作了所谓“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现实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进程所取得的成就现在受到了“左的”方面的曲解。按照这种曲解，似乎无论对美国或联邦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来说，还是对苏联或民主德国的发达社会主义来说，“发达工业社会”的问题都具有相同的特点。

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揭露这种曲解的同时一方面指出，在利用科技革命的成就和防止科技革命可能产生的消极社会后果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具有根本的优越性和质的差别，另一方面则力图探索这一革命在联邦德国的条件下的真正的社会后果[55]。

在七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家考虑到了“学派”的实际上的危机和崩溃，试图革新它的武库，以便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斗争[56]。哈贝马斯在六十年代末领导了学派“第二代”的右翼，站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改良主义立场上。一九七一年，他成了科学技术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的领导

人，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改良主义政策的制定。

正如P．施泰格瓦尔德、\．霍尔采尔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Ю．哈贝马斯制定的“交际能力”概念（以及相应的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计划），他的新的“社会进化理论”，是在“革新”或“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哈贝马斯建议用劳动一般这一抽象一般概念来代替生产方式这一具体的历史概念，用“相互作用”、语言交流基础上的个人之间的交际概念来代替生产关系范畴。

至于说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那么它早就抛弃了统一的、完整的意识形态，原则上不再有兴趣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固定于”某一哲学流派，这就预先限制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范围，有碍于它成为它所向往的“全民党”。与此同时，没有明确的世界观纲领，当代复杂问题的解决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无论在整个西德社会还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内，对政治决定的理论论证和“社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改良主义的哲学基础的批判，首先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用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为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辩护的企图的。在这一方面，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目的的问题在内的关于世界的一般目的问题，在最近获得了特殊的现实意义。如果说社会改良主义过去的特点是对思想和政策问题的纯实用主义的态度，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们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则开始赋予价值目的以越来越大的意义。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纲领（一九五九年）中规定的“基本价值”即自由、正义、团结，表现为非阶级的抽象概念，这些概念可以为任何思想政治立场服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们越来越强烈地追求把基本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变得更为抽象。为社会改良主义辩护的价值哲学形式使得有可能创造

出轰轰烈烈的理论活动的假象，与此同时避开对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作出直接的回答[55]。

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随着诸如保护周围环境、劳动条件的急剧改变和恶化、经济及其他领域中的危机现象等新问题的出现，对社会改良主义的"基本价值"概念提出了具体化的要求。其中，"生活质量"概念（它是一张良好祝愿的清单）就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Й．施莱夫施泰因在评价这一概念的社会政治实质时指出："他们的概念不过是资本主义辩护论的新的变种，这种辩护论的目的首先是减缓、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则是完全消除社会民主党队伍内的反资本主义情绪"[56]。

七十年代中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建立了进一步制定并从理论上论证"基本价值"概念的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要回答下述问题：自由和正义——是为谁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团结——是谁同谁团结？等等。但是，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的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实际上，如此广为宣扬的"基本价值"的划分和具体化并没有实现。正如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B．龙格所指出的，"基本价值"在社会民主党的方案中表现为"自在的价值"。它们"与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生产和生产力、阶级斗争和政治权力没有关系"[57]。阶级斗争的实践要求对隐蔽在"基本价值"概念背后的现实问题作出另外的解决。

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关于价值的讨论中很注意揭示价值和准则的客观源泉，很注意揭示与这些源泉相联系的拜物教观念。例如，施泰格瓦尔德在这个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作了对比，他认为，价值的性质最终要由客观原因来决定。他写道："因此，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价值。马克思主义甚至最先制定了研究价值的科学手段。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停留在动机上，而是把分析深入到人的社会思想

的源泉本身。马克思主义使得有可能懂得，这些或另一些价值以何种形式并且由于哪一个社会阶级得到了 展和应该得到发展”[58]。

价值问题、目的问题和世界的一般目标问题，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哲学问题的重要综合。但是，正如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那样，“目的定向和基本价值的清单如此抽象和笼统，以致甚至未必能找到一位对此不予赞同的保守主义者”[59]。

赋予改良主义思想以价值哲学地位（价值理论）的试图并没有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想建立一种旨在填补他们思想中的哲学真空的代用世界观的期望是站得住脚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较彻底的方法不过是利用资产阶级哲学武库中的某一流派这种惯用的而且已经成为传统的方法。类似的最新尝试是求助于批判理性主义，这种批判理性主义在最近几年里所获得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已足以使它成为各政党纲领的方法论基础。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思想家们力图在K．波佩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中找到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和政策的一般哲学论据，这就要求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分析。由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在工会里、在“青年社会主义者”中间越来越强烈地形成了与党内右翼领导的官方政策相对立的反对派，这类批判的必要性就更为迫切了。

马克思主义者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于一九七五年公布的《一九七五——一九八五年经济政治目标纲领》草案进行了详细的批判分析。й．施莱夫施泰因和K．拜尔茨写了专著来批判社会改良主义的右翼思想家用批判理性主义社会哲学来论证自己的政策的尝试[60]。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在联邦德国出版了几本《批判理性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文集（第一部文集中有联邦总理Г．施密特的序言）。在这些文集中发表文章的右翼社会改良主

义思想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武器，正是K．波佩尔在他的《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和《历史主义的贫困》等著作中表述的社会哲学应该成为社会改良主义的武器。

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哲学大会（一九七八年）明显地表现出批判理性主义在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影响的增长。以P．施泰格瓦尔德为首的联邦德国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小组参加了大会的讨论，不止一次地同马克思主义敌人根据批判理性主义思想的论证发生了冲突[61]。

批判理性主义的实证主义本质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它的社会理论上，这种社会理论把社会归结为单个个人的总体，而把社会的历史归结为受这种或那种社会状况所制约的这些个人的行动的总和。在这里，人们的行为的真正的推动力量即他们的社会经济利益并没有得到考虑，而是代之以“动机结构”，主观目标，条件反射反映、价值目标等等。正如K．拜埃尔茨所着重指出的那样，批判理性主义的社会概念不仅为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服务，而且它的使命也是要成为社会改良主义的实践的哲学依据。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已经非常流行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更强烈的追求很快就暴露出它在理论方面和政治实践方面的弱点。因此，批判理性主义的社会哲学也就没有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被普遍接受的政策基础，而只是成了为社会改良主义辩护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手段之一[62]。

H．施莱夫施泰因和K．拜尔茨的著作《‘批判理性’的神话。对卡尔·波佩尔的认识理论和历史理论的批判》用详尽的论据武装了联邦德国的共产党人，从而使他们能够同那些借助批判理性主义的新实证主义哲学对“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机会主

义概念进行哲学论证的最新尝试相抗衡。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批判了波佩尔的一般哲学观点，这种哲学观点通过对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掩盖了自己的新实证主义的本质。K·拜尔茨指出，无论是用伪造代替证明的思想，还是波佩尔对归纳法的批判，都没有超出新实证主义发展的总路线范围。批判理性主义的新实证主义本质特别明确地表现在波佩尔的社会哲学中，这种社会哲学完全建立在否定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一般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完全建立在把辩证法当作所谓纯主观的结构和“极权主义的”教条加以抛弃的基础之上。在这一方面，批判理性主义的任务是克服人关于这类发展规律的存在和作用的“日常常识”的偏见和教条。这种社会哲学在“试验和错误”的方法的基础上，在对与一切“极权主义”形式相对立的“多元论民主”的理论和辩护论的多元论理解的基础上，直接导致关于细小的社会改良政策的必要性的结论。

在德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刻，各种各样的托洛茨基主义小组在联邦德国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其中的个别小组甚至以“党”的名义进行活动，拥有自己的刊物并在左的反对派范围内散布了反列宁主义的思想。因此，对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到六十年代末期成了紧迫的任务。这一斗争在哲学方面具有意义的令人信服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的二次公开的学术辩论的记录。

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争取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的斗争的结果的基础上，在六十年代开始领导已经真正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反对新纳粹主义的危险，特别是反对国家民主党恢复希特勒主义的名誉并为新法西斯主义分子获取政权作好准备的尝试。与此同时，反动力量越来越积极地指望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右翼。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在国家民

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背后站着垄断资本，首先是它的军事工业集团[63]。

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了新的令人不安的右的危险征兆：力图为希特勒及其法西斯主义思想恢复名誉的著作在书市上获得了广泛的流传。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重新开始做大量工作来团结反法西斯力量并同大批新的法西斯主义著作进行斗争。在法西斯集中营里亲身经历了可怕的遭遇的K．巴赫曼写了《希特勒真相》[64]一书，他在书中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罪犯头目的血腥业绩和仇视人类的思想的真正本质。巴赫曼的著作也是针对费斯特在联邦德国提出的"领袖崇拜"的——（这个人创作了一本书和一部电影颂扬希特勒的人格和"思想"）。揭露费斯特的出版物的有И．贝尔林、Э．约阿希姆、Ф．乌尔里希和Ь．克勒尔的著作《费斯特隐瞒了什么？》[65]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与某些自由资产阶级倾向的批判性出版物不同，作者们把重点放在希特勒专政的阶级实质上，揭示了这一专政同垄断资本的联系，揭露了种族理论、国家主义、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

马尔堡的历史学家P．金茨尔及其学生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系统地研究了法西斯主义的历史[66]。六十年代，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发表著作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哲学基础的最新"批判者"。他们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贯穿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在战后的全部发展历史，甚至在资产阶级哲学家表面上似乎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的时候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理论家和修正主义者歪曲列宁的反映理论，庸俗而粗浅地把意识理解为消极的镜子式的反映。把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同马克思的辩证法对立起来，是同反对辩证法的"本体论化"以及把辩证法归结为"主体—客体"辩证法的做法

结合在一起的。

在为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五十周年（一九六八年于特利尔）恩格斯诞生一百五十周年（一九七〇年于乌培河谷）、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一九七〇年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而举行的科学理论会议上，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严肃地批判了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家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哲学遗产的企图，指出了这一遗产的非暂时的现实性，创造性地发展应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使之与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相适合。

德国共产党主席Г.米斯在总结和概括曼海姆代表大会前的十年（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期间内的经验时指出，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理论工作在这些年里特别富有成果。米斯着重指出，“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的信仰，把这一学说作为最重要的政治路线，是革命工人运动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正是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条件下，对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观点的批判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在这里，关键的因素是对一切对党的国际主义立场，特别是对党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思想一致的攻击给予坚决的反击”[3]。

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创造性地分析研究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对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对反对反共主义、争取和平共处胜利的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① 这些刊物发表的304篇文章中，188篇文章由社会主义各国的作者所写，其中包括苏联学者所写的101篇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作者所写的72篇。

②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在十年时间内共出版了177本书刊，其中定期刊物66本，书111本。在德国共产党的日报《我们的时代》上还有单篇文章讨论哲学问题。

③ 参看Г.米斯《德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向德国共产党曼海姆代表大会所做的总结报告》，载于《一九七八年德国共产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一书，1979年莫斯科版第1页。

④ 参看B．格恩斯、P．施泰格瓦尔德《反垄断斗争的战略问题》197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⑤ 《马克思主义读物》1974年第4期第9页；另见Г．米斯《为争取向民主和社会进步的转变而斗争》，载于《共产党人》1979年第3期第85页。

⑥ 《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进步可以控制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大学生联合会"斯巴达克"在杜塞尔多夫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载于《我们的时代》1978年8月26日。（参看莱因霍德《在杜塞尔多夫召开的第十六次世界哲学家大会》，见《马克思主义读物》1978年第6期第83—85页。）

⑦ 赫伯特·米斯同志的发言，载于1981年2月28日《真理报》。

⑧ 参看Г．米斯《一切为了和平！保卫社会的和民主的权利！》（党的执行委员会向1981年5月29—31日于汉诺威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载于《我们的时代》1981年5月30日第13页）。

⑨ Й．施莱夫施泰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研究入门》1975年慕尼黑第3版。

⑩ 参看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反杜林论）；附注释》197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写作《反杜林论》哲学部分的注释的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B．霍利切尔，哲学家A．科辛、Г．克雷贝尔和C．拉普波特（民主德国）以及P．施泰格瓦尔德（联邦德国）；写作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注释的是Й．施莱夫施泰因（联邦德国）。

⑪ 参看P·施泰格瓦尔德《马克思主义哲学。青年指南》197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⑫ Г．桑德屈勒《实践唯物主义和科学世界观》，载于《发展中的唯物主义、科学和世界观》1976年科伦版第23页。

⑬ 参看Г．桑德屈勒《实践与历史意识。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古义钩沉学概述》1973年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版。

⑭ П．普拉特、Г．桑德屈勒等人《理论和实验室。作为自然科学纲领的辩证法》1978年科伦版。

⑮ 参看《辩证法Ⅰ．哲学和科学论文集》，1980年科伦版。

⑯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科学理论研究入门指导》，Г．桑德屈勒出版并作序，197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ⅦX页。

⑰ Г．桑德屈勒《作为自然过程的社会》，载于《理论和实验室》第151页。

⑱ 《编辑说明》，载于《发展中的唯物主义、科学和世界观》第6页。

⑲ 参看Г．桑德屈勒《导言。唯物主义辩证法、科学和科学理论》，载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第Ⅶ页。

⑳ 参看《认识科学和科学的认识》1978年斯图加特版。

㉑ 参看《资产阶级社会和理论革命。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起源》1978年科伦版。
㉒ 参看《历史的主体》1980年科伦版。
㉓ Г．朗格《未受到社会科学注意的技术》，载于《认识的科学和科学的认识》
㉔ 参看Р．里林《科学社会学中优势的形成和唯物主义科学社会学的任务》，载于《认识的科学和科学的认识》第243页。
㉕ 参看Ф．比亚拉斯《过去和现在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1978年科伦版。
㉖ 参看Г．朗格《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技术》1977年科伦版。
㉗ 参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研究状况文集》，Г．桑德屈勒出版并作序，1973年斯图加特版第XLII页。
㉘ Г．桑德屈勒《实践唯物主义和科学世界观》，载于《发展中的唯物主义、科学和世界观》第40页。
㉙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第IX V—X VI页。
㉚ 参看K．佳滕《社会制度和社会变化》1972年斯图加特第2版，《后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关系》1973年斯图加特版，《社会分析的方法问题》1973年斯图加特版，《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理论》，载于《社会学的中期结算》，M．P．莱普齐乌斯出版，1976年斯图加特版。
㉛ K．佳滕《自然的进化、社会形态、世界历史》，载于《论证》1977年第101期第55页。
32 X．霍尔采尔《进化还是历史？社会发展理论导言》1978年科伦版。
33 K．霍尔茨康普《通过批判心理学从范畴和理论上来把握具体的个人和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之间的中介》，载于《批判心理学》，K．布赖恩、K．霍尔茨康普出版，1977年科伦版。第一卷《专题论文集》；第二卷《讨论文集》。
34 K．佳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理论》，载于《社会学中期结算》，M．P．莱普齐乌斯出版，1976年斯图加特版第75页及以下各页，《自然的进化、社会形态、世界历史》第10页及以下各页。
35 У．霍尔茨康普-奥斯特康普《心理动因分析基础》197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1976年纽约版。
36 《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期间联邦德国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发展。理论、讨论、社会统计分析》。第一卷《阶级结构和阶级理论。理论基础和讨论。Г．容克X．基芬海姆、M．佳滕-施泰因豪埃尔、K．佳滕论文集》1972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二卷《社会统计分析》197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三卷《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知识分子阶层》1974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37 参看A．莱塞维茨《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阶级》197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38 参看 И．施莱夫施泰因《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发展》，载于《共产党人》1977年第5期。

39 参看 И．施莱夫施泰因《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发展》，载于《共产党人》1977年第5期第97页。

40 参看 И．施莱夫施泰因《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发展》，载于《共产党人》1977年第5期第97页。

41 参看 И．施莱夫施泰因《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发展》，载于《共产党人》1977年第5期第100 页。

42 参看 Г．容克、И．施莱夫施泰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和这一理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批评者：一个通俗的回答》197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43 参看B．格恩斯《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的政党》197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44 Ф．德普《工人的意识和危机》，载于《批判心理学专题文集》（三）1978年柏林版第187 页。

45 参看K．霍尔茨康普《感性认识——感知的历史起源和社会作用。柏林自由大学心理研究所：批判心理学文集》197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卷。

46 参看《为争取共同参与管理而斗争》1971年科伦版。

47 X．霍尔采尔《信息社会学》1973年汉堡赖因贝克版。

48 参看X．霍尔采尔《已经破产的教育？》1971年慕尼黑版。

49 参看X．霍尔采尔、K．施泰因巴赫《语言和社会》1973年汉堡版。

50 K．巴赫曼《希特勒真相》1978年多特蒙德版。

51 参看P．施泰格瓦尔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第三条道路’》1971年莫斯科版。

52 参看《从马克思主义看‘法兰克福学派’》197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53 参看《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批判概述》1978年莫斯科版第10页；P．施泰格瓦尔德、И．Г．冯·海泽勒《从马克思主义看‘法兰克福学派’》，载于《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0年第8期。

54 参看格尔特内尔《工人阶级和生态学》197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科学史和科学革命》，K． 拜尔茨出版，1981年科伦版。

55 参看《基本价值讨论》，K． 拜尔茨、X．霍尔茨出版，1978年科伦版。

56 И．施莱夫施泰因《“生活质量”概念为谁服务？》，载于《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第7期第55页。

57 B．龙格《关于“福利国家和社会国家”的讨论》，载于《马克思主义读物》1977年第1期第66页。

58 P．施泰格瓦尔德《马克思主义、宗教、现代》1976年莫斯科版第125 页。

59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集体著作，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德国社会民主党到八五

年的经济政治目标纲领》197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2页。

⑩ 参看K、拜尔茨、И.施莱大施泰因《'批判理性'的神话。对卡尔·波佩尔的认识理论和历史理论的批判》1977年科伦版。

⑪ 参看P·施泰格瓦尔德《帝国主义德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1980年柏林版第265—294页。

⑫ 参看K.拜尔茨、И.施莱夫施泰因《'批判理性'的神话。对卡尔·波佩尔的认识理论和历史理论的批判》。

⑬ Л.米勒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纳粹主义剖析》1972年杜伊斯堡版。

⑭ 参看K.巴赫曼《希特勒真相》1978年多特蒙德版。

⑮ Н.贝尔林、Л.约阿希姆、Ь.克勒尔、Ф.乌尔里希《费斯特隐瞒了什么?关于电影'希特勒'的分析和文献》1978年科伦版。

⑯ P.金茨尔《文献资料中的德国法西斯主义》1975年科伦版;B.Ф.豪格《陷入绝境的反法西斯主义。对德国各大学关于科学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讲课材料的批判》1977年科伦版。

⑰ Г.米斯《关于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演说和论文选》197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35页。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奥地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有共产党人积极参加的独立的奥地利共和国的成立。在战后，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活动，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右翼社会党人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想斗争的复杂条件下进行的。对于一个地处中欧南部的国家来来说，十分突出的是周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它的社会生活施加相互敌对的影响。一九五五年签订了重建独立、民主和中立的奥地利的国家条约。这个条约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重要的贡献，并结束了国家被分割为几个占领区的局面。

在国家政治发展的所有阶段上，奥地利共产党不断同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党派进行斗争。它力求以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来反抗维护资本主义的政策。奥地利共产党的主要活动范围是企业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奥地利工会联合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集权的工会联合会之一，共产党人在它的范围内组成了工会左派联盟。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争取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不仅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也批判社会改良主义和左倾激进主义。至于谈到左倾激进主义，那么可以说，这个以“新左派”运动形式出现的思潮在过去是很弱小的，但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它开始以生态学家、“绿色哲学”拥护者的运动的形式出现。奥地利社会党通

过了改良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表明，党已不承认某些民主主义原则，不同共产党人合作，并以社会合伙的观念代替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一九七八年的新纲领中，奥地利社会党继续奉行自己过去的路线，并补充以关于奥地利从"政治民主"向"社会民主"过渡的论点。这种"社会民主"被它描述为真正的民主。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社会民主"的观念，提出开展争取企业中的民主、争取劳动者实际参加生产管理的斗争的论点[1]。

奥地利工人阶级（它的相当大的部分受社会改良主义幻想的影响）发生分裂，奥地利社会党的右翼领袖拒绝真正的历史前景他们奉行在"后工业社会"的范围内进行自由改革的方针，劳动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的调和——所有这些都使共产党人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变得更加困难。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社会民主党的观念的矛盾性，同时在解决迫切的实际问题上争取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奥地利共产党主席Φ．穆里写道："我们准备同社会党人一起为争取实现符合劳动者利益的所有要求进行斗争。"[2]

但是，对于奥地利共产党人来说，这种与社会民主党人在实际领域中，在与大资本党派的斗争中合作的决心，是同意识形态斗争、同批判分析右翼社会党的政策和作为其基础的哲学观念的矛盾实质分不开的。这种矛盾性尤其表现在：一方面，奥地利社会党在各个领域内基本上执行旨在进一步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现实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又对奥地利共产党人采取敌对的态度。以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特点是"哲学中立"，否认意识形态对改良主义实践的作用（表现在"非意识形态化"的观念中），现在这种"哲学中立"却被"再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和理论的积极性，对新观念的探索以及对旧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代化所取代了。

社会改良派把自己的"民主的"、"伦理的"社会主义观念同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实践对立起来。奥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沙尔夫强调指出：如果说以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只限于阻挠本国的革命发展，把奥地利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同列宁的观念对立起来，那么现在的社会党领导则走得更远。今天，该领导抱有野心勃勃的幻想，"想把'社会主义的可行方案'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对立起来，并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战略的范围内采取明确的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3]。

按照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维默尔的说法，右翼社会党人力图把奥地利变成"社会合伙的典型国家"[4]。他们广泛利用有改良主义倾向的工会，以便宣传阶级调和以及资本主义最近的危机的消失。正如奥共第二十二次表代大会（一九七三年）指出的，奥地利资本主义的现代危机的特点是失业率不高（约等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二分之一）。这是靠资产阶级国家对亏本企业的追加拨款和人为地增加新的劳动场所才获得的，不过这必定会导致奥地利对西欧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的金融债务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还必须指出，按国有的工业和银行在国民经济总体系中的比重来说，奥地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第一位。

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和改良主义工会的领导利用奥地利经济发展中的危机趋势，以达到加强镇压工人阶级的目的，他们扬言要增加失业人数和减少劳动场所，从而得以迫使劳动者向垄断组织作了一定的让步。奥地利产共党人不断进行斗争，反对多国垄断组织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反对破坏奥地利对外政策的中立方针的种种企图。

在政治和文化的领域中，民族的东西和国际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奥地利来说，特别有现实意义。

民族的东西和国际的东西的辩证法，包含在一九八二年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奥地利共产党纲领中，奥共主席Ф。穆里在代表大

会上着重指出："奥地利共产党是自主决定自己政策的独立政党，它的出发点是奥地利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我国全体劳动者和各民族的利益。我们的党，既在独立、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也在国际联系和团结的基础上，建立同其他共产党的关系。"[5]奥地利共产党从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并考虑到民族特点，表示反对现代资产阶级宣传中广泛使用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概念。奥共纲领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具有客观的性质，在使它们实际实现时始终要注意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普遍规律创造性地运用于具体环境。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沙尔夫写道，奥地利社会主义将具有本国的特色[6]。

国际主义的观点贯穿于奥地利共产党的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并集中表现在纲领中。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仔细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政治斗争中出现的新现象，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的东西和国际的东西的辩证法，并反对不正确地解释"新国际主义"这个术语——它在很多场合被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对立起来。沙尔夫强调指出："奥地利共产党看不出，在人们试图说明的'新国际主义'（即与共产党外的反帝力量合作的方针）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即民族的工人阶级队伍和共产党本身的团结的必要性）之间有什么矛盾，相反，认为这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补充。正是由于国际接触和联合的广泛性，各国共产党之间交换意见和开展思想辩论就显得特别重要，而且共产党人的共同倡议，能使得往往在进步运动中自发产生的、不同的、有时还是十分矛盾的倾向和政治观点，具有真正的反帝力量。"[7]

近来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非常注意奥地利民族产生和发展的特点。穆里指出："共产党人在奥地利的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中

起了先进作用，这决非偶然。”[8] 奥地利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面临着下述斗争任务：反对德国民族主义影响的残余和新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争取进一步巩固奥地利的中立和独立，争取发展事实上的民主。

马克思主义者A. 克拉尔于三十年代末写的著作，为奥共中央举办的关于奥地利民族和奥地利民族意识的形成的讨论会作出巨大的贡献。这些著作第一次提出了奥地利民族的观念，并批判了O. 鲍威尔的唯心主义的民族学说。沙尔夫写道：“奥地利共产党与克拉尔一起，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奥地利民族的客观存在，而且在自己的实际政策中也为奥地利民族的存在而斗争。”[9] 维默尔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的观点，指出奥地利人在自在的民族变成自为的民族方面已走完了相当漫长的路程。

虽然在奥地利民族的发展和团结上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近年来国内的精神状况却具有闭关自守的倾向，而且基本上面向过去。许多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奥地利生活的这一特点。文化史家B. 施米德写道：“没有一个国家象奥地利这样孤立于当代…… 文化对一个奥地利人来说成了他已经具备的东西，因此，他认为不再缺乏它了；对他来说文化已经成了现有的东西、已实现的过去事物的同义语。而过去的事物、传统、传说反而成了文化的象征。”[10] 尽管这里关于奥地利文化的自我孤立和墨守成规的说法有明显的夸张，但应当注意到，目前国内的精神生活确实在许多方面建立在过去事物的传统上。

就象在奥地利生活中具有如此巨大意义的文化一样，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哲学基本上也是面向过去，而且近来没有获得任何新东西。资产阶级哲学家П. 海因特尔就此声称：“奥地利没有自己的哲学。它应当借用外国的理论。主要的输出国是德国，其次

是英国。”[11]不过，考察一下海因特尔的说法，可以说，奥地利不仅是个输入国，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输出国，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广泛流传着维也纳小组（M．施利克、O．纽拉特、K．哥德尔、K．波佩尔、B．克拉夫特）的新实证主义思想和精神分析学（З．弗洛伊德、Э．弗罗姆）。这些思想在奥地利本国反而不象在其他国家有那么大的影响。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哲学基本上不是以实证主义和心理分析学为方针，而是以M．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本体论和天主教哲学为方针的。这一倾向在《奥地利哲学》文集中可以看到。这本文集是维也纳大学哲学系主任Л．加布里尔和Й．马德尔为维也纳国际哲学会议准备的。他们列举了这样的流派：现象学、实证主义、先验哲学、人格主义的存在主义和积分逻辑[12]。

与经历过停滞和危机的上述派别不同，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解决哲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现实问题为方针的。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四五年奥地利解放和奥地利共产党合法化时起到六十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到一九四七年），开展传播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把它的规律和范畴运用于分析奥地利的现实，探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某些问题。第二阶段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一九七〇年，在这个阶段上，奥地利共产党人展开了反对Э．费舍和Ф．马雷克集团的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在第三阶段（从一九七〇年起）上，继续探讨现代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化的条件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在党的刊物上批判新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心理分析学，并广泛阐述苏联哲学家、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哲学著作发表在奥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道路和目标》上，或由党的《环球》出版社出

锻。

尽管理论干部为数甚少，但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理论讨论会上讨论的现实问题作出了迅速的反应。

一、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问题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注意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问题。Э·维默尔、Г·卡尔特、Б·弗赖、В·霍利切尔分析了下述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阶级结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并把这一分析与意识形态斗争展开过程中的新倾向紧密联系在一起。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时考虑到下述方面：现代生产发展中的新因素，科学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点，科学之变为直接的生产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危机的加剧。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定要求更严格地计划人的居住环境，因为人将居住在愈来愈是人工造成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必须经常地再生产和完善化。奥地利共产党人支持公民倡议运动。这个运动在"要积极性，不要放射性"的口号下力求保护周围环境。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由于土壤、水和空气的污染，自然环境贫瘠化和趋于消失，还有城市的噪音，等等，使得集中和全面规划成为必要。这种规划从原则上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了现代阶段阶级斗争的特殊性、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向以及国内这些趋向的表现特点。他们特别注意在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不仅对于探讨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对于决定党的战略方针、发扬反垄断的民主、建立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

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一系列问题都在共产党的刊物和奥共中央主持的理论会议上进行了讨论[12]。

这次会议注意到:知识分子变为雇佣劳动力,这是能说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知识分子现状的基本趋向。维默尔指出:"因此,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已经历史地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他批判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表明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的持有者对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变化估计不足,只是表面上承认这种联盟的可能性,实际上并不相信它。另一种观点的维护者夸大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程度,简单地解释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的命题,并断言,知识分子的代表完全是工人阶级的成员。

与上述观点不同,维默尔认为,目前科学向直接生产力转变的过程刚刚开始,因此,不应夸大生产的自动化和自控化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渐接近的趋向的作用。在维默尔看来,夸大物质生产发展中的真实过程,就会忽视那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生产能力的利用不足、失业)。

因此,了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这对于解释科学技术革命的社会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维默尔把知识分子下定义为从事复杂脑力劳动和通常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总和。知识分子不是超阶级的社会集团,不是上流社会,不是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的简单总和。知识分子是复杂的、矛盾的社会集团,它并不翱翔于阶级之上,而是依赖于阶级划分的。

维默尔把列宁的阶级定义运用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结构,并得出结论说:知识分子不可能是独立的经济的阶级或独立的政治力量。按照列宁的标准,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则倾向于工人阶级。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基本阶级采取中立的立场,尽管根据他们的客观情况,他们是关心同资本主义的斗争的。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技术主义的观念（Д.盖尔布赖的特"新技术结构"、Д.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批判了关于"消费恐怖"的左倾臆造，等等。维默尔提出列宁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学说来反对左倾的"反文化"观念，并强调指出，必须更正确、更深刻地理解工人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

B．西尔柏迈尔在谈到奥地利科技知识分子发展的特点时指出，在他们当中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增加了；年轻专家的数量迅速增加（35岁以下的占科技知识分子的55％）。大部分知识分子在中等企业和大企业工作。奥地利科技知识分子的物质状况的典型特点是，他们的工资水平与其他国家的科技知识分子相比还不够高，这就促使他们迁居国外，而"人才流失"，从许可证的购销情况来看，又引起奥地利的逆差的增加。

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尽管科技知识分子的发展有互相矛盾的趋向，但在目前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科技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的接近仍是占优势的趋向。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加深了人道主义的教育理想和培养社会主义者的精选制度之间的矛盾。

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研究了为创立反垄断的民主而斗争的任务，并从反垄断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和吸引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参加反垄断斗争的角度对反垄断的民主作了分析。

马克思主义者详细研究了妨碍工人的阶级意识发展和阻挠共产党人为统一工人运动进行斗争的种种因素。从这些因素中首先可以举出"社会合伙"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体系。这种体系在相当多的工人和职员中颇为流行。

因为工人阶级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日益成长，中间阶层的不同社会集团的代表加入工人队伍、雇佣劳动大军增

加，职员、科技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逐渐接近，所以要确定这个阶级的界限，就更为困难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乘此机会把社会学研究的重点转向知识分子、并溶化雇佣劳动者中的工人阶级，否认工人阶级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革命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和政治团结是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条件，他们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区别对待工人阶级的不同社会集团，考虑到工人的阶级意识的不同水平。

共产党与奥地利社会党的相互关系，是创立反垄断的民主制的范围内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奥地利社会党的领导，象工会领袖一样，与大资本有密切联系，维护它的利益，因此支持反共主义。另一方面，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部愈来愈深刻的政治分化，并分出社会党人左翼。共产党人着重指出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左的倾向，并为工人运动的统一而斗争。但是，正如维默尔指出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行动统一，只有共同参加艰苦的阶级搏斗才有可能。"[14] Φ．菲恩贝格在审查创立反垄断的民主制以及与社会民主党可能联盟的任务时，警告不要用改良主义观点解释民主运动的发展[15]。

反垄断的民主制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与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政治多元论观念的评价是密不可分的。与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同，维默尔认为资产阶级政治多元论观念的发展不是只有一个阶段，而是有两个阶段。这个观念最初是作为对资产阶级国家"无限权力"的增长的反动而产生的，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是进步的。目前这个观念的功能已根本改变，因为"过去基本上是作为抵制'国家的无限权力'而产生的东西，今天客观上已基本是对与国家一体化的观念的论证，是'多元分掌政权'"[16]。

多元论的理论家只承认政治力量角逐中的“动力平衡”，而这个理论范围内的进步顶多只是一些微小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范围内，任何一个集团都不能破坏“平衡”，因此，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只能有政治的量变。

维默尔把多元论评定为各特权集团的政治统治形式，因为实际上，多元论“游戏”的规则不许反映各阶级的利益。多元论观念的主要缺陷在于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质估计不足。宣传在同样条件下以改良主义的方式改变政治制度，这种做法只能巩固以前的阶级统治。社会结构的真正改变，只有通过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质变，才有可能。

维默尔着重指出，政权和所有制关系根本改变的历史必然性造成一些幻想：似乎“在垄断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广泛的民主的上层建筑’，这样的上层建筑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它溶化在资本主义中”，或者断言，“资产阶级的国家可以建筑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如果说，宗派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一种统治形式而不是别的什么，那么，机会主义者则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不是统治形式，而只是权利、取得和机会”[17]。

维默尔强调指出，必须辩证地、全面地对待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矛盾的趋向，因为“社会的均衡化总是引起更大的社会不平衡，而垄断化首先会加速当时具有日益进步的超异化形式的事物出现”[18]。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新趋向之一是舆论工具的作用日益增长。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正广泛地讨论这个问题，并批判了作为“第四权力”（其他还有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的舆论工具和观念，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假出版自由。B·艾希鲍尔写道，资产阶级的大众信息手段的特点是：主观主义，竭力歪曲真实事实，损害个人声誉[19]。资产阶级竭力阻挠工人阶级

意识的发展，向劳动者灌输反共思想。在对居民的思想改造上，大众信息手段，特别是电视，具有显著的作用。大众信息手段正在成为社会化以及使人们接受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最有力工具。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分析了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B·霍利切尔认为，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把个人意识孤立起来，把个人描述为某种自满自足的孤独的东西。事实上，个人的意识，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反映社会的意识，也促进社会意识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注意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一的宗教问题，世俗化的趋向，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对话。霍利切尔说明了宗教是错误的把握世界的形式，但同时强调，必须具体地、有区别地对待教会和教徒。在奥地利，也象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日渐缩小，因此，教会力求适应新的情况，有时也转入思想上的反攻。这个复杂的教会分化过程是教徒内部（其中一部分教徒力求改造资本主义世界的危险的和卑鄙的人）以及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的征兆。

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主张在争取社会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斗争中采取统一行动，并欢迎任何“能促进统一，促进共同合作（其中包括同那些企图借助错误的宗教意识来把握现实的人）”的讨论[30]。

近来在奥地利，在世俗化和宗教信仰低落的条件下，有关无神论问题的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化了。梵蒂冈负责与非教徒对话的秘书处主任，奥地利的红衣主教Φ·克尼格攻击科学的无神论，硬说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不是以科学，而是以信仰为基础。他说，现代科学的实验材料和经验方法，驳不倒作为最高存在物的神，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科学基础。克尼格断言，在人类

历史上宗教观念是一直存在的。

霍利切尔驳斥了这种论据,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六〇年就已表明，能量守恒和转化的规律使无中生有成为不可能。爱因斯坦的一般相对论也反驳了天主教关于从无中创造世界的教义。克尼格关于宗教自古有之的论断也与现代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资料不符[21]。

霍利切尔提出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握自然，以之反对宗教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揭示这种把握的实质，是霍利切尔最近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社会存在物的观点解决了这一问题[22]。他驳斥了宗教的和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理论，说明了作为"造物主本身"的人是在劳动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可见,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分析,是紧密地联系着现代意识形态斗争的迫切任务以及国内精神状况和政治状况的特点进行的。

二、自然和人的辩证法问题

由于自然科学领域中新的发现和就这些发现进行的广泛讨论，转而研究哲学发展的迫切问题，已成为奥地利学者的传统。在《道路和目标》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和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大部头著作中，叙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以及自然和人的辩证法，从哲学和思想上概括了新的科学资料。从这些著作中可以举出B·霍利切尔的《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一九六五年第三版，一九六六年译成俄文)《科学世界图景中的人》(一九六九年版，一九七一年译成俄文)。

霍利切尔从创立科学世界图景和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角度，研究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令人信

服地揭示了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他说，虽然列宁不知道一九二五年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已经发展了《自然辩证法》所包含的许多命题，这就确凿地证明了辩证方法的普遍性和客观性。霍利切尔叙述了列宁的物质定义对于批判"物理学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意义，着重指出，物质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这证明物质是永久地合乎规律地变化着的，是不可消灭和不可创造的。列宁的物质定义不仅说明了存在的不同形式，也说明了客观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地存在着的整个现实。

微观世界领域的新发现确证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基本粒子只有在相互联系和它们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理解。霍利切尔写道："核的质的差别是由于核粒子在质上有多样的结构而造成的。核中引力和斥力的矛盾运动在一种条件下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在另一种条件下又使它们分开。可见，客观辩证法控制着微观现象的世界。"[23] 他把空间关系下定义为物质构成物的相互位置(共存)的真实关系，把时间关系下定义为物质过程彼此相继的真实关系，即物质过程连续不断发展的关系。霍利切尔强调说，时间和空间不是思辨创造的产物，而是运动着的客观存在形式。

霍利切尔在考察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时不仅联系了微观世界领域的发现，而且也联系了具有重要世界观意义的宇宙研究的发展。霍利切尔继恩格斯之后视宇宙为发展着的天体总和。它的基本矛盾就是引力和斥力。这里，在空间和时间上无限的物质存在于无限多样的形式之中：宇宙辐射、弥漫物质、行星、卫星、恒星和总星系。霍利切尔有说服力地驳斥了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关于宇宙"有始有终"的观念，指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成为真正科学的研究宇宙的方法论。

霍利切尔在研究生命的起源和发展时着手分析生物学和人类

学、人的生理学的哲学问题，在这些科学的基础上着手辩证地考察物质的不同发展形式，并批判这个问题上的庸俗机械论和唯心主义的观点。

霍利切尔批判了资产阶级哲学家П．约尔丹（他把偶然性和非决定论等同起来）对量子理论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这个批判是很有意义的。约尔丹断言，有机生命从它出现时起就是这样从无机界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它的产生不是由于可以预见到的因果必然性，而是由于偶然性或造物主的怪癖。在他看来，生命的发生过程无非是单个的、独特的量子突变，这种突变引起能繁殖的分子第一次出现，因此，这一过程不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而是根据神的意志完成的。霍利切尔写道，这种唯心主义的解释，不仅对于生物学，而且对于物理学本身，都是一种哲学谬论。

霍利切尔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批判了Ж．戈比诺、Х．切姆贝尔兰、К．皮尔逊的种族主义的和伪科学的理论，В．沙尔迈埃尔、Э．海克拉夫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他指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为创立科学的自然图景，为有充分论据地批判和驳斥各种伪科学理论，提供了真正科学的和世界观的基础。

霍利切尔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为指导，分析现代人的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特点。他阐明了社会的、生物的和心理的东西的辩证法，并以不同科学的材料为基础，揭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原理。

霍利切尔在分析社会的东西和生物的东西的关系时批判了З．弗洛伊德和К．洛朗齐的观念，批判了资产阶级侵略理论的心理分析学的变种和生物遗传决定论的变种。这位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转而批判心理分析学和生物遗传决定论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歪曲，这决非偶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的危机日益加深，阶级斗争日益加剧，各种导致资产阶级社会解体的形

式，如犯罪、酗酒、吸毒等等日益普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社会人士的注意力自然集中于寻找引起危害社会的现象和社会动荡的原因。但这些现象的原因往往是用弗洛伊德和洛朗齐的观点来解释的，因而他们的著作在奥地利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广为流行。

资产阶级的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力图根据这些理论来驳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利用生物学的威望来创造表面上是科学的，实际上是伪科学的理论，似乎这些理论能证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性质和反人道主义性质是有道理的。霍利切尔在对弗洛伊德的解释中深刻地分析了心理分析学问题，批判了Э．弗罗姆和Г．马尔库塞想用心理分析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学是不能相容的。

霍切利尔令人信服地批判了弗洛伊德主义的企图，即把人的社会本质归结为个别人的行为，又把个别人的行为归结为某些似乎产生于人的天性中的永恒不变的本能。他着重指出，对弗洛伊德来说，具有代表性的不仅是把心理的东西生物化，把社会的东西心理化，而且还机械地解释生物的和社会的过程。霍利切尔认为，如果从社会存在出发，是可以正确说明世界观和心理学的问题的，不过，社会存在本身决不可能从意识到的东西，更不可能从未意识到的东西中引伸出来。他承认未意识到的心理活动的作用，但认为这种活动依赖于意识到的活动。他指出："我们在批判弗洛伊德对人及其行为反应的动机的解释时，承认他提出的下述原理有一定的意义：抑郁的冲动在一定条件下可导致明显的生理和心理的紊乱，这种紊乱往往是病人自己意识不到的。"[24]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霍利切尔最早详细评论了洛朗齐的个体生态学、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洛朗齐断言，各种生物机体生来就具有针对自己同类生物的侵略性。同类的动物挤满有限的生活空

间，致使食物来源枯竭，因此动物表现出侵略性。洛朗齐在名噪一时的著作《文明人类的八项死罪》（一九七三年）中把动物的侵略行为与人的侵略行为混为一谈。

霍利切尔对洛朗齐关于侵略性的观念的批判，既在于反对不正确地解释动物的侵略性，也在于反对毫无根据地把动物行为的的规律性推广于人。霍利切尔在描述动物处于特别恶劣条件下的行为时作出结论说：在动物那里看到的不是侵略性，而是由于相对的“人口”过剩而引起的紧张。他还批判了另一个以个体生态学方法来研究人的问题的代表，美国的作家和社会学家p.阿德里。阿德里把“占有欲”提升为社会的、生物学的、人和动物生活的基本规律。“占有欲”是与动物行为的无数事实相矛盾的。这些事实驳斥了所谓领土本能，从而打击了生物遗传决定论关于人的行为的图景。

霍利切尔反对阿德里关于人生来就有侵略性的论断。他写道无论是在研究类人猿时，或是在研究人的长期形成过程中，都未能找到证据来证明个人侵略或集体侵略的生物程序。硬说人生来就有侵略性和竭力强占领土，这就意味着把个别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推广于所有类型的社会，把现在的侵略冒充为准则。这种关于人的发展的悲观主义观点妨碍了社会进步，掩盖了对抗性社会中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25]。

个体生态学对侵略的解释，忽视了社会因素的影响，忽视了人们的生物学上的多样性和人所特有的个人创造才能。霍利切尔指出，人们按其本性来说既不是侵略的，也不是爱好和平的；人们成为这样，是由于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社会环境和各人经历的复杂相互作用。他揭露了现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说的主要的方法论缺点：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的学说错误地外推到社会发展上，忽视现代文明发展的新阶段[26]。

霍利切尔也考察了生物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的关系的其他重

要方面，特别批判了“新左派”意识形态的前辈之一B．赖希的“性革命”观念。赖希从弗洛伊德的立场为人的本性下定义，企图用性革命偷换社会革命，“而在考察性解放问题时把它同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割裂开来”[27]。

霍利切尔经常注意自然科学的发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和范畴，这有助于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世界观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

三、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哲学修正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斗争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修正主义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贯穿在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著作中。关于这方面的批判，上面已经讲了一部分。

霍利切尔的文章《列宁、恩斯特和维也纳小姐》是从方法论方面批判资产阶级哲学的典型例子。该文第一次发表在为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而出版的《道路和目标》专刊上。霍利切尔在该文中恢复了二十世纪初维也纳的精神和政治的气氛，分析和高度评价了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指出列宁对唯心主义的社会根源以及认识论和哲学史的分析是深刻的和有说服力的。他在补充列宁的评价时说明了马赫的思想观点的复杂性和矛盾性。马赫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但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拥护进步的政治观点。霍利切尔强调说：“除了必须批判马赫的哲学思想外，还不应该忘记他在物理学上的功绩和勇敢的积极的政治立场。”[28]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批判资产阶级的观念，而且也批判“新左派”理论家们的折中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

者在分析“新左派”的矛盾的意识形态时批判分析了资产阶级的左倾激进的思想家们的著作（这些人宣扬“伟大的”否定、“反权威的革命”和Г. 马尔库塞及其追随者的哲学观点），揭穿了革命空论的实质及其反革命的空想主义。Б. 弗赖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反映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而马尔库塞则相反，——从科学到空想。”[29]正是空想主义把马尔库塞的总体否定的哲学同现代的新无政府主义观念联系在一起。“马尔库塞的方法的出发点（和预想的目标）是理想主义的自由，也就是这样的公设：自由的进步以自由意识中的进步为前提。”[30]

弗赖在分析社会中的自由和秩序之间的不间断的辩证联系时批判了新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论点。他不仅更准确地说明了大学生的新无政府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新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差别，而且也说明了真正的自发无政府主义运动和反权威主义的哲学文学遗产之间的差别。这种遗产旨在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按其客观内容来说是反动的，它将会使反帝运动遭受损失[31]。弗赖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尽管新无政府主义运动及其意识形态已经土崩瓦解和有深刻矛盾，但“新无政府主义很容易同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溶为一体，并具有一个公分母即反共主义”[32]。

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奥地利共产党人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奥地利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趋向，从六十年代中期起，也就是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出现类似趋向时，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揭露了这些趋向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会上提到：“反对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仍旧是现实的。当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的宣传，在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最喜欢把希望寄托在民族主义趋向

上，特别是那些采取反苏主义形式的趋向上。他们怂恿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去干同样的思想勾当。他们似乎向机会主义分子说：你们快证明你们是反苏者吧！我们将准备宣布，你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你们快采取完全'独立的立场'吧！附带说一下，事件的进程表明，这些人正走上反对本国共产党的道路。这方面的例子——在法国有加罗迪式的背叛者，在奥地利有费舍式的背叛者，在委内瑞拉有佩特科夫式的背叛者，在意大利有'宣言'派活动家这样的背叛者。"[33]

奥地利修正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增长以及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加强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对部分工人阶级来说实际上是最严重的政治危险。奥地利共产党在国家条约签订后就碰上了这种危险。

助长修正主义传播的另一个因素是社会改良主义的作用在国内思想和政治生活中增大了。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哲学修正主义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34]。用Э·沙尔夫的话说，对必须"克服教条主义并根据当代和各国的特点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论点的不正确解释，在奥地利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趋向的产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35]。

这样的观点首先可以在以前的奥共理论家之一Э·费舍那里看到。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描绘成"凝固的、僵化的、简单化到教义问答的地步"的意识形态[36]。他提出一个命题：作为"错误意识形式"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共存"妨碍思想的自由传播。费舍以群众喜爱一致的、标准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和精神上的优秀人物不受意识形态束缚为理由，来否认阶级社会中认识的社会制约性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质。

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某些人企图把意识形态解释为非阶级的"错误意识"[①]。菲恩贝格写道："如果有人谈论马克思主义，

而且还企图挑起争论，那么他就不应当重复同一个老的真理，即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不是凝固的，不是不变的体系，而是应该想起另一个老的真理，即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斗争的学说……”[37]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分析了修正主义者对异化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和马列主义的国际性质的歪曲。、

六十年代，修正主义者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异化问题。他们企图借助这个问题重新审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修正主义的解释中，异化概念被剥夺了具体的历史的内容，并被机械地转用于评定现代社会现象的发展，其中包含转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费舍在其著作中创造了一个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的“模式”，这里似乎存在着“神秘莫测的”社会关系、暴力和伪善。他篡改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把它的一些缺点和困难拔高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实质。

霍利切尔在批判修正主义的异化时指出，费舍之所以需要异化问题，不是为了研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的加深或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异化消灭的过程，而是为了给社会主义硬加上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矛盾，实质上就是为了证明这些矛盾是永久的，原则上不可解决的[38]。霍利切尔揭露了修正主义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的观念进攻的思想意图。他指出，从抽象人本主义观念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尝试，关于一般人而不是关于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种种议论，都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费尔巴哈学说”，而与马克思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具体地历史地理解人及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从而克服了抽象的人道主义[39]。

分析Φ. 马雷克歪曲社会主义理论，在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雷克的被大肆宣传

的《世界革命的哲学》是一本经他评注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葛兰西的引文集。他在这些评注中驳斥了宿命论的社会发展观，但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唯意志论，把历史主体的活动提到首位[13]。

马雷克的《世界革命的哲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把世界革命运动分裂为许多按自己规律发展的、各自独立的革命解放斗争的细流，它把特殊的东西绝对化（这是否认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的结果），并以根据现代条件重新审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为借口，拒不承认这个理论的许多基本原理。

霍利切尔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补充和歪曲》是批判马雷克的修正主义观点的第一批著作之一。他在其中称马雷克和费舍的观点是“时髦的、但往往又是不时髦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廉价广告”，是我们的敌人的意识形态市场上的畅销货的廉价广告[14]。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马雷克对社会决定论和自由问题的解释。他这种解释使他得出关于革命过程的前景的主观主义结论。霍利切尔就此写道：历史的实践证实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历史过程的意义和方向的学说。“尽管历史唯心主义只提出人道主义的公设并慷慨激昂地号召予以实现，但问题在于：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科学地认识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并在说明人过去和现在怎样创造自身的问题时确定人根据合理的倡议可能并正在成为什么”。[44]正是客观规律决定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在历史过程中客观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辩证地交织在一起。

为了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费舍和马雷克企图制订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观念。这些观念的意识形态目的就是，否认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把“具有人的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同现实的社会主义对立

起来。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一般哲学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模式”的观念拒绝一般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的辩证法并损害一般的东西，而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观念的基础就是反苏主义。

奥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七四年）在进行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观念的总结时指出：“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模式，其中包括奥地利的模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是按照必须加以创造性地运用的一般规律性并考虑到民族特点而建立起来的。”㊸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修正主义者对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的解释。修正主义者硬说，科技革命的发展促使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上升，从而消除了以前的阶级关系和对抗性矛盾。他们把科技革命视为“后工业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性质似乎是由科学和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决定的，同时对进步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素似乎退居次要地位。修正主义者作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消灭，并不意味着异化的消灭，并不为开拓人的潜在可能性创造条件。因此，他们拥护趋同论的追随者的论点：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是同样的。

在奥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的决议中谴责了类似的趋向：“当这种趋向与破坏反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基础的那些理论同时出现时，它就特别危险。在这些理论中还有这样一个命题，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对立的制度似乎在合乎规律地接近，而社会主义为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似乎是多余的。”⑭

修正主义者对科技革命的实质的解释达到承认两种对立的社会政治制度趋同的地步，这种解释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现

代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的修改。费舍声称：现代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无产者，在这个阶级中，熟练工人、技术员和工程师之间的界限已开始模糊了。在费舍看来，人和机器的“冲突”以及其他在生产关系范围之外的冲突，成为主要的冲突。他认为，反抗一切过时事物的青年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正成为基本的革命力量。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这些对工人阶级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的论点。奥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七〇年）决议指出：“决不可忽视下述情况：工人阶级由于他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现在是将来还照样是革命改革的决定性力量。”[45]

维默尔在谈到知识分子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时指出：知识分子队伍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下发生的社会分化，日益推动他们采取左的立场，唤起他们对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心。右倾的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不断阻挠这部分知识分子和“新左派”运动同工人接近的过程[46]。

马克思主义者从原则上批判了把马克思和列宁对立起来的做法。菲恩贝格写道：“目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为了马克思的学说，而且毫无疑问，在不小的程度上是为了列宁的学说。列宁发展了作为生动的辩证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47]

在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复杂和关于所谓西方共产主义问题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了国际主义问题。在奥共中央向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作的总结报告中谈到：“反共力量企图用它发明的术语‘西方共产主义’，挑起西欧各共产党之间的不和，并利用这一术语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

兄弟党，特别是反对苏联共产党。”[48]

为了批判“西方共产主义”，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革命过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时创造性地运用了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正确地认为，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模式，只有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的一般的和特殊的规律性是实在的。

奥地利共产党人受到反动势力的压力，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正如Φ·穆里在奥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他们成了玩弄革命词句的普通社会民主党人。

马克思主义者还从阶级的立场批判了奥地利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与Э·伯恩施坦宣布的标准的改良主义公式“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相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奉行这样的公式：“最终目的是一切，运动是微不足道的”。正如马克思主义者着重指出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宣传的只是这样的最终目的：“民主社会主义”，达到无阶级的社会和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奥地利社会党的政策与这类理想相距甚远，并没有筹划怎样在实际上实现所定的目的。在理论上宣布“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在实际上不这样做，这就是现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实质。

右翼社会党人的理论知识包括下述资产阶级的理论：“后工业社会”、“无产者消失”、新弗洛伊德主义，等等。Б·弗赖写道：“社会党现领导所实现的再意识形态化，旨在宣传‘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用漂亮词句和反共主义贯串起来的。”[49]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进行反对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斗争，同时支持奥地利社会党内的左派力量。这批左派力量反映工人阶级中那些在传统上与社会民主党联系在一起并响往社会主义前景的阶层的利益[50]。

左翼社会党人的特点是改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O·鲍威尔的“一体化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弗赖写道：“O.鲍威尔的理论基础，就是把‘各种客观的社会因素’机械地非辩证地混合起来。把这些因素绝对化，成了他评价改良主义的根据。‘各种客观的社会因素’，离开它们对意识的反作用，离开对思想上层建筑的作用，就会陷入绝境，而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51]除此之外，弗赖还指出，与奥地利社会党现领导不同，鲍威尔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书中，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52]。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注意到奥地利社会党的纲领性文件中的某些积极因素。这些文件旨在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令人愤怒的缺陷：失业、通货膨胀、犯罪增加、庞大的国家机器。因此，进行下述活动的前提是存在的：即就探讨共同行动纲领的问题组织共同的商讨，以求达到限制垄断的权力和反垄断的民主的目的。

总的来说，奥地利社会党纲领草案虽然有个别积极因素，但在奥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对它的评价是“继续向右转，进一步迁就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机会主义实践”[53]。奥地利共产党人批判了奥地利社会党领导的反共立场，主张与社会党的一般党员建立同志关系。马克思主义者从劳动和资本的基本矛盾出发来决定行动统一的问题[54]。

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是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右翼社会党领导人的政策。他们目前加强反共宣传，以维护资本的利益。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这种政策违反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违反了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和所有反垄断力量的联盟的客观必然性。“奥地利社会党在自己的纲领中赞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化和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但实际上它执行的政策还是为保存和巩固资本主义服务的。”[55]

奥地利共产党主张进行商讨，以便采取共同行动并为工人运动的联合创造前提。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奥地利工人阶级的优良革命传统，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 参看B．西尔柏迈尔《‘社会民主’的形式和争取企业中的民主的斗争》，载于《道路和目标》1979年第10期第341—343页。

2 Φ·穆里《社会党政府》，载于1970年《道路和目标》第6期第1页。

3 Э·沙尔夫《奥地利社会党的抉择》，载于《道路和目标》1970年第6期第4页。

4 Э．维默尔《谈谈我们斗争的特点》，载于《道路和目标》1978年第1期第47页。

5 《奥地利色彩的社会主义：奥地利共产党纲领，弗朗茨·穆里同志在1982年1月30日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1982年1月31日《人民之声报》第1版

6 参看Э．沙尔夫《论奥地利共产党纲领》，载于《共产党人》1983年第3期第87页。

7 同上书，第34页。

8 Φ．穆里《前言》，载于《道路和目标》1979年特刊《关于奥地利民族和奥地利民族意识的产生的讲坛辩论》第1页。

9 Э．沙尔夫《奥地利共产党为民族独立而斗争：论阿尔弗雷德·克拉尔的理论著作的现实意义》，载于《道路和目标》1979年特刊第9页。

10 B．施米德《造型艺术》，载于《新奥地利》，魏因齐尔和斯卡尔尼克编，1975年格拉茨和维也纳版第313页。

11 H·海因特尔《哲学》，载于《第二共和国》，魏因齐尔和斯卡尔尼克编，1972

年维也纳和科伦版第2卷第404页

12 参看《奥地利哲学》，加布里尔和马德尔编，1968年维也纳版第5页。

13 参看《关于奥地利知识分子的状况：1975年6月19日理论会议纪录》，奥共中央知识分子工作委员会编，1975年维也纳版。

14 Э.维默尔《反垄断的民主和社会主义》1974年维也纳版第85页。

15 参看Ф.菲恩贝格《争取工人和人民团结的斗争中的重要里程碑》，载于《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5年第7期第52页。

16 Э.维默尔《什么是多元论》，载于《道路和目标》1977年第3期第123页。

17 Э.维默尔《争取民主的斗争的重要性》，载于《道路和目标》1979年第2期第71页。

18 Э.维默尔《"新"国家是新的吗？》，载于《道路和目标》1979年第1期第30页

19 参看В.艾西鲍尔《舆论工具的结构和功用（3）》，载于《道路和目标》1977年第11期第429页。

20 В.霍利切尔《科学世界图景中的人》1971年莫斯科版第383页。

21 参看В.霍利切尔《是宗教的无神论吗？》，载于《道路和目标》1977年第11期第427页

22 参看В.霍利切尔《人的自我创造》，载于В.霍利切尔《动物和人》1971年维也纳版第267—277页。

23 В.霍利切尔《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1966年莫斯科版第164页。

24 В.霍利切尔《人和侵略：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弗洛伊德和洛朗齐》1975年莫斯科版第88页。

25 参看В.霍利切尔《侵略本能和战争：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一次讨论会》1973年斯图加特版第40页。

26 B. B. 德尼索夫在指出霍利切尔著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时指出："霍利切尔力求对资产阶级的这些关于压迫和侵略的基本概念进行最深刻的和全面的批判分析，但我们感到，他在某些情况下，在考察他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时，过分地陷入纯医学、生物学和生理学问题的领域，而且不总是对某些自然科学的成果以及它们特有的科研方法和形式进行在该场合所必需的详细评论和着力描绘。"（B. 德尼索夫《侵略：遗传本能还是社会的现象？》，载于B. 霍利切尔《人和侵略》第7页）

27 B. 霍利切尔《过度紧张的性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性解放》1975年柏林版第77页。

28 B. 霍利切尔《动物和人》第346页。

29 Б. 弗赖《无政府主义的空想，自由和秩序》197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16页。

30 同上书，1978年版第117页。

31 参看Б. 弗赖《无政府主义的空想，自由和秩序》197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0页。

32 Б. 弗赖《新无政府主义的绝境》，载于《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1年第期第74页。

33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资料汇编》1971年莫斯科版第21页。

34 Э. 费舍承认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自己观点的演变有影响（参看Э. 费舍《回忆和反省》1970年汉堡版第345页）。Б. 弗赖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了这一问题。参看《恩斯特·费舍》，Б. 弗赖编的文献汇编，载于《观点和文献》1968年第1期第28页。

35 Э. 沙尔夫《赞意识形态，不应调整而是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1968年柏林版第8页。

36 Э. 费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载于《道路和目标》1955年第5页第3、4

页。

㊲ 《道路和目标》1965年第6期第426页。

㊳ 参看B·霍利切尔《科学世界图景中的人》1969年维也纳版第352页。

㊴ 参看B·霍利切尔《动物和人》第307页。

㊵ 参看Φ·马雷克《世界革命的哲学。革命理论名言集》1966年维也纳等地版第71页。

㊶ B·霍利切尔《马克思主义——补充和歪曲》，载于《道路和目标》1970年第1期第8页；还可参看伊斯佩雷尔《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与弗兰茨·马雷克的关键性争论》，载于《观点》1969年第3期第3—25页。

㊷ B·霍利切尔《列宁的社会发展观》，载于《道路和目标》1970年第7—8期第37页。

㊸ 《奥地利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1975年莫斯科版第81页。

㊹ 《奥地利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载于《道路和目标》1969年第2期第59页。

㊺ 《奥地利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载于《道路和目标》1970年第7—8期第55页；还可参看P·朗格《'老的'和'新的'阶级》，载于《道路和目标》1976年第6期第34页。

㊻ 参看Э·维默尔《'新左派'和老右派》，载于《道路和目标》1970年第5期第11页。

㊼ Φ·菲恩贝格《列宁确实是这样说的》，载于《道路和目标》1969年第6期第36页。

㊽ Φ·穆里《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中央委员会向奥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载于1977年12月11日《人民之声报》。

㊾ 《道路和目标》1973年第1期第9页。

㊿ 奥地利社会党中左派力量的理论家И·欣德尔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把右翼社会

党的工人运动政策描述为“社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化”，这种非社会主义化会导致“在精神上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士投降”。Э．维默尔高度评价了这一著作（参看《道路和目标》1970年第6期第27—30页）。在欣德尔斯看来，社会合伙的主张是奥地利社会党活动中的根本错误（参看欣德尔斯《社会合伙是错误发展的核心》，载于1980年9月10日《人民之声报》）。

⑤① Б．弗赖《是奥托·鲍威尔的文艺复兴吗？》，载于《道路和目标》1980年第1期第8页。

⑤② 同上书，第9页。

⑤③ Ф．穆里《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中央委员会向奥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载于1977年12月11日《人民之声报》。

⑤④ 参看Э．维默尔《面孔向外》（谈迫切的联合行动问题），载于《道路和目标》1979年第4期第127页。

⑤⑤ 《奥地利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1页。

第　六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美国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传播、创造性应用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动是在十分复杂和困难的条件进行的。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共势力和反苏势力主要的军事、政治和思想堡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工业"繁荣"的年代，美国庞大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获得了巨额利润，这使它们能够大大巩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阵地。在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过程中，产生了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所谓"第三世界"的经济中确立了自己地位的巨大的跨国公司。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组成部分——军界工业界集团（军事部门和军事工业垄断组织的联合）——在美国具有最发达的形式。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说，美国的整个经济不断受到一些消极因素如生产过剩危机、货币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通货膨胀和失业现象等的影响，这个经济是服从于军界工业界集团的利益的。在五角大楼的压力下发动的新的一轮军备竞赛，使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化，增大了世界热核战争的危险。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批评了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方针，指出了进行对话来解决尖锐的国际问题的必要性："经验表明，在这里，决定性的环节是举行最高级会谈。这一点在过去是正确的，在今天也是正确的。

苏联希望与美国保持正常的关系。无论从我们两国人民利益的观点来看，还是从整个人类利益的观点来看，没有其他明智的道路。”[1]

正如美国共产党新纲领所指出的，参加军界工业界集团的军界上层人物，金融家，公司经理，“争取签定获利丰厚的生产和出售最新致命技术合同．他们是核军备竞赛最热心的鼓吹者”。[2]

军界工业界集团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千百万人的心理状态产生巨大的影响。它通过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经费和在有选择的基础上向大学提供补助金的办法，干涉精神生活和科学生活的领域。五角大楼的宣传部门和军界工业界公司的有关部门利用各种手段来制造社会舆论。

“身居要职的杰出人物”耗费千百亿美元来进行“思想战”，力图阻止人民群众思想日趋激烈的过程、人民群众对大企业的沉缅于蛊惑宣传和营私舞弊的两个政党即民主党和共和党日益失去信任。为了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反共主义和反苏主义，动用了强大的“群众文化”宣传手段——广播、电视、电影和报刊。

美国共产党总书记Г．霍尔在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说道：“弥天大谎是帝国主义生存的基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耗费巨资建立的思想厨房中补充了非常熟练的‘洗脑’造谣专家。他们一贯力图把垄断组织素有的伤天害理和灭绝人性的罪恶行为硬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阶级干的”。[3]

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展开了广泛的进攻。形成了由“马克思学家”和“苏联学家”的著作所提出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新部门。马克思学家和修正主义者对列宁主义进行特别猛烈的攻击，因为二十世纪在列宁主义旗帜下进行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改造。但是，“马克思学”的产生本身就已经标志着资产阶级哲学的危机．后者是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反

映。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危机表现在它的曾经“风行一时”的各种派别（“绝对唯心主义”、新现实主义、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的下降。现在，在美国哲学生活中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的，是从欧洲输入的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并且企图建立各种“自然的”哲学体系、后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克服了重重困难，为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反共主义、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在广泛的反垄断组织的联合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冷战”和反动派向人民的民主成果进攻（“麦卡锡主义”）的条件下，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成为法院和警方大规模迫害的对象。统治集团力图证明镇压美国共产党是有道理的，展开了广泛的诽谤运动，对美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目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进行伪造。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美国共产党的文献指出，共产党的目的、纲领性的宗旨不是反对美国人民的民主成果，恰恰相反，而是要发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提供的真正的人民民主。

马克思主义者在打退反动派进攻的同时，在五十年代中期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反对威胁着党的生存的修正主义。У.З.福斯特、Ю.丹尼斯、Г.霍尔、Э.Г.弗林、Л.杰克逊、Х.卢美尔、Г.阿普特克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都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美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七年）拒绝了修正主义分子的取消主义，肯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作为党的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基础的不可动摇性。

在四十至五十年代，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反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作了正面的阐述。⑤

六十年代标志着美国反垄断组织民主力量的活跃、美帝国主义内外政策危机的尖锐化、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影响的增长。在美国社会生活各领域中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是这些过程的基础。通货膨胀、失业现象、职工实际工资的下降、种族歧视的加深、城市危机、预算赤字、老人和失业的年轻人苦难的处境——这就是美国劳动人民在每天的生活中遇到的悲惨事实，而这些事实产生的原因，在于力图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垄断组织的掠夺政策。

在Г．霍尔向美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九年）所作的报告中谈到："阶级对抗更加尖锐。两大阶级之间经济上两级分化的现象更加严重。富人相对说来和绝对说来都更加富有，而工人则相对说来和绝对说来都更加贫困。"[6] 在国内，反对垄断组织的情绪高涨：停止军备竞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障持久和平、消灭垄断组织的统治、对动力综合企业实行国有化以及进行其他进步的社会改革等要求，都更有力地提了出来。[7]

在这一时期的美国，特别是在科学知识分子和学生当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兴趣大大增加。Г．阿普特克写道："今天在美国的学院、大学、科学机构和自由职业者当中表现出来的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此认真、如此浓厚和如此广泛的兴趣，在最近三十年中从来没有过。"[8]

一九六二年在美国哲学协会内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研究会（现在它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的增长。一九六四年四月建立了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从事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的科学研究，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组织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讨论，建立与其他机构的学科联系和开展编制图书目录的工作。

从一九六九年起，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心开始进行活动，在该

中心讲授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等。参加讲课的有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大专院校开设讲座，召开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座谈会和理论会议，创办新的杂志，出版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的书籍。"

美国共产党在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以及美国和外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主义哲学选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列宁的选集。"国际"出版社、"进步"出版社（莫斯科）和"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伦敦）共同出版五十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七〇年大量发行美国共产党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上通过的党纲。在美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九年）上，通过了美共新党纲。

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美共的《政治事务》杂志、《每日世界》、《人民世界》等报纸以及"国际"、"新展望"、"新世界评论"等出版社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六十至七十年代，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著作的出版大大增长。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共产党的文件中、在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中，在共产党和左派报刊发表的文章中，在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专题著作和小册子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У. З. 福斯特，Ю. 丹尼斯，Г. 霍尔，Г. 温斯顿，Д. 杰克逊，К. 拉特福特，Г. 阿普特克，Г. 格林，Х. 卢美尔和美共其它领导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В. 杰罗姆，Г. 塞尔沙姆，Г. К. 威尔斯，Д. 斯特鲁克，Д. 萨默维尔，Н. 克洛塞，Э. 伯特，Г. L. 帕森斯，Д. 德格鲁德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和在本国条件下创造性地应用马克

思列宁主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向是：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认识论；

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

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

生态学的哲学问题；

美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道路和形式；

哲学问题；

对资产阶级哲学和政治社会学的批判；

对反共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的揭露，对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的批判。

一、辩证方法和认识论的问题

在反对资产阶级一修正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对美国情况“不适用”的谎言的斗争中，美国共产党人捍卫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工人阶级世界观，是工人阶级获得政权所必需的理论器武的原理。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他们研究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工人阶级、共产党在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进步的斗争中所面临的实际的政治任务的有机联系。

在创造性地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最全面、内容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关于发展的学说的基础上，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复杂的、矛盾的过程，研究两种世界社会体系的斗争趋势，科学地阐释美国共产党的政策、战略和策略。Г. 霍尔说道：“我们现在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这是科学，需要了解而不只是死记硬背，必须运用而不只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更加清楚地懂得，研究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本身就是斗争的工具。”[10]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联系解决当代的迫切问题，揭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11]。在关于辩证法的著作中，分析了一般发展原则，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这两种思想的对立。Д．萨默维尔根据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评论两种发展思想的著名原理指出说，形而上学思想导致承认对物质起作用的“第一推动”、“外在力量”，也就是导致唯心主义。按照辩证法思想，运动是物质的属性。他写道：“对立的、辩证的思想表现在运动归根到底是自我运动这一论断中。”[12]

通过辩证法规律——否定的否定、量变到质变、对立的统一和斗争——揭示出发展的一般思想。萨默维尔总结说：“简而言之，第一条规律是说，一切都有历史；第二条规律是说，历史既是质的，也是量的；第三条规律是说，历史是不会中断的……”。[13]他强调说，所有辩证法规律都表现为根据可以在现实的一切层次上找到的实际材料而得出的结论；它们不是先验论原则。

主观辩证法（辩证思维的形式）是客观辩证法、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性的反映。美国马克思主义者Д．德格鲁德在第十五届世界哲学大会（一九七三年）上所作的报告《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方面》中谈到：“现实的生活过程是辩证法形式的真正源泉……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样的辩证法形式不可能从本质化的理性（如在黑格尔那里）中抽象出来，也不可能从超级主观化的我（如在胡塞尔和现代蒙昧主义现象学那里）中抽象出来。”[14]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到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上，这一规律揭示出作为自我运动的运动的内在源泉。Г．К．威尔斯在《异化和辩证逻辑》[15]一文中，分析了形式与内容（它们是对立面的同一性）的辩证矛盾的发展的各个阶段。他指出，在这一同一性中，对立面是互相联系的：一个对立面不可能没有另一个对立面而存在。它们之间互相影响；这

种互相影响就是它们的斗争。

威尔斯接着指出，对立面是互相渗透、变化和导致新的性质的。每一对立面又构成另外一些对立面的同一性等等。他写道："这样一来，在同一性内部，有过程中各对立面、层次内的层次、阶段内的阶段的统一的整整一个结构。"[16]

威尔斯在评述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的互相影响时指出，开始时形式适应内容。适应应理解为形式促进内容的发展。内容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发展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内容不断发生变化，达到与形式不相适合的程度，因此，它们之间产生冲突。威尔斯写道，在发展的顶点上，这时量变转为质变，"内容抛掉旧的形式，创造与内容发展的新水平相适应的新形式"。[17]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象辩证法的其他规律一样，具有客观的和普遍的性质；它适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适用于物质运动的一切形式。这一有科学根据的论点成为各式各样非马克思主义作者不断攻击的对象，他们有时声称自己是同情辩证唯物主义的，并且力求对它作出"改进"。关于这一点，M. 穆沙契亚在《科学和社会》杂志上发表的引起争论的文章《论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矛盾》[18]也可以证明。

穆沙契亚认为，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有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巨大的"概念混乱"，那就是认为逻辑矛盾"是自然界造成的"。同时，他引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机械运动的著名评述。穆沙契亚写道："断言运动着的物体同时在该处又不在该处，这意味着是一个逻辑矛盾，也就是说，X在同一个关系中既是A，又是非A。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类矛盾正是由自然界确立和解决的。换句话说，恩格斯认为，经验的矛盾是自然界中的逻辑矛盾。"[19]

不难看出，想要"改进"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作者，表明自己根本不懂得辩证法的实质，在对待辩证法问题的方法上造成混

乱，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奎提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的《在连续的和不连续的空间中运动的辩证法》一文中公正地指出了这一点。

马奎提强调说，恩格斯对机械运动的评述中丝毫也没有违背形式逻辑的规律；这样的违背的外表是由于不善于抓住概念的辩证法中运动的辩证法。他写道："与形式逻辑表面上的冲突在这里是由于不善于把运动看成是过程，在其中，运动的一切要素是互相联系的；列宁称这种不善于把运动看成是过程的看法，是与客观辩证法不同的主观辩证法，客观辩证法在思维中反映物质世界所发生的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矛盾。"[49]

马奎提指出，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矛盾可能在对运动的了解中，但不是在实际的过程中成为主要的矛盾。这个问题早就引起思想家很大的兴趣（埃利亚的芝诺的疑难等），但是它的科学解答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中作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论点之一是，承认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马奎提写道："……解决芝诺的矛盾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下述事实即我们实际上没有根据认为，运动着的物体占有该距离中的一定地方（位置）》。[50]物体位于一个地方——这是相对的静止，而不是绝对的静止。

穆沙契亚在自己的文章中企图把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律的范围加以限制，虽然他赞成"辩证的本体论"或"辩证法理论"的发展，但是，他的以新代旧的做法客观上是否定这些规律的，因为这些规律如果不是普遍性的，它们就不可能是辩证的。穆沙契亚在考察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辩证矛盾的例子时写道：大多数例子是"不符合"辩证矛盾的主要特点的，看来，"甚至电的过程也不必然是辩证的"。[49]他认为只有阶级斗争的例子是真正的辩证矛盾的范例。在他的推理中，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哲学中占主要地位的倾向：如果承认辩证法，那也只是在社

会生活的范围内；它是被排除在自然界之外的。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M、科尔曼指出，穆沙契亚妄想否定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的企图是站不住脚的，他写道："确实，在科学中，现在对这一事物（正电和负电—作者注）的认识比列宁那个时代要多得多，但是，即使是现在，科学也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基本的物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正电荷和负电荷不是至关重要的，包括有电荷的中子的产生"。[23]

穆沙契亚把黑格尔关于任何事物都是存在和虚无的统一的论点（A既是A，又是非A），说成是"非理性的"思想，辩证唯物主义继承了这种思想。但是，他强调说，甚至最简单的物体和现象的实质联系和关系也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更不用说物质组织的最高形式。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机体的生命过程。他写道："一切活的机体的实质，就是它们同一时候在死亡和复生，而这种新陈代谢是它们的完整性的条件。在每一时刻，它们既是A，又是非A，这不是逻辑的矛盾，而是经验的矛盾，这一矛盾不断产生和得到解决，没有它就没有生命"。[24]

在总结这一讨论时应当指出，它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辩证矛盾的实质，也有助于揭露在解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方面所作的歪曲。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辩证法问题时，除了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巨大意义外，也强调列宁的著作的巨大意义。Г．塞尔沙姆在因列宁《哲学笔记》以英文发表而写的一篇内容丰富的文章《列宁的笔记》中写道："这些评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无法估量的贡献"。[25]塞尔沙姆指出，在这一著作中，列宁发展了反映论，特别注意思维的能动的、创造的作用，把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的理解推到新的阶段。

塞尔沙姆认为，《哲学笔记》在现代条件下的现实意义是，

在该书中，唯物主义辩证法不是作为完整的公式系统在发展，而是作为既定方向在发展，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都应按照既定方向向前发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认为，仿佛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完全包括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书中。塞尔沙姆写道："这当然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对的，而列宁的《哲学笔记》用英文和其他文字发表将会使这种论断成为不可能"。[46]塞尔沙姆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时强调说，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远未终结；相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重大发展刚刚开始"。[47]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注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列宁的反映论来研究认识论问题。他们批判不可知论，认识论中的唯心主义概念，并且指出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在解决认识问题上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意识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的属性，是客观现实在思想上的复制，是它的反映，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形象[48]。

Г. 帕森斯对意识的实质作了认真的科学分析。他研究人的意识的发生，从简单的机体最简单的反映形式，到与第二信号系统相联系的最高级的反映形式。帕森斯指出，虽然思维不是在个人之外存在，但是就其性质而言，具有社会性质。思维活动——这是与自然界互相影响并在社会—历史基础上发展的一切人类的活动。帕森斯写道："我们把理性的活动看成是在物质环境中产生、受它制约并对它产生影响的物质力量[49]"。[50]

Г. 帕森斯强调说，脑力活动——这是人的一切感觉器官的工作，而不只是脑的工作。他写道："人的身体是作为统一整体工作的，利用一切器官的职能作用，换句话说，整个身体都在思维、因为对某个器官的任何损害都影响脑力活动"。[30]如果把"整

个身体都在思维”的论点放进括号中去，那就会更准确。思维的还不是整个身体；思维的是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但他不是没有身体，而是有自己全部的实际存在。

M．沃尔托夫斯基也表达出这种思想。他批评了把思想和身体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和二元论的思想，强调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立场把思想和身体看成是统一的。他指出，脑是思维的器官、工具，因此，无论是脑本身，或者是在脑中进行的过程，都不等于整个人的全部思维，这就象比如与步伐相联系的动作不等于散步。不是脚在走路，而是人借助脚在走路。瓦尔托夫斯基写道："步行是'我'个人完成的一种行为。同样，在思维的不是我的脑，而是'我'借助我的脑在思维，我的脑是构成我的身体即构成与这个身体、它的历史和它的活动相同的我自己这个具体的人的器官系统中最专门的器官。"[32]

马克思主义者在揭示意识的实质时反对庸俗化的、简单论的、机械的概念。由于控制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制造出"会思想的"电子计算机，在某些著作中就广泛宣传用"机器"的思维代替人的思维的思想。虽然机器也能完成与人的脑力活动有联系的个别非常复杂的操作，但是机器能够代替人的思维吗？

Г．帕森斯、M．沃尔托夫斯基、P．科恩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机器"与人的思维的根本区别，后者是受社会制约的，以神经生理的（生物的）过程为基础，这是机器的"思维"所没有的。帕森斯写道："机器在思维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也在思维的人也是思维着的机器，因为人是具有理性的动物，而不管动物与机器有多么相似，动物始终不等于机器"。[33] M．沃尔托夫斯基指出，"思维的机器"是人制造的工具；人甚至给那些能够给其他机器编制程序的机器编制程序。他写道："机器并不给自己选定目标……只有人才选定目标，而机器不过是工具，它好歹是为

实现这些目标服务的”。[34]

意识的实质问题是一九七六——九七七年在《政治事务》杂志上进行的讨论的对象之一。Д．雷诺兹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Л．霍夫曼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的评论开始了这次讨论。雷诺兹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现在遭到敌人从右边和“左”边的不断攻击。Г．彼特罗维奇，P．苏佩克，П．弗兰尼茨基和其他“实践派”哲学家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宣称辩证唯物主义是“思辩的”、“抽象的”哲学，说它已经“陈旧”，应该用“革命的实践”来代替它。雷诺兹写道：“‘实践’哲学拒绝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后者是以关于意识、思维是现实的、客观世界的反映这一根本原理为基础的。而列宁深刻地和全面地加以仔细研究的恰恰是这一原理……”。[35]雷诺兹强调说，列宁揭示出认识过程的辩证法，这一过程的复杂的、矛盾的性质，指出人们的思维的能动的、创造的作用。因此，“实践派”哲学家关于列宁的反映论具有“形而上学的”、“直观的”性质的论断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雷诺兹高度评价Д．霍夫曼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观点进行的批判，也注意该书中同给意识下定义有关的个别不准确的说法。霍夫曼写道：“思维是特殊的活动形式这一事实完全不是说，思维在这方面不是物质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宁都从未说过人的意识不是物质的形式从而不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是某种别的什么”。[36]雷诺兹很有道理地认为这一定义是对把意识与物质混为一谈的庸俗唯物主义的让步。他强调说，意识不是物质的；它是物质世界的反映。

雷诺兹在引用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下的著名定义时写道：“十分清楚，这里恩格斯断言，思维不是物质的”。[37]他指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了毕希纳、福格

特、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并且指出И·狄慈根在自己的个别主张中把意识与物质混为一谈的错误。雷诺兹说得对，思想是非物质的，但是，与此同时，不能把思想与物质绝对对立起来。列宁强调说："这种相对对立的绝对必然性和绝对真理性的界限，正是确定认识论研究的派别的界限。如果在这些界限之外，把物质和精神即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当作绝对的对立，那就是极大的错误"。[58]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详细研究了在与资产阶级哲学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敌人进行的尖锐论战中的认识论问题。这一点在他们考察实践作为认识论范畴的作用问题时特别明显。对这一问题之所以十分注意是由于美国的特殊条件决定的，在美国，"求实精神"、"直接成功"的思想是在很长时间内培植起来的，已经成为把实际"效益"作为最高哲学原则的实用主义所依靠的传统之一。

很多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按照实用主义的精神进行推论，他们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例如，普林斯顿神学研究班教授Ч．威斯特硬说马克思对真理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似乎真理的内容完全是由实际需要决定的。威斯特认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是作出这种"解释"的根据，在提纲的第二条中谈到，人的思维的客观的真理性问题；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威斯特关于马克思对认识的态度作了如下概括：因此，从不同的观点来看，认识不仅是相对的；它是被歪曲了的斗争工具。对真理或道德的客观标准的要求往往是虚伪的。任何真理的源泉即它由以产生的社会斗争和它所进行的实践是对它的确证"。[61]

Г．阿普特克在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这些歪曲时强调

说，没有客观真理的概念，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知识。马克思主义证实了客观真理的存在。阿普特克写道："如果客观真理的存在被否定，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永远后退的相对主义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的理论"。[40]阿普特克在解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的实质时指出，它的意义在于肯定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必须用实践来检验理论和必须具有正确的理论，以便实践取得成功。

阿普特克指出，在这一方面，应该看看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在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著作中，提纲的这一条也受到各种歪曲。例如，坦普尔大学教师Дж．雷因斯和T．迪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宗教：革命人道主义纲要》（一九七〇年）一书断言，因为马克思是实践的拥护者，所以他对世界观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他们在随心所欲地解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时宣称，在马克思看来，在对待这种或那种理论的真理性的态度中，唯一的标准是它的改变世界的能力；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的"效用"，而与它是否具有客观内容没有关系。但是，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者Э．伯特所指出的，这种十分巧妙的实用主义，实际上是根据宗教学说的精神来歪曲马克思主义，使它失去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伯特写道："雷因斯的努力更适合宗教学说，而不适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4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问题是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苏联和外国都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同时，正如Л．萨默维尔所指出的，共有三种主要的观点。第一种观点的拥护者认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原则只适用于物质对象，而不适用于思维，只有是"唯一逻辑"的形式逻辑才同思维有关系。但是，这种态度导致对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原则的否定，因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和社会，也适用于认识。

第二种观点是企图对形式逻辑作“辩证法的解释”,这样一来，又没有必要谈两种逻辑即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对形式逻辑的这种看法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会导致取消形式逻辑。

萨默维尔认为，只有第三种观点，即承认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必要性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这一观点得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承认。他写道:“恩格斯所表述的经典原理证明，必须承认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前者只有有限的和相对的意义，而后者具有更深刻的、内容更丰富的意义”。[14]

对客观世界的对象和现象的研究，要求考察它们的运动、发展、在解决内部矛盾的基础上从一种质的状态转变为另外的质的状态。这种研究只有在辩证逻辑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只有这种逻辑才是与科学知识的要求相适应的思维方法，这当然丝毫也不降低形式逻辑的意义。Б．达纳姆写道:“辩证逻辑反映那些关于真正现实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使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马克思创立了社会发展论，爱因斯坦创立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使我们感到十分吃惊的物理学”。[15]

Г．К．威尔斯指出，形式逻辑是认识的开始阶段的必要条件；它实际上是从对象和现象的变化中抽象出来的分类逻辑。在任何科学——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等等——中，第一个任务就是把所研究的对象分门别类来划分。科学认识进一步向前发展，于是发现了不同的种和群之间的互相联系和转化，以及它们的变化和发展，进化的思想在科学中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来，这就决定了对辩证逻辑的迫切需要。辩证逻辑更深刻地反映世界，能够深入所研究的现象的本质。

但是，辩证逻辑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形式逻辑的灭亡：它们都有各自的研究对象，都有权独立存在。威尔斯写道:“形式的或者说分类的逻辑，是一般种类的结构，而创造的或者说辩证的逻

辑，是一般过程的结构”。[44]

在科学和技术发生革命，科学知识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出现了空前进步的现代条件下，自然科学家加紧把注意力放到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和哲学问题上。解决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的迫切需要，是决定美国学者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趣日益增加的最重要原因之一[45]。他们当中很多人参加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跨大学的科学哲学讨论会以及其他组织的活动。

波士顿科学哲学讨论会在研究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P．科恩和M．沃尔托夫斯基在叙述讨论会的目的时写道：“我们力求讨论科学基础的问题，并且在可能的地方，从各门科学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中取得材料供研究这些问题之用。我们也试图同每一个人就相邻科目的一切方面进行讨论，以便吸引各个领域——哲学、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历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者”。[46]

M．沃尔托夫斯基在给科学哲学概念下定义时指出，科学哲学把科学中思维的概念和方法，以及它们的实质内容解释为批判反思的对象。他写道：“本世纪后半期，科学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和发展，科学哲学作为多方面的和独立的科目发展。科学哲学应用逻辑批判和逻辑重拟的分析工具，以及在科学史和现代科学思维中综合的哲学概括尝试”。[47]沃尔托夫斯基接着指出，科学哲学是“与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有关的哲学科目。哲学方法从来不只是描述的。它是批判的，分析的，辩证的”。[48]

在《波士顿科学哲学讨论会报告集》中，以及在M．沃尔托夫斯基和P．科恩的著作中，不仅分析了自然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基础，而且也分析了社会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研究了范围广泛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三个主要方面：（1）科学知

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2）科学的方法论，科学与哲学的联系；（3）科学和哲学的基本概念（物质、运动、时间和空间、因果性、规律性、思想、意识和其他）。在这些著作中，批判了物理学（非决定论、操作主义、“唯能论”）、生物学（“生机论”，“突生进化”）、化学、数学、控制论和其他科学知识领域中的唯心主义的、机械的和简单化的思想。

很多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哲学与他们的科学活动没有关系，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Э．马奎提指出的，他们受到科学文献和教科书中传播的各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写道："美国使用的教科书中最著名的哲学观点是逻辑实证主义，它主要借助于利用和解释操作主义的种种规定而得到表现"。[4]

在美国，著名物理学实验家、哈佛大学教授П．У．布里奇曼在自己的著作《现代物理学逻辑》和其他著作中详细研究了操作主义的基础。按照操作主义的说法，概念是相应的一系列计量操作的同义语；物理学规律是操作上确定的数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论的作用只是描述尽可能多的实验。

马奎提指出，操作主义作为经验主义的表现之一，对美国物理学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M．彭格、K．坎佩尔和其他学者的著作中对操作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有充分根据的批判，揭露了它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马奎提在分析美国使用的物理学教科学时写道，这些教科书往往甚至没有作为科学的物理学的对象的准确定义，这正是由于受到操作主义的影响。在很多教科书中，物理学被定义为“计量的科学”、“基本上是实验科学”等等。只有K．У．福特的教科书《古典物理学和现代物理学》才作出比较准确的定义："物理学以前叫做自然哲学，是科学的一部分，与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有最直接的联系"，这是“对运动中的物质的研究”。

马奎提建议使教科书和科学著作中的物理学对象的定义以及一些基本的概念如运动、能量、质量、规律、时间、空间、量、质、度等更加准确。他指出，强调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科学认识是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从现象到本质的运动，在运动中越来越多地揭示出客观世界的对象和现象的不同方面、性质和特征。

马奎提写道："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来，物理学中的研究——这是研究物质的不同的形式及其互相影响，后者促进变化和发展……每一物质系统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来自其他物质形式的起源，这些物质形式始终不可能完全得到研究：'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61]

资产阶级科学中广泛传播非决定论的各种概念，它们是在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并且由于不会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理解物理学、化学和其他科学知识领域中的最新发现而产生的。

M．沃尔托夫斯基在批判地分析这些概念时强调说，它们的基础是古典的、机械的决定论的观念。因为在量子物理学中，由于微质点具有矛盾的微粒一波动的性质，起作用的不是动态的规律性而是静态的规律性，所以，适用于这些规律性的只有彻底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因果性思想。

他指出，谈论量子理论中的坐标和脉冲的非决定性是不对的。电子和其他基本粒子的运动是由因果关系制约和决定的：它们从一个轨道转换到另外的轨道是根据能量水平的变化进行的。瓦尔托夫斯基写道："这种转换是不变地同非连续量的能量的发射和吸收联系在一起的。'无中不会生有'的原则得到完全的遵守，守恒规律没有消失"。[62]

M．沃尔托夫斯基在向第十五届世界哲学大会（一九七三年）作的报告《物质、作用和相互作用》中，批评了"惰性"物质和

非决定论等概念，指出对微观世界各种现象的认识具有十分复杂的、矛盾的性质，它是由微观客体的矛盾的、微粒一波动的性质以及测量仪器对微观客体的重大影响决定的。他写道："……作为物质系统的组成部分，主体和客体在这一系统中是作为物质的本质存在的；但是它们在特殊的认识作用（或相互作用）中彼此有明确的关系"。[53]接着，他强调说，"我们的认识不是对相互作用的认识，而是相互作用本身"。[54]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研究现代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批判对自然科学的成就所作的唯心主义的解释，促使科学知识界进步的代表人物转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这样一来，他们就对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建立和巩固顺利发展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所必需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联合——的解决，作出了贡献。

二、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与科技革命的本质、它的社会后果和在美国表现的特点有关的、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在科技革命的条件下，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平衡的。[55]军界工业界集团的利益也给科技革命的发展打上印记：绝大多数科学资源不是用于和平目的而是用于军事目的。[56]规模空前的科技进步产生了各种各样把科学技术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的社会学思想。专家治国决定论是最近二十年来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影响的）一些理论的特点，这些理论是："统一的工业社会"（P．阿隆、Л．德拉克尔），"阶段论"（Y．罗斯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П．索罗金），"后工业社会"（Д．贝尔）等。

在对这些理论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评价中强调指出，它们的目的是企图推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学说和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资产阶级社会学思想中，忽视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只是把技术看作社会发展的源泉。结果抹杀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质的区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脱节是Y．罗斯托的“阶段论”的基本缺陷。П．克洛塞写道：“罗斯托故意不看经济制度方面的区别，因为他的书的目的，是要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是一样的”。[57]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令人信服地指出，“后工业社会”思想也具有辩护的性质：在这一思想中，科技革命与社会革命互相对立，并且企图证明资本主义有前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已经“过时”。在这一思想中，庸俗机械的专家治国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互相对立。X．卢美尔写道：“正象在合适的马戏场的聚光灯下那样，‘后工业社会’的全部思想实际上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的作者们把生产力提到首位，完全忽视生产关系、社会基础结构的作用，或者把这种作用几乎化为零，生产力就是在社会基础结构内发挥职能的。在这种论述中，主要的东西消失了。资本主义不只是一个具有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这是一种社会制度，具有它所特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剥削方式和分配形式”。[58]

马克思主义者把“后工业社会”思想看成是专家治国的空想：它的作者们宣称，在这一社会中，政权不属于资本家，而属于“专家治国论者”；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将成为历史的财产。Г．阿普特克在谈到“后工业社会”思想的辩护士的著作时写道：“所有这些毫无价值的读物被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最高当局作为智慧和知识奉献出来；它们受到象‘卡内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基金会的

鼓励（和资助）”。[59]贝尔、布热津斯基等人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反革命理论家”。[60]

“后工业社会”理论和其他专家治国空想的捍卫者，根据同现代条件下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加强（采取“调节”经济的措施等）有关的事实，把资产阶级国家看成是社会中能够对垄断组织进行控制的某种“独立的力量”。这样一来，就否定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的、反人民的本质。

Г．霍尔在批判这类观点时写道：“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没有资本家阶级而存在。它是资本家阶级的工具。国家不是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的、充当仲裁人去解决各阶级之间争论的某种中立的调解力量。它是统治阶级的工具”。[61]但是，在国家所起作用的某些方面，使人有理由去谈论国家的“独立性”。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国家具有相对独立性。很多因素，其中包括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工人阶级的斗争、社会舆论等，影响国家的决定。霍尔指出，这方面的明显例子是美国侵略越南所产生的局势：群众性的政治活动、抗议迫使政府放弃某些垄断组织的利益，并且结束战争。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为了狭隘的阶级私利而利用科技革命的成就，这就造成了很多消极的现象：军备竞赛、军界工业界集团权力的加强、企业经常开工不足、失业大军人数增多、自然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污染等。

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证实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论点：资本主义不能充分利用发展生产力的可能性。科技革命不仅不能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恰恰相反，使这些矛盾更加尖锐化。因此，霍尔写道：“自动化和自控化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62]

Д．贝尔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其他辩护士断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在十九世纪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现在已

经“过时”：工人阶级正在“消失”，正在被高度熟练的技术专家“新阶级”所代替。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错误地解释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企图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定义。他们硬说，工人阶级只由体力劳动者组成。因为在科技革命条件下，体力劳动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所以，根据这一点就做出工人阶级正在“消失”的结论。但是，这种结论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并且与实际事实相矛盾。

无产阶级是作为只从事体力劳动的雇佣工人阶级产生的，但是这一阶级同生产的发展一起变化。随着自动化和机械化的发展，工人的职业训练和一般教育水平也发生变化。在他们当中，从事脑力劳动多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增加（自动线调整工、修理工、操作员、实验员、程序编制员等）。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这些人算入所谓的中产阶级成员之列，声称工人阶级正在“消失”。这一类论断的目的是要表明，工人阶级没有前途，因而共产主义也没有前途。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这些论断，指出“白领”[63]中的上述各类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按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说，基本上与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参加生产过程，创造剩余价值，受资本家剥削。

马克思主义者Φ．查普曼批判了资产阶级关于工人阶级在科技革命影响下正在“消失”的说法，他强调说，工人阶级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丝毫没有降低而是提高了它作为社会进步主要力量的作用。他写道：“我们认为这一发展中的主要东西是什么呢？是工业无产阶级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特别迅速的速度增加的事实”。[64]关于工人阶级人数增加的统计资料也证实了这一事实[65]。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反对人为地缩小工人阶级的范围，而且也反对任意扩大工人阶级的范围，而任意扩大工人阶级的范围是右的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P．加罗迪、э．费舍等）所固有的。例如，加罗迪在《共产主义危机：社会主义的转折点》（一九七七年）一书中写道："非体力劳动者（即工程师和科学研究人员）的人数在增加，他们是'总体劳动者'的一部分，他们具有的阶级特征与马克思在给工人阶级下定义时所用的阶级特征相符合"。[66]

但是，马克思从未把"总体劳动者"与工人阶级混为一谈。Г．温斯顿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家派管理人员和领班来监督工人的论述时指出，马克思是把管理人员和领班与工人加以区别的，虽然他们是"总体劳动者"的成员。温斯顿强调说："当马克思谈到'总体劳动者'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这个概念与工人阶级混为一谈……"。[67]

当然，在科技革命的条件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生产技术的知识分子，就其地位来说，与工人阶级接近，因为他们失去了以前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是，接近不是融合。美国马克思主义者Л．里斯托鲁奇在谈到加罗迪关于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融合"的错误论点时写道："马克思谈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而没有谈到它们的'融合'"。[68]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有机融合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实现。

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错误地解释与工人在科技革命影响下地位变化有关的种种事实，提出工人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并与制度即资本主义"一体化"从而丧失了"革命潜力"的论点。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思想的辩护士援引工人阶级中某些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作为论据。但是，必须强调指出，这种生活水平是工人进行长期坚决的斗争才获得的。这种生活水平是为

高度发达的工业再生产出劳动力的必要因素。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对工人的剥削进一步加强了：劳动强度在空前增加，工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在减少，垄断组织的利润在增长等等。贫穷仍然是“富裕社会”中的三分之一的居民的命运。[69]

关于“富裕的无产阶级”的论点不仅是资产阶级的宣传所发明的神话，而且是对工人阶级的侮辱，是对新社会创造者的历史使命的否定。Г．霍尔写道，科技革命并不改变工人阶级作为最受剥削的阶级和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本质：“实际上，在科技革命时期，工人阶级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无产阶级化”。[70]

在科技革命条件下，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它涉及全人类的命运并且引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注意[71]。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资本主义的反人民的本质也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上，对环境的污染上，而环境污染的受害者首先是劳动人民。从前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然的方式恢复的，而现在一个新的阶段到来了：如果不采取有目的的环境保护措施，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可能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Г．霍尔写道：“自然环境的危机是一个崭新的问题。严重的危险威胁着我们星球上的生命。人类面临着抉择：地球是作为一个具有活生生的、发展着的物质的星球保存下来，还是成为一个死的、没有人的星球，就象月亮和其他无数的天体一样”。[72]

研究生态学问题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大规模发展工业和加速都市化。但是，这些因素本身并不是环境危机的原因，环境危机不是注定要产生的。霍尔写道：“科学能够保护环境，全部问题在于，当垄断资本主义在一系列工业发达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能不能做到一点”。[73]

在舆论的压力下，以及从垄断组织的某些利益出发，国家机关不得不去注意环境保护问题，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和困难，需要花费大量款项。在美国国会中设立了十几个委员会，通过了几百个保护环境的法律，但是，实际效果目前却很少。力求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企业家千方百计反对这些法律。难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在一九七七年写道："保护环境运动的崇高理想……开始与经济现实发生冲突"。[74]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虽然要彻底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止资本主义公司的经营活动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保护环境的斗争是人民群众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为恢复自然资源所需的几百亿美元应该向垄断组织索取。同时，还必须考虑美国的跨国公司的掠夺政策的全球规模。Г．弗雷德里克强调说，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是全世界自然环境的主要威胁。他在谈到美国共产党的任务时写道："我们的纲领应当包括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土以外，在全球规模上给世界各国自然环境带来损害的政策"。[75]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赞成进一步发展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科学——生态学。弗雷德里克指出《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其他著作对于研究生态学问题的意义。他写道："它们给我们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我们应该遵循这些原则来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研究是我们以前没有加以足够重视的任务"。[76]

Г．帕森斯也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原则对于生态科学的发展具有奠基的意义。他写道："生态学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活系统"。[77]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作用的思想应该成为生态学的基础。帕森斯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人的历史是他对自然界的实践的和理论的关系的发展，自然界是"他自己

实际的身体"。

科学和技术是人掌握自然力的手段，但是这种掌握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帕森斯写道："掌握是为了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这种掌握来自人民，由人民去实现，以增进人民的福利"。[78]

自然环境的危机，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粮食严重不足，是马尔萨斯主义再度甚嚣尘上的借口。在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Д．米道斯为首的一些学者所起草的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限度。对人口增长的控制》[79]中断言，由于自然界日益贫瘠，人类如果想避免大灾难，就必须及时采取措施来制止人口的"没有限制的增长"。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这类看法时指出，地球上的人口确实在迅速增加，在一百五十个国家中经济的发展落后于人口的增加；贫穷国家变得更穷了[80]。但是，所有这一切不是自然条件的过错而是社会经济条件的过错。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谈到粮食不够的原因时强调人口"过度增加"，但是，主要原因是跨国公司依靠剥削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而获得大量的超额利润。帕森斯写道："想把全世界的匮乏和贫穷、压迫和苦难永远保存下去的罪魁祸首是这些跨国公司资本家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和反动思想家，他们力图阻止人民走向富裕、民主和社会主义[81]

帕森斯写道，全世界现有的资源足以消灭饥饿、贫困、疾病，但是，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都没有很好地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粮食是能提供利润的商品，是旨在寻求更多利润源泉的对外政策的工具。此外，必须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和农业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生产能力开工不足；存在着没有可能创造物质价值的人数众多

的失业大军。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自然界没有在资源方面对人作出严厉的限制；人可以控制自然力。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社会能够创造富裕的经济。帕森斯指出，根据某些学者的计算，现有的自然资源完全能够保证五百亿人很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时候，这种可能性不会成为现实性。他写道："我们把'人口－资源'的问题看成是因统治阶级的罪过而产生的、由工人阶级加以解决的阶级问题。这种激进的分析要求激进的解决方法。社会主义就是解决方法，并且越快解决越好"[82]。

三、对美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道路和形式的论证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说，"伟大而患病的社会"的一切问题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革命的发展会导致工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进一步恶化，会导致经常性失业现象的增加。正如美共纲领中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使阶级斗争尖锐化，而不是使它趋于缓和。"科学和技术——不是敌人。相反，它们有潜力使生活更轻松，使人得到满足。但是，要使科学和技术为人民利益服务，必须使社会经济制度进行相应的改变，使满足人民的需要成为生产的目的"。[83]

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最近的目标是建立由工人阶级、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城乡其他中产阶层组成的广泛的反垄断组织同盟，工人阶级是这个同盟的领导力量。在这个同盟的基础上，应该成立民主政府，该政府的任务将是实现进步的改革（对银行和动力综合企业实行国有化、制止反动的、亲法西斯的力量进行活

动，采取旨在巩固和平的措施等）。

共产党人认为，为和平而斗争，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说，缓和为加强劳动者争取自己切身利益的斗争开辟了新的可能性。霍尔在美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争取缓和而进行的斗争“为阶级斗争和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创造最好和最有利的条件”[64]。

美国共产党人把建立反垄断组织的同盟看成是革命过程必要的、最初的阶段，这一过程的最高环节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垄断组织、争取激进的改革的斗争并不代替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反垄断组织的斗争的必然结局，直接把我们带到社会主义的门槛边”[65]。

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形式的问题时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取决于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毫无疑问，利用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的和平形式是最有利的，但是，这种选择可能遭到垄断组织反动力量的行动的阻挠。因此，工人阶级、全体劳动群众应该准备给予反革命力量以坚决回击。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性，研究了自己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将会具有的特点。他们看到，在美国建立社会主义将会在十分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因为可以广泛利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没有必要实行国家的工业化。把作为战争危险主要策源地的美国帝国主义消灭就提供了把大量资金转用于和平建设的需要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可能性。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动力问题时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基本原则现在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具有更大的迫切性。现在的时代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向社会主

义的革命过渡的时代，工人阶级是这一过渡的决定性力量。当然，按对已经成熟的革命任务的政治认识水平来说，美国工人运动是落后了；它基本上是限于经济方面的要求，但是，客观来看，由于工人阶级在物质生产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所以正如美共纲领中所强调的，工人阶级“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66]。

美国官方宣传断言，工人阶级失去了自己的战斗性，阶级斗争逐渐熄灭了，但是事实证明恰恰相反。根据劳工部的材料，在六十年代,平均每年发生四千一百零四次罢工,参加人数为一百八十万零九千人，而在七十年代则发生五千三百零八次罢工，参加人数为二百三十四万八千人[67]。美国共产党把建立广泛的反垄断组织同盟视为头等重要的任务,非常注意加强工人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联系，非常注意把工人阶级的斗争与其他反帝国主义运动（“新左派”运动，争取民权运动等）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者也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左派”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学生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是积极的力量。很多资产阶级思想家（C．胡克、Д．贝尔、З．布热津斯基、Д．凯南等）对这一运动作了否定的评价，但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进步活动家却强调青年和激进的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巨大意义，同时指出“新左派”的软弱的方面和缺点。美国共产党老战士Г．格林把这一运动称为我国历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当对国内的进步力量、对人民的民主成果展开猛烈的进攻的时候，年轻的激进分子坚决反对反动的内外政策，反对与“麦卡锡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东西[68]。“新左派”的特点是成员十分复杂，思想也是同样复杂的、折中主义的。格林指出，自发发展的“新左派”运动没有制定出也不可能制定出统一的思想。他写道:“自发性不可能创造出比它所创造的混合型折中主义思想更多的东西。这种思想，在一些人看来，是‘缺乏思想’，而在另一

些人看来却是‘新思想’。缺少彻底的世界观和组织性成了这一运动最大的弱点”[89]。

“新左派”中的很多人都受到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辩护思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趋同”，“统一的工业社会”等）以及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派别的观点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Д．理佩写道：“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科学，而是看成神话。在他们那里，德布雷、切·格瓦拉和凡隆代替了马克思和列宁”[90]。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努力使青年和激进知识分子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和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加强对共产党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阐释工作。他们批判地分析“新左派”的思想观点，特别注意Г．马尔库塞的伪批判哲学。Д．杰克逊强调说：“成千上万个在反对‘官方’的斗争中最善于思考和最勇敢的年轻人摸索自己走向共产党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道路。马尔库塞是他们前进道路上一种禁止通行的信号”[91]。

近年来，马尔库塞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影响大大下降。但是，产生“新左派”运动的原因继续在起作用；这一运动的深刻基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矛盾。产生了激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新组织：“争取和平与正义人民联盟”，“新美国运动”等。

某些“新左派”努力从斗争经验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并且详细研究更加接近实际情况的政策，伯克利城学生运动的前领袖M．勒尔纳的书《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它的理论和战略导论》[92]可以证明这一点。

“新左派”的斗争经验表明，激进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运动，同其他民主力量的运动一样，只有在他们与工人阶级（由自己战斗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结成联盟的基础上才可能胜利。

由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和建立反垄断组织同盟的任务，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注意解决黑人问题的理论方面，把遭受资本主义超级剥削的三千万黑人看成是这一同盟的重要力量。Г．温斯顿写道："帝国主义的宣传吹嘘美国是'自由世界'的天堂。它不仅企图掩盖不道德的阶级剥削制度，而且掩饰民族压迫和种族压迫的存在"[93]。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揭露种族主义的本质时强调说，这一现象完全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都没有这种现象。种族主义思想是随着资本主义强国的殖民政策和美国南方种植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在美国南方，从非洲运来几十万黑人奴隶，他们被当作廉价的劳动力来使用。

黑人受到极其残酷的剥削，为了"证明"这种不公正的现象是正当的，奴隶主的思想家制造出种族主义的神话。Г．阿普特克写道："什么样的神话没有制造出来！这里有历史的、解剖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神话。它们在美国得到被歪曲解释的达尔文主义的大力支持。它们的目的很清楚：它们被制造出来，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政治落后，道德粗野、贪得无厌、社会不公正现象是正当的"[94]。揭露种族主义的反动本质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实践方面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有助于克服在反动的资产阶级宣传影响下在美国人中间广泛流传的沙文主义偏见。

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是以争取美国黑人公民权利的斗争大大加剧、全国几百个城市的黑人的群众性行动为标志的。美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努力使运动更有组织性。美共的任务是要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种族压迫的斗争中，建立黑人和白人劳动者的统一战线。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争取到黑人的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Г．霍尔说道："我们的党代表一切

受压迫者和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我们为一切反垄断组织的力量的统一而斗争……我们是最彻底、最坚决、最积极的反种族主义的战士”[95]。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建立反垄断组织的同盟，与教徒展开了对话。对话中最注意的是当代的一些根本问题，如反对热核战争的威胁、争取巩固和平、争取进步的社会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改造。应当指出，霍尔是美国的这场对话的发起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神话或现实：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他在这篇文章中强调说，对话的基础“只可能是今天在对所有的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争取和平、自由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中的共同目标”[96]。

所谓的激进神学的拥护者积极参加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他们要求宗教“现代化”，修改传统的教会政策，以便教会更加注意社会事务。T．迪安写道：“看来，现在必须有完全是另一种类的神学，这种神学将不再是美国政治权势集团的仆役，相反，而是对这一集团的激进批判，后者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圣经原有的革命本质的综合为基础的”[97]。

很多神学家在对话过程中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趋同”的建议。基督教传教士洛赫曼在号召“综合”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时，提出要注意“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和“早期的基督教主义”，二者有“很多共同之处。”他对修正主义者P．加罗迪和M．普鲁哈准备在关于世界观问题的对话中互相作出让步表示欢迎[98]。

马克思主义者Э．伯特在批判这些论断时强调说，这些论断歪曲了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真正本质，忽视了它们的反宗教的倾向。伯特指出，洛赫曼实际上是号召在思想斗争领域中保持“中立”。他写道：“但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在这条战线中保持中立，就意味着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再生产出资产阶级思想，就象必然要再生产出剩余价值一样”[99]。

某些神学家宣称，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采取共同行动的障碍，并且正如Г．帕森斯[100]所指出,他们还提出以下的论据：马克思主义与价值问题格格不入，它只诉诸群众而不诉诸个人；马克思主义者的无神论是基督教徒的绊脚石。帕森斯强调说，所有这些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决了个人、人道主义价值的问题。他指出，至于无神论，甚至教徒们自己也认为，不能根据一个人是否承认神的存在来判断一个人，而应根据一个人的活动是否能够帮助其他人生活和体现价值来判断一个人。他写道:“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理想的论证并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采取共同行动造成障碍”[101]。很多基督教徒积极参加争取和平、裁军、争取实行进步的社会改革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在对话中特别注意需要立刻解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他们争取把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团结起来，其中包括信教的劳动者与无神论者的行动统一，他们是从列宁的以下著名指示出发的：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102]。

马克思主义者与教徒对话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讨论人道主义、个人自由、克服异化等问题，这些问题近二十年来已经成为思想斗争的中心。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关于“两个马克思”的思想，强调指出，这一思想所追求的目标是：（1）歪曲《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后来的著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2）论证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和其他唯心主义派别“趋同”的必然性；（3）把唯心主义地加以整理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真正的、准确的”马克思主义，从而证明现代的共产党不是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进行活动的根据。

Д·斯特鲁克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对"两个马克思"的思想感兴趣，不是出于纯粹的学术上的理由，而是出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的目的。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大谈其异化，却几乎根本不谈阶级斗争；在这些著作中，全部人类历史被说成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例如，Э·弗罗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一书就是以这种精神写的。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阶级的、革命的内容。斯特鲁克写道："这是完全非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弗罗姆对异化的解释产生的"[103]。

在某些美国学者的著作中，流传着（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Л·阿尔都塞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的思想。例如，写过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Л·霍奇斯，把马克思说成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但不是哲学家。他认为，把人道主义"硬加"在马克思主义上意味着向资产阶级思想让步，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溶合在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想中。他认为，"人道主义"一词是不科学的；它只是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用过，后来就被"共产主义"这个词所代替，这意味着与"同劳动世界格格不入的哲学上的或抽象的人道主义"[104]决裂。霍奇斯认为，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论点会引起误解，因为它忽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人道主义理论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这一类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当然，现在除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外，还有很多种人道主义，它们反映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思想趋向和利益，但是，它们并不是十分科学的，尽管在它们当中（例如，在К·拉蒙特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中）[105]存在着一些进步的因素。Г·帕森斯指出，美国大多数哲学家不去考察社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分析哲学家、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和宗教哲学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宣传

人道主义思想，但是这种人道主义是抽象的、超阶级的和消极无为的。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彻底科学的和革命的概念。Г. 帕森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目的是"对整个人的全面研究和人的全面提高"，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一切人都有关系。从它所得出的关于人是什么，人应该是怎样的人的结论中可以看出，它是真正民主的。它比一切种类的人道主义都优越，它们是杰出人物统治论的人道主义"[96]。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说，为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而进行的彻底的斗争必然导致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个人受压迫、一切形式的个人异化的主要根源。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最重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帕森斯写道："无论如何，如果要使人类避免战争，那么，必须使人类摆脱一切产生战争的原因；在我们时代，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帝国主义"[97]。只有用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使人类摆脱剥削和压迫，创造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

四、哲学史。对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的批判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时，广泛利用哲学史。Г. 塞尔沙姆在《革命的哲学》一书中揭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时，仔细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洛克、伽桑狄、休谟、马赫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其他哲学家的著作中对认识论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作为认识基础的真理标准的作用的原理的阐释，是这一分析的主旨。

塞尔沙姆依靠哲学史材料，仔细研究不同流派和学派、哲学

中的两大阵营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揭示出哲学的社会职能。他写道："从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直到现在，哲学讨论反映了社会分歧，而大多数哲学争论反映了极其重要的、严重的社会斗争，并且是与这一斗争直接联系着的"[108]。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Б. 达纳姆的《英雄和异教徒：西方思想政治史》（一九六七年俄译本）一书是对世界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这本书不仅研究了哲学史的问题，也研究了科学、政治思想、宗教和其他形式社会意识的问题[109]。该书是研究关于个人在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中的作用问题的。达纳姆指出，"伟大的异教徒"叶赫纳顿、苏格拉底、卢克莱修、威克利夫、胡斯、斯宾诺莎、康德、伏尔泰、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等在争取实现自由和正义的人类理想，争取摆脱迷信、蒙昧主义和官方"正统思想"坏影响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Д. 德格鲁德的专题论著《本质的哲学：本质范畴研究》（一九七〇年）是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研究本质范畴的。正如作者所指出，这一范畴是"认识的重要工具"，对这一范畴的发展的考察，是根据非常丰富的哲学史材料——从苏格拉底以前的哲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罗素、怀特海、胡塞尔和杜威——进行的。德格鲁德在揭示黑格尔哲学的社会根源时写道，这一哲学是被迫与封建制度妥协的德国"中产阶级"利益的理论表现。他在指出黑格尔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之一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时，也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对立。

Д. 理佩的《印度思想中的自然主义传统》[110]一书分析印度哲学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作用。理佩指出，在西方哲学家中间流传着一种看法，似乎印度哲学几乎完全是神秘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理佩在批判这一类看法时指出，在这一哲学中存在着强

烈的自然主义的倾向（遮缚迦派，早期卫世师迦派等），并且他所说的自然主义，是指与唯心主义对立的派别。

理佩是第一个企图研究印度哲学对美国思想的影响的人。他在分析十九世纪的美国神甫、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先验论者、哲学家（从詹姆士和罗伊斯到今天）时指出，这一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理佩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美国人在印度哲学中吸取宗教、直觉、唯灵论、神智学、目的论等的思想，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主义、科学和方法论的思想越来越引起他们的注意。他指出决定美国人十分注意印度哲学的原因：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对美国哲学本身状况的不满，希望知道新的思想和概念。理佩写道："人们试图使印度思想适合于乐观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美国性格"[111]。

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美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与硬说马克思主义是与美国"格格不入的"现象的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Д．贝尔、С．胡克等的论断不同，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美国和在其他国家广为传播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Л．梅森在研究美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早期阶段时强调И．魏德迈所起的特别重要的作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始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奠定基础"[112]。И．魏德迈、А．克路斯、З．迈尔和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先驱者保持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联系，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美国工人运动条件方面、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派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出版的О．约翰逊的著作《俄国革命前美国历史中的马克思主义》[113]阐明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下一阶段。该研究所出版了很多有宝贵的图书目录材料的小册子，其中包括О．约翰逊和К．里维的小册子《丹尼尔·德·利昂的

著作和关于他的著作：书目提要》[114]。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列宁的著作对于发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巨大意义。Г. 帕森斯在为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而写的文章《列宁思想对美国哲学家的影响》中强调说，列宁主义思想对美国哲学思想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他写道："哪一个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哲学家能够忽视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的列宁？列宁在俄国发展和运用哲学，以便社会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从破坏性的、反人道的社会过渡到创造性的、人道的社会。一九七〇年的美国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不同，但它毕竟是资本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通向人道社会的唯一道路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美国社会主义。因此，列宁的著作和思想是未来的美国社会非常必需的"[115]。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广泛应用列宁的著作来研究迫切的哲学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派别，以及进行反对反共主义、民族主义、"左"右倾修正主义的斗争。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分析了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各种派别，特别是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一般语义哲学和存在主义。多年来，主要的批判对象是实用主义，它作为"特殊的美国哲学"而在美国精神生活中居于引人注目的地位，并对政治学说、教育、科学、哲学、伦理学、美学和其他文化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在Г. 阿普特克、Г. 塞尔沙姆、Г. К. 威尔斯、Б. 达纳姆、П. 克洛塞、Х. 卢美尔和其他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揭露出实用主义的本质，它的社会根源和理论根源，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Г. 威尔斯的《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116]一书对实用主义哲学作了全面的批判，该书特别注意批判约翰·杜威的"工具主义"。

五十年代实用主义哲学开始衰落。分析哲学、新托马斯主

义和存在主义开始居于首要地位。实用主义失去了在科学知识分子中间的声誉，因为他所允诺的“科学方法”是毫无用处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Р. 塞拉尔斯、В. Д. 麦克基尔、М. 法尔贝尔等）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造成实用主义影响的衰落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完全不考虑实用主义对资产阶级哲学其他派别产生的影响就不对了。实用主义也继续影响美国的工人运动，它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根源之一。Г. 温斯顿在美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二）的发言中，十分注意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斗争，这种哲学用自己刺耳的个人主义宣传对工人运动产生腐蚀性的影响，损害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温斯顿强调说，象“实用主义哲学的积极宣传者”С. 胡克这样的思想家，鼓励工贼行为，鼓励靠牺牲自己的阶级兄弟而获得“个人成就”[ⅢⅤ]。

马克思主义者对在科学知识分子中获得一定程度传播的新现实主义作了批判的分析。他们指出，新现实主义认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是唯心主义和客观主义，并且主张承认所感觉到的客体的现实性，实际上它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变种，其使命是“调和”科学和宗教。在这一批判中，十分注意资产阶级哲学家А. 怀特海。Г. 威尔斯指出，怀特海抛弃了旧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没有看到辩证唯物主义，转到了唯心主义的宇宙学的立场上[ⅢⅥ]。

在实用主义在科学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下降的条件下，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加强自己的阵地。资产阶级学者绝大部分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希望在“新哲学”中获得对科学发展提出的复杂的方法论问题（真理标准，科学知识的统一，科学语言等）的回答。但是，逻辑实证主义只不过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进步哲学家Р. 塞拉尔斯写道，逻辑实证主义接受并以现代逻辑学和语

言学的术语进一步发展了马赫、阿芬那留斯、科尔奈利乌斯的经验内在论的传统，把这一传统与休谟、穆勒和詹姆士的经验主义的英美传统联系起来[10]。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认识论的一切基本原理进行了有充分论证的分析。实证主义者关于只有“直接提供的东西”才实际存在的论点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的新的说法：这是感觉，我们不怀疑它们的存在。但是，这些感觉的客观内容是什么？实证主义不可能回答这一问题。实证主义的证明原则也是站不住脚的，按照这一原则，如果判断可以由人的经验来检验，那么，就认为判断是科学的。但是，正如Б·达纳姆所指出的，不是所有一切都可以直接进行检验。例如，不可能根据经验来证明，星体不决定人的生活，星相学是伪科学。如果想证明这一点，就需要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消灭星体。但是，达不到这种目的并不妨碍认为星相学是迷信。达纳姆写道：“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们掌握的经验证据的说服力。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历史的原因如此详尽无遗地解释了人类生活中各种事件的过程，以致对于星相学说来，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东西”[11]。

马克思主义者在揭示新实证主义的社会根源和社会作用时指出，尽管它的很多代表人物的社会政治观点是自由主义，这种哲学按其性质说来是保守的；它抱定的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唯心主义。Г．塞尔沙姆写道：“意味深长的是，马赫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家乡是反动的教权派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堡垒维也纳。在这里，学者们确实必须抵御教会。但是，他们不去保护科学不受宗教偏见的影响，而是屈服于偏见，这种偏见认为，科学对实际的客观世界的管辖范围只限于对我们自己想象力的创造物”[12]。

三十年代后半期在美国产生的一般语义哲学也成为美国马克

思主义者的批判对象。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家С．切兹认为，“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失业”等概念是空洞的，给人们的相互关系带来误解。切兹认为，社会对抗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词汇而产生的。

6．达纳姆强调说，语义学的思想可能被用于反动的政治目的。例如，如果“法西斯”一词是空洞的，那么，就不能决定这种或那种社会制度是不是法西斯制度，因而也就不能同力图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力量进行斗争。

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存在主义哲学展开批判。美国的存在主义的特点是它与实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流派相结合的倾向，以及为了使存在主义的思想适合“普通美国人”的爱好而对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作功利主义的、简单化的解释，从而就有广告式的“乐观主义”。

某些存在主义者企图把自己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以便更有效地解决个人问题。美国存在主义者Д．怀尔德跟随萨特之后，宣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存在主义都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看不见个人，而存在主义看不见社会。因此怀尔德写道，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大概可以互相学习一些东西，并且需要某种综合”[122]。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Дж．劳利尔在指出这类论断的客观倾向时强调说：“萨特的目的正是用存在主义来偷换辩证唯物主义，把存在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123]。他指出，萨特关于马克思“无疑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的论断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存在主义者对镇压个人的力量的反抗，并未使个人得到解放。在存在主义哲学中，实际上包含着承认争取对社会实行革命改造的斗争是“无用的”；斗争被说成是“息息法斯的劳动”，因为“世界是荒谬的”。在“人的哲学”这一存在主义招牌下，隐藏着无政

府主义在帝国主义强大的、自发的力量面前软弱无力和悲观绝望的思想。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Э．弗罗姆、К．霍尔尼和其他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相“综合”的企图。Г．威尔斯、Л．富尔斯特、Д．雷诺兹和其他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发表著作，指出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修改弗洛伊德思想的企图是徒劳无功的。威尔斯写道：“霍尔尼接受了弗洛伊德关于个人行为是由无意识的动机决定的这一原则，又进一步假定这些无意识的动机带有情绪激动的和易动感情的性质，从而保存了心理分析的实质”[24]。

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心理分析在美国广泛传播的原因时指出，主要的原因是得到掌握了强大的宣传工具的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生产自动化、“榨取血汗的制度”加强的条件下，患精神病的人数大大增加，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弗洛伊德主义来达到下述目的：以病人“精神上有缺陷”为借口，使社会人士不去注意这一弊端的社会原因。马克思主义者Л．富尔斯特写道，对神经机能病的原因进行科学分析，“意味着从资本主义现在对人民施加的影响的观点，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毫不妥协的研究”[25]。

Д．雷诺兹写道：“资产阶级思想家广泛利用弗洛伊德主义（和新弗洛伊德主义）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是正当的，这在美国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们借助这一学说来歪曲地描述群众反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弊病和痛苦的斗争[26]。例如，这些思想家认为学潮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而是年轻人“精神上容易波动”。

Д．雷诺兹、Ф．查普曼和其他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所谓的实践哲学作了批判分析，这种哲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实际上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细的修正。马

克思主义者指出，在这种哲学所有“创新”的后面，隐藏着实证主义哲学。雷诺兹写道：“‘实践派’——这是实证主义流派。它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名义，靠牺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过分颂扬实践和‘革命行动’”[127]。查普曼写道：“实践派理论家”力图依靠把弗洛伊德主义（马尔库塞、弗罗姆）和存在主义（萨特）的某些成份合并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而“丰富”马克思主义[128]。雷诺兹指出，“实践哲学”与实用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揭露“实践哲学”的社会根源时指出，它是敌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它实际上反映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利益。查普曼写道：“‘实践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攻击是由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发起的，他们在自己的思想（有时也在行动）中体现出一些人的空想、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反抗。这些人实际上向资本主义的“无限权力”投降，对工人阶级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战斗中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能力丧失信心”[129]。

在客观上，“实践派”思想是反对现实社会主义、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点在集合在《实践》杂志周围的某些南斯拉夫哲学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的活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雷诺兹指出，南斯拉夫的“实践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造成一定的损害，并且对南斯拉夫的政治生活产生消极的影响。他认为关闭这家杂志是积极的现象，证明在南斯拉夫的哲学中存在着健康的倾向[130]。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统一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七十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中产生的思想政治流派“欧洲共产主义”作出了原则性的评价[131]。“欧洲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派别，因为它的一

些代表人物在对当前时代的性质和世界革命的进程的评价上，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种问题的看法上，都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理论观点中的错误时强调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力量企图利用“欧洲共产主义”来达到反共、反苏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他们指出，“欧洲共产主义”的某些理论家企图抛弃诸如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是毫无根据的。Г．霍尔在《最先进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谈到个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引起对法西斯专政的联想，因此应该拒绝使用这个词时写道：“某些人力图避开尖锐的阶级斗争问题，看来不仅把名词而且把本质也放弃了。但是，经验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将会证明这种企图是不现实的”[129]。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活动唯一正确的、科学的基础。这一理论具有国际性质，它毫无例外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其中包括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具有最尖锐的社会对抗和阶级矛盾的国家。美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九年）的决议中谈到：“党的全部历史——这是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历史。它的全部活动和积极性都是牢固地以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为基础的”[130]。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打退反动派的进攻，克服来自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为在自己国家的条件下发展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一定贡献。尽管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美国“不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却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学生和其他人民阶层中争得越来越多的阵地。促成这种情况的，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忠诚，是他们战斗的共产主义党性，原则性，与政治斗争的实际任务的联系。

1. 《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材料》1981年莫斯科版第23页。
2. 《美国共产党新纲领，人民反对垄断组织的政权》，载于《美国：经济、政治、思想》1983年第2期第121页。
3. Г．霍尔同志的发言，载于1981年2月26日《真理报》。
4. 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例如，实用主义领袖、纽约大学教授C．胡克，参加了这一运动，他们宣称共产党人是力图借助"力量和暴力"来推翻政府的"阴谋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Г．阿普特克在给С．胡克的公开信中指出，与梯也尔、俾斯麦、墨索里尼、希特勒、佛郎哥和蒋介石相比，胡克关于共产主义没有说出任何新的东西。阿普特克写道："但是，希特勒在1932年说的谎话，胡克在1952年把它说出来，也不会成为真话。相反，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即为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铺平道路而编造和传播的同样的弥天大谎"（Г．阿普特克《历史和现实》1955年纽约版第91页）。
5. 参看：У．Б．福斯特《世界资本主义的没落》1951年莫斯科版，《美国政治史纲》1955年莫斯科版；Н．克洛塞《约翰·杜威的虚无主义》1958年莫斯科版；Г．К．威尔斯《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1955年莫斯科版，《心理分析的破产：从弗洛伊德到弗罗姆》1968年莫斯科版；Г．阿普特克《历史和现实》；Б．达纳姆《被铁链捆住的巨人》1953年波斯顿版；В．杰罗姆《变化中的世界的文化》1947年纽约版；Г．塞尔沙姆《革命的哲学》1957年纽约版；Дж．萨默维尔《苏联哲学：理论和实践研究》1946年纽约版；Г．К．威尔斯《过程和幻想。对怀特海哲学中的方法的批评》1950年纽约版；等等。
6. Г．霍尔《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载于《每日世界》1979年8月25日第9页。
7. 同时，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向右转，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也有所谓新保守主义的产生。这个派别是由不久前作为新自由派而享有盛名、后来则反对"民主太多"的那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Д．贝尔、Г．坎恩、Н．格莱彻、Д．莫伊尼汉、С．汉丁顿等人）的社会政治观点发展而成的。К．科摩洛夫斯基写道："新保守派，这是'新右派'的专门的分枝，他们是垄断资本主义进攻的先锋"（К．科摩洛夫斯基《'新右派'是鹰派的羽毛》，载于《政治事务》1978年第6期第8页）。
8. Г．阿普特克《美国思想生活中的某些倾向》，载于《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6年第10期第31页。
9. 必须指出，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扩大的同时，很多同路人也归附马克思主义，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发表言论，但是他们的理解中有各式各样的歪曲和混乱。正如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К．埃林逊正确指出，有很多人希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加以"革新"，"现代化"，实际上却同马克

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很少有共同之处。“很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一些没有成效的脑力活动，与当代尖锐的阶级斗争没有任何联系”（K. 埃林逊《马克思主义研究》1978年第2期第39页）。

⑩ Г. 霍尔《争取激烈的改革。共产党观点：向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召开的美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报告和结束语》1966年纽约版第66页

⑪ 参看：Г. 塞尔沙姆《革命的哲学》1963年莫斯科版；A. 萨默维尔《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说明》1967年纽约版；等等。

⑫ Д. 萨默维尔《马克思主义哲学》第29页。

⑬ 同上书，第67页。

⑭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在瓦尔纳（保加利亚）举行的第十五届世界哲学大会会议记录》1974年索非亚版第3卷第563页。

⑮ 参看Г. K. 威尔斯《异化和辩证逻辑》，载于Д. 萨默维尔和Г. L. 帕森斯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1974年威斯特波特（康涅狄克州）和伦敦版。

⑯ 同上书，第88页。

⑰ 同上书，第85页。

⑱ 参看M. 穆沙契亚《论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矛盾》，载于《科学和社会》1977年第3期。

⑲ 同上书，第263页。

⑳ Э. 马奎提《在连续的和不连续的空间中运动的辩证法》，载于《科学和社会》1978—1979年第4期第412页。

㉑ 同上书，第422页。

㉒ M. 穆沙契亚《论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矛盾》，载于《科学和社会》1977年第3期第260页。

㉓ M. 科尔曼《论唯物主义的矛盾：一种批评》，载于《科学和社会》1978年第1期第187页。

㉔ 同上书，第190页。

㉕ Г. 塞尔沙姆《列宁的笔记》，载于《主流》1962年第4期第60页。

㉖ 同上书，第64页。

㉗ 同上。

㉘ 参看：Г. K. 威尔斯《心理分析的破产》；Д. Б. 富尔斯特《神经过敏者，他的环境和内心世界》1957年莫斯科版；等等。

㉙ 在这里，帕森斯是指思维的能动性质，并不否认它的观念性。

㉚ Г. 帕森斯《人的脑力活动是物质力量》，载于《美国现代进步哲学和社会学

思想》1977年莫斯科版第176 页。

㉛ Г．帕森斯《人的脑力活动是物质力量》，载于《美国现代进步哲学和社会学思想》1977年莫斯科版第176 页。

㉜ М．沃尔托夫斯基《论批判唯物主义》，载于《美国现代进步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第219 页。

㉝ Г．帕森斯《人的脑力活动是物质力量》第174 页。

㉞ М．沃尔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1968年纽约版第383 页。

㉟ Л．雷诺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实践哲学》，载于《政治事务》1976年第6期第48页。

㊱ 引自Л．雷诺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践哲学》第52页。

㊲ 同上。

㊳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58 页。在Л．雷诺兹的评论在《政治事务》杂志上发表后，支持霍夫曼在书中提出的关于思想是物质形式的论点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科恩、Б．惠特尼发表评述。他们引证心理学和生理学的材料，断言意识归根到底是“物质的”。惠特尼写道：“对人的脑力活动的研究应该归结为心理范围内的生理研究”。雷诺兹在自己的回答中强调说，不能把心理归结为生理，否认人的精神世界。

㊴ 引自Г．阿普特克《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对话的迫切性》1970年纽约版第46页

㊵ 同上书，第46—47页。

㊶ Э．伯特《共同本质的学说》，载于《政治事务》1971年第10期第36页。

㊷ Д．萨默维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第61页。

㊸ Б．达纳姆《英雄和异教徒：西方思想政治史》1967年莫斯科版第445 页。

㊹ Г．К．威尔斯《异化和辩证逻辑》第81页。

㊺ 参看И．В．马尔蒂尼切夫《自然科学家的世界观》1980年莫斯科版第204—205 页。

㊻ Р．科恩和М．沃尔托夫斯基合编的《波士顿科学哲学讨论会报告集》1965年纽约版第2卷第Ⅶ页。

㊼ М．沃尔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1968年纽约版第Ⅴ页。

㊽ 同上书，第Ⅳ页。

㊾ Э．马奎提《普通物理学课程中的物理学哲学》，载于《美国物理学杂志》1978年8月第784 页。

㊿ Э．马奎提《普通物理学课程中的物理学哲学》，载于《美国物理学杂志》1978年8月第786 页。

51 同上书，其中引列宁的话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77 页。

52 М．沃尔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1968年纽约版第342 页。

⑬ M．沃尔托夫斯基《物质、作用和相互作用》，载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在瓦尔纳（保加利亚）举行的第十五届世界哲学大会会议记录》1975年索非亚版第6卷第661页。

⑭ 同上。

⑮ B．彼尔洛在《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一文中指出，生产日用消费品的工业部门在科技方面是明显落后的。当东北地区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时候，在西部和西南部与新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有联系的各州中，工业却迅速发展。参看《政治事务》1964年第8期第18页。

⑯ Г．阿普特克指出，美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者和专家都与军事生产有联系。参看Г．阿普特克《美国思想生活中的某些倾向》第29页。

⑰ П．克洛塞《经济的虚构。对主观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1962年莫斯科版第376页。

⑱ X．卢美尔《"后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背景》，载于《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2年第12期第80页。

⑲ Г．阿普特克《布热津斯基，"布拉格之春"和今天的现实》，载于《政治事务》1978年第8期第23页。

⑳ Г．阿普特克《布热津斯基，"布拉格之春"和今天的现实》，载于《政治事务》1978年第8期第23页。

㉑ Г．霍尔《革命的工人运动和现代帝国主义》1974年莫斯科版第100页。

㉒ Г．霍尔《对社会主义世界的某种观察》，载于《政治事务》1967年第1期第2页。

㉓ 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白领"的概念是十分广泛的：其中包括脑力雇佣劳动者、科技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管理人员、行政人员等等。

㉔ Ф．查普曼《意识形态上欺诈行为的终结和实践》，载于《政治事务》1977年第6期第35页。

㉕ 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莫斯科）的资料，工人阶级在美国有工资收入的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1950年为70％，而在1975年为81％；在雇佣劳动者中为85％。（参看Ю．瓦西里楚克《论工人阶级发展的辩证法》，载于《共产党人》1978年第10期第93页）。

㉖ 引自Г．温斯顿《阶级、种族和黑人解放》1977年纽约版第189页。

㉗ 引自Г．温斯顿《阶级、种族和黑人解放》1977年纽约版第190页。

㉘ Д．里斯托鲁奇《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地位的变化》，载于《政治事务》1973年第10、11期合刊第56—57页。

㉙ 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Р．帕克在《中产阶级的神话。关于富裕和平等的印象》一书中指出，美国2％的居民控制国民财富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居

民则“仍生活在贫困之中”（该书1972年纽约版第XVI页）。

⑩ Г．霍尔《革命的工人运动和现代帝国主义》第52页。

⑪ 参看：Г．霍尔《生态危机的阶级方面》，载于《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2年第2期，《生态学。我们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存吗？》1974年纽约版；Г．弗雷德里克《重新发现自然辩证法》，载于《政治事务》1976年第5期，《制定党关于环境的纲领》，载于《政治事务》1976年第6期；Г．帕森斯《马克思主义论生态学、技术与和平》，载于《第十五届世界哲学大会会议记录》1974年索非亚版第6卷；等等。

⑫ Г．霍尔《生态危机的阶级方面》第21页。

⑬ 同上书，第23页。

⑭ 引自Н·А·希维多娃《国会和环境保护》，载于《美国：经济，政治，思想》1978年第11期第79页。

⑮ Г．弗雷德里克《重新发现自然辩证法》第35页。

⑯ 同上书，第32页。

⑰ Г．帕森斯《马克思主义论生态学、技术与和平》第741页。

⑱ Г．帕森斯《马克思主义论生态学、技术与和平》第745页。

⑲ 米道斯、兰德尔斯、达伦斯《增长的程度：为罗马俱乐部解脱人类困境的计划起草的报告》1972年纽约版。

⑳ 参看Г．帕森斯《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载于《革命世界》1977年第21·22卷第91、92页。

㉑ 参看Г．帕森斯《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载于《革命世界》1977年第21/22卷第98页。

㉒ 参看Г．帕森斯《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载于《革命世界》1977年第21/22卷第98页。

㉓ 《美国共产党新纲领》第121页。

㉔ Г．霍尔《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还击：向美国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1975年纽约版第32页。

㉕ 《美国共产党新纲领》第127页。

㉖ 《美国共产党新纲领》第122页。

㉗ 参看Н．莫斯托维茨、Г．格沃尔格相《在变革的标志下》，载于《共产党人》1979年第7期第71页。

㉘ 参看Г．格林《新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1971年纽约版第7页。

㉙ 参看Г．格林《新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1971年纽约版第21页。

⑩ Л．理佩《激进学生运动》，载于Л．理佩、Д．德格鲁德、Э．丹吉罗合编的《对革命的看法》1971年布里奇波特（康涅狄克州）版第46页。

⑪ Л．杰克逊《革命的探索》1974年纽约版第49页。

⑫ М．勒尔纳在分析“新左派”的错误时，提出要放弃“反知识论”，放弃不愿意认真研究美国资本主义本质的做法，抛掉对自发性的崇拜，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他认为，美国革命应该由学生、青年、黑人、妇女、教师和其他社会集团在工人的必然参加下完成。勒尔纳强调说：“不包括工人阶级很多代表的任何集团组合，最后将会失去夺取和执掌国家政权的可能性”（М．勒尔纳《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它的理论和战略导论》1973年纽约版第228页）。但是，勒尔纳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工人阶级不只是革命的参加者，而且是革命的主要动力这一重要原理。

⑬ Г．温斯顿《论美国种族主义问题》，载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批判》1976年莫斯科版第103页。

⑭ Г．阿普特克《今天的美国黑人》1963年莫斯科版第24—25页。

⑮ Г．霍尔《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还击：向美国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第11页。

⑯ Г．霍尔《神话或现实：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载于《政治事务》1964年第5期第21页。

⑰ Т．迪安《后有神论思想。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的激进观点的对话》1975年费城版第XII页。

⑱ 参看洛赫曼《马克思主义社会中的教会》1970年纽约版第189页。

⑲ Э．伯特《通向先验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载于《政治事务》1970年第12期第64页。

⑳ Г．帕森斯是世界和平委员会成员、布里奇波特大学教授。

㉑ Г．帕森斯《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中人道主义价值问题》，载于《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9年第7期第36页。

㉒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80页。

㉓ Д．斯特鲁克《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于《科学和社会》1963年第3期第298页。

㉔ Л．霍奇斯《马克思对人道主义的贡献》，载于《科学和社会》1965年第2期第171页。

㉕ 美国哲学家К．拉蒙特是社会主义拥护者和苏联的朋友。他在《荒野呼声》中写道：“美国和苏联在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可能根本谈不妥，但是，这些分歧不应该妨碍资本主义集团和共产主义集团的和平共处，虽然也是竞争共处”（К．拉蒙特《荒野呼声》1974年布法罗、纽约版第277页）。拉蒙特在阐释

称为“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哲学”的观点体系时，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宗教。但是，拉蒙特的观点是不彻底的。他在理解自然方面是唯物主义者，但在考察社会方面是唯心主义者。

(106) Г．帕森斯《人道主义和马克思思想》1971年斯普林菲尔德（伊利诺斯州）版第179页。

(107) Г．帕森斯《今天的人——问题、价值和实现》，载于国际哲学杂志《革命世界》合刊特大号1973年阿姆斯特丹版第39—40页。

(108) Г．塞尔沙姆《革命的哲学》第19页。

(109) Г．帕森斯在评价这部著作时写道："别洛乌斯·达纳姆的书《英雄和异教徒》是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哲学成就之一。这本书号召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扬创造性思想的伟大传统”（Г．帕森斯《列宁思想和美国哲学家》，载于《哲学问题》1970年第3期第71页）。

(110) 参看Д．理佩《印度思想中的自然主义传统》1961年西雅图版。

(111) Д．理佩《印度哲学及其对美国思想的影响》1970年斯普林菲尔德（伊利诺斯州）版第278页。

(112) Л．梅森《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载于《政治事务》1975年第8期第45页。

(113) 参看О．约翰逊《俄国革命前美国历史中的马克思主义》1977年纽约版。

(114) О．约翰逊，К．里维《丹尼尔·德·利昂的著作和关于他的著作：书目提要》1966年纽约版。

(115) Г．帕森斯《列宁思想对美国哲学家的影响》，载于Д．梅森、Д．史密斯合编的《列宁对美国的影响》1970年纽约版第197页。

(116) 参看Г．威尔斯《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1955年莫斯科版。

(117) 参看诺思《美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载于《政治事务》1972年第4期第9—10页。

(118) 参看：Г．威尔斯《过程和非现实》；《А．Н．怀特海的哲学》，载于《科学和社会》1952年冬季号；《А．Н．怀特海的哲学》，载于《美国进步活动家在争取进步思想的斗争中》1950年莫斯科版。

(119) 参看Р．塞拉尔斯《被忽略了的选择对象。批评文集》1973年刘易斯堡版第104页。

(120) Б．达纳姆《被铁链捆住的巨人》1958年莫斯科版第105页。

(121) Г．塞尔沙姆《革命的哲学》第141页。

(122)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第340页。

(123) Дж．劳利尔《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1976年阿姆斯特丹版第5页。

⑭ Г. 威尔斯《心理分析的破产》第114 页。

⑮ Л. 富尔斯特《神经过敏者，他的环境和内心世界》第35页。

⑯ Л. 雷诺兹《弗洛伊德主义和新弗洛伊德主义》，载于《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1年第11期第68页。

⑰ Л. 雷诺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实践哲学》第47页。

⑱ 参看Ф. 查普曼《思想欺骗的终结和实践》第31页。

⑲ 同上，第34页。

⑳ 参看Л. 雷诺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实践哲学》第51页。

㉑ 参看：Г. 霍尔《关于世界各共产党之间的分歧的弥天大谎》，载于《每日世界》1977年9月3日；《问题在于不是怎样成为独立的，而是怎样成为共产主义的？》，载于《每日世界》1977年7月30日；Э. 伯特《圣地亚哥·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载于《政治事务》1978年第11期等等。

㉒ Г. 霍尔《最先进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载于《每日世界》1977年8月6日。

㉓ 《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要政治决议草案》，载于《政治事务》1979年第8期第29页。

第 七 章

马克思主义在加拿大哲学

在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中，除了共同的规律性以外，还有一些特殊性，在其中反映出加拿大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独特过程、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这个国家的阶级和民族冲突、矛盾形势。加拿大是一个已形成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并且独立地执行自己的对外政策，但是带有对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依赖的特色。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加拿大经济中占有极强大的阵地。震撼美国的危机和通货膨胀，在加拿大表现得更加强烈。金融和能源危机、失业、通货膨胀、涨价、劳动者实际工资下降——这一切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现象导致国内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尖锐化。

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У．卡斯坦在苏共二十六大上这样谈到加拿大经济的危机状况："在象加拿大这样富裕的国家中，我们看到停滞、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失业增加、美国公司开设的工厂关门、生活水平下降。现在加拿大的失业人数几乎达到一百万。"[1]

在国内越来越尖锐地提出民族问题，说法语的加拿大人为争取在联邦范围内的真正平等权利的斗争在不断加强。

现今加拿大社会的精神生活反映了各种各样的阶级、民族、社会和地区的利益。不管社会关系如何复杂，有一条贯穿一切的主线可以看得非常明显，这就是反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主要阶级斗争的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与统治阶级有联系的大众信息手段、各种机构和组织所宣传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有统治地位。

加拿大有影响的哲学流派，是从欧洲输入的各种“现实主义”学说、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和新托马斯主义。马克思主义者C．赖尔森写道：“加拿大法语区的官方哲学是托马斯主义。”②加拿大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是从美国进口资产阶级文化。在加拿大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垄断资本为了剥削加拿大人的民族自我意识，剥削他们对美国扩张的抵抗，死劲地向加拿大灌输美国资产阶级文化。

以共产党为前导的加拿大进步力量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进行紧张的斗争，捍卫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思想。Y．卡斯坦在苏共二十六大上说道：“现在的形势要求世界上一切进步的和爱好和平的力量紧密团结起来。我们党过去曾号召，现在还继续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党把这一斗争作为自己在加拿大的全部活动的基础。”③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为在自己国内宣传、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了大量工作，揭露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加拿大的发展是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在五十年代，加拿大共产党人为保持和加强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者而进行了斗争。

以后的年代以民主力量的积极活跃、工人阶级斗争的加强以及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激进化为标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兴趣不断提高。在加拿大共产党二十一大（一九七一年）上，通过了指出加拿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新党纲。通过这个党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重大胜利。加拿大共产党二

十四大（一九八〇年）展示了它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它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的增长。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全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重要文献，国际共运杰出活动家以及加拿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著作。Т．布克和Л．莫里斯写了许多书和文章，论述加拿大的工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分析加拿大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阶级斗争的辩证法，他们为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У．卡斯坦发表了分析共产党活动的最重要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对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原则性的批判。

加拿大共产党出版物，特别是《加拿大论坛报》和《共产党观点》杂志，对密切联系阶级斗争实践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重大意义。加拿大共产党领导成员У．卡斯坦、У．斯图亚特、Б．马格努森、С．沃尔什、А．迪尤赫尔斯特、М．东格等，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者Л．高尔斯蒂克、Б．苏恩凯等，经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论述哲学、科学共产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加拿大学者С．赖尔森在创作关于加拿大及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基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对作为认识和革命行动的彻底科学方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和创造性运用极为重视。共产党的文件中强调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党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实际活动的重大意义。加拿大共产党纲领中说道：“共产党的世界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共同规律时考虑加拿大历史发展和加拿大人民实际斗争的特点。党力求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成为劳动人民的财富，并且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反对任何歪曲或修正。”④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创造性运用唯

物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两个世界社会体系斗争的复杂和矛盾过程，科学地制定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极为重视民族问题，积极争取消灭在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和说英语的加拿大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平等，反对压迫少数民族和美帝国主义对加拿大民族主权的威胁。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非常注意研究与科技革命及其社会后果有关的问题，捍卫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考察关于科学性和党性、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问题。他们发表了研究在加拿大向社会主义实现革命过渡的道路和形式、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的著作。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问题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注意在列宁反映论的基础上研究认识论问题；除了正面的研究和阐述以外，他们还批判对马克思认识理论的伪造和歪曲。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特别是“马克思学家”，还有修正主义者，都反对列宁的反映论，把它说成是“形而上学的”和“直观的”东西。

然而，这类说法是以对列宁著作的错误解释为根据的。在列宁的《哲学笔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及其他著作中，都揭示了意识的能动的、创造的性质及其通过人的活动的改造作用。资产阶级哲学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科学原则相对立，提出了各种各样浸透了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不可知论和非理性主义思想的理论。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揭露哲学中的反动思想的社会根源，他们指出，这种社会根源就是垄断资产阶级的自私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这个垄断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在全球性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实现革命过渡的条件下保存它的统治。

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尽管有阶级局限性，还是在自己的学说中提出了与封建主的蒙昧主义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个别珍贵论点。然而，现在的形势不同了。现在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完全不利于资产阶级，但是有利于工人阶级。正是资产阶级不关心鼓励对总的历史运动、资本主义的性质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这种反动的阶级倾向对资产阶级哲学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合乎规律地产生形形色色的伪科学概念。正象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这些伪科学概念中流行特别广泛的是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正向冲突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极为重视批判这些概念，捍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Д. 高尔斯蒂克在《列宁论真理和责任》一文中,对认识论方面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提供了很有内容的批判，他强调指出，列宁在制定认识理论、批判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时候，在真理问题上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相对主义又反对独断主义。

高尔斯蒂克指出，相对主义者通常援引科学理论不断变化的因素来支持自己关于一切知识只是相对的论点，这个论点实质上导致否定客观真理。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辩证的真理论驳斥这种观点，它认为，在一系列精心制定的科学理论中，即使没有一个理论是绝对和完全的真理，但是其中一些理论可能比另一些理论更正确，更接近绝对真理。强调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即马克思主义的相对真理学说并不认为任何真理只是相对的。”[5]

当然，有事实的绝对真理，但是重要的是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的实质，无论是相对主义还是独断主义与它都不能相容。许多资产阶级哲学按“或是这样，或是那样”的原则看问题，不可能懂得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法。他们在真理问题

上往往提出这样一种错误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如果我们不能够一下子知道一切，如果我们的知识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那么我们就什么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列宁曾强调指出，如果抛掉无所不知和一无所知这种错误的对分，那么就有可能提出关于认识只是在一定界限内是相对的论点。

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者的修正主义时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6] 科学认识的发展在下面这种意义上是相对的，即它受到技术水平、经验材料掌握程度等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没有一个历史时期没有提供绝对真理；在各种不同条件和时候的理论可能差别很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科学史上不可能有进步；每一个时代都增加知识的客观内容，超过以前的时代。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科学认识进步的最重要条件是理论和实践建立密切联系。他们在分析作为认识论范畴的实践时，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它决定认识的目的和途径，是真理的标准。实践标准使得有可能证明正确论点，驳倒错误论点。Д·高尔斯蒂克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就在于它与社会历史实践的有机联系，这种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它的科学的和革命的性质。高尔斯蒂克关于列宁的观点这样写道："他的理论是深刻实践的，他的实践以理论作为指导"。[7]

列宁把实践作为认识论范畴看待，使得有可能驳倒经验批判主义者的理论。高尔斯蒂克写道："列宁在自己的书中是运用什么批驳手段对付'经验批判主义'的呢？这是一种极其简单和实际的批驳……列宁证明了，经验批判主义的严肃和彻底的信徒不会

再相信处于他自己思维以外的一切客观存在。”[8] 高尔斯蒂克指出，必须一步一步地迫使马赫主义者承认他们的理论的逻辑后果：这样就必然暴露出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脱离。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在资产阶级哲学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倾向，即借口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一样极为重视实践而把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同起来。他们指出，现在“马克思学家们”时兴把马克思描绘成为实用主义者，因为他似乎“使认识服从于实践”。这些“学者们”宁愿使用《praxis》来表示实践，而不使用英语的《practice》，虽然这样的替换并没有给他们的论据增加任何新东西。

然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马克思为了迎合实践而贬低了理论。康宁汉指出，那些这样断言的人通常是以对马克思著作的错误解释为根据。相反，马克思常常指出认识和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他从来没有把它们看作互相排斥的东西，而是强调它们的必须统一。只有根据实践才能发展和考验理论，而没有客观的认识，实践的成功也只可能是偶然的。

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断言，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和政治流派相比较的真理性是由这一点证明的，即它由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而在历史上取得了对它们的胜利。高尔斯蒂克在批判这种说法时写道：“我不知道有哪一篇著作可以表明，马克思有这种对真理的实用主义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保证了它的胜利。”[9]

列宁对马赫主义和其他唯心主义形式的深刻科学的和尖锐论战性的批判也适用于现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们常常为了“驳倒”列宁的反映论而采取最精巧的伪造方法。正象高尔斯蒂克指出的，以“幼稚具像论”[10]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英语国家的哲学界是得到公认的。H. 马金内斯、Д. ж. 波尔及其他资

产阶级哲学家做出这种“解释”，是由于对作为认识论范畴的“形象”有不正确的理解。高尔斯蒂克写道：“毫无疑问，列宁的书中多次使用‘形象’这个词（译成英语是“image”），能够一下子，简直是自动地使英文哲学书刊的读者按照早已形成的反射作用想起发源于勒奈·笛卡儿和约翰·洛克的传统具像论。下面将说明，这个结论是以对‘形象’概念的错误解释为根据的。”[11]

例如，英国哲学家Д.ж.波尔所提供的就是这种被歪曲了的形象概念，他把列宁所理解的形象与潜水艇的潜望镜中的“形象”相比较。高尔斯蒂克指出，这种比较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列宁在哪里也没有说过人们感知的是“形象”。高尔斯蒂克援引了列宁这样一句话，“感觉的确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12]，然后写道：“如果物质是在人的感性认识中‘直接给予人’的（这样一来，感性认识就给意识提供与充当我们感觉的‘感性内容’的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真正是同直接（direct）现实主义打交道。”[13]高尔斯蒂克指出，对于“直接现实主义”的主张者说来，意识的一切感知“形象”都是感知活动。

高尔斯蒂克在捍卫列宁的反映论不受歪曲时，使用了英语国家里所形成的术语，其中包括“直接现实主义”的概念，他把这个概念与辩证唯物主义等同起来。但是这种等同是不对的。“直接现实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同的地方只是在于承认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某种中间环节，即精神上的形象。然而“直接现实主义”没有考虑到感性认识的相对直接的性质、社会实践对认识的意义、这一过程的全部辩证的复杂性和矛盾性。[14]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原则有普遍的性质：它们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社会。可是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承认自然界可以认识，却认为社会生活的多样的和复杂的现象在原则上

是不能认识的。为了论证这个错误的论点，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论据”。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一些著作，令人信服地驳斥了这种“论据”，批判了对待社会生活问题的相对主义、怀疑论和不可知论。[15]他们指出，在加拿大大学校园的精神气氛中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其培养基应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中去寻找。

高尔斯蒂克写道：“哲学见解的这种居统治地位的气氛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决定的，是它要求巩固和永远保存的趋势的反映。”[16]

Ш．帕克希尔、Д．高尔斯蒂克及其他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在高等院校的社会科学师生、受资产阶级宣传影响的文化工作者当中，居支配地位的是浸透了对社会生活问题的不可知论、主观主义和犬儒主义的观念。按照他们的看法，关于社会科学中的对立理论的任何讨论都得不到积极的结果，因为在讨论某个问题时没有评价理论的客观原则。在严格客观研究的幌子下，只是陈述某个哲学家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

一些流行的教科书引用大量科学史和哲学史的材料，广泛宣传社会科学不可能有客观性的论点。

这个论点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敌人（К．波佩尔、Л．冯·米泽斯、У．沃尔什、Дж．梅奇）的维护，他们的论据是，马克思主义似乎把自己论点的真理性和客观性理解为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主观目的和意图。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针对他们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一切反科学理论的特点在于它对真正现实的深刻科学的和客观的研究、对历史过程的规律性的揭示，不这样就不能理解社会生活发展的本质。高尔斯蒂克写道：“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必须知道关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17]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企图援引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事实来反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质，说它不能表达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不是科学。”

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引起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高尔斯蒂克写道:“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这个词的最一般意义上，任何党的思想体系都是意识形态。谁也不怀疑，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意识形态’。”[18]但是，正如高尔斯蒂克认为的，这个问题更复杂得多，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本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几种意义。高尔斯蒂克指出，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来表示包括政治观点、哲学、宗教、法制意识、艺术等等在内的全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是“思想的总体”[19]。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还有“意识形态”这个词的另一种意义——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家根据经济及其他社会关系所制定的思想体系。很清楚，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家所制定的意识形态表达上层统治人物的利益，整个说来是一种被歪曲的世界观。高尔斯蒂克写道:“例如，他们在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常常使用‘意识形态’这个名词来指职业的法学家、哲学家、作家等想要在阶级社会中阐述和传播的这种错误思想。”[20]

“意识形态”这个词有时也被用来表示为了团结人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政治神话、不科学的教义。P．尼布尔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谈到这种“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好处，高尔斯蒂克对他进行了批判。他强调指出，只有提供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高尔斯蒂克写道:“与象P．尼布尔和Ж，索

列尔这样的理论家的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具备比较科学的正确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指望获得成功。”[21]高尔斯蒂克实质上正确地谈到，为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遵循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好理解的只是：为什么高尔斯蒂克认为这个理论应该是“比较科学的”。然而接着他完全正确地强调指出，科学的真理性是运动归根到底取得成功的极重要因素。

高尔斯蒂克在说明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不是科学”的论点站不住脚时指出，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表达工人的利益，它是科学的。无产阶级关心对社会现实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这种知识。他写道：“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肯定地说，它既扎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时又是科学的。”[22]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在表达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同时，又表达人类绝大多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无产阶级和这个大多数的利益是一致的。高尔斯蒂克在结束时写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是工人阶级特有的学说，同时又符合全人类的利益。”[23]

二、对在加拿大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道路和形式的分析

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遗产、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来制定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力求将它创造性地运用于自己国家的条件。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断言，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在今天已经“过时”，因为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在社会生活中已发生巨大变化，工人阶级的作用和阶级斗争的土壤正在消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用各种各样形而上学的、庸俗进化论的理论来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

展理论对抗，企图把人类的未来不是与共产主义、而是与变了形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这种变了形的资本主义就是“后工业社会”（Д．贝尔）或“技术统治的社会”（З·布热津斯基），它将由电子计算技术、计划方法、预测方法等来管理，结果在这种社会中似乎将不再有社会对抗。

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科技革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后果、在它的影响下在社会结构、劳动性质等中发生的变化。他们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企图借口这种变化否定象阶级斗争这种对抗性社会的最重要规律性。Б．马格努森在《科技革命和世界革命过程》一文中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冲突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不仅没有削弱，而是更加加剧了。在科技革命条件下，最大规模地对生产进行规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做到的。马格努森写道："技术和社会进步与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不能相容；这必然在社会上产生出对抗的矛盾。"㉔

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以及改良主义者的这样一种企图，即想要证明科技进步已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已成为“民主的”、“人道的”等等。有一个改良主义者这样说道：“我们现在看到所有制和管理之间的分离；管理公司的现在不是资本家，而是经理和官员。但是后者对剥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正统的管理者过去大概是有这种利害关系的。”㉕

马克思主义者Н．弗里德在揭露这种诡辩时，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并没有改变。他写道："尽管条件有各种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照旧存在着。主要的生产资料属于私有。雇佣劳动生产的产品为资本所有者所占有。如果雇佣的经理和官员直接不设法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一切利润的源泉），他们就

会被解雇。”[26]

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菲立浦斯指出，联邦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人、英国的工党分子许多年来掌握政权，关于社会主义写了和说了不少东西，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照旧存在着资本主义。菲力浦斯关于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样写道：“这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实际上是为保存资本主义服务的。它们否定社会主义革命、把主要生产资料交给社会的必要性。”[27]

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正在经受深刻危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根本问题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加拿大共产党纲领中说道：“加拿大人民的大多数看得非常清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把生产资料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夺过来交给社会，从而解放生产力，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满足自己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将是由加拿大人民在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根本的、革命的社会变革。”[28]

纲领中拟定了为争取对加拿大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进行斗争的具体任务、途径、手段和方式。最近的任务是建立反垄断资本的广泛人民同盟，在这一基础上应该建立旨在实现进步性质的改革的民主政府。按照纲领，统一的革命过程将经过两个阶段——反垄断资本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民主改革措施的实现将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У·卡斯坦说道：“共产党活动的目的是社会主义。反垄断资本的政府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社会经济改革。”[29]

加拿大共产党纲领中对社会主义革命形式、斗争手段的问题极为重视，强调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具体历史条件，对某种斗争方式和斗争手段的侧重将因革命过程的发展、阶级力量的对比而发生变化。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动

力问题，他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的根本原则，不仅没有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和修正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已经过时，而且相反，在今天，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全球性革命过渡的时代，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者证明关于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说法站不住脚。劳动强度增加、通货膨胀、失业、对明天没有信心——这是加拿大工人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一样每天遇到的现实。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圭尔夫大学教授K. 孟福德指出，科技革命并未消除资本家加强"血汗制度"的愿望。他强调指出，"垄断资本利用技术进步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生产的自动化和机械化导致"劳动强度的急剧增加"。[30] Г. 马尔库塞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家断言斗争的主力应该是流氓无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似乎已经"资产阶级化"了，孟福德在证明这种论断站不住脚时写道："不是流氓无产阶级，而正是有纪律、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是唯一的由于自己在生产中的地位应该在革命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阶级。"[31]

共产党争取建立反垄断资本的同盟、设法使工人阶级与有反垄断资本性质的群众民主运动，如说法语的加拿大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新左派"运动、争取公民权运动等联合起来。马克思主义者极为重视研究加拿大民族问题的理论方面，这个问题在那里非常尖锐。

两个民族——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和说法语的加拿大人——有共同的加拿大血统；他们为反对殖民统治、争取加拿大解放和防止美国强占而进行了共同的斗争。然而，由于某些历史发展的特点，法语加拿大人对英语加拿大人说来处于民族从属的地位，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都较差。

英语加拿大人的沙文主义在国内居统治地位：法语加拿大人被看作是“次等”公民。统治阶级不承认他们是独立的民族，不给予他们民族自决权。民族概念的所谓“法律定义”也应该为此服务，按照这个定义，民族是独立的、主权的国家。既然法语加拿大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按照这个定义就不构成民族。这一法律拜物教在实践上导致镇压法语加拿大人民解放运动的反动政策。

C· 赖尔森写道：“对只存在一个加拿大人国家的明显事实的承认，成了反对这个国家有两个民族的论据。否定法语加拿大民族的存在，你就排除了承认它的自决权（直至包括分离的权利）的任何必要性。”[32] 正如C· 赖尔森断言的，民族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它存在着，并且有权存在。法语加拿大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它捍卫自己的利益，并不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国家而不再是民族。任何“法律的论据”都不能解决民族问题。

加拿大共产党提出法语加拿大人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作为纲领性的要求，把授与这种权利看作是解决联邦危机的必要条件。[33]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各民族自愿平等的联合，同时批评民族主义的、分立主义的思潮，因为这种思潮在客观上阻碍所有劳动者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极为重视研究“新左派”运动，这个运动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具有很大的规模，尽管有重大缺点，带有明显的反垄断资本性质。青年的大规模行动在争取进步改革和巩固和平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然而“新左派”没有科学的行动纲领。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是什么统一的东西，而是从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从存在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那里取来的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新左派”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某些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论点。[34]

共产党人在揭露"新左派"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时，实行使青年运动与工人阶级斗争相结合的方针。[35]有共同利益和共同敌人，这就是为工人阶级与社会上所有受到垄断资本压迫的其他阶层的联合创造了客观基础。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工人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应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水平，作为独立阶级行动。迪尤赫尔斯特写道："历史地看，加拿大工人阶级还没有达到这种觉悟水平……工人阶级绝大多数还处于改良主义的影响下。"[36]

加拿大工人的大多数追随资产阶级政党以及支持这些政党的改良主义工会领袖。所以，加拿大共产党极为注意在争取和平、社会进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对劳动群众进行政治教育。把他们的力量团结起来。

三、对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的批判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它的一些最有影响的流派进行了科学的批判分析，揭示了它们的阶级本质和社会功能。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正在经历深刻的危机，这一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反映。非理性主义、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等是它固有的特点。Д.高尔斯蒂克写道，在加拿大的大学圈子里，"非理性主义是占优势的传统"[37]，"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其衰落时期的支柱，也是它的产物"。[38]

加拿大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都贬低，甚至力图驳倒一切与理性主义多少有联系的思想，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高尔斯蒂克指出，这些流派的代表硬说，这些思想过于广博，因此也就过于自命不凡，不可能是真理，他们认为，科学妄图占有真理的要求本身就是"独断主义的"。

在这种条件下，哲学变成为阻碍有成效的思维和行动的障

碍。高尔斯蒂克强调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社会功能就在于“培养对现状的非批判态度和对想要批判研究现存社会制度或提出严肃实际抉择的合理尝试的本能的怀疑主义”。[39]

在加拿大和在美国一样，最流行和最有影响的有两个哲学流派：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高尔斯蒂克写道：“这两个流派从历史上看都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中的产物。对这两个流派的医治办法归根到底都不仅仅是、或者甚至主要不是理论上的批驳，在更大的程度上应该是实际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以革命方式消灭造成这种衰落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深刻社会原因。”[40]

马克思主义者对分析哲学的批评，首先在于它不考察尖锐的社会问题。分析哲学家的相对主义概念合乎逻辑地导致不可知论、不相信科学认识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分析哲学的装样子的学院派头、忽视人类现实问题的倾向，实质上是适应上层权势集团策略的迷彩伪装。高尔斯蒂克指出：“毫无疑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英语院校哲学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流派（有时在广义上称作“分析哲学”）总是愿意取得学院的合理性，不惜损害以前对人类问题采取严肃态度的传统。”[41]然而，他指出，这样获得的“合理性”很快就蜕变为经院和诡辩学说。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表明了，语言分析哲学家实质上是敌视科学认识的。这种哲学的各种相对主义概念被广泛用来论证“不可能”对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研究，被用来“驳斥”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

语言分析哲学的代表A．契库列尔维护社会科学的主观主义思想，在《社会学中的方法和尺度》一书中声称，“语言结构及其使用影响人们解释和描述周围世界的方法”。[42]这是语言学相对主义原则的典型表述。另一语言哲学的代表Э．塞皮尔断言，在实际上，“现实世界”基本上是没有意识到的建立在语言特点

上的集团。

按照塞皮尔的看法，有多少语言集团就有多少“世界”。沃尔夫—塞皮尔的论点说，对世界的感知取决于感知者的“思维世界”（他的“形而上学”或“世界观”），它或是完全由所用的语言（特别是语法）所决定，或是与语言有辩证的相当关系，但是语言是主要成份。无论是“被思维的世界”还是它与语言的关系都向我们“隐藏着”，可是它们却无意识地迫使我们按范畴来“整理”世界、描述和解释世界。

语言相对主义者断言，既然社会科学的一切研究者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利用一定的语言，那么他们的语言就将决定他们能够按照经验得知的东西，所以两个语言基础很不相同的学者之间似乎不可能有客观的讨论。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如果语言相对主义是对的，那么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就不可能，或者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可能，因为按照分析哲学家的看法，任何两种语法和词汇相隔较远的语言不能够表达同样的说法。

沃尔夫的追随者之一Γ.格律恩鲍姆试图证明语言差异是人们交往中“不可克服的因素”这个错误的论点，他断言普罗提诺著作的拉丁译文过于繁琐，这成了阻碍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传播的主要障碍。然而这个论据经不起批评。

沃尔夫写道，世界在人的感知中是万花筒式的千变万化的感受，这些感受应该由理性、由它的语言体系来进行分类整理。然而，借助各种不同语言进行分类整理的必要性本身不能证明语言相对主义正确。例如，说俄语和说英语的人看到的是同一个色谱。分类整理需要定出把属分为种的原则。诚然，选择某个原则是协议的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支持相对主义的论据。分类整理的原则本身是在客观上被决定了的，因为分类整理是在经验、现有事实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

除了对分析哲学的批判以外，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另一个很流行的流派——对青年大学生和激进知识分子有很大影响的存在主义——进行了批判的科学研究。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H.弗里德指出，这种哲学对各种不同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精神危机的观念说来是一种“理论基础”。他写道：“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主要问题是‘存在’或‘本质’和不断重复的死亡的旋律。”[43]接着他又说，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人类没有未来。人类应该走向死亡，前面可以看到的一切是‘非存在的空虚’”。[44]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产生这种颓废的悲观主义哲学的深刻社会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现实本身，在这种现实中个人感到无能为力和空虚无望。Д．高尔斯蒂克写道，许多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感觉到他们生活在颓废的时期，这表现在许多现象上。他指出，在这种情况常常使用“异化”这个词。但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原因和消灭的途径是什么？高尔斯蒂克断言：“异化是在我们当代社会中流行的不健康的社会现象……可以指出象很流行的失望和怀疑情绪、对为暴力而暴力的颂扬、无能为力的心理感以及对个性全面发展的压制等这样的颓废征候。”[45]

存在主义者非常注意个性问题、个性的自由、异化的克服，但是他们不能提供对这些问题的科学答案。他们认为，现实的自由能够通过个人脱离社会、与社会对立的办法来达到。但是他们对社会和个人的观点是抽象的。弗里德强调指出：“没有象‘一般社会’和‘一般个人’这种现象。实际上只有一定的社会经济社会，即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归根到底是历史决定的社会制度的产物。”[46]

与存在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是社会的存在物，自由永远不可能是绝对的。存在主义者对社会的批判是虚无主义的。它没有积极的纲领。高尔斯蒂克指出，存在主义哲学是深刻矛盾的。一方面，它反对资本主义幸福的神话，另一方面又

反对在合理基础上建立社会的革命要求。高尔斯蒂克在谈到存在主义者时写道，他们的“哲学唠叨更多的是反对理性、科学和技术,而不是反对其实际倾向是在压制理性、把科学技术用于反人道目的的资本主义制度”。[47] 存在主义者的造反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维护者说来不构成危险。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他们还没有充分揭示关于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以及唯心主义者用以投机的个性问题。弗里德指出，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在驳斥思想绝对独立的理论、意志和选择的绝对自由时，没有充分阐明思想相对独立、选择自由和思想影响历史发展的问题。这一切为那些力图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加强自己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留下了活动的余地。弗里德写道:“我们必须与‘问题的这一方面’（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打交道；这不是抽象的学术问题，而是非常实际的、从作为阶级斗争决定性战线之一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问题。”[48]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与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修正主义的代表起着向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政党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作用。加拿大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和六十年代初进行了特别尖锐和紧张的反修斗争。修正主义者（Г·加隆、Л·索尔斯贝格等）把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声称，这一学说已经“过时”、“不适用”于加拿大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者在揭露修正主义的伪造时表明了，修正主义者夸大加拿大和加拿大工人运动发展的民族特点，只考虑这些特点，从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性，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Л·莫里斯批判修正主义者的议论，强调指出，若企图建立“加拿大的”和其他的“民族马克思主义”,那就意味着

消灭作为具有国际性质的工人阶级科学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写道："没有任何'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有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加拿大现实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和加拿大特点的结合。"[49]

У.卡斯坦参加了反对修正主义的讨论，他在阐述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加拿大现实结合起来的思想时写道："结合意味着创造性地具体地发展和运用它，但不是修正它。"[50]修正主义者攻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点，宣布它"不符合"加拿大的条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根本没有原则意义。Т.布克在揭露这种"论据"时写道，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很重要的哲学问题"。[51]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应该是革命党，不然它就不再是共产党。"[52]

正象列宁著作（《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中表明的，产生修正主义的主要原因带有社会政治性质。然而列宁也指出了，修正主义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哲学的根源。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遵循列宁研究修正主义产生原因的方法，指出资产阶级哲学是修正主义的重要意识形态根源之一。资产阶级哲学所固有的非理性主义和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在客观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科学。高尔斯蒂克写道："在一定程度上，资产阶级哲学的这一共同特点可以被看作是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特殊功能相联系的。"[53]

此外，高尔斯蒂克指出，在加拿大也和在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一样，还有一个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殊因素，这就是"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有一种反理论的倾向，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这一点上所有阶级都是一样，他把这种倾向看作是阻碍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传播的障碍"。[54]

在科技革命的条件下，加拿大的工人阶级也和其他高度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一样，起了很大的变化；它的队伍中补充了“白领工人”。这是一种积极的现象。但是，高尔斯蒂克写道，工人阶级的这些新成分必然“要给无产阶级的队伍带来小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55]小资产阶层是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它的特点是在改良主义与左倾的、浪漫主义的冒险主义之间动播。高尔斯蒂克强调指出，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来与这一切相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使得有可能“深刻地研究客观现实的全部辩证的复杂性，它的变化的矛盾”。[56]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活动，他们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于自己的国家的条件做出了贡献。他们依据科学的方法，研究现代社会发展的复杂的、矛盾的过程，捍卫工人阶级的革命世界观不受伪造和歪曲，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苏主义、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

① 威廉·卡斯坦同志在苏共二十六大上的发言，载于《真理报》1981年3月3日。

② C·赖尔森《加拿大社会科学发展的某些趋势》，载于《哲学问题》1961年第11期第78页。加拿大进步哲学家P.巴茨也指出“托马斯主义的宇宙学和认识论”、“哲学和神学的教条主义”在加拿大法语区大学中有强烈影响(参看：P．巴茨《科学哲学在加拿大》，载于《一般科学理论杂志》1974年第5卷第2册第342页)。

③ 威康·卡斯坦的发言，载于《真理报》1981年3月3日。

④ 《加拿大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62年1月19—21日于多伦多》1962年莫斯科版第143页。

⑤ Л．高尔斯蒂克在《列宁论真理和责任》，载于《共产党观点》1971年第 期第40页。

⑥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36页。

⑦ Л．高尔斯蒂克《列宁论真理和责任》第36页。

⑧ Л．高尔斯蒂克《列宁论真理和责任》第39页。

⑨ Л．高尔斯蒂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吗？》，载于《共产党观点》1977年第2期第45页

⑩ 按照具像论，认识主体的意识所感知的不是客体，而是客体的形象，它把这个客体介绍给意识：在认识过程中似乎发生客体的"分裂"。

⑪ Д·高尔斯蒂克《列宁的感知理论》，载于《哲学科学》1978年第3期第118—119页。

⑫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页。

⑬ Д·高尔斯蒂克《列宁的感知理论》第119—120页。

⑭ "实质上，作者所捍卫的感知理论可以被看作是列宁的反映论，把它叫作'直接现实主义'是多余的"（И·С·纳尔斯基为Д·高尔斯蒂克的《列宁的感知理论》一文写的跋，载于《哲学科学》1978年第3期第131页）。

⑮ 参看：Д·高尔斯蒂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吗？》。

⑯ Д·高尔斯蒂克《哲学和颓废和应该怎么办》，载于《共产党观点》1973年第2期第35页。

⑰ Д·高尔斯蒂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吗？》第39页。

⑱ 同上书，第38页。

⑲ Д·高尔斯蒂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吗？》第39页。

⑳ 同上书，第40页。

㉑ Д·高尔斯蒂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吗？》第40页。

㉒ 同上书，第41页。

㉓ Д·高尔斯蒂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吗？》第43页。

㉔ Р·马格努森《科技革命和世界革命过程》，载于《共产党观点》1974年第4期第44页。

㉕ 转引自Н·弗里德《与查理·泰勒辩论》，载于《共产党观点》1969年第1期第12页。

㉗ Дж. 菲立浦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载于《共产党观点》1976年第2期第33页。

㉘ 《加拿大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35—136页。

㉙ Э·卡斯田《工人阶级和反垄断资本的斗争》1975年莫斯科版第37页。

㉚ К·孟福德《大规模失业的真正功能》，载于《危机和意识》，Р·费里斯编，1977年阿姆斯特丹版第84页。

㉛ К·孟福德《重访流氓无产阶级》，载于《政治事务》1974年第5期第46页。

㉜ С·赖尔森《不平等的联盟》1966年多伦多版第430页。

㉝ 《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争取民主解决联邦危机》，载于《加拿大论坛报》1977年2月28日第7版。

㉞ 在《地平线》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大学生（"新左派"）这样描述这一意识形态："它是存在主义、实用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学、主观社会学和

宗教人道主义的结合”；而且，据作者们自己承认，“新左派”中有些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的大学生左派和马克思主义》，作者是“大学生左派”成员，载于《地平线》1966年第19期第59、62页）。

35 参看A·维格多《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青年和共产党人》，载于《共产党观点》1974年第1期。

36 A·迪尤赫尔斯特《哲学和颓废和应该怎么办》，载于《共产党观点》1973年第2期第35页。

37 J·高尔斯蒂克《哲学和颓废和应该怎么办》，载于《共产党观点》1973年第2期第35页。

38 同上书，第32页。

39 J·高尔斯蒂克《哲学和颓废和怎么办》，载于《共产党观点》1973年第2期第29页。

40 同上书，第36页。

41 J·高尔斯蒂克《哲学和颓废和应该怎么办》，载于《共产党观点》1973年第2期第36页

42 A·契珠列布《社会学中的方法和尺度》1964年格伦科版第1页。

43 H·弗里德《无处反叛》，载于《共产党观点》1970年第1期第44页

44 同上

45 J·高尔斯蒂克《哲学和颓废》第28页。

46 H·弗里德《无处反叛》第44页。

47 J·高尔斯蒂克《哲学和颓废》第31页。

48 H·弗里德《共产党人和“新左派”思想》，载于《共产党观点》1971年第5期第50页

49 J·莫里斯《辩论中心的一个基本原则》，载于《全国事务》1957年3月号第6页

50 S·卡斯朗《某些概念和误解和为了促进党的利益所需要的变化》，载于《全国事务》1957年4月号第23页。

51 T·布克《你们的在斗争中》1977年多伦多版第402页。

52 同上书，第404页

53 J·高尔斯蒂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毒药》，载于《共产党观点》1969年第4期第46页

54 同上

55 同上书，第47页。

56 J·高尔斯蒂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毒药》载于《共产党观点》1969年第4期第48页。

第 八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阿根廷

现代拉丁美洲现实的基本矛盾是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拉丁美洲各民族和与地方寡头政治、大资本结成同盟的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X·阿尔内多（一八九七——一九八〇年）在阿根廷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三年）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在阿根廷“主要矛盾是大部分居民、阿根廷本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人民和寡头政治之间的矛盾”[1]。这一客观矛盾决定了必须把争取劳动群众的社会解放的斗争与争取他们的真正的民族解放和复兴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矛盾还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拉丁美洲革命理论的一个主要原理：拉丁美洲革命的反帝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之间的辩证联系的原理。

在阿根廷共产党纲领中提到：“阿根廷共产党联合一切关心解决民主问题、土地问题和反帝问题的力量，共同进行斗争，并致力于建立国内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强大阵线。”[2] 同时，共产党人声明，他们为成立“新型的人民民主政府”[3] 而斗争，这个政府将能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拉丁美洲革命过程的现代阶段——共产党人称之为争取真正独立的斗争的阶段——上，当代的主题，即社会主义的主题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社会哲学中急剧地增长。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共产党会议宣言（一九七五年于哈瓦那）中宣称：“我们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是唯一能保证拉丁美洲得到真正迅速发

展的制度，我们的国家需要这样的发展。古巴向各国兄弟人民表明，在我们的时代，可以在美洲大陆上从事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且古巴已获得惊人的成就。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目的。”[4]

大陆上反帝运动的加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立拉美所有左派力量的统一反帝阵线中的革命作用不断增长。阿根廷的共产党人认为，共产党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它的行动纲领和行动方法深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不朽哲学所鼓舞，已成为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的必要因素”[5]。

在解放正义阵线于总统选举中获胜（一九七三年）之后，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的政治、思想和理论的斗争在阿根廷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张状况。在一九七六年军事政变之后，这一斗争的紧张程度又进一步加剧。共产党人称这种新的历史情况为阿根廷社会的结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消灭亲帝的、农业大庄园的和寡头政治的社会政治制度，就成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和“边缘的”阶层、先进的军人和“左的”基督教徒、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在阿根廷社会的各主要阶级和不同阶层之间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政治对话，主要谈的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民主革命、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问题[6]。

在阿根廷人民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的现代阶段——它的标志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形式的对话的深化——上，作为一般政治实践理论的哲学的作用在日益增长[7]。因此，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的政治意义增大了。对此深表关注的阿根廷共产党理论家有：Э．阿戈斯蒂、Р．基奥迪、М．列别金斯基、Ф．利纳雷斯、К．隆巴尔迪、Ф．纳德拉、Л．帕索，等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具体历史发展中，与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这个哲学的两个方面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和社会意识形式的相互作用的问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工人阶级、所有劳动者的科学意识形态，是他们确定反帝和社会主义目标时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它是认识"拉丁美洲现实"的革命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阿根廷的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可分为两个主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巴黎公社和阿根廷第一批革命社会组织的产生起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阿根廷共产党的建立；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在社会主义的和革命民主的团体和小组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8]。苏联的拉丁美洲学者在评述这一时期时指出："阿根廷在那时是拉丁美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中心。"[9]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阿根廷共产党于一九一八年一月的建立——它的创建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В．科多维利亚（一八九四——一九七〇年）和Р．基奥迪（生于一八九七年）——开辟了第二个时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时期[10]。知名的阿根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Л．帕索在描述这一时期的历史意义时写道："我们可以说，一九一八年在我国为马克思主义近代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创立了开端……共产党是在反对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大庄园寡头政治的斗争中诞生的，它把自己与社会改良主义区别开来。"[11]

十月革命和列宁的著作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拉美工人运动的进步活动家的思想演变，有巨大的影响。在这方面阿根廷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А．庞塞（一八九〇——一九三八年）的生活和创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是庞塞

的思想道路，按他的继承人Э．阿戈斯蒂的典型说法， 这就是“美洲知识分子命运”的公式。阿戈斯蒂还准确地确定了这样的思维形式，其中展现出“寻找新的人道主义”的过程[12]。庞塞断言：“俄国革命的理想就其普遍意义来说与五月革命的理想是同一的。”[13]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识到：在群众性社会运动的时代，阿根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根本的变化。问题在于：进步的民族知识分子是否能够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给予了明确的回答：能！但条件是知识分子要转到工人阶级立场上并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这个任务的解决因下述情况而变得复杂了：从二十世纪初起，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谓意大利学派在阿根廷得到传播(该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它与“俄国的、政治化的和科学主义的学派”相反，把重点放在“早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问题上)。Р．蒙多利福教授是“意大利学派”在阿根廷的信徒。这位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者曾自命不凡地以“批判的历史实践的哲学”的名义，在许多方面预先说出了六十——七十年代的修正主义者和叛徒——Э．费舍、Φ．马雷克、Р．加罗迪等人的思想。

阿根廷马克思主义者Э．特罗伊塞指出：在蒙多利福看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大利学派”的基本特征如下：“第一，坚决把在某种条件下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同本来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即形而上学分开；第二，把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相提并论；第三，承认伦理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意义，这个问题就在于要求人的自由作为达到未来社会所必需的起鼓舞作用的根据。”[14]

特罗伊塞在其著作《阿尼瓦尔·庞塞著作研究概述》（一九六三年）中写道：庞塞认定资产阶级的哲学观念和意识形态以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各种篡改的基础，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解释的基础，是哲学方法的问题。他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制订并论证了下述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领域所实现的革命，为新型的思考和认识世界的方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统一的国际学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是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不仅是对人类的现实历史的客观而真实的分析，而且还提出有科学根据的社会发展和人生意义的理想。从这个观点来看，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真正科学的思维形式与在革命实践和创造过程中肯定自身的人类生活本身的内在激情的统一。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道德实践的"方面，就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和对革命知识分子意识的形成产生影响这一社会历史事实。庞塞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唯一真实的能认识美洲现实的理论。"[35]

阿根廷的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美洲现实"的原理，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上，制订了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民主革命、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在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一九二九年)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它是阿根廷共产党为制订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的理论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阿根廷成为民族意识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发展的主要因素。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深化，大陆的社会政治的传统结构的总危机的深化，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强烈地要求采取积极的革命行动，这一切决定了：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基础日益扩大；第二，它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威信在拉丁美洲各界进步社会人士中不断增长。

一、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阿根廷的基本发展趋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阿根廷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即现代时期，包括从一九四五年起到现在的时期。

在第一个十年期间，在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的阿根廷哲学中，社会历史问题和文化学问题的意义急剧增长。在战后年代，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由于拉丁美洲各国对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依赖和政治依赖愈来愈多。拉丁美洲的“依赖”问题，它的性质，首先要求社会学的思考。在阿根廷，也象在许多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发展社会学颇为流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家试图论证拉丁美洲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拉丁美洲哲学意识揭示了西方的“非真实性”，暴露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化历史传统的崩溃。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知识分子的代表提出民族文化的“真实性”，它的实质、发展规律和形式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资产阶级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最大代表（P．C．奥尔蒂斯、Φ．罗梅罗、A．卡图雷利、Г．卡沙斯、H．安肯、H．德里西等），正是在考察社会经济的二律背反“依赖和解放”和文化学的二律背反“真实性和非真实性”——这些二律背反都是从拉丁美洲“历史现实的结构”的发展过程中发现的——时，企图克服阿根廷哲学传统中的自然科学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并实现哲学思维向主观唯心主义和神学的转变。

阿戈斯蒂在其著作《保卫现实主义》（一九四五年）中揭露了阿根廷资产阶级哲学的这种转变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公正地指出，现象论、不可知论、唯灵论的原理在认识论中的产生，是由于资产阶级哲学家不能理解意识和认识的社会本性。阿

戈斯蒂继续发展了庞塞提出的论题，为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制订了“夺回人”的实际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就要求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克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流派的影响，其中特别有影响的是庇隆主义的意识形态。

社会政治危机暴露了资产阶级政党和“老式”理论不能解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最尖锐的民族问题。庇隆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在这个危机的基础上产生了，到四十年代中期，得到广大居民阶层，其中包括劳动群众的拥护。毫无疑问，这种意识形态对国内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庇隆主义的思想家们试图“重新综合”资产阶级意识的二律背反，并想在宗教哲学关于社会和个人的概念即所谓的“有组织的公社”的基础上“改良”资产阶级意识。在庇隆主义的著作中大肆渲染关于庇隆主义具有“先验的”、几乎是神秘的本质，关于“正义论”[16]学说接近“阿根廷人民的灵魂”的论点[17]。

但是，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事实上，在这一现象中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B．科多维利亚、X．阿尔内多·阿尔瓦雷斯、P．基奥迪、Φ．纳德拉、E．莫雷诺、X．罗萨莱斯等人的研究，揭示了庇隆主义和正义论学说的演变的复杂而矛盾的性质。这种演变进程可以表达为：从等级的土生外族人的民族主义通过“民粹主义”达到宣传建立“民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18]。“庇隆主义的”意识模式以消除阿根廷的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盾为目标。由于一系列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它是很稳固的。它的现实支柱是具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各种各样体验和观念的中间阶层。它的政治思想观点是以“面向人民生活现实”（X．Д．庇隆）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人民生活现实”似乎形成了庇隆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事实上，庇隆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则是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和折衷主义。用列

宁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使群众感到“似是而非的满足”[19]的折衷主义，它明显地表现在“第三条道路”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上，表现在“既非资本主义，亦非共产主义”（Х．Д．庇隆）的公式中。“真正的”庇隆主义目前正经历着政治危机。这场政治危机是正义论意识形态在理论上没有定形的实际表现。

第一，在六十——八十年代，对拉丁美洲革命过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历史的分析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方法论问题的作用提高了，在这些问题中，主要是历史认识、“世界性”原则和拉丁美洲的历史辩证法的问题：一般、特殊和个别、国际的东西和民族的东西、必然和自由、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的关系。近几十年来，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提高方法论理论研究水平的基础上写出了不少有关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的著作[20]。

第二，所获得的科学成果已成为阿根廷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民族财富，它们使得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哲学的批判提高到质上全新的水平，并制订出马克思主义批判分析拉丁美洲现代唯心主义派别和学派的原则。

第三，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批判形形色色的主观唯心主义观念：“民族存在”和“阿根廷思想”，关于建立“民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正义论命题，坚决批判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同存在主义、基督教结合起来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意图，同时也承认不同世界观、不同信念的代表对话的可能性。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话是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式之一，是发展反帝意识和认识拉丁美洲现代哲学思维的特点的有效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阿根廷发展的现代时期（从一九四五年到现在）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和方法的政治作用显著增长。这是由一定的意识形态状况和社会政治状况决定的。与庇

隆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展开的．它要求阿根廷共产党及其理论家不仅要加强对庇隆主义的社会政治批判，而且要加深对“庇隆主义的社会现象”的理论分析，弄清它的理论根据．通过实际批判来克服庇隆主义学说的方法论 这只有通过创造性地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才能实现。

因此．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一般发展规律．就是传播这一思想的速度不断加快和它对民族反帝意识形成过程的革命影响不断加深。这一规律以特有的形式表现在具有民族意识的政治、思想、宗教、艺术和哲学等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功能和方法论理论功能的内在的辩证统一，是由拉丁美洲的革命过程的发展决定的。

二、马克思主义对“民族存在”和“阿根廷思想”的关系问题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形而上学的革命内容在于．第一、与那种把先验的“纯粹的”客体设定为哲学对象的思辩思维彻底决裂 第二、坚决改变哲学反思行为本身的方向．因为这种行为的对象是社会历史的(在这里是拉丁美洲的)现实。第三、大陆的革命过程的性质的特点在哲学中集中表现为在拉丁美洲各民族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的阶级斗争史上民族存在和民族意识的关系问题。

正如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表明的．哲学思想的这个关键问题是拉丁美洲现实本身的理论反映，它可能在民族的意识和知识的不同层次上表现在各种按内容和术语构成来说都不同的专门学科教育中。

例如，在现代的拉丁美洲学中，往往被称为“思想史”的哲学知识领域占有显著的地位，而拉丁美洲学的内在问题则是“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的）思想（意识）同拉丁美洲的（民族的）存

在的关系[21]。

关于"民族存在和民族意识"的产生和发展问题是"思想史"研究的出发点。许多现代的阿根廷的研究者各自从一定的大相径庭的方法论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力求创立一个关于民族认识自身存在的运动的"模式"，即"阿根廷思想的模式"[22]。

马克思主义者Р．基奥迪、Э．阿戈斯蒂、А．Г．巴尔塞洛、Л．帕索、К．М．隆巴尔迪等强调指出，批判分析"阿根廷思想史"这一现代阿根廷社会的精神生活现象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为依据指出，资产阶级哲学家对"阿根廷思想"这一术语的内容的解释带有唯灵论的印记，唯灵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论根源和历史根源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和黑格尔的观念。

阿根廷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的特征是：珍惜民族的哲学传统，渴求接受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十九世纪阿根廷哲学的唯物主义的、进步的和民主的倾向，保留它的"实践的"方向，并赋予它以辩证的和革命实践的性质。

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К．М．隆巴尔迪指出，Э．埃切韦里、Х．Б．阿利贝尔迪、Д．Ф．萨缅托第一次在阿根廷哲学思想中为历史主义问题开辟了道路；同时提到，他们的哲学观念中还保留有宗教信仰的成分。正是启蒙意识的这个层次引起阿利韦尔奇、萨缅托和埃切韦里的理论中的折衷性，这种折衷性以一种颇有调和感的特殊形式——"浪漫的民族主义"固定下来[23]。"浪漫的民族主义"对所谓阿根廷实证主义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实证主义就其哲学内容和社会政治作用来看不同于欧洲的实证主义。"阿根廷实证主义"是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意识的总方针；在地主和教权的寡头政体的政治统治的条件下，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在国内得以巩固

的基础。“八十年代的实证主义的一代”的代表（Φ．阿梅吉诺、К．О．本赫、Х．М．Р．梅希亚、Х．加西亚、А．费雷拉等）很关注“科学的分类和进步”问题。他们在区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范围内把人本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分了出来。但是，把实证主义的方法应用于分析阿根廷民族和阿根廷意识的实质，这导致对这种实质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心理学的解释，即认为这种实质就是特殊的“阿根廷的”思维形式[24]。

阿戈斯蒂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和新经院哲学家——他们认定十五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第二经院哲学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经院哲学是民族意识的“开端”——的观点，并强调说：必须辩证地和唯物主义地考察关于民族存在和民族意识的实质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民族存在和民族意识的历史起源密切联系在一起。阿戈斯蒂认为：“阿根廷的社会和文化的反常发展”的最初原因是西班牙发现本国并使之成为殖民地；在很长的时期内，阿根廷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因托马斯主义的社会理论和土生外族人对劳动的态度而变得缓慢了[25]。

因此，阿根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得出结论：社会的（民族的）存在对民族意识的形式来说是第一性的[26]。他们指出，阿根廷人民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发现的客观辩证规律展开的，它经历了一些阶段，并具有自己固有的民族特点。因此，К．隆巴尔迪写道：“作为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普遍的价值，它不是否定，而是肯定它在其中发展着的一个国家的特点。”[27]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阿根廷思想”无非说明合乎规律地彼此更替着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形式的变动，或民族对自身存在和革命前景的科学认识的增长。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民族意识的最高形式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K．阿斯特拉达（一八九四——一九七〇年）是拉丁美洲最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的研究者之一。他研究了存在和思维同一的观念。这个观念的中心思想在他那里就是下述看法：辩证的生成是世界和人的深刻的现实，而作为认识和改革活动的方法的辩证法是在直观"这一生动的和真正的过程"的基础上产生的[28]。阿斯特拉达以这些看法为根据，试图使存在主义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接近。

阿斯特拉达从批判研究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开始，后来转向辩证法的问题，这就引起他思想演变中的转折，其标志就是他逐渐地而且愈来愈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有兴趣[29]。

阿斯特拉达正确地批判了在拉丁美洲得到相当广泛传播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末世论解释"例如，在M．卡沙斯的著作中就有这样的解释 这种解释的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人、人的世界和自由的学说中"发现"宗教秩序的层次，而这个层次似乎是以神秘因素为基础的，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救世主的性质"阿斯特拉达认为这些解释的根源就在于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对存在和意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的看法。

阿斯特拉达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他对反映论和"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中。他指出，在反映论中客观现实的意识是它本身在人脑中的概念化的反映。反映论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认识论的实质"。阿斯特拉达认为，列宁所制订的反映论，是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批判地重新思考黑格尔《逻辑学》中本质观念后产生的。黑格尔写道，"存在的真理是本质"，本质的运动是存在转化为概念的过程。阿斯特拉达考虑到："这样一来，既然本质是反思在自身中的存在，那么本质就是主体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反映不可能同主体的活动疏远。应该着重指出，在反映论中发现了意识形态问题的哲学根

据。"[30]

阿斯特拉达的这一考虑表明，他"为马克思主义作的辩护"在要点上是同哲学家内心的主观意图即消除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分不开的。主体和客体在他那里是"自身同一的生活之流"的内在因素，而"存在的辩证历史性"就是这种"生活之流"的存在形式。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对存在主义哲学的露骨的非理性主义的不满，因为许多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力图靠牺牲马克思主义……来把"存在哲学"引出非理性主义和极端主观主义的死胡同。但是，问题的实质，决不因某个研究者在分析存在和意识的关系时以作为"现实的辩证生成"的存在，以装在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框子内的存在为出发点而有所改变。要知道，重要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诸范畴内装的是什么内容。在阿斯特拉达那里，这些范畴是"生活的形式"；他没有区分"生活"的客观内容和主观内容，也就是说，他没有看到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范畴的客观内容和社会历史内容。因此，阿斯特拉达批判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因为它以关于存在、社会和思维的规律有差别的原理为基础。从而在他看来，它已经离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31]。阿根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A．巴尔塞洛在批判阿斯特拉达这一观点时正确地指出："阿斯特拉达在其著作《黑格尔和辩证法》（一九五六年）中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肯定存在主义的'历史性'观念，并试图把它列入马克思主义。"[32]

马克思对存在和意识的辩证同一问题的分析法的实质是另一回事。马克思指出人的存在和意识的社会本性，存在和意识的辩证规律是对立面之间、人类实践历史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间的斗争和相互作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主客观关系的结构具有客观发展着的现实矛盾即不以个人存在为转移的关系的意义。人在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改造和认识现实，从而也改造自

己。主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和思想活动并不是“生活之流”所固有的。相反，客观存在着的和以多种方式发展着的生活，成为人赖以进行活动的内部财富。

阿戈斯蒂在其著作《复活的坦塔洛斯》（一九六四年）和《阿尼瓦尔·庞塞：悼念和回忆》（一九七四年）中分析批判了阿斯特拉达对存在和意识的辩证法的态度，并公正地指出："现实"概念对科学地认识现代"拉丁美洲现实"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他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现实范畴属于本质的范围。换言之，属于这样的范围，在这里，事物和现象不是简单地存在着，而是按照其本性存在着，对其本性的认识，就是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在阿戈斯蒂看来，"要认识和解释客观现实"，就必须依据"人与其存在条件的现实关系和思想关系的辩证统一"[33]。

在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时把重点仅仅放在"存在条件"上，这会导致理论的和政治的错误。这种情况明显地表现在《论拉丁美洲解放的哲学》一书（一九七四年）中。其中特别强调："存在主义的哲学不是'危机哲学'，而是起净化作用的'哲学危机'，这种危机为现代思维创造了开端。这种哲学促使我们与自我意识的哲学的无限权力彻底决裂。同时，它从存在无条件地先于思维的前提出发，重新考虑了阅读黑格尔的方法和黑格尔以后的社会思维方法。这一过程不是外来的而是阿根廷思想形成的内部过程，它必然会使人们发现民族的和拉丁美洲的存在，并把这种存在看成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34]

在上面所引的论点中包含着这样的提示：在阿根廷哲学中已经形成解释存在主义哲学的独特的传统，这种传统旨在阐明"民族存在"。"民族讲坛"的代表们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这里指的是二十——三十年代资产阶级哲学家C．奥尔蒂斯和Э．埃斯

特拉达想从唯灵论的自然主义的观点，后来则是M．Г．卡沙斯想从基督教的存在主义的观点进行的创立“美洲人本学”的尝试。其次，指的是哲学史教授P．蒙多利福和K．阿斯特拉达所提供的“阅读”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的“批判实践的”经验。在所考察的著作的作者们看来，阿斯特拉达是他们的最近的先驱。上面已经讲过，他提出了使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接近的任务。近年来，这种趋向不断深入，而且看来日益获得概念的和逻辑的形式。

阿根廷哲学思维的发展具有“非原来的”、依赖于欧洲形而上学的性质。在阿迪莱斯看来，阿根廷哲学的这一特点是由下述情况产生的：原来的拉丁美洲的存在，这是“还没有的存在”[35]；他由此得出主观主义的结论：拉丁美洲的存在是由哲学创造的，而哲学“实际上就是政治”[36]。把哲学与政治——它是政治运动和在当时历史阶段有影响的意识形态的实践——等同起来，这导致对哲学认识的普遍性质的否定，导致关于“我们的特殊性”和“要求解放的意志冲动”的说教，导致在理论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论点：似乎阿根廷人民在激昂慷慨地追求某种自己的“阿根廷的社会主义”。

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A．埃斯卡拉和A．里韦拉详尽地剖析了“民族讲坛”的教授们的哲学方法论观点，并提到，他们“机械地过分夸大实践在认识过程的作用，并把科学归结为实践的一个单纯要素…… 此外，实践被认为只是政治实践，而政治实践又被说成是社会意识的唯一的结构性的因素[37]。

哲学“非意识形态化”的观念表面上是与哲学（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政治化”相对立的。之所以说是表面上，因为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所追求的只是同一个目的，即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不适用于分析现代拉丁美洲的现

实。

例如，伪社会主义的理论家 Т．Ди·特利亚写道："必须榨干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便，第一，挤去它的浆液——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第二，支持科学传统与对解决具体的人的问题的关心之间的趋同原则，马克思就是伟大的严守趋同原则的人之一。"[39]这段话中明显地暴露出现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意识的一个目的，即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综合"现代哲学思维的科学主义派别和存在主义派别的理论基础。从意图来看，这种作法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在现代资产阶级意识的体系之中。

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阿根廷思想中存在和思维等同的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这一分析表明，在现代阶段，有人企图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融化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意识的思想体系之中。这一目的本身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某种意识形态（在这里是正义论的意识形态）中，引起科学社会主义和非科学社会主义（或有意识的反科学的社会主义）在处理拉美各民族的社会、民族和精神的解放问题上的矛盾态度。

事实上，这个实际问题的表现形式就是现在的拉丁美洲现实的主要抉择——革命还是反革命。社会生活的这种抉择使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这种或那种哲学观念的"科学性"和"实证性"的问题变得更为集中。阿根廷的精神局势中最重要的时刻也因此而到来了。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阿根廷的知识分子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下述原理：真正的革命不仅要在社会政治范围内，也要在对"拉丁美洲现实"的哲学科学的认识中进行。因此，关于意识形态、哲学、科学和艺术的关系的方法论问题，是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中的中心问题之一。

三、科学、意识形态和艺术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阿根廷共产党的杂志《文化手册》上进行的关于科学、意识形态和艺术的关系的讨论（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引起社会上很大的共鸣。它对进一步开展最迫切的社会哲学问题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意识形态（政治）、科学和艺术的关系的一般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功能统一的问题紧密联系着的。同时，讨论一方面服从于从理论上阐明阿根廷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三年）资料中的一系列原理的任务，另一方面，服从于对“民族社会主义”这个反马克思主义观念的理论原理的批判。专门分析这些问题的文章有：Э．巴里奥斯《德里神父、意识形态、科学和第三世界》，Ф．利纳雷斯《关于阿根廷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和艺术世界中思想工作的意义》，Е．塞德龙《文化复兴阵线的必要性》、А．比格纳米《艺术、意识形态和社会总论》。

在这些文章中提到：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歪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拉丁美洲的“左的”和右的修正主义的增强而引起的。这两种修正主义，都处在下述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第一，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第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抽象人道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解释。这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意识形态化”和“再意识形态化”的观念为基础的解释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前面已经谈过。“左的”和右的修正主义企图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内容的现实性，或是“彻底”修改这种内容。同时，这两种修正主义都以“真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自居。Э．巴里奥斯指出，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抽象的、唯心主义的

和错误的观念是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出发点。例如，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思想家来说，“意识形态是人民所达到的一定意识水平的表现。其中凝结着信念和希望、行为方法和对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看法的总和。”[39]

因此，巴里奥斯认为，例如，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意识形态范围之外的“历史科学”，这是错误的。这种企图的反面是下述论点：作为“科学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掌握了黑格尔哲学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精神”。“第三世界”的许多思想家追求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目的，以便接着否定它的科学性。巴里奥斯在批判他们的观点时写道：“在任何意识形态中，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大量思想和概念中，始终统治着一定的观点，存在着某种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规律性。”[40]

可见，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观点的基础，就是否认意识形态和科学在现实历史中相互作用的客观过程。

关于意识形态和科学在人类实践的历史上日益分离这种毫无根据的论断，导致一系列的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派别”的产生。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M．列别金斯基在其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这些“派别”。“在谈到现代的或‘新的’修正主义时，不能仅限于某一个方面。必须考察其全貌，才能看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统一的国际学说的全面歪曲。”[41]他举出哲学领域中在下述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摒弃辩证唯物主义并代之以新康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把“青年”马克思同“成熟的”马克思对立起来；把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分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等同起来；否认自然辩证法；放弃唯物主义；用主体的辩证法代替主客体的辩证法；用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偷换党性原则。

列别金斯基揭露了拉丁美洲哲学修正主义的这些派别的思想

内容和社会历史内容，并指出，“左的”修正主义的思想纲领是新无政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联盟。近年来、　　　　助长了新无政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列别金斯基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Э．弗罗姆的哲学人本学、Э．布洛赫的“希望哲学”，还有基督教的人格主义，是右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源。小资产阶级的和“中间的”阶层以及大学生的激进化是使大陆上修正主义活跃起来的客观社会因素。在这位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阶层的思想趋向具有下述基本特征：1）不考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主观主义；2）盲目相信直接行动的口号，而不管已经形成的社会政治局势；不顾一切的冒险主义，或者相反，对伟大日子的消极“等待”[42]。

阿根廷共产党的理论家在彻底批判拉丁美洲的哲学的和政治的修正主义时，维护列宁主义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哲学科学的论点。同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或那种功能能否提到首位，要视具体的社会政治局势、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而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现代的意识形态对抗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和革命的内容突出为主要的东西。它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科学意识形态。前面已经指出，在艺术创作中重要的是揭示它的社会的、阶级的和世界观的本性。

马克思主义者着重指出，在现代艺术中应该寻找能使进步的艺术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相接近的意识形态因素。反帝的立场就是这样的共同要素。Ф．利纳雷斯就此提到，部分进步的富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虽然处在庇隆主义的影响下，但“愈来愈接近于把‘民族社会主义’理解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阿根廷道路，这条道路要通过生产资料的真正而有效的社会化来实现，也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改造来实现”。[43]

利纳雷斯、塞德龙和比格纳米不缩小富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

和创作在文化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更准确地制订了“人民”这个概念，并说明了在争取“文化复兴”的反帝斗争中“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等概念的内容。他们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哲学的下述论点：如果艺术理论在分析艺术现象时从客观实在出发，那么它就是“理性的偏见”。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指出，这类思想的支柱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趋向，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已把科学思维的合理性和真理性作为疑问。

同时，需要指出，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正如它的代表们自己指出的那样失去“科学的”和“社会的”威信，各哲学派别和学派的趋异倾向破坏了哲学统一的情况下，哲学“改革”的要求被愈来愈强烈地提出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为了寻找出路以摆脱意识的危机状态，求助于现代宗教哲学。但是，他们在这里碰到那种勾销已经定型的宗教意识观念的现象。例如，“革命的基督教徒”在“争取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第一次拉美晤面会（一九七二年于智利的圣地亚哥）上，表明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天主教和大多数资产阶级哲学派别的对科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态度。在这次晤面会的文件中首先尖锐批判了天主教的社会学说。其次，十分明确地强调指出：“革命的实践表明，对拉丁美洲现实的任何科学的和客观的解释都应以阶级分析作为这种解释的关键性根据。”[44] 再次，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基督教信仰是革命过程的起动的和批判性的促进因素。”[45]

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在哈瓦那宣言中分析“左的”基督教徒的立场时提到：近年来，在下述力量中发生了深刻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的变化，这些力量过去充当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而现在已变成“进步分子，甚至具有革命的潜力”[46]。这里指的是先进的军人以及基督教徒。在宣言中声称：“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

对话、促使人们在争取深刻的改革、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威胁的斗争中达到行动统一，并为在建设新社会道路上的巩固同盟打下了基础。”[5]

四、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治对抗的社会哲学问题

在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条件下，阿根廷共产党面临的政治任务是与许多社会哲学问题紧密联系着的，这些问题要求根据事实进行研讨，并要考虑到它们的现实的民族的意义。在这类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之间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对抗的关键性问题中，首先是拉丁美洲的革命、国家和个人、民族和文化等问题。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专门分析这些复杂问题的理论研究工作，在阿根廷特别紧张地展开了。阿戈斯蒂提到，世界经济危机暴露了阿根廷资产阶级社会的“反常”发展中最尖锐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症结。关于个人、民族和文化——它们已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体系中的“螺丝钉”——的悲惨状况的问题已十分明显地出现了[6]。

新的社会历史状况不仅导致已经形成的哲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动，而且也引起阿根廷哲学所特有的一些问题。提到首位的问题有：人和历史、历史和文化、文化和民族、文化中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人的本质和存在，等等。

现代阿根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分析这些问题时，照例一开始就试图确定国家和民族、个人和文化的“明显的危机事实”。但是，他们没有理解到：现代危机问题——这是他们对自己的哲学和哲学问题的反思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反映，是“政治摆锤”在资产

阶级民主政体和法西斯式的军事极权制度之间“摇摆不定”的反映。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在寻找摆脱危机局势的出路时愈来愈固执地求助于民族主义的思想，企图赋予“民族要素”以某种只有该民族才有的“特殊精神”。这种想法是拉丁美洲各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流派和政治运动的粘结剂。与处于发展中的“趋异”状态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不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继续保留相对的整体性。拉丁美洲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所谓土生外族人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学说，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观念和理论的所有混合物中最稳定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从三十年代起，在阿根廷出现了土生外族人的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的“会合运动”。

作为“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的拉美民族主义的基础，是关于美洲的特殊存在的浪漫民族主义的观念：似乎美洲按可能性来说，可以成为世界文化和历史的精神发展中心。这种民族主义形式的政治目的就是关于北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必须争取建立这种威胁的对立物——统一的南美洲——的论点。

从二十世纪初起，土生外族人的民族主义从等级的传统主义变为以要求“秩序”为基础的“功能民主”。土生外族人的民族主义的基本理论来源是天主教的社会哲学，而它在阿根廷的最新形式则是“基督教民族社会主义”的学说。

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Х．拉沃尔德、Х．罗萨莱斯、Ф．纳德拉指出，这一学说是“真正的”（右的）庇隆主义的思想家制订的㊾。“基督教民族（阿根廷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根据，是宗教哲学关于民族和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观念，即所谓的“有组织的公社”。

Х．庇隆在其著作《有组织的公社》中描述现代危机时举出下列特征。这是价值、社会和个人的深刻危机，是物质进步和人

的生活的精神内容的分离，是科学思维形式失去与“人民生活现实”的直接联系[50]。这里他所说的“人民生活现实”是指“信仰、希望和爱基督的本质”。

庇隆主义的意识形态答应把人的真正地位还给人，却对人采取了家长式的立场，而且是以非常独特的方式采取的。庇隆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力图以煽动人心的方式采取“超阶级的立场”，并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论证先验观察者的观点，这种观点似乎能使人们超出阶级分析法。庇隆主义的思想家们照例地利用种种抽象的惯用语：“民族利益”、“民族统一”、“民族和谐”、“阶级和解”、“社会均衡”，等等。这样的立场使庇隆得以充当了民族的“仲裁人和良心”的角色。

阿根廷共产党的理论家对庇隆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政治思想批判，并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庇隆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根基是土生外族人的民族主义，其中包括作为“中间阶层”、中小民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拉丁美洲民族主义。因此，庇隆主义的意识形态加紧发展带有伦理色彩的反帝倾向，但它以空洞词句和口号的形式极不彻底地表达这种思想趋向。所谓的庇隆的反寡头政治，只是一个幌子，它有可能使民主变成“新贵族”的政治制度的支柱。这种政治目的一方面在于摘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的“桂冠”，并对之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则向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宣战”。

近三十年来，“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活中占居统治地位。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是，在温和的发展论、或多或少带有反帝倾向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口号下“调和”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对抗趋向[51]。在这些重要的思想过程的影响下，国家和社会、民族和文化的问题获得实际的政治意义。因此，阿根廷共产党的理论家认为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

——就是通过革命批判去战胜庇隆主义的意识形态

战。

B．科多维利亚在专门分析庇隆主义的报告指出，阿根廷共产党的坚持不懈的和多方面的群众工作，工人阶级自我意识和所有进步民主力量的成长的客观过程，不可能不给予庇隆主义的运动和经历了复杂而矛盾的演变的"正义论"意识形态以压力[32]。

如果说，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庇隆主义的思想家在"第三条道路"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的基础上制订了自己的观念，那么，现在提出的和加紧制订的则是建设"民族社会主义"的提纲。

重要的是指出："真正的"庇隆主义的思想家把"第三条道路"理解为表达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和各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质的最恰当的形式，并把这个国家群体的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同世界革命过程的辩证法对立起来。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不仅利用"第三条道路"这类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当资产阶级制度自我批判的工具以使其社会政治机构现代化，而且还用它们作为资产阶级的"批判武器"来同工人阶级的科学意识形态作斗争。

关于民族的东西和国际的东西的关系、关于社会方面的个别、特殊和一般的辩证法的问题，已成为现代思想斗争的中心问题。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说，除了打着"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帜有意地篡改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外，在这一概念中还有一些合理思想，正如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阿尔内多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指出的，在庇隆主义的战斗部的文件中这些合理思想往往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33]。在阿根廷共产党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在庇隆主义运动内部，旧的矛盾尖锐化了，新的矛盾产生了。在庇隆主义者的意识中逐渐出现"向左转"的倾向，这种倾向反映了劳动群众自我意识增长的过程。

阿根廷共产党在其对待庇隆主义的战略和策略中所持的出发点是分析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并分出三个相互敌对的阵营：民主阵营、资产阶级阵营和地主阵营。阿根廷是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共产党人认为，工人阶级的使命是为争取对民主反帝阵线的领导权进行斗争。只有这个阵线的政府才能实现国内真正革命的改造，从而使阿根廷人民摆脱持续不断的危机局势。共产党人批判了庇隆主义的论点：工人阶级应当在"私有制社会主义化"的基础上通过"正义的政府"使"人民资本主义化"。谁应当掌握反帝斗争的领导权，是工人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人和右翼庇隆主义领导人不可调和。阿根廷共产党为工人阶级指出的方向是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政党，这个政党不是争取资产阶级进化的某个阶段的胜利，而是争取夺得民主阵线的领导权，争取实现反帝革命的任务并随之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小资产阶级和关心对经济政治生活进行深刻改革的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参加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反帝阵线。这个阵线将为争取实现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民主革命、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而斗争。

争取建立统一反帝阵线的斗争，要求对"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和哲学的内容进行更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民族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内部，抗议抽象哲学或"学院式的"哲学的趋向在不断加强。事实上，人们称之为"抽象哲学"的是"新先验主义"的各种不同流派。"新先验主义"的最大代表们（例如，Ф．罗梅罗及其学派）认为，任何关于民族和文化的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民族和文化统一的问题，他们在普遍的先验的理性"结构"中"寻找"这种统一。他们认为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文化的危机局势就是民族和文化的分离状态，而这种分离状态似乎是由于古典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内部"不够"协调所造

成的。因此，关于民族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要用资产阶级悲剧的范畴来分析。

正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是阿根廷资产阶级哲学的对立两极之间的起加固作用的中间环节。此外，这些意识形态力求"综合"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意识的种种二律背反，并赋予这种"综合"以一定的运动方向，即向神学靠拢和寻找与基督教有联系的新形式。这种以露骨的全面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为标志的趋向，具有形而上学的、反辩证的内容。阿根廷马克思主义者着重指出，这就是为什么下述任务具有很大意义，这个任务就在于——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54]，在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国家和个人、民族和文化的问题。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戈斯蒂从理论上研究了在阿根廷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刻而广泛的来龙去脉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作出了巨大的成绩。他在说明民族和文化的统一时以马克思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办法为依据："人的存在决定意识，但意识不仅是存在的意识，而且还是活动的意识，几乎始终是感性和对象性的活动的意识。"[55]这意味着"文化是人民的劳动活动的历史。"[56]这种历史发展的内在源泉是阿根廷社会历史现实本身所包含的辩证矛盾。阿戈斯蒂用以表述这一思想的是下面的二律背反的形式："但是，除了占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的渊博学识之外，还存在着现实的文化基础，可以把这种基础理解为人民的全部活动的总和。这种基础是人民的活动，而人民的活动是壮阔而又零散的、有时是瘫痪的，因为它甚至不能满足人民的最低的和必需的需要。"[57]

阿戈斯蒂批判了资产阶级关于"阿根廷存在"的理论，揭露了"根本不合理的主题"（"本能的非理性主义"和"血统的非

理性主义”）。这些主题是拘泥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关于大地的概念（“大地之灵”和“离开使我们感到压抑的无边无际的平原过独居生活”）的民族和文化理论的根据，也是关于“创世的第三天”的宗教哲学理论（这些理论认为美洲人的“罪过”就是犯了反对圣灵的第二“原罪”）的根据。他指出，“民族和它的文化之间的分离”是民族文化危机的真正实质[58]。

在阿根廷文化的范围内有：封建教权主义的文化（其内在特征是“天主教和几乎是封建的西班牙主义”），资产阶级的文化（它的形式和现象，一方面是世界主义，另一方面是自由派的民族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等级的传统主义），还有“相当多的力求建立社会等级结构的政治民族主义流派”，最后是全部社会主义文化的现象。至少在这个范围内的某些文化中存在着上述的分离。矛盾的文化是在对立的社会力量的实际活动和斗争的进程中产生和形成的。但是，“文化继承的过程有一种使文化在民族和人民方面融为一体的趋向”[59]。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过程的“民族存在”，是矛盾的，并充满着悲剧性的要素。“阿根廷存在”的悲剧性形式，是进入危机时代的西欧文明的畸形发展的表现和反应，也是阿根廷社会本身的发展的“反常”性质的表现。

因此，阿根廷人及其世界的“悲剧”的实质是国内民族财富的异化。在这个总体异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从属机制”和统治机制，它们的社会职能就在于灌输关于阿根廷人民不能独立发展的思想。它们已固定下来，成为一定的能适应于取消民族利益的目的的意识形态结构。阿戈斯蒂作出了按革命实践意义来说非常重要的结论：“被如此歪曲了的社会意识形式是对民族的东西的双重摒弃，因为它把那些根据社会的东西从内部破坏这些因素的因素转移到民族的基础上。”[60]

阿戈斯蒂强调说，问题的实质不是在于“民族意志”和“阿根廷人的灵魂”，而是在于阿根廷人民同他们的文化之间真实存在和日益加深的分离。要揭示民族意识发展的真正内容，就应当分析使历史和文化的创造者——人民——同他们自己的文化世界相异化的整个制度。消除异化和异化了的意识的前提是，通过革命实践否定异化的客观条件即产生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客观条件本身[41]。

*　　*　　*

在阿根廷共产党纲领中着重指出：这个纲领是民主革命、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纲领，同时又是“民族意识的纲领”、“以劳动群众真正解放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的纲领”[42]。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民族自我意识发展的主要因素，它转向具体的人。对具体的人来说，“人的世界”是他的祖国以及祖国的社会和文化。

通过社会革命的方法实际解放劳动群众和个人的迫切任务，提高了对人及其世界的问题和一系列革命人道主义问题的理论研究的政治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同妄图充当整个文化运动的“原动力量和功能力量”的角色的唯心主义作斗争，而且应当成为所有左派力量的统一反帝阵线的理论纲领。

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与现代拉美资产阶级哲学的不断对抗之中，它以各种形式给予拉美哲学意识的发展以不断增长的影响。这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已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和宗教的哲学流派的组成部分；表现在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宗教的“客观主义”；表现在试图用抽象人道主义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同存在主义和基督教结合起来。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还表现在：社会哲学对抗的理论“场所”，主要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之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意识之间

的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在历史认识的方法论领域内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求探讨拉丁美洲的哲学史观念和大陆革命过程——这一过程是以社会实践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具体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1　X．阿尔内多《为新的、自由的阿根廷团结起来》197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11页；还可参看新当选的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A．法瓦的发言：《组织一个争取民主开放的同盟》198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

2　《阿根廷共产党纲领》196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31页。

3　同上，第31页。

4　《拉丁美洲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人民福利、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1975年莫斯科版第37页。

5　X．阿尔内多《为新的、自由的阿根廷团结起来》第5页。

6　参看X．阿尔内多《争取新的和自由的阿根廷》，载于《拉丁美洲》1974年第1期。

7　例如，正在积极努力地创立以人本主义为方向的"拉美解放哲学"，它的代表以"新方法阅读"存在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试图证明"哲学实际上就是政治"。参看《拉丁美洲解放哲学概论》197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11页。

8　关于这一时期的类似特征，可参看Г．Н．博伊科《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阿根廷的发展》，载于《阿根廷的文化》1977年莫斯科版；《基奥迪论文和演说选集》1971年莫斯科版。

9　《伟大的十月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1978年莫斯科版第18页。

10　В．М．贡恰罗夫《卡马拉达·维多利亚》1980年莫斯科版。

11　П．帕索《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阿根廷》，载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我们的同时代人》197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191页。

12　Э．阿戈斯蒂《保卫现实主义》1945年蒙得维的亚版第137—138页；作者同上，《阿尼瓦尔·庞塞：悼念和回忆》197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

13　引自Э．阿戈斯蒂《保卫现实主义》第137—138页。

14　Э．特罗伊塞《蒙多利福教授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载于《文化手册》1963年第65期第27页。

15　引自Э．阿戈斯蒂《保卫现实主义》第136页。

16 “正义”一词西班牙文为“Justicia”

17 Φ．纳德拉《民族的社会主义》197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 9—10页，在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对这一论点作了批判分析。参看，例如，《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吗？》197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

18 X．罗萨莱斯《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197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21页

19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7 页。

20 1969年，在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创办了以维克托里奥·科多维利亚命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心。Л．帕索把这个组织的活动分为三个主要方面："在群众中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在民族的东西、本国史、工人运动方面研究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在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和其他领域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建立档案和信息中心是刻不容缓的任务。"（Л．帕索《研究中心的任务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载于《文化手册》1973年 第37期第26页）。

21 整个大陆共同的历史规律性与该地区各国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发展的特点的复杂交错，还有对国家和民族的形成深有影响的文化因素的独特性，使得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形成了。民族的自我意识成长过程使得一种颇有调和感的特殊形式——"浪漫的民族主义"出现，它采用了文化思想流派"阿列尔主义"的形式。这个流派是用一个乌拉圭人Э．罗多的书《阿列尔》（1900年）命名的，它为所谓关于思想的文学即土生外族人的自我意识理论创造了开端

22 参看A．卡图雷利《现代阿根廷的哲学》197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法雷《阿根廷哲学的五十年》195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高斯《西班牙语的思维》1945年墨西哥版；因赫尼罗斯《哲学对阿根廷文化的指导》196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科恩《阿根廷思想》196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Φ．罗梅罗《论美洲哲学》195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托尔西亚·埃斯拉达《阿根廷的哲学》1961年版；塞亚《伊比利亚美洲思想史模式》1956年墨西哥版；《拉丁美洲的文化和社会》，载于《墨西哥大学评论》1972年 第26卷。

23 参看K．隆巴尔迪《阿根廷的社会思想》196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

24 参看佩雷尔斯泰因《阿根廷的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196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

25 参看Э．阿戈斯蒂《工程师。青年的公民》195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31页。

26 参看K．M．隆巴尔迪《阿根廷的社会思想》。

27 K．M．隆巴尔迪《赫伯特·马尔库塞或总体否定的哲学》197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138 页。

28 E．阿斯特拉达《马克思主义和末世论》195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170页。

29 参看E．阿斯特拉达《存在主义的游戏》193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现象学的唯心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形而上学》193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马克思和黑格尔》195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

30 E．阿斯特拉达《辩证法的两面》196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51页。

31 参看E．阿斯特拉达《马克思主义和末世论》第174页。

32 A．巴尔塞洛《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科学的辩证法》197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80页

33 P．阿戈斯蒂《阿尼瓦尔·庞塞：悼念和回忆》第10页。

34 《拉丁美洲解放哲学概论》第11页。

35 O．阿迪莱斯《印度伊比利亚美洲哲学史覆灭的根据》，载于《论拉丁美洲解放的哲学》第26页。

36 同上书，第21页。

37 A．埃斯卡拉和A．里韦拉《民族讲坛，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原因和结果》，载于《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吗？》第148页。

38 T．迪特利亚《社会实践的社会学》，载于《拉丁美洲社会学评论》1967年第111卷第1期第86页

39 J．巴里奥斯《德里神父、意识形态、第三世界》，载于《文化手册》1973年第35期第4页。

40 同上书，第10页

41 M．列别金斯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成果》，载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我们的同时代人》197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199页。

42 参看M．列别金斯基《马克思列宁主义面临着'左的'和右的（一般的和阿根廷的）修正主义》197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66—68页。

43 Φ．利纳雷斯《'民族社会主义'和民族文化》，载于《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吗？》第216页。

44 《争取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第一次拉美晤面会》，载于《民族现实手册》1972年第13期第253页。

45 同上。

46 《拉丁美洲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人民福利、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第40页。

47 同上书，第45页。

48 参看P．阿戈斯蒂《复活的坦塔洛斯》1969年莫斯科版第14—17页。

49 参看《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吗？》

50 A．庇隆《有组织的公社》196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9—10页。

⑤① 参看T．多斯·桑托斯《依附的新性质》，载于1968年《本国社会经济手册》。

⑤② 维·科多维利亚《庇隆主义"向左转"的意义》196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4卷。

⑤③ 参看X．阿尔内多《争取新的和自由的阿根廷》第196页。

⑤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4页。

⑤⑤ Э．阿戈斯蒂《保卫现实主义》第21页。

⑤⑥ Э．阿戈斯蒂《民族和文化》1963年莫斯科版第15页。

⑤⑦ 同上书，第11页。

⑤⑧ 同上书，第73页。

⑤⑨ 同上书，第28页。

⑥⓪ 同上书，第163页。

⑥① 参看Э．阿戈斯蒂《复活的坦塔洛斯》第106页。

⑥② 《阿根廷共产党纲领》第53页

结 束 语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国外几个国家战后几十年发展的分析，展现了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争取对科学认识和社会实践当前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答案而进行富有成果的创造性探索和有效的思想斗争的广阔画面。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由于是各国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组织和文化组织的意识形态活动的理论基础之一，在其发展中不仅为社会进步和科学认识的迫切任务所制约和决定，而且本身是这些任务顺利解决的最重要条件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其他思想因素中的作用特别表现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这种社会的特点是主观因素的意义不断增长，劳动群众的觉悟、思想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过程的共同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倾向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首先表现在哲学研究与具体历史实践的密切联系、哲学研究的党性、国际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哲学、各种修正主义表现的积极斗争上。

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共同发展过程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尽力促使对科学认识和社会实践的迫切问题作出彻底辩证唯物主义的解答。对他们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著作的分析表明，他们在对哲学的物质概念、唯物主义一元论、物质运动的各种不同形式、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世界的可认识性、决定论、发展的辩证法、反映的能动性、目的设定等进行马克思主义解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家积极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分割的统一，驳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学说的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对立起来或贬低其中一个方面的意义的各种企图。在那些需要克服某些修正主义倾向和比较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影响的国家里（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特别多的关注。

所考察的各个国家战前发展的不同水平、对在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历史阶段上产生的主要社会经济任务的特殊解决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在哲学问题的解决中除了原则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以外，侧重和强调的方面各有不同。对此有影响的还有一个情况，即在一些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基础（工业化、集体化、文化革命等）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全套社会改造任务是比较连续地、按阶段地实现的，而在另一些国家里，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在不同社会领域中远不是一样的。

哲学研究的主要兴趣、课题、方向的形成以及全部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首先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任务所决定。同时，特定国家精神生活中的哲学史传统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也对这一课题的形成打上一定的烙印。例如，在波兰，研究形式逻辑问题的丰富传统促使波兰哲学家特别重视论证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相互关系，思维和认识的辩证方法与形式逻辑方法的相互关系，阐明辩证方法和局部科学方法的联系和区别，等等。因此，在五十——七十年代，属于科学认识的逻辑领域的课题得到了大量研究。

辩证逻辑问题在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刊中也进行了

积极的探讨。他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弄清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相互关系上。这是因为要反对“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否定客观现实中的辩证法。

传统对哲学课题的影响也表现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哲学书刊中。在保加利亚，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与反映论有关的课题的悠久传统（从保加利亚共产党创始人 Д．布拉戈耶夫的创作开始），由于 Т．帕夫洛夫及其后继者的贡献今天已变成为保加利亚哲学思想的主要方向之一和显著特色。

在匈牙利的哲学书刊中，论证理论认识问题与对作为有目的的变革活动的劳动的分析的联系占据了重要地位。匈牙利学者们依靠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Д．卢卡奇的传统，力求全面表明，必须在社会关系的背景上把认识看作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由于我们时代所特有的某些新的思维方式方法，首先是在生理学和心理学学说的发展中、在把目的说明方法广泛引入科学的控制论的理论问题研究中目的分析作用的提高，又由于对社会管理、预见和计划的方法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匈牙利哲学家把目的问题以及与之有关的人的哲学社会学问题在理论认识研究中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

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的共同趋势，是逐渐把与分析社会主义发展的标准和阶段、研究由建设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所决定的各种不同社会过程有关的社会哲学课题提到首位。这种课题的特别迫切性，首先是由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都面临的直接实践任务这一点决定的。科学地解决与此有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党的战略策略的正确制定，而这又决定社会进步的速度、社会主义社会完整体系各组成部分发展的和谐。此外，在理论上正确解决与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有关的问题，对顺利进行反对当

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有重大的意义。

上述情况决定了，那些与使对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解深化和具体化、提高主观因素的作用和活动的有目的性质、完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培养和谐发展的个性有关的哲学问题具有最迫切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家的著作中分析了与建设和完善发达社会主义有关的广泛问题。深入探讨了研究成熟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以及阶段划分的界限和标准、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特点和辩证法、生产力的完善和发展规律问题、社会关系问题、社会阶级结构问题、社会认识和社会管理问题、精神生活问题、科技革命成果与社会主义发展可能性结合的方法、社会主义型个性的形成途径等。

例如，民主德国的哲学家在设法揭示认识理论作为工人阶级、全体劳动者在完成其历史使命过程中的理论工具的作用时，把主要注意力用于论证具体历史实践对认识的意义、分析一定社会经济形态所固有的认识过程的构成因素、对比各种不同社会认识主体的评述等。在这种场合下，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首先从意识形态对认识、对知识变为信念的过程的影响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而传统的哲学真理问题则主要从其意识形态内容和实践意义方面来进行分析。对历史过程的辩证法、首先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动力、源泉、规律和趋势的分析，在民主德国的哲学社会学书刊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之一。

在保加利亚，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首先是作为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管理意识形态和精神过程的问题进行解释的。上面指出的这个国家的哲学课题的特殊性（全面研究反映

论）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中也有所表现。保加利亚哲学家特别注意对社会认识和社会管理的方法论方面的揭示、对社会主义社会意识的全面分析、以及作为科学地完善社会发展控制的经验基础的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哲学家的著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前者那里，它是同驳斥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者一度提出的使哲学"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反对他们使哲学问题和哲学范畴的研究脱离社会实践、脱离共产党的政治活动的企图联系在一起的。在后者那里，它首先是由反对"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结集在《实践》杂志周围）的斗争决定的，因为他们把科学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把意识形态解释为认识的异化形式，认为它与科学真理正相反对。

社会主义国家学者们对当代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问题的研究也属于迫切的哲学社会学问题。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驳斥了关于工人阶级似乎正在失去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将这种作用让给知识分子的非马克思主义论断。他们反对在社会学分析中用非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取代阶级和党性立场的企图。

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哲学书刊中对当代迫切问题的正面研究是和反对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的积极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进行的。受到批判分析的首先是那些或是直接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或是构成现代修正主义基础的理论。哲学家们现在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主要问题，是反映论问题（特别是主体反映客观现实的能动性问题）、历史主义和历史预见问题、哲学和政治的一元论和"多元论"问题、人的问题、对反共主义和反苏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哲学史研究作为思考领会世界和本国哲学思想发展经验的必

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得到广泛发展。这种研究揭示出哲学的前进运动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在最重要哲学问题上的斗争史的总画面。主要研究线索是联系到这个或那个民族和整个人类精神文化总发展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哲学史研究的最重要方向是揭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有关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社会主义国家对哲学科学迫切问题的共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由于进行学术合作的结果，提高了哲学著作的思想理论水平，扩大了在双边和多边的哲学会议和座谈会上讨论问题的机会。在许多合作撰写的著作中，特别突出的有苏联和保加利亚关于反映论的著作，苏联和民主德国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辩证法的著作，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关于科技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结合问题的著作，苏联和波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发展问题的研究以及其他的著作。

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统一的国际学说是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所有队伍，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队伍共同发展的。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表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传播、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发展的迫切问题，密切联系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面临的任务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这种工作的结果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对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拥护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劳动者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中，既有所有国家共同的规律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特点表现在经常关心传播和

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和解决新问题、密切联系社会政治实践、在哲学两个阵营搏斗中起积极作用、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哲学中两个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归根到底反映资本主义社会敌对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列宁写道:“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1] 这一列宁主义原理也完全适用于对资本主义国家当代哲学思想的分析。

共同规律性也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历史主义、党性、国际主义这些统一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他们强调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决不象它的敌人所断言的那样是“封闭的教条体系”,相反，它是一种创造性的、不断发展的科学哲学，对人类科学成果中一切珍贵东西都敞开着大门，但是它把一切蒙昧主义、信仰主义、唯心主义、反人道主义的理论都拒之门外。

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不断深化它的原则、用新的原理和结论丰富它，是它发展必须的条件。列宁写道:“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2]

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揭示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列宁阶段的丰富性和现实的世界历史意义。他们表明，列宁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和总结世界历史实践、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制定了新的原理和结论，丰富了它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和修正主义者把列宁主

义与马克思主义分割开的企图进行了认真的科学批判。他们证明、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把列宁主义说成只适用于“落后国家”的“纯粹俄国”学说的企图。他们强调指出列宁主义作为科学制定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的理论基础的重大意义。

除了共同规律之外，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其特征，这些特征是由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及其他因素决定的。这些特征表现在研究课题的选择、哲学传统在该国的影响、理论活动本身的组织（学派、论争的存在）等上面。

法国、意大利、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研究唯物辩证法和认识理论方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他们发展列宁的反映论，反对把它描绘成为“消极和直观”理论的企图，强调指出它的能动性质、启发和改造的作用。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即在对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的研究方面，获得了重要的成果。关于人、个性心理学、人道主义的问题的著作非常出名。

对科技革命的本质和社会后果、它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表现的特点的研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于从方法论上保证科学认识的需要增长了。在英国、联邦德国和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高度重视科学学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于科学发展的方法论意义的分析。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制度演变的问题以及生态学问题方面，展开了积极的工作。

旨在批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增长阶段”论、“趋同”论、“后工业社会”论等，受到了科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证明了，在科技革命条件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没有削弱，而是越来越尖锐化。所以，尽管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动力在社会进步中起主导作用的原理丝毫没有失去意义。在他们的著作中，否定工人阶级历史使命、说工人阶级已“资产阶级化”、与权势集团“一体化”、“融化在中等阶级中”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调都受到了批判。

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它的最流行流派——逻辑实证主义、一般语义学、语言分析、“批判理性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新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和新托马斯主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表明了马克思学家和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及其他哲学流派“结合”的企图站不住脚。

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反共辩护士们在“个性自由”和“保卫人权”的口号掩护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外反动政策辩护。他们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真正科学性质、有效的革命本质。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指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步哲学家的人道主义观念中的某些积极方面。

坚决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哲学家对各种各样笼统地批评现实社会主义的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发展中的继承性原则的作法（包括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内），进行了批判。他们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利用“欧洲共产主义”思想来反共反苏、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企图。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完整性和统

一，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可能有各种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论点。马克思主义“多元化”论点的基础，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对立的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动机。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被创造性运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结论，具有普遍的性质。

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国际性质，不仅是由于它与人类科学思维的历史发展有联系，而且主要是由于它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与工人阶级的国际性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列宁主义是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完整的、不断发展的学说。”[1]列宁主义也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是国际性的。所以，把工人阶级的统一革命学说按地区或民族特征加以划分的企图没有任何科学根据，是为了达到反动的目的：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取消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

国外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工作条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有一定的困难和不平衡性。探索现代科学认识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产生的新问题的解决办法，并非总是成功和正确的。并非所有的理论观点都是经过充分深入推敲的和无可争议的。

有时可以听到似乎马克思主义正在经历“危机”的声音。Ю．В．安德罗波夫指出：“然而这里的问题完全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危机’。问题在别的地方，在于某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不能够达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真正理论思维高度，不善于在具体研究具体问题的过程中运用他们学说的巨大精神力量。”[2]

在现代条件下，必须保证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理论工作有新的更高得多的水平。К．У．契尔年科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一九八三年）上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应该更深刻地分析社会主义国

家中的社会政治过程，全面巩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途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选择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的发展的最新特点，现时代的全球问题。”[5]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整个说来在传播、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反共主义和反苏主义、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活动有助于一切反帝力量在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的团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正在为加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进行大量工作；许多先进的自然科学家以及进步的哲学家正在成为唯一科学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随者。国外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列宁阶段、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重大贡献。

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79页。

2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87页。

3 《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诞辰110周年：苏共中央1979年12月13日决议》1979年莫斯科版第1页。

4 Ю．В．安德罗波夫《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问题》1983年莫斯科版第30页。

5 《1983年6月14—15日苏共中央全会材料》1983年莫斯科版第33页。

人 名 索 引

A

B

C

D

E

F

H

K

L

M

N

P

Q

R

S

T

W

X

Y

Z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上、下册）
作者＝
页数＝７２５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Ｖｓｓ号＝８３４８０８９６